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沙皇俄国

人民出版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沙皇俄国

（文章摘编）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沙皇俄国
（文章摘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25印张 595,000字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1042 定价 1.40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一九一七年沙皇反动统治被推翻的三百多年中，沙皇俄国一直穷凶极恶地对内镇压各族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掠夺别国领土，争夺世界霸权。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沙皇俄国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愤怒的谴责，指出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镇压**“解放运动的宪兵”**。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它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国内各族人民，疯狂地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择手段地对别国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妄图称霸世界，胃口比老沙皇更大。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替自己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公然篡改和伪造历史，竭力为老沙皇翻案，充分暴露出新沙皇的丑恶面目。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对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为此，我们编印了这本书。在本书中除了摘编革命导师有关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论述，还摘编了革命导师有关沙皇俄国对内实行专制制度，残酷压迫、剥削国内各族人民的若干论述。

本书所摘编的文章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某些注有星花的标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编者所加的。作者署名加上方括号的，表示还不能确定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写的，或

F154/15

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为了便于阅读，在书后附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集》或《选集》中的有关注释，有的注释本书编者作了一些删节和修改。为了便于查考，书后还附录了革命导师有关著作目录。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希望对本书的选编工作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五年十月

目　录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 俄国的照会（1848年8月1日）…… 1

恩格斯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摘录）
（1848年8月7日—9月6日）…… 8

[马克思、恩格斯] 新"神圣同盟"（1848年12月30日）……12

恩格斯　俄国人（1849年4月21日）……14

恩格斯　同盟中的第三者（1849年5月3日）……17

恩格斯　沙皇和他的藩臣们（1849年5月8日）……19

恩格斯　匈牙利（摘录）（1849年5月18日）……21

马克思和恩格斯　国际述评（一）（摘录）
（1850年1月31日至2月）……25

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摘录）（1851年4月）……27

马克思和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
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摘录）
（1853年3月12日—22日之间）……28

恩格斯　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1853年3月23—28日之间）……32

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摘录）（1853年3月底）……37

恩格斯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年4月初）……41

马克思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摘录）（1853年5月24日）……47
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1853年5月31日）……49
马克思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摘录）（1853年6月7日）……52
马克思　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摘录）（1853年6月21日）……56
马克思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摘录）（1853年7月1日）……62
马克思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摘录）（1853年7月12日）……68
马克思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摘录）（1853年7月19日）……71
马克思　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摘录）（1853年7月29日）……76
马克思　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摘录）（1853年8月5日）……82
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在下院（摘录）（1853年8月19日）……86
马克思　帕麦斯顿勋爵（摘录）（1853年10月—12月初）……92
第二篇（摘录）……92
第四篇（摘录）……94
第六篇（摘录）……96
第七篇……97
第八篇……105

马克思　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摘录)
(1853年10月18日) …… 115
恩格斯　神圣的战争 (1853年10月27日左右) …… 117
马克思　东方战争(摘录)(1854年1月14日) …… 122
马克思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1854年3月21日) …… 127
马克思　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
——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摘录)(1854年7月4日) …… 138
马克思　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马德里报刊
(摘录)(1854年8月15日) …… 143
恩格斯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摘录)(1855年4月17日左右) …… 146
恩格斯　俄国军队 (1855年11月2日左右) …… 151
恩格斯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1857年1月底—2月初) …… 157
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1857年3月18日左右) …… 163
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摘录)(1858年9月28日) …… 166
马克思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58年10月1日) …… 167
恩格斯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1858年10月8日左右) …… 170
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1858年10月25日左右) …… 177
马克思　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1858年12月29、31日) …… 182
(一) …… 182
(二) …… 187
恩格斯　萨瓦、尼斯与莱茵(摘录)(1860年2月) …… 191
四 …… 191
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摘录)(1860年2—11月) …… 201
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 201
马克思　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1860年9月17日) … 221
恩格斯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1866年1月底—4月6日) …… 225

一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 225
二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 228
三　民族理论之运用于波兰 …… 232
马克思　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1867年1月22日） …… 236
恩格斯　俄国状况（1871年3月15日左右） …… 242
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摘录）（1874年5月—1875年4月） …… 246
一　波兰宣言 …… 246
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 253
恩格斯　支持波兰（发表于1875年3月24日） …… 266
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1875年5月） …… 270
恩格斯　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发表于1876年1月22日） …… 273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摘录）（1876年12月18日） …… 275
恩格斯　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摘录）
（1878年1月12日） …… 277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摘录）（1878年2月4日） …… 279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摘录）（1878年2月11日） …… 282
恩格斯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摘录）
（1878年2月中—3月中） …… 286
马克思和恩格斯　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
年纪念大会（1880年11月27日） …… 290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2年1月21日） …… 293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摘录）（1882年2月7日） …… 29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摘录）（1882年2月22、25日） …… 298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摘录）（1885年4月23日） …… 30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摘录)(1886年9月13—14日) …… 304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摘录)(1886年9月13日)…… 308
恩格斯　欧洲政局(1886年10月25日)…… 310
恩格斯致若昂·纳杰日杰(摘录)(1888年1月4日) …… 319
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889年12月—1890年2月) …… 322
一 …… 322
二 …… 331
三 …… 339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摘录)
(1890年4月3日)…… 361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摘录)(1891年8月17日)…… 363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摘录)(1891年10月13日) …… 365
恩格斯　德国的社会主义(摘录)(1891年10月)…… 367
二(摘录) …… 367
恩格斯　欧洲能否裁军?(摘录)(1893年2月) …… 375
五 …… 375
六 …… 378
恩格斯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1893年6月9日)…… 382

列　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摘录)(1895年秋) …… 385
中国的战争(发表于1900年12月)…… 387
危机的教训(发表于1901年8月) …… 392
芬兰人民的抗议(发表于1901年11月20日) …… 397
给农村贫民(摘录)(1903年3月) …… 402

2.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摘录）…… 402
五一节 传单草稿（1904 年 4 月）…… 406
旅顺口的陷落（发表于 1905 年 1 月 14 日〔1 日〕）…… 410
五一节（1905 年 4 月 12 日〔25 日〕以前）…… 418
覆灭（发表于 1905 年 6 月 9 日〔5 月 27 日〕）…… 422
最新的消息（1905 年 11 月 4 日〔10 月 22 日〕）…… 426
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发表于 1905 年 11 月 16 日〔3 日〕）…… 427
关于斯托雷平的声明 宣言草案（1907 年 2 月底）…… 434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摘录）
（1907 年 3 月 21—25 日〔4 月 3—7 日〕之间）…… 437
政治评论（摘录）（发表于 1908 年 2 月 26 日〔13 日〕）…… 448
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摘录）（发表于 1908 年 7 月 23 日〔8 月 5 日〕）… 450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发表于 1908 年 10 月 16 日〔29 日〕）…… 454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发表于 1909 年 7 月 11 日〔24 日〕）…… 464
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发表于 1909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3 日〕）… 469
对芬兰的进攻（发表于 1910 年 4 月 26 日〔5 月 9 日〕）…… 472
革命的教训（发表于 1910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2 日〕）…… 477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发表于 1911 年 2 月 8 日〔21 日〕）…… 483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发表于 1911 年 3 月 19 日〔4 月 1 日〕）…… 487
斯托雷平和革命（发表于 1911 年 10 月 18 日〔31 日〕）…… 496
饥饿（发表于 1912 年 3 月 17 日〔30 日〕）…… 505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发表于 1912 年 5 月 6 日）…… 507
最后一个汽门（发表于 1912 年 8 月 5 日）…… 511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发表于 1912 年 10 月 21 日）…… 517
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摘录）（1912 年 11 月）…… 519

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1912年11月中)…… 521
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 525
各等级和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发表于1913年8月28日)…… 533
民族平等(发表于1914年4月16日)…… 536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发表于1914年4月22日)…… 538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发表于1914年12月12日)…… 547
社会主义与战争(摘录)(1915年7—8月)…… 552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摘录)…… 552
第二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560
论单独讲和(发表于1916年11月6日)…… 567
远方来信(摘录)…… 575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1917年3月7日〔20日〕)…… 575
第四封信 如何争取缔结和约?(摘录)
(1917年3月12日〔25日〕)…… 58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摘录)
(1917年4月14—22日〔4月27日—5月5日〕)…… 592
8.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592
乌克兰(发表于1917年6月28日〔15日〕)…… 597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摘录)
(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 599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摘录)(10月26日〔11月8日〕)…… 599
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摘录)
(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 602
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1920年3月1日)…… 604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摘录)(1921年12月23—28日)…… 608
1.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1921年12月23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
九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摘录) …… 608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笺(1922年10月6日)…… 610

斯 大 林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摘录)
(发表于1901年11月、12月) …… 611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摘录)
(发表于1904年9月1日) …… 613
各民族友爱万岁!(1905年2月13日)…… 615
告公民书。红旗万岁!(1905年2月15日) …… 617
反动加紧起来了(发表于1905年10月15日)…… 621
国际反革命(发表于1906年7月14日) …… 625
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1913年1月9日)…… 627
我们在东部的任务(摘录)(发表于1919年3月2日) …… 631
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摘录)
(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 …… 632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摘录)
(发表于1921年2月10日) …… 633
三 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摘录) …… 633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摘录)
(发表于1923年3月24日) …… 637
一(摘录) …… 637
论列宁主义基础(摘录)(发表于1924年4—5月) …… 640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摘录) …… 640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录)
(1927年3月1日)…… 643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摘录)
(1930年6月27日) …… 645
三 党(摘录) …… 645
二、党内事务的领导问题(摘录) …… 645

注释 …… 65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篇目索引 …… 706

[马克思、恩格斯]

俄国的照会

（1848年8月1日）

科伦 8月1日。俄国的外交当局暂时以通告的形式给俄国驻德国的各个使馆送来了一个照会，而没有送来军队。这个照会首先在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的官方报纸[1]上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不久又受到别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刊的友好欢迎。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先生所受到的这种借以进行正式外交活动的欢迎越是异乎寻常，这种活动也就越值得仔细研究。

在1848年以前的美好日子里，德国书报检查机关关心的是不许报纸刊载一句不利于俄国政府的话，甚至在希腊或土耳其的报道栏里也是这样。

在不幸的三月事件之后，可惜这个方便之门被关闭了。因此涅谢尔罗迭才成为政论家。

在他看来，“仇恨俄国的情绪似乎暂趋缓和的德国报刊”，对于俄国在边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散布了“毫无根据的推测和解释”。他用十分温和的语调说完后就提高嗓子说：“德国报刊每天都在散布极荒谬的谣言，对我们进行极卑鄙的诽谤。”接着又说什么“狂暴的叫喊”、“狂人”和“阴险的诡计”等等。

在最近的一件报刊审判案中，德国国家检察官便可以把俄国照会当做据以控诉的可靠文件。

为什么要攻击德国的报刊，尤其是“民主的”报刊而且在可能

的时候还要消灭它呢？因为它不承认俄国皇帝的“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和“真诚爱好和平的愿望”！

涅谢尔罗迭代表他的统治者问道：“德国怎么能抱怨我们呢？当征服者在大陆上实行残酷统治的期间，俄国**为了支持**德国**维护它的完整和独立**而流过血。俄国的领土早已解放，但是俄国仍然在欧洲各个战场上继续援助自己的盟友德国。”

虽然俄国以高薪雇佣了大量的暗探，但是，如果俄国想在1848年拿所谓的解放战争来博得他人的好感，那就大错特错了。俄国真的为我们德国人流过血吗？

1812年以前俄国“支持”德国的“完整和独立”不过是表面结成同盟，暗中却和拿破仑订立密约，而且后来还靠抢劫和掠夺充分地补偿了自己的所谓援助。这点姑且不谈。后来俄国帮助的是和它联合的各邦君主，支持“天赋的”专制制度的代表反对由于革命而升到统治地位的人民，虽然它曾发表过卡里斯宣言[2]。神圣同盟和它的决非神圣的行动，在卡尔斯巴德、来巴赫、维罗那等地召开的强盗式的代表会议，俄德对一切自由言论的追究，——也就是俄国从1815年以来所执行的全部政策，自然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罗曼诺夫王朝和它的外交家们可以放心，**这**笔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至于谈到俄国1814年和1815年的援助，那末我们别的情感都有，只是不会对这种英国经济支持下的援助有感激之情。

这件事情的原因对所有明察事理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至少要撤去三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涅谢尔罗迭先生所推崇备至的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三十三年来使我们所处的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

个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德国其他地方也许早就达到莱茵河左岸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所达到的地步了；我们这里现在也许既没有乌刻马克贵族，也没有波美拉尼亚的万第人了。我们也许不必呼吸“历史的”、“基督教德意志”沼泽里的窒息空气了。

但是，俄国是宽宏大量的。即使对它不表示任何谢意，俄国皇帝仍会象从前那样对我们怀着“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的确，“尽管蛮横无礼和出言伤人，也不能改变我们的（俄国的）① 感情”。

这些感情目前表现在“消极观望的政策”上。应当承认，这种政策俄国运用得非常巧妙。它善于等待，一直要等到适当的时机。虽然从三月起俄国就大量调动军队，但是涅谢尔罗迭先生却非常天真，要我们相信俄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有典型的“先生们，准备马吧！”[3]的说法，虽然华沙警察局长阿布拉莫维奇流露了真情，发表了反对德国人民的恶毒言论，虽然（确切些说是由于）彼得堡发出了威胁性的别有用意的照会，俄国政府却仍然力争“和平与和解”。俄国仍然是“真诚爱好和平的，并且抱着防御的态度”。根据涅谢尔罗迭的通告，俄国本身是容忍而虔诚的，虽然它屡次无辜地遭到侮辱和损害。

现在我们举出照会中所提出的德国对俄国犯下的几个罪行：（1）“敌对的情绪”，（2）“要求全德实行改革的狂热”。回答沙皇这种善意的竟是“敌对的”情绪！太对不起我们亲爱的内兄的情谊了！加之还有这个可诅咒的病魔——“要求改革的狂热”！实际上它最可怕，虽然这里把它放在第二位。俄国有时还把另外一种疾病——霍乱传染给我们。这不去管它！但是这种“要求改革的狂热”不仅能传染，而且有时还非常厉害，使得高贵的先生们不得不

①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急忙跑到英国去[4]。也许“德国人要求改革的狂热”就是制止俄国在三四月里侵入德国的原因之一吧？第三个罪行是：法兰克福预备国会宣布，目前与俄国作战是必要的。俱乐部和报纸上也有同样的声明，这就更加不可饶恕了，因为根据神圣同盟的决议和俄奥普三国最近签订的条约，我们德国人只应该为各国君主的利益流血牺牲，而不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流血。第四个罪行是：德国有人主张恢复旧波兰1772年时确有的疆界[5]。真该先挨顿鞭子，然后再发送到西伯利亚去！但是，并没有这样，当涅谢尔罗迭写他的通告时，他还不知道法兰克福议会对兼并波兹南问题①表决的结果。议会为我们赎了罪，所以沙皇口边现在露出了温和的、宽恕的微笑。德国的第五个罪行是：“它对北方的一个君主国发动了一场值得惋惜的战争”。鉴于俄国政府威胁性的照会获得了成功，德国军队根据波茨坦的命令急忙撤退，并且考虑到普鲁士驻哥本哈根大使就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所作的声明[6]，对于德国的这种卤莽行为可以从轻处罚，无须象没有这些情况时那样严厉。第六个罪行是：“公开鼓吹德法订立攻守同盟”。最后，第七个罪行是：“收容波兰难民，让他们免费乘坐火车到波兹南参加起义”。

要不是外交家一流的人物的舌头给他们提供了“掩盖自己的思想”的工具，那末涅谢尔罗迭和内兄尼古拉本该欢天喜地拥抱我们，热烈地感谢我们。因为我们用了一切优待办法诱出法、英、比等国的波兰人，把他们送到波兹南去，以便在那里用霰弹和榴霰弹来扫射他们、用硝酸银来给他们打烙印、枪杀他们、给他们剃光头等等，此外还尽可能地用克拉柯夫叛变者的炮弹把他们消灭干净。

难道俄国对德国这七条滔天罪行的答复竟是保持防御状态而不企图进攻吗？是的，的确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俄国外交家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71页。——编者注

要全世界向他的皇帝的爱好和平与宽大为怀的精神跪拜。

根据涅谢尔罗迭先生的意见，俄国皇帝“至今片刻也不放弃”的行动方式是：

“当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制度时，决不干涉其内政，并给各国人民以充分自由，不阻止他们进行任何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不侵犯任何强国，只要它不侵犯俄国。同时坚决回击一切侵害俄国内部安全的企图，并注意使领土的均势在遭到任何破坏和改变时不要损害我们的合法利益。”

俄国的照会忘记了举例来说明上述这段话。七月革命后，俄国皇帝把军队调往西部边境，以便和他的忠实的德国朋友联合起来用事实向法国人证明，他是多么“想给各国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至于他的行动方式遇到了阻碍，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1830年波兰革命的过错，这次革命使他的计划改变了方向。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对待西班牙和葡萄牙采用的也是这种行动方式。俄国皇帝给唐·卡洛斯和唐·米格尔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援助就是证明。1842年底，普鲁士国王想赐予国家一个以非常方便的“历史”原则（这个原则在1847年的诏书[7]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为基础的等级宪法，大家知道，正是尼古拉坚决反对这件事，以致使我们“基督教德意志人”很多年没有享受到诏书中所规定的种种乐事。他所以这样做，正象涅谢尔罗迭所说的，是因为俄国从来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克拉柯夫的事情不值得再提了。我们只提一下俄皇“行动方式”的最近的一个例子。瓦拉基亚人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他们要改变整个旧制度，并且要按照各文明国的榜样建立自己的制度。“为了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俄国军队侵入了他们的国家。

由此任何人都会明白，这种“行动方式”将会怎样应用在德国身上。俄国的照会不用我们费力去做结论，照会中说：

“无论**德邦**采用何种**新形式**，只要它不侵犯邻国，不企图以武力扩张自己

的版图或者把自己的合法权限扩大到**约定的范围**之外，本国皇帝也将同样**尊重**它的**内部**独立。”

这个问题在照会的另一个地方谈得更清楚：

“如果德国真正能解决它的政体问题而不损害它的国内的安宁，使赋予德意志民族的新形式不致扰乱他国的安宁，那我们是衷心高兴的，正如在德国旧政体下我们希望它强大和统一那样。”

通告中的下面一段话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谈到俄国竭力支持德国取得和谐与统一：

“**当然，不是热中于平等和扩展的民主派现在所幻想的那种物质上的统一**（根据民主派的沽名钓誉的理论，这种统一一旦实现，迟早一定要使德国和所有邻国发生战争），而是**精神上的统一**，是**德意志联邦**必须和其他强国进行协商的一切政治问题的看法和想法的真正一致。

支持这种统一，加强德国各邦政府相互之间的联系，——这才是我们的政策所抱的目的。

我们那时所希望的，我们现在仍然希望。”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俄国政府是愿意允许德国**在精神上**统一的，只是不允许**在物质上**统一，只是不让迄今存在的联邦议会被建立在人民主权上的政权所代替，这个政权不是表面上的政权，而是实际的坚强的中央政权！多么宽宏大量呵！

“我们那时（1848年2月以前）所希望的，我们现在仍然希望。”这是俄国照会中唯一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一句话。但是我们要给涅谢尔罗迭先生指出：愿望和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

现在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期待于俄国的是什么。既然旧制度将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它涂了一层现代的色彩），既然由于“一时的陶醉和兴奋”而脱离了俄国和“历史的”轨道的德国又将驯顺地进入这个轨道，那末俄国将是“真诚爱好和平的”。

俄国国内的情况是：霍乱猖獗，某些县发生骚动，彼得堡曾酝酿革命（但被及时制止），华沙要塞发生密谋事件，波兰王国成了火

山基地，——总之，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沙皇对德国表示既善意又“无私的感情”。

然而，德国本身在此以前所发生的各种事变，对俄国政府的“消极观望政策”无疑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柏林—波茨坦、音斯布鲁克、维也纳、布拉格、法兰克福、汉诺威以及几乎我们祖国（它又被适合俄国口味的精神上的统一所笼罩）的每一个偏僻角落里在此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难道尼古拉本人能如此顺利地处理他的事务，如此迅速地实现他的意图吗？难道波兹南的普富尔（硝酸银）、科隆布和榴霰弹将军① 的行动，布拉格的文迪施格雷茨的行动没有使沙皇的心里充满欢乐吗？难道文迪施格雷茨没有从年轻的美延多尔夫先生的手里收到尼古拉经波茨坦寄给他的称赞的信吗？难道柏林的汉泽曼先生、米尔德先生、施莱根施坦先生和法兰克福的拉多维茨、施梅林和利希诺夫斯基之流还不会使俄国心满意足吗？难道法兰克福议会里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主张**不是不久前的许多痛苦的安慰剂吗？因此俄国外交当局不需派遣军队侵入德国。它完全可以满足于“消极观望的政策”，满足于上面分析的照会！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5卷第342—349页）

① 指普鲁士将军希尔什菲尔德，他1848年极端残酷地镇压波兹南起义。——编者注

恩 格 斯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摘录)

(1848年8月7日—9月6日)

法国一个历史学家说过：il y a des peuples nécessaires——现时存在的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波兰民族无疑是在十九世纪这些不可缺少的民族之列的。

然而正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波兰的民族生存比对任何人都更有必要。

从1815年开始，某些方面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结成的呢？靠**瓜分波兰**，这三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

这三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赖俄国的地位。俄国命令普鲁士和奥地利保持君主专制政体，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为自己争取统治地位的那种本来就软弱无力的意图，由于不可能摆脱俄国，由于俄国支持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阶级而落空了。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从三个同盟国最初企图征服波兰的时候起，波兰人就不仅举行起义来争取自己的独立，同时还进行**革命**活动来反对本国的社会制度。

瓜分波兰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波兰大封建贵族和参加瓜分波兰的三个强国结成联盟。正如前诗人约丹先生所断言的，这个联盟根本不是进步的；它是大贵族摆脱革命的最后一个手段，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结果，波兰其他各阶级，即小贵族、城市市民和一部分农民结成了联盟，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同盟既反对波兰的压迫者，也反对本国的大贵族，1791 年的宪法[8] 证明，波兰人在那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独立是和推翻大贵族阶级，和国内的土地改革根本分不开的。

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frohnpflichtigen〕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 1789 年法国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波兰民族是邻近的农业民族中首先宣布实行这个革命的民族，这是它的功绩。1791 年的宪法，是改革的第一次尝试；1830 年起义时，列列韦尔宣布土地革命是救国的唯一方法，但是议会对这一点承认得太迟了；1846 年和 1848 年起义时，曾公开宣布实行土地革命。

波兰人从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奴役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迫使自己的压迫者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本国保持宗法封建制度。特别是从 1846 年克拉柯夫起义时起，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而争取**土地民主制**（东欧民主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斗争。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

建立波兰国家和调整波兰与德国的边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

是革命以来东欧所发生的一切政治问题中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散居和杂居在喀尔巴阡山以南的种族庞杂的各个民族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比起波兰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确定波兰与德国的边界问题来，要复杂得多，要以更多的鲜血作代价，要引起更多的纷争和内战。

不言而喻，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虚幻的波兰，而是要建立一个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应该拥有1772年时代的领土，它不仅应该管辖本国各大河流经过的地区，而且应该管辖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

如果德国在革命以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气拿起武器去要求俄国放弃波兰，它就可以保证波兰实现上述一切，同时也就保卫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至于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杂居的问题，双方应该互相作某种让步；某些德国人会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但是德国经过不彻底的革命，并没有找到勇气来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说，在火车站上欢迎来往的波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了！

对俄国作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我们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以及在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基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对俄国作战是在对我们的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我们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然而我们是市侩，而且始终是市侩。我们举行过好几打大大小小的革命，可是革命还没有完成，而自己就先害怕起来了。在我们大肆吹嘘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贯彻到底。革命没有使我们的眼界扩大，反而使它缩小了。在讨论一切问题的时候，那种最怯懦、最狭隘、最肤浅的庸俗见解就表现出来了，而我们的一切真正的利益当然又遭到了损害。从这种打小算盘的庸俗见解出发，解放波兰的大问题自然就归结为改组波兹南省的一部分地区的无谓的空谈，而我们对波兰人的热情也就变成了榴霰弹和硝酸银。

我们再重复一遍：对俄国作战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唯一能够保卫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办法。既然不敢进行这种战争，就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柏林被击溃的反动军阀在波兹南重新抬头；他们在挽救德国的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下举起反革命的旗帜，镇压我们的同盟者，革命的波兰人，——在这个时刻，被愚弄的德国居然向它的胜利的敌人热烈致敬。重新瓜分波兰已经完成了，所差的只是德国国民议会的批准了。

要挽救这个问题，法兰克福议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认整个波兹南属于德意志联邦，并且声明，在有可能同复兴的波兰进行d'égal à égal〔平等的〕谈判以前，边界问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不过，这未免对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教授、律师和牧师们提出过多的要求了！诱惑力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从来没有闻过火药味的和平的市民们，应该通过简单的投票方式为德国夺取五百平方英里的地区，兼并八十万"涅茨同胞"、波兰的德国人、犹太人和波兰人，虽然这是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和真正的长远的利益的。多么大的诱惑！他们屈服了，批准了瓜分波兰。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5卷第389—393页）

[马克思、恩格斯]

新“神圣同盟”

（1848年12月30日）

科伦 12月30日。还在几个月以前，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就结成了新的“神圣同盟”，这件事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条约最近就要公诸于世。依靠“上帝和鞭子的恩典”的君主们的这个同盟的灵魂是俄国。但同时俄国的全部政治和外交活动，除少数例外，都是由德国人或俄籍的德国人进行的。的确，凡是有专制政体和反革命进行活动的地方，我们总会遇见德国人。但我们在任何地方所遇见的德国人，都没有在不断反革命的中枢——俄国的外交界所遇见的那样多。在这里占头把交椅的涅谢尔罗迭伯爵是德国的犹太人；其次，驻柏林的公使冯·美延多尔夫男爵，是从爱斯兰来的，而他的助手，皇帝的侍卫官，卞肯多尔夫伯爵上校，也是爱斯兰人。在奥地利工作的库尔兰人麦迭姆伯爵以及他的几个助手，其中包括冯·方通先生，都是德国人。俄国驻伦敦公使冯·布隆诺夫男爵也是库尔兰人，他是梅特涅和帕麦斯顿的中间环节和中介。最后，以俄国代办身分在法兰克福进行活动的布德堡男爵是里夫兰人。这只是随便举出的几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好几十个，更不用说那些以彼得堡沙皇为后台，在德国身居高位和要职，同时又领俄国的优厚奉禄的人了。

没有必要说明（因为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奥地利大公妃、现在的皇太后索菲娅在人民敌人阵营和神圣同盟阵营中扮演

着什么样的角色。索菲娅本人又处在米哈伊尔大公妃、保尔·维尔腾堡亲王的女儿叶列娜大公妃的最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叶列娜使尼古拉和索菲娅同臭名昭彰的路德维希大公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些人物的圈子里，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讨论和通过了一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奥地利的军法皇帝① 应当娶大公夫妇唯一在世的女儿② 为妻，借以使新“神圣同盟”亲密无间，团结一致，并使俄国能够日益接近自己的目的——在德国建立鞭子的绝对统治。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第171—172页）

① 军法皇帝（或戒严皇帝）指弗兰茨·约瑟夫。——译者注
② 指叶卡特琳娜·米海依洛夫娜。——译者注

恩格斯

俄国人

（1849年4月21日）

科伦 4月21日。大约十一个月以前，当《新莱茵报》开始出版的时候，它曾是提醒人们注意俄国军队在我国东部边境集结的第一家报纸。那时许多善良的公民说这是夸大其词，庸人自扰，等等。

现在已经清楚了，我们是不是夸大其词。最初只是保卫自己边境的俄国人，随着反革命势力的加强，开始转入了进攻。巴黎的六月胜利把他们引进了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维也纳和佩斯的陷落又把他们引进了海尔曼施塔特和喀琅施塔得①。

一年以前，俄国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当时，在它被突然爆发的革命的无限威力吓得惊慌失措的最初时刻，本来是很容易把三四万俄国军队逐出波兰并建立一个自由的波兰的。有人这样号召过，但是这种号召没有得到响应。这就是俄国人有时间武装起来，而现在他们为数五六十万人的军队把我们包围在尼门河到多瑙河与阿留塔河② 一带。据《波罗的海报》的报道，仅仅沿普鲁士边境就驻扎有大约十五万人；其余的军队驻在国内，在加里西亚边境附近，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立陶宛、波多利亚和沃伦，在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莫德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

① 罗马尼亚称作：锡比乌和布拉索。——编者注

② 罗马尼亚称作：奥尔特河。——编者注

扎莫斯提耶诸地的要塞中，据《波罗的海报》的报道，在这些要塞中储存有足够供二十五万人用的武器和军需品。

这家报纸写道：

“粮食储备是靠发放强制债券建立的，每个地主都必须接受债券而供应军队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食品。明年这项债券将被折算为赋税。因此，不久前曾流传着一种谣言，说俄国政府命令在波兰预征一年的赋税。”

这项债券的接受情况如何，我们将从其他方面得知。

去年末和今年初，波兰地主曾必须供应大量食品，不过这项供应已被算做纳税。大家满以为这样就算完了，可是现在才知道，赋税必须提前交到今年年底。

供应军队给养的这种强制措施就已经表明，集中在波兰的俄国军队的数目是多么巨大。

另一家报纸——波兹南的《东方日报》[9]——4月13日从波兹南报道说：

“在西方的俄国军队的数量是：在波兰王国驻扎有利季盖尔的一个军；利季盖尔第四军的一半再加上预备队，总共大约有十二万人。在立陶宛驻扎着一个所谓的掷弹军（原沙霍夫斯基军）和第一军的一部分。近卫军会到得迟一些——关于它要来的事已经谈了好几个月了。在杜布诺设有大本营的沃伦，配置了契果达耶夫斯基第四团的其余部队。在基辅附近驻扎着第二辅助军，在克列美涅茨驻扎着六千到八千人的快速军（巴甫洛夫率领）。最后，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还配置了为数多至六万五千人的利迭尔斯军。”

这些部队集结在这里的目的何在——这一点他们自己作了非常天真地解释：

“俄国兵士和军官谈话都是不太审慎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为什么他们屯驻在边境这个问题，他们每人的回答都是一样，即因为我们的皇帝是普鲁士国王的姻兄弟。自从俄国人在大战中打败法国人以后，一直到巴黎的全部土地都属于皇帝的了；他委任德国各小邦君主（Fürsten）来治理国事，而任命自己的姻兄弟普鲁士君主为总督。现在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举行了叛乱，

而德国各邦君主和总督又都向皇帝求援——这就是我们屯驻在边境这里的原因。如果安宁不能很快恢复，我们就要越过国境去整顿秩序。”

但是这还没有完。尼古拉皇帝已经下令在帝国西部募集新兵，每千人募集八名。命令附有必须募集新兵的二十一个省的名单。

国境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五十万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的野蛮人，只等待适当的时机一到，就将进攻德国并把我们变为信奉正教的沙皇的农奴。

象特兰西瓦尼亚一度被俄国人占领一样，象现在要求三万俄国人进入这个地区和再派三万人穿过加里西亚一样，象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也向信奉正教的沙皇求援一样，——在我们这里情况也将是这样。我们还会看到，政府和资产阶级**将把俄国人召进我们的国家**，就象不久前在特兰西瓦尼亚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事情也正是这样发展的。反革命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胜利，对我们的影响还不算大。可是，当德国尝到了俄国的鞭子，那时它的举动就会有所不同了。

俄国人是德国的真正的解放者，——我们在去年6月这样说过[10]。我们现在还重复这句话，但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我们这样说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第515—517页）

恩格斯

*同盟中的第三者

（1849年5月3日）

科伦5月3日。我们曾经数百次地指出过，在俄奥两国的同盟中，冯·霍亨索伦先生及其内阁扮演着“同盟中的第三者”的角色。正直的德国公民曾经数百次地怀着愤慨的心情否认过这种说法。

结果如何呢？现在已经完全确定，解散议院的秘密原因之一是：根据同奥里缪茨的公爵和彼得堡至高无上的信奉正教的沙皇的秘密协定，桑苏西宫俄国藩臣①[Unterknäs]**承担了调遣四万名普鲁士士兵到波希米亚去的义务**——一方面是为了使人民驯顺听话，另一方面是作为反对匈牙利人的预备队。这件事甚至在圣保罗教堂公开议论过。连柏林的中间派和一部分右派也不能对此保持缄默。因此就把他们驱散了。

但是不仅如此。柏林的《国民报》5月1日从柏林报道说：

我们刚从完全可靠方面获悉：**“昨天早晨，上西里西亚铁路管理局收到了内务部一封电报，说有三万名俄国士兵要经由上西里西亚铁路从克拉科夫调往奥国〈可见是从克拉科夫经过梅斯洛维茨、科捷尔、拉提博尔②和奥得堡③〉。**上西里西亚铁路管理局特此通知，**普鲁士王国政府对此毫不反对，**并

① 奥里缪茨的公爵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信奉正教的沙皇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桑苏西宫俄国藩臣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译者注

② 波兰称作：梅斯洛维策、科兹列、拉威布日。——编者注

③ 捷克称作：博古敏。——编者注

且如政府所希望的，铁路管理局将丝毫不妨碍这次调运工作。”

在电报上署名的是：**冯·曼托伊费尔**

我们原来已搞到这种地步：俄国皇帝藩臣的波茨坦政府不仅**下令逮捕**科苏特、贝姆和戈尔盖①。不，它还调遣三万名俄国宪兵经由铁路**通过普鲁士领土**到匈牙利去，——此外，它还派遣四万名普鲁士士兵到波希米亚去镇压其自由遭到粗暴蹂躏，但渴望复仇的民族！

听着吧，莱茵省的居民们！可见，迫使我们屈从于**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为了把我们的儿子和兄弟，象我们一样的莱茵省居民，送到波希米亚去，可能还送到匈牙利去，叫他们**为俄国沙皇效忠**，帮助镇压那个最后拿起武器来保卫 1848 年革命的民族！

1815 年有人把我们出卖给普鲁士，是为了使我们也蒙受耻辱，仿佛俄国士兵大张旗鼓地去打匈牙利的革命军队，是受到我们的纵容，是通过**我们的**领土，通过**跟我们**一起被束缚在一个邦中的地方。

我们只是被**武力强迫**才成为**普鲁士的臣民**和继续做**臣民**的。**我们从来不是普鲁士人**。但是现在，当我们被指使去反对匈牙利的时候，当俄国匪帮蹂躏普鲁士土地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是普鲁士人，是的，**我们感到做普鲁士人是多么可耻**！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6 卷第 562—563 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232—233、507—508 页。——编者注

恩 格 斯

沙皇和他的藩臣们

（1849 年 5 月 8 日）

科伦 5 月 8 日。传闻法国驻柏林大使就普鲁士人进入萨克森一事提出抗议。

可见，法国政府终于发觉，东欧的反革命对它也是个威胁，新的神圣同盟的最终和最高的目的不过是征服，而这一次还可能是**瓜分法国**。

我们确实知道，根据信奉正教的沙皇同他的奥里缪茨和波茨坦的两个藩臣之间所签订的条约，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征服法国，废除共和制，立“圣路易之子”、**波尔多的**白痴**亨利为法国和纳瓦腊**的“正统国王”。

奥迪隆·巴罗参与了这一阴谋，几乎用不着怀疑。

普鲁士后备军的士兵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于你们的！要你们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就是为了先驱使你们同德国、普鲁士的兄弟们厮杀，把你们去年争得的自由所剩下的点滴残余都消灭掉，然后再驱赶你们去打那些对你们的处于威胁中的自由进行援助的匈牙利人；如果你们使你们的王公老爷们和你们的最高主子和统治者，沙皇尼古拉感到满意，完成了这些任务的话，他们将率领你们跨过莱茵河，去打曾经给你们带来自由的那个民族，你们现在所享有的一切自由都是那个民族在 1789—1794，1830 和 1848 等年代举行的英勇起义给你们提供的。

街垒战士们，威严的人民大众！你们在去年争得了一点自由，难道就是为了要在现在以后备军士兵的身分亲手把它断送，然后再为你们至高无上的主子俄国沙皇去摧毁匈牙利和法国这两个自由堡垒吗？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第569—570页）

恩 格 斯

*匈 牙 利(摘录)

(1849 年 5 月 18 日)

科伦 5 月 18 日。正当匈牙利战争随着俄国人的实际干涉而变成**欧洲**战争的时候，我们被迫停止对战争今后进程的报道。现在只好再次向我们的读者概要地评述一下这个伟大东欧革命战争的进程。

记得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即 1847 年秋天，**科苏特**所领导的普勒斯堡议会就通过了一系列革命的决议，如关于地产出卖权、关于农民迁徙自由、关于赎买封建义务、关于解放犹太人、关于各阶级同等课税等决议。议会还允许克罗地亚和斯拉窝尼亚的居民在内政方面正式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最后，在巴黎开始二月革命的那一天(2 月 22 日)，议会要求成立单独的匈牙利责任内阁，从而迈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分离**的第一步。

二月革命爆发了。结果维也纳政府对匈牙利人的要求的抗拒被摧毁了。在匈牙利革命的第二天(3 月 16 日)，维也纳政府同意成立独立的匈牙利内阁，因而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也就缩小为君合国[11]了。

……

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分离，早于 4 月14日在德布勒森就决定了。与波兰人的联盟，在 1 月中旬也已公开宣布，并且由于有两三万波兰人参加匈牙利军队而成了现实。从 10 月 6 日维也纳革命和施

韦哈特会战时起即已存在的与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的联盟，也因德意志军团参加匈牙利军队、和当时的战略形势与政治形势而保持住了，当时的形势迫使马扎尔人必须攻占维也纳，使奥地利革命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所宣布的独立得到承认。

这样，匈牙利战争很快就失去了它最初所具有的民族性质，正因为它的看起来是纯粹民族的行动，正因为宣布独立，这次战争才具有了真正全欧的性质。为了两国的解放而与波兰成立的联盟，为了德国东部的革命化而与德国人成立的联盟，只有在匈牙利与奥地利分离、从而宣告奥地利君主制度解体的时候，才固定下来，并获得坚固的基础。匈牙利独立、波兰复兴、德意志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革命中心、伦巴第和意大利取得独立，——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现，那末整个东欧国家的体系就会完全瓦解：奥地利会消失，普鲁士会被融化，而俄国会被排挤到亚洲边界。

所以神圣同盟一定要竭尽全力来堵塞具有威胁性的东欧革命的道路。俄国军队已逼近特兰西瓦尼亚和加里西亚的边境。普鲁士已占领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的边境，并让俄军通过自己的领土进入普雷劳①，几天之后，俄国的第一个军就驻扎在莫拉维亚的领土上了。

匈牙利人清楚地知道，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将要对付人数众多的新开到的军队，因此没有象最初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维也纳也象佩斯一样，他们如果不对市区进行炮击，是不能用正面攻击攻克的，可是炮击又没有可能。象在佩斯一样，他们又要被迫采取迂回运动，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确信自己的两翼和后方不受威胁。可是恰好这时他们后方受到俄军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直取维也纳，预料将受到拉德茨基部队猛烈的攻击。

---

① 捷克称作：佩尔热罗夫。——编者注

因此，匈牙利人这样做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急于进攻维也纳，而只是加紧肃清匈牙利境内的奥皇军队，从小喀尔巴阡山到施梯里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坡地构成一个很大的弧形来包围奥皇军队，派出一个加强军把守住雅布龙卡，在加里西亚各山口上构筑了工事，封锁了这些山口，扩大了对布达的攻势并且迅速征集了二十五万新兵（特别是在新占领的西方各州中）。他们这样做，就保证了两翼和后方的安全，并且建立了军队，这种军队不会害怕逼近的俄国援兵，就象以前不害怕那么庞大的奥皇军队一样。这支著名的黑黄军队[12]进入匈牙利的时候是二十万人，而回去的时候恐怕还不到五万人；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被俘的被俘，或者投到匈牙利人方面去了。

不错，俄国人会派出更庞大的军队：预期将调来十二万人，而据另一些消息说，将调来十七万人。根据《的里雅斯特自由港》的报道，野战军队远远超过五十万人。但是俄国人好夸大是众所周知的：在所举出的数字中通常只有一半列在花名册上，而被列在军册上的人数真正在队伍中的又不到一半。如果除了占领波兰所必需的军队之外，俄国援军的实际人数能有六七万人的话，奥地利就很满意了。而这样一个数目，匈牙利人是能对付得了的。

1849年的匈牙利战争与1830—1831年的波兰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前者与后者不同之处，就在于当时对波兰人不利的一切情况，现在都对匈牙利人有利。大家知道，列列韦尔当时曾坚持下面两点而没有成功：第一，要以解放农民和犹太人的办法来使居民群众依附革命，第二，要以在整个旧波兰发动起义的办法来使参加瓜分波兰的三个强国卷入战争，并使战争成为**欧洲的**战争。当时在波兰实行得**太迟**的事情，**匈牙利人一开始就做了**。国内社会关系的革命，消灭封建制度是匈牙利的第一个措施。吸引波兰和德国参战是第二个措施，从而使欧洲战争成了事实。随着**俄国**的

第一个军踏上德国领土，欧洲战争就开始了，而随着法国的第一个营进入德国的领土，这个战争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就要到来。

正是由于匈牙利战争成了欧洲战争，它就同欧洲运动的其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它的进程不仅影响着德国，而且也影响着法国和英国。决不能期望英国资产阶级会容忍俄国把奥地利变为它的一个省。同样毫无疑义，法国人民看到反革命日益逼近法国边境，也不会置之不理。不管法国的选举结果如何，军队都会赞成革命。而目前，问题决定于军队。如果军队希望战争，——而军队是希望战争的，——那末战争就会发生。

战争就要爆发。巴黎革命行将到来——不管这是由于选举的结果，还是由于已经发生的军队同革命政党在选举投票箱旁举行了联欢的结果。在未来的德国革命军队的核心正在南德意志形成，因而妨碍普鲁士积极参加匈牙利战争的时候，法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斗争。问题将在几个星期之内，也许将在几天之内决定。不久之后，法国的、匈牙利一波兰的和德国的革命军队就要在柏林城下的战场上庆祝自己的友好节日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第604、612—61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国际述评(一)(摘录)

(1850年1月31日至2月)

俄国也没有充足的金钱来支付换取自己荣誉的代价，何况购取这种荣誉时又必须交付现金。正教沙皇尽管在乌拉尔和阿尔泰有驰名的金矿，在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地下室里有无数的财宝，在伦敦和巴黎似乎完全是由于现金多余而收购有价证券，但是他仍然认为，不仅必须制造种种借口从保存在彼得巴甫洛要塞里作为纸币基金的现金储备中借取五百万银卢布，下谕在巴黎交易所上抛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而且还必须请求不大相信人的伦敦西蒂区①老板们借予三千万银卢布的贷款。

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使俄国深深卷入了欧洲的政局，以至如果它不愿意它那关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这把它门户上的钥匙"[13]的老计划永久不能实现，它现在就必须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西欧反革命的胜利，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的日益增长，俄国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的恶化，迫使它尽快地采取行动。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了在东方问题上这出新戏的外交序幕[14]；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正戏了。

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会演成一场欧洲战争。这最合神圣俄罗斯②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可能在德国站得住脚，竭力使那里

① 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

② 俄国的古称。——译者注

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占领纽沙特尔，最后向革命的中心巴黎挺进。

英国在这场欧洲战争中不会是中立的。它必定要出面反对俄国。英国是俄国的最危险的对手。如果大陆的陆军深入俄国腹地，必然会在俄国领土上分散兵力，自行削弱，如果它们越过古波兰的东部边境向前挺进，几乎完全有重演1812年事件的危险，那末英国可能选中俄国最要害之处给以打击。何况，英国还可以驱使瑞典人夺回芬兰，为英国舰队打开彼得堡和敖德萨的大门。大家知道，俄国舰队是世界上最糟的舰队，占领喀琅施塔得和什吕谢尔堡要比占领圣让得阿克和圣万得拉[15]来得容易。俄国一失去彼得堡和敖德萨，就成了一个被砍掉双手的巨人。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俄国无论在出售原料和购买工业品方面如果离开英国哪怕是六个月也难以支持，这一点在拿破仑封锁大陆时就表现得很明显，而目前更加是如此。俄国一断绝与英国市场的联系，几个月后就会遭受严重的困难。英国则相反，它不仅可以在若干时期内不要俄国市场，而且可以从其他市场上获得各种俄国的原料。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并不怎么可怕。但是，俄国在德国市民看来所以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俄国会直接制服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德国市民有一种完全正确的预感：野蛮的俄国大军很快就会遍布德国并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救世主的作用。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第257—258页）

恩 格 斯

一八五二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摘录)

(1851 年 4 月)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 1793 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 1813 年便已集中完毕。1812 年俄国战役使俄国在大陆战争上成为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基本的核心，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是在以后才集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主帅。但是自 1848 年后，神圣同盟便已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了。1849—1851 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犹如莱茵联邦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附庸关系。尼古拉——id est〔即〕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 en cas de guerre〔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迭是 en temps de paix〔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7 卷第 553—55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摘录)

(1853年3月12日—22日之间)

缅施科夫公爵在举行了驻多瑙河各公国俄军阅兵式并检阅了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军和舰队之后(按照他的命令,塞瓦斯托波尔在他莅临时曾举行军队上船和登陆演习),于2月28日以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姿态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随员共十二人,包括俄国黑海分舰队司令海军上将①、一位师级将军②、几位参谋军官和使团秘书小涅谢尔罗迭先生。希腊居民和俄罗斯居民对缅施科夫的接待,就象接待亲临沙皇格勒恢复真教的正教沙皇本人那样。在伦敦这里和在巴黎,下面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缅施科夫公爵对傅阿德-埃芬蒂的辞职并不满足,他要求苏丹为了俄国皇帝的利益不但放弃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而且放弃任命希腊总主教的权利;苏丹向英法求援;不列颠代办罗斯上校急忙派"黄蜂号"蒸汽舰往马尔他岛,以便立即调英国舰队去阿希佩拉哥群岛,而俄国舰船则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基利亚停泊。据巴黎的报纸《通报》[16]报道,在土伦的法国分舰队已接到命令开进希腊领水。不过,邓达斯海军上将仍然在马尔他岛上。从这一切可以

① 弗·阿·科尔尼洛夫。——编者注

② 阿·阿·涅波科伊契茨基。——编者注

看出，在欧洲，东方问题又提到 ordre du jour〔日程〕上来了，但这样的事对于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17]，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的平静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镇压下去[18]，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给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经过若干年，当七月革命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国的起义已经过去，成了 1831 年那个样子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问题于 1840 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19]。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自夸似乎已经幸运地使欧洲摆脱了混乱状态和革命危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

土耳其是欧洲正统主义[20]的一个痛处。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 status quo〔现状〕。这个共同的协议（顽固地维持自发或偶然形成的状况）是一个 testimonium paupertatis〔贫穷证明书〕，是主要的强国承认自己毫无能力为进步或文明作出什么事情。拿破仑能够在一刹那间决定整个大陆的命运，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显示出英明果断。聚集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欧洲正统主义的代表们，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以他们全部的"集体智慧"还花了好几年的功夫；而且他们为此互相争吵，造成极大的混乱，并且都发现做这样的事是如此索然无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都意兴阑珊，不再打算重新划分欧洲了。平庸的米尔米东人（贝朗热这样称呼

他们)[21] 不通历史，不了解历史事实，没有主张和主动精神，他们膜拜 status quo——他们自己的集体创作，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这件艺术作品是怎样的粗糙和平凡。

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恰好在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它所认为的 status quo ante〔一定时间以前的现状〕的时候发现了，土耳其在这一个时期的 status quo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利益、新的关系。可怜的外交家们又要从 8—10 年前因普遍动荡而工作中断的地方开始做自己的工作。一定要维持土耳其的 status quo! 这就象要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停在一定阶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烂一样。土耳其正在烂下去，而且，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 status quo 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因此，它将不顾所有的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经常地每年在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就象任何一种腐烂物体向周围大量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问题到底在哪里。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的藩属王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非洲的领地暂时不谈，因为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从属于苏丹的国家。但是埃及要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人，在今后瓜分土耳其时它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人的属地。亚洲土耳其则是土耳其帝国现时还拥有的那些力量的真正中心。四百年间，土耳其人大半都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尔明尼亚，这两个地方是经常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充裕的来源，从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的军队，一直到库列夫查战役[22] 中被吉比奇的并不高明的战术击溃的土耳其军队都是这样。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少，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属于土耳其族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群，目前就休想去征服它。所以，实际上一讨论"东方问题"的时候，在亚洲各

地区中受到注意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平原。

真正经常引起纠纷的，是沙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一个大的半岛，即欧洲土耳其。这个好地方却不幸成了各个不同种族和民族杂居的地方，同时很难说它们当中谁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条件。一千二百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纳乌特人①处于一百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一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除了土耳其人以外，在这些不同种族中哪一个最有能力实行统治，而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不能不只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当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想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企图遭到了怎样可怜的失败，而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平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为了重掌政权和消灭任何进步倡议每一次都不惜向奥地利和俄国乞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即土耳其政府的权力是怎样由于基督徒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完全不成功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的时候；最后，当我们看到，希腊争取独立，俄国夺取部分阿尔明尼亚，而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这一强国保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土耳其人居留在欧洲严重阻碍了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所拥有的一切潜力的发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8页）

① 土耳其称阿尔巴尼亚人为阿尔纳乌特人。——编者注

恩 格 斯

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1853 年 3 月 23—28 日之间）

很奇怪，在目前东方问题的争论中，英国报纸没有更坚决地强调英国的切身利益，而正是这些利益使它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这一点，只要看看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清楚了。

在没有开辟通往印度的捷径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贸易的中心。就是现在，尽管印度的产品由陆路经波斯、图兰[①]和土耳其运往欧洲，土耳其的港口仍然居中同欧洲和亚洲内陆地区进行着十分重要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这一点了。整个远离海洋的地区，从黑林山脉起，到大诺夫哥罗德的沙丘地带止，河流纵横，都汇入黑海或里海。多瑙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欧洲大河，德涅斯特尔河、德涅泊河和顿河，都是从远离海洋的地区把产品运往黑海的天然运河。我们说运往黑海，因为黑海也是通往里海的必由之路。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整个匈牙利、俄国最肥沃的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土耳其，在出口和商品交换方面都有天然的纽带同欧克辛海[②]联结起来，同时，这些国家

① 土尔克斯坦（图兰）低地的旧称。——编者注

② 黑海的古称。——编者注

主要是农业国，产品分量大，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匈牙利、波兰和南俄的粮食、羊毛和皮革在我们西方市场上数量与年俱增，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在加拉兹、敖德萨、塔干罗格和欧克辛海其他港口装船运来的。此外，在黑海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贸易。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比曾德，是同亚洲内地，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同波斯和土尔克斯坦进行商队贸易的主要中心。这种贸易也在迅速增长着。希腊和阿尔明尼亚的商人从上述两个城市运进大量的英国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价格低廉，因此迅速地排挤着亚洲妇女的家庭手工业品。特拉比曾德由于地理关系，比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这种贸易。它的后方接连着阿尔明尼亚高地，这里较之叙利亚的沙漠好走多了，而且距巴格达、设剌子和德黑兰相当近；德黑兰则是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的商队的贸易地点。这一种贸易和整个黑海贸易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耳闻目睹，在那里，皮肤黝黑的希腊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那里，德语、英语和希腊语、南方斯拉夫语的讲话声交织在一起。

特拉比曾德的贸易也成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利害冲突之源。在1840年以前，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几乎一手垄断了外国工业品的贸易。俄国的商品一直渗入印度河流域，有时甚至比英国的商品还流行。可以大胆断言，在阿富汗战争以及信德和旁遮普被征服[23]以前，英国同亚洲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现在情况不同了。迫切需要不断扩大贸易，这个 fatum〔厄运〕象幽灵一样追逼着现代的英国，如果不马上使这个厄运追逼得缓和一点，那末它就会从纽约到广州、从圣彼得堡到悉尼引起可怕的震荡。这种无法缓和的需要，逼着英国的贸易从印度河和黑海这两个方面同时向亚洲内地进攻。我们虽然对于俄国向这个地区的出口额知道得很少，但仍然可以从英国向这些地

区的输出增加这一事实中大胆断定，俄国在那里的贸易恐怕是大大缩减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战场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特拉比曾德；先前曾经直抵东方英帝国边界的俄国贸易，现在已被压回到防御线上，这条防御线也正是它本国的国界。这一情况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它关系到东方问题将如何解决，俄国和英国在这当中能起什么作用。这两个国家在东方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死对头。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来看看黑海的贸易。据伦敦杂志《经济学家》[24]统计，英国向土耳其地区，包括埃及和多瑙河各公国的出口总值如下：

1840年……1 440 592英镑
1842年……2 068 842英镑
1844年……3 271 333英镑
1846年……2 707 571英镑
1848年……3 626 241英镑
1850年……3 762 480英镑
1851年……3 548 959英镑

在这些总额中，黑海各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至少要占三分之二。而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都决定于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角落的道路。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能否指望它会敞开这些大门，让英国象过去一样，闯入俄国的贸易范围呢？

土耳其，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就是如此。很明显，商货经过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的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达达尼尔海

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们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要地同直布罗陀和松德海峡的赫尔辛格类似。但是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甚至比后面这两个据点更为重要。直布罗陀或赫尔辛格的炮火不能控制自己海峡的全部地区；要完全封锁海峡，还要借助于舰队。而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很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构筑若干设备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峡，马上就会这样做），就可以筑成一道攻不破的屏障，就是全世界的联合舰队来犯也休想通过海峡。如果这样，黑海就会成为俄国的内湖，甚至位于俄国腹地的拉多加湖也比不上它；高加索人的反抗力量也马上就会耗完；特拉比曾德就成了俄国的港口，而多瑙河就成了俄国的河流。此外，土耳其帝国丧失君士坦丁堡之后就会被分成两部分：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这两部分将无法彼此通气或相互支援，而被迫退到亚洲的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将完全不起作用。征服者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征服马其顿、特萨利亚、阿尔巴尼亚，因为这些地区已被包围，与主力隔绝，它们除了求饶和请求派兵维持国内秩序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然而是否可以设想，这个如此庞大、扩张得这样厉害的国家，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已经走了这样远而会在半路止步呢？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形势也是不允许的。吞并了土耳其和希腊以后，它就可以获得优良的海港，而且还可以从希腊人当中获得精锐的水兵。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它就在地中海的门前立定了脚跟；控制了都拉索和从安提瓦利到阿尔塔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以后，它就可以进入亚得利亚海的腹地，窥伺着不列颠的伊奥尼亚群岛，并且只须三十六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马尔他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奥地利领地以后，它就完全可以象对待自己的藩属一样对待哈布斯堡王朝。还有其他一些结局也是可能的，甚至

是一定的。这个帝国的西部边界弯弯曲曲，同自然边界不一致，这样就要修改边界，于是俄国的自然边界就是从但泽或者施特廷到的里雅斯特了。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吞并匈牙利、普鲁士、加里西亚和最终建立一个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一百年来就是这样，直到1789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象过去一直就非常怕它一样。不久前的米兰起义[25]使反动派惊慌万分就说明这一点。但是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的时候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14—19页）

恩 格 斯

土耳其问题(摘录)

(1853 年 3 月底)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有可能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26]以前,在各方面都是一个 terra incognita〔不为人知的国土〕,因此,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些关于土耳其的陈腐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不错,到过土耳其的官方使节吹嘘自己掌握了比较确切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也是很可怜的,因为这些官方人士谁也没有下功夫研究过土耳其、南方斯拉夫或现代希腊的语言,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以希腊通事和法兰克商人① 的偏颇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所事事的外交家们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上面。他们当中只有德国的土耳其历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麦尔是一个可嘉的例外。这些先生们对该国的人民、机构和社会制度根本不感兴趣,只同宫廷、特别是同希腊的法纳尔人[27]往来,这些法纳尔人是双方狡猾的中介人,而双方则都同样不了解对方的力量和潜力的真实情况。西方外交对土耳其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依据,在很长的时期都是从十分可怜的情报中所得出的传统观念和判断,而且,尽管使人奇怪,甚至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这样。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在黑

① 即西欧的商人(法兰克是近东对西欧居民的流行称呼)。——编者注

暗中徘徊摸索，想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更狡猾地超过了它们。这就是俄国。俄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土耳其的真实的情况和性质。欧洲土耳其的居民十分之九同俄国人信奉同一宗教；有七百万土耳其臣民的语言差不多同俄语毫无差异；而大家也知道，俄国人学会说外国语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的代理人甚至还没有完全通晓这些语言就能够毫不费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东南欧的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计的俄国的代理人周游土耳其，向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宣传：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的首领、天然的保护者和救星，负有最终解放它的使命；他们特别向南方斯拉夫人灌输沙皇全能的思想，说沙皇迟早要把伟大的斯拉夫种族的所有分支团结在一个王权之下，并且使它成为欧洲的统治种族。希腊教会的僧侣早就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俄国的金子和俄国的影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促成了1804年塞尔维亚的起义[28]和1821年的希腊起义。土耳其的帕沙无论在哪里举起反对中央政权的反叛的旗帜，从来也少不了俄国人出主意和俄国人出金钱。因此，当土耳其的国内状况问题最终把那些对土耳其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并不比对月球上的人了解得更多的西方外交家们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战争就开始了，俄国军队向巴尔干挺进，于是一块一块的领土就同正在被瓜分的奥斯曼帝国脱离了关系。

不错，近三十年来在向广大公众介绍土耳其状况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德国的语文学家和批评家向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学；英国的代理人和英国的商人收集了许多有关这个帝国的社会制度的资料。但是，外交界的才子们看来对这一切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并且顽固透顶地死抱住传统不放，而这些传统是由于

知道了东方神话才产生的，是经过世界上最容易被收买的一小撮希腊商人用同样使人惊奇的胡说加过工的。

自然的结果如何呢？结果，由于西欧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举棋不定和畏首畏尾，俄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一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纳瓦林会战[29]起，到现在的东方危机止，西方各国的行动不是由于相互间的争吵（这些争吵大半是出于它们对东方情况都不了解，出于那种对东方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小猜忌）而瓦解，就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于是，不仅希腊人（住在希腊和住在土耳其的），而且斯拉夫人，也都认为俄国是自己的天然的保护者。而且，甚至君士坦丁堡政府也越来越不再希望那些以根本不能独立判断土耳其的情况为荣的西方列强的使节们终究会了解它的迫切需要和它的真实情况，因此这个土耳其政府每次都不得不向俄国求情，请这个强国保护，虽然这个强国公然宣称它决心要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把圣安德烈的十字架竖立在艾亚-索非亚清真寺的尖塔上。

俄国的这些一贯的和顺利的侵略行动，不管外交传统怎样，终于使西欧各国的内阁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危险的迫近。这种预感就使它们提出了一项原则，作为一种伟大的外交上的专利药。根据这项原则，维持土耳其的 status quo〔现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某些用词藻来掩饰自己无能的当代国家要人，其不学无术和束手无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这个原理中暴露得这样明显。这个原理虽然一直是死的条文，但二十年来却成了神圣的传统，就象约翰王的 Magna Charta[30] 那样不容忽视和不容争辩。维持 status quo! 呵，当然！只是为了维持 status quo，俄国才挑起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使希腊独立，攫取了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并把阿尔明尼亚的一部分把持在自己手里。当这一切大功告成时，英国和法国连手指头也没有动一下。它们仅仅

有一次作过自己还活着的表示，这是在1849年，但是当时它们不得不保护的并不是土耳其，而是匈牙利流亡者[31]。在欧洲外交界看来，甚至在欧洲的报刊看来，整个东方问题归根到底只能是：要么俄国人坐镇君士坦丁堡，要么维持 status quo。二者必择其一，他们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24—27页）

恩 格 斯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1853 年 4 月初）

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要人们由于顽固的不学无术、传统的因循守旧和世代相承的思想懒惰，都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打算回答。阿伯丁和帕麦斯顿，梅特涅和基佐都认为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至于 1848—1852 年时期他们的那些共和派和立宪派后继者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的名字后代人永远不会提起。

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慢慢地，但是一步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进逼，全不把法国和英国的一切外交照会、一切计谋和手腕放在眼里。

欧洲各国所有党派虽然都承认俄国节节挺进的事实，但是没有一个官方要人能够解释这个事实。他们看到这个事实的影响，甚至看到它的后果，但是原因何在，他们仍然不知道，尽管一切因由都非常简单。

推动俄国去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强大动力，不是别的，正是原来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持 status quo〔现状〕的理论。

Status quo 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们只要仍然处在土耳其统治的压迫下，他们就要把希腊正教教会的首脑

和六千万正教徒的君主(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看做**自己的天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土耳其而发明的外交体系，却迫使欧洲土耳其的一千万正教徒向俄国求援。

我们且来看看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早在叶卡特林娜二世即位以前，俄国就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取得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特惠。它终于在缔结阿德里安堡条约[32](1829 年)的时候取得了极为广泛的特权，以致上述公国目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俄国，而不是受制于土耳其。当 1804 年爆发了塞尔维亚革命的时候，俄国马上出来保护起义的"莱雅"，在两次战争[33]中支持他们，在两个条约中保障他们取得了本国的内政独立。而在希腊起义期间又是谁决定了斗争的结局呢？不是亚尼纳的帕沙阿利[34]和他的一切阴谋叛乱，不是纳瓦林会战，不是摩里亚的法国军队，不是伦敦会议和议定书，而是吉比奇率领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马里乍河河谷的俄国军队。于是，就在俄国无所顾忌地动手割裂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家们仍然把 status quo 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的不可侵犯当做某种圣物来保障和维持！

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即无论如何都要维持 status quo，维持土耳其目前这种状态的独立，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者，自己的救世主。

现在暂且假定，土耳其在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上的统治结束，那里的政体比较符合人民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地位如何呢？大家知道，在土耳其境内每一个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独立的国家里，都组成了强大的反俄党派。如果说，在俄国的援助是挣脱土耳其压迫的唯一靠山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末一旦对这种压迫的恐惧消失，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可是，如果土耳其人的统治被排挤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如

果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民族获得自由并享有信仰自由，如果欧洲列强的各种计划和阴谋，各种针锋相对的意图和利益都在那里畅行无阻，难道不会引起大战么？——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然，不能指望帕麦斯顿、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大陆上形形色色的外交大臣们有能力做出任何这样的行动。他们即使想一下这件事也不能不发抖。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象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问题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问题。

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象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

如果企图为欧洲土耳其领土的可能分割草拟详尽的蓝图，那就是无聊的幻想。可以想出至少二十种草案，每一种看来都同其

他十九种一样合适。但是我们打算做的，并不是编造空幻的计划，而是要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决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通常叫做欧洲土耳其的半岛是南方斯拉夫种族世代相传的当然财产。在一千二百万居民当中有七百万属于这一种族。它占有本土已有十二个世纪了。如果把极少数本属斯拉夫族而改说希腊语的居民除外，只有野蛮的土耳其人或阿尔纳乌特人是斯拉夫人的对头。这些土耳其人早就被斥责为仇视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方斯拉夫人是该国内部地区文明的唯一代表者。不错，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较文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们同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的敌人进行了十一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内政自主。近二十年来，他们在文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都把塞尔维亚看做他们将来为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团结中心。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民族的结合程度越大，俄国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直接影响就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试看，塞尔维亚为了取得一个基督教国家应有的地位，就曾经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因此才出现这样的反常现象：塞尔维亚尽管受俄国的保护，但本身却是君主立宪，而且从一解放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无论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血缘如何相近，宗教如何相同，而一旦后者获得自由，他们的利益立刻就要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从两国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贸易需求来看就易于理解这一点。俄国是密封的大陆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有朝一日工业生产也可能发展起来。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的版图不大而海岸线

极长，面临三海，其中有一个海归它自己控制；因此，它在目前主要是过境贸易国家，虽然它也具有发展自己的工业的雄厚潜力。俄国要垄断，而南方斯拉夫人则要扩大市场。此外，他们在中亚还是竞争对手，俄国的现实利益要求除自己的商品外不准任何其他商品渗入中亚，而南方斯拉夫人目前就已经迫切要求把西欧的商品运往东方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两个民族怎么能互相一致呢？实际上，土耳其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甚至现在就同西欧比同俄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当现在从奥斯坦德、哈佛尔和汉堡通到佩斯的铁路线延至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正如现在计划的那样）的时候，西方文明和西方贸易对东南欧的影响就要经常化了。

另一方面，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深受要由他们供养的穆斯林军事占领者的压迫。这个军事占领者阶级独揽一切国家职权：军事的、民政的和司法的。但是，俄国的政治制度在它还没有同封建机构结合起来的所有地方，不也是按军事方式来组织等级制的民政和司法并且要人民担负全部费用的军事占领吗？谁要是认为这类制度会使南方斯拉夫人向往，那就请他看看1804年以来的塞尔维亚历史吧。塞尔维亚独立的缔造者卡拉-格奥尔基被人民唾弃了，重新恢复了这个独立的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可耻地被逐出国，这两个人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企图推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半军事的官僚制和敲诈勒索，象土耳其的帕沙们现在所做的那样。

总之，这个问题简单而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历史和现代的事实同样指明，必须在欧洲伊斯兰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到来的革命就极有可能使这样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恐怕非爆发不可。英国势必参加这个冲突，不管到那时是什么政府执政。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同意俄国占领君士坦

丁堡。它势必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在衰败虚弱的土耳其政府的原地上促成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35]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35—40页）

马克思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摘录）

（1853年5月24日）

大家知道，关于圣地问题已经做了有利于俄国的解决[36]；俄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都保证俄国并没有别的企图，它只是要求承认它在这些圣地的主要地位。俄国外交目的的侠义性质并不亚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和狮心理查。至少《泰晤士报》是这样说的。

《辩论日报》[37]报道说："5月5日，俄国蒸汽巡航舰'贝萨拉比亚号'从敖德萨开来，乘坐该舰的是一名上校，给缅施科夫公爵送来了急电；到5月7日①星期六那天，公爵就向土耳其大臣们递交了一份协议或专门条约的草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企图。这一文件被称为最后通牒，因为它还附有一份很简短的照会，照会指出土耳其御前会议接受或拒绝这一文件的最后期限是5月10日即星期二。照会最后几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土耳其政府复照拒绝，皇帝将不得不认为这一行动是对他本人和对俄国完全缺乏尊敬的表示，并且将对这一消息深表遗憾'。"

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保证俄皇对土耳其政府治下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根据十八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38]，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正教教堂，而且俄国大使馆有权干预正教教堂的神甫同土耳其人的争端。阿德里安堡条约又重申了这项特权。但现在缅施科夫公爵却想把这项不平常的特权变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

① 应是5月5日。——编者注

的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此外，缅施科夫还要求君士坦丁堡的、安提奥克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耶路撒冷的所有总主教和大主教享有常任权，只要他们没有被发现犯叛国罪（反对俄国人）；而且，即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免职，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换句话说，缅施科夫是要苏丹[1]放弃自己的主权，使俄国得利。

星期六的电讯是这样：一、缅施科夫公爵同意把答复他的**最后通牒**的期限延长到5月14日；二、土耳其内阁成员有变动，俄国的对头列施德-帕沙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而傅阿德-埃芬蒂复任大臣之职；三、**俄国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

就算是俄国已经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它也不能向土耳其提出这样一些过分的要求。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俄国是如何顽固地坚持着它的已经根深蒂固的打算，证明了欧洲每一次反革命的王位虚悬时期都会给予它向奥斯曼帝国勒索让步的权利。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从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起，欧洲大陆上的倒退运动也总是意味着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但是现在俄国却弄错了，它把欧洲的目前状况同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以后的欧洲局势，甚至同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欧洲局势混淆了起来。现在，俄国本身害怕革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大战都会引起革命）要比苏丹害怕沙皇的进攻厉害得多。如果其他大国抱坚定的态度，俄国就会后退，以保持面子。不管怎样，俄国最近所要的手腕，至少对从内部瓦解土耳其的那些因素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唯一的问题是：俄国现在是按照自由的意志行动呢，还是不由自主地只是新天命——革命——的不自觉的奴隶？我相信后者。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121—123页）

---

① 指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麦吉德（1823—1861）。——编者注

马 克 思

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

（1853 年 5 月 31 日）

在比斯开湾，发现科里海军上将的分舰队正开往马尔他，去那里加强邓达斯海军上将的分舰队。关于这件事，《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

“如果在几个星期以前能够让邓达斯海军上将到萨拉密斯附近和法国分舰队会合，那末，现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如果俄国企图以实际的军事行动来支援缅施科夫的可笑的示威行动（哪怕仅仅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那末，它的第一个行动很可能就是再一次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侵入阿尔明尼亚的卡尔斯省，侵入巴土姆港。这些地方，俄国远在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的时候，就曾千方百计地力图弄到自己手里。由于巴土姆港是黑海东部的唯一可靠的安全港口，所以，如果俄国占领了它，土耳其就会丧失自己在欧克辛海① 的最后一个海军基地，欧克辛海就要变成纯粹俄国的海。如果俄国占领卡尔斯——阿尔明尼亚的最富庶、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再占领巴土姆，那末，它就能够切断英国和波斯之间通过特拉比曾德的贸易，并且还能为自己建立一个既能对付英国又能对付小亚细亚的作战基地。即使如此，如果英国和

① 黑海的古称。——编者注

法国能持强硬态度，尼古拉就很难在这一地区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就要碰到当年叶卡特林娜女皇在同阿加-穆罕默德斗争时碰到的命运，那时，阿加-穆罕默德曾经命令他的奴隶们用鞭子把俄国大使沃依诺维奇和他的随从赶出阿斯特拉巴德，迫使他们坐船逃走。

最近的一些消息在印刷所广场引起的慌乱，比任何地方都要大。《泰晤士报》[39]在可怕的打击之后，为了恢复常态，首先就来拚命抨击电报，说它是一个"完全失效了"的机器。《泰晤士报》大叫："从这些不真实的电讯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它用这种办法把自己做了不正确结论的责任都推给电报线以后，就用大臣们在议会里所用的辞句，企图和它自己先前的那些"正确"前提划清界限。《泰晤士报》声称：

"不管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命运怎样，更确切点说，不管统治了这个帝国已有四个世纪的伊斯兰教政权的最终命运怎样，英国和整个欧洲的所有政党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当地的基督教居民逐步向文明、向独立治理进展，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民族沦于俄国的铁蹄之下，使俄国的巨大领土更加扩大。我们深切地希望，不仅土耳其，而且全欧洲都来抵抗俄国的这种野心；我们希望，只要俄国的这种兼并和扩张的意图真正表现出来，马上就引起普遍的反感和不可遏止的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族和斯拉夫族的臣民也是决心积极参加这种反抗的。"

那末，可怜的《泰晤士报》那时怎么就相信了俄国对土耳其抱着"善良愿望"和它对一切扩张都抱"反感"呢？俄国对土耳其竟然抱着善良的愿望！彼得一世早就盘算过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己的宝座。叶卡特林娜也曾一再开导奥地利，劝说法国，一同来瓜分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①]为首的希腊帝国，而且还胸有成竹地让她的孙子受了相应的教育，甚至给他取了相应的名字。现在，比较稳健的尼古拉只是要求承认他是土耳其的唯

① 康斯坦丁。——编者注

一的保护人。但是所有的人都记得，俄国做过波兰的保护人、克里木的保护人、库尔兰的保护人、格鲁吉亚和明格列里亚的保护人、切尔克斯和高加索各部族的保护人。现在它又要当土耳其的保护人了！为了说明俄国对扩张所抱的“反感”，让我从俄国自彼得大帝那时起抢夺领土的许多事实当中举出几件材料罢。

俄国边界向外伸展的情况是：

往柏林、德勒斯顿和维也纳方向伸展……约 700 哩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约 500 哩
往斯德哥尔摩方向……约 630 哩
往德黑兰方向……约 1 000 哩

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六十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第 129—131 页）

马 克 思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摘录）

（1853 年 6 月 7 日）

据伯尔尼消息，联邦委员会撤销了弗里布尔州军事法庭对不久前暴动参加者的判决，并且建议：如果州委员会不予赦免，就将该案移交普通法庭。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在“瑞奥关系决裂”时采取的第一个英勇行动。关于这次决裂的必然后果，我在前面一篇论述这个欧洲的“模范共和国”的文章中已谈过了①。

我在转述关于普鲁士政府命令在国外休假的一些炮兵军官速返职守的消息时，误写了他们在俄国军队中任教官，而我的本意是想说，他们在土耳其炮兵中任教官，指导野战训练。

住在巴黎的所有俄国将军和其他俄国人，都接到了速返俄国的命令。俄国驻巴黎公使基谢廖夫先生说话很带威胁性，并且耀武扬威地出示彼得堡的信件，这些信件对土耳其问题的谈法 assez cavalièrement〔非常骄横〕。从这里就产生一种传言：似乎俄国要求波斯让出里海东南岸顶端的领土和阿斯特拉巴德城。同时，俄国商人正向他们驻伦敦的代理人发出——或者，象消息所报道的，已经发出了——指示：“目前谷物不要急于求售，因为战争威胁迫于眉睫，谷价看涨。”最后，所有报纸都神秘莫测地暗示：俄国军队正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24—125 页。——编者注

开赴边境；雅西居民筹备欢迎；俄国驻加拉兹领事采购大批圆木，以备在多瑙河上架设桥梁之用；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由《奥格斯堡报》[40]和其他亲奥、亲俄的机关报煞费苦心编出来的谣言。

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大堆类似的新闻、报道等等，都不过是俄国代理人的可笑企图。他们想使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能对俄国有利的恐惧心理，迫使西方世界继续执行拖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掩护之下，俄国就可以象过去一样实现它在东方的计划了。这一幕骗局是怎样系统地演出的，从以下可以看到：

上星期，某些公开接受俄国津贴的法国报纸作出了这样一个发现：

"实质上，与其说是俄土之争，倒不如说是彼得堡和莫斯科即沙皇和旧俄派之争；对专制君主来说，宣战的危险性，比遭到坚决要求攻城略地的党派的报复，要小得多，这个党派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它会如何对待它所不乐意的君主。"

不言而喻，缅施科夫公爵就是"这一党派的首领"。《泰晤士报》和多数其他英国报纸马上就接着宣扬这一荒谬的论断，它们当中有一些完全了解这种说法的真意，有一些可能是无意受骗。但是从这个新发现中公众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或者是，尼古拉在众口嘲笑之下后退，放弃他对土耳其的好战的做法，那末，他就是战胜了本国好战的旧俄派；或者是，尼古拉真的开战，那末，他这样做只不过是由于必须向这个（故事中的）党派让步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只是莫斯科战胜彼得堡或彼得堡战胜莫斯科的问题"，因而不会是**欧洲战胜俄国**的问题。

至于著名的旧俄派，我曾偶然地从一些在巴黎与我常相往来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俄国贵族出身的人那里听到，这个党派早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当沙皇要找一个恐吓西欧的稻草人迫使西欧容忍他的苛求时，才偶尔把这个党派的阴魂招来用一下。他们都说，现

在所以把缅施科夫挖掘出来，给他穿上故事中的旧俄服装，就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沙皇所担心的只是俄国贵族中的一个党派，即想按照英国的样式建立贵族立宪制度的党派。

为了欺骗英国和法国，俄国外交除了招来形形色色的阴魂之外，最近又采取了另一措施：出版了波蒙-瓦西子爵所写的一部著作，书名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罗斯帝国》**[41]。要介绍这本opusculum〔小册子〕，只从里面引这样一段就够了：

"大家知道，在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地下室内藏有硬币和金银锭的储备。截至1850年1月1日，这一**秘密金库**据官方估计为九千九百七十六万三千三百六十一银卢布。"

有谁想到过谈论英格兰银行的**秘密金库吗**？俄国的"秘密金库"不过是用来担保三倍于此数的**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此种纸币**可换取贵金属**，至于不能换取贵金属的、国库发行的有价证券构成的"秘密"准备金的存在，那就不用说了。不过，有可能这种金库确实可以称为"秘密的"，因为除沙皇政府每年任命几名彼得堡商人来检查他所存的钱袋之外，至今还没有人看见过。

但是，俄国按照上述精神而耍的主要的花招，是在《辩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由老奥尔良派贤人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署名的文章。现在我引证一段：

"我们认为，现在欧洲有两个大危险，一个是威胁它的独立的**俄国**，一个是威胁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欧洲只有完全投入一个危险，才能避免另一个危险…… 如果欧洲认为，它的独立，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独立的关键在君士坦丁堡，正是在君士坦丁堡要表现出勇敢大胆精神来解决问题，那末，这就意味着跟俄国开战。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战争中就是为保障欧洲的独立而战。德国将如何行动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欧洲形势下，战争就意味着社会革命。**"

不言而喻，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是不惜任何代价要和平因而反对社会革命的。但是他忘了俄国皇帝对这种革命感到的"恐

慌”，至少也同他本人及其东家贝坦先生一样。

尽管俄国外交给英国报界和英国人民送上了上述种种麻醉药，但“老顽固”阿伯丁仍然不得不向海军上将邓达斯发出了到土耳其沿海与法国舰队会合的命令。即使是最近几个月来只会用俄文写字的《泰晤士报》，看起来也充满了更多的英国感情。它现在也开始用极端骄横的口气说话了。

丹麦问题（过去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在英国开始引起极大的注意，因为英国报界终于了解到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同东方纠纷的根源一样，都是俄国的扩张意图。土耳其和东方制度的著名崇拜者，议员乌尔卡尔特先生出版了一个论述丹麦继承权的小册子[42]，这本小册子我将在今后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这一著作的主要论据是指出：俄国的意图是想使松德海峡在北方所起的作用，正同达达尼尔海峡在南方一样，就是说，力求利用松德海峡来保障自己在波罗的海的统治，就象它力求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来巩固它在欧克辛海的统治一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132—135页）

马 克 思

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摘录）

（1853 年 6 月 21 日）

1828 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结果缔结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纳帕南至波提（切尔克西亚除外）都夺到了自己手里，并且占领了多瑙河河口诸岛屿，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被交给俄国统辖，当时大不列颠的外交大臣是阿伯丁勋爵。1853 年，我们看到，同一位阿伯丁成了这个国家的“混合内阁”的首脑。只要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俄国目前在它同土耳其和欧洲的冲突中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泰晤士报》在星期四提出的那种强词夺理的、狡猾的和伪造的辩护理由，恐怕平息不了由于《新闻报》对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布隆诺夫男爵之间的秘密协议的揭露所引起的风波①。甚至《泰晤士报》后来也不得不在一篇半官方的文章中承认，克拉伦登勋爵实际上同意了俄国打算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但是，它又补充说，俄国人在伦敦所通知的要求同在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提出的要求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尽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55 页。——编者注

管布隆诺夫男爵介绍给英国大臣的文件就是从缅施科夫公爵得到的指示中“**摘录下来的原文**”。但是，《泰晤士报》在星期六（毫无疑问是由于俄国使团的抗议）又收回了自己的断语，并且为布隆诺夫男爵作证，说他是极其“诚实和正直的”。《先驱晨报》昨天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俄国向布隆诺夫男爵本人发了一个虚假的指示，为的是欺哄英国大臣呢？”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又知道了卖身为奴的报纸千方百计向公众隐瞒起来的一些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排除了上述的解释。这些揭发材料证明，全部责任都在“混合内阁”身上；而且根据这些材料足以控告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犯了国事罪，换上其他任何一个议会都会这样做，只有本届议会除外，它只不过是用行贿和恫吓手段硬拉起来的选举僵尸生下的瘫痪产儿而已。

已经确定，克拉伦登勋爵曾收到通知，通知告诉他关于圣墓的问题**不是**俄国公爵① 所关心的**唯一问题**。这个通知还谈到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土耳其的正教居民和俄皇根据条约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所有这几点都经过了讨论，俄国准备采取的方针也被详加说明，这就是5月6日的条约草案[43]详尽阐述的那个方针。克拉伦登勋爵征得阿伯丁勋爵的同意，对这一方针并没有表示丝毫的不赞同，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正当伦敦这样办事的时候，波拿巴派出了舰队前往萨拉密斯，社会舆论对议会施加了压力，在两院中都向大臣们提出了质询，罗素郑重许诺要保护土耳其的不可侵犯和独立，而缅施科夫公爵则在君士坦丁堡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阿伯丁和克拉伦登两位勋爵这时就不能不向其他大臣说明事件的全部经过了，于是联合内阁濒于瓦解，因为帕麦斯顿勋爵（他的过去使他不能不这样做）开始坚持完全相反的政策。

① 指缅施科夫。——编者注

为了防止内阁瓦解，阿伯丁勋爵终于向帕麦斯顿的主张作了让步，同意英法两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共同行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阿伯丁勋爵为了履行自己对俄国所负的义务，用急电告诉圣彼得堡说，他将不把俄军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看做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而《泰晤士报》也接到了指示，要它促使舆论接受这一个对国际条约的新解释。这里不能不为这家报纸说句公道话：它为了把黑的说成白的，确实非常辛苦了一场。这家报纸过去一直断言，俄国对土耳其的正教居民的保护权根本不会有任何政治后果，而现在却突然证明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有两个宗主国，它们实际上已不是土耳其帝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严格地说来”，占领它们并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侵犯，因为，按照布加勒斯特条约[44]和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沙皇对多瑙河各省的正教居民有保护权。1849年5月1日签订的巴尔塔利曼尼条约[45]有这样一个十分清楚的规定：

“一、对这些省份的占领如属应当，也只能由俄国和土耳其的武装部队来联合执行；

二、进行占领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多瑙河各公国发生了严重的混乱。”

但是，这些公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混乱，而且俄国也绝不打算和土耳其一起去占领这些地方，恰恰相反，正好是为了反对土耳其才去占领这些地方，于是《泰晤士报》就说，土耳其首先应当对俄国单独占领这些公国的行为采取容忍态度，然后再同俄国进行谈判。如果土耳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冷静态度，认为占领就是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那末，该报认为，英法两国也决不应该抱同样的态度。即使它们要抱同样的态度，《泰晤士报》建议，它们的行动也要有分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作为交战国的一方来反对俄国，而只是以土耳其盟国的资格来保护土耳其。

我觉得，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懦怯而滑头的行为加以痛斥的

最好方法，莫过于从《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中引证下面一段话。这篇社论简直是集阿伯丁勋爵政策中的种种矛盾、诡辩、借口、顾虑和 lâchetés〔卑鄙行为〕之大成。

"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土耳其政府可以（如果它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对各公国被占领一事提出抗议，并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继续进行谈判。土耳其政府应当取得四大国大使的同意而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自己做出决定，特别是要确定，敌对行为已经超出界限多少，是否可以根据 1841 年公约[46]的规定把达达尼尔海峡向外国军舰开放。如果这个问题肯定了，并且舰队得到了开进海峡的命令，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到那里去究竟是作为调解国还是作为交战国。因为，即使假定土耳其和俄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外国舰队根据 casus foederis①（！）而被允许进入海峡，那还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它们一定要作为交战国的船只而不是作为调解国的船只进行活动，而这个问题是它们更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们被派往那里去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这种措施不应当使我们一定要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

《泰晤士报》的所有的社论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没有一家报纸跟在《泰晤士报》后面跑，也没有一家报纸上它的圈套，甚至《纪事晨报》、《晨邮报》、《地球报》、《观察家报》这些政府报纸也完全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响应拉芒什海峡对面的热烈反响，——在那里，也只有一家正统主义报纸《国民议会报》[47]好象还没有把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一事看做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

这样一来，由于政府报刊以不同的腔调叫嚷起来，公众就知道了联合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帕麦斯顿已经说服了内阁把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事看做宣战行为，并且得到辉格党人和"混合内阁"的假激进派阁员的支持。阿伯丁勋爵（他仅仅由于指望俄国不在达达尼尔海峡而只在多瑙河各公国采取行动才同意英法两国舰队采取共同行动）现在就陷入了非常狼狈的境地了。于是政

① 直译是：同盟的时机，即同盟国应当履行义务的时候。——编者注

府的存在又成了问题。这样弄到最后，当帕麦斯顿向阿伯丁勋爵的顽固主张进行让步，并且准备迫不得已同意俄国强占两公国的行为的时候，突然从巴黎拍来急电，报告拿破仑打算承认这种行为就是 casus belli。混乱就达到极点了。

如果上面这种对事件的阐述是正确的话（根据阿伯丁勋爵的过去一切，我们有一切理由这样认为），那末几个月来吸引着欧洲注意的俄土悲喜剧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出来了。现在我们马上明白了，为什么阿伯丁勋爵不愿把英国舰队调离马尔他岛。我们开始懂得，为什么罗斯上校会由于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坚决行动而遭到训斥；我们也弄清楚了，为什么缅施科夫公爵的态度那样咄咄逼人，为什么沙皇表现得那样大胆强硬。沙皇了解到，英国的军事示威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所以，他如果能够通过这次毫无阻碍地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行动，使他不仅可以以主人的资格退场，而且还可以用苏丹臣民的钱粮进行年年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那他是非常乐意的。如果战争还是要爆发，那末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俄国太过分了，势必丢面子才能下台。而且，俄国之所以这样强硬，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指靠着英国的纵容。

在这方面，“一个英国人”最近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谈到联合内阁的话说得很中肯：

“每当达达尼尔海峡吹来一阵微风的时候，联合内阁都要发生动摇。善良的阿伯丁胆小怕事，克拉伦登无能得可怜，这就鼓励了俄国，引起了危机。”

最近从土耳其传来的消息是：土耳其驻巴黎大使收到了君士坦丁堡通过泽姆林发来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土耳其政府已依据给列强的备忘录拒绝了俄国的最后通牒[48]。据马赛的报纸《信号报》[49]报道，士麦那有消息说，俄国在黑海截走了两艘土耳其商船，

但是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辉的胜利，缴获大炮不下二十三门。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160—165页）

马克思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摘录）

（1853年7月1日）

从1815年起，欧洲列强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status quo〔现状〕遭到破坏。但是列强中的任何两国发生任何战争都有打破status quo的危险。因此，西方列强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俄国在东方进行的掠夺，而且从来不向它要求任何代价，只要求它找出某种借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借口也好，好使它们能够继续中立，不致于非去阻挡俄国侵略不可。俄国一直受到夸奖，都说它的"神圣君王"宽宏大量，不仅仁慈地愿意来掩盖西方各国当局的那种不可掩盖的、可耻的卑屈行为，而且对土耳其很宽大，没有把它一口吞完，而是一块一块地吞吃。这样一来，俄国外交就有了西方的国家活动家们的胆怯心理作为依靠，而它的外交术也逐渐成了一种**公式**，以致于对照着过去的记录就可以几乎丝毫不差地察知当前谈判的经过。

俄国的新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点，在苏丹① 最近向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发出了一项敕令，凡有关宗教的一切都作了比沙皇所要求的还要多的让步以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绥靖希腊"[50] 是否就是进行干涉的重大借口呢？当年，德·维莱尔先生为了消除

① 指阿卜杜-麦吉德，1839—1861年的土耳其苏丹。——编者注

苏丹① 的顾虑并证明列强的善意，曾提议“盟国首先签订一项条约，以保证奥斯曼帝国维持其现状”，这个提议遭到了俄国驻巴黎的大使② 最坚决的反对。俄国大使声称：

“俄国**对土耳其政府是宽宏大量的**，对自己的盟国的愿望是**无限尊重**的，但是，它不得不保留它独有的解决自己与土耳其御前会议的分歧的权利；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伤及**圣上的感情**，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权利赖以产生的原则，更不用说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51

现在，俄国要求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并否认土耳其有权把这个步骤看做是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

1827 年，俄国曾要求允许它“**以三强的名义**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1828 年 4 月 2 日，俄皇在宣战书中声明：

“我的同盟者会看到我时刻准备和他们同心协力地履行伦敦条约52，会看到我非常想帮助他们完成我们的**宗教**和全人类的神圣感情使我们关怀的那项工作；他们会看到我时刻准备**纯粹**为了使 7 月 6 日的条约更快地得到履行而利用我的地位。”

1829 年 10 月 1 日俄国的宣言宣称：

“俄国一向就没有任何侵略思想和任何扩张意图。”

同时，俄国驻巴黎大使却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当帝国当局讨论以武力对付土耳其政府的时机是否来到这一问题时，大概某些人曾对这一步骤的迫切必要性有所怀疑，这些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首脑不久前用那种可怕的暴力手段推行的**血腥改革的后果**是考虑不够的。**皇上研究了土耳其的制度，他发现这一制度显露出一种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体力组织和精神组织的萌芽。**如果说苏丹在现在，在他刚刚为实现新的改革和改良计划打基础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向我们进行更坚决更有组织的反抗，那末，如果他有了时间来巩固这种基础，对我们就更可怕了。既然形势已

①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② 波茨措-迪-博尔哥。——编者注

成这样，那我们应当引以为幸的就是还来得及在危险性增大以前转入进攻。任何迟延都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并给我们造成我们不曾遇到的重大困难。”

现在，俄国是想先采取侵略步骤，然后才谈论它。1829 年，利文公爵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我们将只限于一般的提法，因为任何关于这个如此微妙的问题的具体报道都可能造成实际的危险。如果我们要同我们的同盟国一道商讨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的条文，那也只有在他们**自以为**使我们作出了无可挽回的牺牲的时候才能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和约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阵营内签订，只有在和约缔结后才能让欧洲知道和约的条款。到那时要反对已经晚了，欧洲也只好忍一口气承认它已经无法阻挠的局面。”

现在，俄国有几个月一直用种种借口迟迟不采取断然行动，以保持一种俄国可以接受而对土耳其则有致命危险的非战非和的局面。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时期内，俄国也正是这样做的。波茨措-迪-博尔哥曾就这一点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四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虽然沙皇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而且现在还以武力威逼它做出最屈辱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大肆宣扬他对“苏丹阿卜杜-麦吉德的友谊”，和他对“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关怀。沙皇把“责任”推到苏丹身上，说苏丹违抗他的“公正要求”，说苏丹不断“伤害他的友谊和他的感情”，拒绝他的“照会”，拒绝他的“保护权”。

1828 年，查理十世曾问过波茨措-迪-博尔哥是什么原因使俄军在那年的战役中失利，波茨措-迪-博尔哥回答说，是因为俄皇不愿意在不到非常必要的时候就进行 à l'outrance〔决死〕战争，俄皇希望苏丹能抓住他表示**宽大**的机会，但是这种**试验**未能成功。

在俄国同土耳其政府发生目前这场冲突以前不久，俄国曾试

图在政治流亡者问题上组成大陆列强的大联合来反对英国；当这一试图不成功时，它便极力复活同英国的同盟来反对法国。同样，在1826—1828年期间，俄国曾经用普鲁士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威吓奥地利，同时又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普鲁士并助长其野心，以便使普鲁士起到抗衡奥地利的作用。俄国在它现在的周知照会[53]中把波拿巴说成是贪图圣地而破坏和平的唯一祸首。在1826—1828年时期，俄国曾经由波茨措-迪-博尔哥出面证明：

“笼罩欧洲的惊惶不安应该归罪于梅特涅公爵的阴谋”，并且，俄国极力“向威灵顿公爵本人示意，说他对维也纳当局的关注可能损害他对所有其他各国当局的影响，并且会造成这样一个转折：谋求法国同大不列颠协议的就不是俄国，而是早先为了靠拢维也纳当局而拒绝同法国结盟的大不列颠自己了。”

现在，俄国如果让步，就会大大贬低自己。它在1828年第一次战役失败以后的处境也正是这样。当时俄国的主要目的何在呢？我们让它自己的外交官来说吧：

“为了取得顺利进行谈判所必需的那种优势，第二次战役是必要的。在进行这次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做到能够迅速而有力地迫使对方接受我们的条件…… 陛下在**掌握较大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将只限于提出**较小的要求**。在我看来，达到这样的优势，应当成为我们的全部努力所追求的目的。**这种优势现在已成为**我们应当在全世界面前保存和保持的那种**政治存在的条件**。”

但是，难道俄国不怕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吗？当然是怕的。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公布的有关俄国用以瓦解法英同盟的手段的秘密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

“如果爆发了法国和英国联合参加的战争，俄国就丝毫没有取胜的希望，除非使这个同盟瓦解，或者，至少使英国同意当大陆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中立。”

问题是俄国是否相信英国和法国将联合行动？让我们再看一看波茨措-迪-博尔哥的报告吧：

"自从那种认为土耳其帝国要灭亡的想法不再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起，英国政府就不怎么敢冒大战的危险来使苏丹不同意作某些让步，特别是在下一个战役开始之前，一切尚不明确的那个时候。这些情由使我们有根据设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大不列颠会公开同我们决裂。它只会建议土耳其政府求和，并且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尽力之所及帮土耳其政府的忙。如果苏丹拒绝，或者我们坚持己见，英国也不致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

至于涅谢尔罗迭对那位曾在 1828 年当大臣和 1853 年当大臣的"善良的"阿伯丁的看法，可以从利文公爵如下一段报告中看出：

"阿伯丁勋爵在和我会晤时再一次向我担保说，英国从未打算同俄国发生争执。他担心圣彼得堡对英国内阁的立场并不完全了解。他本人的处境很微妙。舆论总想向俄国大肆进攻。而不列颠政府又不能经常向舆论挑战。而且在那些与民族偏见密切关联着的问题上挑动舆论是很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俄国可以完全信任同这些偏见作斗争的英国内阁的友好态度。"

如果说涅谢尔罗迭先生的 6 月 11 日的照会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那末，值得惊奇的并不是"无耻之极地混合了为事实驳倒的声明和被词藻掩饰的威胁"，而是欧洲对俄国外交照会第一次采取这种态度：西方世界并没有象往常那样敬畏和颂扬，而是为过去感到羞愧，并且轻蔑地嘲笑了这种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和十足的野蛮无耻之极地堆在一起的东西。但涅谢尔罗迭的周知照会和 6 月 16 日的"紧急最后通牒"仍然丝毫不亚于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备受赞扬的杰作。而那时涅谢尔罗迭伯爵也和现在一样，是俄国外交的首领。

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位研究熊的波斯自然科学家，其中一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就问道：这种动物是下崽呢还是产蛋呢？另一位比较熟悉些的回答说："这种动物什么事都能做"。俄国熊无疑也是什么事都能做，特别是当它知道它要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些野兽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

我想 en passant〔顺便〕提一提俄国最近在丹麦国王咨文以

一百一十九票对二十八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这件事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请看下面一段话：

“联合议会根据1849年6月5日宪法第四条，同意按照国王1853年6月13日再次提出的1852年10月4日的王位继承咨文，在整个丹麦王国执行国王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诏令。”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184—189页）

马 克 思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摘录)

(1853 年 7 月 12 日)

俄国人占领了两个公国[①] 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公布苏丹确认一切教派的基督徒的特权的敕令，并封闭了一家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德文报纸，因为这家报纸竟敢刊登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同时，俄国人还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他们前次(1848—1849 年)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规定的年贡的第一批贡款。从 1828 年以来，俄国的保护制度使这两个公国花费了一亿五千万披亚斯特，而抢劫和破坏造成的巨大损失还不算在内。英国为俄国支付了它对法作战的费用，法国为它支付了对波斯作战的费用，波斯为它支付了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土耳其和英国为它支付了对波兰作战的费用；现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各公国要为它支付它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了。

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涅谢尔罗迭伯爵于 1853 年 6 月 20 日发自圣彼得堡的一个新的周知照会。照会宣称，在苏丹没有同意沙皇的全部要求、英法舰队没有离开土耳其海面之前，俄国军队决不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这个照会听起来简直就是对英法两

① 指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编者注

国的侮辱。照会中说：

“两个海上强国采取的立场是海上占领，因此我们有权利占领一定的军事阵地，以恢复双方地位上的均势。”

请大家注意一下，贝捷克湾离君士坦丁堡有一百五十哩。沙皇坚持它有占领土耳其领土的权利，同时却否认英国和法国有不经沙皇特许而占据中立水域的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沙皇允许土耳其政府在选择放弃主权的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允许土耳其政府“通过协定或其他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甚至通过签署一个普通照会的方法”来做这件事。他确信，“公正的欧洲”一定会理解，凯纳吉条约虽然只给予俄国保护伊斯坦布尔的一座东正教教堂的权利，但 eo ipso〔这样一来〕就宣布了俄国是东罗马。他对于西方不了解俄国在外国的宗教保护制度根本无害于人表示遗憾。他用历史事实，即用“他在 1829 年利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时所表现的那种真正的温和”来证明自己关心保持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性。实际上，他当时没法表现不温和，因为当时他的军队处境很困难，而英国海军上将又扬言不管有没有本国政府的允许都将轰击黑海沿岸的每个居民点；他当时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之所以能得到，完全是西方各国的当局“宽宏大量”，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附近被背信弃义击溃的结果。

“在 1833 年他是欧洲唯一使土耳其免遭不可避免的瓜分的人。”

1833 年沙皇通过签订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54]，同土耳其订立了**防御同盟**，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舰队禁止驶近君士坦丁堡。由此可见，土耳其不被瓜分，完全是为了让俄国全部独吞。

“在 1839 年，他同其他列强一起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由于共同努力实行这些建议，才使苏丹的王位免除了被新的阿拉伯帝国所取代的危险。”

换句话说，在 1839 年，他使列强担任主动消灭了埃及的舰队，

并使那个唯一能够使土耳其变成对俄国的最大威胁、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① 丧失了一切力量。

“圣上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向来就是力图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东方的 status quo〔现状〕。”

说得对。沙皇一贯处心积虑地想使土耳其的腐烂过程完全在俄国的保护下进行。

应当承认，东方还从来没有敢于直接向西方提出过更有侮辱性的照会。照会的作者真不愧是涅谢尔罗迭，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兼有荨麻和鞭笞② 的意思。的确，这个照会证明欧洲如何在反革命的鞭笞下退化了。革命者只能向沙皇祝贺他有这样的杰作。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末这还不单是在一般的失败之后的退却，而是通过卡夫丁峡谷[55]。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220—222页）

① 穆罕默德-阿利。——编者注

② 俏皮话：《Nessel》（涅谢尔）意为“荨麻”（德文）；《rod》（罗迭）意为“鞭笞”（英文）。——编者注

马克思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摘录）

（1853年7月19日）

沙皇不仅开始了战争，而且已经结束了第一个战局。作战线不仅越过了普鲁特河，而且推到了多瑙河沿岸。可是西方列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们劝苏丹，就是说，他们强迫苏丹把战争看做和平。他们不是用大炮而是用照会来回答专制君主的行动。他们用来向俄皇进攻的不是两支舰队的力量，而是不少于四个的谈判方案。一个是英国内阁提出的，第二个是法国提出的，第三个是奥地利提出的，第四个是由波茨坦的那位“内弟”① 匆忙间草拟的。他们希望沙皇开恩，从这些 embarras de richesses〔财宝多得难以挑选的宝库〕中选择一个最符合他的目的的方案。德鲁安·德·路易斯在对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照会（第二个照会）的答复（第二次答复）[56] 中，极力证明“首先采取示威行动的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象人们把骨头扔给狗一样，俄国向西方外交家发出了许多照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作无害的消遣，而保证自己进一步赢得时间。自然，英国和法国都踊跃上钩。他们受了屈辱还嫌不够，因为接受这种照会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屈辱，而且还为这些照会加上最爱好和平的评语，例如，《帝国报》[57]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

① 指1840—1861年期间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德·拉·格隆尼埃尔先生署名，然而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写的，并且是经过他仔细校阅的。这篇文章认为俄国有权提出"不在普鲁特河的东岸而在西岸进行谈判"的不客气的要求。文章几乎把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第二个照会看做"谋求和解的企图"。文章关于这一点的表述如下：

"涅谢尔罗迭伯爵现在谈的只是道义保证，并且宣布道义保证只应暂时地由物质保证来代替；**由此可见，他是直接要求举行谈判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外交途径已经无能为力了。"

《国民议会报》(这是巴黎的《俄国日报》)以开玩笑的口气祝贺《帝国报》作了这种为时太晚的发现，它自己只不过对于这样无故吵嚷表示遗憾。

英国报纸则完全失去了自制。

"沙皇根本不能理解西方列强对他表示的礼貌…… 他在同其他列强进行谈判的时候在态度上做不到有礼貌。"

上面是《晨报》所说的话。《晨邮报》也因沙皇很少考虑对方的内部 embarras〔困难〕而大发脾气。

"仅仅由于狂妄任性而提出没有什么迫切性的要求，并且在这样做时又丝毫不考虑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的欧洲的状况，那就是犯了几乎难以置信的轻率的毛病。"

《经济学家》杂志上论述金融市场问题的文章的作者认为：

"现在人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看到：由于世界的〈即交易所的〉最深处的利益为一个人的古怪脾气所左右，结果产生了多么大的困难啊。"

但是，在 1848 年和 1849 年，俄皇的半身塑像同 veau d'or〔金牛犊〕本身却是紧挨在一起的。

然而苏丹① 的处境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困难和更复杂了。它的

① 指阿卜杜-麦吉德，1839—1861 年期间的土耳其苏丹。——编者注

财政困难所以不断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而从战争中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民的热情没有被用来反对沙皇，而是转过来反对苏丹自己。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使他受到发生宫廷政变的威胁，而正教徒的宗教狂热则有引起人民起义的危险。今天的报纸上登载了关于密谋杀害苏丹[58]的消息，策划这个密谋的是企图扶植阿卜杜-阿吉兹即位的老年土耳其党的穆斯林大学生。

昨天波门特勋爵和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上院要求克拉伦登勋爵报告自己的意图，理由是法皇已经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但是克拉伦登勋爵只是简短地报告说，英国赞同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照会，他以在最短期间一定向议院报告全部消息的诺言为掩护，回避作进一步的说明。当有人问到俄国人也攫取了处在他们的军事占领制度下的多瑙河各公国的民政机关和邮政机关一事是否属实时，克拉伦登勋爵当然也是“避不作答”。“由于他是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59]为根据的，所以他不能相信这一点”。对此，波门特勋爵宣称，他觉得克拉伦登的确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乔·华姆斯莱爵士在下院提出的关于最近在士麦那发生的乱子① 的问题时说，他确实听到过关于奥地利领事② 绑架一个匈牙利流亡者③ 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奥地利要求引渡所有匈牙利流亡者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消息。约翰勋爵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随自己的意来回答质问。到头来总是他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也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诸君看来他可能或一定读到的东西。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9页。——编者注

② 指奥地利驻士麦那总领事韦克贝克尔。——编者注

③ 指科斯塔。——编者注

《科伦日报》[60]在一封7月11日的维也纳来信中援引了下面一段关于士麦那事件的报告。

"舍基布-埃芬蒂已被派往士麦那去调查这个乱子的祸首，在这个乱子发生时哈克贝尔格先生遭到杀害。舍基布也得到了把奥地利籍或托斯卡纳籍的流亡者引渡给奥地利的命令。美国代办布朗先生就这个问题同列施德-帕沙进行了谈判，结果如何现在还不知道。我刚刚得知，杀死哈克贝尔格男爵的凶手已从驻士麦那的美国领事那里获得了一张护照，使他可以不受土耳其当局制裁。**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打算干涉欧洲事务。**另外还有一件不用怀疑的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舰队中有三艘美国军舰，有一艘美国的'坎伯兰号'巡航舰为土耳其政府带来了八千万披亚斯特。"

不管这一消息或其他类似的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它们都证明了一点，这就是到处都估计美国会进行干涉，而一部分英国的公众甚至还把这看成好事。美国舰长① 和领事的行为在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大声的赞同，"一个英国人"② 在昨天的《晨报》上还要求在地中海上升起美国国旗，让"肮脏的旧的英国国旗"丢一下丑，以促使英国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就东方问题的实质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沙皇的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他正在把奥斯曼帝国的最边远的地区一个一个地从奥斯曼帝国身上割下来，而且要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这个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停止跳动为止。每当他看到土耳其政府似乎加强，或者看到一个更大的危险，即斯拉夫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谋求解放，从而威胁到他对土耳其的计划时，他就会侵入

① 指英格拉哈姆。——编者注
② 指阿·理查兹。——编者注

这个国家。他利用西方列强的胆小怕事，吓唬欧洲，过分地提高自己的要求，以便到后来得到了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就止步，使人觉得他宽宏大量。

另一方面，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由于他们太软弱，太胆小，不敢用建立希腊帝国或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的办法来改造奥斯曼帝国，所以就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只放在保持 status quo〔现状〕上，即保持那种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而斯拉夫人又不能摆脱苏丹的腐烂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革命政党只能为自己庆幸。西方各国反动政府的卑躬屈膝，它们在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无能，不能不使 1849 年以来一直处在反革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产生强烈的愤慨。这些半东方的纠纷也同在中国发生的纯粹的东方纠纷一样，将使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更加尖锐化和更快地到来。随着粮价的上涨和营业的普遍停滞，外汇行市正在变得不利于英国，黄金开始流向大陆。从 6 月 9 日到 7 月14日，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已减少了二百二十万英镑，这个数目超过最近三个月的增长总和。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第 237—241 页）

马 克 思

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摘录)

(1853 年 7 月 29 日)

1848 年宪法中的最后一个宪法，现在由于丹麦国王完成了 coup d'état〔政变〕而被废除了。国家得到的是一个具有俄国精神的宪法，并且由于废除了 Lex Regia〔王位法〕[61]，丹麦便沦为俄国的一省。我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述这个国家的现状①。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四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这是1828 年 11 月 28 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在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信中所说的话，而涅谢尔罗迭伯爵现在正是按照这条规则办事。俄国继军事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以后进而攫取了这些国家的民政管理机构，派遣一支又一支的军队到贝萨拉比亚和克里木去，同时又向奥地利暗示，可能接受它的调停，而对波拿巴则表示，他的建议可能得到沙皇良好的反应。对于巴黎和伦敦的大臣们，则描绘了这样一幅可喜的前景：尼古拉终究会慈悲为怀地接受他们的歉意。欧洲各国的宫廷正象苏丹王后一样，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着，不知那位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宽宏大量的主宰要把他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69—270 页。——编者注

手帕抛给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尼古拉就这样使他们如此紧张地期待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以后突然声明，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奥地利也好，普鲁士也好，都不应该干涉他和土耳其的冲突，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和土耳其进行谈判。显然，正是为了同土耳其顺利进行这些谈判，他才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他的大使。但是在他声明列强不应该干涉俄国事务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法、英、奥、普的代表们却在维也纳会议上消磨时间，细细斟酌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案，而且，在这种滑稽的会谈中，既没有土耳其大使参加，也没有俄国大使参加。7月8日，苏丹指定主战派组织政府，以便摆脱军事停战状态，但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却迫使他在当天晚上让这个内阁辞职。这使苏丹发了慌，以致打算派一位奥地利信使到圣彼得堡询问沙皇是否想恢复直接谈判。要等这位信使回来以后，再根据他带回的答复决定列施德-帕沙本人是否作圣彼得堡之行。列施德-帕沙应该把新照会草案从圣彼得堡寄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这些新照会再寄回圣彼得堡，而且在最后的答复从圣彼得堡转回君士坦丁堡以前，将不作任何决定。那时，就是第五个月了，任何舰队都将不能进入黑海。沙皇就可以优游自在地在多瑙河各公国过冬，在那里，他的开支可以用债券来支付，这些债券从1820年他几度占领这些国家时起一直流通到今天。

大家知道，根据俄国的坚决要求，塞尔维亚大臣加腊沙宁被解职。俄国由于这第一次的胜利而增加了勇气，现在又要求免除全体反俄军官的职务。而且还打算用这个办法来对待在位的亚历山大公爵，以便用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公爵这个俄国和俄国利益的驯服工具来替换他。亚历山大公爵为了竭力避免这一灾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奥地利的影响），于是就反对苏丹，并且宣布他愿意严守中立。巴黎的《新闻报》用下面的话描写了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

"大家都知道，俄国领事馆所在地沃尔肖伐是一个衰败的村庄，这里没有一个俄国的臣民，它位于塞尔维亚居民最稠密的地方，这里的俄国领事馆过着非常可怜的生活，但仍然不失为目前俄国宣传的中心。法院的侦察断定，俄国既参与了1840年布来洛夫案件，也参与了1850年约安·卢特措案件以及不久前逮捕十四名俄国军官的案件（这个案件成了加腊沙宁政府辞职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缅施科夫公爵在他任职君士坦丁堡期间，曾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布鲁萨和士麦那进行了阴谋活动，在萨罗尼加、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也进行了这样的活动。"

俄国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在现在的东方问题上，没有一次纠纷，没有一次谈判，没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带有重复历史上某些事件的印记。

俄国目前向苏丹提出要求，只能以凯纳吉条约为依据，虽然这项条约并没有规定沙皇对他的教友实行保护，而仅仅是给予他在伊斯坦布尔建筑教堂和呼吁苏丹仁慈对待他的基督教臣民的权利。列施德-帕沙在他14日的照会中反驳沙皇的时候，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早在1774年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俄国就有心早晚要曲解这个条约，就象在1853年这个条约被它曲解的这样。当时奥地利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使臣图古特男爵于1774年向本国宫廷上书说：

"今后无论何时，俄国只要认为时机有利，事先不作特别准备就能从自己的港口派出登陆队到黑海去对付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就会实行同正教教会的首脑们事先共同策划的阴谋，而苏丹除了在一获悉俄国人逼近的消息就离开自己的宫廷，逃到亚洲复地，把欧洲土耳其王位交给比较有经验的统治者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首都一被占领，俄国的统治在恐怖手段和正教徒的狂热支持下，无疑会很容易地扩展到整个阿希佩拉哥群岛、小亚细亚和直到亚得利亚海岸的整个希腊的沿海地区。俄国占有这些举世无双的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家将使俄国强大到这种程度，使历史上古代君主的丰功伟业的一切奇迹都为之逊色。"

同现在一样，早在1774年俄国就企图以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前景来刺激奥地利的贪欲。关于这一点，这位图古特男爵写道：

“奥地利这种扩张疆界的行动是不会引起俄国方面的妒忌的。其原因在于：只要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落入俄国之手，那末奥地利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地（这在其他的情况下对俄国来说非同小可），对俄国来说是无所谓的。须知这些省份中的居民几乎都是穆斯林和正教徒：前者是不会被容许在这里定居的，而后者考虑到邻近东方俄罗斯帝国，会毫不迟延地搬到那里去；如果他们仍留在原处，那末他们对于奥地利的不信任将成为长时期混乱的原因。因此，扩张领土而不加强内部，不仅不会巩固奥皇的权力，反而会使它削弱下去。”

政治家们要揭示俄国的整个传统政策，特别是要揭示它对君士坦丁堡的意图的时候，通常援引彼得一世遗嘱。但是他们还可以追溯更远的历史。远在八百多年以前，当时还是多神教的俄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召集群臣宣布说，“由俄罗斯来统治的不仅应该有保加利亚，而且还应该有欧洲的希腊帝国，以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斯维亚托斯拉夫于公元968年占领了锡利斯特里亚并且进窥君士坦丁堡，象尼古拉在1828年所做的那样。在俄罗斯帝国建立后不久，柳里克王朝便把自己的王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以便更靠近拜占庭。在十一世纪，基辅在各方面都仿效君士坦丁堡，因此，人们称它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堡**；这个称呼反映了俄国几世纪的愿望。俄国的宗教和文明是起源于拜占庭，因此，俄国那时想使象现在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处于没落状态的拜占庭帝国从属于自己，比起德皇想占领罗马和意大利要自然得多。所以，俄国的政策在目的方面的单一性，是由它的历史的过去、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是由于它必需在阿希佩拉哥群岛（象在波罗的海一样）有四通八达的港湾，以便在欧洲保持领导地位这种情况决定的。但是，俄国用来追求自己的目的的那些传统手法，远远值不得欧洲

的政治家们那样赞扬。这一传统政策的成功证明了西方列强的软弱，而它的单一性和公式化则证明了俄国本身的野蛮。如果法国想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黎塞留遗教[62]或查理大帝敕令[63]的基础上，那谁会不觉得可笑呢？只要研究一下俄国外交的最著名的一些文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俄国的外交善于细致地、巧妙地、熟练地和灵活地找到欧洲的君主、大臣和宫廷的弱点，尽管它非常高明，但是，由于它不了解西欧各国人民自己的历史运动，所以它总是走进死胡同。利文公爵指望善良的阿伯丁对沙皇让步，显示出他对阿伯丁性格的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在1831年展开的议会改革运动的前夕预言托利党将继续执政，这样他对英国人民的判断就根本错误了。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曾经对查理十世作出过完全正确的判断，但是他怂恿自己的"神圣君王"同这位国王在他被赶出法国的前夕举行瓜分欧洲的谈判，这样他对法国人民的估计就完全错误了。俄国的政策以其传统的诡计、奸诈、狡猾可以把欧洲的宫廷（它们自己也只不过是过去的传统罢了）捉进自己的圈套，但是，它在对付革命人民的时候却是完全无力的。

在贝鲁特，美国人从奥地利的鹰爪里又抢走了一个匈牙利人。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正是从东方问题开始，这是令人高兴的。除了君士坦丁堡因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贸易和军事意义外，还存在着一系列其他的历史原因，使占有这个城市的问题成了东西方之间经常激烈争执的主题。而美国就是西方最年轻最有力的代表。

君士坦丁堡是永恒的城市，是东方的罗马。在古代希腊皇帝统治时代，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野蛮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东方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致使这个神权帝国的中心成了欧洲进步的严重障碍。当希腊的皇帝们被伊康尼苏丹[64]排挤出去的时候，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精神却不管这种改朝换代的变化而继续存在，而苏丹如果被沙皇所取代，Bas-

Empire〔东罗马帝国〕也将再生。到那个时候，它会产生比在古代皇帝统治下更坏的影响，会成为比在苏丹时代更富有侵略性的力量。沙皇将为拜占庭文明提供支持，正象组成东罗马帝国皇帝们的武装力量的 corps de garde〔近卫军〕的俄国冒险家们在几世纪中为这些皇帝们提供了支持一样。西欧和俄国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斗争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是拜占庭主义在西方文明面前衰落下去呢，还是它们之间的对抗将采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厉害、更带有暴力性质的形式而再度尖锐化起来。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西方文明好比太阳，不经过这道桥就不能绕过世界；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也就不能通过这道桥。君士坦丁堡在苏丹的手里只不过是暂时归他占有留待革命来取的抵押品，而西欧现在的这些统治者们——他们认为自己的"秩序"的最后一个支柱在涅瓦河畔——也只能使问题悬而不决，一直到俄国面对着他的真正的敌人——革命为止。推翻西罗马的革命也将战胜东罗马的邪恶势力。

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65]并且想对革命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的读者们，不妨看一看现在陈列在纽约水晶宫的**哈森克莱维尔**先生的绘画；这幅画描绘了1848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杰出的艺术家以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现出来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257—263页）

马 克 思

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摘录)

(1853 年 8 月 5 日)

俄皇找到了把持多瑙河各公国的新借口。他今后需要这两个公国已经不是由于它们是他的精神要求的物质保障，也不是为了补偿占领它们的费用，——不，他现在要把持它们是由于“内部混乱”，是根据巴尔塔利曼尼条约的条款。由于俄国人确实在各公国闹得天翻地覆，因此内部混乱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在 8 月 2 日上院会议上，克拉伦登勋爵证实了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事，即俄国人禁止公国的国君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他们应缴纳的贡品，根本禁止他们与土耳其继续保持关系①。克拉伦登勋爵特别庄严并且郑重其事地声明，他

“将通过今晚离开伦敦的信使，命令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要求俄国当局做出解释，英国是有权这样要求的。”

当克拉伦登派遣急使到圣彼得堡要求解释时，《祖国报》[66]在今天这一号上登载了上月 20 日从雅西发出的消息：俄国人正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构筑工事；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已置于由三人组成的俄国监督机关的监视之下；正向居民征收实物军税；某些倔强的大臣被抓到俄国军队里去了。这就是哥尔查科夫公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67 页。——编者注

的告示所作的“解释”，这项告示说，

“神圣君王无意改变该国的政权机构，他的军队的驻扎不会使居民承担任何新的捐税和负担”。

在同一天举行的下院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问题时声称，四大强国已经在维也纳商定共同向沙皇提出一项俄国和土耳其都“可以接受的”建议，这一建议已送往圣彼得堡。约·罗素勋爵在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时说：

“虽然这个建议最初出自法国政府，但实际上是**奥地利的**。”

这个出身法国但又入了奥地利籍的建议看来是很成问题的，《新普鲁士报》[67]在一封维也纳来信中对此作了如下说明：

“俄奥两国当局已暗中约定不允许英国影响在东方占优势。”

“一个英国人”① 就联合内阁的**解释**指出：这个内阁是“在屈辱中表示伟大，在无力中表示威武，在沉默中表示雄辩”。

一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国化，加里西亚、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都会成为俄国的«enclaves»〔“嵌入别国领土的属地”〕。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谈过彼得堡银行的“秘密金库”，——即用来保证为数三倍的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②。现在俄国陆军大臣③申请将该储备的一部分拨归陆军部金库。由于财政大臣④反对，皇帝便亲自出马，向正教行政总署——教会财产的维护者商借六千万卢布的贷款。沙皇遭到了钱财困难，而他的士兵的健康也遭受着威胁。据可靠消息：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士兵在进军期间饱受酷热之苦，病者极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许多民房都成了

① 阿·理查兹。——编者注
② 见本书第54页。——编者注
③ 多尔哥鲁科夫。——编者注
④ 勃罗克。——编者注

病院。

昨天《泰晤士报》反对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计划，但同时又企图掩盖俄国在丹麦的阴谋。《泰晤士报》甚至在假装同它的神圣君王反目时，也为他效劳。

《泰晤士报》说："我们不相信俄国当局已使哥本哈根宫廷屈服于自己的影响的说法，我们认为，丹麦政府在俄国的影响下正采取废除或删削1849年宪法的步骤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诚然，丹麦政府公布了关于**略事修改**现行**宪法**的法案或法案初稿，但这一法案将在两院重新开会时提交给它们讨论和表决；它决不会通过国王的权力付诸实施。"

把立法会议分割为四个独立的封建的省议会，废除立法会议的自行决定课税问题的权利，废除普选权，取消出版自由，恢复闭塞的行会用以代替自由竞争，剥夺所有官员即丹麦唯一有教养阶级不经国王特许而可以被选入代议机关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叫做"对宪法的略事修改"！如此说来，也可以把奴役叫做对自由的略事修改了。不错，丹麦国王没有敢把这一新的"根本法"作为法律颁布。他只是效法东方的苏丹，把丝绳和勒令自缢的命令交给两院。这种建议已包含着这样的威胁：不自愿服从，就强行贯彻。"对宪法的略事修改"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谈谈"俄国的影响"。

丹麦国王和丹麦两院之间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的呢？国王建议取消 Lex Regia，即丹麦的现行的王位继承法。谁促使他采取了这一步骤？是俄国。这一点从我上一篇文章引用的1853年5月11日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照会中就可看到。废除 Lex Regia 对谁有好处？除俄国之外，没有别人。Lex Regia 允许王朝女系的代表继承王位。随着 Lex Regia 的废除，男系亲属就可以拒绝至今仍然堵在他们道路上的所有女系亲属继承王位的要求。大家知道，丹麦王国除丹麦本土即一些岛屿和日德兰之外，还包括两个公

国——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丹麦本土和什列斯维希的王位继承按 Lex Regia 的规定，而霍尔施坦公国是德国的封地，根据 Lex Salica〔舍拉法〕[68]，它仅由男系继承。随着 Lex Regia 的废除，丹麦和什列斯维希的王位继承制度也和德国的公国霍尔施坦一样了。俄国皇帝作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室的代表拥有对霍尔施坦的直接权利[69]，于是，他作为男系的年龄最大的亲属也就有权直接要求继承丹麦王位了。1848—1850 年，在俄国照会和俄国舰队的支持下，丹麦为维护不许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联合、不许公国脱离丹麦的 Lex Regia 而与德国进行了斗争。沙皇在维护 Lex Regia 的借口下取得对德国革命的胜利之后，便用废除这一法律的办法来并吞民主的丹麦。因此，斯堪的那维亚人和德国人根据经验就知道了，他们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民族要求建立在封建的王位继承法的基础上。经验更清楚地向他们表明，德国人和斯堪的那维亚人——同一个伟大种族的代表——彼此争吵而不结成同盟，这只会为自己的世世代代的敌人——斯拉夫人铺平道路。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第 271—274 页）

马 克 思

土耳其问题在下院(摘录)

(1853年8月19日)

还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俄国大使就通知约翰勋爵，说沙皇打算派一个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它的使命只限于就圣十字架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问题提出建议。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和英国政府并没有猜疑俄国方面还有任何其他的意图。只是在3月初，土耳其大臣通知斯特腊特弗德勋爵说，缅施科夫公爵提议签订一项同土耳其独立绝不相容的秘密条约[70](据累亚德先生说，罗斯上校和其他许多在君士坦丁堡的人物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并且声称，如果让法国和英国知道了这个建议，俄国将认为这是一种直接敌视俄国的行为。同时也知道了(不仅根据传言，而且根据可靠的报告)，俄国正在向土耳其边界和敖德萨大量集结军队。

至于维也纳会议致沙皇并被沙皇接受的照会，这是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在巴黎根据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最近一次照会的复照[71]的内容写出的。过了一些时候，奥地利接受了这个照会，修改了一下，在7月24日作为它自己的建议提出，而照会的定本是在7月31日完成的。奥地利大臣在此之前就把照会转交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大使则在7月24日，即照会还没有最后定稿之前就寄到圣彼得堡了。只是在8月2日，即沙皇同意这个照会之后，照会才发往君士坦丁堡。可见，这个照会实质上是俄国通过四大

强国给苏丹的照会，而不是四大强国给俄国和土耳其的照会。约翰·罗素勋爵肯定说，这个照会**"在形式上不是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完全吻合的"**，从而承认这个照会在内容上同它是完全吻合的。为了使人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疑问，他又加了一句：

"俄皇认为，他的目的将要达到。"

照会草案对撤出多瑙河各公国问题连提也没有提。

约翰勋爵说："即使土耳其和俄国终于在这个照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从各公国撤兵这个重要问题仍是悬案。"**

同时他补充说，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撤兵是非常重要的"，但又请允许他不谈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相当明白地示意，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许在哥萨克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离开贝捷克湾。

"我们不应当同意这样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舰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驶近达达尼尔海峡，都可以被看做无异于实际入侵土耳其领土的行动。但是不言而喻，当问题得到解决，和平得到保证时，贝捷克湾对英国和法国将不再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基地了。"

任何一个明智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应当永远留在贝捷克湾，或者英国和法国应当签订一个正式条约，来禁止自己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公海。因此，这些模棱两可而费解的话的意思（如果确实有点意思的话）只能是：苏丹一接受照会和哥萨克一答应撤出各公国，舰队即行撤离。

约翰勋爵说道："当俄国政府占领了各公国时，奥地利声明，根据1841年条约的精神，绝对有必要召集各强国代表举行会议，努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已经形成的困难局面，否则，它将危及欧洲和平。"

阿伯丁勋爵则与此意见相反，他几天以前在上院说过，——从其他方面获悉，他在6月间给君士坦丁堡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的

正式照会中也说过：

“1841 年的条约根本没有规定各签字国有切实援助土耳其政府的义务〈但是却有暂时拒绝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义务！〉，所以英国女王政府完全有权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自行决定，是采取行动或者是放弃行动。”

阿伯丁勋爵否认对土耳其有任何义务，无非是不愿有反对俄国的权利而已。

约翰·罗素勋爵最后指出了谈判接近完满成功的“美好前景”。但是，在目前，在维也纳写成的俄国照会（应由土耳其转交沙皇）还没得到苏丹赞同，西欧列强提出的 sine qua non〔必需条件〕，即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还根本没有向沙皇坚决提出的时候，这种看法是太乐观了。

累亚德先生第一个发言回答约翰勋爵，他的讲演毫无疑问是最好和最有力的，这篇讲演大胆，紧凑，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它表明，这位著名学者十分熟悉尼古拉，正如他熟悉萨尔达尼拔一样；十分了解东方现代的勾心斗角，正如他了解东方过去的神秘传说一样。

累亚德先生对阿伯丁“无论何时何地都宣称他的政策的实质是和平”表示遗憾。英国如果回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就是鼓励俄国这个肆无忌惮的国家的野心，它的这种野心迟早必然导致战争。俄国现在的行为不应当看作偶然的一时的现象，而应当看作广泛的政治计划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至于对法国的“让步”和拉瓦累特先生的“诡计”，俄国甚至不能拿它们作借口，因为

“土耳其政府在颁布作出引起俄国不满的让步的敕令之前好些天，甚至几星期，就将这个敕令草案递交提托夫先生了，当时敕令本文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对”。

要说猜不透俄国对塞尔维亚、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土耳

其基督教居民的存心，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作正式访问，刚刚到达就要求免去加腊沙宁的塞尔维亚大臣职务。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塞尔维亚正教最高会议提出抗议。加腊沙宁先生是在1842年的起义中涌现出来的活动家之一，这次反俄的民族运动赶走了当时在塞尔维亚执政的米哈伊尔公爵(他和他的家族都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1843年，俄国要求有干预塞尔维亚内政的权利。绝对没有任何条约使俄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它从当时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那里得到了这种全权，阿伯丁勋爵当时宣布，**"俄国有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自己的各项条约的权利"**。

累亚德先生说道："俄国在这方面的成功表明，它是塞尔维亚的主人，它可以阻挠任何民族争取独立。"

至于多瑙河各公国，俄国首先利用了1848年这些省份的民族运动，促使土耳其政府把一切有自由主义主张和独立主张的人从这里驱逐出去。随后它又迫使苏丹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这个条约确定了俄国干预各公国一切内政的权利，"各公国现在被占领也证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是俄国的省份"。

现在剩下的还有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

"在希腊人当中流行起一种批判的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再加上他们同欧洲自由国家的贸易联系，引起俄国政府极大的不安。俄国的不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新教在东方基督教徒中的传播。在土耳其恐怕找不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没有新教的核心，这应当说主要是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和传教的结果〈这又是美国进行干涉的一个根据〉。得到俄国传教士撑腰的正教僧侣竭尽全力阻挠这个运动，但一切迫害都无济于事，于是缅施科夫公爵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俄国来说，特别要紧的就是根除近年来在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中开始表现出来的宗教独立和政治独立的精神。"

累亚德先生谈到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所谓希腊帝国**的计划，他指出，希腊人（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正教徒，而是指有别于斯拉夫人的民族）总共不过一百七十五万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千方百计加紧抛掉同他们的任何联系，不许希腊族僧侣到自己那里去担任神甫和主教；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自己的总主教教堂，来代替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教堂；如果让希腊人盘踞在君士坦丁堡，就是把整个土耳其出卖给俄国。

有些下院议员宣称，君士坦丁堡是否将落入俄国手中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累亚德先生反驳他们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土耳其版图内的所有大省份，如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都将陷于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掌握了这些省份的强国还会建立对印度的统治。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的强国，东方通常视之为世界的霸主。

不过俄国深信，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让它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是，

"它力图使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民族存在，力图慢慢地，而又是实实在在地剥蚀土耳其人的权力，并向所有反抗它的计划的人表明，这种反抗不仅无用，而且会遭到它的报复。一句话，它要使土耳其不能有其他政府，而只能有俄国的政府。**这一次，它的这类阴谋已经完全成功了**"。

累亚德先生声称，在缅施科夫公爵要求签订秘密条约之后，在俄国在边界和敖德萨进行大规模备战活动之后，政府竟然还满足于圣彼得堡对它的解释和保证，而错过了机会，没有声明英国和法国将认为越过普鲁特河是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没有声明它决不许俄国在没有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同土耳其缔结任何条约或协议。

"如果我们当时采取这个步骤，俄国绝对不敢越过普鲁特河。"

随后，累亚德先生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如果成为独立国，同贝

萨拉比亚联合起来，并以匈牙利为后盾，最终会成为捍卫君士坦丁堡以免被俄国人侵占并把大斯拉夫种族分为两部分的唯一手段。他认为俄国**终将撤出**各公国。

“俄国明白，为了实际上已经属于它的省份而同欧洲列强打仗是不值得的。俄国本来就已经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只有用流血牺牲和高昂代价才能取得的东西；它已经加强了自己在东方的实力；使土耳其受到屈辱；迫使土耳其负担全部军费，耗尽了土耳其的资源；此外，也是重要得多的一点，它已经贬低了英国和法国在它们本国臣民和东方各民族心目中的威信。”

累亚德认为，维也纳会议拟定的照会将有下列结果：

“如果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它，俄国就会把矛头转向我们，要我们当它的盟国，一起反对土耳其，迫使它接受这个不公正的建议。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它，那就意味着英国直接批准俄国有干预土耳其政府一千二百万基督教臣民的事务的权利…… 我们对这个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占的是二等国的地位，而起头等国作用的只是俄国…… 我们错过了适当解决这个东方大问题的也许是不可复得的机会…… 相反，却让俄国把土耳其打击得再也恢复不了元气…… 但这不是我国政策唯一的结果。瑞典、丹麦以及迄今一直指望能够得到我国支持的一切欧洲弱国会认为，从今以后，再反抗俄国侵犯是毫无用处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300—306页）

马 克 思

帕麦斯顿勋爵（摘录）

（1853 年 10 月—12 月初）

第 二 篇（摘 录）

为了使读者对勋爵[72] 阁下的亲希腊感情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这里我应该提请读者回忆一下某些历史事实。

俄国占据了塞凡湖边的哥克查地带（这无疑是波斯的领土），并且要波斯放弃它另一部分领土卡潘，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换条件。波斯拒绝了，于是俄国便发动反波斯的战争，并获得胜利，迫使波斯在 1828 年 2 月签订土库曼彻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波斯应付给俄国二百万英镑的赔款，并割让包括埃里温及阿巴萨巴德的要塞在内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照尼古拉的说法，签订这个条约的唯一目的是划定双方沿阿腊克斯河的边界，硬说这是消除两国将来任何纠纷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又拒绝把阿腊克斯河北岸的塔雷什和莫甘两地归还波斯。最后，波斯还不得在里海驻留舰队。这就是俄波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至于希腊的宗教和自由，则俄国当时对这两件事关心之少，正象正教徒的神现在对于“圣墓”或著名的“圆顶”所在的寺院的钥匙由谁掌握的事情[73] 很少关心一样。俄国的传统政策一向就是先煽动希腊人起义，然后则弃之不顾，让苏丹去对他们实行报复。俄国

对爱拉多[1]的复兴实在太同情了，以致在维罗那会议上把希腊人看做叛乱分子，并且承认苏丹有权拒绝任何外国来干涉他与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沙皇还提出要“帮助土耳其政府镇压叛乱分子”——这样的提议自然是被否决了。这一试图失败之后，沙皇就向其他大国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出兵土耳其，在宫墙之下迫使它接受和约”。为了拿“共同行动”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沙皇的手脚，其他大国于1827年7月6日在伦敦同他缔结了条约，条约规定彼此承担在必要时用武力来调解苏丹同希腊人之间的争端的义务。在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俄国曾同土耳其缔结一个阿克尔曼条约[74]，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应放弃它对希腊问题的任何干预。在阿克尔曼条约缔结前，俄国曾唆使波斯皇太子进犯奥斯曼帝国，并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企图使它对俄国翻脸。在此种种事件之后，英国大使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的条款，他这一次的活动仍然是代表俄国及其他强国进行的。俄国利用这种种谎言与欺骗给土耳其所造成的困难，终于找到了发动1828—1829年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以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而结束，条约的内容在麦克尼耳的名著《俄国在东方的进展》中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沙皇取得了阿纳帕、波提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阿哈尔卡拉基和阿哈尔齐赫的要塞，另外还取得了多瑙河口诸岛；条约中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毁掉土耳其的茹尔日沃要塞并把多瑙河南岸数英里地区以内的土耳其人统统赶走……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的家庭从土耳其亚洲各省迁往沙皇境内，部分是强迫的，部分是受了僧侣的影响……沙皇为他在土耳其境内的臣民解除了对当地政府应负的一切义务，并以偿还军事开支和赔偿商业损失为名把巨额赔款加在土耳其政府身上，最后，还抓住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锡利

① 即希腊。1833年后它是希腊国家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斯特里亚不放，作为支付这笔赔款的抵押…… 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使土耳其承认了3月22日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苏丹对希腊只有宗主权并从希腊取得年贡），同时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来促使希腊独立。希腊成了独立国，被任命为总统的是前俄国大臣康波第斯特里亚伯爵。”

第四篇（摘 录）

有一些事实虽然不大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但却成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清晰标志，1833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实。

俄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来自冰冷的涅瓦河畔的野蛮人把繁华的拜占庭和阳光煦丽的博斯普鲁斯海岸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自封的希腊皇帝后裔——虽然是暂时地——占领了东罗马。

“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决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土耳其的命运。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虽然是为了保卫它〈？〉，但这件事实本身却是对土耳其的独立地位的决定性的一击，即使俄国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塞拉尔宫①的上空也不过如此。”（罗伯特·皮尔爵士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土耳其政府在1828—1829年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因而在它的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正象东方的各个帝国中通常在最高权力削弱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帕沙们就成功地造起反来。1831年10月，苏丹②和在希腊起义时曾支持过土耳其政府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之间就已开始冲突。1832年春，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伊布拉希姆-帕沙带领军队开进了叙利亚，经过霍姆斯会战占领了该省，然后越过托罗斯山，在科尼亚会战中消灭了土耳

① 土耳其皇宫。——译者注
②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其最后一支军队后，就直扑伊斯坦布尔。1833 年 2 月 2 日苏丹被迫向圣彼得堡求援。 2 月 17 日，法国海军上将鲁散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之后，他致函土耳其政府，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中包括土耳其政府拒绝俄国援助的条件，采取措施使帕沙撤兵。但是因为鲁散没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就无力对付俄国了。“是你叫我来，我就来了。”① 2 月20日，俄国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运送一大批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岸登陆，包围了首都。俄国对保卫土耳其是这样热心，以致同时还派了一名俄国军官去通知特拉比曾德和埃尔斯伦的帕沙说，一旦伊布拉希姆的军队要向埃尔斯伦进发，这两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交由俄国军队保卫。1833 年 5 月末，奥尔洛夫伯爵由圣彼得堡来到，对苏丹说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纸片请苏丹签署，苏丹不必同他的大臣们商议，也无需让任何一个驻土耳其政府的外国使节知道。于是就产生了有效期为八年的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同俄国建立攻守同盟，未经俄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新的条约，并确认以前的各项俄土条约，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附在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政府必须

“为了俄帝国朝廷的利益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即不让任何外国军舰以任何借口开进海峡。”

沙皇得以用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由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而把奥斯曼帝国的宝座从君士坦丁堡搬到圣彼得堡来，他究竟应该感谢谁呢？不是别人，而是爱尔兰贵族、皇帝陛下枢密院委员、巴尼大十字荣誉勋章荣膺者、议会议员、陛下首席外交大臣、坦普尔男爵亨利·约翰·帕麦斯顿子爵阁下。

---

① 莫札特的歌剧《唐璜》中骑士团长的雕像所说的话。——编者注

第六篇(摘　录)

在俄国辞汇里找不到"荣誉"这个词。这个概念被看做法国人的幻想。俄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是 honneur？这是法国人的 chimère"①。俄国的荣誉这一发现完全应该归功于帕麦斯顿阁下，因为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每到紧急关头总是最坚决地替沙皇的"荣誉"作保。1853 年的议会闭会时他这样做了，1833 年的会议闭会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勋爵阁下恰巧正在公开表示自己"无限信赖沙皇会知荣誉和守信用"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曾经对西方保密，看了它们之后，对于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是怎么回事就会没有任何疑问，——如果这种疑问曾经有过的话。这时，勋爵阁下甚至用不着把俄国人刮一下就可以发现鞑靼人的原形。一个奇丑而不加任何掩盖的鞑靼人被他弄到了手②。他收到的是当权的俄国大臣们和外交官的自供状，这些俄国的大臣和外交官撕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暴露出自己的最不可告人的阴谋，十分坦白地商量实行侵略的计划，轻蔑地嘲弄欧洲各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愚蠢的轻信，恣意嘲笑所有这些维莱尔、梅特涅、阿伯丁、坎宁和威灵顿之流。他们抱着野蛮人的蛮横无耻态度，混杂着廷臣的尖酸刻薄，一同策划着怎样使巴黎不信任英国，使伦敦不信任奥地利，使维也纳不信任伦敦；怎样唆使他们互相倾轧，把他们全都变成单纯的俄国的工具。

原来，在华沙起义时期，总督的档案落到了得胜的波兰人手

---

① «honneur»——"荣誉"，«chimère»——"幻想"；"什么是"和"这是法国人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用的是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编者注

② 双关语：«to catch a Tartar»（弄到一个鞑靼人）转义是"娶了一个泼妇"、"弄到一个烫手的东西"。——编者注

里。这些档案是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邸中保存着的，其中有俄国大臣们和大使们从本世纪初到1830年的密信。最初，波兰流亡者把这些文件带到法国，后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外甥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而他就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把它们忘记了。子爵阁下一方面口袋里装着这些文件，一方面却对不列颠议会和全世界特别热狂地宣布他“无限信赖俄国皇帝的知荣誉和守信用”。

这些轰动一时的文件于1835年末在有名的“文件集”上发表了出来，这并不是勋爵阁下的过失。不管国王威廉在其他方面如何，但他毕竟是俄国的死对头。他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很熟，他把这位先生推荐给国王。从此国王陛下就同这两位朋友密谋反对“真正英国的”大臣的政策。

第 七 篇

只要打开欧洲地图约略看一下，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中心的河，才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在正对着河口的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七百英里，把欧亚两洲分开。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控制了多瑙河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主要是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这个强国再占有了高加索，那末黑海就是它的了；而要想把这个海的入口封锁起来，只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使它可以直接控制特拉比曾德；而在里海的统治地位则使它可以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的贪婪的眼光注视到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山脉这两个地方。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在高加索山脉是要保住这种统治。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穆斯林那里夺得的格鲁吉亚、明格列里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等最富饶的省份隔开。这样，庞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只有一条可以称为军用的道路，从莫兹多克蜿蜒通过达尔雅尔峡谷的关口，通往梯弗里斯；这条道路上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布满了工事，但仍不断从两旁遭到高加索各部族的袭击。这些高加索部族如果有个军事首领把它们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威胁邻近的哥萨克地区。“一想到含有敌意的切尔克斯人由一个首领联合而可能给俄国南部带来的可怕后果，就不寒而栗”[75]，——德国人库普费尔先生于1829年率领一个学术考察团随同艾曼努埃尔将军考察厄尔布鲁士山时曾这样感叹地说过。

现在，多瑙河和高加索这两个地方都同样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在多瑙河岸，俄国占领了欧洲的两大谷仓；在高加索，它面临着失掉格鲁吉亚的危险。俄国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由阿德里安堡条约为它做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条约中得到承认的。

该条约第四款规定：

“两个帝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沿格鲁吉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和以东各地，以及从库班河口到圣尼古拉码头的黑海沿岸地区，包括圣尼古拉码头在内，统属俄国。”

关于多瑙河，条约有如下的规定：

“沿多瑙河直到圣乔治支流河口划为国界，依此，多瑙河诸支流所形成的各个岛屿统属俄国。南岸仍归土耳其政府。但南岸从圣乔治和苏利纳两条支流的分叉处起，距多瑙河两小时路程〈六英里〉以内的地区规定为非居住区，不得修造任何建筑物。仍属俄国宫廷所有的诸岛也依此规定。在这些岛

屿上除设立检疫所外，不得修造任何设施或工事。”

这两项条款确保了俄国“扩张领土和获得贸易特权”，因而公开破坏了威灵顿公爵在圣彼得堡签订的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以及俄国同其他大国在伦敦缔结的1827年7月6日的条约[76]。因此，英国政府当时拒绝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威灵顿公爵曾发表声明对这个条约提出抗议。(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据马洪勋爵说，阿伯丁勋爵也曾对这个条约提出过抗议。

“他在1829年10月31日致海茨贝里勋爵的急电中，对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许多章节都大为不满，并且特别注意有关多瑙河诸岛屿的规定。他否认这个和约〈阿德里安堡条约〉是在尊重土耳其政府的领土主权、尊重地中海的海上各大国的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签订的。”(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格雷伯爵肯定阿伯丁勋爵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条约被批准，那末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格雷伯爵1834年2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告诉我们说：

“俄国在多瑙河口、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扩张疆界，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开始前对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绝对不符合的。”(下院，1837年3月17日)

俄国对高加索西北各地区的统治暂时还是名义上的。它要想实现这种统治，只有当它封锁住黑海东岸，并且切断向这些地区运送武器弹药的道路时才有可能。但是，黑海沿岸以及多瑙河口却决不是克拉科夫这样的被勋爵抱怨为“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究竟是用了什么诡计得以封锁了多瑙河及黑海沿岸，并且迫使大不列颠不仅同意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且同意俄国自己违反这个条约呢？

这些问题在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里提到了勋爵阁下的面前，这时下院已经收到伦敦、格拉斯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的许许多多的请愿书，纷纷反对俄国在黑海上采取的财政措施，以及它所实行的旨在阻挠英国在多瑙河上进行贸易的规章和限制。俄国在1836年2月7日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下令在多瑙河口的一个沙洲上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它借口在这里实行检疫条例，说它有权对溯多瑙河而上的船只登船检查，强迫它们纳税，并且有权扣留那些敢于违抗的船只，把它们解往敖德萨。早在检疫所建立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以建立检疫所为名而设立海关和筑起炮台以前，俄国政府就曾摸了一摸底，以便确定它对英国政府耀武扬威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德勒穆勋爵按照从英国得到的指示办事，就英国贸易受到阻挠一事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他奉命去见涅谢尔罗迭伯爵。涅谢尔罗迭伯爵叫他去见新俄罗斯的省长；新俄罗斯的省长又让他去见驻加拉兹的领事；后者同不列颠驻布来洛夫的领事作了接触，建议不列颠领事把那些被征税的船长叫到多瑙河口来，即叫到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场来，以便进行调查；当然，当时是已经知道那些船长都在英国，才这样做的。"（下院，1836年4月20日）77

俄国1836年2月7日的法令引起了不列颠商界的普遍注意。

"当许多船只已经出海或正要启航时，船长们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许承认俄国所强求的登船检查的权利。显而易见，如果议院不毅然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那末这些船只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议院如果不这样做，那末总排水量至少有五千吨的不列颠船只就会被扣留并解往敖德萨，不依从俄国的无理要求就走不掉。"（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提出要求领有多瑙河口附近多沼泽的沙洲，这个条款本身就是违反俄、英及其他列强于1827年缔结的条约的。而在多瑙河入口处修筑工事和设置炮台，则违反了明确规定不许在离河六英里以内的地区修筑任何工

事的阿德里安堡条约本身。征收税款和阻碍多瑙河上的通航，则违反了维也纳条约，因为该条约曾宣布：从多瑙河可以航行的地点起到河口止的各个河流，航行应完全自由；“税额无论如何不得超过现行的税额”，即 1815 年的税额；“在未征得沿岸各国的普遍同意以前，不得有丝毫增加”。这样，俄国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就是：违反 1827 年的条约的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又被俄国自己违反，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维也纳条约被人违反所致。

要想叫帕麦斯顿勋爵作一个他承认或不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声明，成了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事。至于维也纳条约是否被人违反的问题，则勋爵阁下

“还不曾得到关于发生过任何违反这个条约的事情的正式情报。要是缔约国肯定发生这一类事情了，那时就会采取皇家法律顾问根据英国臣民的权利所认为必须采取的步骤”。（帕麦斯顿勋爵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款上规定由它来保证多瑙河各公国的“繁荣”和充分的“贸易自由”。这时，斯图亚特先生证明，俄国是十分嫉妒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因为它们的贸易从 1834 年起就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个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而加拉兹则成了多瑙河上进行谷物贸易的最大的堆栈，在谷物贸易方面排挤着敖德萨。勋爵阁下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极可尊敬的朋友能够证明，我们几年以前同土耳其进行过巨额的、意义重大的贸易，而后来由于别国的侵略或我国政府的漠不关心而缩减为很小的数额的话，那他的确有理由向议会申诉”。但是恰恰相反，“我极可尊敬的朋友所证明的只是，我们近几年来同土耳其的贸易有很大发展，而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贸易。”

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俄国阻挠了多瑙河上的航行，因为多瑙河各公国的贸易日益扩大。帕麦斯顿勋爵反驳的是，俄国在几乎没有这种贸易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阁下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回击俄国最近在多瑙河上进行的侵犯。帕麦斯顿勋爵回答的是，就是在俄国还没有实行这些侵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说实在的**，哪里谈得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好象政府要不是议院的直接干预便不会对这些情况采取预防措施”呢？帕麦斯顿终于得以阻止下院通过决议，因为他向下院保证

“王国政府丝毫不想容忍任何一国的侵略行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强大”。

同时他还叫议院

“不要无事惊慌，以致使别的国家说我们是有意挑衅，或给它们这种说法以**口实**”。

下院进行的这场辩论过去了一星期以后，有一个不列颠商人写了一封信给外交部，控诉上面所说的那项俄国的法令。大臣助理给了他以下的一个答复：

“帕麦斯顿子爵命我通知阁下，他已请皇家法律顾问就俄国在1836年2月7日的法令中所宣布的条例发表意见。同时帕麦斯顿勋爵还命我通知阁下，关于阁下来信中的后一部分，王国政府认为，俄国当局没有权利在多瑙河口征收任何税款；阁下吩咐自己的代理人**拒绝**缴纳任何这类税款，这样做是对的。”

商人按照这样的指示去做了。但勋爵阁下却是把他完全出卖给了俄国；据乌尔卡尔特先生说，驻伦敦和利物浦的俄国领事现在对每艘开往多瑙河上的土耳其港口的英国船只都要抽税，而且“在莱蒂岛上仍设有检疫所”。

俄国侵入多瑙河的行动并不以设立检疫所、修筑工事和征收

捐税为限。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多瑙河口的唯一的一条尚可航行的苏利纳支流划归俄国所有。在这条支流过去属于土耳其人的时候，河床的深度为十四——十六英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深度；自从转属俄国以来，河床的深度降到了八英尺，即降到运粮船只完全不能通航的程度。尽人皆知，俄国是维也纳条约的参加国，该条约第一一三款规定：

"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纤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无阻。"

然而俄国却发现，维持苏利纳支流通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一些破碎的船只堆积到河底，把水浅的地方变成沙泥滩，这样来逐渐降低河水的深度。除了这种在长时期中一步步地违背维也纳条约的行为以外，俄国还违背那个除检疫所和灯塔以外不许在苏利纳支流修造任何建筑物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它竟然下令在那里筑起了一个俄国小型炮台，靠着向商船强征捐税来维持；这些商船，由于河床堵塞而不得不停下来花钱雇用平底船装卸，这就成为俄国强征捐税的借口。

"Cum principia negante non est disputandum〔同否认原则的人不必辩论〕。对于人所共知是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帕麦斯顿勋爵 1823 年 4 月 30 日的演说）

于是，子爵阁下就完全依照他自己的主义，满足于对俄国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了。但他到这里还不停步。1840 年 7 月 6 日，他肯定地告诉议院，多瑙河的航行自由有"维也纳条约作保证"；1840 年 7 月 13 日，他向议院诉苦说，虽然俄国占领克拉科夫是违背维也纳条约，但是"英国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然而，在说了这些话两天以后，他就同俄国签订了"在同土耳其和平期间"

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1]封锁的条约。这样一来，英国也就失去了“以强力维护”维也纳条约的唯一可能，欧克辛海也就的的确确变成了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了。

这件事办妥之后，勋爵阁下就假装出向舆论让步的样子，一连串发射了许多纸上声明的空炮，用规劝的和多情的语调提醒那个“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说，

“俄国既已迫使土耳其把作为许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道路的欧洲一条大河的河口割让给它，那它也就对其他国家担负了责任和义务，它应该把遵循这些责任和义务看做是有关自己名誉的事情。”

涅谢尔罗迭伯爵对这样顽强地强调抽象原则所作的答复是这样一句老话：“问题将仔细加以研究”。此外，他还不时地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人们如此不信任它的意图感到遗憾”。

这样，由于勋爵阁下的关照，1853 年多瑙河就宣布不能航行了，粮食都烂在苏利纳支流上，而法国、英国和南欧则受着饥饿的威胁。另一方面，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俄国“在得到其他一些重要属地之后，又占有了多瑙河和欧克辛海之间的铁门”。俄国掌握了多瑙河的钥匙，掌握了打开谷仓的百宝钥匙；西欧的政策什么时候应当受到惩罚，它什么时候就会把这把钥匙运用起来。[2]

---

① 在 1854 年 1 月 1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英国”作“对英国军舰”。——编者注

② 在 1854 年 1 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是以下面两段话结尾的：“然而，帕麦斯顿同俄国之间在俄国的多瑙河计划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秘密勾结，仍然直到关于切尔克西亚的辩论时才被揭发出来。就在那时，1848 年 2 月 23 日，安斯提先生才说明：‘子爵阁下就任〈外交大臣〉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即承认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所抗议的那个条约。

至于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尽其可能地做了这些事和怎样把切尔克西亚出卖给俄国的，准备用专文来写”。——编者注

第 八 篇

1836年 4 月 20 日下院收到的请愿书，以及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根据这些请愿书而提出的议案，不仅有多瑙河问题，而且有切尔克西亚问题，因为商业界盛传俄国政府借口切尔克西亚沿岸被封锁有意不让英国船舶在黑海东岸的许多港口卸货。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庄重声明说：

“如果议会信任我们，如果它把外交仍交给我们去办，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同时还可以免动干戈。”（下院，1836 年 4 月 20 日）

数月以后，即 1836 年 10 月 29 日，乔治·贝尔先生的一艘运盐商船“雌狐号”从伦敦开往切尔克西亚。11月 25 日该船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湾被俄国军舰截去，理由是“该船被用来同被封锁的海岸联系”（俄国海军上将拉札列夫 1836 年 12 月 24 日给英国船长却尔茨的信）。商船、它的货物和人员被押解到塞瓦斯托波尔港，1837 年 1 月 27 日被俄国人判了罪。这时已经不谈什么“封锁”了，而是干脆宣布商船“雌狐号”为依法捕获的赃船，理由是“它犯了走私罪”，因为输入盐是被禁止的，同时在苏茹克-卡列湾，即在俄国的港湾，又没有设立海关。判决被执行了，而且执行得非常无礼和带有侮辱性。对截夺该船的俄国人都公开授予奖赏。英国国旗先被升起而后降下，换上了俄国国旗。船长和船上人员被当做俘虏押上了实行截夺的“哀杰克斯号”，然后从塞瓦斯托波尔解到敖德萨，又从敖德萨解到君士坦丁堡，才允许他们从那里返回英国。关于这艘船本身，一位在这件事发生数年以后到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旅行家曾在《奥格斯堡报》上写道：

“在我所参观的俄国战列舰中，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苏茹克-卡列号’，即以前的‘雌狐号’，现在插着俄国国旗。该船的外貌完全变了。这只小

小的舰艇现在是所有俄国船只中最好的一只帆船，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切尔克西亚沿岸之间进行运输。”

“雌狐号”被劫夺，毫无疑问是帕麦斯顿勋爵履行他“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这种诺言的最好机会。但是，除了英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的贸易利益以外，这里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切尔克西亚的独立问题**。俄国在扣留“雌狐号”时说它违犯了俄国宣布的封锁令，但是在给它判罪时却用了完全另一种借口，说它违犯了俄国的关税规章。俄国既然宣布封锁，也就是宣布了切尔克西亚为敌对的外国，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这种封锁。反之，俄国既然在切尔克西亚施行关税规章，也就是把切尔克西亚看做是它的藩属，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权利？

在继续往下说以前，这里不妨提一下：俄国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完成它在塞瓦斯托波尔修筑要塞的工程。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谈过的那样，俄国占据切尔克西亚的任何权利，只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但是 1827 年 7 月 6 日的条约已规定，俄国不得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做任何扩张领土的试图和取得任何贸易特权。因此，俄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而扩张领土的任何举动都是对 1827 年条约的公开违背，并且，正如威灵顿和阿伯丁所抗议的那样，决不能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可见，俄国并没有权利要土耳其把切尔克西亚割让给它。另一方面，土耳其也不能把不属于它的东西让给俄国。切尔克西亚对土耳其政府始终是独立的，所以还在阿纳帕驻有土耳其帕沙的时候，俄国就曾经同切尔克西亚的首领数次签订沿海贸易的协定，因为当时正式规定土耳其的贸易只限于阿纳帕港口。既然切尔克西亚是个独立国家，那末俄国人认为自己有权要它实施的地方管理法、卫生条例和关税法令等等，它是否应当遵守，就象坦比哥是否应当遵守俄

国的法律一样了。

另一方面，如果切尔克西亚是一个同俄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外国，那末俄国只能在它能够实际实行封锁，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即在俄国拥有能够强行封锁的海军舰队，并且真正控制了海岸的时候，它才能向切尔克西亚宣布这种封锁。但是，在全长二百英里的海岸线上，俄国只有三个孤立的炮台，其余的切尔克西亚领土完全掌握在切尔克西亚人的手中。在苏茹克-卡列湾，连一座俄国炮台也没有。封锁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并没有实行封锁的海军力量。两艘英国船——"雌狐号"和另一艘于1834年曾到过这个海湾的船的船员们曾经要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海岸根本没有被俄国人占领，而且这一点也为两个于1837年和1838年到过这个港湾的英国旅行家公开声明所证实。(《文件集》1844年3月1日第8号)

当"雌狐号"开进苏茹克-卡列湾时，

"无论从船上还是从岸上都看不到有一艘俄国军舰…… '雌狐号'抛锚以后又过了三十六小时，正当船主和几个高级职员上岸同切尔克西亚当局就货值税率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俄国军舰才驶进港湾…… 这艘军舰并不是沿岸行驶的，而是从公海上开来的"。(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既然借口违犯封锁令而下令扣留"雌狐号"的圣彼得堡当局又借口违犯关税规章而把"雌狐号"没收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举出新的证明了。

这一事件对切尔克西亚人来说看来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独立问题同黑海航行自由问题、英国贸易的保护问题以及俄国对英国商船的粗暴的海盗行为问题合到了一起。他们得到海上霸主保护的机会看来也更加没有疑问，因为

"在此以前不久，经过成熟的考虑，并且同政府各部进行了许多个星期的

书信往来，在一个同外交部有关系的定期刊物《文件集》上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并且在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审查过的地图上标明切尔克西亚是一个独立国”。（斯坦利勋爵 1838 年 6 月 2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谁能想到高尚而侠义的子爵竟如此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把俄国的这种劫夺英国财产的海盗行为变成了正式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和致命地打击切尔克西亚独立地位的良机呢？

1837 年 3 月 17 日，罗巴克先生根据“雌狐号”被没收的问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向议院提供

“英国政府同俄国及土耳其政府之间有关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全部往来文件的副本，以及与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缔结后占领黑海沿岸诸港口及地方有关的协商和谈判的报告书”。

罗巴克先生惟恐别人怀疑他有人道的心肠和从抽象原则出发来保护切尔克西亚，所以就坦率地声明：

“俄国可以企图去霸占整个世界，这种企图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它侵犯了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时刻，我要请求我国〈显然，这个国家是在“整个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政府给侵略者以惩罚。”

因此他想知道“英国政府是否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

勋爵阁下虽然被逼到墙角了，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镇静发表了长篇演说，并且，用休谟先生的话来说，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始终没有告诉议院：目前究竟是谁实际上占有切尔克西亚沿岸，这个地方是否确实属于俄国，俄国劫夺了‘雌狐号’是由于它违犯了财政当局所规定的关税规章，还是因为确实存在着封锁，以及他是否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休谟先生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罗巴克先生说，贝尔先生在许可“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以前，曾经同勋爵阁下联系，以便弄清楚让货船去切尔克西亚的一个地点会不会有危险或者有什么不妥之处，结果从外交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就不得不向议院宣读他同贝尔先生

的往来书信。听着他宣读这些书信，就觉得他好象是在读西班牙《斗篷和短剑》式的喜剧，而不是在读一位大臣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正式信件。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听完了勋爵阁下宣读的关于“雌狐号”被劫夺一事的信件的内容之后，禁不住大喊：“我不能不回想起达来朗的名言：言语是掩盖思想的！”

例如，贝尔先生问道：“在所提到的海上进行贸易，是否存在着为王国政府所承认的某些限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他想派一艘装盐的船到那里去”。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阁下问我做盐的生意是否对阁下有利，”还告诉他，“商号自己应该知道做某种生意是否值得”。贝尔先生说：“我根本不是问阁下这个问题；我所要知道的只是王国政府是否承认俄国对库班河以南的黑海海岸的封锁”。勋爵阁下说：“阁下应该去看一看《伦敦官报》[78]，——这方面的消息那里全有”。对于一个想得到这方面消息的英国商人说来，根据《伦敦官报》自然要比根据俄皇的指令更为适当。贝尔先生在《伦敦官报》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承认这种封锁或其他任何贸易限制的报道，于是他就把他的船派了出去。结果是：他自己很快就上了《伦敦官报》。

“我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帕麦斯顿勋爵说——“是想让他看了报纸以后确信，关于封锁一事，俄国政府对我国没有发过任何通知和声明。因此也就根本谈不到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帕麦斯顿勋爵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他这样做不仅否认大不列颠承认俄国的封锁，而且同时还肯定了：在他看来，切尔克西亚沿海地区**并不是**俄国的**一部分**领土，因为《官报》**并不发表**关于外国为了例如平定国内叛乱而对本国的一部分领土实行封锁的消息。既然切尔克西亚不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那末在切尔克西亚就不可能实行俄国的关税规章。可见，按照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所说的来看，他在给贝尔先生的信中并不承认俄国有权封锁切尔

克西亚沿海或者使它受到任何贸易限制。诚然，从他的整个演说里可以看出他是想叫议院做出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他也公开声称：

“俄国在多瑙河口地区、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进行疆界扩张，无疑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

当他在演说完毕坐下来之前，郑重地保证他要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保持它的荣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是已经不堪负荷他过去的政策所招致的种种不幸，不象是又在策划未来的叛卖性阴谋了。在这一天，他不得不恭听如下一段严厉的责备：

“勋爵阁下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表现不够积极和热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过去还不曾有一个大臣在不列颠臣民受到欺侮的时候象他这样前后不一、顾虑重重、迟疑不决、畏首畏尾。勋爵阁下还要让俄国欺侮大不列颠和损害英国贸易多久呢？勋爵阁下侮辱了英国，使英国扮演了一个好吹嘘的寻小事争吵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情，对强者卑躬屈膝。”

是谁把“真正的英国”大臣这样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呢？不是别人，而是达德利·斯图亚特。

“雌狐号”是在1836年11月25日被劫走的。我们刚才所引的下院的激烈辩论是在1837年3月17日进行的。但是1837年4月19日勋爵阁下才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要它

“指明它根据什么理由在和平时期扣留不列颠臣民的商船”。

1837年5月17日勋爵阁下收到驻圣彼得堡的不列颠大使德勒穆伯爵的如下的一封急电：

“阁下！关于对苏茹克-卡列是否 de facto〔事实上〕存在着军事占领的问题，我应该向阁下禀报：海湾有一座以女皇之名命名的炮台（亚历山得拉），并且由俄国的常备军驻防。

永远忠实于您的

德勒穆”

亚历山得拉炮台的实在性，连波将金在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克里木去巡游时请她参观的纸扎的村落都不如，这一点看来是用不着再说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急电的五天以后回电圣彼得堡如下：

“王国政府考虑到，苏茹克-卡列虽经俄国根据1783年的条约承认属于土耳其，而现在，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肯定的那样，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而属于俄国，所以王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充分根据对俄国扣留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提出异议。”

关于这次交涉，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帕麦斯顿勋爵用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去为交涉做准备，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把交涉结束了。他上面那一封1837年5月23日的急电把交涉突然打断了。这封急电在提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签订日期时不是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

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指出的：

“在4月19日到5月23日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以正式抗议开始，但却以表示满意告终。看来，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断言已经说服了政府，使它相信土耳其已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我们所说的那个海岸割让给俄国了。为什么政府对这种诏令没有提出抗议呢？”（下院，1838年6月21日）

发生上述这一切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国王威廉四世背地里指使贝尔先生把“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当勋爵阁下迟迟不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谈判的时候，国王还健康如常。而他突然打断谈判，却正是国王快死的时候，勋爵阁下对外交部已经独断独行，好象已成了大不列颠的专制君主了。本来国王把这艘莽撞的“雌狐号”派去是有他一定的打算的，即想刺一下沙皇，表示对阿德里安堡条约不屑一顾并确认切尔克西亚的独立，而勋爵阁下则在国王快死的时候，大笔轻轻地一挥就以国王的名义

正式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承认了俄国领有切尔克西亚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这一着玩得真够俏皮！

贝尔先生我们已经说过是上了《官报》了，而当时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乌尔卡尔特先生也被召回，因为“他曾劝诱贝尔先生让‘雌狐号’作这次冒险”。

在国王威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是不敢公开反对这次冒险的。因此在《文件集》上才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随后才出现了经勋爵阁下审查过的那幅切尔克西亚的地图，接着才有他给贝尔先生写的模棱两可的回信以及他在议院所作的含糊其词的声明，最后，在“雌狐号”上经管货物的贝尔先生的弟弟在启航时才接到外交部委托转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紧急公文，而驻土耳其政府的不列颠大使庞森比勋爵也才直接鼓动他去做他的这趟生意。

到女王维多利亚即位之初，辉格党的优势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了，所以豪侠仗义的子爵的调子也就突然改变。恭顺奉承一变而为傲慢不逊。1837 年 12 月 14 日托·阿特伍德先生就“雌狐号”和切尔克西亚问题质询勋爵阁下，他回答说：

“说到‘雌狐号’，俄国对自己的行动已作了解释，英国政府对这些解释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船被扣留并不是由于违犯了封锁令。该船所以被捉走是因为它的主人违犯了俄国的地方管理法和关税规章。”

勋爵阁下针对阿特伍德先生担心俄国侵略这点说道：

“我认为俄国也象英国一样地向人类提供了维护和平的保证。”（帕麦斯顿勋爵 1837 年 12 月 14 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议会会议快要结束时，勋爵阁下就向下院提交了他同俄国政府的往来公函，其中两封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1838 年，各党派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托利党人又得势了。6 月 21 日他们对帕麦斯顿勋爵发动了突然的攻击。现任驻君士坦

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当时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乔治·贝尔先生对勋爵阁下提起的控诉，并且处理贝尔先生的赔偿损失的要求。最初勋爵阁下表示极为惊异，说他没有想到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的提议是"这样的琐事"。

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大声喊道："阁下是第一名敢把保护不列颠的财产和贸易说成是琐事的英国大臣。"

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就说：

"关于俄国是否有权统辖切尔克西亚或者是否有权实行它以武力强迫别国遵守的关税规章和卫生条例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商人都没有权利要求王国政府表示意见。"

休谟先生问道：

"如果外交部不办这类事情，那末要外交部做什么？"

勋爵阁下继续说道：

"据说，贝尔先生，这位无辜的贝尔先生，是由于我所给他的回答而上了我所设下的圈套。谈到圈套，则这个圈套不是别人给贝尔先生设下的，而是贝尔先生给别人设下的。"

这里指的是贝尔先生向"无辜的"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些问题。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1838年6月21日)，一个很大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即使勋爵阁下在1836年有心要去反对俄国的野心，他也不能去做，道理很简单：早在1831年他刚一上台就首先承认了俄国侵占高加索，这样也就偷偷地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正如斯坦利勋爵(现在的得比勋爵)所指出的，俄国当局于1831年8月8日曾通知它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说俄国想要

"对高加索和相邻的土耳其各省的居民之间的自由交往规定卫生检查条例"，还说，大使必须"把上述条例通知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外国使团以及奥斯曼政府。"

允许俄国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实行除在上述文件中提到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所谓卫生条例及关税规章，就等于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权利，这样也就等于认可这种权利所依据的阿德里安堡条约。

斯坦利勋爵说道："这些通知通过最正式的手续交给了驻君士坦丁堡的孟德维尔先生〈大使馆秘书〉，特意要他通知英国商人，而且这些通知也送给了帕麦斯顿勋爵阁下。"

而帕麦斯顿勋爵则"一反历届政府的常规"，没有让也不敢让"劳埃德委员会[79]知道已经发出这种通知的事实"。罗伯特·皮尔爵士惊呼：勋爵阁下犯下了"隐匿六年"之罪。

当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仅以十六票的多数——一百八十四票反对，二百票赞成——而幸免于罪。但是这十六票压不住历史的声音，也不能使高加索的山民们静默下去；他们的枪声正在向世界证明：高加索决不"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断言"而帕麦斯顿勋爵加以附和的那样"属于俄国"！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01—403、419—421、436—437、443—461页）

马克思

*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摘录)

(1853年10月18日)

10月1日交给四大国的土耳其宣言，是一个为苏丹对沙皇宣战作辩护的文件，从各个方面来看，它的价值要高于1853年5月以来充斥欧洲的大堆大堆的官方文件。

宣言说：苏丹并没有造成引起纠纷的任何口实。在圣地问题解决以后，就不再有纠纷的借口了。俄国方面破坏了一切条约，而土耳其方面则用尽了一切和解手段。各强国自己都认为，苏丹不应当同意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那末，怎么能够期望苏丹会赞同内容大致同缅施科夫的照会没有什么差别的维也纳照会呢？维也纳会议的解释信根本不可能改变形势。既然俄国甚至对凯纳吉条约的**明确**条文都作了曲解，难道还可以去冒风险，"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条文交到它的手里，让它有要求宗教保护权的严重借口吗？"此外，苏丹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已完全被后来公布的涅谢尔罗迭的解释证明是合理的。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本身就构成了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所以土耳其政府现在决定承认这是casus belli。因此，要求哥尔查科夫公爵撤出多瑙河各省。如果哥尔查科夫公爵在接到上述警告后的十五天内给以否定的答复，那末奥美尔-帕沙就应开始军事行动，俄国代表就应离开奥斯曼帝国国境，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应停止。但是，对俄国商船将不扣留，而只是命令它们离开土耳其港口。海峡将对各友邦的商船开放。

苏丹宣言的要点就是如此。

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是本月 9 日通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所以，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期限是到本月 25 日为止。不过，对于开始军事行动的威胁，仍然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因为奥美尔-帕沙决不会离开他的强大阵地去进攻俄军。

昨天的《先驱晨报》证实了我对俄军向西运动和这种运动所证明的它同奥地利有秘密协定① 的说法。

忠于一套旧的亚洲式的欺骗和小阴谋的俄国，又利用西方世界的轻信散布谣言，说什么沙皇"**已经火急地**向维也纳派出信使送去声明，表示愿意完全接受调停国提出的一切条件了"，可是很遗憾，他忽然"获悉土耳其政府宣战的消息"。于是，俄国人的圣主自然就收回了他以前曾经做过的**一切让步**，并且叫嚷说："现在除作殊死战[guerre à l'outrance]而外已别无他法"。这样一来，结果就是苏丹迫使沙皇进行战争。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第 472—473 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384—385 页。——编者注

恩格斯

神圣的战争

（1853年10月27日左右）

战争终于在多瑙河上开始了，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宗教狂信的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果然不出所料，奥美尔-帕沙首先开始了真正的军事行动。按职责来说，他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以表明自己决心用武力把入侵的敌人驱逐出奥斯曼帝国。但是，象维也纳的谣传那样，他已把三——五万人派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那就有理由担心他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他所放弃的这个河岸能保证他有一道很好的防线和多种多样的防御手段；而在他所要占领的那个河岸上，他所拥有的进攻的兵力将少于敌人，而且战败时没有退路。因此，关于他率领这样的兵力渡过多瑙河的报道，在没有接到更确实的消息以前，是值得怀疑的。

在欧洲，战争是在对土耳其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在亚洲情况就不同了。在亚洲，从军事观点来看，土耳其和俄国的交界地区分成了两个完全隔离的战区。山脊，更确切些说，山脉把高加索同中央阿尔明尼亚高原连接起来，并且在流入黑海的各条河流和流入里海的阿腊克斯河以及流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之间形成一道分水岭。这条以前把阿尔明尼亚同欧克辛海隔开的山脉，现在成了将在其中进行战争的两个独立地区的分界线。山脉到处是悬崖

绝壁，几乎寸草不生，只有很少几条道路可以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特拉比曾德和巴土姆到埃尔斯伦的两条道路。因此，这些高山差不多是任何军事行动所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使敌对双方都不得不在山脉的两面各有一支比较能够独立行动的独立部队。

黑海沿岸地区横贯着许多河流和山溪，形成一道一道的防线。俄军和土军在最重要的地点都设有据点。在这个主要是起伏地的地形上（只有里昂河流域近乎平原）进行防御战，只要敌军没有相应的舰队协同作战，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战果，挡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因为是山地，只有很少几道防线可以从陆地上迂回）。如果舰队开近沿海地区，必要时运送部队在敌人翼侧登陆，而陆军则进行正面攻击，那末舰队就可以逐个迂回所有这些坚固的阵地，孤立或摧毁国境线任何一面的威力不大的要塞。因此，谁掌握制海权，谁便占有黑海沿岸；换句话说，如果联军舰队不积极协同土军作战，黑海沿岸便很可能为俄军占领。

山脉背面的远离海岸的地区，是幼发拉底河、阿腊克斯河和库拉河的发源地。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省位于国境线的这一面，俄国的格鲁吉亚省位于那一面。这个地区也是山岭交错，一般说来，军队是通不过的。土耳其方面的埃尔斯伦和俄国方面的梯弗里斯可以算做两个直接的作战基地，基地丧失就不可避免地使整个邻近区域丧失。因此，俄军曾由于强攻埃尔斯伦[80]获胜，决定了1829年的亚洲战局。

但是，某一地点，对于一方是直接的作战基地，对于他方便是直接的作战目标。因此，连结梯弗里斯和埃尔斯伦的道路将成为敌对双方的作战线。道路有三条：一条沿库拉河上游通过阿哈尔齐赫，一条沿阿腊克斯河上游通过埃里温，一条在前两者之间翻山到卡尔斯。这三条道路双方都有设防城市和据点防卫，因而很难断定哪一条对土军最有利，哪一条对俄军最有利。只要指出这个

情况就够了：通过阿哈尔齐赫的道路，是土耳其军队直趋高加索起义地区的捷径，而俄军如果从巴土姆经过乔罗赫流域由沃耳特向埃尔斯伦前进，就可能迂回向前推进了的土军。来自巴土姆的道路与来自梯弗里斯的道路在距埃尔斯伦仅十五英里的地方会合，因此在上述方向前进的俄军，就有可能截断土军的交通线，如果兵力充足，甚至可以占领埃尔斯伦，因为这个城市的工事是纯粹亚洲式的，不可能成为严重的障碍。

因此，巴土姆是控制山脉两侧的亚洲战区的锁钥阵地。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巴土姆在通商方面的意义，那就不必奇怪，沙皇为什么总想侵占它了。不仅如此，巴土姆还是土耳其整个亚洲部分的战区的锁钥，因为它控制着沿海地区通往内地的唯一孔道，这条路可以迂回土军在埃尔斯伦前面的一切阵地。黑海的两国舰队，谁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回海港，谁就能控制巴土姆。

俄军十分明了这个据点的重要性。他们分水陆两路增援南高加索沿海地区。不久前我们就已相信，土军在欧洲虽然比较弱小，但在亚洲却占很大优势。据报道，亚洲土军司令官阿勃迪-帕沙拥有六——八万人，有的甚至说有十二万人，并且每天还有数以千计的贝都英人、库尔得人和其他好战的非正规部队投到他的麾下。据说，已为高加索起义者储备了武器装备，一旦宣战，土军就将向这个反俄基地的中心突进。在这方面，必须指出，阿勃迪-帕沙未必能有三万以上的正规部队；他在到达高加索之前，必须用这支兵力——也只能用这支兵力——同顽抗的俄军部队作战。骑马的贝都英人和库尔得人可以出色地用于山地作战，以迫使俄军大大地分散兵力，从而削弱其主力；他们还可以使俄国境内的格鲁吉亚人的村落和俄罗斯族移民的村落遭受许多损害，甚至可以和高加索的山民建立某种秘密联系。但是，如果阿勃迪-帕沙的正规部队不能封锁住从巴土姆到埃尔斯伦的道路并击溃俄国人可以集中的作

战部队的主力，那末非正规部队的战果仍然是保不住的。在我们今天，要胜利地进行任何起义或非正规的军事行动以对抗强大的正规军，就必须有正规军的支援。土军在这个边境上所处的地位颇似威灵顿在西班牙所处的地位；我们将看到，阿勃迪-帕沙是否善于用兵，就象英国将军一样，善于对付在正规作战和必需物资方面都大占优势的敌人。1829 年集结在埃尔斯伦前面的俄军共一万八千人；考虑到自那时起土军已进行了改革（虽然在亚洲的那部分土军改革最少），我们认为，如果俄军现在能在这个地点集中三万人成为一支突击力量，他们便有很大把握获胜。

现在，有关亚洲俄军的可靠材料比欧洲俄军的少，而谣传却比较多，在这种时候，谁能预言他们是否做得到这一点呢？高加索俄军按满额数字名义上是二十万人；二万一千名黑海哥萨克已派往土耳其边境；据说，有几个师已由敖德萨乘船前往高加索南部海岸的列杜特-卡列。但是大家知道，高加索俄军尚不及正式编制人数的一半，派往高加索山脉以南的援军显然不可能达到俄国报纸所报道的那个数字。根据我们收到的一些互有出入的消息，根本不能够哪怕是大概估计出亚洲边境上俄军的兵力。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双方的兵力很可能大致相等（高加索人立即普遍起义的情况不算在内），也可能土军稍多于俄军，因此，完全有理由在这个战区采取**攻势**。

土军在亚洲成功的希望的确要比在欧洲大。他们在亚洲只需守住一个重要的据点——巴土姆。向高加索山脉北面的进军，无论从巴土姆出发或是从埃尔斯伦出发，如果成功，便可以和他们的同盟者——山民取得直接的联系，还可以至少由陆上一举截断南高加索俄军与俄国的联络，这样就可以全歼这一支军队。另一方面，土军如果失败，顶多只会失去巴土姆、特拉比曾德和埃尔斯伦，即使是这样，俄军仍然没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前进。土军的得将大

大超过失败时可能的失，因此，根据这些明智的和正确的看法，土军看来已经决定在这个地区打进攻战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第486—490页）

马 克 思

*东方战争(摘录)

(1854年1月14日)

久待解决的东方问题看来终于尖锐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外交手段失去了左右它的力量，而且已经不能利用它进行变化无常的、永远没有结果的活动了。1月3日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袭击。沙皇尼古拉有一次曾宣称，他将把这种行动看做是宣战的信号。那末，他现在会不注意这个事实吗？今天得到的消息说，法英两国舰队的联合兵力正和土耳其舰队第一大队共同把一万七千名土军运往巴土姆。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末这就象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是一种战争行为，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

但是俄国会不会孤立呢？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这一场全面战争中将站在哪一方面呢？

据说，路易·波拿巴曾暗示奥地利政府：如果法国同俄国发生冲突而奥地利站到俄国方面，那末法国政府就将利用只需一点火星就足以重新燃起燎原烈火的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风潮，而且法国将企图恢复波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但是，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奥地利政府受本身财政困难的影响将比受波拿巴的威胁的影响更大。

最近时期，贬值的纸币流通量不断增大，其次，政府不久以前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以法律规定它发行的纸币贬值百分之十五，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推断奥地利国库的情况。这种使本国货币贬值

的措施，也许是在征税方面的登峰造极的发明，因为这种作法就是税上加税。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奥地利 1854 年的预算在经常开支方面的赤字将达四千五百万弗罗伦，在特别开支方面的赤字达五千万弗罗伦。奥地利第一百次决定借款，但是看来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准备借款五千万弗罗伦，显然是为了支付定期债券的利息和应付其他一些刻不容缓的急需。

当联军的分舰队即将进入黑海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银行家们大忙了一阵，纷纷把纸币换成银币。持有一百和二百弗罗伦纸币的人们则拥挤在这些银行家的办公室里，力图挽救受到威胁的积蓄，然而在决定关头，圣彼得堡对维也纳的影响还是占了上风，奥地利将卷入这场即将到来的冲突并站到俄国方面。至于普鲁士，它仍企图玩弄 1780 年、1800 年和 1805 年的那套把戏，即建立中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或北德意志各邦的联盟，而它居于盟主的地位就可以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可以投到许给它好处最多的那一方面。

毫无疑问，土耳其和欧洲的舰队能够摧毁塞瓦斯托波尔并消灭俄国的黑海舰队；联军能够夺取并守住克里木，能够占领敖德萨，封锁阿速夫海并发动高加索山地居民。在波罗的海应当采取在黑海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同瑞典缔结同盟；必要时，还得恐吓丹麦，派出足够数量的部队在芬兰登陆，并提出只有在该省重新归并瑞典的条件下才签订和约的保证，以发动芬兰的起义。在芬兰登陆的部队可以威胁彼得堡，而舰队则可以炮击喀琅施塔得。

这一切都决定于欧洲海上强国的行动是否坚决有力。

……

然而，俄国已经筋疲力尽了，它正在世界各地，在英属印度的边境、在波斯、在塞尔维亚、在瑞典、在丹麦等地使用收买和恫吓的手段。在波斯，英国公使和沙赫政府之间发生了小争执，后者已经

准备让步了，但是俄国大使进行干涉，不仅竭力激起沙赫对英国的愤恨，而且企图把他卷入对土耳其政府的积极的敌对行动，并怂恿他对土耳其宣战。但是，据说这个阴谋失败了，因为英国代办汤普逊先生威胁说他将离开德黑兰，沙赫害怕会立即引起波斯人民反俄的怒潮，同时阿富汗外交代表团来到恫吓说，如果波斯同俄国缔结同盟，阿富汗人就要进占波斯领土。

与此同时，大批俄国间谍布满了塞尔维亚。他们到处游串，寻找过去以忠于被推翻的奥布廉诺维奇王朝而出名的人。他们同一些人谈论年轻的米哈伊尔公爵，同另一些人谈论他的老父米洛什，在谈话中时而暗示有希望在俄国的保护下扩大塞尔维亚的疆界，把现在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统治下的全部操塞尔维亚语的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伊利里亚王国，时而威胁说，如敢反抗，就派大军侵入，把塞尔维亚完全征服。俄国尽管不断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仍然破坏不了塞尔维亚和苏丹的亲密关系。相反，贝尔格莱德正在等待接受君士坦丁堡发出的两道敕令：一道敕令是断绝塞尔维亚同俄国之间原有的一切联系，另一道敕令是把各个时期承认给塞尔维亚人民的所有特权肯定下来。其次，俄国政府还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积极进行谈判，企图说服瑞典和丹麦政府在欧洲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站在俄国一边。俄国企图同这些国家缔结同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封锁松德海峡和贝耳特海峡以对付西方强国。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俄国所争得的却是，瑞典、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缔结了武装中立的条约，并进行了显然用来对付俄国本身的武装准备。从瑞典发出的一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人们因为俄国未经宣战而无耻夺占的芬兰公国有可能归还斯堪的那维亚王国而感到欢欣鼓舞。至于丹麦，它的（不是人民的，而是宫廷的）态度还不很明确。甚至传闻现任的丹麦外交大臣将呈请辞职，而由雷芬特洛夫-格里敏尼尔伯爵这位以同圣彼得堡的宫廷有着密切联系而出

名的人物继任。在法国，由于俄国的影响，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的问题[81]取得了某些成绩；同时这种影响也正被千方百计地用来破坏英法政府之间的 entente cordiale[82]，并在它们之间散播不信任。某些接受基谢廖夫先生津贴的巴黎报纸企图使人们对英国政府是否真诚产生怀疑，我们也看到，接受布隆诺夫先生津贴的一家英国报纸也在怀疑法国政府是否真诚。另一个主要针对西方强国的打击是俄国禁止波兰输出粮食。

然而，西方强国的外交活动丝毫不带有敌视俄国的性质。正相反，当问题涉及伸张正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拖延倾向，当问题已经涉及犯罪行为时，他们又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妥协倾向。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这样的行动是错误的有害的。最近六个星期以来外交方面的主要事件有下列几点：维也纳会议复活了；会议参加者于去年 12 月 5 日拟定了议定书；法国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给列施德-帕沙写了一封信；[83] 12 月 15 日四大国交给土耳其政府一份共同照会，该照会于 12 月 31 日为苏丹接受；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向法国的驻各国外交代表发出 12 月 30 日通令，告知联军的舰队已进入黑海。关于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本报读者在读完这几行字后就可以了解它的内容。再没有什么比议定书中的下列论点更荒唐的了：

“俄皇在各个时期所作的保证，消除了任何关于至尊的皇帝怀有某种破坏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意图的想法。”

也没有什么比议定书中所谓同意签订三个月的停战协定对土耳其是适当的这种声明更恶毒的了。在可耻的西诺普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两天以后，即 12 月 5 日，列施德-帕沙写信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告知西诺普来的消息，并请求联军舰队进入黑海。12 月 12 日，即列施德-帕沙发出照会后一个星期，他收到两位大使非常冷淡的复照，

复照中通知他说：

“联军舰队的出现只有‘**政治**意义’，因而毫无**军事**意义，这只是‘**精神**支援’，因而决非**军事**支援。”

于是，土耳其政府被迫接受12月15日的四强共同照会。这个照会对于土耳其政府因专制君主海盗式的行为所受的损失没有规定任何赔偿，而且坚持恢复过去的一切条约——凯纳吉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和其他条约，所有这些条约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成为俄国取得欺骗、干涉、进犯和吞并的武器的武库。这个照会还允许沙皇对土耳其在宗教问题上有保护权，在民政管理问题上有指导权，因为在照会中写明，对各强国，

“土耳其政府应当告知有关它给予所有非伊斯兰教臣民的宗教特权的敕令的内容，同时对每一强国作出相应的保证”，

而且土耳其政府应当宣布它更加积极地推行行政制度和进行内部改革的坚定决心。

虽然从这些新建议的字面上看来，欧洲五强国都有权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但实际上只有俄国才有这种权利。这一协议的实质是：法国和奥地利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应当保护土耳其的罗马天主教居民，英国和普鲁士是信奉新教的国家，应当保护苏丹的新教臣民，而俄国则应保护信奉正教的臣民。但是，由于土耳其信奉天主教的还不到八十万人，信奉新教的不到二十万人，而信奉正教的却将近一千万人，因此很清楚，沙皇实际上获得保护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权利。直到12月19日，即里扎-帕沙和哈利耳-帕沙进入内阁，因而保证了“主和”派或者说“亲俄”派的胜利以后，土耳其政府才接受了四强国的建议。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0—22、26—29页）

马 克 思

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

（1854年3月21日）

目前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大臣们被迫公布了他们在上台后最初三个月中同俄皇来往的秘密公文[84]以及关于1844年沙皇同阿伯丁勋爵会见的备忘录，阿伯丁勋爵是为了向《圣彼得堡报》[85]应战才公布这个备忘录的。

现在我就从分析涅谢尔罗迭伯爵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开始，这个备忘录是根据1844年6月俄皇访英之后的通报写成的。备忘录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最符合于保持和平的共同利益”；英国和俄国在这个基础上已经达成协议，并且共同努力来维持这个status quo〔状态〕。“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扰土耳其政府，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外交上的争论去惊动它，非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但是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执行这个“不干涉制度”呢？第一，大不列颠不应当妨碍俄国认为必要时对俄土条约所作的解释，相反地应当促使土耳其根据俄国对条约所作的解释来行动；第二，应当使俄国能够“经常地”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总之，对土耳其政府的“不干涉制度”就等于俄国的参与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议表达得远不是这样坦率。

看起来备忘录说的是“一切大国”，但是实际上分明在暗示，除了俄国和英国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大国。备忘录说，法国“必须

根据圣彼得堡和伦敦之间取得协议的那种行动方式来行动”。奥地利被描绘成俄国的一个简单附属物，既说不上独立存在，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政策，有的只是“通过**完全一致**的原则”同俄国的政策保持“紧密联系”的政策。普鲁士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国，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被提到。因此所谓“一切大国”无非是对圣彼得堡内阁和伦敦内阁的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而一切大国应当据以联合起来的行动方式也无非是由圣彼得堡规定而伦敦必须遵循的行动方式。备忘录中说：

“土耳其政府总想摆脱它在同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它希望不受任何惩罚地作到这一点，因为它指望各国内阁之间相互竞争。它认为，如果它不执行它对某一内阁的义务，其他内阁就会站到它的方面来，使它摆脱任何责任。

重要的就是不支持土耳其政府的这种错误打算。每当它不执行自己对某大国的义务时，其他一切大国的共同利益要求——迫使它认识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促使它对于向它提出正当要求的内阁给以满足。**一旦土耳其政府看到其他内阁都不支持它，它也就会让步，这时所产生的争论将通过协商得到解决而不会引起任何冲突。**”

这就是俄国为了要求英国帮助自己迫使土耳其根据旧条约作出新让步而向英国提出的公式。

“根据目前欧洲人们的思想情绪，各国内阁对于土耳其基督教居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宗教迫害不能漠然置之。应当经常使奥斯曼的大臣们认识到这个真理，并使他们确信，只有在他们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采取宽大而温和的态度时，他们才能指望得到各大国的友谊和支持。

遵循这些原则的外国代表们，应当本着彼此完全一致的精神行事。他们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照会时，应当使这些照会表现出真正的一致性，但是仍然不采取命令的形式。”

俄国就这样温和地提示英国，要它支持自己对土耳其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的要求。

俄国在如此叙述了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的前提之后，就不能

向自己的亲密朋友隐讳：正是这种不干涉要比任何侵略政策更加危险，它会非常可怕地促使奥斯曼帝国现有的“分解成分”增加起来，因此有朝一日**“难以预料的情况”**会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那时各友好内阁就无力阻止这种崩溃”。接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旦这种难以预料的情况使土耳其遭到不可挽回的灾难，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备忘录指出，一旦土耳其遭到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威胁，唯一必须做的就是**英国和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事先达成协议”**。备忘录肯定地说，对于这一点，“在俄皇最近访问伦敦期间已经原则上取得一致了”（经过这位专制君主同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阿伯丁伯爵长时间的会商）。结果，**“俄英两国承认约定的义务：一旦土耳其发生某种突然事件，双方应事先就共同行动达成协议”**。

这个**约定的义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第一，俄英两国应当事先就**瓜分土耳其**问题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谓俄国的 alter ego〔第二个我〕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不得不”**，也就是被迫按照它们的目的来行动。这种相互谅解的必然结果就是英国被卷入对法的流血战争，这样就会使俄国放手在土耳其实行自己的政策。

备忘录非常坚持地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那些能够加速土耳其崩溃的“不可预料的情况”。但是在备忘录的末尾，这些隐晦的词句不见了，而代之以比较明确的说法：“如果我们看到奥斯曼帝国要崩溃的话”，英国同俄国就应该事先达成协议等等…… 这样一来，唯一难以预料的情况就是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现在要崩溃了这种难以预料的声明。约定的义务的主要结果就是使俄国有权随时看到土耳其的即将到来的灾难，并迫使英国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就这种不可避免的崩溃进行谈判。

因此，在备忘录写好十年以后，英国按规定的形式得到通知说，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已经枯竭了，现在已经到了事先就排除法国的问题，即背着法国和土耳其来策划阴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了。由于这个建议，也就出现了圣彼得堡和联合内阁之间来往的一系列秘密文件。

1853 年 1 月 11 日不列颠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汉·西摩尔爵士向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罗素勋爵送去了第一个秘密报告。1 月 9 日晚间，他“荣幸地”在叶列娜大公妃的宫中见到了俄皇，叶列娜大公妃敬请爵士夫人和西摩尔勋爵来同皇室会见。俄皇和蔼可亲地走到他跟前，表示对联合内阁成立的消息非常满意，并祝贺联合内阁长期执政；他请大使向年迈的阿伯丁转达他的祝贺，并请大使告诉约翰·罗素勋爵：

“现在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我，我和英国政府——要保持最好的关系，这一点，从来都没有象目前这么必要。”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在 1853 年 1 月讲的，恰恰在这个时候，奥地利，也就是备忘录所说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俄国原则上完全一致”的奥地利，在门的内哥罗问题上公开地兴风作浪了。

沙皇说：“只要我们达成协议，别人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他以假慈悲的口吻继续说道：“现在土耳其的局势非常危急，这可能会给我们大家招来很多麻烦。”

沙皇讲了这些话之后，和蔼可亲地向汉·西摩尔爵士伸出手，仿佛要向他告别。但是汉密尔顿爵士“立即想到话还没有讲完”，于是鼓起“很大的勇气”谦恭地请求专制君主“就土耳其问题稍微详细地谈一谈”。

汉密尔顿爵士指出：“皇帝的谈话和态度尽管依然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但是表明皇帝陛下不打算同我谈论他准备在南方举行的示威问题。”

必须指出，汉密尔顿爵士在 1853 年 1 月 7 日的报告里就已经

告诉不列颠政府：

“第五 corps d'armée〔军〕已经奉命向多瑙河各省的边境推进，而第四军将奉命整装待发。”

他在1853年1月8日的报告中说，涅谢尔罗迭曾经把自己对于“必须用武力示威来支持俄国外交”的意见告诉他。汉密尔顿爵士在报告中继续说：

“皇帝的讲话开始时还拘谨，但是后来便直言不讳无拘无束地谈论起来，他说：‘现在土耳其的情况混乱得很。看来国家本身已经处于灭亡（menace ruine）的前夜。它的崩溃将是巨大的不幸，现在十分重要的是，英国和俄国应就这个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两强国的任何一方，没有通知对方就不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皇帝提高了声音说：‘瞧，在我们手中的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我坦白地告诉您，如果在最近的某一天这个病人死去，特别是在一切必需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前死去，这将是巨大的不幸。但是现在还不是同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俄国熊认为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应当**吃掉他。汉密尔顿爵士对于俄国医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诊断有些吃惊，他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仁慈的陛下，请允许我再讲一点。陛下说，这是一个病人，完全正确；但是请陛下恕我冒昧地说，宽宏大量和身强力壮的人应当怜悯病人和弱者。”

不列颠大使感到自慰，因为他觉得他同意沙皇对于土耳其和病症的看法，他要求对病人采取宽大态度等等“至少没有使皇帝感到难堪”。汉·西摩尔爵士关于他第一次同沙皇秘密谈话的报告就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这次 vis-à-vis〔会见〕中他表现出是一个十足的内侍臣，但是他还是有足够的理智来用下面的话提醒自己的内阁，他说：

“提出这样一类的任何一个建议的目的，只是要使对方进行左右为难的抉择。我认为这种抉择就在于：如果女王陛下政府不同俄国就土耳其突然崩

溃时应当采取的措施问题达成协议，那末后果一旦对英国不利，女王陛下政府就更没有理由来埋怨别人。反之，如果女王陛下政府参加讨论这些可能性，那末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促使灾难发生的因素，而女王陛下政府最关心的却是尽量延缓这种灾难的发生。”

汉密尔顿爵士用以下警句似的箴言来结束自己的报告：

“根据上面所说的一切，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英国来说，最好是同俄国取得密切的协议以阻止土耳其的崩溃；而对于俄国来说，最好是这种协议能造成足以引起土耳其崩溃的事件。”

乔·汉·西摩尔爵士在1853年1月22日给约·罗素勋爵的报告中说，1月14日他又同沙皇进行了秘密谈话，这次沙皇“单独接见他”。专制君主同意给英国大使讲一讲东方问题。对于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理想和计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对俄国来讲也许只存在一个危险，这就是进一步扩大它本来已经过于广阔的领土。（读者该记得，我在引证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的报告的摘要时已经提出过这一点。）土耳其的 status quo〔状态〕最符合俄国的利益。一方面，土耳其人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还有足够力量，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有**足够力量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保证自己得到别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帝国内住有几百万基督徒，他必须关心他们，尽管这个任务有时是困难的，“棘手的”。他的权利、他的义务和他的信仰都同时要求他这样做。后来沙皇突然转到他那个关于一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的比喻上来，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病人“在他们手中突然死去”（de leur échapper〔从他们身旁消失〕）。“如果**在某一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

沙皇在对奥斯曼帝国的必然死亡作了这种新的暗示之后，紧接着又一次要求英国——根据“约定的义务”——同俄国一道来考

虑遗产问题。但是沙皇不暴露自己的未来“计划”，而宁愿以议会的用语来指出瓜分时应当注意的主要之点。

“我想把您当做朋友和**君子**来谈一谈。如果英国和我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那末其他问题对于我是不关重要的。别人怎么做，怎么想，对我都无所谓。因此我要开诚布公地告诉您，如果英国打算最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己的统治，我是不允许的。我并不是说你们一定有这种打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直率地讲出来。我自己也愿意保证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统治，——当然是作为永久的占领者，——至于作为暂时的保护者，我是不拒绝的。如果不事先采取措施，如果一切凭偶然，那末情势可能迫使我占领君士坦丁堡。”

这样，英国就被禁止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统治。而沙皇却可以做，即使不是作为永久的占领者，至少也是作为暂时的保护者。不列颠大使感谢皇帝陛下这种直率的解释。然后尼古拉援引了他以前同威灵顿公爵的谈话——这次谈话的记述或者说谈话概要已写入1844年的备忘录。谈到沙皇对圣地的要求这个迫切问题时，不列颠大使表示了这样的担心：

“一旦出现俄国军队就会有两种后果：或者是法国可能进行反示威，或者是（这更加严重）基督教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本来就因秩序混乱和财政危机严重而削弱的苏丹政权。皇帝向我保证，到目前为止他的军队没有前进一步（n'ont pas bougé）；而且他希望他的军队也不需要前进一步。**谈到法国远征苏丹领土**，皇帝陛下暗示，这种步骤会立即引起危机；荣誉感会迫使他毫不犹豫地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开赴土耳其；如果这样的行动方式使土耳其苏丹（le Grand Turc）遭到崩溃，他只能对这种后果表示遗憾，但是仍然认为这是迫于不得已而做的。”

这样，沙皇现在就为英国出了一个当前就要研究的题目：英国应当制订一个消灭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计划”，“并就取代现行制度的新制度问题事先达成协议”。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还能够得到奖赏，并以父亲般的口吻谆谆叮咛：

"如果有可能用不破坏普遍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由两个最关心土耳其命运的主要政府采取预防的措施来填补由于欧洲伊斯兰教统治的消失所形成的空白，那将是十九世纪的文明的伟大胜利。"

在沙皇向英国提出这种要求之后，罗素勋爵出场了，他于1853年2月9日用密件答复了沙皇。如果约翰勋爵对沙皇的阴险计划（利用英国同沙皇秘密谈判将来瓜分盟国的问题而置英国于一种令人怀疑的处境）有充分了解，他就会也象沙皇那样，只限于口头上答复布隆诺夫男爵，而不是向圣彼得堡发去正式的政府文件。在秘密文件提交议院以前，《泰晤士报》曾把约翰勋爵的文件说成是对沙皇的建议的有力的、"愤怒的驳复"。可是《泰晤士报》在昨天收回了对罗素勋爵的赞扬，并且声明："那个文件不值得赞扬，这种赞扬是因为消息不确切而造成的。"约翰勋爵使《泰晤士报》感到恼火的是他在星期五下院会议上的声明，他说他没有向这家报纸提供消息的习惯，关于那篇影射他给乔·汉·西摩尔爵士的复信的文章，他只是在文章发表三天以后才读到。

凡是了解1814年以后所有英国大臣们（甚至包括坎宁在内）同俄国讲话时的那种卑躬屈膝、阿谀奉迎的口吻的人一定会认为，约翰勋爵的这份密件可以算是这个矮子的英雄行为。

因为这个文件是对历史的卓越贡献，它能够说明谈判的进程，所以，如果读者不嫌，我就把它 in extenso〔全部〕引录出来。

约翰·罗素勋爵致乔·汉·西摩尔爵士

（机　密）

1853年2月9日于外交部

阁下！

您于1月22日寄来的秘密报告已经收到并呈交女王。象以往一样，这次女王陛下也满意地注意到皇帝陛下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女王陛下命

我以同样温和、真诚和友好的态度来讨论问题。皇帝陛下所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鉴于土耳其帝国可能崩溃，甚至即将崩溃，也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未来计划制订好以前突然发生灾难，那就会同时发生混乱、骚动和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与其如此，那末预先采取一些对策岂不更好。皇帝陛下说："这就是我希望您提请贵国政府注意的一点。"女王陛下政府在研究这个重要问题时首先根据以下的考虑：过去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危机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一广泛的欧洲问题。关于圣地的争论曾经发生过，但是这种争论同土耳其内部管理问题没有关系，关系更多的是俄国和法国而不是土耳其政府。土耳其人进攻门的内哥罗造成了奥土关系的某些不和；而这里涉及的也只是威胁奥地利边界的危险，而不是威胁苏丹权力和安全的危险；总之，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其次，女王陛下政府应当指出，不能肯定地说，什么时候将发生这种事件。当威廉三世和路易十四签订条约来确定西班牙查理二世死后的继承制度时，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是针对为时不远的事件。西班牙君主的罹病和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必然完结都足使预定的事件无疑地很快地到来。西班牙国王的死亡决没有因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而提前。关于上个世纪所签订的预先决定托斯卡纳在梅迪契家族的最后君主死后的命运的协议，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可能性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崩溃也许会在二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预先就分配苏丹所统治的领土，与同样鼓舞着俄国皇帝和大不列颠女王的那种对苏丹的友好情感未必相称。**除了上述考虑以外，还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必然会加速它所针对的那些情况的凑合。如果不让奥地利和法国知道这个协议，那是不公正的，而且这种隐瞒行为也是同防止欧洲战争这一任务不相容的。事实上，皇帝陛下也不可能有这种隐瞒的打算。应当认为，只要大不列颠和俄国就适当的行动方式达成协议，并且想要使它生效，它们就会把自己的打算通知欧洲各大国。这样签订出来并且这样通知欧洲各大国的协议是不能长久保持秘密的；而关于这种协议的消息一传出来，除了使苏丹感到不安和不愉快而外，还将煽动他的所有敌人加紧采取强制行动，进行更顽强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确信，他们一定获得最后胜利，而苏丹的将领和军队则会感到，任何暂时的胜利都不能够挽救他们的事业而不致最后垮台。现在人们担心的那种无政府状态正是会这样造成并且日趋严重的，而病人的朋友们的预见将成为病人死亡的原因。对于执行任何这一类协议所带来的危险，女王陛下政府恐怕用不着再

作更多的叙述。“王位继承权战争”的例子充分证明，这种协议在人们为强烈诱惑力驱使而加以破坏的时候是不会受到多大尊重的。由于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暂时保护者而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的这种地位却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后的占领者不管是谁，恐怕都不会满意穆罕默德二世后裔们那种无所事事和委靡不振的作为的。君士坦丁堡的占领者由于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大门，对于欧洲事务自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用来为俄国谋利益，也可以用来控制和限制它的实力。皇帝陛下正确而英明地说道：“我的国家幅员广大，各方面都很美满，因此对我来讲，如果希望再扩大现有的领土和实力，那就是愚蠢的。”他接着说：“相反，对我们说来巨大的危险，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进一步扩大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帝国版图。但是代替土耳其政府的一个强盛而好大喜功的国家可能会使俄国皇帝或者他的继承人必须进行战争。”为了防止欧战而提出的手段可能正是引起欧战的手段，因为无论英国、法国，可能还有奥地利，都不会容忍君士坦丁堡永远留在俄国手里。至于大不列颠，那末女王陛下政府声明，它没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皇帝陛下可以完全相信这一点。政府还愿意提出这样的保证：如果事先没有同俄国皇帝磋商，决不签订任何关于土耳其崩溃时应采取的措施的协议。总之，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皇帝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这个政策使他比起那些从完全不正当的侵略和瞬息的荣誉中寻求不朽业绩的最显赫的君主更加扬名于世。要使这个政策取得胜利，最好是尽最大的克制对待土耳其；最好是使欧洲各大国向土耳其提出的各种要求成为友好谈判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无条件的要求的对象；尽量避免反苏丹的陆海军示威；对于涉及土耳其和属于土耳其政府职权范围的问题的意见分歧，要根据大国相互的协议来解决，而不要强迫弱小的土耳其政府接受。除了预先提醒这些问题以外，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根据欧洲各文明民族所普遍采用的公正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愈是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皇帝陛下就愈认为没有必要在实际上行使那种他认为非常麻烦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问，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您可以把这份密件宣读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如果认为适当的话，甚至可以把密件的副本交给皇帝本人。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转交副本时，应该向皇帝陛下保证女王陛下对他的友谊和信赖——他的行动

方式所理应赢得的友谊和信赖。

您的忠诚的　**约·罗素**

我的叙述不得不在下一篇文章中结束①。但是在结束本文以前，我想供给你们一些广大公众无法弄到的最新材料，作为我以前所说的关于普鲁士的立场和计划问题的补充。

当俄国同英法同盟之间的冲突达到某种顶点时，尼古拉皇帝给自己在柏林的内弟② 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虽然法国和英国能够在海上使他遭受某些损失，但是他在陆上不怕它们，因为到4月底他就能准备出动六十万大军。其中二十万他准备交给弗里德里希-威廉支配，只要后者答应进军巴黎，推翻路易-拿破仑。愚蠢的国王对这个计划是如此热衷，以致**曼托伊费尔**为了劝止他不要接受这个建议竟花了三天的时间。这是关于国王。

至于**冯·曼托伊费尔**先生这位普鲁士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伟人"本人，只要我们看了他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所发的秘密指令，就对这位人物的全貌了如指掌了，他的这些指令正是在接到上面所说的俄国来信的时候发出的，并且落到了我的手里，虽然落到我手里的途径与我的私人信件落到本生手里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86]。这些指令由于无耻的模棱两可的笔调暴露了这个学究兼军士的真面目，指令的内容大致如下：

"要好好地看一看刮的是什么风。如果您看到英国同法国结成紧密同盟并下定决心进行战争，那您就要坚持土耳其的'完整和独立'。如果您看到英国在政策上摇摆不定，无意进行战争，那您为了国王即我的和您的君主的荣誉和尊严，就要勇敢地投入争吵。"

瞧，俄国专制君主把普鲁士看做一个区区小国不是很正确吗？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8—159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60—177页。——编者注

②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马克思

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摘录)

(1854年7月4日)

土耳其政府要求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宗主权是根据1393年、1460年和1511年的三个条约。1393年瓦拉几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 我们，即巴耶济德等本着对隶属于我们不可战胜的帝国的瓦拉几亚的宽厚精神，和它的执政国君共同决定，这个国家将继续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统治，瓦拉几亚国君将有充分的自由自行选择方式和时机同邻邦宣战和媾和。

第三条 国君(基督徒)由大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

第四条 瓦拉几亚国君有义务每年给帝国国库纳贡五百披亚斯特。"

1460年瓦拉几亚国君符拉德五世和穆罕默德二世签订的条约规定：

"第一条 苏丹同意并且保证由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保护瓦拉几亚和防御任何敌人的进犯，为此仅要求瓦拉几亚承认苏丹对作为主权公国的瓦拉几亚具有宗主权，地方长官为此必须每年向土耳其政府纳贡1万披亚斯特。

第二条 土耳其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公国的地方行政，任何一个土耳其人无重大原由，均无权进入瓦拉几亚境内。

第三条 地方长官照旧由大主教、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土耳其政府承

认这种选举是合法的。

第四条 瓦拉几亚人民仍享有按本国法律进行管理的自由，它的地方长官享有对其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他们自己的行为不对苏丹负任何责任。”

第三个条约就是1511年的条约。莫尔达维亚在条约中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并为自己争取到比瓦拉几亚所取得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俄土之间签订的条约当然不能使莫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自己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失效，因为这两个民族从来没有跟俄国人进行过谈判，也没有给土耳其政府代他们达成协议的权利。而且值得指出的，俄国本身在阿德里安堡条约中已经承认上述特惠条例。这个条约的第五条规定：

“鉴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两公国根据特惠条例服从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而俄国保障它们的繁荣（！）因此，显而易见，它们继续享有它们的特惠条例所赐予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上面援引的几个特惠条例现在依然有效，因为后来的任何条约并没有废除它们，根据这些特惠条例可以看出，多瑙河两公国是两个受土耳其政府庇护的主权国家，它们是在土耳其政府保卫它们不受任何外敌侵犯，同时决不干涉其内部管理的条件下向土耳其政府纳贡的。土耳其人不仅无权将瓦拉几亚交给外国占领，而且他们自己没有重大理由也不得进入瓦拉几亚的领土。不仅如此，由于土耳其人这样违反了同瓦拉几亚人签订的特惠条例而丧失了宗主权，俄国人只要有瓦拉几亚人向他们提出请求，甚至可以援引被土耳其违反的条约来论证自己有权将奥地利人赶出两公国。而且，这一点决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俄国采取的政策一贯不仅鼓励，甚至还唆使土耳其人破坏瓦拉几亚人的权利，以便在他们之间煽起敌意，从而给自己制造干涉的借口。就拿1848年来说

罢，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年春天，几个贵族向莫尔达维亚国君呈递了请愿书，要求进行某些改革；在俄国领事的影响下，不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连写请愿书的人也被投入了监狱。这个做法所引起的骚动以后就成了俄国于6月25日越过边境向雅西推进的借口。同时，瓦拉几亚国君仿效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做法，答应进行瓦拉几亚贵族自由派所要求的若干改革。这是6月23日的事情。不用说，这些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但是，它们破坏了俄国依靠在1829年占领期间颁布的并为上述改革废除了的根本法[87]而取得的一切影响。代替这个根本法而制定出来的宪法废除了农奴制并把农民耕种的一部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而地主可以从国家领取赔偿费，以补偿他们所失去的土地和占有他们的农民的劳动的权利。后来，执政国君在俄国人的怂恿下放弃了王位，一个临时政府成立起来主持国事。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权干涉公国的内部事务，并且错过了抗议俄国人进入莫尔达维亚的时机的土耳其政府，派遣苏里曼-帕沙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瓦拉几亚并发表了威胁性的苏丹告居民书；这些措施自然是御前会议在俄国压力之下通过的。瓦拉几亚人出来迎接帕沙和土耳其人并同他们结成盟友。于是签订了一项协定：临时政府将由 Lieutenance Princière〔公国总督〕接替，后者开始时本来由六人组成，以后改由三人组成。这个政府得到了帕沙的承认，而且在帕沙的坚持下，也得到外国领事的承认。新宪法又经过了某些修改之后也被苏丹批准了。

然而，俄国政府在向全欧洲发出的宣言中大发雷霆地攻击瓦拉几亚人民，指责它建立了共和国并宣布了共产主义。1848年8月1日，大批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苏里曼-帕沙突然被土耳其政府召回；苏丹拒绝接见应他本人的邀请前来君士坦丁堡的瓦拉几亚代表，而9月25日，傅阿德·埃芬蒂率领

土耳其军队到了布加勒斯特城下，声称此行纯粹是为了消除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任何借口。布加勒斯特城和城郊的十万多居民听信了土耳其人的话，不带武器，穿上节日服装，以僧侣为首，出城欢迎他们。傅阿德·埃芬蒂让他们派代表团到他的兵营接受训示。布腊提昂诺先生在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说：

"代表团还来不及向傅阿德·埃芬蒂说明身分，便已经被捕了；同时，土耳其军队以急行军奔向布加勒斯特，土军的骑兵的铁蹄践踏了把土耳其人当作朋友来欢迎的和平居民，撕毁了他们的旗子，折断了十字架，开枪乱射路上见到的兵营和城内的整个街坊区，用霰弹射击兵营里的瓦拉几亚兵士，迫使他们投降和缴械，还杀死病员；军队进城后大肆抢劫、屠杀以及干下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

这里，俄国全权代表杜加美尔将军支持了并且实际上指挥了土耳其军队。在他后面俄军跟着开到；结果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恢复了俄国拟定的根本法，即所谓的法规，而这正是奥地利目前有义务在瓦拉几亚恢复的那种 status quo〔状态〕。

很明显，如果奥美尔-帕沙现在率领他的常胜军进入瓦拉几亚，那末接受了不久前的教训并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人，就会恢复 1848 年宪法及其全部后果，即"共和国、共产主义"和 1848 年全部产物。没有人会相信，奥地利会比俄国更喜欢这个前途。另一方面，也很明显，土耳其政府一定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才会同意再次破坏自己同瓦拉几亚人订的条约，虽然它根据经验知道这个步骤会有怎样的后果。能施加这种压力的只有英国大使。因此，回忆一下同一个雷德克利夫勋爵以及他的唐宁街上司在 1848—1849 年对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破坏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权利的态度，是很有趣味的。

1848 年 6 月，当俄国军队初次开进莫尔达维亚国境时，帕麦

斯顿勋爵在下院回答忠实不变的达德利·斯图亚特的质问时说：

“俄军没有得到圣彼得堡内阁的命令开进了莫尔达维亚；它的目的只是维持或建立秩序，事后将立即撤出；它进入国境曾得到国君的同意，俄国无意占据这块地盘。”

1848年8月，当俄国军队再次渡过普鲁特河开往布加勒斯特，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派遣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御前会议曾向英法两国大使征求过意见并从雷德克利夫勋爵那里得到关于遵循俄国所规定的政治方针的建议。

10月，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共同占领瓦拉几亚时，俄国人追查某一个普通的瓦拉几亚军官一直找到布加勒斯特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的寓所，后者曾和傅阿德·埃芬蒂一起就此事提出抗议。土耳其政府知道这次受辱以后，声明它不愿意再跟俄国人打交道，并且命令它的军队撤到多瑙河右岸，不再参与实行俄国人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政策。同时，土耳其政府威胁要向各大国提出一项严正的抗议并以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发生的全部事情的详细备忘录作证明。又是那位大使再次出面干涉，并打消了土耳其政府的这一意图。

最后，当1849年俄土的联合占领具有恐怖制度的性质，并且瓦拉几亚非正规军首领马基耶罗孤军抵抗的时候，他不得不撤到喀尔巴阡山北，而“屈从于不列颠总领事提出的理由，这个总领事向他指出，他的军队在这里有碍外交家们的活动，并且指出他的国家不久将重新享有它的权利”。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0卷第328—333页）

马 克 思

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马德里报刊(摘录)

(1854 年 8 月 15 日)

可见，当时盟国的全盘计划不外是让俄国长驱直入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领地，而让联军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英法军队按兵不动和被歪曲解释的一切调动的原因。土耳其军队的英勇打乱了俄、英、法三国的巧妙计谋当然是“出乎意料的”。

在目前的西班牙革命爆发前几个月，我曾告诉《论坛报》的读者说，俄国的影响正用于挑起半岛上的骚动。俄国做这事并不需要直接的代理人。它有突然对伊萨伯拉女王和西班牙宫廷的可怕的失道寡义表示愤怒的《泰晤士报》——这个炮弹国王、奥地利的“年轻的希望”①、尼古拉和乔治四世的拥护者和朋友——为它效劳。此外，还有一些英国内阁的外交代表，而亲俄派大臣帕麦斯顿给他们画几幅半岛上的科堡王国的图画[88]，就能毫不困难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现在据可靠消息，不是别人，正是不列颠大使把奥当奈尔藏在自己的府邸，并说服现任财政大臣、银行家科耳亚多支付一笔为奥当奈尔和杜耳塞策划政变所需的款项。对于不相信俄国实际上已经插手西班牙事务的人，我以为可以让他回想一下累

① 即弗兰茨-约瑟夫。——编者注

翁岛上的事件。1820年，在加迪斯集结了大批军队准备开赴南美殖民地去。岛上的军队突然宣布拥护1812年宪法，其他地方的军队也纷纷响应。我们现在从参加维罗那会议的法国代表沙多勃利昂[89]那里知道，俄国曾经怂恿西班牙远征南美洲，而又勾引法国进军西班牙。另一方面，我们从美国总统① 的咨文中知道，俄国曾向他保证防止对南美洲的远征[90]。因此，不用太多的判断力就可以发现累翁岛上起义的主谋者。但我也可以举出另外的俄国温情脉脉地注目着西班牙半岛上的骚动的例子。德·马尔利安尼先生在他的《现代西班牙政治史》(1840年巴塞罗纳版)一书中，为证明俄国没有理由反对西班牙的立宪运动，他写道：

"在涅瓦河畔可以看到向宪法(1812年)宣过誓并从俄国皇帝的手中接受军旗的西班牙兵士。拿破仑在向俄国的罕有的进军中，曾把拘留在法国的西班牙战俘编成一个特别军团，法军失败后，这个军团投到了俄国人方面。亚历山大盛情地接待了这些西班牙人，让他们驻扎在彼得哥弗，皇后常去看他们。有一天，亚历山大命令他们集合在封冻的涅瓦河上，领着他们宣誓效忠西班牙宪法，同时授给他们皇后亲手缝制的旗帜。从那时起命名为'亚历山大皇帝'军团的这个军团，在喀琅施塔得登船开往加迪斯去了。这个军团1821年在奥康尼亚举行了争取恢复宪法的起义，证明了他们对涅瓦河上的誓言的忠诚。"

俄国在比利牛斯半岛通过英国进行阴谋活动，同时却在法国面前诽谤英国。譬如，我们在《新普鲁士报》上读到：英国背着法国策动了西班牙革命。

引起西班牙的骚动对俄国有什么利益呢？俄国的目的是在西方进行佯攻，挑起英法之间的分歧，最后引诱法国进行干涉。英国的亲俄派报刊已经报道，法国六月起义者在马德里修筑了街垒。在维罗那会议上也有人曾经对查理十世说过类似的话：

---

① 即门罗。——编者注

“西班牙军队所创造的先例，引起葡萄牙人的效法，也推广到那不勒斯和皮蒙特，并在各地树立了军队干涉改革和以武力强迫国家接受法律的危险榜样。皮蒙特发生起义后，法国（在里昂和其他地方）立即就发生了追求同样目的的运动。第四十五团的二十五名兵士在罗舍尔参加了贝尔顿的密谋。革命的西班牙使一些怪诞的捣乱分子返回了法国，于是两国的民主派便携手共同反对君主制度。”

我们根本不是要说西班牙革命是出自英国人和俄国人之手。绝不是。俄国只是在知道革命危机已经存在的时候促进混乱。但是，以后发生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反对俄国的阴谋总是不亚于反对本国政府的专制行为。1848年在瓦拉几亚曾是这样，现在1854年在西班牙又是这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0卷第430—432页）

恩 格 斯

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摘录)

(1855 年 4 月 17 日左右)

泛斯拉夫主义的最初形式是纯粹文艺的形式。它的创始人是**多勃罗夫斯基**(捷克人,斯拉夫方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和**科勒**(匈牙利外喀尔巴阡山的斯洛伐克诗人)。多勃罗夫斯基富有学者和研究家的热情,而科勒的政治思想很快占了优势。泛斯拉夫主义起初只满足于一些哀诗,它的诗歌的主题是过去的伟大,现在的耻辱、不幸和异族的压迫。"呵,上帝!难道大地上就找不到一个人能把正义交还给斯拉夫人吗?"关于建立一个迫使欧洲遵守它的法律的泛斯拉夫帝国的想法,那时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有所表露。但是,哀诗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单纯"为了斯拉夫人的正义"的呼吁也随之过去了。

有关斯拉夫人的政治、文学和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研究活动,在奥地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语言学家**沙法里克**、**科皮塔尔**和**米克洛希奇**以及历史学家**帕拉茨基**领导了这个运动,追随他们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天资较差或根本没有才能的学者,如**汉卡**和**盖伊**等人。捷克和塞尔维亚的光荣的历史时代都被作了色彩鲜明的描绘,以与这些民族目前受屈辱的悲惨处境相对照;正如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政治和神学在"哲学"的幌子下遭受批判一样,在奥地利,梅特涅认为,泛斯拉夫主义者利用语文学来鼓吹斯拉夫人统一的学说,并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它的目的显然是要根本改变奥地利各民族的

现状，甚至要把奥地利变成一个大斯拉夫帝国。

从波希米亚和克伦地亚往东，一直到黑海，语言的混杂情况真是令人吃惊。居住在邻接德国地区的斯拉夫人中间非民族化的过程，德国人的缓慢而不间断的推进，匈牙利人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结果使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被七百万密集的芬兰民族分割开来），插入斯拉夫族地区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和瓦拉几亚人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真正的语言上的巴比伦。村与村之间，几乎是田庄与田庄之间，语言都有变化。甚至在波希米亚，五百万居民中有二百万德意志人和三百万斯拉夫人，而且这些斯拉夫人三面受到德意志人的包围。奥地利的斯拉夫族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斯拉夫人的原有土地归还给斯拉夫人，把奥地利（提罗耳和伦巴第除外）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宣布近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全部无效，砍掉德国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匈牙利，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变成斯拉夫的城市——目前占有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不能同情这种行动的。而且，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别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有一个可笑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848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91]上，曾经想找出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语言，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最后与会者不得不讲他们所最痛恨的语言——**德语**。

因此，我们看到，奥地利的泛斯拉夫主义缺乏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因素：群众和统一。所以缺乏**群众**，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只掌握一部分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人民中没有什么威信，因此要同时反抗它所敌对的奥地利政府以及德意志民族和匈牙利民族，力量就不够了。所以没有**统一**，是因为泛斯拉夫主义派的统一原则是纯粹理想的原则，在第一次企图实现这种统一原则时，就因语言上的差别而遭到了失败。只要泛斯拉夫主义一直是纯粹奥地利的运

动，那末它不会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它会很快地找到它所需要的那种统一和群众的中心。

本世纪初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很快就使**俄国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土耳其的居民中大约有七百万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语最近似的一种语言，而宗教和**教会**语言（古斯拉夫语或教会斯拉夫语）则同俄国人的完全一样。俄国依靠自己的希腊正教教会领袖和庇护者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当中第一次开始进行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当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刚刚在奥地利生根的时候，俄国就立刻把它的谍报机关的分支伸展到自己盟国的地区。在它碰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地方，就根本不提宗教方面的问题，俄国仅仅表现为一个吸引一切斯拉夫人的中心，即团结各个复兴的斯拉夫民族的核心，它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总之，这里已经找到了所缺乏的群众和统一！泛斯拉夫主义一下子就落入了圈套。于是，它宣布了自己的判决。为了重新建立想象中的民族，泛斯拉夫主义者表示愿意为维护俄罗斯—蒙古人的野蛮统治而牺牲八百年来实际参加过的文明生活。难道这不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动地反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和力图使世界历史开倒车的运动的自然结果吗？

梅特涅在自己实力最雄厚的年代就已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并且觉察到了俄国的阴谋。他使用他所有的一切手段来镇压了这个运动。但是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那就是**迫害**。而唯一有效的手段——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的自由发展完全可以驱散斯拉夫怪影——是同他的一套卑鄙的政策相矛盾的。结果，在梅特涅垮台以后，1848 年斯拉夫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开展了，它席卷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居民阶层。然而这

个运动的极其反动的性质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当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运动显然是一种进步的运动的时候，——斯拉夫人却正是挽救了旧制度，使旧制度免于毁灭，使拉德茨基得以向明乔河推进，使文迪施格雷茨得以夺取维也纳。为了使奥地利完全依从于斯拉夫人，强大的**斯拉夫后备军**即俄国军队于1849年开进了匈牙利[92]，在那里强迫它接受和约。

如果说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同俄国的结合是它的一种自我斥责的话，那末奥地利同样明显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没有生命力，因为它决定接受、甚至呼请这种斯拉夫人的援助以反对它境内的三个刚刚具有历史生命力而且正在表现这种生命力的民族，即反对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从1848年起，对泛斯拉夫主义所欠的这笔债一直威胁着奥地利，意识到这笔债，是奥地利政策的主因。

奥地利已开始在本国领土上反对斯拉夫人，但是，如果不实行哪怕有部分的进步性质的政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各省的特权都废除了，实行了集中管理制来代替联邦管理制，提出承认一种**人为的**民族——**奥地利**民族来代替各种不同的民族。虽然这些新办法有一部分是针对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但是它们的重点却落在不大密集的斯拉夫族身上，德意志人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说国内对斯拉夫人的依赖因此而消除了，那末对俄国的依赖仍旧存在，所以必须哪怕是暂时地或在一定程度上结束这种直接的和屈辱的依赖状态。这就是奥地利在东方问题上奉行虽然是动摇的、但至少是公开宣布的反俄政策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泛斯拉夫主义并没有绝迹；它深受凌辱，它正在愤怒、沉默，并从在匈牙利进行干涉的时候起把俄国皇帝当做它命中注定的救世主。一旦俄国作为泛斯拉夫主义首领而采取公开行动，奥地利为了使自己生存不至于遭到威胁，是否会采取向匈牙利和波

兰让步的对策？考察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任务。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已经不仅是俄国，而是整个泛斯拉夫主义的阴谋有在欧洲废墟上建立自己统治的危险。所有斯拉夫人的联合具有显著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会日益增强，因此这种联合很快要迫使与它敌对的力量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波兰人，他们可尊敬的大部分是敌视泛斯拉夫主义的；也没有谈到假民主和假社会主义形式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种泛斯拉夫主义本质上同普通的露骨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它的漂亮言词和假仁假义。我们同样很少谈到德国思辨哲学的代表[93]，这些代表们因离奇的愚昧无知而堕落为俄国阴谋的工具。以后我们还要来谈这个问题，并将详细说明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与泛斯拉夫主义有关的问题。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1卷第221—225页）

恩格斯

俄国军队

（1855年11月2日左右）

在西方列强和俄国之间宣战的时候，英法报刊曾认为，俄国不会感到兵员不足，然而很快就会感到财力不足。他们估计，财政上的困难会削弱军队，使数百万的兵员（据说俄国在任何时候都能拿出这些兵力来对付敌人）难以调动。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虽然俄国在形式上被赶出了欧洲的一切大交易所，但是它却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贷款[94]；它虽然一再增发纸币，但是纸币并没有贬值；它的军队在行军期间，以那种只有在纯粹农业国里才可能采用的方式从居民方面得到了粮食和运输工具。尽管它的港口被封锁，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始终能够避开财政上的一切暗礁，而伦敦的聪明人曾断言它会碰上这些暗礁的。至于说到取之不尽的兵员，实际情形则完全不然。当英国采取在国内外招募志愿兵的办法而逐渐使它在克里木的军队增加到近四万人的时候，当法国仅在今年就征召了十四万人而不是八万人，并且已经能够向东方派出人数甚至超过佩利西埃作战所需的一支大军的时候，俄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在所有抽丁地区，已经两次普遍征兵，每次的比例大致是每一千名男丁中征十人，以后又普遍征召非常后备军，每一千名男丁中征二十三人，现在又颁布了为基干部队重新普遍征兵的法令，每一千名男丁中征召十人。平时的征兵比例，是在帝国的一半地区内平均每一千名男丁中约征五人，另一半地区则在下一年

度征兵。这样，整个帝国（不抽丁的省份当然除外）每年平均的征兵比例，是在每一千名男丁中征二点五人。可是，两年来的战争已迫使俄国在每一千名男丁中共征召五十三人，约占全国人口（包括男女居民）的 2.5%。可见，近两年来，每年的征兵数等于平时征兵数的十倍。假定法国在宣战后的两年中共征兵三十万人（这无疑是超过实际数目的），这在三千六百万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 $^{1}/_{120}$，每年的比例则为 $^{1}/_{240}$，也就是说，刚好是俄国已经不得不征召入伍的人数的 $^{1}/_{6}$。诚然，在平时，俄国每年征兵数约占全国人口的 $^{1}/_{900}$，法国则约占 $^{2}/_{900}$。但是由于俄国的现役期比法国的服役期长一倍多，所以就完全抵销了征兵比例上的差异。

我们从各方面听说，俄国已开始感觉到这样不断抽出男劳动力的影响，而法国却几乎还感觉不到这一点。据报道，在波兰尤其感到农业方面人手不足；这一事实的另一个证据，就是贵族对于不断抽走他们最强壮的农奴一事表示了很大的不满。一位显赫的贵族兰斯科伊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向贵族们发布了一项公告[95]，宣布亚历山大皇帝已用特别法令保证贵族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这就说明，农奴主中间的这些不满情绪的征兆已经使宫廷感到多么惊慌。

然而，这种接二连三的征兵的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军队的实际人数增加得并不多。假定抽丁地区内的男丁总数为二千二百万人（这无疑还是偏低的估计），那末两年来应征编入基干部队的不少于六十六万人，编入非常后备军的不少于五十六万人。诚然，非常后备军只实行了局部动员，大概为二十万人；这样，实际抽出的男劳动力约为八十六万人。那些在服役期最后五年或十年归休而在战争爆发前征召入伍的预备役兵士，也可以加在这个数字内；但是，他们大部分在 1853 年就已征召入伍，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把他们列入计算数字以内。

尽管有组成每个步兵团的第五营和第六营的这些预备兵员，尽管征召了六十六万新兵(其中一部分编入每团的前四个基干营，另一部分则分配到新编的第二期后备营，即各团的第七和第八营)，但是很多部队还远没有补齐自己的编制名额。这方面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南方军团司令利迭尔斯将军在尼古拉也夫发出的一项命令。他宣布，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附属南方军团的二十三个非常后备军大队①（二万三千人）应即编入基干部队，补充每团的第三营和第四营。但是这一措施仅能表明，南方军团所属的各团已经大量减员，因而需要把第三营和第四营的大部分兵士调到第一营和第二营，而他们空出的位置则由非常后备军的兵士填补。换句话说，在得到非常后备军兵士的补充以前，这些团的四个营的人数只勉强相当于两个满额的营。大部分人员还从未见过敌人、所有的部队从锡利斯特里亚会战以来一直没有参加过战斗的这样一支军队如果还减员这么多的话，那末，在克里木以及在亚洲的损失又该有多么大！俄国军队的真实景象就突然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使我们能够对俄军的损失作出一个估计，并且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征召入伍的六十六万多人并没有使军队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但是，这样巨大的、不相称的损失是由于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首先是在于新兵要进行长途行军：他们必须从居住地点走到省会，然后走到分配站，最后走到自己的团队，——他们到达团队以后的行军还不算在内。从皮尔姆行军到莫斯科，从莫斯科行军到维尔诺，最后从维尔诺行军到敖德萨或尼古拉也夫，这对于新兵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既然这种迢迢万里的强行军是按照象尼古拉这样一个人的最高旨意来进行的，他准确地规定

① “大队”一词在原稿上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字。——编者注

了到达的时间和出发的时间，并且对任何违背命令的行为都予以惩罚；既然这些旅、师、军都是急如星火地从帝国的一端被赶到另一端，而不顾有多少人由于疾病和疲惫而掉队；既然需要用一般的强行军速度从莫斯科走到皮列柯普，而这种强行军在其他国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从来不持续到两天以上的，——那末，巨大损失的原因就可以找出来了。除了兵士体力过度紧张以外，还要看到一点，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俄军主管部门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军需部门的管理工作恶劣所必然造成的混乱现象。同时应当注意到兵士在行军期间的给养方法，他们的给养是尽可能依靠沿途各地的居民来解决的。如果组织得好，这种方法在一个纯农业国里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在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军需部门和指挥官都把从农民那里征来的一部分备用品贪污自肥，这种方法就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困难。最后，还须估计到在下列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严重的计算错误，即军队散布在这样广阔的空间里，它们必须按照中央的统一命令运动，并且需要象钟表一样准确地执行这些命令，而这些命令所依据的一切前提却又都是错误的和没有根据的。1853 年的俄军几乎已全部从地面消失，却未能使敌人遭到相当于自己损失的三分之一的损失，造成这一可怕的事实的原因，不在于敌人的刀剑和子弹，不在于南俄罗斯许多地方无法避免的疾病，甚至也不在于使俄军大大减员的长途行军，而在于俄国兵士应征、受训、行军、操练、饮食、衣着、居住、接受指挥以及作战等所处的那些特殊的条件。

利迭尔斯将军最近的命令在另一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个命令公开承认，非常后备军的兵士完全没有作好对敌作战的准备。他劝老兵不要嘲笑新兵，不要因为新兵在队列中的动作不灵而轻视他们；这个命令承认新兵几乎没有受过队列训练，并且对操典也作了一些看来完全得到皇帝赞同的修改。不要拿没有用处的阅兵

式教练来引起兵士的“反感”；只应当训练兵士做最必需的动作，即：持枪、装弹、瞄准、射击、成纵队运动以及成散开队形运动，——其余的一切都被宣布为没有用处的阅兵式教练。就这样，一位俄国将军在皇帝的直接赞同下，指责整个俄军操典有三分之二是无用的蠢话，这些蠢话只能引起兵士对自己职务的反感。而这部操典却刚好是已故皇帝尼古拉所特别引以自豪的杰作！

每一个姿势和步伐都会引起伙伴们一阵大笑的“年轻的新兵”，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里都不能算作是新兵的。他们入伍六——十个月，却依然和刚放下犁耙时一样的不灵敏。不能借口说，长途行军使他们没有时间进行训练。拿破仑在他最后几次战局中，都是把刚经过两个星期训练的新兵编入相应的各个营，随后就把他们派往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他们在行军期间，无论在途中或在宿营地，都受到训练；当他们经过六个或八个星期的行军而编入部队时，已经被认为是适于执行勤务的兵士了。拿破仑把他的新兵训练成兵士，从来没有用过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即使在1813年，当他不得不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培养新的军官干部以及建立其他一切的时候，他的新兵从到达分配站后只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被他带上了萨克森的战场；而他的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对这些“粗野的新兵”已经做了些什么。在法国人的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和俄国人的笨手笨脚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别！这是俄国非常后备军军官无能的一个多么好的证明！而利迭尔斯竟声称，几乎所有这些军官都在军队中服务过，而且其中许多人还闻过火药味呢！

训练仅限于一些最必要的动作的操练这一点还表明，利迭尔斯对他的新增援部队的期望是什么。成散开队形和成纵队运动——这就是兵士受训的全部内容；根本没有正面展开，也根本没有由横队变成纵队的动作。俄国兵的确最不适于成横队运动，正象不适于成散开队形运动一样。他们的长处是成密集纵队进行战

斗，在这种战斗队形中，指挥官的严重错误引起的混乱最小，对会战的总进程的影响也不大，同时，勇敢但却被动的人群的合群本能可以弥补指挥官的过失。俄国兵好象草原上被狼追逐的野马一样，混乱地挤成一团，不易机动，无法控制，但却能坚守自己的阵地；敌人要费极大的力气，才能把他们打垮。然而，无论如何，横队在许多场合仍是必需的，甚至俄军也采用它，虽然不太经常。如果一支军队根本不会展开成横队，或者费了很大力气展开成横队以后，却不能再变成纵队而不引起全盘混乱，那末对它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1卷第636—641页）

恩 格 斯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

（1857 年 1 月底—2 月初）

英军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波斯湾占领了波斯最重要的港口布什尔，其借口无非是赫拉特这个不久前被波斯军队占领的阿富汗的公国[96]应当归谁所有的问题。赫拉特现在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它是西面和北面的波斯湾、里海和亚克萨尔特河同东面的印度河之间整个地区的战略中心；因此，一旦英国和俄国为了争夺亚洲的霸权而发生严重冲突（英国侵入波斯可能加速这一冲突），赫拉特就将成为双方争执的主要目标，而且可能成为双方最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战区。

赫拉特被赋予这样重要的意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凡是了解它的地理位置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波斯的内陆是四面环山的高原，水流不能外溢。这些水流不足以形成一个或几个中央湖泊；它们不是被广阔的沼泽地化为乌有，就是逐渐消失在干燥的大沙漠中。这个大沙漠占着波斯高原的绝大部分，形成了波斯西部和东北部之间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沙漠北面的边界是霍拉桑山脉，它由里海的东南角几乎向正东延伸，形成厄尔布尔士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连接线；霍拉桑山脉分出一道支脉向南延伸，将波斯沙漠跟灌溉较好的阿富汗地区分隔开来，而赫拉特正是位于这个分隔开来的地方。赫拉特周围是相当广阔而且特别肥沃的谷地，为它提供生存资料。在霍拉桑山脉的北面，有与其

南麓的沙漠相似的沙漠。几条象木尔加布河那样的大河，在这里也被沙漠化为乌有。但是奥克苏斯河与亚克萨尔特河，由于水势十分强大，冲过了沙漠，在下游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阔谷地。在亚克萨尔特河的那边，沙漠便逐渐带有南俄罗斯草原的性质，并且最后完全与它融合在一起。因此，在里海和英属印度之间有三个文化比较发达的不同地区：第一，波斯西部的几个城市：设剌子、休斯特尔、德黑兰、伊斯法罕；第二，阿富汗的几个城市：喀布尔、加兹尼、坎大哈；第三，土尔克斯坦的几个城市：希瓦、布哈拉、巴耳赫、萨马尔汗。在所有这些城市之间保持有相当频繁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的中心，自然是赫拉特。所有从里海到印度河以及从波斯湾到奥克苏斯河的道路，都在这个城市会合。赫拉特是喀布尔到德黑兰以及设剌子到巴耳赫途中的一个商队旅舍。经耶兹德和库希斯坦穿过波斯沙漠的那条沿途有绿洲的大驿路，直通向赫拉特；另一方面，从西亚细亚通往东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的唯一的一条绕过沙漠的道路，得经过霍拉桑山脉和赫拉特。

因此，赫拉特在强国的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坦，即波斯和奥克苏斯河北面地区的一个据点。谁占有赫拉特，谁就充分握有中央阵地的全部优势，因为以这一阵地为中心向任何方向进攻，比从伊朗或土尔克斯坦的其他任何城市进攻，都更加容易，更有把握获得胜利。同时，阿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巴耳赫、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城市彼此之间交通非常困难，即使从所有这些城市向赫拉特发起共同进攻，也很少有可能获得胜利。向赫拉特进攻的各纵队，几乎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而赫拉特如果有一位果敢的将军，却可以袭击它们并将它们各个击破。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从坎大哈、喀布尔和巴耳赫推进的各纵队，一定要比从阿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分进合击的各纵队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从阿富汗方面进攻时，是从山地到平原，而且可以完

全不经过沙漠，然而从里海和阿腊克斯河方面进攻时，只有一个纵队（从阿斯特拉巴德出发的）可以不经过沙漠，而其他各纵队则必须经过沙漠，以致完全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

以赫拉特为共同中心的三个文化中心，形成了三类不同的国家。在西边是波斯，土库曼彻条约已将它变成俄国的附属国。在东边是阿富汗和俾路支诸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喀布尔和坎大哈现在可以列为英印帝国的附属国。在北边是土尔克斯坦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这两个汗国虽然名义上中立，但当发生冲突时，它们几乎一定会倒向获胜可能性较大的一方。波斯实际上从属俄国，而阿富汗实际上从属英国，这种情况可由俄国已派兵去波斯，而英国已派兵去喀布尔的事实来证明。

俄国占有里海西岸和北岸的全部地区。巴库（距阿斯特拉巴德三百五十英里）和阿斯特拉罕（距阿斯特拉巴德七百五十英里），是两个可供设置军用仓库和集结预备队的上好地方。当俄国里海舰队控制着这个内海时，俄国可以很容易地向阿斯特拉巴德输送必需的物资和援军。在里海东岸通往咸海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有俄国的堡垒。由此向北方和东方，伸展出一道俄国的堡垒线，沿线散布有乌拉尔河流域哥萨克人的村庄，这道堡垒线早在1847年就已经由乌拉尔河推进到了恩巴河和土尔盖河，即向俄国统治下的吉尔吉斯诸汗国境内和咸海方向推进了一百五十——二百英里。此后，实际上已在咸海沿岸修筑了堡垒，现在在咸海和亚克萨尔特河上都有俄国的轮船航行。甚至有消息说，俄军已占领希瓦，不过这种说法至少还为时过早。

俄国人向中亚细亚或南亚细亚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时所必须遵循的作战路线，是自然条件规定了的。如果从陆路由高加索沿里海西南岸前进，就会遇到巨大的天然障碍——波斯北部的山脉，并且会使进攻的军队在到达主要目的地赫拉特之前必须通过一千

一百英里以上的路程。如果从陆路由奥连堡向赫拉特进攻，则进攻的军队不仅要经过那个使彼罗夫斯基的军队在征讨希瓦时遭到覆灭[97]的沙漠，而且还要经过两个同样不好客的沙漠。从奥连堡到赫拉特的距离，按直线计算有一千五百英里，但是如果俄国人从这一方向进攻，则奥连堡将是俄军能够选来作为作战基地的最近地点。此外，俄属阿尔明尼亚同奥连堡都几乎完全与俄国的中心隔绝，前者被高加索山脉所隔绝，后者被大草原所隔绝。要在这两个地方把夺取中亚细亚所必需的物资和军队集中起来，是根本谈不上的。因此，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横渡里海，以阿斯特拉罕和巴库作为基地，以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作为监视站，而且这条路到赫拉特总共只有五百英里。这条路线具有俄国所能期望的一切优越性。阿斯特拉罕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正如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位置一样。它位于俄国最大的一条河流的河口，而这条河流的上游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中心——大俄罗斯，所以它具有一切方便条件可被用来转运人员和弹药，以组成强大的远征军。由阿斯特拉罕乘轮船走四天，乘帆船则走八天，便能到达里海对岸的阿斯特拉巴德。里海本身无疑地是俄国的内海，而阿斯特拉巴德（现已被波斯沙赫献给俄国），则位于由西面到赫拉特这条唯一的道路上的起点。这条道路通过霍拉桑山脉，完全不经过沙漠。

俄国政府就是根据上述情况采取行动的。俄军准备在事态更加复杂时用来向赫拉特进攻的主力，现正向阿斯特拉巴德集中。此外，还有两个侧路纵队，不过它们与主力的协同至少是很成问题的，因而每个纵队都有独立的任务。集中在塔夫利兹的右路纵队，任务是掩护波斯西部边境，防止土耳其人向那里采取任何敌意行动，并在必要时开往哈马丹和休斯特尔，以掩护首都德黑兰，使它免受土军和在波斯湾布什尔港登陆的英军的进攻。左路纵队由奥

连堡进攻，很可能得到由阿斯特拉罕开往里海东岸的援军。它应当保证占有威海周围的地区，并向希瓦、布哈拉和萨马尔汗进发，争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或协助俄军作战；此外，还要尽量沿奥克苏斯河而上，向巴耳赫推进，以威胁英军在喀布尔附近的或靠近赫拉特的翼侧和后方。据我们所知，俄军各支队伍已在途中，而且中路纵队已抵阿斯特拉巴德，右路纵队已抵塔夫利兹。至于左路纵队的推进情况，大概在若干时间内我们还不会得到消息。

在英军方面，作战基地是印度河的上游地区；他们的仓库一定是设置在白沙瓦。他们已从那里向喀布尔派出了一个纵队，喀布尔距赫拉特按直线计算为四百英里。但当发生严重的战争时，英军除应占领喀布尔外，还应占领加兹尼、坎大哈，以及可用来防守阿富汗通路的各个山中堡垒。他们在这方面所要遇到的困难，未必比俄军占领阿斯特拉巴德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帮助阿富汗人反对波斯的侵犯。

英军从喀布尔至赫拉特的进军，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不需要向翼侧派出纵队，因为俄军的任何一支侧路纵队都不可能接近这个地区；而如果奥连堡纵队经过几天行军后由布哈拉进抵巴耳赫，那末喀布尔的强大预备队会立即予以迎头痛击。英军占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作战线比较短；因为，虽然赫拉特恰恰位于加尔各答和莫斯科的正中间，但是英国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汇合处附近的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只有六百英里，而俄国在阿斯特拉罕的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则为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喀布尔的英军距离赫拉特比阿斯特拉巴德的俄军距离赫拉特近一百英里，而且据我们所知道的地形条件，英军所经过的地区，耕作较好，居民较多，道路也比俄军在霍拉桑可能遇到的要好。至于谈到两国的军队，那末英军无疑在适应气候方面胜过俄军。英军的欧洲团队无疑将和他们在因克尔芒的伙伴们一样具有坚韧不拔的刚毅精神，而对

西帕依步兵[98]也丝毫不能轻视。查理·纳皮尔爵士——而他从头到脚是统帅也是兵士——曾在多次战斗中亲自看到过西帕依作战的情况，对他们极为推崇。正规的印度骑兵价值不大，可是非正规的印度骑兵却很出色，他们在欧洲军官的指挥下，无疑地将胜过哥萨克骑兵。

当然，再继续议论这样一次战争的前景，是完全无益的。没有可能猜出双方会派出多少军队。无法预见现在看来正在临近的这种重要事变一旦到来时所要发生的全部情况。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由于双方到赫拉特都需要通过很远的路程，所以双方在赫拉特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地区用来决定斗争结局的军队，都不会太多。这次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决定于赫拉特周围各国宫廷中的外交阴谋活动和贿买活动。在这些活动方面，俄国人几乎一定会占上风。他们的外交办得较好，而且带有更多的东方特色：他们知道如何在必要时不吝惜金钱，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在敌人内部有自己的朋友。英国向波斯湾的远征，只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行动。这一行动虽能吸引住很大一部分波斯军队，但不能取得很多的直接战果。即使把现在驻在布什尔的五千人增加两倍，英军顶多也只能进到设刺子为止。但是这次远征本来也并不指望更多的东西。如果它能让波斯政府看到，这个国家可能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那末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对英军的这次远征抱有更大的期望，那是荒谬的。因为真正决定整个伊朗和土尔克斯坦命运的路线，是从阿斯特拉巴德到白沙瓦这条路线，而在这条路线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是赫拉特。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第133—139页）

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

（1857年3月18日左右）

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和我们[①]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至于法国人，他们之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固然，据说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做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于天朝的朝廷。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象在欧洲一样，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

既然俄国人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他们从来就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没有利害关系，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卷入这种纠纷里去；因此，中国人的反感也就没有扩展到俄国人身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而且不是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大概经常出没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冒

① 指美国人。——编者注

险家相提并论。不过，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这种由1768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①]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离城约一百英里。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管，其中六个是俄国人，六个是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由于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换的商品比例。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几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四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十七万五千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至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一千五百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②]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十一万二千箱。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

① 指蒙古。——编者注

② 指太平军起义。——编者注

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九百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了，欧洲就只能从这条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海上贸易将重新开放，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里巴瓦两港同位于俄国中部的古城——下新城（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地）之间的交通。欧洲将经由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这要比利用我们所设计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有远为更大的可能。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由于它的体积远远小于它的价值，由陆路运输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①期间曾经一度中断，但是，无疑地，它将来会大力恢复这种努力的。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个舰队，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这与扩大已经为它垄断的陆路贸易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1页）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马 克 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摘录)

(1858年9月28日)

"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99] 所做的结论;同时,这家报纸还嘲笑"条约中最精彩的一点",即"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但是,无论约翰牛怎样用这个玩笑来寻开心,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自然,这种回顾对于约翰牛来说是不愉快的。伦敦《泰晤士报》为此深深感到痛心,所以当它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消息时,竟将电报中有关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那一部分故意删去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34—35页)

马 克 思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

（1858 年 10 月 1 日）

农奴制问题目前在俄国似乎要发生一个严重的转折；这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采取这样一个非常措施，即在圣彼得堡召开一次可说是全体贵族代表会议来讨论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农民事务总委员会[100]的工作已几乎完全失败，只不过引起了各委员之间的激烈争吵，在这场争吵中，该委员会的主席康斯坦丁大公是偏袒反对沙皇的旧俄罗斯派的。省贵族委员会似乎大部分也是利用正式讨论解放农民的预备步骤的机会，一心来阻挠这个措施。在俄国贵族中当然有一派人是主张废除农奴制的，但是他们为数甚少，而且在一些最重大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口头上反对奴役，但是只答应在使解放有名无实的条件下给予解放，这种态度甚至在俄国自由派贵族中似乎也是很流行的。其实，老农奴主对解放农民采取的这种公开的反抗或缺乏诚意的支持，完全是很自然的。收入减少，地产跌价，他们作为围绕着中央暴君旋转的许多小暴君所惯于享有的政治权利受到严重侵犯，——这就是他们会预料到的、也是很难期望他们会乐于承受的直接后果。在一些省份里，现在就已经不能用地产作抵押筹得信用贷款了，因为谁也说不定地产是否不久就会贬值。俄国有很大一部分地产是抵押在国家自己手中，那些地产的所有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将如何履行对政府的义务呢？许多地主的地产有私债的负担。许多地主是靠定居在城市里当商贩、手工业者和帮工的农奴缴纳租赋过日子的。当然，这些收入会随着农奴制的废除

而消失。还有一些小贵族，他们拥有的农奴数目很有限，但是拥有的土地还要少。如果每一个农奴都领到一块土地（一旦解放必定如此），那末这些农奴的主人就会变成乞丐了。对于大地主说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解放农民几乎等于放弃权势地位。如果农奴被解放，这些地主还能凭借什么去抵制皇帝的专横呢？此外，俄国如此需要的并且取决于土地实际价值的赋税将从何而来呢？国有农民又将如何处理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并且构成了农奴制拥护者们借以藏身的许多坚固阵地。这是象各国人民的历史一样古老的故事。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当到了需要进行改革的时候，起初总是表现得热情洋溢；人们兴高采烈地互相祝贺彼此的善良愿望，冠冕堂皇地大谈其对进步的普遍热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一旦到了说话要用行动兑现的时候，有些人就害怕被他们召来的鬼魂而向后退缩，而大多数人则表示决心捍卫自己实际的或想象的利益了。欧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关系才能废止农奴制。普鲁士政府只是在吃到拿破仑铁枷的苦头以后才敢于考虑解放农民；然而即使那时它对这个问题也解决得不彻底，以致不得不在1848年重新予以解决，并且，这个问题尽管在形式上已有所改变，仍然有待于在未来的革命中予以彻底解决。在奥地利，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合法政府，也不是统治阶级的善良意志，而是1848年革命和匈牙利起义。在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并不是由于什么人道观念，而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企图用和平方法改变人民群众的状况[101]，但是他们两人都失败了。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尼古拉背弃了他自己过去提出的解放农奴的计划，而变成了一个最顽固的保守派。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则是否要唤醒那些沉睡的力量，对他来说

未必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战争，使俄国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的规模之大，单凭这一件事实就可以想见了：在1853—1856年这段时期，强迫流通的纸币从三亿三千三百万卢布增长到大约七亿卢布，而这全部增长的纸币数量实际上只是国家预先征收的赋税。亚历山大二世只是仿效亚历山大一世在与拿破仑作战时的做法，用解放的诺言鼓舞农民。再说，战争以丢脸的失败告终，至少在那些决不可能通晓外交秘密的农奴看来是如此。以这种明显的失败和丢脸来开始他的朝代，并且还公开违背在战时向农民所许的诺言，——这种做法甚至对于沙皇说来也是太冒险了。

甚至尼古拉本人，不管是否发生东方战争，能否更久地拖延这个问题，都是令人怀疑的事情。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就无论如何没有这种可能了；但是他曾认为（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向服从惯了的贵族不会违抗他的命令，如果让他们通过各种贵族委员会在这出大戏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甚至还会引以为荣的。然而这种估计落空了。另一方面，农民对沙皇打算给他们做的事情甚至抱有过分夸大的想法，他们对于自己领主们迟疑不决的做法已感到不能忍受。好几个省份里发生的纵火事件，就是意义很清楚的危险信号。其次，大家知道，在大俄罗斯和过去属于波兰的各省都发生了情景非常可怕的暴动，结果使贵族们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在那里借着城墙和驻防军的保护，才能不怕愤怒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必须召开一次类似贵族会议的集会。如果这次会议成为俄国历史上一个新的起点，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如果贵族们一定要坚持以自己的政治解放作为在解放农奴问题上向沙皇让步的先决条件，那末结局又将如何呢？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第627—630页）

恩 格 斯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102]

（1858年10月8日左右）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曾指出[①]俄国近年来在东亚细亚，即在太平洋西岸有着极顺利的进展。今天，我们要请读者注意这同一个大国在另一方面，即在中亚细亚的同样顺利的进展。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生冲突的问题，自从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103]以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这两国军队的第一次远征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气候而遭到的失败，有一个时期使人们对议论不感兴趣。英国曾以成功的然而一无所得的进军喀布尔来弥补自己的失败。俄国似乎是默默地忍受了自己的耻辱，可是我们就会看到，它丝毫也没有想到要放弃自己的计划，而且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但是那时大家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俄国的先遣部队已推进到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在哪一个方向进行侦察。印度报纸偶尔登载一些关于俄国在中亚细亚的征服地的报道，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它们。最后，在1856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重新引起了讨论。

---

① 见本书第116页。——编者注

但是近来中亚细亚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急速地变化着①。当1812年拿破仑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莫斯科作为向印度进军的作战基地时，他只是步彼得大帝的后尘而已。还在1717年，这位深谋远虑的、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就曾派军队远征希瓦，当然，那次远征是失败了。此后，俄国在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去破坏土尔克斯坦草原上的安宁，不过这时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地区内却移去了许多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建立了哥萨克军屯。但在乌拉尔河彼岸，俄国对吉尔吉斯人的

① 在1858年11月24日《自由新闻》刊载的原文中，文章从开头到"当1812年"这几个字之前是这样的："兹附上从我所作的关于俄国近来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的札记中摘录的**几段文字**。可能，这些材料有一部分对你们是新鲜的，因为据我所知，在圣彼得堡用俄文公布的、作为这些材料的主要来源的俄国官方文件，还没有来到英国。

只要注意一下年月日，就会发现帕麦斯顿勋爵的行动与俄国对中亚细亚的侵略之间的联系。例如：1839年俄军向希瓦推进，尽管他们遭到军事上的失败；1854年俄国在希瓦最后固定下来，虽然它只作了简单的军事示威，也没有发出一枪一炮；1856年俄军匆匆通过吉尔吉斯草原向土尔克斯坦东南部进军，恰巧这时，在印度发生了起义。在俄国官方文件中，只提到已经发生的事实(faits accomplis)；当然，事件的内幕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而在整个这出戏里只不过充当点缀品的武装力量，却被描绘成主要的登场人物。因为你们已很熟悉这个问题在外交上的全部经过，我在所摘录的文字里就只限于按俄国自己的说法来叙**述事实**。我仅就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从军事观点来看对印度有什么意义，补充了几点看法。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亚历山大二世公布了关于俄国入侵北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的文件，而尼古拉是一直用心良苦地不肯把这些文件公布于世的。一般来讲，关于亚历山大可以这样说，他做到了他父亲没有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让欧洲知道俄国的秘密的'亚洲'计划，从而使欧洲成为他在制定这些计划时的公开同谋者。其次，这些文件实质上只有学问渊博的德国人才能看懂，因为他们珍视亚历山大对发展地理科学的宽容态度。再者，克里木战争以后，老莫斯科派由于俄国丧失了它的威信而愚顽不化地一再表示不满。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就以公布文件来答复他们，从文件中不仅可以看出俄国最近一年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而且公布文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就是对'威信'的坚决肯定；这是尼古拉从来下不了决心去做的事。"

接下去那一部分文章的标题是：《俄国文件概述》。——编者注

三个汗国或部落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名义上，到1833年瓦西里·彼罗夫斯基将军被派往奥连堡担任总督以前，俄国的商队总是遭到吉尔吉斯人和希瓦人的抢劫。彼罗夫斯基发现，由于这些游牧民族的袭击，俄国同亚细亚内地和南部各地区的贸易往来完全被切断了，因为甚至近几年来护送商队的武装护卫队也不能保护商队。彼罗夫斯基为了结束这种状态，首先组织了流动纵队来对付吉尔吉斯人，接着很快就在他们的地域上布置了哥萨克兵哨。他用这种办法在几年内使吉尔吉斯人屈服于俄国的实际控制和统治之下，然后便着手实现彼得大帝很久以前制定的征讨希瓦的计划。

彼罗夫斯基得到俄皇的许可后，组织了一支军队，人数大约相当于一个步兵师（八千人），并附有许多半正规的哥萨克骑兵和非正规的巴什基里亚骑兵和吉尔吉斯骑兵的队伍。征集了一万五千头骆驼在荒漠的草原上往来运输给养。由于缺水的缘故，没有可能在夏季进行远征。因此，彼罗夫斯基选定在冬季作战，并在1839年11月由奥连堡出动。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知道。暴风雪和严寒摧毁了他的军队，冻死了他的骆驼和马匹，使他损失惨重，不得不撤退。虽然如此，这次进军的公开目的还是达到了：当英国还一直不能替在布哈拉被杀的使节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复仇的时候，希瓦可汗释放了全体俄国俘虏，并派使节到圣彼得堡去求和。

这时彼罗夫斯基着手开辟一条取道吉尔吉斯草原的交通线。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科学考察团和工程勘察队就已开始进行工作，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考察了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和咸海以北的整个区域。对于土壤的特性、修筑道路的最好线路以及开凿大水井的最适宜的地点，都作了调查。他们把这些水井钻凿或者挖掘在彼此相隔不远的距离内，在水井四周筑起足以抵御游牧部落任何袭击的坚固工事，在工事里面留有相当宽阔的地方用以贮藏大

量的粮食。奥克苏斯河上的卡腊布拉克和伊尔吉兹河上的伊尔吉兹，成了保卫吉尔吉斯草原南部的中心据点；在这两个地方和乌拉尔河沿岸各城市之间，道路两旁都修筑了小型堡垒，在每相距十英里或十二英里① 的地方开凿了水井。

在1847年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在锡尔河上离河口约四十五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取名阿腊耳斯克。里面可以容纳一个营以上的守备部队。阿腊耳斯克马上就成为分布在锡尔河下游以及与该河邻接的咸海沿岸的广阔的俄国农业移垦区的中心，这时，俄国便正式占有了咸海和锡尔河三角洲以北的全部地区。在1848年和1849年，咸海第一次受到详细的勘察；发现了一群新的岛屿，它们立刻就被划作不久就要着手建造的咸海汽船队的主要停泊处。在对着锡尔河河口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另一座堡垒，同时奥连堡和咸海之间的交通线也得到进一步加固并修竣完工。

1842年卸去奥连堡总督职务的彼罗夫斯基，现在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并于1853年春天率领大军向阿腊耳斯克推进。军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就穿过了沙漠，然后沿锡尔河向上游前进，当时还有浅水汽船沿河伴行。俄军来到离河口约四百五十英里、隶属于浩罕可汗的阿克麦吉特要塞时，便把它一举攻了下来，并立刻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要塞，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以致同年12月浩罕军队在进攻这个要塞时遭到了惨败。

1854年，当欧洲的注意力投向多瑙河和克里木的战事时，彼罗夫斯基率领了一万七千人的军队，从锡尔河上新建立的作战基地向希瓦推进。但是希瓦可汗没有坐等他到达奥克苏斯河就派使者前往俄国军营，双方签订了条约，**按照条约，希瓦可汗承认俄国**

---

① 在《自由新闻》上不是印作"十二英里"，而是"二十英里"。——编者注

的最高权力，将宣战权和媾和权让给俄国，把统治本国臣民的无限权力移交给俄国，俄国永远有权确定商队的线路，规定捐税和关税，调整希瓦全境的贸易。在希瓦驻有俄国领事，他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也负责全权裁决希瓦的一切政治事务。

随着希瓦的归顺，关于征服土尔克斯坦的问题实质上已经解决；也许现在这个问题在事实上也已经解决了。浩罕可汗和布哈拉可汗也曾派使节到圣彼得堡；俄国同他们签订的条约虽然没有公布，但是条约的内容可想而知。这些小国家唯一的力量就在于它们难以被人攻破，可是目前，至少对俄国来说，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以不论俄国愿意让这些小国家有多大程度的独立，这种独立终究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因为只要从希瓦或阿克麦吉特派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到比较富饶的上土尔克斯坦盆地去，就完全可以镇压任何反抗的企图和横扫全境。应当说，俄国在1854年以后并没有对这些地区置之不理，尽管它行动十分诡密；而既然它在最近二十五年来在土尔克斯坦迅速地、悄悄地和连续不断地获得了成就，就很有把握可以预料，它的国旗不久将在兴都库什山和博洛尔塔格山的山隘上飘扬。

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们而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军这样深入中亚细亚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计划，已经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轮廓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同温带地区为一片宽阔的、从波斯湾沿岸径直穿过整个大陆而通向黑龙江发源地的沙漠地带分隔开来。这个沙漠地带——姑且不说黑龙江沿岸地区——直到最近为止，军队几乎不能通行；唯一可以设想的穿越这个地带的道路，是由里海的阿斯特拉巴德取道赫拉特到喀布尔，再往印度河这样一条道路。但是现在俄军驻在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和奥克苏斯河（阿姆河）下游，而且有了供给军队用水和粮食

的军用道路和堡垒以后，中亚细亚沙漠就不再是军事上的障碍了。俄国本来只有一条未修好的、由阿斯特拉巴德经由赫拉特通往印度河的道路，而现在有三条不同的道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准备好供行军之用。首先是一条穿越赫拉特的老路，在目前局势下这条路不可能再对俄国封锁起来；其次，是从希瓦到巴耳赫的奥克苏斯谷地；第三是从阿克麦吉特到霍德仁特的锡尔河谷地，从这里军队可以通过水源充足和人烟稠密的地区到撒马尔汗和巴耳赫。赫拉特、撒马尔汗和巴耳赫可以成为攻打印度的一个极好的作战基地。巴耳赫距离英印帝国的西北前哨白沙瓦总共才五百英里。撒马尔汗和巴耳赫都隶属于布哈拉可汗，布哈拉可汗现在已经完全依靠俄国；要是阿斯特拉巴德（它不是已经被俄国人占领，就是随时可能被他们占领）和巴耳赫将来落在俄国手中，只要俄国决心攻占赫拉特，赫拉特就保不住。一旦这样的作战基地实际上为俄国所占有，英国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印度帝国而斗争了。从巴耳赫到喀布尔，不见得比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更远一些，仅仅这一件事实就已经证明，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中立地带现在是多么狭窄。

十分清楚，如果俄国人的进展继续保持着最近二十五年内所采取的那种速度、那种精力和始终不渝的精神，那末再过十年或十五年，俄国人就将直叩印度的大门了。他们只要穿过吉尔吉斯草原，就进入土尔克斯坦东南方那些耕种较好和肥沃富饶的地区，在征服这些地区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这些地区可以在许多年内毫不费力地维持一支拥有五万或六万人，完全足够向任何地方，直至印度河进军的军队。象这样一支军队在十年内就可以征服全境、成立警卫队保护修筑道路和保护俄国国家农民垦殖广阔的土地（就象目前在咸海所做的一样）、使周围的国家慑服、准备同印度作战时所需要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是否会在什么时

候进行这种进军，那要取决于目前只能作为渺茫推测对象的政治条件①。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第636—642页）

① 《自由新闻》上刊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担保，凡是研究过这个国度的地理的军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我们的推测正确无误，那末'哥萨克同西帕依'（假如那时还有愿意替英国效劳的西帕依）之间的搏斗，就不会象原来推测的那样，发生在奥克苏斯河沿岸，而是发生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沿岸。"——编者注

恩 格 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1858 年 10 月 25 日左右）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实现了。虽然格拉克列亚半岛[104]上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块不大的领土[105]，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毕竟还是得到不少好处。“病夫”[106]的状况更是大大恶化了；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希腊人或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比任何时候都更认为俄国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最近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就已表现出来的并且为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极端衰竭和软弱，已足以说明苏丹的全体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普遍地激动不安。因此，俄国以暂时牺牲一小块领土为代价（因为很明显，俄国一有机会就要收回这块领土），在实现它对土耳其的计划方面推进了很远。加紧分裂土耳其和确立自己对于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刚开始时竭力追求的目的；而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

这样，俄国甚至由于这场对它不利的战争也得到了好处。可是，俄国还是要实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没有人能与它匹敌的领域——外交领域。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战

争时，俄国则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俄国这时的处境确是少有的顺利。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所谈的是其中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并且在英国国内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本国皇帝的意旨行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和该河南岸满洲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进行了铁路线的勘查工作并预定了未来的城市和港口的地点。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尽管它正好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挺身出来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

各参战国得到的利益（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而且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①，这些利益大部分都是虚妄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的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度棉花以外），还是应该象过去一样，主要只限于中国商品即茶叶和丝的出口，并且这种出口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给予多少方便，不如说是取决于外国的需求。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前，世界各国已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35页。——编者注

经设法弄到茶叶和丝，而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在长江上开放贸易，为了谨慎起见，在中国皇帝还不能完全恢复自己在长江沿岸起义地区内的权力以前，必须延期，也就是说遥遥无期。但是关于这个新条约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说，英中条约第二十八款所规定的子口税纯属虚构。过去曾有人认为这种税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意见所持的根据，只是说中国人不很需要英国商品，因此这种商品根本就不销往内地，然而有些能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经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却甚至销到沿海各地。人们没有想到，如果这种子口税是存在的，那末它们也会象适用于英国商品一样适用于俄国商品。可是，曾被专门派往中国内地的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未能发现这种假想的“子口税”，他在答复人们公开向他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承认，他已“痛心地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不了解实在是极其明显的无知”[107]。另一方面，英国贸易大臣约·沃·汉利通过报纸回答“是否有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内地税”的问题时，十分清楚地说道：“对于你们感兴趣的、有无关于中国内地税的材料问题，我无法奉告。”这样，约翰牛除了颇不愉快地意识到额尔金勋爵在要求赔款时未规定付款期限，并且将战事由广州转到京都只是为了订立一个将使英国军队重新由京都回到广州去作战的条约以外，脑子里还产生了一种模糊的疑虑，以为英国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偿付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因为第二十八款很可能诱使中国当局对英国制造品规定7.5%的子口税，这种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为2.5%的进口税。伦敦《泰晤士报》为了不让约翰牛过细考察自己的条约，认为必须假装迁怒于美国公使，气势汹汹地责骂他把事情弄糟了，虽然事实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失

败毫不相干。

因此，就英国的贸易来说，和约所带来的只是新的进口税和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是中国人无法遵守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英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领土——如果它不给予法国同样的权利，就不能提出领土要求，可是让法国借助英国进行的战争来在中国沿海得到领土，对于英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至于俄国，它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所以现在这项工作又该重新开始了。其次，在条约中有关于调整恰克图和北京之间的邮政的条款。从前那种不定期的、只为中国当局所容忍的通信路线，现在要变成定期组织的和法定的通信路线。在这两个地点之间预定每月有一次邮政交通，而且相距约一千英里的路程只需走十五天；此外，在这条路上，每隔三个月将派出一支商队。无疑地，中国人或者不愿执行或者不能执行这个职务；既然邮政交通现在已作为权利赋予俄国，其结果是这种交通将逐渐转入俄国人手里。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①；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关于不列颠统治中国的梦想将完全破灭，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

不难想象，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有什么样的结果。请回想

① 本书第170—176页。——编者注

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外交总是占上风。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大军队和一条供这支军队顺利进军的道路，——这样一位俄国公使在北京将是威风凛凛的，有谁能怀疑这一点呢？

十分显然，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战略阵地之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之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土尔克斯坦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而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亚洲的举足轻重的国家。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36—40页）

马克思

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1858年12月29、31日）

（一）

1858年12月29日于柏林

俄国革命的伟大“首倡者”（用马志尼的说法）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又向前跨出了一步。11月13日，掌管废除农奴制事务的御前总委员会[108]终于签署了一封给皇帝的奏折，其中陈述了建议据以实行农奴解放的基本办法。这封奏折的基本原则如下：

第一篇，农民立即停止为农奴，而进入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的状态。这种状态应延续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们享有帝国所有其他纳税臣民所享有的一切人身权和财产权。农奴的依附关系及其一切后果，永远被废除，对过去的主人不付任何赔偿；因为如奏折中所说，农奴的依附关系是沙皇波利斯·戈东诺夫任意推行的①，

① 这种说法决不正确。波利斯·戈东诺夫（1601年11月2日敕谕）剥夺了农民在帝国土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把他们固定在他们由于出生或居住所隶属的领地上。在他几位继承者的统治下，贵族对农民的权力迅速扩大，不久所有的农民便真正成为农奴。但是这仍然只是贵族方面非法的越权行为，到1723年彼得大帝才使它合法化。农民没有摆脱把他们束缚在领地上的羁绊，现在又被变成贵族地主的个人财产；地主获得权利把他们单个地或成批地，随着土地或不随着土地出售，由于这个缘故，他本人便开始向政府对农民及其赋税负责。后来，叶卡特林娜二世大笔一挥又把新得到的西部和南部各省中的四五百万比较自由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但是，在俄国的官方文件中是不便提到有关彼得一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这种事实的，于是要倒霉的波利斯·戈东诺夫来为他的所有继承者的罪孽负责。

后来由于滥用职权才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然是由君主的意志产生的，也就可以由君主的意志废除。至于为废除它而偿付赎金的问题，用奏折中的话来说，这种用缴钱换取权利的办法，会构成俄国历史上真正可耻的一页，因为这些权利是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

第二篇，农民在负有暂时义务的十二年当中，仍然继续固定在领地上；但是如果地主不能供给他至少五俄亩土地自己耕种，他可以自由离开领地。如果他能找到人耕种他的份地，并替他向官府完纳赋税，他也可以同样自由离去。

第三篇和第四篇，每个村社得保有社员的住房及其庭院、畜舍、菜园等等，但每年须向地主缴纳这些财产估价的 3 %的租金。村社有权迫使地主接受由两个地主和两个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对这些财产进行估价。只要村社愿意，它可以付清估价，把自己的家园赎回归自己所有。

第五篇，地主应该给予农民的份地是这样规定的：在固定于领地上的每个农奴平均有六俄亩以上的地方，每个成年男性农民可分得九俄亩耕地；在土地较少的地方，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分给农民；在固定于领地上的农民太多，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不能使每个成年男性农民至少分得五俄亩的地方，把土地划分成五俄亩一块的份地，而那些抽签没有抽到份地的农民，可向村政府领取身分证，随意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去。至于柴草，地主应该按照事先规定的价钱由自己的树林子里向农民提供。

第六篇，为了这些利益，农民应该给地主服以下的徭役：为领到的每一俄亩份地，要给地主做十天用马的工和十天不用马的工（如果领到九俄亩份地，一年就得出一百八十天工）。按照这个标准，每个地方行政区（省）的农民徭役的价值可以用货币定出来，因为一天徭役的价值只等于自由工人一天劳动的价值的三分之一。

在过了头七年以后，这种徭役的七分之一，此后每过一年又有七分之一，可以折成谷物代役租。

第七篇，家务农奴，即那些不是固定于一定领地，而是固定于地主宅邸或服侍地主本人的农奴，必须为他们的主人服务十年，但是领取薪资。不过他们可以随时赎买自己的自由，男子须缴三百卢布，女子须缴一百二十卢布。

第九篇，地主仍然是村社的首脑，有权否决村社的决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准许向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提出申诉。

这个重要文件的内容就是这样，它间接地反映出了亚历山大二世对俄国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的观点。我省略了专门谈村社组织的第八篇，以及只不过说明有关这种改革的官方文件应该采取的法定形式的第十篇。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这封奏折实质上只不过是总委员会今年春天向帝国各地各种贵族会议提出的纲领的继续和发展。那个纲领——它的十条完全相当于奏折中的十篇，——实际上只是一个纲要，草拟它的目的在于向贵族指出行动的方向，并指望他们对它加以补充。但是，贵族愈深入这个问题，他们的反感就愈大；极有意义的是，八个月以后，政府不得不自己来充实这个纲要，制定出那个本来是设想为贵族的自发行动的计划。

关于上述文件的来历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来看它的内容。

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109]。的确，请设想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110]；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 samoderjetz

vserossiiski ①，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象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这封奏折中所涉及的头一个当事人就是贵族。如果贵族不肯庆祝自己的8月4日，那末政府十分坦率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将被迫这样做。奏折的每一篇对于贵族说来都包含着痛心的物质损失。贵族运用他们的活人资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农奴租出去，或者让他们出门随意谋生而缴纳一定的年金（obrok ②）。这种做法再好不过地既满足贵族的腰包，又符合俄国农奴的漂泊生活方式。这是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第一篇就规定要毫无补偿地取消它。不仅如此。根据第二篇，地主不能分给五俄亩耕地的每个农奴，可以自由行使权利，去他所想去的地方。根据第三篇至第五篇，地主对他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失去自由处理的权利，而被迫把它分配给农民。的确，农民现在也占有着这些土地，但是还是处在地主的控制之下，并且必须执行完全由地主所规定的各项徭役。可是今后土地实际上应该属于农民，他们成为土地的永久持有者，他们获得完全赎买自己家园的权利，他们的徭役虽然规定得很多，但毕竟是要由法律加以严格限定的；更糟的是，农民可以按照（对他们）很有利的价格通过赎买来摆脱这些徭役。甚至dvorovye ③，即地主家中的仆役，也应当领取工钱，并且如果愿意，可以赎买自己的自由。还要更糟糕的是，农奴应该获得与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这就是说，他们将有他们至今从来不知道的控告主人和在法庭上作证反对主人的权利；虽然地主在其领地上仍然是农民的

① “全俄罗斯独裁者”，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② “代役租”，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③ “家务农奴”，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首脑，对他们保有一定的司法权利，可是使大部分俄国贵族得以积蓄金钱去供养巴黎时髦女郎和在德国温泉疗养地肆意赌博的横征暴敛将要大大地缩减。然而，为了判断这种收入的缩减可能对俄国贵族发生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财政状况吧。俄国所有土地贵族向各信用银行（由国家设立）借了共计四亿银卢布的债款，为此给这些银行抵押了大约一千三百万名农奴。俄国农奴总数（不包括国有农奴）为二千三百七十五万人（按1857年人口调查）。显然，银行的主要债务人是较小的农奴主，而较大的农奴主则很少负债。1857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大约有一千三百万名农奴属于拥有一千名农奴以下的地主，而其余的一千零七十五万名农奴则属于拥有一千名农奴以上的地主。由此可见，后者大致是俄国贵族中不负债的，而前者则是负债的。这种算法也许不十分精确，但是一般说来可以认为是相当正确的。

按照1857年的人口调查，拥有一个到九百九十九个农奴的地主是一万零五千五百四十人，而拥有一千个农奴以上的贵族则不超过四千零一十五人。这样，可见按照最低的估计，俄国全部贵族中有十分之九都对信用银行，也就是说对国家负有大量债务。但是，大家知道，俄国贵族此外还欠了私人、银行家、商人、犹太人和高利贷者许多的债，并且大多数贵族负债都非常沉重，以致对他们的地产只保有名义上的所有权。那些还在与破产进行挣扎的贵族，被最近这场战争的沉重牺牲完全拖垮了，因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要担负沉重的捐税，出人出钱出徭役，而且还无处销售他们的产品，于是不得不按极端苛刻的条件去借债。而如今要他们毫无补偿地把大部分收入完全放弃，并且对剩下的部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处理，即不仅要缩减它，而且今后还要把它继续保持在缩减的限度以内。

对于象俄国这样的贵族说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很容易预料

到的。除非他们愿意看到他们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完全垮台或立即破产，而在将来溶化在那个完全仰赖政府来决定等级和地位的官僚贵族阶级中，他们就一定要对这个解放农民的企图进行反抗。他们的确也在进行这种反抗；显然，如果他们目前的合法的反抗对君主的意志无能为力，他们将不得不诉诸别的更有效的手段。

（二）

1858年12月31日于柏林

俄国贵族对沙皇解放农民计划的抗拒，已经开始以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亚历山大二世在巡游各省时亲自向贵族发表演说，有时用温和口吻呼吁以仁爱为怀，有时用劝说方式多方开导，有时则声色俱厉地威胁命令，但是这些演说的效果如何呢？贵族象奴隶那样俯首帖耳地聆听这些演说，然而他们的内心感觉是：这位特地来向他们大声疾呼、哄骗劝导、说服告诫、威胁命令的皇帝，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位能为所欲为的全能的沙皇了。因此，他们便敢于根本不做任何答复，不附和沙皇的意见，并且在他们的各种委员会中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一再拖延，也就是说，做出在实质上是否定的答复。他们使皇帝无路可走，只好象罗马教会那样：compelle intrare〔强迫进门〕。但是这种单调沉闷的、执拗的缄默终于被圣彼得堡的贵族委员会大胆地冲破了，该委员会采纳了委员普拉东诺夫先生所起草的一个实际上等于“权利请愿书”[111]的文件。贵族公然要求召开贵族议会，来与政府共同解决不仅是这一个巨大的迫切问题，而且要共同解决所有一切政治问题。尽管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先生拒不接受这个文件，他把它退回给贵族，并且愤怒地向他们指出集会呈递请愿书不是贵族份内的事情，他们只应该限于讨论政府给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这并没有

什么效果。舒瓦洛夫将军以委员会名义转入进攻，威胁要亲自把文件呈交皇帝，从而迫使兰斯科伊先生收下了它。这样，1858 年的俄国贵族就正如 1788 年的法国贵族一样，宣布了 Assemblée des Etats généraux〔三级会议〕的口号，或者用俄国人的话来说，宣布了 Semski Sabor 或 Semskaja Duma① 的口号。这样，贵族在为了私利而企图完整地保存金字塔的陈旧社会基础的同时，自己攻击了它的政治重心。此外，esprit de vertige〔谬误精神〕——年老的法国侨民这样称呼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了他们，以致大部分贵族都被卷入资产阶级开办联合股份公司的狂热中，而在西部各省，小部分贵族还尽力表明自己在领导和保护时髦的文字宣传。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大胆的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 1858 年，发行的日报已经增加到一百八十种，可是还有一百零九种新报纸宣布将于 1859 年出版。另一方面，在 1857年创办了十六个公司，其资本为三亿零三百九十万卢布，而在 1858 年从 1 月到 8 月又增添了二十一个新公司，其资本为三千六百一十七万五千卢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实行的改革的另一面。不应该忘记，俄国政府曾经多次在农民眼前造成自由的 fata morgana〔幻景〕。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统治初期，曾号召贵族解放农民，但是没有成功。在 1812 年号召农民参加 oplchenie②（民兵）时，曾允许他们以废除农奴依附身分来酬答他们的爱国行为，这个许诺虽是非正式的，但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当时曾说，对于保卫住神圣俄罗斯的人，决不应再以奴隶视之。甚至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也曾有一系列敕谕限制贵族对农奴的权利：允许农奴（1842 年的敕

① “国民代表会议”、“国民杜马”，这两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② “义勇军”，这个词是马克思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

谕)与其主人签订有关服役期限的契约(这便间接地允许农奴起诉控告主人);以政府名义(1844年)保证农民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保证农奴(1846年)在他们所依附的领地需要拍卖时有权赎买自由;允许依附于这种领地上的农民(1847年)在该领地一出售时立即把它全部买下来。使政府和贵族都大为吃惊的是,突然发觉,农奴对此很有准备,真的接二连三地买起领地来了;不仅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地主只是虚有其名的所有者,因为是他自己的农奴出钱帮他摆脱了债务,这些农奴当然采取了各种预防办法来为自己确实保证自由和领地的所有权。当这些情况一经发现,被农奴这种机灵和干练的表现以及西欧1848年的革命爆发吓得魂不附体的政府,不得不寻找补救办法来阻止实行那势必逐渐把贵族撵出领地的法令。但是要废止敕谕已经为时太晚,因此另一道敕谕(1848年3月15日)便把以前只属于村社的购买权扩大到每一个个别的农奴。这个措施不仅破坏了一个个村子的以及一县境内数个村子之间的那种在此以前使农奴能够为购买领地筹集资本的联合,而且,它还附了一些特别的条件。农奴可以购买土地,但是不能购买依附于土地之上的人;换句话说,农奴在购买他们所附属的领地时,并没有购买他们自己的自由。恰恰相反,他们仍然是农奴,而且全部交易只有得到原来地主的同意才能有效!除此以外,有许多所谓按照自己农奴的信托而持有地产的贵族,由于那同一道敕谕,得到权利并且受到鼓励去破坏这种信托关系,收回对地产的全部所有权;同时还无条件禁止了农奴在法庭上进行任何诉讼。从那时起,农奴除小学以外都不得进其他任何学校,对解放的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但是上一次战争又迫使尼古拉采取普遍武装农奴的措施,并且象往常一样,以使他们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诺言来推行这项措施,——政府委托自己的下级官吏在农民中广泛散布了这些诺言。

十分自然，在这一切之后，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认真着手解放农民。他努力的结果，他的计划要点，既然已经成熟，现在公布出来了。十二年的考验将伴随着沉重的徭役，而以后会进入何种状态连政府也不敢详细描写，对于这样的考验，农民会说些什么呢？对于组织村社管理机构、法庭和警察来消除俄国每个村社自古固有的全部民主自治机关，以便仿照1808—1809年的普鲁士乡村立法建立一套地主世袭政权的体系[112]，——这种体系是那全部生活都由村社管理、毫无个人土地私有观念、认为村社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所有者的俄国农民所极端厌恶的，——农民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自从1842年以来，农奴反对地主及管家的起义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现象，甚至按照内务部的官方统计，每年大约有六十名贵族死于农民之手，在上次战争期间，起义有很大的发展，而在西部各省起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政府（那里曾经策划密谋，一俟外国敌人——英法军队逼近国境，就开始起义！），那就未必可以怀疑，即使贵族不反对解放农民，企图实现委员会的建议也会成为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爆发大规模起义的信号。但是，贵族必定要反对；皇帝在国家大计和权宜办法之间、在对贵族的畏惧和对愤怒的农民的畏惧之间徬徨，必然会踌躇不前；而由于怀着巨大期望而愤激到极点的农奴，认为沙皇是在他们一边，但是被贵族束住了手脚，这时必然要开始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16—725页）

恩格斯

萨瓦、尼斯与莱茵（摘录）

（1860年2月）

四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在围绕尼斯和萨瓦问题进行的这场交易中，关系重大的是下面三个主要情况。

第一，是路易-拿破仑在实践上这样宣布了意大利的独立：意大利至少被分裂为三个或者甚至四个国家；威尼斯属于奥地利；法国由于占领萨瓦和尼斯而控制着皮蒙特。教皇国在罗曼尼亚分出去以后将把那不勒斯同北意大利王国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北意大利王国无法向南方作任何扩张，因为领地的其余部分必须“保证”归教皇占有。同时，对北意大利王国来说，威尼斯仍然是一种诱饵，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也就会以奥地利为直接的和主要的敌人；而为了使这个新的王国能够按照路易-拿破仑的愿望出来反对奥地利，法军占领了可以控制阿尔卑斯西部的一切阵地，并把前哨推进到距都灵九德里的地方。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布下的阵势，一旦发生争夺莱茵河疆界的战争，这种阵势可以代替它整整一个军团。而奥地利从这里得到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派遣自己盟军的好借口——甚至这一点也未必做得到。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完全改变德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德国并不需要到明乔河和波河为止的威尼斯领土；这一点我们认为已经在别的地方说明了。对于教皇的统治和那不勒斯的统治，我们也完全不感兴趣，

相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奉行自己政策的、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比波拿巴主义对意大利作更多的贡献。也许不久会发生一些情况，那时注意到这一点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法国公开宣扬自然疆界论。法国报纸重新高唱这种论调，不仅是得到政府的同意而且是根据政府的直接命令，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理论目前只应用于阿尔卑斯。这件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无害的。萨瓦和尼斯只是两个不大的省份，一个只有五十七万五千人，另一个只有二十三万六千人，总共不过使法国人口增加八十一万一千人；它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意义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由于对这两个省份的领土要求，使法国人重忆起了自然疆界论的观点；欧洲人不得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口号，就好象习惯于听十年来不同时期所宣布而后又被抛弃的一些波拿巴的口号一样，——这些就特别同我们德国人有关了。在《国民报》[113]的共和主义者们十分卖力地继续使用的第一帝国的语言中，所谓法国自然疆界 par excellence〔主要〕是指莱茵河。就是今天，一谈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尼斯或者萨瓦，而只会想到莱茵河。哪一个政府，并且是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侵略传统的政府，有权重新宣布自然疆界的原则，却建议法国满足于尼斯和萨瓦呢？

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这件事不能小看，它证明一年前在德国表露出来的民族感情是正确的。固然，现在不是路易-拿破仑，而是他操纵的报纸在大叫大嚷说：当然，过去和现在都仅仅是指莱茵河而言。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就是俄国对于整个阴谋的态度。去年爆发了战争，哥尔查科夫本人承认俄国对路易-拿破仑有“条约上的义务”，那时这些义务的内容就已经逐渐传开了。这些传说来自

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在主要问题上都互相印证了。俄国答应动员四个军配置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上，使路易-拿破仑更容易施展他的计谋。对于战争过程本身，似乎已经预先考虑了下面三种情况。

或者是奥地利同意以明乔河为边界而缔结和约。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丧失伦巴第，同时，由于与英国和普鲁士隔离，就很容易被拉入俄法同盟，而这个同盟下一步的目的（瓜分土耳其，把莱茵河左岸地区让给法国）将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或者是奥地利为占有威尼斯而继续战斗。那时，它将被彻底逐出意大利，匈牙利将爆发起义，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被转交给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伦巴第和威尼斯将归属于皮蒙特，而萨瓦和尼斯将归属于法国。

最后，或者是奥地利继续战斗而德意志联邦支持它。这时俄国将积极地加入战斗；莱茵河左岸将转归法国，俄国则将得到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

再说一遍：关于法俄同盟协定中最重要部分的这些材料，自战争爆发时就开始为大家获悉并且已经公布出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为各种事件所证实。其余的部分情况怎样呢？

对于事态的真相，现在不可能提出文件来作证据。只有在事件本身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这些证据才会出现。只有根据事实与文件（例如1830年在华沙发现的俄国的公文[114]）查明的俄国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才是揭开这个错综复杂的阴谋的钥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查明政策就足够了。

在这个世纪内，俄国曾两次与法国结成同盟，并且每一次都是以瓜分德国为其目的或者基础。

第一次是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木筏上。[115]俄国当时让法国皇帝完全支配德国而自己仅取得普鲁士的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为此它取得了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于是就赶忙夺取贝萨拉比亚和莫

尔达维亚，并驱军渡过多瑙河。但是不久以后，拿破仑就开始“研究土耳其问题”并根本改变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情况对俄国说来便成了1812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在1829年。俄国与法国缔结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应取得莱茵河左岸，俄国则再度取得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这个条约后来被七月革命[116]废除了；达来朗在准备对波林尼雅克内阁的起诉时，发现了有关的文件，但为了避免使法国和俄国的外交出丑，他把这些文件付之一炬。在广大群众面前，各国外交家结成了一个秘密的同盟，他们永远也不会公开地彼此诋毁的。

在1853年战争中，俄国曾把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117]身上，据它的估计，神圣同盟已经由于对匈牙利的干涉和华沙的失败而复活了，而且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路易-拿破仑的不信任而加强了。但是它打错了算盘。奥地利已经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118]（其实，它早已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华沙用高额利息偿还了它欠俄国的债）和它在多瑙河地区传统的反俄政策的彻底复活，使全世界吃了一惊。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失算了，但在另一个问题上，敌人阵营中的叛卖行为却挽救了它。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个固执的想法，现在只有和法国结盟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在法国又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象路易-拿破仑政府那样需要夺取莱茵河左岸。因此情况比1829年更为有利。形势对于俄国是有利的；路易-拿破仑只能为它火中取栗。

首先必须消灭奥地利。奥地利从1792年到1809年在战场上顽强地反抗过法国，而从1814年以来它又在同样顽强地（这是它仅有的然而是无可争辩的功绩）从外交上反对俄国侵略维斯拉河和多瑙河的计划。在1848—1849年间，当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使奥地利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时，俄国拯救了奥地利——它

的崩溃不应该是革命的结果，因为革命会使帝国的已解放的地区摆脱俄国政策的统治势力。然而，从1848年起就具有独立性的各个民族的运动，使奥地利失去了反抗俄国的可能性，从而也使奥地利的存在失去了最后的内在的历史根据。

这个反奥的民族运动现在应当成为分裂奥地利的因素，运动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是在匈牙利。俄国的作法和拿破仑第一不一样；在西方，特别是在那些人口稠密、文明程度超越它本国人民之上的地方，它前进得很慢。俄国征服波兰的最初阶段在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完成。缓慢的然而可靠的胜利使俄国得到的满足，和迅速坚决而收获巨大的攻击使它得到的满足相同；但是，它总是同时考虑到这两种可能性的。它在1859年战争中利用匈牙利起义的作法，即把这次起义留作第二步使用的作法，清楚地暴露了俄国的手法。

难道俄国会只满足于在短促的1859年战局中削弱奥地利，而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了吗？难道它动员第一批的四个军就只是为了得到这种满足吗？如果奥地利不让步，那又将怎样呢？如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局势迫使普鲁士和德国其余各邦（在战争继续的条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出来援助奥地利呢，那时又将怎样呢？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对法国又会承担些什么义务呢？

提尔西特条约和1829年条约给这个问题做出了答案。如果俄国把它的领土扩张到多瑙河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地统治了君士坦丁堡，法国也应当取得它自己的那一份战利品。俄国所能提供给法国的唯一的抵偿就是莱茵河左岸。德国只得再次承受牺牲。俄国的自然的和传统的对法政策，是允许法国占领莱茵河左岸或者在某种场合在这方面加以帮助以换取法国对俄国侵占维斯拉河和多瑙河的承认和支持；对由于感恩图报而承认俄国侵占行为的德国，则帮助它从法国手中收复失地。自然，这个计划只有在发生重

大的历史危机时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绝不妨碍俄国在 1859 年很好地考虑到这些可能性，象在 1829 年那样。

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对外政策一贯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如果现在还来论证这个事实，那就可笑了。我们在这里只准备提醒一点，就是俄国除非与法国或者英国结盟，否则永远不能实现瓜分土耳其的目的。1844 年，当俄国感到向英国直接提出建议是适时的时候，尼古拉皇帝曾去英国并亲自带去了俄国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备忘录，当时还把埃及许给了英国人。建议被拒绝了，但是阿伯丁勋爵把这份备忘录放在一个小匣内，加了封签传给了他外交部的继任者。以后历任外交大臣都看了这个文件，然后重新加封传给自己的继任者，直到 1853 年上院辩论时，这件事才终于被公开出来。同时公布的还有尼古拉一世同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之间关于“病夫”的有名会谈，会谈中埃及和克里特岛同样被许给了英国，而俄国似乎只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就满意了。[119] 可见，俄国在 1853 年对英国的许诺和在 1844 年是一样的，那末在 1859 年对法国的许诺难道会比 1829 年吝啬些吗？

无论从所处的地位或个人的品格来看，路易-拿破仑都注定要替俄国计划服务。他既然自命是伟大的军事传统的继承人，所以也把 1813 年和 1815 年的失败作为遗产接受了下来。军队是他的主要支柱；他必须以新的军事胜利使军队得到满足，必须惩罚那些使法国在这几年来遭受失败的国家，恢复法国的自然疆界。只有当法国的三色国旗飘扬在整个莱茵河左岸时，才能洗雪巴黎两次被占领[120]的耻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强大的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俄国与英国之间选择。英国的内阁经常更换，即使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同意这些计划，这个国家至少也是不可靠的。那末俄国呢？它已经两次表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法国结为同盟，只要求得到适中的代价。

从所处的地位对俄国的政策有利这一点来讲，俄国的政策从来没有找到过比路易-拿破仑更为适合的人了。居于法国王位的是这样一个统治者，他**被迫**进行战争，他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进行侵略，他需要同盟，并且只能和俄国缔结这个同盟，——这样一种形势是俄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自从在斯图加特会见[121]以来，法国政策的全部最后的原动力便不应到巴黎，到路易-拿破仑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该到彼得堡，到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办公室里去寻找。德国的庸人们如此敬畏的这位“神秘的”人物被降为俄国外交所玩弄的傀儡，俄国外交让他摆出伟人的姿态而自己却享受实际的利益。俄国从来都是非万不得已不肯牺牲一个戈比和一名兵士，但一有机会就要在欧洲各国间挑起纷争并削弱它们，因此，在路易-拿破仑还没有得意洋洋地摆出意大利解放者的姿态以前，当然要由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的条约来加以认可的。当俄属波兰的民情报告已经证实形势非常不妙，以致在毗邻的匈牙利不能允许发生任何起义的时候，当动员俄国第一批四个军的尝试表明国家的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当农民的骚动和贵族的抵抗的规模在对外战争期间会成为一种威胁的时候，俄皇的将军衔侍卫长就来到了法军大本营，于是就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122]。俄国暂时可以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了。奥地利因为1854年的“忘恩负义”而遭到了残酷的惩罚，其残酷程度远比俄国所能指望的要厉害得多。在战前眼看就能整顿就绪的奥地利财政，受到了惨重的破坏，要几十年才能恢复，整个国家机构摇摇欲坠，它对意大利的统治不存在了，领土被割据了，军心涣散了，军队对自己的长官失去了信任，匈牙利、斯拉夫和威尼斯的民族运动已经大大加强，与奥地利分离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公开提出的目标。自此以后，俄国可以完全不再把奥地利的抵抗放在眼里，可以指望逐渐把奥地利变成自己的工具。这就是俄国的成就。而路易-拿破仑，除了为他的军队

争得了极为渺小的荣誉，为自己争得了非常值得怀疑的荣誉，以及取得了关于有权占有萨瓦和尼斯的极不可靠的许诺而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这两省对他说来至多也不过是丹瑙人的礼物[123]，它们会使他更加仰承俄国的鼻息。

进一步的计划暂时搁了下来，但并没有放弃。搁多久，那就要看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情况，要看路易-拿破仑能把自己的御用军队控制多久以及新的战争对俄国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而定了。

俄国在对我们德国人的关系上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去年哥尔查科夫公爵致德国各小邦的有名的照会[124]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从来还没有人以这样的口气对德国说过话。我们希望，德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俄国竟敢禁止他们去援助遭到攻击的德国的一个邦。

我们想，德国人一定不会忘记俄国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1807年在签订提尔西特和约的时候，俄国曾坚持要把它的同盟者普鲁士的领土——别洛斯托克省划归自己，而把德国出卖给了拿破仑。

1814年，甚至奥地利也承认波兰有独立的必要（见卡斯尔里回忆录）时，俄国还把华沙大公国[125]（也就是以前属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几个省）几乎全部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从而对德国采取了进攻的立场，直到我们把它从那里驱逐出去以前，它将一直威胁着我们。在1831年后筑成的要塞群——莫德林、华沙、伊万城——甚至连亲俄派哈克斯特豪森也认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

1814年和1815年，俄国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使德意志联邦条例[126]以现在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德国永远孤立无援。

自1815年到1848年，德国处于俄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奥地利在多瑙河上曾同俄国抗衡，而在来巴赫、特劳波和维罗那等会议上，它却实现了俄国对西欧所抱的一切希望。俄国能这样控制是

德意志联邦条例造成的直接后果。普鲁士在1841年和1842年曾企图立刻摆脱这一条例的约束，但立即就被迫恢复原状。因此，当1848年革命爆发时，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127]，把德国的运动说成是儿童室里的吵闹。

1829年，俄国和波林尼雅克内阁缔结了自1823年就开始由沙多勃利昂草拟的（并经他正式确认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莱茵河左岸被割让给了法国。

1849年，俄国在匈牙利支持了奥地利，条件是要奥地利恢复联邦议会和摧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抵抗；伦敦议定书[128]保证俄国在最近期间获得对整个丹麦君主国的继承权，并使它有希望实现自彼得大帝以来就渴望实现的进入德意志联邦（以前是德意志帝国）的计划。

1850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被召到华沙受沙皇审判。虽然许多庸俗的政客认为只有普鲁士受到了屈辱，其实奥地利所受的屈辱并不见得少些。

1853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在同汉·西摩尔爵士交谈中任意摆布德国，就好象德国是他的世袭领地似的。他说奥地利是忠实于他的；至于普鲁士，他根本不屑于一提。

最后，1859年，当神圣同盟看来已彻底瓦解的时候，俄国就同路易-拿破仑缔结条约，法国在俄国的同意和支持下进攻奥地利，哥尔查科夫还发出照会，非常放肆地禁止德国人向奥地利提供任何援助。

这就是从这个世纪开始以来我们要感激俄国的一切，但愿我们德国人永远不要忘记。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受到法俄同盟的威胁。法国本身只有在个别时机并且也只有在与俄国结盟后才能威胁我们。但是俄国却时时刻刻在威胁我们，侮辱我们，每当德国起来反抗时，它就以莱

茵河左岸作为许诺来策动法国宪兵。

难道我们应该永远容忍俄国这样玩弄我们吗？俄国把我们最美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一个地区永远当作诱使法国御用军政权上钩的诱饵，难道我们四千五百万人民还要继续忍受下去吗？难道莱茵地区除了作为战争的牺牲品，帮助俄国取得在多瑙河和维斯拉河上行动的自由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用处了吗？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希望德国能迅速地手持利剑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把法国御用军和俄国"毛虫"一起驱逐出去。

同时，我们已经有俄国农奴这样一个同盟者。现在俄国统治阶级和被奴役的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它正在动摇俄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当俄国内部在政治上还没有发展以前，才可能存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政府与贵族共同大力促成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现存的社会关系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程度。这种社会关系的废除一方面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不经过暴力变革又是不可能的。随着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毁灭，它的对外政策也将遭到毁灭。

看来，德国注定不仅要用笔墨而且要用刀剑来向俄国说明这一点了。如果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时德国就将恢复自己的名誉，洗净几世纪来蒙受的政治耻辱。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第670—680页）

马 克 思

福格特先生(摘录)

(1860 年 2—11 月)

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克吕登纳夫人，这位神圣同盟的母亲，把善的因素即**"北方的白天使"**(亚历山大一世)同恶的因素即**"南方的黑天使"**(拿破仑第一)加以区别。福格特，这位新神圣同盟的养父，把两个人——沙皇和凯撒(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第三)都变为**"白天使"**。这两个人都命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福格特说：皮蒙特**"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同上，第 71 页)。**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对一个国家，还能再说什么呢？在皮蒙特已经把维拉弗兰卡军港让给俄国[129]，而同一位福格特就普鲁士购买亚德湾一事[130]提出了下列警告以后，更是如此：

"一个在异国境内的军港，同占有该军港的国家毫无有机联系，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因为这种军港的存在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达到未来目的而设的瞄准点，看做用来观测瞄准线而升起的一面小旗。"(《研究》第 15 页)

大家知道，叶卡特林娜二世曾经力图在地中海上为俄国取得一些军港。

对于北方的"白天使"表示无微不至的殷勤，使福格特过分粗暴地破坏了"天生的谦逊"，因为这种谦逊在丹屠出版的原著中还是存在的。他在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奥地

利》（1859 年巴黎版）这本小册子的第 20 页上读到：

“可是，当奥地利政府自己**已经侵占了克拉科夫**，因而破坏了保证克拉科夫独立的 1815 年条约时，它还有什么理由侈谈这些条约不可破坏呢？”①

福格特把他的法文原著译成这样的德文：

“这类话竟出自**迄今一直厚颜无耻地破坏条约的唯一的一个政府**之口，听起来简直令人奇怪；在和平时期，它毫无理由地向受到条约保证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伸出罪恶的黑手，并且**没有多久**就把它并入帝国的版图”（同上，第 58 页）。

当然，尼古拉废除了受到 1815 年条约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出于对 1815 年条约的“尊重”。俄国在 1831 年派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1836 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就象对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 1815 年条约在 1840 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1846 年 2 月 22 日，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又占领了克拉科夫，以便把它并入奥地利。[131] 这些条约曾遭到**三个北方国家**的破坏，而 1846 年奥地利的侵占，只不过是 1831 年俄国入侵的尾声。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表示客气，竟忘记了波兰的被侵占，并且歪曲了克拉科夫被侵占的历史。②

俄国“一贯敌视奥地利而同情法国”一事，使福格特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就象“他的〈路易·波拿巴的〉政策**现时**同俄国的政策**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 30 页）一

① «De quel droit, d'ailleurs, le gouvernement autrichien viendrait-il invoquer l'inviolabilité de ceux» (traités) «de 1815, lui qui les a violés en confisquant Cracovie, dont ces traités garantissaient l'indépendance?»

② 帕麦斯顿曾以引人发笑的抗议愚弄了欧洲，从 1831 年起，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克拉科夫的阴谋。（见我的抨击文《帕麦斯顿与波兰》[132] 1853 年伦敦版。）

事，使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一样。

因此，应当把神圣的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的“解放意愿”和“人民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就象应当把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看成是西方的这种“朋友”一样。这一口号曾经颁发给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各个代理人。

“俄国”，——**福格特**在丹屠出版的《**条约的拘束力、签订了条约的列强和皇帝拿破仑第三**》（1859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读到，——“俄国属于斯拉夫人大家庭，属于优秀种族…… 有人对法俄两国之间突然产生的骑士协商感到惊奇。其实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原则相同，目标一致，政府和人民遵守神圣同盟法律**不是为了进行欺骗和强制，而是为了使民族运动走上绝妙的道路，并支持这一运动。这种最充分的诚意〈在路易-菲力浦同英国之间只有过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但在路易·波拿巴同俄国之间却存在着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最充分的诚意〕〉已经产生了极其良好的结果：铁路、**农奴解放**、地中海上商船停泊场等等。”①

福格特抓住了“农奴解放”，并且暗示说：

“目前的这一推动……应当把俄国变成解放意愿的朋友，而不是解放意愿的敌人。”（同上，第10页）

就象在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中的看法一样，在这里他也以为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谓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争变为“**法国战争**”（同上，第9页）。

① 《La Russie est de la famille des Slaves, race d'élite… On c'est étonné de l'accord chevaleresque survenu soudainement entr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Rien de plus naturel: accord de principes, unanimité de but… *soumission à la loi de l'alliance sainte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 non pour leurrer et contraindre, mais pour guider et aider la marche divine des nations. De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 sont sortis les plus heureux effets: chemins de fer, *affranchissement des serfs*, stations commercial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etc.》, p. 33. 《*La Foi des Traités* etc.》, Paris, 1859.

谁都知道，响亮而坚决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研究了农奴解放问题；为此，他在1838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产业部，在1843年下诏这个部进行准备工作，而在1847年甚至颁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贵族领地的法律[133]，但是到了1848年，由于害怕革命，他又废除了这些法律。因此，如果说农奴解放问题，在"好心的沙皇"——**福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已有了极为重大的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

但是，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贵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现，农奴的真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教皇庇护九世曾经发现，意大利的解放同教廷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134]）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1860年出版的《**俄国真相**》一书中，对所谓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千年王国的谎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和驳斥；这类谎言从1856年起由俄国的雇佣文人尽心竭力地传遍全欧，1859年又由十二月骑士们响亮地给以宣扬，福格特也盲目地在他的"研究"中加以重复。

还在意大利战争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之间订立的同盟，——按照**福格特**的说法，这是专门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订立的，——就已在多瑙河各公国经受了考验，在那里，罗马尼亚

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由库扎上校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君主而得到了巩固。[135]

"奥地利拚命抗议，**法国和俄国则表示赞同**。"（同上，第 65 页）

在俄国内阁于 1837 年给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告书（1855 年的《普鲁士周刊》[136] 曾经转载过）中，我们可以看到：

"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异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 无论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别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象我们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并之前，它曾宣布克里木的**独立**。

我们在 1814 年 12 月 11 日的俄国宣言中可以看到：

"波兰人，你们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们呼吁。为了保卫你们的祖国和维护你们的**政治独立**，你们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各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来，俄国就关心这些公国的"**独立**"了。在涅米罗夫会议[137]（1737）上，女皇安娜要求苏丹让多瑙河各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138]（1772）上，坚持各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这种努力仍在继续进行；在他把贝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812 年布加勒斯特和约）以后，这种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谢廖夫，用至今还有效的"组织规程"为罗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 code〔法典〕的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亚历山大二世使多瑙河各公国在库扎统治下实现的准联合，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执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现：由于实行了在俄国藩属统治之下的这种联合，"各公国将成为阻挡俄国南进的障碍"（同上，第 64 页）。

因为俄国欢迎库扎的当选（同上，第 65 页），所以非常明显：好

心的沙皇不遗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贯追求的目标"(同上，第 9 页)。

把俄国说成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愿的保护者，并不是什么新货色。法国和德国的许许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特林娜二世誉之为进步的旗手。"高尚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把他贬称为 Le grec du Bas 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①)曾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财富为芬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慷慨地赐给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139]的秘密领袖，虽然他同时在维罗那会议上通过卖身投靠的沙多勃利昂怂恿路易十八讨伐西班牙的暴乱[140]？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一个接受忏悔的神甫，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讨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北美合众国总统，说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任何干涉？难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领袖"前往瓦拉几亚，并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谋杀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领袖弗拉基米烈斯库？1830 年以前，各种语言、诗歌和散文把尼古拉也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 1828—1829 年对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恰好是在马茂德拒绝让俄军过境去镇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庞然怪物——唐·米格尔、奥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了对希腊人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给他们派一个俄国将军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去担任总统？但是，希腊人并非法国人，他们杀死了高尚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 1830 年七月革命爆发时起，主要扮演的是正统派的保护人，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协助

① 转意是：口是心非的奸诈汉。——编者注

"民族的解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43 年 9 月爆发的旨在宣布宪法的**希腊**革命，是由俄国驻雅典公使卡塔卡集领导的，此人原先是纳瓦林惨败时海军上将葛伊甸的顶头上司。俄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曾是 1842 年**保加利亚**骚乱的中心。俄国将军杜加美尔于 1842 年春在领事馆里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说明了总起义的计划。塞尔维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则应成为瓦拉几亚的君主。在**塞尔维亚**起义时（1843 年），俄国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以便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争取欧洲的同情和狂信。沙皇尼古拉的解放计划也丝毫没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曾经是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青年意大利》[141]，在 **1843 年 11 月**的某一号上这样写道：

"罗曼尼亚新近发生的骚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两者之间多少是有联系的…… 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败，因为真正的民主派拒绝参加这一运动。**共和派分子不愿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能有一部分军队起来领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以后，伦巴第、皮蒙特和罗曼尼亚应随之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皇的女婿——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青年意大利'粉碎了这个计划。**"

1843 年 11 月 20 日的《泰晤士报》就《青年意大利》的这一报道指出：

"如果这个伟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现，那就更好了；但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任何突然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奥地利惶恐不安，并且转移它对俄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fearful)计划的注意力。"

1843 年，尼古拉对《青年意大利》的号召毫无结果以后，便于 1844 年 3 月把布帖涅夫先生派往罗马。布帖涅夫代表沙皇把一项

计划通知教皇①，计划规定，把俄属波兰割让给奥地利以换取伦巴第，后者应组成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罗马教廷的英文机关报《小报》，于 1844 年 4 月就这一建议写道：

“这项美妙的计划使罗马宫廷醉心的是：波兰落到了天主教手中，而伦巴第仍然处于天主教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罗马外交界的老手们懂得，虽然奥地利能勉强保卫自己的领地，同时，大概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可是把波兰割让给奥地利，——即使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债款，一旦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真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也就必然落到俄国统治之下。因此，这项被推崇备至的计划就暂时被搁在一边了。”

《小报》在 1844 年就是这样写的。

奥地利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以及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阻挠——虽然这种阻挠是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胆怯的，但却是顽强的——使福格特发现了“奥地利是东方一切纷争的策源地”（同上，第 56 页）。他带着同他的肥胖外形十分相称的“某种童稚的天真”，把俄国同法国结盟反对奥地利的原因——“好心的沙皇”的解放倾向除外，——说成是因为奥地利对尼古拉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所给予的帮助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

“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奥地利已经达到了武装的敌对的中立的最后边缘。不言而喻，这一行动，况且是带有**虚伪和狡诈**痕迹的这一行动，必然使俄国政府凶狠地反对奥地利，从而把该政府推到法国一边去。”（同上，第 10、11 页）

在福格特看来，俄国执行的是温情主义的政策。奥地利由于在 1850 年华沙会议时损害德国利益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142]对沙皇所表示的那种**感激**，仍然不能使知恩的福格特感到

① 格雷哥里十六。——编者注

满足。

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他的1825年10月写于巴黎的著名紧急报告[143]中，在列举了奥地利反对俄国在东方的干涉计划的各种阴谋诡计之后，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奥地利〉采取威慑的态度；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应当使它确信：如果它竟敢采取什么手段来反对我们，那末，一场它从未经受过的极可怕的风暴就会降临在它的头上。"

波茨措用外来的战争和内部的革命来吓唬奥地利，并提议由奥地利占领"它所觊觎的"土耳其"各省"当做一种可能的和平结局，而把普鲁士简单地描绘成俄国的一个千依百顺的同盟者，在这以后，他接着写道：

"**如果维也纳内阁承认我们的善良目标和意图**，那末皇帝内阁的计划早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不仅涉及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和君士坦丁堡，而且还涉及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大家知道，尼古拉和查理十世于1830年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它规定了下列条件：法国允许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自己取得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作为补偿；普鲁士得到汉诺威和萨克森作为补偿；奥地利获得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一部分省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在俄国的倡议下，同一个计划又由摩莱提交给彼得堡内阁。在这以后不久，布隆诺夫就带着这个文件去伦敦，把它当做法国背叛变节的一项证据交给英国政府，并利用它来组织1840年的反法同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受巴黎原著指使的**福格特**的想法，俄国**该**怎样跟法国同心协力地利用意大利战争。俄国"民族的"构成，特别是"**波兰民族**"，对一个以"民族原则"为其"指路明星"的人来说，看来该引起一些困难的；可是：

"我们对民族原则评价很高，但自由自决原则对我们更可贵"（同上，第

121 页)。

当俄国根据 1815 年条约占领了绝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就向西部挺进，不仅楔入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而且楔入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之间，以致当时普鲁士的军官们（例如格奈泽瑙）就已经注意到不能容忍同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而，只是在 1831 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为俄国人所左右时，这个楔子的真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须使波兰俯首听命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类强大工事的真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维斯拉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甚至连非常同情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以及俄国一切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德国的一种实际危险和威胁。俄国人在维斯拉河上的设防阵地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别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军事力量当做自己的侵略力量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福格特**才这样宽慰德国说：**波兰是根据自由自决变成为俄国的。**

"毫无疑问"，——他说，——"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民党的紧张努力，**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大缩小了**，也许，**只需要一种不大的推动力，就可把它完全填平了。**"（同上，第 12 页）

意大利战争应当提供这种不大的推动力。（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场战争时期曾深信：波兰还不能胜任福格特给它准备好了的高位。）在"自由自决"的基础上溶化于俄国的**波兰**，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将会成为一个中心体，把被夺走的正在异族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前波兰的一些部分吸引过来。为了使这个吸引过程进行得比较容易，**福格特**劝告普鲁士抓住方便时机摆脱"斯拉夫人的附庸"（同上，第 17 页），也就是摆脱**波兹南**（同上，第 97 页），或许也要摆脱**西普鲁士**，因为只有东普鲁士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德国土地"。

从普鲁士夺走的各个部分，当然马上就会同俄国所吞没的中心体合并，而“纯粹的德国土地”——东普鲁士，将变成俄国的 enclave〔插入别国领土中的领土〕。另一方面，至于说到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也被划入俄国版图的**加里西亚**，那末要知道，使加里西亚脱离奥地利就是使德国摆脱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领地的战争的直接目的。**福格特**想起了：

“1848 年以前，在加里西亚所看到的俄国沙皇的肖像，要比奥地利皇帝的肖像来得多”（同上，第 12 页），“在俄国为实现这类阴谋而使用特殊手法的情况下，奥地利就可能有充分根据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同上）。

但是，不言而喻，为了摆脱“内部敌人”，德国应当安然地允许俄国人把将会支持这类阴谋的“军队推进到边境”（第 13 页）。虽然普鲁士自己会放弃它的波兰各省，但是俄国应当利用意大利战争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加里西亚，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9 年就已得到了加里西亚的一部分，作为酬谢他对拿破仑第一所作的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支持一样。大家知道，俄国成功地取得了原先归普鲁士和奥地利管辖的一部分波兰领土，其中一部分是从拿破仑第一手中搞到的，一部分是在维也纳会议上搞到的。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在 1859 年，**整个**波兰同俄国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福格特**并不是要求从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手中**解放波兰民族**，而是要求**先前的整个波兰国家溶化于俄国并灭亡**。Finis Poloniae!〔结束波兰！〕“俄国”这种“恢复波兰”的观念，在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立即传遍了全欧；1855 年 3 月，**戴维·乌尔卡尔特**曾在其抨击性著作《*The new hope of Poland*》（《波兰的新希望》）中揭露了这种观念。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不够卖力气。

这位**热心的交谈者**叙述说：“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者的态度是异常殷勤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这同奥地利人的行为比较起来，简直太突出了，

因而它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影响。俄国虽然粉碎了一个党〈nota bene〔注意〕：在**福格特**看来，俄国粉碎的并不是**匈牙利**，而是一个**党**〉，但对它还是既温和又礼貌的，因此，俄国就为下面一种看法奠定了基础，这种看法可大致表述如下：两害相权须取其轻；而**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并不是较大的害。**"（同上，第12、13页）

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是用"异常殷勤、既温和又礼貌"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态度来描述俄国人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的，因而使自己变成了传播幻想的"渠道"；而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就是在这种幻想上碰碎的。**戈尔盖**的党当时散布要把一个俄国公爵当做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予以信赖，并用这种信赖摧毁了匈牙利革命的反抗力量。①

1848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在任何一个种族中都得不到特别的依靠，当然它就把它对匈牙利的统治建立在统治的民族——**马扎尔人**身上。附带提一下，梅特涅倒是各民族的最伟大的保护者。他迫使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但是他需要这些民族，以便强迫它们这样做。因此，他保护它们。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波兹南和加里西亚。1848—1849年革命之后，在斯拉夫人帮助下击败了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模仿约瑟夫二世，以暴力使德国成分在匈牙利居于统治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害怕俄国，不敢投入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怀抱。他们全国的反动势力，在匈牙利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战败者——马扎尔人，不如说是针对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因此，奥地利

① 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匈牙利革命军中作过战、后来又在切尔克西亚反对过俄国人的一位波兰上校拉品斯基说："匈牙利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人。"（泰奥菲尔·拉品斯基《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1850年汉堡版第216页）。"维也纳内阁完全落到了**俄国人**手里…… 按照他们的建议，把一些领导人杀害了…… **俄国人**一方面用种种办法博得同情，一方面**迫使奥地利**的所作所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痛恨。"（同上，第188、189页）

反动势力在同它的拯救者的斗争中，就象**瑟美列**在其1860年于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匈牙利**》中所指出的，把斯拉夫人赶回到马扎尔人的旗帜下面去。可见，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统治，不论在1848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是同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并存的。至于俄国，不管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按族系和宗教去统计同俄国相近的一切成分，那就会发现，俄国拥有占居民**多数的非马扎尔人**。马扎尔人在数量上少于按族系同俄国相近的斯拉夫人和按宗教同俄国相近的瓦拉西亚人。因此，俄国在匈牙利的统治就等于**匈牙利民族的灭亡**，也就是在历史上同马扎尔人的统治有联系的匈牙利的灭亡。①

福格特要**波兰人**通过"自由自决"溶化于**俄国**，要**匈牙利人**俯首听命于俄国的统治，从而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灭亡。②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是不够卖力气。

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中间，即德意志联邦**不**应为之"拔剑张弩"去反对法国和反对"完全站在法国一边"的俄国各省区中

---

① 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声名赫赫的**康塞茨·佩尔采尔**将军，在意大利战役时就已脱离了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在都灵的匈牙利军官们，他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是这样解释他离去的动机的：一方面是由于科苏特仅仅成了波拿巴派的稻草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匈牙利未来将属于**俄国**这样一种前途。附带提一下，我曾写给他一封信，要他比较详尽地解释一下他的声明，他在回信（注有：**1860年4月19日于圣埃尔耶**）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一种工具：帮助匈牙利逃脱双头鹰的毒爪，仅仅是为了随后又把它投入北方熊的**致命的怀抱**。"

② **科苏特**先生从来没有怀疑过上面发挥的看法的正确性。他知道，**奥地利**可能残酷地对待匈牙利，但不可能消灭它。1851年2月15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告诉宰相列施德-帕沙说："约瑟夫二世皇帝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唯一英明人物，他用尽了他的全部独特而罕有的智慧，利用了当时还流行的关于他的王朝的威力的传闻，来使匈牙利日耳曼化，并使它溶化于一个联合的国家中。然而，斗争却使匈牙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奥地利从灰烬中起来投入最后一次革命，只不过为了向沙皇、向它的那个从来不给帮助、反而一贯**出卖**这种帮助

间，不仅有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而且有**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

福格特说："俄国是一个坚固的核心，斯拉夫各民族越来越渴望围绕在它的四周。"（同上，第9—10页）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居民属于"斯拉夫各民族"。就象莫斯科公国变成了俄国一样，俄国也应当变成泛斯拉夫国。"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同上，第134页）我们，即德国，应当竭力摆脱捷克人，也就是摆脱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对各个君主的非德意志领地不给以任何保证。"（同上，第133页）"**联邦内再不要任何非德意志省区**"（同上），可是要法国有德意志省区！因此不仅应当"趁目前法兰西帝国**没有侵犯联邦的德意志领土**"时"**给**该帝国**以行动自由**"（前言第9页），而且应当趁俄国目前只侵犯"**联邦内非德意志省区**"时也"**给**"**俄国**以"**行动自由**"。俄国派兵前往那些构成了俄国"阴谋"的对象的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的附属地"，有助于德国的"统一"和"民族完整"的发展。当奥地利将在意大利忙于应付路易·波拿巴，而普鲁士仍然把德

的主子双膝下跪。因而奥地利必须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的代价。"（《科苏特通信集》第33页）在同一封信中，另外，他还这样写道：土耳其和匈牙利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挫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诡计。1851年1月17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We *must crush Russia*, my dear Sir! and, headed by you, we will! I have not only the resolution of will, but also that of hope! and this is no vain word, my dear Sir, no sanguine fascination; it is the word of a man, who is wont duly to calculate every chance: of a man though very weak in faculties, not to be shaken in perseverance and resolution etc.》（同上，第39页）。（"**我们一定要摧毁俄国**，亲爱的朋友！而且在您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摧毁它。我不仅充满决心，而且满怀希望——这并不是空话，亲爱的朋友，并不是一个爱激动的人的幻想：这是一个已习惯于对一切良机都加以深思熟虑的人说的话，这个人虽然庸碌无能，但是坚毅果断，不可动摇，等等。"）

意志联邦之剑装在剑鞘里的时候，“好心的沙皇”将“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暗中支持**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革命”（同上，第 13 页）。

可是“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

“好心的沙皇”是多么宽宏大量，因为他竟使我们摆脱了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及其捷克人，这些捷克人属于“斯拉夫各民族”，自然“必须围绕在俄国的四周”。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划入俄国以后，是怎样来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波希米亚成为俄国的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位于德国中间，西里西亚使它同俄属波兰隔开，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莫拉维亚使它同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隔开。这样一来，俄国就得到了长五十德里、宽二十五——三十五德里这样一部分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它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整整六十五德里。然而，由于从艾盖尔河到亚尔萨斯的劳特尔堡按直线仅仅是四十五德里，因此，法国方面的楔子，尤其是俄国方面的楔子，就会把德国北部和南部完全切断，**形成德国的被分割状态**。从维也纳直达柏林，甚至从慕尼黑直达柏林，这时都得**经过俄国**。德勒斯顿、纽伦堡、累根斯堡和林茨就会成为我们同俄国毗连的边防城市；我国在南部的地位，对斯拉夫人来说，至少会变得象在查理大帝**以前**那样（但在西部，福格特却不允许我们返回到路易十五时代），我们也就得勾销我国一千年的历史。

同波兰所起的那种作用相比，波希米亚能够起更好的作用。只要把布拉格变成一个设防阵地，并在莫尔多瓦河和艾盖尔河流入易北河的汇流处建筑一些辅助堡垒，在波希米亚的俄军就能够泰然等待一开始就分散地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勃兰登堡开来的德军，使其中较强的受到堡垒的迎击，而把较弱的各个击破。

我们来看一看中欧的语言分布图，譬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威性资料——沙法里克的 *slovanský zeměvid*[144] 来说吧。在这一分布图上，斯拉夫语言的界线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经过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西通往梅泽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转直下。在这里，德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间。在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语言又远远地向西移；的确，它同周围的德语区犬牙交错，这里也有一些德国城市和一些零星分散的德语区，而且在北方，整个维斯拉河下游和东西普鲁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是讲德语的，它们往前移动是不利于波兰的。在波兰语的最西点和捷克语的最北点之间，在德语区中间，有一个孤零零的温德—鲁日伊策语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对拥有波希米亚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福格特**来说，无疑是知道斯拉夫国家的自然疆界在哪里的。这条疆界从梅泽里茨直通利贝罗泽和吕本，然后到达易北河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的交叉点以南，再往前通至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西南部边境。这条线以东全是斯拉夫地区；混杂在斯拉夫地区里的几块德国的和其他外族的土地，不可能较久地阻碍伟大的斯拉夫整体的发展；况且，它们也没有权利继续留在原地方。既然接受了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现状”，那末不言而喻，在南部也必须对边界进行类似的修改。在南部，也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德国楔子插在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中间，占据了多瑙河谷和施梯里亚阿尔卑斯山脉。**福格特**不会容忍这一个楔子，而且要使奥地利、萨尔茨堡、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的德国部分完全并入俄国。用“民族原则”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来改组斯拉夫—俄罗斯帝国，使一些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以及各种土耳其人落到俄国手里（要知道，“好心的沙皇”在征服切尔克西亚和消灭克里木的鞑靼人时，也是为了给“民族原则”增光），作为

对他们插入北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间的一种惩罚，福格特把这一点解释成对奥地利的有意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德国人失去的只不过是东西普鲁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整个波希米亚、莫拉维亚以及奥地利（不包括提罗耳，因为它的一部分按"民族原则"应划给意大利），——失去的只不过是这一切加上我国的民族生存！

但是，我们不妨暂且谈一谈：如果加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变成**俄国的**，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这种现状下，德意志的奥地利，德意志的西南部和德意志的北部便永远也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除非——这会是必然的，——**在俄国的领导下**。

福格特强迫我们德国人唱他的巴黎人在1815年唱过的歌：

«Vive *Alexandre*,
Vive *le roi des rois*,
Sans rien *prétendre*,
Il nous donne *des lois*». ①

这样，福格特在1859年曾想通过"北方的白天使"和"南方的白天使"之间的同盟来实现的**福格特式的**"民族原则"，按他**本人的**意见，首先应当表现在波兰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溶化，马扎尔民族在**俄国内部**的灭亡和德国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消失。

这次我没有提到他的原著即**丹雕**出版的小册子，因为我掌握了一段颇有说服力的**妙不可言的**引文，证明他在这里一半隐约其词一半道破了的、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一个口号正在全面地实现。

---

① "万岁！亚历山大，
万岁！王中之王，
你赐给我们法律，
却不要一点报酬。"——编者注

在1859年5月2—16日的一期《思想和行动》[145]上，**马志尼**预言了后来发生的事变，他并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和路易·波拿巴之间缔结的同盟的第一条是：«abbandono assoluto della Polonia»（法国完全拒绝支持波兰，**福格特**则译为："最终填平横在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

«Che la guerra si prolunghi e assuma…proporzioni europee, l'insurrezione delle provincie oggi turche preparata di lungamano e quelle del-l'*Ungheria*, daranno campo all'Allianza di rivelarsi… Principi russi governerebbo le provincie che surgerebbo *sulle rovine* dell' Impero Turco e del-l'*Austria*… *Constantino di Russia* è già proposto ai malcontenti ungheresi». （见1859年5月2—16日《思想和行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而且发展成欧洲规模的战争，那末，早已准备就绪的现今土耳其各省的起义和匈牙利的起义，就会使同盟有可能采取明显的形式…… 俄国的公爵们将治理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 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已被指定给心怀不满的匈牙利人了。"）

……

"光荣的克里木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两年以后"占领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让俄国夺得了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并且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146]时不得不谦逊地"请求"敌人"允许"他们能顺利地把自己的军队调回国去，——的确，把这个战役说成是什么战役都可以，只是不能把它说成是"拿破仑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赞库尔**的小说[147]里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争暴露了许多问题。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结成同盟。巴黎和约的第一个结果是牺牲了"切尔克西亚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的鞑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军征讨上的。而从克里木战争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争**，不敢失掉

旧军队和欠下新国债，以换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财富来 «de payer sa propre gloire» 〔“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换取路易-拿破仑的名字在一项欧洲条约里出现，换取“欧洲保守的报刊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评价（同上，第 32 页）一致承认“皇帝圣上的勇武、贤明和有节制”，换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真拿破仑才受之无愧的全部 honneurs 〔荣誉〕都献给他，但只要路易·波拿巴照路易-菲力浦的榜样适当地使自己保留在“实际上明智的疆界之内”，即保留在 1815 年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内，并且一刻也不忘记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细线。政治上的鬼蜮伎俩、君主和社会状况——这些情况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起初在法国境内、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但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编年史来说却是不适宜的。

“但至少事实仍然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马尼亚民族〉力求团结的意愿的。”（《研究》第 34、35 页）

上面已经提到，库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总督，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诸侯的。在《**一八六〇年的欧洲**》地图上，作为诸侯出现的是梅克伦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马尼亚的**这种**解放的全部 honneurs 〔荣誉〕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则取得这一解放的一切实际利益。阻碍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实现他的善良意图的是奥地利。因此，意大利战争应当把奥地利**从一种障碍物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 1858 年，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者就已利用他的无数传声筒，围绕“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吹奏了各种变调曲。因此，**福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 1858 年 11 月 20 日在格拉斯哥的讲演中就能给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制订出来的宪

法…… 实际上，它恰好是赏赐给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nor less than a charter granted to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disposing of the Principalities.»)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这些公国里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掩盖他把多瑙河各公国转送给俄国，正如**奥地利政府**在1848—1849年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借助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霍尔瓦提人和瓦拉几亚人等等来绞杀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罗马尼亚人民，——而为他们操心的既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又有利欲熏心的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贵族流氓；其中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罗马尼亚人民一如既往地在极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有俄国人**借助于“组织规程”才能组织起来的，只有东方的 demi-monde〔半上流社会〕才会予以支持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
第532—551、562—564页）

马 克 思

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

（1860 年 9 月 17 日）

目前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德国提供了一幅最奇异、最紊乱、最悲惨的图景。只须对比一下这样两个事实，即德意志民族联盟[148]不久前在科堡举行会议和主要的德意志邦君即将在华沙举行会晤[149]，就可以最清楚不过地了解德意志的真实情况。民族联盟力求祖国的统一，对德意志的奥地利拒而不纳，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而普鲁士摄政王本人则把他的反抗法国侵略的计划跟重建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神圣同盟联系起来。如所周知，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它既不是正统主义的，又不是革命的，但它却同样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不管这种扩张是附和起义的人民而达到，或是附和角逐的君主而达到。时而附和这一边，时而附和那一边，成了俄国对德国的确定不移的政策。最初它和法国达成协议，以便摧毁奥地利对其东方计划的反抗，随后又站到德国这一边，以便削弱法国和取得德国酬谢的期票，然后在维斯拉河或多瑙河上兑现。在欧洲纠纷发展的进程中，俄国始终会认为联合德意志各邦君主比联合法国暴发户好。原因很简单，它的真正力量在于外交优势，而不在于物质实力。如果因为同法国结盟而同自己的紧邻德国发生战争，就可能暴露出北方巨人的外强中干；而在对法战争中，俄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总是应当担任后备队的角色，而迫使德国承受战争的实

际重担，为自己储存胜利果实。结盟的国家在这方面与各个军团相象。先头部队和本队得顶住主要的打击，而决定会战的结局和取得胜利的则是后备队。德国的幻想家们希望，俄国在国内的与解放运动联系着的社会斗争的强烈影响下，这一次将放弃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关于俄国对外政策永远不变的信条，就让他们以这种虚幻的希望自慰吧。

有人推测，被阶级斗争弄得四分五裂，被财政危机弄得精疲力竭的大帝国，将非常乐意地不再过问欧洲；但这样的推测只说明对俄国内部所发生的运动的真正本质了解得很差。不管慈悲的沙皇的真正意图如何，对他来说，消灭农奴制和保存自己的专制政权两者是不可能调和的，就象 1848 年对慈悲的教皇① 来说意大利统一和教皇宫廷的切身利益不可能调和一样。“俄国解放农奴”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它后面却隐藏着各种极不相同的意义和各种极为矛盾的意向。在运动之初，这些矛盾意向被某种共同的热情掩盖了起来，而一旦采取从空论到行动的步骤，这种掩盖物就一定会被打破。按照沙皇的理解，解放农奴就等于排除那些仍然限制着皇帝专制的最后障碍。一方面，应当取消贵族的以专横统治大多数俄国人民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应当用政府的消灭“共产主义”原则的计划，来取消以共同占有被奴役土地为基础的农奴的村社自治。这就是中央政府所理解的农奴解放。至于俄国贵族阶级中有势力的那一部分贵族，他们由于没有希望保持昔日的状况，于是就决定在两个条件下让农奴解放。第一个条件是要补偿金，使农民由农奴变为契约债务人，这样一来，从物质利益这方面来说，至少在两三个世代之内，除了农奴依附的形式可能由宗法式的变为新的、文明的形式外，就什么也不会改变。除了应由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农奴付出的这种补偿之外，贵族还要求由国家再付给一笔补偿。贵族表示准备放弃自己在地方上对农奴的统治权，但它要求从中央政府手中取得政治权力来代替这种统治权，实质上，就是要取得宪法权利参加帝国的一般治理。

最后，农奴对解放问题则宁愿作最简单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解放，就是去掉他们的旧主人之后的旧制度。在这种相互的斗争中，政府虽然进行了威胁和阿谀，仍然大遭贵族和农民的反对，贵族阶级则大遭政府和他们的牛马即农奴的反对，而农民则大遭他们的最高主人和地方主人的联合的反对。在这种斗争中，一如既往，掌权者总是牺牲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妥协。政府和贵族阶级已经商妥，把解放农民问题暂搁一下，在对外冒险上再碰碰运气。1859 年与路易·波拿巴的秘密协定[150]和 1860 年有德意志邦君们参加的正式的华沙会议，都是由此而来的。意大利战争削弱了奥地利的自信，已经可以使它这块绊脚石变为俄国执行对外政策计划的工具；而普鲁士由于在战争的进程中既追求虚荣，背信弃义，又毫无举动，以致弄得狼狈不堪，现在受到法国在它的莱茵省边界上的威胁，已不得不步奥地利的后尘。哥达党[151]的一个大错误，就是幻想奥地利大概会在法国的打击之下，瓦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而德意志的奥地利部分如果摆脱了把它同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拴在一起的绳索，也就可以很容易地成为统一的大德意志帝国的成员。长期的历史经验表明，奥地利跟法国或俄国进行任何战争都不会使德意志摆脱奥地利的影响，只能使它服从法国或俄国的计划。即使这些强国有力量给奥地利一个沉重的打击，把它打碎成各个组成部分，对它们来说也是一种下策；但是削弱奥地利，利用其残余影响为自己利益服务，却曾经是并且永远是它们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只有以维也纳为一个中心，以柏林为另一个中心的德国革命，才能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打碎，而

不使德国的完整遭到危险，不使它的非德意志地区受法国或俄国控制。

即将举行的华沙会议是会使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大大巩固起来的，如果不是在意大利，真正的民族派和法国派冲突的前景使他丧失了这种机会的话。不过，应当预期，华沙会议最后将使德国睁开眼睛，并教育它懂得，要抵御外来的入侵或在国内实现统一和自由，它必须清除自己家里的王朝老爷们。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5卷第192—195页）

恩 格 斯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1866 年 1 月底—4 月 6 日）

一

致《共和国》[152] 周报编辑

阁下：

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就用不多的几个字——**恢复波兰**表达出来。整个宪章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法国工人在 1848 年前很久，以及在值得缅怀的 1848 年是如此，他们在 1848 年 5 月 15 日走向制宪议会的时候曾经高呼 «Vive la Pologne!»——波兰万岁！[153] 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1848 年和 1849 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好几家机关报都曾要求对俄作战以恢复波兰。[154] 就是现在，除了下面将要详细谈到的一个仅有的例外，情形也是如此。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最能表达他们对外政策的一种要求。诚然，资产阶级也曾“同情过”，而且现在也还“同情”波兰人，但是，这种同情并不妨碍他们在 1831 年、1846 年和 1863 年让波兰人陷于灾难，甚至也不妨碍他们一面在口头上维护波兰的利益，一面却放纵波兰最凶恶的敌人如帕麦斯顿勋爵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是俄国的帮凶）去为非作歹。工人阶级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们要过问，而不是不过问；他们要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干涉波兰的

事务；而且每当波兰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们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不久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更充分地表达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这种共同的本能的感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155]

西欧工人和中欧工人对外政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这个纲领被提给的那个阶级的一致承认，不过，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在法国工人中间，有一小部分是已故的比·约·蒲鲁东的学派的追随者。这一学派 in toto〔完全〕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背道而驰；它把他们称之为愚笨的大老粗，在大多数问题上都与他们持完全对立的意见。它对他们的对外政策也是抱这种态度。蒲鲁东主义者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象斯泰里布雷芝的陪审员一样，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他们称赞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强国，象美国那样微不足道的国家甚至不值得和它并提。他们责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说它抄袭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①，宣布慷慨的俄国民族 (people) 不在文明欧洲范围以内，而这是违反世界民主和各民族友好原则的严重恶行。这就是他们的责难。[156] 如果把他们的民主辞句丢在一边，那就立刻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怎样逐字逐句地重复各国极端保守派关于波兰和俄国的言论。诸如此类的责难是不值一驳的；但是，既然这些话是出自工人阶级一部分人之口（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人），那就应当再一次考察一下俄波问题，论证一下今后我们可以称作已联合起来的欧洲工人的对外政策的那种东西。

①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用了 nation(нация)、nationality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和 people(народ)三个词。这三个词一般都译"民族"，我们在这里同样也译"民族"。但在本文中这三个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为了不致混淆起见，凡原文用 nationality 和 people 的地方，我们都附上原文；凡不附原文的地方，则原文都是用 nation。——译者注

可是，为什么在谈到波兰的时候，我们总是只提一个俄国呢？难道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意志人的强国不也是参加了对波兰的掠夺吗？难道它们不也是奴役着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并同俄国一起镇压波兰的任何民族运动吗？

大家很清楚，奥地利如何持续不变地力求站在波兰事务之外，如何长期地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策划的瓜分计划。波兰曾是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天然同盟者。自从俄国成为威胁力量的那一刻起，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莫过于在奥地利和一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之间保持一个不受侵犯的波兰。奥地利只是在看到波兰的命运已经决定，不管有没有它参加，另外两个强国都决心要消灭波兰的时候，才出于自卫感而加入它们一伙，以便也能拿到一份领土。但是，早在 1815 年它就主张恢复独立的波兰；1831 年和 1863 年，它曾准备在英法同意支持它时为此而战，并放弃自己占据的一部分波兰领土。克里木战争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谈论这一切，并不是为奥地利政府的总的政策进行辩护。奥地利经常都在证明：压迫更弱小的民族，是奥地利统治者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在波兰问题上，自卫的本能比对新的领土的贪婪和统治者的习惯都更加强烈罢了。这就是目前不必谈奥地利的原因所在。

至于谈到普鲁士，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很小，没有多大意义。它的朋友和盟国俄国居然把它在三次瓜分中所得到的弄走了十分之九。而留在它手上的这一点点东西，却象梦魔一样缠得它透不过气来。这就把它拴在俄国的凯旋车上，使得它的政府竟然在 1863 年和 1864 年能够毫无阻碍地在普属波兰，以后更进而在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破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就完全弄坏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资产阶级由于担心在东方边界上失去若干平方英里的领土，曾允许政府把波兰人置于法律保障之外。不仅是普鲁士的工人，而且整个德国的工人，

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关心波兰的恢复，而且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他们都表明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恢复波兰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摆脱对俄国的臣服地位。因此，我们觉得：普鲁士也不是罪魁。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象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问题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族，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

二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有人说，要求波兰独立似乎就意味着承认“民族原则”，而民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所搞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发明。这个“民族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1815年的条约划定的欧洲各国的疆界，只符合于外交的要求，主要是符合于当时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俄国的要求。无论是居民的意愿、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没有加以考虑。于是，波兰被瓜分了，德国被分裂了，意大利被分裂了，至于居住在东南欧的当时还很少为人知道的许多更小的民族(nationalities)，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力求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当1821—1823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尝试被镇压下去以后，以及又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一种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解放和统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便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157] 1848年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被压迫民族

中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匈牙利。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见，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当德国还在帮助奥地利直接地、或者通过自己的附庸去奴役意大利的时候，它能不能达到自由和统一呢？要知道奥地利王朝的彻底摧毁是德国统一的最首要的条件！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是各国工人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了的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

路易-拿破仑，这个“上奉天命、下承民意”的皇帝，于1851年 coup d'état〔政变〕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称。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 (nationality) 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 *Nations*，而是 *Nationalities* 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 (na-

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亚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也不愿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则”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间，是有差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民族（peoples）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也触及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混淆问题。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

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象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句便当的空话，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不管这种发明多么空洞，但是要把它想出来，却需要比路易-拿破仑的头脑更加聪明的头脑。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正如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的，俄国在遵守民族原则的借口下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种思想已经存在有一百多年了，而现在，俄国正在经常地利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则应用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158]、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昔日的斯拉夫民族(peoples)的残余吗？甚至就在现在，俄国政府还有许多代理人奔走于挪威北部和瑞典的拉伯兰人中间，为的是在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当中鼓吹"大芬兰民族(nationality)"的思想，说在欧洲的极北地区应当恢复大芬兰民族，当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被压迫的拉伯兰人的"绝望的哭声"在俄国报刊上响得很厉害，但这哭声不是出自被压迫的游牧人自身，而是出自俄国的代理人，——要知道，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只有在东欧，民族原则才能够真正被发明出来，在那里，一千年来亚洲人入侵的浪潮一个接一个涌来，把一大堆一大堆混杂的民族碎片留在岸上，直到现在民族学家也只能勉勉强强把它们区分开来；在那里，十分混乱地杂居着土耳其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以及近一打斯拉夫

部落。这就是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而俄国是怎样把它制造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波兰的例子。

三

民族理论(Doctrine of nationality)之运用于波兰

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的人。波兰的大多数居民即它的基本核心，无疑是操波兰语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 1390 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159]，后者在 1794 年最后一次瓜分以前曾是波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立陶宛大公国境内，曾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由**立陶宛人**自己管辖，这是一种与他们的斯拉夫邻人操不同语言的民族(people)；这些立陶宛人很大一部分曾被日耳曼移民所征服，而日耳曼移民反过来又吃力地防预着立陶宛的大公。其次，在现今的波兰王国的南部和东部，住着**白俄罗斯人**，他们的语言介乎波兰语和俄罗斯语之间，而更接近于俄罗斯语；最后，在南部地区还住着所谓的**小俄罗斯人**，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现在的语言与我们通常称之为俄罗斯语的大俄罗斯语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有人说，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诉诸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是恢复至少由四个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组成的国家。

当旧的波兰国家由于同立陶宛合并而组成时，俄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时，它还处在蒙古征服者的铁蹄之下，而在这以前一百五十年，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就已经共同努力把蒙古征服者赶回东方，赶过德涅泊河去了。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

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添进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他们未来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的吞并欲望；可是，波兰人从来就是骁勇的，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强大的民族（people），他们不仅善于保卫自己的国家，而且还能进攻别的国家；十七世纪初，他们甚至把莫斯科占领了好几年[160]。

当政的贵族的逐渐腐化，资产阶级赖以发展的力量不足，以及耗尽国家元气的连年战争，终于摧毁了波兰的威力。一个顽固地保持着封建社会制度不受侵犯的国家，当它的所有邻邦都在进步，形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发展了贸易和工业，建立了许多大城市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就注定要衰落。贵族确实使波兰衰落了，完完全全衰落了。而在把它弄到这步田地之后，贵族又互相责难，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外国人。1700年至1772年的波兰历史，不过是俄国人在波兰篡夺政权的编年史，而这种篡夺之所以可能，就是由于贵族的出卖。俄国兵差不多不断地占领着这个国家，波兰国王即使自己并不想做卖国贼，但也愈来愈成为俄国大使手中的玩物。这种把戏要得那样成功，继续得那样长久，以至于到波兰最后被灭亡的时候，整个欧洲都没有提出一声抗议，而大家感到惊奇的只是：为什么俄国那样慷慨地把那么大一块领土让给了奥地利和普鲁士。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次瓜分的方式。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虽然《泰晤士报》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种商品，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十八

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161]”，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

信教自由——这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波兰在宗教问题上从来就是非常自由的；下述事实就是证明：当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遭到迫害时，他们在这里却找到了避难所。东部各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正教，而波兰人则是天主教徒。这些正教徒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十六世纪时被迫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因而被叫作东方礼天主教徒，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各方面仍然保持原先的正教信仰。这主要是农奴，而他们的高贵主人差不多全都是天主教徒；这些农奴按民族（nationality）来说都是小俄罗斯人。可是俄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家里，除正教而外，不容忍其他任何宗教，它把叛教当作罪行严加惩罚，它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同时不断加强对俄罗斯农奴的束缚，——就是这个俄国政府，却很快对波兰大肆攻击起来，它借口信教自由，说什么因为波兰压迫正教徒；借口要维护民族原则，因为东部地区的居民是**小俄罗斯人**，需要把他们合并到**大俄罗斯**里去；并且借口革命权利，武装农奴去反对他们的主人。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们在谈到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时，总是把它看做一种非常革命的东西；但是，俄国大约还在一百年以前就在波兰开始了这样的战争，而这是阶级战争的绝妙样品，当时，俄国的士兵和小俄罗斯的农奴一起前进，焚烧波兰贵族的城堡，但只是为了给俄国的吞并作准备；一旦吞并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就又把农奴拖回他们主人的

枷锁之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教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因为民族原则当时在西欧还不是时髦的东西。不过，那时已有人在小俄罗斯农民面前摆弄这一原则了，而从那时起，它在波兰事务中就开始起着重要的作用。俄国首先的和主要的贪求，就是把所有的俄罗斯部落都统一到沙皇的政权之下，沙皇自称为全俄罗斯其中也包括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专制君主(Samodergetz vseckh Rossyiskikh)。为了证明它的贪求仅止于此，它在三次瓜分的时候都竭力表示自己只关心白俄罗斯地区和小俄罗斯地区合并于俄罗斯的问题，而把居住着波兰人的地方，甚至把小俄罗斯的一部分（东加里西亚）留给自己的同谋者。可是，现在的情形怎样呢？1793 年和 1794 年被奥地利和普鲁士吞并的大部地区，现在却以波兰王国这个名称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波兰人中间逐渐唤起一种希望：好象只要他们服从俄国的最高权威，放弃对昔日立陶宛地区的一切要求，他们就可以期望把所有其余的波兰地区统一起来，在以俄国沙皇为国王的条件下恢复波兰。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打起来，那末非常可能是这样一场战争：归根到底将不是使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归并于普鲁士或威尼斯归并于意大利，而是把奥地利所占领的波兰部分，和至少是把普鲁士所占领的波兰部分归并于俄国。

这就是民族原则运用于波兰事务的情形。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6 卷第 170—183 页）

马 克 思

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1867 年 1 月 22 日）

女士们！ 先生们！①

三十多年前在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是刚同查理十世签订了一项改善欧洲行政管理和地理安排的密约的圣彼得堡没有料到的事件。接到这个破坏了全部计划的消息之后，沙皇尼古拉召集了近卫军军官，对他们作了简短的杀气腾腾的演说，最后一句话是："先生们，备马吧！"这并不是空洞的威吓。帕斯凯维奇被派到柏林，为的是在那里准备入侵法国的计划。几个月功夫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普鲁士人应当在莱茵河集结，波兰军队应当进驻普鲁士，而俄国佬则应跟在他们后面。然而那时，正如拉斐德在法国众议院所说的，"前卫军把武器调转来对准了主力部队"[162]。华沙的起义把欧洲从再一次的反雅各宾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过了十八年，又有一座新的革命火山爆发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又发生了一次震撼整个大陆的地震。甚至连德国也显得不安宁了，虽然自从所谓的争取独立的战争以来俄国就一直把它当做幼儿一样地看管起来。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维也纳在所有的

① 《自由之声》报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演说词，前面有这样一句话："德国人马克思博士首先提出了一项简短有力的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编者注

德国城市中第一个尝试筑起街垒，并且顺利地筑成了。这一次——看来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俄国失去了自制。沙皇尼古拉不再向近卫军发表演说，而向他的人民颁布诏书[163]，诏书中说道：法国的瘟疫甚至传染上德国了，它已逼近了帝国的边界，疯狂的革命把自己狂热的视线转向了神圣的罗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喊道。要知道就是这个德国许多年来都是无神论的策源地。亵渎神明的哲学的溃疡已经损伤了这个表面上看来如此仪表堂堂的民族的生命中枢。最后他用对德国人的号召结束了他的诏书：

“上帝和我们同在！放明白些吧，异教徒，降服吧，因为上帝和我们同在！”

在这以后，他立即通过自己的忠实奴仆涅谢尔罗迭交给德国人另外一封对这个异教民族充满温情的照会。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事情是这样的：柏林人不仅完成了革命，而且扬言要恢复波兰，而普属波兰人则被人民的热情引入迷途，也开始在波兹南修建兵营。沙皇因此才摆出了这副殷勤的姿态。又是波兰人民、这个欧洲的不死的勇士迫使蒙古人退却了。只是当波兰人被德国人、尤其是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出卖之后，俄国才惊魂初定，并准备了足够的兵力，以便对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掩蔽部——匈牙利进行打击，然而，就是在这里，同俄国人战斗的最后一个勇士仍然是波兰人贝姆将军。

现在还有一些十分天真的人，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变了。象一位法国作家说的，波兰已不再是“必要的民族”，它只是感伤的回忆而已。可是，你们知道，无论是感情还是回忆，在交易所里都没有行情。当俄国的关于废除波兰王国的最后几道命令在英国传开了的时候，大财主们的机关报[164]就规劝波兰人当俄国佬。即使是为了让英国资本家刚刚借给沙皇的六百万英镑的利息更有保

证，它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泰晤士报》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就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好了，只要它答应英国占领埃及，并保证英国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就行！换句话说，如果俄国宽宏大量地答应英国把埃及从法国手里夺过来，那就让英国把君士坦丁堡给俄国吧。《泰晤士报》说，俄国佬喜欢向英国借钱，同时也很好地偿还。他喜欢英国钱。实实在在喜欢。然而他怎样喜欢英国人呢——关于这一点，1851 年 12 月的《莫斯科新闻》[165]对你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最后一定轮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①，过些时候我们只会在加尔各答同这个民族签订条约。”

我要问你们，有什么东西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险减弱了吗？没有。只是欧洲统治阶级的理智昏聩到了极点。首先，根据俄国官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供认，俄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只有统治着一群野蛮人的善于随机应变的政府才能在目前想出类似的计划来。正如近代最大的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关于这一点所谈到的那样：波兰是实现俄国对世界霸权的贪欲的最重要的工具，然而当受尽欧洲不断变节的折磨的波兰人还没有变成俄国佬手中可怕的鞭子之前，它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撇开波兰人民的情绪不谈，请问，是否出现了什么东西妨碍俄国实现它的计划或遏止它的行动呢？

我不必提醒你们：俄国的侵略政策在亚洲正获得接二连三的成功。我不必提醒你们：所谓的英法对俄战争把高加索的山地要塞、黑海的统治权，以及叶卡特林娜二世、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曾

①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译者注

经枉费心机地想从英国手里夺去的海上权利交给了俄国。铁路正在把俄国分布很广的兵力连接起来和集中起来。俄国在会议桌上的波兰[166]（它构成俄国在欧洲的强固营垒）的物质资源不可思议地增长了。华沙、莫德林、伊万城——拿破仑第一选定的各个据点——的工事控制着整个维斯拉河，并且是向北、向西和向南进攻的有威胁性的桥头堡。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随着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衰落而一步跟一步地前进。而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意味着什么呢，你们可以从1848—1849年的经验中弄清楚，当时曾在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麾下作战的斯拉夫人，侵入了匈牙利，破坏了维也纳，摧毁了意大利。除了这一切以外，英国对爱尔兰的罪行也给了俄国一个在大西洋彼岸的新的强大的同盟者。

彼得一世有一次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① 俄国所需要的旺盛士气只有在吞噬波兰人之后才能进入它的躯体。那时你们把什么东西投到天秤的另一端呢？人们会根据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民而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另一些人断言，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而某些更激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西欧的内部社会改造上。②

那末，谈到第一种意见，即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

---

① 在《社会主义报》上刊登的马克思的演说词中，这句话是这样的："俄国政策的着眼点并没有改变；从1848年起实现它的手段大大增多了，不过，只是有一点对它说来到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彼得一世也曾经提到这个弱点，他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编者注

② 在《社会主义报》上，这一段的末尾是这样的："从大陆来的欧洲人可能回答我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奴，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最后，西欧的社会革命将消除'国际冲突'的危险。只看《泰晤士报》的英国人可能反驳我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英国就会占领埃及，并从而保证通向广大的印度市场的道路。"——编者注

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受到惩罚。只要提醒你们关于政府对戒酒协会的惩罚就够了，那些戒酒协会力图把俄国佬从费尔巴哈称之为俄国佬的宗教的物质实体的东西、即伏特加酒中拯救出来。农民的解放在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还不知道，不过它增加了沙皇现有的实力这一点，在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来谈谈普鲁士。这个波兰从前的附庸只是在俄国的庇护下并且靠瓜分波兰才变成头等强国的。如果普鲁士明天失去了它在波兰猎获的东西，它就会溶合在德国里面，而不是把它吞并。它要作为德国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强国而存在，就一定要依靠俄国佬。不久前它的统治的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这种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变得如胶似漆，并加强了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同时俄国是霍亨索伦王朝及其封建诸侯建立它们无限权力的支柱。它是它们用来对付人民的不满的盾牌。因此，普鲁士并不是对抗俄国的堡垒，而是俄国准备用来入侵法国和征服德国的工具。

至于谈到社会革命，它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比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能不那样残酷，可能血流得少一些。但愿能够如此。可是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危机，尽管能加强西欧各国人民的力量，还是会和任何的内部冲突一样，将同时引起外来的侵犯。它将又一次使俄国扮演它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和自从神圣同盟产生以来所扮演过的角色——天定的秩序救主。俄国将会把欧洲所有的特权阶级召募到它的队伍里。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不止一个蒙塔朗贝尔伯爵把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哥萨克的马蹄声是否动地而来。[167]

已经有不止一批忠实的普鲁士仆从在德国的代表会议上对沙皇称“父”称“君”。在所有的欧洲交易所里，俄国人的每一次胜利，都使证券的行情上涨，而每一次失败又会使它下跌。

总之，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象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二千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6卷第224—229页）

恩格斯

俄国状况

（1871年3月15日左右）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英国政府声称，它对俄普同盟一无所知。而在德国却任何人也不怀疑存在着这种同盟。相反地，亲普鲁士的报纸为此兴高采烈，而反普鲁士的报纸则气愤不已。其中有一家报纸《人民国家报》[168]认为，格莱斯顿先生之所以否认同盟，只是想暗示：这种条约与其说是同盟，勿宁说是臣服，在这一点上格莱斯顿先生是正确的。的确，凡尔赛和彼得堡之间，“您的至死效忠的威廉”和他的较为审慎的外甥亚历山大之间的函电往还，使人对今天大陆上两大军事帝国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顺便说一下，这些函电首先发表在《圣彼得堡报》上；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报刊却没有将这些函电的内容全部披露，尤其是对威廉皇帝至死效忠的保证保持缄默。不管怎样，通信的全文使人毫不怀疑，威廉皇帝想表明他如何深深地感激俄国和准备怎样为它效劳。因为皇帝已年逾七旬，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 的情绪又使人怀疑，所以俄国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要趁热打铁。

此外俄国国内的情况也很难令人满意。财政遭到近乎绝望的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编者注

破坏；以特殊形式实行的农奴解放和与此有关的其他社会政治改革把农业生产破坏到几乎难于置信的程度。政府时而赐与、时而废除、时而又恢复的各种自由主义性质的不彻底的措施，使得有教养的阶级有充分可能形成某种舆论；而这种舆论和现政府迄今所遵循的外交方针显然完全相反。俄国的舆论实质上有着鲜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是说，它敌视斯拉夫人的三大"压迫者"：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它不能容忍和普鲁士结成同盟，正如它不能容忍和奥地利或土耳其结成同盟一样。此外，它还要求根据泛斯拉夫主义的精神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传统俄国外交的平静迟缓但极周密稳妥的秘密行动，对它的耐性是极为严重的考验。不管在会议[169]上获得多大的成功，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说来都无足挂齿。他们听见的只是自己受压迫的同胞的"痛苦呻吟"；他们感到最需要的是用强力手腕、掠夺战争恢复神圣俄罗斯失去的无上威权。此外，他们知道，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 也具有与他们同样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以及向南方和西南方修建的大规模战略铁路已能有效地为进攻奥地利或土耳其或同时进攻这两个国家服务，那末这难道不是促使俄国政府和亚历山大皇帝本人采取波拿巴的老办法，趁目前与普鲁士的同盟还似乎可靠的时候，借助对外战争来暂时解除一下国内困难的强大动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最近发行一千二百万英镑公债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的确，证券市场上出现了爱国主义的抗议书（据传无人签名，看来一直到最后还无人签名），不过听说，售出的公债超过了规定的数字。这一千二百万英镑除了某些别的用途外还有什么用途，施特廷的《波罗的海报》[170]给我们做了报道，这家报纸多年来不仅对于俄国的情况消息最灵通，而且它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发

① 亚历山大王储，未来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表这些消息。据该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新历3月4日消息），俄国军事当局从普法战争中认识到，迄今俄国建造要塞所遵循的筑垒方法是完全不适用的，因而陆军部已经制定了必要的修改计划。

“据报道，新的方法是建造单独的堡垒，这种方法应首先用来修建需要立即兴修的最重要的边防要塞。应首先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莫德林等要塞建造单独的堡垒。”

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即伊万城）和莫德林（它的正式俄文名称是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正是以华沙为中心的控制波兰王国大部分国土的三个要塞。现在所以没有在华沙建筑单独的堡垒，只是因为它许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的堡垒。就这样，俄国在紧张地巩固它对波兰的控制，加强它对奥地利的作战基地，而匆忙进行这样的工作对欧洲和平说来绝非吉兆。

所有这一切，目前还可称为纯粹防御性的措施。不过上述的那位记者继续写道：

“俄国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军事准备工作仍然在加紧进行。不久前陆军部已下令成立第四营。所有各团，包括驻在波兰王国的各团，都已开始执行这一命令。已经组成战时在铁道上和电讯方面执行勤务的队伍以及卫生连。正在加紧训练人们执行各种勤务，而卫生连里甚至在训练如何急救伤员，如何止血，如何使失去知觉的人复苏。”

几乎大陆上所有大规模军队的步兵团平时都是由三个营组成，无疑由平时转向战时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路易-拿破仑在宣战的那一天也是下令成立第四营。在普鲁士，接到动员令后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奥地利和俄国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不管怎样解释突然要为波兰的要塞修建单独的堡垒、突然要empressement〔急于〕在俄国军队中设立普鲁士的Krankenträger〔担架队〕以及成立铁道和电讯队伍（这个国家的铁路线和电报线都很少），成立第四营这一点总是鲜明地表明了俄国实际上已经越

过平时与战时的分界线。谁也不能设想，俄国采取这种步骤是没有一定目的的；而如果说这种步骤意味着什么，那只是要进攻某人。可能这也就是需要这一千二百万英镑的原因。

您的忠实的　恩·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7卷第307—310页）

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摘录)

(1874年5月—1875年4月)

一

波兰宣言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左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西蒂去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一切战略规则作了部署,——可是,所有这些劳力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左夫斯基,没有响过一声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劳力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五英镑,督察员每人两英镑(合一百马克和四十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伦敦期间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171]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

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因为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冒充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末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它每一次都使较强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第一个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非常讨厌地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在任何时候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保卫者。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的在十六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蓬勃发展，工商业和财富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的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两百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走狗才被解除了武装。很著名的

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172]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从内部蛀蚀俄国的蛆虫，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特别的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联合起来。现在正受奥地利压迫的所有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①，直到土耳其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象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一般说来我将活着的话，那末我希望而且应当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以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在维斯拉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经过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

① 本篇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标点符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于把革命引进到东北欧的结果而站了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争得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争得的东西。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损失，依靠自己的爱国主义，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自己所承担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关怀责成它承担的义务。”

但是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的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173]中都做了阐述。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为波兰各地代表所确认的1845年宣言，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原理**。——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是由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的过错，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这个问题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解决，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确定了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经常图谋之一的遮盖物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

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了，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以便谈几点关于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的重要性的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如何地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如何地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象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 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 年俄国已经根据帖欣和约要求并得到了① 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174]。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 1853 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是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准备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象巴黎六月战斗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

① “并得到了”是恩格斯在 1894 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其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并且不让他的德国藩臣出来为他们辩护，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只是因为这样，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国家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象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①，——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的军队。

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

① 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352页。——编者注）中已经谈到。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主要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带有贵族派头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象我们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①进行文化斗争[175]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波兰的恢复是必要的，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己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但是，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

① 在1894年版中不是“波兹南”，而是“波兰”。——编者注

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76]

特卡乔夫[177]先生顺便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

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私有者**”——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象是一种力量……　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　在你们那里国家完全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那种混乱的观点，即仿佛经济利益为了自身的**体现**而需要有它们本身创造的国家，也不去谈论那个大胆的断语，即仿佛俄国的“社会形态〈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内的〉本身的存在就是有赖于国家的存在”，也不去谈论那个矛盾的断语，即仿佛这个国家和似乎是它创造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一亿零五百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一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一万五千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三千三百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

同保证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缴纳一亿九千五百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缴纳一千三百万！贵族的土地平均比农民的肥沃一倍，因为在赎买徭役后接着进行分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去交给贵族的，不仅有较多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最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不能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先由国家替他们垫出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步向国家清偿。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缴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缴纳土地税，缴付赎金和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以外，自从成立地方行政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缴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意为高利贷者造成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

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愈来愈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但是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有时也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商品支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受饥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还能得到很好的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就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贫瘠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商品支付制度，那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毫厘不爽的爱尔兰式的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象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们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那里近十年来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了空前迅速发展和深受最近这次危机打击的大资产阶级，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

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早从赫尔岑年代起，许多俄国人就硬说它具有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象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实质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实质，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萨阿米族、涅涅茨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① 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

① 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Sbornik materialow ob Arteljach v Rossiji》（《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 年圣彼得堡版第 1 分册。

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象古代日耳曼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①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头目(starosta 意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企业而建立的，企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经常性的企业，即真正的工业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象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末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作为雇佣工人完全受企业主雇用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业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钱给他们糊口，而且又极卑鄙地发展了商品支付制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Flerovsky.《Položenie rabočago klassa v Rossiji》）1869 年圣彼得堡版）。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雇用

① 恩格斯在 1894 年版中接着删去了："交易所——也是那样的劳动组合"。——编者注

该团体以外的人做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成立了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四十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挖土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假如这一次要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那也还是远远办不到的。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末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业企业（如郎卡郡的纺织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大工业发生冲突就必然要遭到灭亡。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178]，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应该是确切知道这种残余的。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

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往后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是多么广阔〉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完善’社会的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种原则想把私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来，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是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179]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

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мир* 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 *мир* 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是同这些条件“毫不相干”的！——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象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以便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是在各个家长之间定期重新分配，并且每个人都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各社员间在财富上很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说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他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 15 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并且森林也转归地主了；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了。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使他一家能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①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②；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

① 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W Zacholusti i w Stolice》(《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 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

② 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

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象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说，俄国人民用“教派……抗税……匪帮〈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有利的结局。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而“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了。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 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

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革命是可以象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末请问：一个早已满了十二岁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那里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巩固密切的联系。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了三千个兵士，在十四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① 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579页。——编者注

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580—587、616—629页）

恩格斯

支持波兰

（发表于1875年3月24日）

今年在伦敦隆重庆祝了1863年1月22日波兰起义纪念日。参加纪念会的有我们德国党的许多同志；其中有些人，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恩格斯说："在这里大家已经谈到了使各国革命者同情和捍卫波兰事业的那些原因了。只有一点忘记提到，这就是：波兰所处的政治形势已经彻底革命化了，波兰不是革命就是灭亡，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抉择。这一点早在第一次瓜分以后就显露出来了。第一次瓜分是由于波兰贵族力图保存已经失去存在权利的宪法和特权而引起的；那部宪法和那些特权不仅没有维持安宁和保证进步的发展，反而破坏了公共秩序，给国家带来了危害。在第一次瓜分以后，有一部分波兰贵族承认了这个错误，并且确信波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恢复；十年之后，我们看见了，波兰人是怎样在美国为自由而斗争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立刻在波兰引起了回响。宣布人权和公民权的1791年宪法成了维斯拉河两岸的一面革命旗帜，使波兰成了革命法国的前卫，并且这恰好是在一度掠夺过波兰的三个大国联合起来，以便扑向巴黎，扼杀革命的时候发生的。难道这三个大国会允许革命在这个同盟的中心扎根生长吗？——绝对不会。它们再次向波兰扑去，打算在这一次彻底消灭波兰民族。波兰打起了革命旗帜，是它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由于革

命而被宰割得支离破碎并被从各民族的名单上勾销了的国家，除了革命，已经找不到任何挽救危亡的办法了。因此，在一切革命战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波兰人。1863 年波兰人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我们今天所纪念的那次起义中宣布了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根据波兰存在一个贵族党，就认为波兰的革命者是希望恢复 1772 年的贵族波兰的贵族分子，是可笑的。1772 年的波兰已经永远灭亡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从棺材里拉起来。由于革命而站立起来的新波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将和 1772 年的波兰根本不同，就象我们尽力追求的新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本不同一样。

再说几句话。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曾经消灭了波兰的三个大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请看一下我自己的祖国——普鲁士德国吧。在民族统一的幌子下，我们把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并入我国，——现在我们有三个威尼斯[180]；我们到处都有敌人，为了供养那些同时也被用来镇压德国工人的无数士兵，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赋税。奥地利，甚至奥地利的官方都知道得很清楚，它为自己占领的那一小块波兰要付出多少代价。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奥地利曾经以占领和解放俄属波兰作为反对俄国的条件。但是，这并不在路易-拿破仑的计划之内，更不在帕麦斯顿的计划之内。至于俄国，我们可以看到：1861 年在那里爆发了第一次重大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当时解放农奴的结果使人民到处都处在群情极其激愤的状态中。俄国政府非常清楚地看见了这种危险性，可是它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它在波兰引起了 1863 年起义**；因为已经得到证实，这次起义是由它一手造成的。一当问题牵涉到维持俄国在波兰的统治时，学生运动、人民中的深刻的激愤情绪便立刻平息了，并让位给了俄国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淹没了波兰。由于对波兰进行

极其有害的斗争，俄国第一次重大的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波兰的恢复是真正符合于革命的俄国的利益的，今天晚上我很高兴知道，这个意见同俄国革命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在这次纪念大会上说出了这种看法[181])

马克思的讲话大致如下：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一①。是什么原因使工人政党这样特别同情波兰的命运呢？

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爱尔兰、在蒙古人压迫下的俄罗斯等，明显地证实了这个道理。

工人政党同情波兰恢复的另一个原因是波兰的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所具有的特点。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连结起来的锁链。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拆散这种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但是，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编者注

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分进行战斗的民族。波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过自己的鲜血；它的几个军团曾经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旗帜下战斗过；1830年它用自己的革命防止了参加瓜分波兰的国家当时已经决定了的对法国的入侵；1846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1848年波兰的子弟杰出地参加了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战斗；最后，在1871年，它给巴黎公社提供了优秀的将军和最英勇的兵士。

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地呼吸的那些短暂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波兰的囚犯——梅洛斯拉夫斯基及其难友——并宣布恢复波兰；1848年5月布朗基在巴黎领导工人反对反动的国民议会，迫使它出兵干预以保卫波兰；最后，在1871年，当巴黎工人组成政府的时候，他们表示了对波兰的尊敬，委派波兰的子弟担任军事指挥，统率他们的武装力量。

就在现在，德国工人政党也绝不会由于波兰议员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发表反动演说而分不清是非；德国工人政党知道，这些先生的行动不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私利；德国工人政党知道，波兰的农民、工人，一句话，每一个没有被本阶层的利益弄瞎眼睛的波兰人，一定了解：**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同盟者——工人政党。**[182] **——波兰万岁！**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630—633页）

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一书导言

（1875年5月）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被迫同一位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先生进行论战时写的。在一篇评论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前进》的文章（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号和第118号）中，我曾经附带提到了这位先生的名字，但是，这一提却惹起了他对我的可敬的愤怒。特卡乔夫先生立即发表了一封《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于苏黎世），在这封信中，他给我胡诌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针对着我的极端无知，谈出了他自己对俄国实际状况和社会革命前途的看法。这篇劣等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带有一般的巴枯宁主义的烙印。该信是用德文发表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人民国家报》上对它做一个答复（见《流亡者文献》第4篇和第5篇，1875年《人民国家报》第36号和以后几号）。我的答复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巴枯宁主义者进行文字斗争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一大堆简直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强加在对方身上。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对这个主要是个人方面的部分已经谈得很够了。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略去，而在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出版的单行本中只留下了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探讨1861年以来，即所谓农奴解放以来俄国的社会状况。

---

① 见本书第253—265页。——编者注

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极大的意义。现在的俄罗斯帝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这在1848年和1849年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由于德国不肯支持波兰起义并同沙皇作战(象《新莱茵报》一开始就要求的那样)，以致这个沙皇能够在1849年镇压了已经迫近维也纳大门的匈牙利革命，而在1850年又在华沙裁判了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小邦并恢复了旧联邦议会。就在不久以前，即1875年5月初，俄国沙皇正象二十五年前一样，接受了他的柏林藩臣们的效忠宣誓，从而证明了在今天他也还是欧洲的仲裁人。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德国却是同俄国最近的邻国，因此俄国反动派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德国身上。因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

但是，它的覆灭绝不能从外部引起，而外部战争只可能大大加速它的覆灭。沙皇帝国内部具有在大力促使它灭亡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波兰人。他们经过百年来的压迫，已处于这样的境地：或者起来革命，支持西欧的一切真正的革命起义，作为解放波兰的第一步；或者就只有灭亡。现在他们恰好处于这种境况，即只有在无产阶级阵营里他们才能为自己找到西欧盟友。近一百年来，他们经常被西欧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出卖。在德国，资产阶级一般地只是从1848年起才算数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它始终敌视波兰人。在法国，1812年拿破仑出卖了波兰人，而由于这次背叛，他的远征失败了，皇冠和帝国都丢掉了；资产阶级王国在1830年和1846年，资产阶级共和国在1848年，第二帝国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和在1863年都效法了他的榜样。它们都同样卑鄙地背叛了波兰人。就是现在，法国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和派还仍然匍匐于沙皇面前，希望用一次对波兰利益的新出卖来换得一个反

普鲁士的复仇的同盟，正好象德意志帝国的资产者把这同一个沙皇当做欧洲和平的保护者，也就是说把他当做德普持久合并的庇护者来崇拜一样。除了革命工人而外，波兰人不论在哪里也找不到公开的和真诚的支持，因为共同敌人的覆灭对他们两者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因为波兰的解放就意味着这个敌人的覆灭。

然而，波兰人的活动受到了地域上的限制。这种活动只限于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俄罗斯帝国的真正核心——大俄罗斯——几乎完全处于这个活动之外。四千万大俄罗斯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民族，而且经过了非常特殊的发展，所以不能从外面把任何一种运动强加给他们。而这样做也完全没有必要。的确，俄国的人民大众，农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地在脱离历史发展的泥坑中愚昧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而使得这种单调的沮丧状况中断的唯一变动，便是零星的毫无结果的起义，以及贵族和政府的新压迫。这种脱离历史的生存，已由俄国政府自己通过废除再也不能拖延下去的农奴制度以及实行徭役赎买——这个办法实行得非常狡猾，它使大多数农民以及贵族遭到了必不可免的破产，——把它结束了（1861 年）。由此可见，俄国农民现在所处的环境本身，正推动他们投身到运动中去，这个运动诚然在目前还刚刚产生，但是，随着农民群众的状况日益恶化，它将不可遏止地不断朝前发展。农民的愤恨不满，现在已经是政府以及一切不满意的人和反对党都不得不予以重视的事实了。

因此，下文中说到的俄国，不是指整个俄罗斯帝国，而是专门指大俄罗斯，这个地区最西的省份是普斯可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最南的省份是库尔斯克和沃龙涅什。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8 卷第 641—644 页）

恩格斯

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发表于1876年1月22日）

公民们：

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就拿1848年革命来说。这次革命席卷的地区，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阔得多。它吸引了奥地利、匈牙利、普鲁士。但是它在俄国军队所占领的波兰的边界停住了。当尼古拉皇帝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就对群臣说："去备马吧，先生们！"他立即动员了军队，并在波兰集结了军队，以便在适当时机调遣军队过境对付叛乱的欧洲。革命者本身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波兰将是一个决战场。5月15日，巴黎人民高呼着**"波兰万岁！"**的口号冲入国民议会，去迫使议会为波兰的独立而战。马克思和我当时在**《新莱茵报》**[183]上要求普鲁士立即对俄国宣战以解放波兰，而且整个德国先进的民主派都支持我们。可见，在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革命就必定灭亡。但是，法国的拉马丁、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沙皇的内兄）以及他的资产阶级大臣康普豪森根本不打算粉碎俄国的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力量看做他们抵御威胁到自己头上的革命的最后堡垒。当匈牙利起义者的成

功还没有威胁到战胜了维也纳起义的奥地利反动势力时，尼古拉还可以按兵不动，他的军队还可以暂时只限于扼守波兰和威胁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只有威胁到反动势力时，这些俄国军队才大举入侵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保证反动势力在整个西方取得胜利。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使我们现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39—40页）

恩 格 斯

致海尔曼·恩格斯(摘录)

(1876年12月18日)

我完全相信,战争很快就要开始。俄国人陷得这样深,已经不可能后退了,而土耳其人对于任何入侵当然要进行抵抗。英国将来无论如何是要保卫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但目前我们认为它还不会这样做;我确信,如果让土耳其人放手地去干,他们是能很好地收拾俄国人的。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阵地是欧洲最坚固的阵地之一,况且,只要那里还没有修好铁路和公路,在那里可以使用和供养的俄国军队就最多不会超过十万至十五万人。因此在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那和苏姆拉① 四边形要塞区战争大概将是持久的,而且土耳其人将比俄国人更容易坚持这场战争。所谓的保加利亚自治无非是要把土耳其人从这个坚固阵地上驱逐出去并使君士坦丁堡暴露出来以便俄国入侵。而土耳其人当然不会容许任何会议把这强加给他们。[184] 如果你想确切了解,俄国人在那里将碰到些什么困难,我可以送给你一件圣诞节的礼物——毛奇的著作《1828—1829年俄土战争》1836年柏林版;这本书很好,你同时还可以从中找到对于了解即将爆发的战争所必要的专门地图。这一次同1828年比较,差别如下:

(1)土耳其人有军队,

① 保加利亚称作:鲁塞、锡利斯特腊、瓦尔那和苏门(现在称作:科拉罗夫格勒)。——编者注

（2）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等等的四周设有现代化的独立的堡垒，

（3）土耳其人拥有仅次于英国的最强大的装甲舰队并在黑海上完全占统治地位，

（4）俄国军队正在改组的过程中，因此对战争准备不足。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第216—217页）

恩 格 斯

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摘录）

（1878 年 1 月 12 日）

我认为，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由于所谓解放农奴而形成的状况，早在战争以前就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次大改革进行得如此巧妙，使贵族和农民最后都破产了。随后又实行了另一项改革，这一改革似乎是为了让省和县在中央政府不加干涉的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选举行政机关，但是改革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本来就不堪忍受的捐税。

由于各省径直负担自己的管理费用，国家现在的开支就比较少了，但是收的税还是那么多；因此就另设新的捐税来弥补省和地方的开支。后来还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又等于新设了一项比其他捐税更重的捐税，这也意味着建立一支新的、人数更庞大的军队。

结果，财政崩溃的局面加速到来了。早在战争以前，国家就陷于破产的境地。俄国国库由于广泛参与了 1871—1873 年时期的骗人的投机勾当，使国家陷于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于 1874 年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并且长期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和商业。当时的形势就是，在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的”战争[185] 爆发以后，由于到处借不到外债，而内债又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动用银行的数百万款子（准备金）和发行纸币；结果纸币日益贬值，它的比价很快

地——只过了一两年——就跌到了最低限度。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俄国的1789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1793年。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将很快地爆发，也可能就在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预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宫廷，从没落的和*frondeuse*〔**因不满而反抗的**〕贵族中间开始。但是革命一爆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连1793年也要为之逊色的场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后备军；它在1798年、1805年、1815年、1830年、1848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军一旦被消灭，到那时再来看，事情将会怎样转变！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133—134页）

马 克 思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摘录)

(1878年2月4日)

我们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这有两个理由：

(1)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

(2)因为**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它的因素大量存在），**从而会加速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

情况的发展不是这样。为什么？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叛卖**。

英国——我指的是英国政府——譬如说，在塞尔维亚人被击溃时救了他们；它造成一种假象，仿佛俄国人（通过英国）**建议停战，停战的第一个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从而以欺骗手段使土耳其人停止战斗。**只是由于这样，俄国人才能取得最近一些突然胜利**。否则他们的军队很大一部分会饿死和冻死；只是由于开辟了通往鲁美利亚——那里可以获得（即夺取）储备品，而且气候较温和——的道路，俄国人才得以逃出挤满俄国士兵的保加利亚陷阱，蜂拥南窜。迪斯累里在自己的内阁中，被伊格纳切夫的密友、俄国奸细索耳斯贝里侯爵，common place① 中的大科夫塔[186]得比伯爵和如今已辞职引退的卡纳尔文伯爵捆住了(现在还捆着)手脚。

① 双关语：《common place》——"老生常谈"、"庸俗的话"；House of Commons——英国下院。——编者注

奥地利阻挠土耳其人获得他们在门的内哥罗的胜利果实等等。

最后——这是他们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及时进行革命**；因此，旧塞拉尔制度的化身、苏丹[①]的女婿**马茂德-达马德**仍然是战争的真正指挥者，而这就无异于**由俄国内阁直接指挥反对自己的战争**。这家伙一再使土耳其军队处于瘫痪状态和陷入窘境，这一点连最小的细节都可以得到证明。其实这在君士坦丁堡是众所周知的，这也就**加重了土耳其人的历史过失**。在这样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俄国政府懂得，达马德对它有什么价值；为了使**米德哈特-帕沙远离**君士坦丁堡和让达马德继续执政，它比夺取**普勒夫那施展了更多的战略和策略**。

当然，为俄国的胜利在暗中帮忙的是……**俾斯麦**。他建立了**三帝同盟**[187]，从而约束了**奥地利**。即使在普勒夫那陷落之后，奥地利只要派出十万人，俄国人就不得不乖乖地撤兵或满足于极其微小的战果。奥地利的**退出**立即使亲俄派在英国占了上风，因为对于英国来说，法国（由于当时的首相格莱斯顿先生加速了色当会战之后的灾祸）已不再是大陆上的军事强国了。

这样所造成的结果简直就是**奥地利的崩溃**，如果俄国的媾和条件被接受[188]，从而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今后仅仅在形式上存在的话，这一崩溃是必不可免的。土耳其是**奥地利抵挡俄国**及其斯拉夫侍从的堤坝。因此，在适当时机自然要首先把“波希米亚”乞求到手。

但是普鲁士作为普鲁士——即就其作为德意志的独特的对立面而言——还有其他的利益：这个意义上的普鲁士是指**它的王朝**；

---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它是以俄国为“**垫板**”而**形成**现在这种状态的。俄国的失败，俄国的革命将会是普鲁士的丧钟。

否则，在普鲁士对法国取得巨大胜利并成为欧洲的头号军事强国之后，冯·俾斯麦先生本人大概也不会使普鲁士在俄国面前再一次处于象1815年那样的地位，而那时它在欧洲国家中是无足轻重的。

最后，对于俾斯麦、毛奇等等这些大人物来说，现在**开始的一系列欧洲战争**可望给他们个人带来的好处，……也远不是无关紧要的。

十分明显，普鲁士到时候必将要求“赔偿”，因为**俄国的胜利**全是靠着**它**才取得的。从俄国人对待罗马尼亚政府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本来是罗马尼亚政府在俄国的补充部队到达之前在普勒夫那城下**救了**那些俄国人。现在，卡尔·冯·霍亨索伦必须把俄国人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割让的贝萨拉比亚部分领土归还他们，以表示感谢。柏林不会轻易同意这样做，这一点彼得堡当然知道，并且甘愿付给慷慨的补偿。

但是这整个历史还有其它方面。**土耳其**和**奥地利**是1815年重新修补过的旧欧洲国家制度的最后支柱，随着**它们的**覆灭，这种制度将被彻底摧毁。将要在一连串战争（起初是“区域性的”，最后是“全面的”）中出现的这种崩溃，会加速所有这些炫耀武力、外强中干的国家的**社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灭亡**。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第294—297页》

马 克 思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摘录)

(1878 年 2 月 11 日)

俄国的外交远不是支持"基督教"对"新月"① 的无理的仇恨。它认为，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已被压缩到君士坦丁堡和鲁美利亚的小部分地区，但是在小亚细亚、阿拉伯等地却有巩固的内地，因而应该通过攻守同盟使之受制于俄国。

在最近的一次征讨中，十二万**波兰人**在俄国军队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要做的是把**土耳其人**同波兰人合并到一起，于是欧洲的两个最骁勇的、渴望向欧洲复仇雪耻的民族，就都将站到**俄国的旗帜**下，——主意倒不错！

1829 年普鲁士的作法和现在正好一样，但当时它充其量还只是欧洲小国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显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

吉比奇使俄军在越过巴尔干(**1829 年 7 月**)之后陷入了绝境，对此**毛奇**作了很好的描述。[189] 当时只有靠外交手段才能解救它。

第二个战役的结局几乎和第一个战役同样糟糕[190]，此后会是 finis Russiae——会是俄国的末日。因此沙皇**尼古拉**以参加**普鲁士亲王威廉**(如今是德国皇帝)**的婚礼**为名，于 1829 年 6 月 10 日到达柏林。他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戴着胜利的花冠"[191])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影响，让它派出代表，以便开始议和。这时吉比

① 新月是奥斯曼帝国的旗帜上的标志，因此新月常被用来表示土耳其人的权力。——编者注

奇还没有越过巴尔干，他的大部分军队被阻截在锡利斯特里亚城下和苏姆拉[1]附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按照同尼古拉的协议，正式派遣**缪弗林**男爵为驻君士坦丁堡的特命公使；但他在那里应当作为**俄国**利益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缪弗林简直是个俄国人，正象他本人在《我的一生》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样；1827 年他拟定了俄国进军计划，他极力主张吉比奇不惜任何代价越过巴尔干，而他自己则以调停人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阴谋活动；他自己说，被这次进军**吓坏了的**苏丹[2]将会求助于"他这位朋友"。

在保障欧洲和平的幌子下，他把法国和英国拉到自己方面来；对于后者，他的办法是通过英国大使、亲俄的罗伯特·戈登对他的哥哥**阿伯丁伯爵**施加影响，又通过阿伯丁对**威灵顿**施加影响，威灵顿后来对此懊悔万分。

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时，于 **7 月 25 日**(1829年)满意地收到列施德-帕沙关于开始和谈的书面邀请。**同一天**，缪弗林初次同罗伊斯-埃芬蒂(土耳其外交大臣)[3]会谈，他以自己的(罗伊斯亲王[4]般的)激烈讲话吓倒了对方；其间他还提到了戈登等等。在普鲁士公使（在英国**大使**戈登和法国**大使吉埃米诺**支持下；二者都已被**缪弗林**说服)的压力之下，苏丹接受了下列五项和平条件：(1)奥斯曼帝国的完整；(2)保留土耳其政府和俄国之间原有的条约；(3)土耳其政府参加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1827 年 7 月 6 日**签订的)有关调解希腊问题的伦敦公约；(4) 切实保证黑海航行自由；(5)土耳其和俄国代办进一步会谈有关双方赔偿的要求及其他一切要求。

---

① 保加利亚称作：锡利斯特腊和苏门(现在称作：科拉罗夫格勒)。——编者注

②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③ 括号内的说明大概是威·李卜克内西加的。——编者注

④ 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

8月28日，两名土耳其全权代表，萨迪克-埃芬蒂[1]和阿卜杜-喀德-贝伊，在居斯特尔（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武官）陪同下到达阿德里安堡[2]，俄国总参谋部设在这里已经将近一星期。9月1日，俄国全权代表（阿列克塞·奥尔洛夫和帕连）刚刚到达布加斯，吉比奇没等他们到来便开始了谈判。

但是在谈判期间吉比奇一直把自己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他（不顾自己的困境，或者说得确切些，是由于这种困境）骄横无耻地要求土耳其全权代表在八天的期限内同意下列条款：

布来拉、茹尔日沃[3]和卡拉法特的要塞应当拆毁，这些地方本身划归瓦拉几亚。土耳其把黑海上的阿纳帕和波提与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割让给俄国；七十万“布尔斯”（约一亿二千万法郎）的军事赔款，缴纳赔款的保证是，将锡利斯特里亚和多瑙河各公国留给俄国人作抵押。给俄国商人大约一千五百万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赔款应分三期缴纳，每付款一次，俄国军队就后撤一步，先撤到巴尔干山麓，然后撤到这个山脉以北，最后撤到多瑙河彼岸。

土耳其政府对这些条件提出抗议，这些条件同沙皇[4]关于不提过分要求的保证是显然矛盾的。新任普鲁士公使罗伊埃尔（缪弗林，这位“土耳其政府的朋友”和和平天使干完自己的刽子手勾当以后，于9月5日溜走），和受缪弗林欺骗的吉埃米诺将军以及罗伯特·戈登爵士一道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抗议，因为这种蛮横态度违背了约定的条件，这甚至使得“戴着胜利的花冠”的人也感到走得太远了。吉比奇知道，他在军事方面处境困难，于是作了虚假

---

① 穆罕默德-萨迪克-埃芬蒂。——编者注

② 土耳其称作：爱德尔纳。——编者注

③ 罗马尼亚称作：朱尔朱。——编者注

④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的让步：同意从正式和约中删掉关于**军事赔款数额**的条款；缩减赔偿俄国商人的第一期付款额，因为**正象土耳其代表声称的**，“最无知的人也知道，土耳其政府无力支付”。和约终于在9月5日签订。

欧洲反应强烈，英国非常愤慨；威灵顿大发雷霆；连阿伯丁也从紧急报告中看出，和约的每一项条款都包藏着危险，因而力图缔结一项普遍盟约，由**所有大国**（包括俄国在内）**保证东方的和平**。奥地利没有反对；但**普鲁士破坏了这个计划**，拯救了俄国，使它摆脱了欧洲会议对它的威胁。（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准备实行政变，打算同**俄国**订立**秘密**协定；还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规定法国应该**取得莱茵河各省**。[192]）

这种情况使涅谢尔罗迭感到可以放手地干；他给英国大臣们发了一封蛮横无礼和口吻轻蔑的电报，也就是发往伦敦给利文伯爵（俄国大使）的那封电报。

这就是普鲁士当时的所作所为，而如今它又以更大的规模重复了同样的作法。这班霍亨索伦真是好样的霍亨施陶芬！俾斯麦在他处理奥地利和法国事务时[193]毫不费力地表现了国务才略；反对奥地利时他依靠波拿巴和意大利人，而在反对法国时他得到整个欧洲的支持。此外，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由形势提出并做好了准备的。

现在形势复杂化了，才能就完了。①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第298—302页）

① 在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中，这封信后面刊有下面一段话，这段话没有确定是马克思信中的一部分还是李卜克内西本人写的：“俄国内部并不平静。温和的亚历山大想在**新地岛**为**政治犯**建造**苦役监狱**。这是la mort sans phrases——真正的死刑。最好是在最近一两年内奠定和平。这首先有利于俄国内部崩溃的进一步发展。俄国政府的第一个步骤会是（按照1815年以后普鲁士的样子）迫害**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者**。需要他们时就利用他们；军事上的忙乱一停止，惩罚立刻接踵而至。”——编者注

恩 格 斯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摘录)

(1878年2月中—3月中)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能说俄国有过什么值得提起的工人运动。但是，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极大多数俄国人民由束缚在土地上的、必须为他们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而它的实行却无论是对从前的地主或从前的农奴都没有好处。农民公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地主则因为把土地让给农民，部分地也因放弃在此以前属于他们的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应该得到赎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钱来付给地主，于是国家就来干预这件事情。一部分赎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前独自耕种的土地转交一部分给地主；其余部分的赎金则以政府的债券支付，债券先由国家垫付，而农民则应当每年一次地分期连利偿还。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债券卖光以后把钱花完了；这样一来，地主现在不仅比过去穷，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们的领地，因为农民的确不肯去为他们工作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芜。至于说到农民，他们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往往少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足以养家活口的地步。这些份地多半是领地中最坏的

土地，是沼泽地或其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过去属于农民的和由于他们的劳动而改良了的好地，却转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每年还必须向政府支付国家贷给他们作赎金的债款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另外，向他们征收的赋税也在年年增加。其次，在解放以前，农民拥有公社对地主土地的某些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的权利，砍伐林木用于建筑和其他目的的权利等等。新的办法蓄意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如果他们想重新享有这些权利，就得再同他们从前的地主讲讲价钱。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负债累累的时候，农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尽了一切可能来加速这个革命。贪污之风渗透到官场各方面，并使任何可以设想的善良意图都失去作用，这种传统的贪污风气象往常一样可恶地保存了下来。而当土耳其战争爆发的时候，贪污之风在每个公共机关简直是盛极一时。在克里木战争快结束时就已混乱不堪的帝国财政，这时处于愈来愈悲惨的境地。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签订，结果，除了签订新的借款以外，就没有别的钱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审法庭，而由贵族、城市资产者和农民按照规定选出的代议机关，准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开始在政治上轻佻地献媚。但是，舆论对政府的善良意愿估计错了。报刊变得太直率。陪审员也开始真正替那些政府甚至想不用任何罪证就加以判罪的政治犯辩护。地方和省的会议① 一致声称：政府用它

① 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会议。——编者注

的解放法令破坏了农村，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人们甚至传说要召开国民议会，认为这是结束几乎不堪忍受的混乱状态的唯一方法。此外，波兰人再也不愿让人用诺言来款待他们，他们举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起义[194]，以致于只有拿出帝国的一切力量和俄国军官的全部凶残，才能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报刊的嘴被堵住；政治犯被转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再理睬。但是已经晚了。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政府丧失了威信。对它的巩固和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任何反抗的信心已经消失。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些力量再象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况且，政府尽管力图回到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洲面前，毕竟还是企图表面上保持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结果是一连串的动摇和犹豫：今天作出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又循环反复，半准许，半收回——政策时时在变化，结果每个人都看清了这个政府的内部软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政府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象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他们向欧洲说，这次打仗是要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人长期横行霸道之下拯救出来，而对俄国人民则说，进行战争为的是使同族的斯拉夫兄弟挣脱土耳其的羁绊，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经过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后，现在才把土耳其的抵抗同样不光彩地镇压下去，——这部分地是靠背叛，部分地是靠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而使这次战争结束了。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或者是在即将召开的欧洲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上，俄国不得不从现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以致巨大的牺牲和微不足道的成果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极其猛烈的革命爆发；或者是俄国要在欧战中保卫它新夺得的地盘。一个力量已经消耗一半以上的国家，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它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不管这种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而在上述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这个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无力避免这个革命。但是，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155—15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880 年 11 月 27 日）

公民们：

波兰人在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成立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考斯丘什科和华盛顿并肩战斗。1794 年，当法国革命好不容易地抵抗同盟的武力时，光荣的波兰起义使它摆脱了威胁。波兰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法国革命却得到了拯救。起义失败的波兰人加入了“长裤汉”军队，帮助他们去粉碎封建的欧洲。最后在 1830 年，当尼古拉皇帝和普鲁士国王① 蓄意重新进攻法国以实现其复兴正统王朝的计划时，你们今天所纪念的波兰革命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秩序笼罩了华沙”。

“波兰万岁！”这个在当时响彻整个西欧的口号，不仅表达了对遭受暴力摧残的爱国战士们的同情和钦佩，人们还用这句口号向这个民族表示敬意，这个民族所举行的各次起义——对其本身说来是多么不幸的起义——经常是制止了反革命的进攻，这个民族的优秀儿子在各地的人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时候，从未停止过以武力回击敌人。另一方面，波兰的被瓜分，加强了目的在于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掩饰沙皇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的神圣同盟。因此，“波兰万岁！”这个口号本身就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消灭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专制，消灭蒙古人对现代社会的统治！

从1830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政权以来，无产阶级运动就开始显露出来。早在1840年，英国的有产阶级不得不乞灵于武力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组织宪章派。与此同时，在独立的波兰的最后一个角落，即在克拉柯夫，于1846年爆发了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革命[195]。从那时起，波兰就失去了有产者欧洲的任何虚伪的同情。

1847年，在伦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196]，根据大会的决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结尾提出一个新的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波兰有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上，著名的列列韦尔和他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1848年和1849年，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的革命大军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指挥官，都表现得出类拔萃。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趋向被淹没在六月日子的血泊中，然而1848年革命——决不可以忘记这一点——的熊熊火焰几乎燃遍了整个欧洲，有个时期曾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共同体，从而为国际工人协会奠定了基础。1863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议，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最后，在波兰流亡者中间也有巴黎公社的忠实保卫者。公社失败以后，只要是波兰人，就会被凡尔赛军事法庭下令枪杀。

总之，在自己的祖国以外，波兰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大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战士。

现在，当这一斗争正在波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时候，愿它得

到宣传界、革命报刊的支持，愿它和我们俄国兄弟的趋向联合起来；这将是重提“波兰万岁！”这一老口号的又一理由。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前委员

签名：**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弗·列斯纳

1880年11月27日于伦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265—26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2年1月21日）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①，由《钟声》[197]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

① 这个译本实际是在1869年出版的。——编者注

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198]，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231页）

恩 格 斯

致卡尔·考茨基(摘录)

(1882年2月7日)

关于在最近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此外，在1873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199]，所以当时波兰完全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恢复，成为以后的真正的波兰的萌芽。如果俄国的先生们不在最近停止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和在黑塞哥维那的挑唆[200]，他们就会招致一场他们自己、奥地利和俾斯麦都控制不了的战争。黑塞哥维那的事态严重，只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和沙皇感到有兴趣；波斯尼亚匪帮则同现在在那里活动的愚蠢的奥地利大臣和官僚一样，并不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因此，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不经过起义，而仅仅由于欧洲的冲突就恢复独立的小波兰，正如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普鲁士小德意志的建立并不靠这个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革命道路或议会道路，而是靠战争一样。

因此，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波兰人在一切危急关头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革命战争

的一切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使他们失去恢复波兰的期望，或者使他们深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他们就会对欧洲革命失去任何兴趣。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第一，他们在1863年发明和运用了俄国人现在很有成效地在仿效的斗争方法[201]（《柏林和彼得堡》附件二）；第二，在巴黎公社中，他们是唯一可靠而有才干的统帅[202]。

然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意向的是那些人呢？第一，是欧洲的资产者，波兰人从1846年起义以来，并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对他们失去了任何信任；第二，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例如以赫尔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蒲鲁东。要知道，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象法国的天生的革命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但目前还能给我们造成不少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在准备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战争会不会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只有一点是无疑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本身出色地进行着的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将完全被破坏，并且被推到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三年到十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宪制的“新纪元”[203]的到来将有一个短时间的延期；在德国领导下实现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间；最后，产生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了，或者正

是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甚地成为我们的死敌。卡特柯夫们、阿克萨柯夫们、伊格纳切夫们及其同伙都知道，只要沙皇制度一被推翻，俄国人民一登上舞台，他们的统治就永远结束了。因此，在国库空虚而又没有一个银行家肯借给俄国政府一文钱的时候，就产生了进行战争的这种热望。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恨死了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即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而这些人是必须用暴力包括在大斯拉夫沙皇帝国之内的，帝国未来的首都将是沙皇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您可能要问我，难道我对小的斯拉夫民族和被插进斯拉夫民族中去的三个楔子——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那些民族不抱任何同情吗？的确是少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呼救道："上帝呵，世界上竟没有人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原文如此〉！"①，彼得堡予以响应，于是捷克的整个民族运动都盼望沙皇"公正地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加里西亚人，卢西人（至少是一部分）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维护这些目的。只有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这些小民族的民族意向同想取得世界霸权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脱离了联系时，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行动自由，而且我深信，对于多数奥地利—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只要有六个月的独立，他们就会央求接受他们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些小民族拥有他们现在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硬说自己拥有的那种权力，即阻止修筑通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铁路网的权力。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5卷第262—264页）

---

① 扬·科勒《光荣的女儿》，第三篇《多瑙河》。——编者注

恩 格 斯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摘录)

(1882 年 2 月 22、25 日)

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

但是，我要请您别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意见强加在我的头上。奥格斯堡《总汇报》已经使用了多年的一些奥地利的官方论据，同我毫不相干。其中正确的东西，已经过时，而没有过时的东西，又不正确。我决没有丝毫理由抱怨奥地利的离心运动。一旦俄国爆发了革命，也就是说，一旦那里召集了某种代表会议，“对付俄国的堤防”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从那一天起，俄国就会忙于内部事务，泛斯拉夫主义就会彻底垮台，帝国的崩溃就会开始。泛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有教养的阶层”、城市和大学、军队和官吏的人为的产物；农村对它毫无所知，甚至领地贵族也如此窘困，以致于诅咒一切战争。从 1815 到 1859 年，奥地利尽管实行胆小而愚蠢的政策，的确曾经是一道对付俄国的堤防。可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前夜，重新让它充当“堤防”角色，那就意味着延续奥地利的存在，重新为它的存在提供历史的根据，推迟它无法避免的崩溃。

这真正是历史的讽刺：奥地利容许斯拉夫人进行统治，就是自己承认，至今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对俄国的战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斯拉夫人在奥地利的统治。

您说，将来一旦各斯拉夫民族（又把波兰人除外！）再也没有根据把俄国看作是他们的唯一的解放者的时候，泛斯拉夫主义就完蛋了。这说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似乎有道理。但是，第一、泛斯拉夫主义的危险——既然存在这种危险——不在边远地区，而在中心地区，不在巴尔干，而在给沙皇制度提供兵员和金钱的八千万奴隶当中。由此可见，就是应该把杠杆摆到这里，要知道它已经摆好了。难道要用战争再把它搬开吗？

第二、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唯一的解放者，这种情况怎么会产生，我不打算作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看法是这样，这就够了；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而且只要沙皇制度没有推翻，这种看法会一直保持下去；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民族就会站在沙皇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它们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们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们的直接的敌人。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

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象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沙皇怎样去"解放"呢？请去问问乌克兰的农民，叶卡特林娜起先也曾把他们从"波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过（借口是宗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后来吞并他们。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欺骗实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仅此而已。只有实行这种侵占才能有力地影响俄国农民的宗教传统，鼓动他们去保卫神圣的沙皇格勒，延长沙皇制度的寿命。只要俄国人一占领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就完了：这些兄弟们（bratanki）很快会感觉到，过去甚至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他们还要好过得多。这些兄弟们完全是因为幼稚透顶，才相信沙皇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本身的利益。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卷第270—273页）

恩 格 斯

致维·伊·查苏利奇(摘录)

(1885 年 4 月 23 日)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个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 1789 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象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 3 月 13 日[204] 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

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205])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通过小小的密谋活动震撼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①。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迸发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206])，那末，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207]，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您不妨看看违反自己意志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② 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③ 一场宫廷阴谋，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

①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我不说是在俄国，因为在远离行政中心的省份，这样的打击是无法进行的。"——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③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贵族集团或交易所集团，——好吧，祝你成功！——一直到"。——编者注

寡头——都有其代表人物，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450—452页）

恩格斯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摘录)

(1886年9月13—14日)

亲爱的倍倍尔：

在整个保加利亚的和东方的事件[208]中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俄国人只是现在才发现，由于兼并亚尔萨斯等等，他们已成了欧洲的主宰，而马克思早在1870年就对国际谈到过这一点①。对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战争以来各国都实行了(俄国是在1874年)普鲁士军事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要建立一支相称的强大军队需要十至十二年。现在，这样的军队俄国和法国也都有了，因而现在可以动手了。正因为如此，俄国军队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现在对政府大施压力，迫使沙皇② 不得不克制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感，而提出两种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者同法国结成同盟，或者使俾斯麦赞同俄国的东方政策。俾斯麦和威廉曾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是抗击俄国，那就或者导致法俄同盟和世界大战，或者由于泛斯拉夫主义者同虚无主义者结成同盟而使俄国革命不可避免；要么是向俄国让步，那就要出卖奥地利。俾斯麦和威廉不可能采取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这一点我认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很清楚的，而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和德国的利益之不能相容现在暴露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得非常明显，这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德意志帝国由于以普鲁士为基础而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这一事件在冬季结束之前暂时还能多少掩盖一下，但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胃口是越吃越大的，而象目前这样有利的机会他们以后也决不会再有了。如果俄国人一旦占领了保加利亚，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例如德奥英联盟）阻止他们，那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俾斯麦大声疾呼，要英国必须采取积极反俄的政策，《旗帜报》根据他的指示现在几乎每天叫喊，说什么英国应该防止世界大战。

不管怎样，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十分尖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超过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至于结局如何，即谁将成为胜利者，这是不能预言的。德国军队无疑是最好的，并有最好的指挥，但它只是许多军队中的一支。奥地利人的力量在军事上（军队的数量，特别是指挥）也难以估计；他们拥有最好的士兵，但老是吃败仗。俄国人一贯陶醉于自己庞大的（纸上的）兵力；他们在进攻方面极其软弱，但在保卫本土方面却是强有力的。他们的最大弱点，除了最高指挥部以外，就是缺乏指挥大部队的有能力的军官；这个国家造就不出这样多有教养的人。土耳其人是出色的士兵，但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即使不是卖身投靠，也是一贯很糟糕的。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政治上过分发展，不容许在本国实行一年制志愿兵这样的制度，再加上法国资产者（就个人来说）又根本不爱打仗，所以，他们也感到缺少军官。最后，除了在德国人那里以外，新制度无论在谁那里都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所有这些大国，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是难以估计的。关于意大利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将被任何另外一支军队所击败。但是，在世界大战中，这些大国将怎样互相结合或互相对抗，这也是难以预

料的。英国(它的舰队以及它的巨大的辅助资源)的威力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日益增长,如果它在开始时把自己的兵力留作后备,那末到最后,一个六万人的英国军团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所有这些估计都是以各国内部一切不变为前提的。不过在法国,战争会使革命分子上台执政;在德国,打败仗或者老头子[①]死亡会引起整个制度的急剧变化,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各交战国的重新组合。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

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这个革命将使法国人充当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者的角色。我不知道,这种结局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最为有利;那时,理想的法兰西沙文主义将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在战败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只有导致同法国媾和才有好处。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干起,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

不管战争是否发生,至少已经使德国庸人从昏睡中惊醒了,而且他们终将再次被迫积极参与政治。由于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和半封建基础上的现代普鲁士波拿巴主义之间,还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所以,如果德国资产者最后将再一次被迫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而反对现存制度,使事情哪怕稍微前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进一点，那对我们只会有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现在才如此迫切地等待着国会新的例会的召开。我现在连一份德国报纸都得不到，如果你能够不时地把那些报道重要会议，特别是报道对外政策的德国报纸寄给我，这将是对我的一个很大帮助。

李卜克内西也谈到很多关于俾斯麦向俄国人屈膝[209]因而在德国引起愤慨的情况。他在伊斯特勃恩海滨我那里住了几天，非常乐观，象往常一样“一切都好得很”。由于右翼先生们已经不再制造任何重大的争吵，并且不得不作一些让步，所以李卜克内西又能够讲得非常革命，并且尽可能扮演最坚决的角色了。我已十分明确地向他暗示，对这一事件我所知道的也许比他希望我知道的还要多些，但是由于他已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不采取十分热诚的态度。关于我同他的谈话，他给你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因此也就不能对此负责。

9月14日

我又一次被打断了，但我尽量在晚邮班之前把信写完，好让你至迟在星期四早晨收到这封信。匈牙利议会日内也要开会，那里关于保加利亚事件的谈论不会少。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是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把俄国逼走，那时革命就会在那里爆发。泛斯拉夫主义者会参加到里面去，但第二天就会受到愚弄。马克思总是很有把握地谈到这一点——而我不知道有谁能象他那样清楚地了解俄国，了解俄国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他说，在俄国，旧制度一旦崩溃（是谁使它崩溃的无关紧要），议会一旦召开（是什么样的议会无关紧要），俄国的侵略政策就将完结，因为那时国内问题将压倒一切。而这个最后的反动堡垒一旦垮台，它给予欧洲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们在德国将首先感觉到。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卷第512—516页）

恩格斯

致劳拉·拉法格(摘录)

(1886年9月13日)

摩尔在1870年致国际的宣言[①]里说过,亚尔萨斯等地的被兼并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主宰,现在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一点。俾斯麦不得不完全屈服,俄国的意愿必须实现。关于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和平的保卫者,不经它的允许谁也不准放一枪的梦想破灭了。现在德国的庸人发觉自己是沙皇的奴隶,就象当年普鲁士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那个时代一样。现在他们和俾斯麦冲突起来,其实俾斯麦只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德国,不仅庸人们,而且军队中的怒火也很大。李卜克内西说,1866年以来,对政府的行动还从来没有表现出如此愤激的情绪。但是,事情不会就此结束。如果巴尔干的戏剧进入第二幕,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就将爆发一场战争,那时(听其自然吧!)战火可能会燃遍整个欧洲。我将对此感到遗憾。当然,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当然,这场战争也象其他一切事情一样最终一定会对我们有利。但是,这样一场战争毕竟会推迟我们的胜利,所以另一条道路要稳妥些。不过除了俄国爆发革命,几乎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而只要亚历山大[②]听命于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便是极少可能的。事实上,吉尔斯对俾斯麦提出的决定

---

①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性论点就是：我们处在泛斯拉夫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如果我们保持和平，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宫廷政变就将是既成事实，因此我们应该向君士坦丁堡推进，这比俄国革命对你们，俾斯麦和威廉，害处要小些。今年冬天会见分晓，所以我一定要在明春前把第三卷① 准备好。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卷第519—520页）

① 《资本论》。——编者注

恩格斯

欧洲政局

（1886年10月25日）

1878年3月，迪斯累里把四艘装甲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单是这些军舰的出现，就制止了俄军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和破坏圣斯蒂凡诺条约。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210] 俾斯麦得以使俄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达成协议。奥地利不公开地得到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保加利亚和鲁美利亚则被置于俄国的极大影响之下。这种情况使人能够设想，如果俾斯麦将来让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把萨罗尼加和马其顿留给奥地利。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一样。[211] 波斯尼亚是奥地利的一个固定吸血罐，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的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人也象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不再信任奥地利，这是俄国政府政策的重要胜利。

在塞尔维亚曾经有斯拉夫主义、因此也是俄罗斯主义的倾向，但是自从它解放以来，它沿袭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办法。年轻人到奥地利的大学上学，官僚制度、法典、诉讼程序、学校，都照抄奥地利的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俄国不能让保加利亚也这样效法他人，它不愿意为奥地利火中取栗。因此保加利亚就被建成为俄国的总督管辖区。官厅、军官和士官、官吏，总之一切制

度都是俄国式的。赏给保加利亚的巴滕贝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

俄国政府的统治(先直接,后间接),不到四年就破坏了保加利亚人对俄国的一切好感,虽然这种好感曾经是情深意挚的。居民们对于"解放者"的厚颜无耻越来越反感,甚至象巴滕贝克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观点、只愿效忠沙皇、但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温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驯服了。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驱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它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它必须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它还需要一点爱国幻影。在拿破仑第三时期,莱茵河左岸曾把革命的激情转移到国际事务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激动不安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邦。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须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情势是有利的。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播下了法国和德国不和的种子,看来这会使这两个国家保持中立。奥地利单独是不能对付俄国的,因为它的最有效的进攻武器——号召波兰人——始终会被普鲁士打掉。而占领波斯尼亚这一强盗行为,又造成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亚尔萨斯。意大利站在标价最高的方面,也就是说,站在俄国方面,俄国给它提供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又加上了达尔马戚亚和的黎波里。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派格莱斯顿,听从俄国的诱劝,在和平时期**占领了埃及**。[212] 这就造成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不和,这也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耳其**,即把土耳其的领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结成同盟**。此外,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得

心应手，他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保加利亚人对于俄国的暴政的愤懑，成了开始军事行动的借口。1885年夏，保加利亚与鲁美利亚开始受到诱骗，说它们可以合并（这种合并，圣斯蒂凡诺和约保证过，柏林条约又取消了）；人们对它们说，如果它们再投入俄国这个解放者的怀抱，俄国政府就会执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这种合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应当首先赶走巴滕贝克。后者及时做了戒备，他破例地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他实现了完全于自己有利的、俄国本想用来对付他的那种合并。从此以后，巴滕贝克和沙皇之间便开始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个斗争起初是隐蔽的，曲折的。人们为巴尔干的小国制造了路易·波拿巴的妙论的新版，按照这种妙论，如果至今还是分散的民族〔Volk〕，例如意大利或德意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Nation〕，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就有权要求领土补偿。塞尔维亚吞下了这枚诱饵，向保加利亚宣战。俄国的胜利就在于：为它的利益而燃起的这场战争，全世界都看到是在奥地利保护下进行的，奥地利不敢阻止这场战争，它害怕俄国派会在塞尔维亚上台。而俄国方面则瓦解了保加利亚的军队，它召回全体俄国军官，即整个总参谋部和全部校级军官，一直到营长。

然而，出乎一切意料，保加利亚人在没有俄国军官的情况下，以二比三的力量击溃了塞尔维亚人，赢得了惊愕的欧洲的尊敬和钦佩。胜利的原因有二：首先，亚历山大·巴滕贝克虽然是一个很差的政治家，然而却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用在普鲁士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来指挥战争，而塞尔维亚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模仿奥地利的。因此这是1866年波希米亚战役的再版。[213]此外，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

已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构成他们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氏族**公社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原始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特别勇敢的原因。

所以，对于俄国说来，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切得从头开始。为对抗革命因素而煽起的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一天比一天增强，已经成为政府的危险。沙皇前往克里木，俄国报纸报道他将完成一番伟绩；他竭力拉拢苏丹，不断向苏丹表明：他的昔日盟友（奥地利和英国）正在出卖他，掠夺他；而法国已完全受命于俄国，并且盲目地跟着它走。但是苏丹竟充耳不闻，所以大批武装仍放在俄国的西部和南部暂不动用。

沙皇从克里木回来了（在今年6月）。但是在这段时期，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蔓延的运动不能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① **在他的向沙皇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214] 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纸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有力的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纸不说话。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由于害怕革命，由于担心斯拉夫主义者与立宪派、虚无主义者，最后，与所有心怀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只好让步了。

财政困难使局势复杂化。谁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个从1870年至1875年在伦敦已经借了十亿零七十五万法郎和正在威胁着欧洲和平的政府。两三年以前，俾斯麦帮助这个政府在德国借到三亿七千五百万法郎，但是这笔借款老早就已经吃光了，而没有俾斯麦的签字，德国人是不会拿出一文钱来的。而这个签字只有以屈辱性的条件为代价才能得到。国家纸币发行量太大了，一个银卢布

① 尼·亚·阿列克谢也夫。——编者注

值四个法郎，一个纸卢布值两个法郎二十生丁。武装耗费了巨款。

总之，得采取行动。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获胜，或者是革命。吉尔斯曾访问俾斯麦，并向他介绍了形势，此人对形势有很好的了解。为了奥地利的利益，俾斯麦本来是愿意节制沙皇政府的食欲的，这个政府的贪而无厌使他不安。**但是，俄国的革命意味着俾斯麦制度的垮台。**没有俄国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军，容克地主在普鲁士的统治连一天也维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德国的局势，它会一举而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是他取得统治阶级支持的保证），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

俾斯麦知道沙皇制度的存在是他的全部制度的基础，他急忙到维也纳去通知他的朋友，说面对着这种危险应该丢开自尊心的问题，必须给沙皇一点成功的面子，奥地利和德国为了自己的正确利益应该向俄国屈膝。此外，如果奥地利的先生们一定要干涉保加利亚，他就撒手不管了；到那时他们就会看到结局如何。卡耳诺基让步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成了牺牲品，于是俾斯麦便急忙亲自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吉尔斯。

不幸，保加利亚人表现了出人意料的、"被神圣俄罗斯解放的"斯拉夫民族所不应该有的魄力和政治才能。巴滕贝克夜间被捕，可是保加利亚人也抓到了密谋者，并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果断的廉洁的政府——这是一种刚被解放的民族完全不应该有的品质。他们又要巴滕贝克回来，然而后者暴露了自己的整个弱点，逃走了。但是保加利亚人是改不了的。无论有无巴滕贝克，他们总是反抗沙皇的无上命令，迫使英雄的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众出丑。[215]

沙皇盛怒可想而知。拉拢了俾斯麦，击败了奥地利的反抗，如今却受到这个小国的阻挠，而这个小国只不过昨天才存在，多亏他

或他的父亲[1]才享有"独立"，但却不愿去理解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盲目服从"解放者"的命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已经忘恩负义了，可是保加利亚人却越出了一切界限。当真接受独立了！真是罪该万死！

为了从革命中得救，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但是每走这样一步却越来越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当然，如果俄国政府直接干涉保加利亚，如果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末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公开敌对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而是全面战争了。如果对统治欧洲的那些骗子手的高尚品质有所了解，就不可能预料双方的阵容。俾斯麦如果不能用其他方法制止俄国的革命，他是能站在俄国方面去反对奥地利的。但是更可能的是，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战争一旦爆发，德国就会援助奥地利，以防它完全覆灭。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冬季，在4月以前，俄军在多瑙河不能展开大战，——沙皇竭力诱骗土耳其人入其圈套，而奥地利和英国对土耳其的背信，又减轻了他的负担。他的目的是占领达达尼尔，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以此造成一个攻不进的避难港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即地中海。但是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他的索非亚的拥护者已经把他的秘密计划泄露出来了。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俾斯麦动摇不定，他很想找到一个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方法。

*　　*　　*

而法国呢？

---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十六年来一直想报仇的法国爱国者认为，再也没有比利用可能出现的情况更自然的了。然而，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正如这个问题对于沙文主义的先生们说来也不简单一样。在俄国的帮助和保护下进行一场复仇战争，可能会在法国引起革命或反革命。在发生革命而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俄国的联盟就会垮台。首先**俄国人就会立即与俾斯麦媾和，以便与德国人一同扑向革命的法国**。那时，在法国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通过战争来阻碍俄国革命。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是**保皇派的反革命**。沙皇很希望他的密友奥尔良王朝复辟，只有这个政府才答应他根据优惠的条件结成巩固的联盟。而一旦开始战争，就会使用保皇派军官来准备这个复辟。如果遭到一点点局部的挫折——这是难免的，——就可以大叫：这是共和制的过错；为了得到胜利和俄国无条件的支持，需要一个巩固的君主政府，一句话，需要菲力浦七世①。保皇派将军们将要消极怠工，这样才能把失败归咎于共和制政府；这样君主制就恢复起来。果真菲力浦七世登上王位，那些国王和皇帝就立即会彼此商量，他们将不是互相吞并，而是瓜分欧洲，吞并小国。在消灭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会召开新的维也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罪孽可能成为夺走它全部或部分亚尔萨斯—洛林的借口。君主们就会嘲笑那些共和主义者们太天真了，竟然对沙皇政府与共和国之间结成真诚联盟的可能信以为真。

此外，布朗热将军对凡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人所讲的**"需要战争来阻碍社会革命"**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那就让这句话作为对社会主义政党的警告吧。布朗热这位好心人有说大话的习气，这对于一个军人说来也许情有可原，但是这表明他是

① 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巴黎伯爵。——编者注

一个缺少政治头脑的人。他无论如何拯救不了共和国。他处于社会主义者和奥尔良派之间，可能与后者达成协议，只要后者向他保证与俄国结成联盟。总而言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沙皇一样，社会革命的幽灵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知道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

在法国、俄国和德国，种种事件都于我们有利，所以我们目前可以希望仅仅维持 *status quo*〔**现状**〕。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相反，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的党在德国就会遭到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命运。毫无疑问，事件归根结底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

把欧洲推向战争的力量是巨大的。到处采用的普鲁士军事制度，要全面贯彻，需要十二年到十六年的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后备部队的骨干就都是有掌握武器能力的人了。这十二年到十六年到处都已过去了，到处都有在军队中服役十二年到十六年的人。因此，到处都已准备好战争，所以德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优越之处。这意味着，威胁我们的战争会把上千万的兵士投入战场。那时老头子威廉也许死了。俾斯麦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他可能掀起战争，以保全自己。**而各地的交易所实际上已经相信，老头子刚一闭眼，战争就要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恢复君主制。

对于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说来，并不存在亚尔萨斯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清楚地知道，他们从来就反对的 1871 年的兼并，

是俾斯麦反动的内外政策的支点。两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关心维护和平，因为正是他们必须支付全部战费。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第356—364页）

恩 格 斯

致若昂·纳杰日杰(摘录)

(1888 年 1 月 4 日)

使我非常满意的是,我可以深信,贵国的社会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的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个理论已经成功地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我们党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半球的无产者在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大军所做的努力,定将取得彻底胜利。但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从那时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是多么好呵!

这些成绩是这样大,以致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至少对于欧洲的党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再一次满意地指出,您在原则上同我们,以及同多数西欧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您翻译我的《欧洲政局》一文,以及您写给《新时代》编辑部的信,向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确,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命。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盟,这个同盟从 1815 年以来一直受俄国沙皇政府的领导,尽管发生过种种暂时的内讧,但继续存在到现在。1815 年,这个同盟的成立就是为了与

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相对抗；1871 年，这个同盟由于兼并了亚尔萨斯和洛林而得到巩固，这种兼并把德国变成了沙皇政府的奴隶，而把沙皇变成了欧洲命运的主宰；1888 年，这个同盟继续保存，是为了镇压三个帝国内部的革命精神和民族要求，同样也是为了镇压劳动者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由于俄国具有几乎攻不破的战略地位，俄国沙皇政府便成为这个同盟的核心，成为整个欧洲反动派的主要后备力量。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一旦沙皇政府垮了台，那末，现在以俾斯麦为代表的那个倒霉的国家就丧失了它极其有力的支持，也就会跟着完蛋和崩溃①。奥地利将要解体，因为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即将丧失：奥地利的存在是为了阻止穷兵黩武的沙皇政府吞并喀尔巴阡和巴尔干各分散的民族。波兰将要复兴。小俄罗斯将要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南方斯拉夫人将能自己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确定自己的新疆界。最后，高贵的大俄罗斯民族所竭力追求的，将不再是为沙皇政府的利益充当凶恶的征服者，而是对亚洲负起自己真正传播文明的使命，并且在同西方的合作中发挥出自己广博的才智，而不是用绞架和苦役去摧残自己的优秀人物。

您在罗马尼亚必定了解沙皇政府。基谢廖夫的《组织规程》、1848 年对起义的镇压、对贝萨拉比亚的两次侵占、[216] 对贵国的无数次入侵（贵国对俄国来说只是通向博斯普鲁斯的一个兵站），使您从切身经验中对沙皇政府有了充分的体会。沙皇政府深信，一旦沙皇政府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宿愿实现，贵国的独立存在也就完了。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将以从匈牙利人手中夺回罗马尼亚的特

① 草稿中还写道："于是我们工人政党就会大踏步地走向革命。"——编者注

兰西瓦尼亚的诺言来诱骗你们；其实正是由于沙皇政府的罪过，特兰西瓦尼亚才同罗马尼亚分离。只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一垮台，欧洲也就不存在奥匈帝国了。

现在这个同盟看来是瓦解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但是，如果战争爆发，那只是为了使不顺从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屈服。我希望，和平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于这类战争，绝不能同情交战的任何一方——相反，只能希望它们**统统**垮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种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结底，都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

请原谅我发表了这些见解，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给罗马尼亚人写信，无论如何不能不谈谈自己对这些迫切问题的见解。这些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第4—6页）

恩 格 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889 年 12 月—1890 年 2 月）

一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①，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直还没有足够地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②

卡尔·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 1848 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

① 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事业。①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

① 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绍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来，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已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竭力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小卒，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的、神秘性的学说，即充满了许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肯定的事实的暗示的学说。他建议恢复那种把叛国的大臣送交法庭审判的做法，并用枢密院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的优势的万应良药。乌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说：《Si M. Urquhart n'existait pas, il faudrait l'inventer》["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编者注

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在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他们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由于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表面的光彩，绰绰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绰绰有余地足以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详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

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象我们从吉霍米罗夫[217]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现存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诚不二，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好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大规模地采取攻势的试图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218]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里障碍几乎

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担负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变成了战场的领土承受破坏，由它们提供最多的兵士，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1813—1815年的战争[219]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来看看1760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 matière à conquêtes〔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以此葬送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暂时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骚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

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尔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徒中间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通过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偷袭，然后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耳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海上也就无法攻破它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得利亚海。但是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

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220]这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此后，由于波兰有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徒统治波兰，迫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俄罗斯臣民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著名的现代斯拉夫学家米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221]，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最终陷入完全崩溃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 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222]）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223]的条款得到法国和瑞典的明确保障；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其全部利益在于阻挠这一加强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有它的征服地，所以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

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用于贿买的法国钱，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①。因此，皇帝早已不是在只要他花钱而除了麻烦和忧虑之外什么也不带给他的帝国内部寻找他的政权的支柱，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中寻找了。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象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斯和波兰的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至于土耳其，离它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方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他只是成功地采取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通婚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纠纷的办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进一步变得有利于俄国了。普鲁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

① 见 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etc.» Jena 1830, 2. Band, S. 201—206。

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上可见，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而"开明的"十八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达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也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特林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材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224]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

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十八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①。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二

1762年，当大淫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国际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推行其侵略计划。七年战争[225]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在美洲、在印度的威力，然后又把自己在大陆上的同盟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抛给命运去摆布。这后者，在1762年，当登上俄国王位的彼得三世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濒于毁灭；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遗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周旋、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投身到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能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帝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了。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彼得堡同盟条约[226]，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预先决定了波兰

① 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来详细谈第一次瓜分波兰[227]的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三大台柱叶卡特林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拥有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而加以践踏的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负，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些开明的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特林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明"① 是十八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象十九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②，就象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它，也只有它，被许可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这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1778 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打了起来[228]，这又只对叶卡特林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象彼得那样想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③；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

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它终于争取到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帖欣和约，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各项和约，其中包括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执行。这样，德国的软弱就被固定下来，它本身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229]。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得到了阿速夫海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尔河。在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而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叶卡特林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义首先提出了"武装中立"的原则[230](1780年)，即要求限制英国认为它的军舰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按照1856年巴黎和约的条款已基本上为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特林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革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的"朋友和邻居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列奥波特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特林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幌子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陷入了罗网。虽然普鲁士（它从

1787 年到 1791 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特林娜的同盟者的角色）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虽然也不得不分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231] 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分散了 1792—1794 年同盟[232] 的力量，使得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削弱了，法国在这时就得以巩固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政府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特林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邻居；把德国变成未来的瓜分对象；把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叶卡特林娜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就是这样向国王古斯达夫三世提出的[233]；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莱雅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俄国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酷爱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舆论。

到叶卡特林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

多港湾。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去问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的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胜利的机会：德国日益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固执、任性、不可忖度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计划；他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立刻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法本身而成了外交家的耶稣会匪帮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让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尔和约[234]（1801 年），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时约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侣（主教、神甫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 1779 年帖欣条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候，决定性的话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来讲。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贪婪，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讲的话成为真正决定性的话。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定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定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法律（1803 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235]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

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象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什么在等待着这些小邦呢？普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僭望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也希望得到德意志帝国的王位继承权。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毗邻的关系对各小邦直接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世代追求的目的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弄得筋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要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开始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在各个宫廷充满了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的同时，给公众散发了神秘的小册子，其中把俄国捧为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1779年的帖欣条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1805年战争爆发时，只要稍微懂一点事的人都会明白，问题仅仅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尔利茨城下被打败了[236]，新的莱茵联邦[237]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而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尔利茨战役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战役，埃劳战役，弗里德兰德战役[238]和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这

里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卖身投靠以及彼此意见分歧，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胆横越冻结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引起了斯德哥尔摩的暴力的宫廷政变和芬兰的让与俄国。[239] 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准备同拿破仑破裂时，他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亚波，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240]。这样就在1814年实现了叶卡特林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归你。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的，象往常一样，仍然是沙皇格勒。在提尔西特和爱尔福特[241]，拿破仑曾坚定地答应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给了他以瓜分土耳其的希望，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1806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但是，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性的话，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它靠混乱维持着。钢铁般坚强的士兵，钢铁般坚强的土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得以补救被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要把他们粉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242]，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需要黄金。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①。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

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在这方面是够格的评断人，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边，改组波兰，并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象拿破仑这样的统帅应当懂得，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他所依靠的基础又很不稳固，已经无法下决心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订和约；他忽视了波兰人的忠告，直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时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对法国统治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

①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7节。（在原文中恩格斯的散文体的德文译文是：《wie ein Staat reich wird und wie er kein Geld braucht, wenn er nur Ueberfluß an Produkten hat… sein Vater das nicht begreifen konnte und ein Landgut nach dem andern vorhypothekiren mußte》.）——编者注

加入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243]以后，莱茵联邦脱离了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过了大约十八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所出卖的土耳其，于1812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把贝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244]，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皇现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保证。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尽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能消灭法兰西帝国。

俄国从来还没有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也在自己的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贝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是波兰人的。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

三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

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更加成功得多地借助这同一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以经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象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贸易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它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没有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①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1774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编者注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要设法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准备好了土壤。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愤；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245]。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可能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①。它完全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吗？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劳波、莱巴赫、维罗那的会议[246]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装模做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虽然同时它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欧的希腊之友加倍努力。愚蠢的欧洲又受到难以置信的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②，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③；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那，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迷

---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内部不和”。——编者注

② 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

③ 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①。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就会向它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的天然的敌人”247。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俄国想得到欧洲的崇高的许可，即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的全部企图都没有成功。而在此同时，土耳其于1825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人到处被击溃，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么失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茨措-迪-博尔哥（1825年10月4日（16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理会欧洲，甚至不理会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显然，整个俄国外交界的主张都是这样。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由于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由于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活象«grec du Bas-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拿破仑这样叫他）。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来，他已经讨厌

① 这句话中的“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在英译文中是：“世界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

希腊的起义者了。他无所事事，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几乎不可捉摸地在南方塔干罗格附近旅行。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象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①；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发动了对土战争，而同时却避开了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两者都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于 1827 年 10 月 20 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林袭击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于 1828 年 5 月 6 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一万五千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同年 8 月和 9 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警告，使它不敢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左右，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脉退却。他只有两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编者注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渊”（毛奇《俄土战争》第390页）。

无论如何，这次媾和[248]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块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各公国事务的新口实。多瑙河各公国从这时起直到克里木战争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karczma zajezdna»①；在这整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在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优势达到下一步的目的以前，七月革命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这个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249]。

我不来详细谈1830—1848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利的侵袭，派遣三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其次，它后来在1840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同盟变成反法同盟，[250]最后，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② 以及用«Règlement organique»③（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章）④将贵族引诱到

① 在英译文中，«karczma zajezdna»的后面是：“（小饭店）”。——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中”。——编者注

③ 即《组织规程》。——编者注

④ 括弧里的话在英译文中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它规定农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由贵族（地方上的土地贵族）支配，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10章第218—222页。”——编者注

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而这只是经过二十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个惨重的失败：当康斯坦丁大公1830年11月29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① 的指示原本和使节们的一切重要报告的官方复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1825—1830年间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揭露了②。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转交给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指示，戴维·乌尔卡尔特于1835年将它们发表在《公文集》[251]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够把这个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扩展到了维也纳，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驻守着，动也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各公国[252]，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重新侵入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的口实。

---

① 涅谢尔罗迭。——编者注

②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1825—1830年间所搞的全部阴谋被揭露了。"——编者注

不仅如此。奥地利，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倔强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濒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了匈牙利军队，从而肯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受他的裁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253] 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侮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了，他并且预先看到了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符合于沙皇政府的目的而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254] 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所以，俄国外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份；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爆发了克里木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中于d'étonner le monde par la grandeur de son ingratitude〔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①。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报答，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沃尔肖伐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而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在它几乎是从未有过的

① 据说这是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在奥地利采取敌视俄国的政策时讲的一句话。——编者注

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了无数的钱财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联军的头批队伍一在保加利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各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认真的战争。这个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①，因为俄国是通过它的领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的危险。正是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那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假象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土地上稳稳地住下来；假象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认真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假象的战争最有利，对认真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边疆的一点，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便反转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

① 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这个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编者注

该成为入侵的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和粮草给养都很差的军队在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只好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

他的继承人① 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255] 比较起来，战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生在它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太激动了，沙皇太滥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诚，要立即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逐渐发展；除贵族阶级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开明的阶级——资产阶级。总之，新登极的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所追逐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有可能存在。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末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在进攻方面和过去一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La Russie ne boude pas, elle se recueille〔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聚力量256〕，——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在作这种积聚(recueillement)时，政府本身帮助了它。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① 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这就是俄国的«recueillement»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

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象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①；他不但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叶卡特林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并且缔结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257] 而在1859年，当路易-拿破仑决定向奥地利为俄国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见诸行动。当时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1848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反沙皇的意志，也违反路易-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258]

1859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法、英三国，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259] 他以此使沙皇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放弃了他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1864年脱离了丹麦。[260] 然后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这里沙皇又有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1849—1850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二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起来。1866年的战争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普鲁士"好样的舅舅"② 一边，他直接威胁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

①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编者注

② 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Uncle's a brick]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

失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1866年一样，亚历山大在1870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筋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开进了德国。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所造成的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宣言[261]，其中把1866年战争跟1870年战争作了类比①。宣言中说，1866年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但是一当普鲁士获得胜利，力量增强，法国立刻就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同样，1870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在战争期间他曾给过德国以外交上的支持。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他那现时被破坏了的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在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国外威势的丧失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那末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开始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这个战争很容易变成一场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种族战争。

新德意志帝国给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亚尔萨斯—洛林[262]，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由此到本段末尾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话，从“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起到“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0页）。——编者注

制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来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 1877 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 1878 年 1 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忽然出现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蒂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查。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263]被暂时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的附庸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收复了 1856 年失去的那部分贝萨拉比亚领土；在阿尔明尼亚占据了新的重要的阵地；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的一切意图；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筋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①——暂时地为俄国守护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 «la clef de notre maison»〔"我们房屋的钥匙"〕② 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亚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末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编者注

② 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 1808 年和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的用语。——编者注

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绝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围困法来攻占这一或那一国家(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①。但是，要知道，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一百五十年来力图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②

---

① 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没有那种长期以来它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按照1856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二个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是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在我们的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们毗邻的中立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归根到底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到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上优势将在这场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而除此之外，其实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1857年的印度起义[264]以后，早在1840年就已开始的对土尔克斯坦的征服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亚克萨尔特河上建立了据点；1868年合并了撒马尔汗，1875年合并了浩罕。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被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麦尔夫的缓慢的进军；1881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帖彼；1884年麦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海洛夫斯科耶和奥克苏斯河的查尔朱伊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地位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也决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宿愿。只有君主制复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于自己的十分特殊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通过和丹麦王室（俄国在松德海峡的前哨）的代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一千五百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265]。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了与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相对抗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

一般说来，正是在1878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愈来愈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在俄国 ex professo〔专门〕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毫无收获。是罗马尼亚人使

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没有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1857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土尔克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索利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266]，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贝萨拉比亚，现在他们未必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塞米格腊迪埃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本身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267] 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① 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阿尔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虔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268] 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②，甚至连格莱斯顿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已经不会为了克里特岛或阿尔明尼亚而冒欧洲战争的危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1856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人民”。——编者注

② 英译文中在“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的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编者注

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1848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中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末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的。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会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① 而随后它又被迫把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化为乌有[269]，这个经验可以作为这样一点的保证，即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亚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

① 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那参议会)"。——编者注

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① 将失去他的一切反对法国的同盟者，因为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② 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270]，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将是非常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

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采取战争的方针，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将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①、希腊人②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残余部分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末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站在沙皇一边作战，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 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 1848 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验过

①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② 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阿尔明尼亚人”。——编者注

什么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根本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末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威势的破灭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①。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② 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③ 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

① 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② 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

③ 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

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①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象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15—57页）

①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七百万张选票中，它拥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恩 格 斯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摘录)

(1890年4月3日)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必须同各地的民粹派作斗争,不管是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还是俄国的。而这并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认为,我必须说的那些东西如果让某个俄国人去说就更好。不过我承认,例如瓜分波兰的问题,从俄国的观点来看,较之从已经变为西方观点的波兰观点来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终究也应当尊重波兰人。如果波兰人要求得到被俄国人通常认为是永远得到了的并且按民族成分来说也被认为是俄国的那些领土,这个问题就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照我看来,有关的居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完全象亚尔萨斯人应当自己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选择一样。遗憾的是,我在提到俄国的外交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时,不能不谈到被俄国当代人看作内部事务的那些东西;而不便之处(至少乍看起来是这样)就在于,谈这个问题的竟不是一个俄国人,而是一个外国人。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您认为以我的名义按这个精神加一个简短的注解是有益的话,那就请您在您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加吧。

但愿我的文章用英文发表会产生一些影响。目前,由于从西伯利亚传出的消息,由于谦楠的书和最近俄国各大学的风潮[271],自由派对沙皇的解放热情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也就是我急于发表文章的原因;要趁热打铁。彼得堡外交当局期望,在东方未来的

战役中，亲沙皇的格莱斯顿，“北方之神”（他这样称呼亚历山大三世）的崇拜者执政会对它有所帮助。克里特岛人和阿尔明尼亚人已经被动用起来，随即可能在马其顿发动佯攻；在法国对沙皇奴颜婢膝和英国表示亲善的情况下，大概会采取新的冒险行动，甚至不同德国开战就占领沙皇格勒，因为德国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是不敢作战的。而一旦占领了沙皇格勒，就会有一个很长的时期陶醉于沙文主义情绪，就象 1866 年和 1870 年[272] 之后的德国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英国自由党人中复活起来的反沙皇情绪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极端重要的。斯捷普尼亚克在这里也有可能给他们以鼓舞，[273]这是很好的。

自从俄国本身有了革命运动以来，曾经是无敌的俄国外交界就再也不能得到任何成功了。而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种外交界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是目前俄国唯一坚定的力量，在俄国甚至军队本身也对沙皇不忠，在军官中进行的大逮捕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逮捕表明俄国军官的一般发展和道德品质要比普鲁士军官高得无可比拟。只要你们（你们或者哪怕是立宪主义者[274]）在外交界获得拥护者和可靠分子，你们的事业就胜利了。

向普列汉诺夫致友好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7 卷第 370—372 页）

恩 格 斯

致劳拉·拉法格(摘录)

(1891 年 8 月 17 日)

我们的一位俄国朋友① 大约三星期前来信说:"我们正处于饥荒的前夜",这个预言确实很快就应验了。当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举行联欢、互喊"乌拉!"[275] 时,这个事实抵销了他们的一切示威。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沙皇是不能打仗的。他最多只能竭力利用法国资产者目前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挥舞武器和进行威胁,但不会发动进攻;如果法国资产者走得太远,他就会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俄国政府当前的目的是要**在战时对各国舰队**关闭达达尼尔海峡。首先,它试图取得法国的同意;然后,如果象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这里下次普选的结果是格莱斯顿上台,这位年老的大亲俄派也将被说服这样做。那时,一旦两大海上强国被这种协议束缚住手脚,沙皇就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宰,可以随时对它进行突然袭击,而苏丹将只不过是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总督而已。计划就是如此;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巴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充当沙皇的工具,而当它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沙皇就会把它一脚踢开。沙皇之所以恭顺地聆听《马赛曲》,并讨好共和国代表,其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只要某些人不丧失理智,今年和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① 尼·弗·丹尼尔逊。——编者注

和平局面是有保证的。这就是俄国饥荒带来的主要结果。

而且还有其他的结果。俄国国内将要发生骚动，这种骚动**可能**引起变化；甚至很可能会引起**某些**变化，从而在这潭死水中引起一点波动；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它不仅将意味着结局的开始，而且意味着结局本身。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8卷第139—140页）

恩 格 斯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摘录)

(1891 年 10 月 13 日)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天,我只能答复你关于俄国人的问题[276],这也的确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其他琐事都已解决。

至于明春能否爆发战争,俄国的三种势力起着重要作用。第一是外交界。关于外交界,我仍然认为它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正因为这样,它为了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俄国那极有利于防御的地位,**正在为战争准备着一切**。每次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并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既不把事情弄到大动干戈的程度,又利用对方惧怕战争的心理(因为战争对对方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冒险)来捞取最大的好处。除了外交界,其次是军队。俄国的军队尽管遭到多次军事失利,但仍然异常自信能赢得胜利,并极能吹嘘,——比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会吹嘘。这支军队急于求战。第三是年轻的资产阶级,它象四十年代的美国资产阶级一样,把扩大市场看作自己的天职,看作俄国解放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并统治东大陆的历史使命。这三个因素都应加以考虑,但到目前为止,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外交界总是不断获胜。如今又加上饥荒,在东部和东南部,饥荒尤为严重。从敖德萨到下新城和维亚特卡一线以东的所有地区,灾情最重;该线以西,庄稼长势渐有好转;最西部,有些地方小麦收

成尚好；黑麦收成各地都不佳。马铃薯不是俄国居民的主要食物。伏尔加河流域极为严重的饥荒表明，俄国的交通还处于何等落后的状态。因此，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假如你轻信了要求拨款的我国军人的话，似乎他们肯定预计明春将发生战争，那你就会毫无必要地把自己置于受攻击的地位。俄国外交界的特点是，越是不打算进行战争，就越是起劲地准备战争，同样，总参谋部人员的职责也正是在帝国国会中说服你们相信，战争无疑会在 1892 年 4 月爆发。你这样密切关注所有这些报道，这很好。你如能提供有关这方面的、经过核实的材料，我将十分感激，但这些人还另有其附带的目的。

这个问题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玄妙。一旦政府所要求的拨款提交帝国国会，这个问题就具有重大意义。假如我们确信春季将爆发战争，那末，我们在原则上就很难反对此项拨款。而这将使我们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那时，所有卑躬屈膝的政党就会欣喜若狂地叫嚷，结果是他们对了，而我们现在不得不践踏我们自己二十年来的政策。这样一个毫无准备的转变也会在党内引起剧烈的摩擦，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

可是，另一方面，战争仍然可能在春天爆发。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8 卷第 170—171 页）

恩 格 斯

德国的社会主义(摘录)

(1891 年 10 月)

二(摘录)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环境中继续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①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战役[277]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在国际总委员会

①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其结果会怎样呢?"——编者注

1870 年 9 月 9 日的宣言中说："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①，而允许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什列斯维希和亚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

① 在德译文中不是"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编者注

义的德国之间不可能在亚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亚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末，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拉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远敌视的根源**①。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

① 在德译文中补充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编者注

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1]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　　*　　*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278]，而在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1814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债[279]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四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

① 在德译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编者注

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亿六千万马克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二亿四千万马克，而不是四亿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洋洋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这次计达八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连神圣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自己，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

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1861年垮台了。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1810年到1851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的方法[280]；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说到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①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纳不多的税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交纳比以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手工业的市场，而家庭手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手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 Verleger 或英国式的 Sweater 摆布，农民手工业者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三十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24章，第5节）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281] 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无比深刻。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1891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个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使自己的官吏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

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县份种上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自己感到饲料不够吃，后来则由于同样确定不移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3—296、298—303页）

恩 格 斯

欧洲能否裁军？（摘录）

（1893 年 2 月）

五

现在我们来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不仅俄国将来是否遵守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协议完全无关紧要，就连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协议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根本不注意俄国，其理由如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一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但是在军事进攻力量方面，它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即使是大致地相比。德国的五千万人口集中在五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而从军事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俄国的九千万或者最多一亿人口，则散居（根据保守的统计）在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德国人因为人口非常稠密而取得的这种优势，还由于他们有无比优越的铁路网而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长时期中一亿人能比五千万人提供更多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归根到底他们终究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军队不仅需要应征人员，而且还需要军官。而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非常糟。在俄国，军官只能从贵族和城市等级中间征集；但

是贵族比较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和中学生的数目非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军所需要的军官呢？

对于一方好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制是以经济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没有这种水平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第一，要把一个中等才能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任务是由步兵以密集队形的进攻来解决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的。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教导他们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结合。在乡村还是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在城市是劳动组合中的合作劳动，到处都是 krugovaja poruka，即伙伴们彼此互相负责；一句话，社会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只有团结才能得救，另一方面，单独的只靠自己的主动精神的个人注定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俄国人的这个特点在军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结成为营的俄国人几乎是不可能拆散的；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但是，这种在拿破仑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足以补偿俄国士兵的许多欠缺方面的团结的本能，现在已成为直接的危险。现在密集的人群已从战场上消失；现在的问题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线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时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掺混在一起，指挥又常常并且是迅速地转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军官来担任；现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独立地采取在当时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不失掉同整个分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始的群居本能来建立，而只有在每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比较高的“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小口径后装连发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军队的伟大力量的这种长处变

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现在条件下，为了把一个俄国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而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军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组织成战时的新队伍呢？如果连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军官，那末俄国又如何能作到呢？在俄国，有文化的居民（中用的军官只能从这部分居民中培养）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而且在这里，士兵，甚至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比在任何别国的军队中都需要更多的军官。

最后，第三，大家知道，普遍盗用公款和盗窃现象在俄国官吏中间、而且往往在军官中间也非常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样去进行动员呢？俄国过去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立刻暴露出，甚至和平时期的一部分军队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纸空文。当号召转入预备役的退伍军人和民团①（后备军）拿起武器以及需要保证供给他们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动员时不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是一切都在规定期限和规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混乱。而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惯于盗窃和贪污的俄国官吏之手，一切事情怎么能够顺利地进行呢？在俄国进行动员，这将是一场出色的演出。

换句话说：甚至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允许俄国人随便征集多少士兵和让他们随便服多长时间的现役，只要沙皇认为需要的话。但是，他未必能征集到比现役军人更多的军队，而且也未必能及时作到这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驻扎在从柯夫诺到卡麦涅茨的全部边境线上的俄国军队，将在自己的国境内处于敌人的领土上，陷入

---

①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只要俄国打了一两次败仗，战场就会从维斯拉河转向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在德军后方，在德军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一支德军的波兰盟军；不过，如果普鲁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它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问题的纯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特别是财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六

俄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绝望的。1861 年的农民解放以及与之有关的——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欧洲的中国**推向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这个过程目前主要是破坏的过程。

贵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有价证券提供的补偿，这些有价证券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被他们挥霍净尽了。这个结束以后，新的铁路为他们自己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销售市场；于是贵族就从事砍伐和出卖林木，在卖得的钱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享乐的生活来。在已经形成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地主庄园大部分仍然经营得很坏；无怪乎俄国的土地贵族即使还没有完全破产，也是负债累累；他们庄园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以前所有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的质量更差；他们被剥夺了利用公社牧场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们失去了饲养牲畜的基地；捐税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现在到处都要用货币来交税；此外，他们还要——也是用货币——支付利息和偿还

赎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wykup)；总而言之，除了农民一般经济状况的恶化外，又突然加上了强制的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结果，农村财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馆老板，mirojedy（按字面上的意思是吃公社的人）和 kulaki（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大为加强。而且所有这些好象还不够似的，又出现了使农民的自然经济彻底破产的新的大工业。大工业以自己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且还要么夺去他们的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业依附于资本家"包买主"，或者更坏，依附于他的中间人。俄国农民及其原始的农业和旧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度，忽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的现代大工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注定要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居民的十分之九，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至少暂时是）俄国的破产。①

在这种社会变革延续了二十年之后，也出现了它的其他一些结果。无情地砍伐林木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巨大的水灾；到夏天则河里水量很少，土地干旱。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地下水位降低了，据说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禾谷的根就由于接触不到水分而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破产了，而且许多地区的土地也变贫瘠了；这种土地贫瘠的状况至少要延续整整一代之久。

1891 年的饥荒使这个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 1891 年起俄国

① 关于这一切，一年以前我在 1891—1892 年《新时代》杂志第 19 期上发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书第 370—374 页。——编者注]中已经谈到了。

始终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大量地毁掉了农民最后的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他们的牲畜，并使他们负债累累，以致必然要摧毁他们最后的生命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于绝望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资金。在俄国，贵族靠借债度日，现在农民也靠借债度日，但是，首先靠借债维持的是国家本身。俄国在国外借了多少钱是众所周知的：超过四十亿马克。它的国内债务有多少谁也不知道；第一，因为既不知道发行的公债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纸币的数目；第二，因为这些纸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钱。四十亿马克的俄国国家债券已把西欧的金融市场塞得过于饱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些证券的荷兰和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债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总数五亿法郎的公债只销掉三亿，其余两亿，俄国财政大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额认购了债券的银行家那里收回。这证明，在最近时期内，任何新的俄国公债甚至在法国也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这个国家似乎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们，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绝望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们自己不这么愚蠢，而把为此所需要的钱投到它嘴里去的话。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的愚昧无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相反地，倒是俄国需要法国。没有法国，沙皇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容忍在西方和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更聪明一点，它就能从俄国弄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沙皇面前卑躬屈节。

由于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输出已经遭到了破坏。

现在主要的输出项目只剩下黑麦了，而它差不多完全是输往德国。**只要德国一开始吃白面包而不再吃黑面包，现在官方的沙皇和大资产阶级的俄国立刻就会破产。**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452—459页）

恩格斯

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

（1893年6月9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二期；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言。[①] 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1848年以前，人们可以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天情况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的进展，我甚至在晚年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但是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在亚洲边境上的这些东南方前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并且以此来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加利亚文[282]，我非常高兴。

---

① 在恩格斯的信中，对编辑部的称呼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о редакцията на сборникъ «Социалъ-демократъ»»。——编者注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①

你们的　**弗·恩格斯**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477—478页）

① 这句口号恩格斯是用保加利亚文写的：«Да живѣ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ъ!»。——编者注

列　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摘录)

(1895年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同时对于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有深刻的理论的认识，并且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正是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的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主义者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意图，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的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阿尔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

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的灾难，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选自《列宁选集》第1卷
第93—94页）

列　宁

中国的战争

（发表于 1900 年 12 月）

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中国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传播者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担，完全是由劳动人民承担的，从他们中间抽了许多人到远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末，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甚至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然是不宣而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

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很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制度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这里倾销工业品，从中牟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使居民的起义风起云涌，使他们濒于饿死的边缘。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283]。

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

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在1900年8月12日给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且开入满洲境内，乃是临时的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乱者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违反政策的自私计划"。

好一个可怜的帝国政府！它简直象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十戈比的生活费，这难道还不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

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狂妄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亨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包工头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拚命地干，并且增雇成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实行冒险政策，是因为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升官发财，建立"功勋"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断然牺牲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暴露出自己是甘愿充当资本家大亨和贵族的奴才的昏官的政府。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张，工人的状况恶化，农民

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灾难。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吏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西，因此，在对中国的战争中人民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没有确切的材料，但是，这次战争的费用达**好几亿卢布**，这是没有疑问的。有消息说，政府遵照一项没有公布的指令，一次就拨出军费一亿五千万卢布，而目前的战费开支每三四天就要耗掉**一百万卢布**。政府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给饥饿的农民的救济金却一扣再扣，斤斤计较每一个戈比，不愿意把钱用在国民教育上，它和一切富农一样，从官办工厂的工人和邮政机关小职员等等的身上榨取血汗。

财政大臣维特曾经宣称，截至1900年1月1日，国库尚存闲置现款两亿五千万卢布，但是现在这笔钱已经没有了，都投入了战争，政府正在发行公债，增加捐税，因财政拮据而缩减必要的开支，停止修筑铁路。沙皇政府虽然面临破产的危险，仍然拚命实行侵略政策，这不但需要大量资金，而且有卷入更可怕的战争的危险。进攻中国的欧洲列强，已经在分赃问题上争吵起来了，谁也不能断定这次争吵会怎样收场。

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例如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卑鄙的报纸中伤犹太人，说犹太工人不象俄国工人那样受资本和警察政府的压迫。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拚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

国人民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那种苦难，他们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遭受到侵入中国的资本的压迫。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从人民群众所处的那种政治上受压迫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沙皇政府不仅使我国人民变成奴隶，而且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如1849年，俄国军队曾镇压匈牙利革命）。它不仅帮助俄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工人，把工人的双手捆起来，使他们不能团结自卫，而且还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别国人民。要想打碎战争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唯一的办法就是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迫使政府不光是照顾宫廷奸党的利益。

（选自《列宁选集》第1卷
第213—217页）

列　宁

危机的教训

（发表于1901年8月）

工商业危机快延续两年了。显然，危机越来越扩大，侵袭到新的工业部门，扩展到新的区域，并且由于又一批银行的破产而更加尖锐化。我们的报纸从去年12月开始，每一号都指出了危机发展的情况及它的毁灭作用。现在是提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意义的总的问题的时候了。这种现象，对俄国来说，还是比较新的，正象我国整个资本主义还是新的一样。在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即在大多数产品为着销售而生产，大多数工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劳动工具，只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别人当雇工，被那些占有土地、工厂、机器等等的人所雇用的一些国家里，危机是一种老现象，时时反复重演，好象慢性病发作一样。所以，危机是可以预料到的，例如，当资本主义在俄国开始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的时候，在社会民主党的书刊里就预言过目前的危机。在1897年末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里曾说过："显然现在我们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周期（这是一种象四季循环一样不断重复着同样一些现象的过程）的那样一个时期，这时，工业'繁荣'，商业昌盛，工厂全部开工，无数新工厂、新企业、股份公司、铁路建筑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是预言家也能预言那不可避免的破产（相当厉害）必定在这种工业'繁荣'以后接踵而来。这种破产将使大批小业主

破落，把大批工人抛到失业者的队伍里去……”① 破产终于到来，来势凶猛，在俄国还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可以预言的按时复发的可怕的慢性病，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能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两步都退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销售而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商品。而管理生产的是各个资本家，他们每个人都单独进行生产管理，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他们盲目地生产，所关心的只是你争我夺。这样，生产品的数量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是很自然的。而当着广大市场突然扩展到新的、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范围时，这种可能性就特别大了。不久以前，我们所经历的工业“繁荣”开始时的情况正是这样。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把魔掌伸向拥有亿万居民的世界的另一洲——亚洲，那里在此以前，只有印度和不大一部分边缘地区同世界市场保有密切联系。里海东岸的铁路已开始为资本“开辟”中亚细亚，“大西伯利亚铁路”（所谓大，不仅指它的长度，而且指建筑人无限掠夺国家金钱，无限剥削筑路工人）开辟了西伯利亚。日本已开始变成工业国，并曾试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开缺口，而当它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抢走了。大铁路的修筑、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昌盛——这一切引起了工业的突然活跃，新企业的增加，对销售市场的疯狂竞争，对利润的追逐，以及新公司的创建和大批新资本（其中一部分是小资本家为数不多的储金）的投入生产。这种世界性的对未经开发的新市场的疯狂追逐，引起了巨大的破产，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要对这种追逐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应当注意有哪些巨头参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299页。——编者注

加追逐。当人们说到“单独的企业”，“个别的资本家”时，常常忘记，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实质上，只有利润的占有是单独的，个别的，而生产本身已经变成社会的了。巨大的破产之所以会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就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是受一伙唯利是图的富豪所支配。关于这一点，我们以俄国工业作例子来加以说明。近来危机已经扩展到石油工业方面。而在这种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诺贝尔兄弟石油生产公司”这样一些企业。1899 年该公司售出石油制品一亿六千三百万普特，获得五千三百五十万卢布，而 1900 年已售出一亿九千二百万普特，获得七千二百万卢布。一年之内，在一个企业中，生产增加了一千八百五十万卢布！这样“一个企业”的存在是靠几万乃至几十万工人的联合劳动来维持的，这些工人有的开采或提炼石油，有的用输油管、铁路、船只运输石油，有的建造这些方面所必需的机器、仓库、材料、驳船、轮船等等。这几万工人都为着整个社会工作，而支配他们劳动的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这一小撮百万富翁把群众有组织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利润据为己有。（诺贝尔公司所获的纯利，在 1899 年是四百万卢布，而1900年是六百万卢布，其中股东每五千卢布一股即可得一千三百卢布，而五个董事共得奖金五十二万八千卢布！）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企业为了在难以推测的市场上夺取地盘而展开疯狂的竞争，那末，危机的到来还有什么奇怪呢？

况且，为了从企业中获得利润，就必须把商品卖出去，就必须找到顾客。而顾客应该是所有居民，因为大企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产品。可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十个居民中有九个是穷人：工资微薄的工人和大多数比工人过得还要坏的农民。在繁荣时期，大工业拚命大量生产，结果只好把大量产品抛向市场，而大多数穷人则无力购买。机器、工具、仓库、铁路等的数量虽然一天比一天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时断时续，因为人民群众仍然处于赤

贫的境地，而所有这些改善了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群众准备的。危机证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末，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多得无比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证明，工人的斗争不应局限于取得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地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夺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大大降低工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一天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危机证明，两年前吵吵嚷嚷说现在发生破产的可能性较小的那些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以“批评家”自命，理由大概是：他们可以不加批判地抄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目光多么短浅。

危机揭露了社会生产受私有制支配的全部荒谬现象；它给人们的教训是这样深刻，以致现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也要求加强监督，例如对银行的监督。但任何监督也无碍于资本家在复苏时期开办一些后来必然要破产的企业。已经破产的原哈尔科夫土地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创办人阿尔切夫斯基，曾不择手段地弄到了几百万卢布来开办和支持一些估计可能获得巨额利润的矿业企业。工业的停滞毁灭了这些银行和矿业企业（如顿涅茨-尤里也夫公司）。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的这种“毁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较弱的“二等”资本家被较强的百万富翁所排挤。哈尔科夫的百万富翁阿尔切夫斯基被莫斯科的百万富翁列布申斯基所代替，这个更富有的资本家将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二等富翁被头等富翁代替，资本力量增大，大批小私有者破产（如小额存款人随着银行的破产而丧失全部财产），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这就是危机所引起的后果。我们都还记得《火星报》所描述的情况：资本家延长

工作日，极力设法解雇有觉悟的工人，换上俯首听命的农民。

在俄国，危机的影响，一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无比。在我们这里，工业停滞的同时，还有农民的饥饿。人们把失业工人从城市赶到农村，但又把失业的农民赶到哪里去呢？人们赶走工人，原是想把不安分的市民清除出去，可是，被赶的人难道不可能使一部分农民从世代相传的那种俯首听命的状态苏醒过来，并发动他们不仅提出请求，而且提出**要求**吗？现在工人与农民日益接近起来，这不仅由于他们共同面临着失业与饥饿，而且共同面临着警察的压迫，这种压迫使工人无法进行团结与自卫，使农民甚至得不到乐善好施者的救济。警察的魔掌，对于千百万丧失一切生活资料的人民，变得百倍可怕。城市的宪兵和警察，地政官和农村下级警官清楚地看到，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们现在不仅害怕农村的食堂，而且害怕报纸上关于捐款的公告。害怕捐款！真是做贼心虚。当贼看到过路人施舍东西给被他偷过的那个人时，贼就开始感到：他们相互帮助，是要以共同的力量来对付他。

（选自《列宁全集》第5卷
第71—75页）

列　宁

芬兰人民的抗议

（发表于1901年11月20日）

在这里我们全文发表一篇新的群众的呈文，在这篇呈文中，芬兰人民对政府一贯践踏芬兰宪法的政策表示坚决的抗议，抗议这种行为违背了亚历山大一世至尼古拉二世各代沙皇所作的庄重**誓约**。

这篇呈文是在1901年9月17日(30日)递交芬兰参政院转呈沙皇的。在呈文上签名的有芬兰各社会阶层的四十七万三千三百六十三个男女公民，也就是说，几乎有**五十万**公民签了名。芬兰的全部人口有二百五十万人，可见这个新的呈文真可说是**全民的呼声**了。

呈文的全文如下：

"最威严、最仁慈的皇帝和大公陛下！陛下对芬兰的义务兵役法的修改在整个边疆引起普遍的不安和极大的悲痛。

陛下于今年7月12日(6月29日)所批准的关于义务兵役的敕令、诏书和法律，彻底破坏了大公国的根本法和根本法所保障的属于芬兰人民和边疆全体公民的各项最珍贵的权利。

按根本法的规定，颁布关于公民保卫边疆的义务的法律，一定要得到地方议会议员的同意。1878年的义务兵役法就是通过这个程序由亚历山大二世和地方议会议员一致决定而颁布的。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这项法律先后作了多次局部性的修改，但是每次都得到过地方议会议员的同意。现在却与此相反，没有得到地方议会议员的同意，就宣布废除1878年的法律，而且代

替它的新法令，同 1899 年地方非常议会的议员所作出的决定完全背道而驰。

在芬兰法律的保护下生活和行动，这是每个芬兰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现在成千上万的芬兰公民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新的义务兵役法责成他们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用暴力手段把边疆的青年编入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的军队，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服兵役就变成了痛苦的事情。

新法令废除了法律所规定的每年服役名额的任何限制。此外，新法令完全不承认根本法规定由地方议会议员参加军事预算编制工作的权利。

与 1878 年的法律的根本原则相反，甚至后备军也要完全受命于陆军部。

虽然在诏书中声明，在暂时还不能确定的过渡时期，将采取减轻措施，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人们从上述法令所得到的印象，因为在暂时地减少征兵人数之后，就会无限制地征召兵员到俄罗斯军队服役。

芬兰人民不是要求减轻现在的军事负担。代表人民意见的地方议会议员已经表明，只要保持芬兰军队作为芬兰机构的法律地位，芬兰方面准备为保卫国家尽量多出一分力量。

与此相反，新法令中规定：芬兰的大部分军队将被撤销，俄罗斯军官将到留下的少数部队中任职；这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必须精通俄语，因此，多半出身于农民等级的芬兰籍人就根本无法担任上述职务；这些军队要受俄国当局的管辖，甚至在和平时期，也可能驻扎在芬兰境外的地方。

这些敕令并不是什么改革，而是一味要消灭芬兰的民族军队，这说明对芬兰人民是不信任的，芬兰人民在同俄国合并的将近一百年间，没有任何地方是不足信的。

在有关义务兵役制的新法令中，有一些措词否认芬兰人民有自己的祖国，否认边疆居民有芬兰公民的权利。芬兰人民在同俄国合并以后的政治地位早在 1809 年就已经不可动摇地确定了，但是这些措词的目的显然是同芬兰人民保持这种政治地位的绝对权利不相容的。

最近几年来，我们边疆所受的痛苦愈来愈多。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边疆根本法的各项规定不断遭到忽视，这一方面表现在各种立法措施上，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人接替了许多重要职务而造成的。边疆行政当局似乎把扰乱安宁和秩序当作自己的任务，专门阻挠共同有益的愿望的实现，引起俄罗斯人和芬兰人之间的不和。

但是，对于边疆来说，实施新的义务兵役法才是最大的不幸。

在1899年5月27日回复的奏折中，地方议会的议员详细地呈述了按照芬兰的根本法，颁布义务兵役法所应遵循的程序。同时，他们指出，如果新的义务兵役法将以其他程序颁布，那即使在强制手段的压力下生效，也不能为法律所承认，而且在芬兰人民看来，这不过是强迫命令而已。

地方议会议员曾经指出的一切，始终是芬兰人民的法律意识，这种意识是暴力所不能改变的。

应该考虑到这种同边疆法律相抵触的命令所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官员和政府机关同责任感产生了痛苦的矛盾，因为良心在召唤他们不要听从这样的命令。有劳动能力的移民早就由于害怕即将到来的变更而被迫迁往外地，已经公布的法令一旦付诸实施，这样的人还会增多。

关于义务兵役的新法令，以及其他旨在破坏芬兰人民自己的政治生存权和民族生存权的措施，必然要破坏君民的相互信任，同时会引起愈来愈强烈的不满和普遍受压抑的感觉，使社会和它的成员在为边疆的幸福而工作时感到没有信心和困难重重。要防止这些，除非用在地方议会议员参加下颁布的义务兵役法来代替上述法令，除非边疆政府当局切实遵守根本法的规定，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芬兰人民始终是另一个民族。由于共同的历史命运，由于法律概念和文化活动而结成的我族人民，始终真挚地热爱芬兰祖国和自己的合法的自由。我们人民仍然希望在各民族中，处于命运所赋予我们的应得的谦逊的地位。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的权利，尊重作为我们社会生活基础的法律，我们也同样坚决地相信，只要今后能依据1809年所规定的根本原则来治理芬兰，使芬兰由于同俄国合并而感到幸运和安宁，那末强大的俄国的统一就不会受到任何损害。

各村社和社会各阶层的居民，出于对祖国的责任感，将事态诚挚而坦率地奏呈于皇帝陛下。上面已经指出，不久前颁布的义务兵役法令是同得到正式确认的大公国根本法相抵触的，因此不能为法律所承认。我们认为应该再补充说明一点，对芬兰人民来说，军事负担本身并不象丧失固定不移的法律规定和法律保障的安宁那样重要。鉴于奏文中所涉及的问题的严重性，伏请皇帝陛下御览。谨奏。”

这篇呈文成了人民对破坏根本法的一帮俄罗斯官僚的真正的审判，我们对此呈文要补充的不多了。

我们只是列举一些有关“芬兰问题”的主要资料。

芬兰是在1809年俄瑞战争的时候同俄国合并的。亚历山大一世想把过去瑞典国王的臣民——芬兰人拉到自己方面来，决定承认和批准芬兰的旧宪法。按照这个宪法，**没有得到议会，即一切等级的代表会议的同意**，不能颁布、修改、解释或废除任何根本法。亚历山大一世在几次的诏书中都“庄严地”确认**“边疆特别宪法神圣不可损害的诺言”**。

后来俄国的各代皇帝，包括尼古拉二世在内，都确认这个誓约。尼古拉二世在1894年10月25日（11月6日）的诏书中说：“……保证那些根本法律保持不可破坏的和不可变动的效力”。

可是，还不到五年，俄国沙皇**就背信弃义了**。在卖身投靠、曲意逢迎的报纸对芬兰作了长期的攻击以后，1899年2月3日（15日）颁布了建立新程序的“诏书”：颁布“攸关全国需要的法律或者和帝国的立法有关的法律”，可以**不得到议会的同意**。

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对宪法的破坏，是一次真正的**国家政变**，因为任何法律都可以说成是攸关全国需要的法律！

这次国家政变是用**暴力**完成的：总督波布里科夫威胁说，如果参政院拒绝公布诏书，他就要出兵芬兰。驻扎在芬兰的俄罗斯军队已经荷枪实弹（据俄罗斯军官所说），备马待发了……

在第一次镇压以后，又接二连三地进行无数次迫害：芬兰报纸相继被封闭，集会自由被取消，芬兰到处有俄国的间谍，到处有最无耻的挑衅者在煽动暴动，如此等等。最后，终于在6月29日（7月12日）**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就颁布了义务兵役法，颁布了这个在呈文中已作充分分析的法律。

1899年2月3日的诏书和1901年6月29日的法律都是**非法的**，这是背信弃义者和一伙杀人强盗即所谓沙皇政府的暴力行为。当然，二百五十万的芬兰人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暴动，但是我们

所有的俄罗斯公民，倒应该想一想我们蒙受了怎样的耻辱。我们还是处在这样的奴隶地位，被人利用去奴役其他的民族。我们还是这样地容忍政府，容忍它象刽子手那样残暴地镇压俄国国内的任何自由倾向，而且利用俄罗斯的军队对其他民族的自由进行武力侵犯！

（选自《列宁全集》第5卷
第273—277页）

列　宁

给农村贫民（摘录）

（1903年3月）

2.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摘录）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要争取**政治自由**。有了自由，他们才能把全俄工人广泛地公开地联合起来，去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什么叫做政治自由呢？

要了解这一点，农民应该先把他现在的自由同农奴制度比较一下。在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地主许可是不敢结婚的。现在，农民不用任何许可就可以自由结婚了。在农奴制度下，农民在总管指定的日子一定要替自己的老爷干活。现在农民替哪个东家干活，在什么日子干，要多少工钱，都可以随自己的便。在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得到老爷的许可就不敢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现在，如果村社允许他，如果他没有欠税，如果他能领到身分证，如果省长或县警察局长不禁止移居，那末农民是可以随便到哪里去的。这就是说，农民现在也还没有随便到哪里去的完全自由，还没有迁移的完全自由，农民还是半农奴。我们下面要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俄国农民还是半农奴，他们怎样才能不当半农奴。

在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得到老爷许可就不敢置财产，不敢买土地。现在，农民可以随便购置任何财产了（但是农民直到现在

也还没有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没有随便处理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在农奴制度下，地主可以对农民实行体罚。直到现在还没有免除体罚，可是地主已经不能随便处罚自己的农民了。

这种自由就叫做**公民**自由，就是在家庭、私事和财产方面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可以自由（虽然并不是完全自由）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私事，支配自己的劳动（即自由选择东家），支配自己的财产。

可是，无论俄国工人或者全体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自己**全民**事务的自由。就象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奴隶一样，现在全国人民还完全是官吏的奴隶。俄国人民没有权利选举官吏，没有权利选举代表来制定全国的法律。俄国人民甚至没有权利集会讨论**国家**大事。正象从前老爷用不着农民答应就派总管一样，现在派官吏来管我们也不用我们答应，可是没有得到这些官吏的答应，我们甚至不能印报纸、印书，不能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讲讲国家大事！

正象农民过去是地主的奴隶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是官吏的奴隶。正象农奴制度时候农民没有公民自由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全民的、国家事务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到国家杜马（议会）中去的权利。只有人民自己选举的这个国家杜马（议会）才能讨论和颁布一切法律，才能规定一切捐税。政治自由就是人民有权给自己选举一切官吏，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一切国家大事，不用谁答应就可以印任何书报。

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人民还是苏丹政府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的权力要多大有多大。人民根本不能参加国家的机构和管理国家。沙皇一个人有独揽的无限专制的权力，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什么官吏都由他派。当然，沙皇**甚至没有法子全知道**俄国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他连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法

子知道。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几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都管理不了象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家。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说说罢了！——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最显贵的官吏。沙皇所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反对这一小撮高等贵族的意旨，因为沙皇自己也是地主和贵族，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培养他、教导他的也是这些人。关于全体俄国人民，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入沙皇宫庭的最富的商人知道什么，沙皇才知道什么。

在每个乡公所里，你们都可以看到一幅图画，上面画着一个沙皇（现在沙皇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正在向前来庆贺他加冕典礼的乡长们讲话。沙皇吩咐他们："**要听你们的贵族会长的话！**"现在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沙皇自己也承认，只有依靠贵族和通过贵族，他们才能管理国家。我们要牢牢记住沙皇说的这句要农民服从贵族的话。我们要明白有些人极力把沙皇的统治说成是最好的统治，这是在撒谎。这些人说：在别的国家里，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还说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我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象国务会议，我们普通工人和雇农就进不去。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过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俄国没有选举产生的统治机关，当权的不仅完全是富人和贵

族，而且是他们中间最坏的人。当权的是沙皇朝廷中那些最会说坏话，最会坑害人的人，是常向沙皇说谎造谣、拍马讨好的人。他们是秘密进行统治的，人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正在拟订些什么法律，正在准备进行些什么战争，正在准备增加些什么捐税，奖赏哪些官吏和为什么奖赏，掉换哪些官吏等等。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多的官吏。骑在没有发言权的人民头上的官吏黑压压地好象一片森林；普通的做工的人永远穿不过这片森林，永远得不到公道。对于官吏的贪污、掠夺和残暴行为的任何控诉，都是石沉大海，官场舞弊使得一切状子都毫无下文。一个人的喊声永远传不到全民的耳朵，而只能消失在这片黑压压的丛林里，闷死在警察的拷问室里。不由人民选举因而不必对人民负责的大群官吏，结成了一张紧密的蜘蛛网，人们就象苍蝇那样在这张蜘蛛网上挣扎。

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沙皇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式的依从。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

正因为这样，所以工人走上街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正因为这样，所以千百万农村贫民应该支持和响应城市工人的这种战斗号召。农村工人和贫苦农民应该象他们一样不怕迫害，不怕敌人的任何威胁和暴力，不怕开始时的失败，起来为全俄人民的自由作坚决的斗争，并且首先要求**召集人民代表会议**。让人民自己在全俄各地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让这些议员组成最高会议，去建立俄罗斯民选的统治机关，使人民不再象农奴那样由官吏和警察去摆布，保证人民享受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求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的要求**。

（选自《列宁选集》第1卷
第392—395页）

列　宁

五　一　节

传单草稿

（1904年4月）

工人同志们！五一节快到了。在这一天，全世界工人都将庆祝他们自觉生活的觉醒，庆祝他们在反对一切人摧残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和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摆脱饥饿、贫困和屈辱的斗争中的团结。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两个世界对立着：资本的世界和劳动的世界，剥削、奴役的世界和友爱、自由的世界。

一方面是一小撮富有的寄生虫。他们把工厂、工具和机器攫为己有。他们把千百万俄亩土地和大量金钱变为私有财产。他们使政府和军队成为他们的仆役，成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的忠实保护人。

另一方面是千百万不幸的人。他们不得不请求富人雇佣他们。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全部财富，但是他们终生不得不为一块面包去拚命，不得不求乞似地请求工作；力所不及的劳动损害了他们的体力和健康；他们在农村的草棚里，在大城市的地下室和阁楼里忍饥挨饿。

可是今天，这些不幸的劳动者已向富人和剥削者宣战了。全世界的工人正在为使劳动摆脱雇佣的奴役、摆脱贫穷和困苦而斗争。他们正在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而斗争，在这种社会制度里，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而不是为一小撮富人造福。他

们力求使土地、工厂和机器变为全体劳动者的共同财产。他们要消灭富人和穷人的分野，他们要把劳动的果实归劳动者自己享受，他们要将人类智慧的一切成就和工作中的一切改进都用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而不是充当压迫劳动者的工具。

劳动反对资本的伟大斗争是要各国工人付出巨大的牺牲的。各国工人为了捍卫自己过美好生活和享有真正自由的权利，已经流了许多鲜血。为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不知遭到了政府多少次的迫害。但是，不管怎样迫害，全世界工人的联合正在发展和加强。全体工人正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政党的拥护者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他们正一步一步地勇往直前地向着完全战胜资本家剥削者阶级的目标前进。

俄国无产阶级也已经觉醒过来，走向新的生活。它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斗争。过去，我国工人恭顺地弯背折腰地替人做工，看不到摆脱自己奴隶生活的出路，在自己苦役般的生活中看不到一线光明，但是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主义已经指出了一条出路，成千上万的战士把红旗当作指路明灯，涌向前去。罢工向工人表明了联合的力量，教会了工人怎样去进行反抗，也表明了有组织的工人对资本是一个多么大的威胁。工人们亲眼看到，资本家和政府是靠他们的劳动生活和发财的。工人们要求进行共同的斗争，向往自由和社会主义。工人们已经懂得，沙皇专制制度是一种多么凶恶和黑暗的力量。工人们需要斗争的自由，但是沙皇政府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工人们需要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但是沙皇政府以监狱、皮鞭和刺刀来压制一切争取自由的企图。“打倒专制制度！”的喊声已响彻全俄国。在街道上，在工人的千百万人的大会上，这种喊声愈来愈多。去年夏天，俄国整个南部的数十万工人都奋起为改善生活、为摆脱警察的压迫而斗争。资产阶级和政府一看见威严的工人大军就胆战心惊，因为这支大军一下子就使

大城市的全部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几十个为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在被派来对付内部敌人的沙皇军队的枪弹下倒下去了。

但是这个内部敌人不可能被任何力量击败，因为统治阶级和政府只有依靠他们的劳动才能支撑下去。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们的每一次失败都推动更多的战士参加战斗，都促使更广大的群众觉醒过来，走向新的生活，准备新的斗争。

俄国现在正经历着这样的事变：工人群众不可避免地会更加迅速、更加广泛地觉醒过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准备进行更坚决的战斗。战争吸引无产阶级的最落后阶层关心国家大事。战争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专制制度的全部腐朽性及统治俄国的警察和宫廷集团的全部罪恶。我们国内的人民日益穷困并因饥饿而死亡，但是有人为了掠夺几千俄里以外异族居民的土地却使他们卷入破坏性的和毫无意义的战争。我国人民正苦于政治上受奴役，但是有人为了奴役其他民族却使他们卷入战争。我国人民要求改造国内的政治制度，但是有人竟想用世界另一端的隆隆炮声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沙皇政府正在赌博中进行冒险，正在掠夺人民财产和摧残青年生命（他们在太平洋岸上牺牲着）的罪恶行动中进行冒险。任何战争都要求人民的力量紧张起来，而同文明的自由的日本所进行的艰苦的战争要求俄国大大地紧张起来。而且需要这种紧张恰恰是在警察独裁的建筑物在日益觉醒的无产阶级的打击下已开始摇摇欲坠的时候。战争揭露了政府的一切弱点；战争拆除了虚伪的招牌；战争暴露了内部的腐朽性；战争使每个人一眼就看清沙皇专制制度的荒谬性；战争向所有的人表明，旧的俄国，无权、黑暗和闭塞的俄国，农奴般地束缚于警察政府的俄国正处于死亡的状态。

旧俄国快要死亡。代替它的将是一个自由的俄国。保护沙皇

专制制度的黑暗势力正在衰亡。但是只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给这种黑暗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只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为人民争得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自由。只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回击一切欺骗人民、剥夺人民权利并使人民变成资产阶级的简单工具的企图。

工人同志们，让我们用十倍的干劲来准备即将到来的决战！让社会民主党人——无产者的队伍更牢固地联合起来！让他们的主张更广泛地流传开来！让他们为实现工人们的要求更大胆地展开宣传！让五一节吸引成千上万的新战士参加我们的队伍，在为全体人民的自由并使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的压迫的伟大斗争中成倍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打倒罪恶的强盗般的沙皇专制制度！

（选自《列宁全集》第7卷
第185—188页）

列　宁

旅顺口的陷落

（发表于1905年1月14日〔1日〕）

“旅顺口投降了。

这是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昨天，通过电报传遍文明世界每个角落的这个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使人感到一场巨大而可怕的横祸和不幸，这种感觉是难于用言语来表达的。强大帝国的精神力量在破灭，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显示自己的年轻的种族的声望在减退。整个政治制度被宣判，一连串的雄心被打断，巨大的努力被摧毁。当然，旅顺口的陷落早在意料之中，用来搪塞和自慰的话也早已准备妥贴。但是，明显而无情的事实打乱了全部编造的谎言。现在，要冲淡已经发生的崩溃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难以补救的失败使旧世界第一次遭到屈辱，打败它的是一个十分神秘的、昨天才来追求文明因而十分幼稚的新世界。”

欧洲一家资产阶级的大报这样描写了对事件的直接印象。应当看到，这家报纸不仅是清晰地表达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情绪，它的话也反映了旧世界资产阶级的真实的阶级本能；旧世界资产阶级为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各项成就感到惶惑不安，为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的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惊慌失措。难怪连没有参战的欧洲资产阶级也仍然感到自己受到屈辱和挫折。它如此习惯于把俄国的精神力量和欧洲宪兵的军事力量等同看待。在它看来，年轻的俄罗斯种族的声望与强大不可动

摇的、坚定不移地保护着现代“秩序”的沙皇政权的声望是密不可分的。难怪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认为居于支配地位发号施令的俄国的灾难是“可怕的”，因为这一场灾难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大大加快，而资产阶级十分清楚，它根据痛苦的经验深知，这种加速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加速。西欧资产阶级在长期停滞的环境中，在“强大的帝国”的庇护下感到十分安逸，可是突然有一种“神秘的、十分幼稚的”力量竟要来打破这种停滞，摧毁这些支柱。

不错，欧洲资产阶级是有值得害怕的东西。无产阶级是有值得高兴的东西。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快要到来，它还预告着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

但是，旅顺口的陷落为什么和在什么程度上是一场真正历史性的灾难呢？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一事件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对日本人来说，战争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反动的欧洲以无法补救的打击。十年以前，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反动的欧洲，曾因中国败于年轻的日本感到不安，它曾经联合起来从日本手中抢走最好的胜利果实。欧洲一直保护着旧世界已经确定的关系和特权，维护着它的优惠的权利，即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的权利。日本夺回旅顺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俄国占据旅顺口六年，花了亿万卢布修筑战略铁路，修建港口，建设新的城市，加固要塞；被俄国收买和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的一切欧洲报纸都曾吹嘘这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军事评论家们说，就实力而论，旅顺口等于六个塞瓦斯托波尔。[①] 可是，一个小小的、一直为人瞧不起的日本，却在八个月之内占领

① 沙皇俄国在克里木半岛的重要军事要塞。——编者注

了这个要塞，而过去英国和法国为了攻克一个塞瓦斯托波尔，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军事上的打击是无法补救的。关于海上优势的问题——现代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起初并不比日本舰队弱的（如果不是较强的话）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了。舰队作战的基地也被人夺走，于是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的分舰队在白白地花费了好几百万以后，在无畏的铁甲舰队大败英国渔船以后，只好可耻地又开回来。据计算，俄国仅在舰队方面的物质损失，即达三亿卢布。但是，数万名优秀的海军人员的损失以及整个陆军的损失，还更为惨重。许多欧洲报纸现在正在竭力设法冲淡这些损失的意义，它们在这方面的热心努力达到了滑稽的地步，它们甚至说库罗帕特金① 现在"轻松了"，"用不着"担心旅顺口了！俄国的部队也用不着一大批军队了。据最近英国的统计材料，被俘者的数目达**四万八千人**，在金州附近和在要塞本身附近的战役中还牺牲了好几千人。日本人完全占领了整个辽东，获得了影响朝鲜、中国和满洲无比重要的据点，腾出了八万到十万经过锻炼的而且配备有庞大的重炮队的军队来对付库罗帕特金，这支重炮队开抵沙河，将使日军对俄军的主力居于压倒的优势。

据国外报纸消息，专制政府决定无论如何要继续作战，并给库罗帕特金派去二十万人。很可能战争还要拖延很久，但战争的无望已经是很明显了，而一切的拖延将只会加重俄国人民由于容忍专制制度宰割自己而遭受的无数灾难。直到现在为止，日本人在每一次大的战役以后总是比俄国人更迅速而且更充实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现在，他们在争得完全的制海权和彻底消灭了俄国的一支军队以后，就能够比俄国人派出多一倍的援军。日本人一

① 沙皇政府的陆军大臣。——编者注

直在接二连三地揍俄国的将军们，虽然俄国的将军们在要塞战中拥有大批精锐的炮兵。日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兵力充分集中起来，而俄国人却不仅要为库页岛担心，而且要为海参崴担心。日本人占领了满洲最好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靠被征服地区的资财和靠中国来供养军队。而俄国人却越来越只能靠从俄国运去的物资接济，由于无法供应足够数量的物资，库罗帕特金很快就不能进一步扩充军队了。

但是，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靠雇佣兵或半脱离人民的帮会分子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战争是由人民来进行的，——据涅米罗维奇-丹钦柯证明，甚至连库罗帕特金现在也开始了解到，这个真理不仅仅对字帖有用。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因此，战争的伟大属性现在表明得特别明显：一向只是少数觉悟的人所了解到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不一致，现在在事实上，在千百万人的面前揭露出来了。一切先进的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批评，现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评所确认，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不知道什么叫专制制度的人，以至知道这一点但一心一意维护专制制度的人都感到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了。一旦人民不得不在实际上以自己的鲜血为专制制度付出代价的时候，专制制度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全体人民（一小撮官僚和权贵除外）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能够解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作为代价。

旅顺口的陷落给沙皇制度的罪行作了一次最伟大的历史总结。这些罪行从战争刚一爆发的时候就已开始暴露出来，今后将更加不可控制地广泛地暴露出来。在我们的后面，管它洪水泛滥！——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阿列克谢也夫[284]都这样说，他们没有

想到，而且也不相信洪水真的就要来到了。将军们和统帅们原来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据英国一位军事评论家的权威证明(载《泰晤士报》)，1904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是“对海上和陆地的基本战略原则的犯罪性的忽视”。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不熟练、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在现代战争中同进步的民族发生冲突时，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质量高的人材。没有具有主动精神的、自觉的士兵和水兵，要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使用速射的小口径步枪和机器大炮，船舰上装有复杂的技术设备，在陆战中采用散开队形的时代，坚韧、体力以及许多人密集在一起的战斗阵势，都不可能产生优势。专制俄国的军事威力原来只是虚有其表。沙皇制度成为符合最新要求的现代军事组织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①——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表现。事件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他们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顶好的军舰时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材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都显得落后和毫无用处。

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那样，先进国家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译者注

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着伟大的革命作用。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它是战争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不可避免和无法排除的伴侣的无情敌人，就不能闭眼不看击溃了专制制度的日本资产阶级所完成的这一革命任务。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因此，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彻底和最坚决的代表，如法国的茹尔·盖得和英国的海德门，都直率地表示他们同情击溃俄国专制制度的日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们俄国，当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思想混乱。《革命俄国报》[285] 曾谴责盖得和海德门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拥护工人的、人民的日本，而不能拥护资产阶级的日本。这种谴责十分荒谬，正象谴责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能承认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比主张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进步一样。盖得和海德门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但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其中一国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当然，是我们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懂得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新《火星报》① 也未能不表现出混乱。起初它大谈不管什么样的和平的废话。当饶勒斯② 清楚地表明，拥护一切和平的冒牌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应该为谁的利益——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时候，新《火星报》才匆忙“纠正”。现在它又发表庸俗的议论，说什么利用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投机”(!!?)是如何不恰当，说什么“不论”专制制度是胜是败，战争就是灾难。

不是这样。俄国的自由和俄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

① 即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编者注

②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机会主义头子。——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与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一事业从这次使欧洲所有的旧制度保护者感到恐惧的军事失败中得到很多好处。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断地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同时要永远牢记，当阶级统治还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会消除的。饶勒斯à la① 的庸俗的和平辞藻，对被压迫阶级并无好处，被压迫阶级对两个资产阶级民族间的资产阶级战争不负任何责任，它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推翻一切资产阶级，因为它知道，就是在"和平的"资本主义剥削时期，人民的灾难也是无穷的。但是，在反对自由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和半农奴制度相比，自由竞争是有进步性的。在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在宣传当中应当把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农奴制的专制制度严格区分开来，我们应当经常指出俄国工人被迫参加的这个历史战争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它已变成新旧资产阶级世界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战争每进一步都将大大加剧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难怪最沉着、最冷静的欧洲资产阶级这样惊慌失措，它全心全意赞助俄国专制制度能作些自由主义的让步，但害怕俄国革命甚于怕火，因为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

一家冷静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写道："认为俄国爆发革命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种见解已经根深蒂固了。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论据为这种见解辩护。例如说俄国农民不爱动，俄国农

① 之流。——编者注

民信赖沙皇……依赖僧侣等等。又说，极端不满分子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可能举行叛乱（小规模的爆发）和恐怖性的谋杀，但决不能掀起总起义。他们对我们说，广大的不满的群众缺乏组织和武器，而最主要的是缺乏冒生命危险的决心。俄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大约只是在三十岁以前具有革命情绪，以后他们就搞到一官半职，舒适安逸地生活起来，于是很大一部分激烈分子就变为平庸的官吏。”但现在，这家报纸继续写道，许多迹象证明要发生巨大的变革。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已经不光是革命者，而且还有一些完全没有“偏好”的人，即秩序的坚实的柱石，如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写给内务大臣的信现在正被所有的国外报刊转载。“害怕俄国革命看来是有实际根据的。不错，谁也不认为俄国农民会拿起木叉为宪法而斗争。但难道革命是在乡村里发生的吗？在现代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早已是大城市了。在俄国，正是在城市里，风潮正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涌动。谁也不敢预言结果将会怎样，但是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发生的人的数目却在日益减少，这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一旦产生严重的革命爆发，被远东战争削弱了的专制制度是否能对付得了，这就不止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是的。专制制度是被削弱了。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普遍相信革命就已经是革命的开始。政府本身由于自己的军事冒险，担心革命会继续下去。俄国的无产阶级对支持和扩大严重的革命冲击是会关心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8卷
第29—37页）

列　宁

五　一　节

（1905 年 4 月 12 日〔25 日〕以前）

工人同志们！全世界工人的伟大节日来到了。在五一节，全世界的工人要庆祝他们渴求光明和知识的觉醒，庆贺自己结成一个兄弟联盟来反对一切压迫，反对一切专横，反对一切剥削，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而斗争。凡是从事劳动的人，凡是用自己的劳动养活富翁和显贵的人，凡是为了得到微薄的工资而在过分繁重的工作中过活的人，凡是永远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人，凡是在现代文明的奢侈和豪华中过着牛马生活的人，都应当伸出手来为工人的解放和幸福而斗争。丢掉不同民族或不同宗教信仰的工人之间的相互仇视吧！这种仇视只能有利于靠无产阶级的无知和分散过活的掠夺者和暴君。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芬兰人和瑞典人，拉脱维亚人和德国人——都应当在社会主义的共同旗帜下并肩前进。全体工人是兄弟，他们的坚固联盟，是全体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人类争取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唯一保障。在五一这一天，全世界工人的这个联盟——国际社会民主党将检阅自己的力量，并且团结起来继续为自由、平等和友爱进行不倦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同志们！现在我们处在俄国伟大事变的前夕。我们正在同专制的沙皇政府进行决死战斗，我们必须把这一战斗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大家看看，这个恶魔和暴君的政府，这个贪官污吏和资本

的走狗的政府使全体俄国人民遭到多么深重的灾难啊！沙皇政府把俄国人民抛进疯狂的对日战争，它从人民手中夺走了千百万年轻的生命，把他们葬送在远东。这次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是无法形容的。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为了我们掠夺成性的沙皇政府从中国夺来的满洲！为了别国的土地使俄国人流血，使我们的国家破产。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资本家和官吏对他们的敲榨勒索也越来越紧，而沙皇政府却又派遣人民掠夺别国土地。腐败无能的沙皇将军和贪官污吏断送了俄国的海军，糟蹋了人民千百万的财富，丧失了大批的军队，可是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并不断带来更多的牺牲。人民破产，工商业停滞，饥饿和霍乱流行，而专制的沙皇政府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它打算葬送俄国，只要能拯救一小撮恶魔和暴君；除了和日本作战外，它还发动了另一个战争——和全俄国人民作战。

俄国现在已从沉睡、闭塞和奴隶状态中苏醒，这种情形是从来没有过的。社会上的各个阶级，从工人、农民到地主和资本家，都活动起来，彼得堡，高加索，波兰，西伯利亚到处响起一片愤怒声。各地人民都要求停止战争，要求建立自由的人民管理机构，召开全体公民（无例外的）派代表参加的立宪会议来任命人民政府，把被沙皇专制制度推进深渊的人民拯救出来。二十多万彼得堡工人，1月9日星期日和格奥尔基·加邦牧师一起去见沙皇，陈述人民的这些请求。沙皇把工人当作敌人，沙皇在彼得堡大街上屠杀了数千个手无寸铁的工人。现在斗争在全俄国沸腾起来，工人罢工，要求自由和改善生活，在里加和波兰，在伏尔加和南方，血还在流，农民也揭竿而起。争取自由的斗争变成了全民斗争。

沙皇政府惊慌失措。它想借钱继续进行战争，但是它在借贷方面已失去信用。它答应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但实际上一切照旧。迫害仍在进行，官吏照旧蛮横无理。没有人民的自由集会，没有

人民的自由报刊，更没有释放为工人事业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的战士。沙皇政府竭力唆使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它挑拨鞑靼人去中伤阿尔明尼亚人，在巴库造成了一场大血战。它又在准备一场反犹太人的大血战，煽动无知的人仇恨犹太人。

工人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容忍这样侮辱俄国人民。我们要挺身而起保卫自由，我们要回击那些想转移人民对我们真正敌人的怒火的人。我们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为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工人和农民们，拿起武器吧！举行秘密集会，组织战斗队，尽量设法储备武器，派遣可靠的人和社会民主工党联系！让今年的五一节成为人民起义的节日，我们大家都来迎接它，等待向暴君坚决进攻的信号。打倒沙皇政府！我们要推翻它并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召开人民立宪会议。让人民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让全体争取自由的战士走出监狱，从流放中返回家园。让人民公开举行集会，让人民的报纸不在万恶的官吏的检查下出版。让全体人民武装起来，让每个工人都有一枝枪，让人民自己、而不是让一小撮掠夺者，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让各村自行召集自由农民委员会来推翻农奴制的地主权势，使人民摆脱官吏的侮辱，把被夺走的农民土地还给农民。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主张，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号召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目的：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成立民主主义共和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成立农民委员会。工人同志们，准备迎接这次伟大的战斗吧，五一节要关闭工厂，或是根据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意见拿起武器来。起义的钟声还没有鸣响，但就要响了。现在，全世界的工人都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为自由事业付出无数牺牲的英雄的俄国无产阶级。彼得堡工人已经在著名的一月九日宣布：不自由勿宁死！全俄国的工人们，让我们重复这个伟大的战斗口号，我们不惜任何牺牲，我们要通过起义走向自由，通过

自由走向社会主义！

五一节万岁！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工人和农民的自由万岁！民主主义共和国万岁！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

《前进报》编辑部

1905 年

（选自《列宁全集》第 8 卷
第 318—321 页）

列　宁

覆　灭

（发表于1905年6月9日〔5月27日〕）

朝鲜海峡的海战吸引了全世界政治报刊的注意。起初，沙皇政府企图不让自己的臣民知道悲惨的真相，但很快就知道这种企图是不会成功的。要掩盖整个俄国舰队的完全覆灭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在评价最近这次海战的政治意义时，不得不重复我们在《前进报》第2号① 上关于旅顺口的陷落所说过的话。沙皇俄国军事上的完全破产在当时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波罗的海舰队使俄国爱国者产生了一线希望。当时人人都了解，战争的最终结局取决于某一方在海上的胜利。专制制度看到，战争的不幸结局就等于“国内敌人”的胜利，即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孤注一掷。为了迅速的调遣波罗的海舰队花了亿万卢布。随随便便凑集了舰员，军舰航行的最后准备工作草率结束。舰支的数目也有所增加，因为新的和强大的装甲舰又补充了一些“旧箱子”。一支巨大的舰队（它象整个俄罗斯帝国那样庞大，那样笨重、荒唐、无力、怪诞）起程了，把不义之钱花在煤炭和给养上，使欧洲大为嘲笑，特别是在它粗暴的违反了中立的一切惯例和要求而大败渔船之后。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这支舰队价值近三亿卢布，加上调遣费一亿卢布，总共

① 见本书第410—417页。——编者注

有**四亿卢布**糟蹋在沙皇专制制度最后这次军事赌注上。

现在连最后的赌注也输了。这本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但是谁也未料到俄国舰队的失败竟是这样悲惨的覆灭。俄国军舰的舰队象一群野人一样猛扑装备精良和拥有一切现代防卫手段的日本舰队。经过两天的战斗，拥有一万二千——一万五千名海军人员的二十艘俄国舰队，有十三艘被击沉和消灭，四艘被俘。只有一艘（“金刚石”号）幸免于难开抵海参崴。海军人员牺牲过半，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本人”和他最亲近的助手涅博加多夫也被俘，而整个日本舰队在战斗中却未受巨伤，总共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艇。

俄国海军彻底被消灭。吃败仗是注定的了。俄国军队被完全赶出满洲，日本人夺取库页岛和海参崴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这一崩溃意味着整个沙皇政治制度的崩溃，日本人每一次新的打击都使欧洲和全体俄国人民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人人都起来反对专制制度：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被侮辱的民族自尊心，军队的激昂的自豪感，为数万和数十万年轻生命丧失在这场毫无意义的军事冒险中所产生的悲痛，对盗窃亿万人民金钱的痛恨，对这样的战争必然引起的财政破产和长期经济危机的忧虑，对可怕的人民革命（在大资产阶级看来，沙皇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及时的“明智的”让步来避免这场革命）的恐惧。要求和平的呼声正在增长和扩大，自由派的报刊愤愤不满，甚至连最温和的分子如“希波夫派”① 的地主，也都开始发出恫吓，连奴颜婢膝的《新时报》也要求立刻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了。

沙皇政权的最可靠的支柱欧洲资产阶级，也开始失去耐心了。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重新结合，年轻而富有生气的日本日益增

① 希波夫是莫斯科地方自治局主席，该派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编者注

长的实力，欧洲军事同盟者的丧失——这些都使它感到害怕。它慷慨地贷给专制制度的数十亿贷款的命运也使它感到不安。使它大为惊恐的是俄国的革命，因为这一革命过分地激动了欧洲的无产阶级，并且大有燃起世界革命火焰的危险。为了与沙皇制度的"友谊"，它呼吁沙皇制度理智用事，坚持必须讲和——同日本人讲和，同俄国自由资产阶级讲和。欧洲丝毫没有忽视，对日媾和现在只能以高价换取，但它清醒而实际地估计到，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每继续一个月，都必然会提高这个价格，并且必然会增加革命爆发的危险性，而这种革命爆发将象扫除沙粒一样扫除整个"让步"政策。欧洲也了解，专制制度现在已经很难并且几乎是不可能停止下来，因为它走得太远了，因此，资产阶级的欧洲就竭力用天真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和自己的盟友。

例如法国一家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Le Siècle»[①] 在科尔奈耶所作的题为《一篇英雄史诗的终结》的短文里就这样写道："现在，当俄国人在大陆上迭连失败后又在海上被击溃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就有责任签订和约并改组自己的军事力量。喜欢冒险的政府有时由于自己的野心或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不得不把它们统治下的人民拖进战争。因为对这样的政府说来，争取胜利的赌注就是它们自身的生存，所以它们就要求自己的人民作出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从而把人民引向最后的灭亡。在法国，我们两个帝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第三帝国的历史也将会是这样，如果在我们这里能建立起帝国的话。

相反地，俄国政府的情况正好不是这样；它摸到了俄国人民的心底，因而共同的不幸并没有使政府和人民分离，而只是使它们彼此团结得更加紧密。战败的凯撒已经不是凯撒了。不幸的沙皇可

① 《世纪报》。——编者注

以仍然是神圣和受人欢迎的沙皇。”

可叹，可叹！沙文主义的法国小店铺老板吹牛“吹的太明显了”！他说什么战争并没有使政府和人民分离，这与人所共知的事实显然不符，使人听了发笑，这种狡辩看来是天真无辜的。为了预告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俄国的专制君主提防不可避免的崩溃（因为这位专制君主正象真正的“凯撒”一样盲目而固执地走向崩溃），法国资产者一片好心地说服这位凯撒，他不应当象其他的凯撒一样，他还有另外更好的出路。“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法国资产阶级是如此希望有沙皇这个强大的同盟者，以致故意杜撰出一段神话来安慰自己，说不幸把俄国人民和沙皇团结在一起。科尔奈耶先生本人当然也并不真信这个神话；我们就更不必认真地对待它了。

不仅凯撒们的政府，就连一些最古老王朝的最合法君主的政府，也往往喜欢冒险。在落后于历史整整一百年的俄国专制制度的身上，冒险精神比任何一个法兰西帝国都大。专制制度正是以冒险精神把人民投入了一场荒谬可耻的战争。它现在正面临着应得的灭亡。战争揭开了它的一切痈疽，暴露了它的全部腐败，表明它与人民是完全分离的，并且摧毁了凯撒统治仅有的支柱。战争成为一个森严的法庭。人民已经对这个强盗的政府作出了自己的判决。革命将把这一判决付诸执行。

（选自《列宁全集》第 8 卷
第 450—453 页）

列　宁

最新的消息

（1905年11月4日〔10月22日〕）

日内瓦，11月4日（10月22日）

在暴君尼古拉的“立宪”诏书发表以后，接着便发生了特列波夫[①]和他那一群匪徒所策划的无数次新的谋杀事件。哥萨克的猖獗，对犹太人的蹂躏，在大街上枪杀刚刚“被大赦的”政治犯，黑帮在警察的帮助下进行抢劫——为了镇压革命斗争，一切手段都使用出来了。

沙皇帮了革命者一个大忙，他证实了革命者认为“自由主义的”诏书是假让步、是丑恶的滑稽剧的评价。沙皇自己想要挑起又一次的决战。这样更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工作、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现在都将用来准备下一次进攻，消灭沙皇制度这个妖怪，它在垂死的时候企图最后一次煽起愚昧大众的愚昧的本能。现在特列波夫愈是疯狂地挣扎，整个特列波夫匪帮和整个罗曼诺夫家族就愈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彻底的崩溃。

（选自《列宁全集》第9卷
第423页）

① 彼得堡省总督。——编者注

列　宁

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

（发表于 1905 年 11 月 16 日〔3 日〕）

势均力敌，——两星期以前，当全俄政治罢工的头一批消息传来，开始显出政府不敢立刻动用军事力量的时候，我们这样写过①。

势均力敌，——一星期以前，当时“最新的”政治新闻 10 月 17 日的诏书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显出沙皇政府的优柔寡断和退却的时候，我们又这样说过②。

但是势均力敌丝毫也不排除斗争，反而使斗争特别尖锐。政府的退却，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是表明政府选择了新的自己认为更加合适的战斗阵地罢了。以所谓 10 月 17 日诏书这种一纸空文来宣布“自由”，只是企图准备精神条件来同革命作斗争，——与此同时，特列波夫统率着全俄黑帮党徒在为这个斗争准备物质条件。

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新的政治形势用革命时代所特有的惊人速度显示出来。政府口头上作了让步而立刻开始在实际上准备进攻。在允诺颁布宪法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最野蛮最丑恶的暴行，好象故意要在人民面前更明显地表示专制政府的真实权力的全部真实意义。许诺、空话、一纸空文同实际情形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比

① 见《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379 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 416 页。——编者注

地明显了。事变开始雄辩地证明我们早就肯定地说过而且将来一直都要对读者肯定地说的那个真理：当沙皇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它的一切让步，甚至直到“立宪”会议，都只是一种幻象、泡影、障眼法罢了。

彼得堡的革命工人在自己的一号每日公报[286]上非常鲜明地表述了这一点，这种公报我们还没有收到，但是那些被无产阶级的威力所震惊、所吓倒的外国报纸愈来愈经常地报道这些公报的消息了。罢工委员会写道（我们是从英文翻译成俄文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当然会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已经给我们集会自由，但是我们的集会仍然被军队包围着。已经给我们出版自由，但是书报检查机关继续存在着。已经允许了科学研究的自由，但是大学被军队盘踞着。已经给了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监狱里关满了囚犯。已经给了维特，但是特列波夫继续存在。已经给了宪法，但是专制制度继续存在。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

停止实现“诏书”的是特列波夫。阻止颁布宪法的是特列波夫。解释自由的真正意义的仍是特列波夫。把大赦弄得残缺不全的还是特列波夫。

究竟这个特列波夫是个什么人物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非凡人物吗？根本不是。他是一个指挥军警完成专制政府最平常的工作的最平常的警官。

究竟为什么这个最平凡的警官及其最普通的“工作”忽然获得这样无限巨大的意义呢？这是因为革命已经向前迈进了无限巨大的一步，接近了真正总解决的关头。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在政治上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成熟起来，或者说，不是逐年而是逐周地成熟起来。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是一个最平常的警官；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政治力量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就成为体现沙皇制度的野蛮、罪恶和荒唐的不可忍受的家

伙了。

革命教导着人们。革命给俄国各阶级人民和各民族上了**关于宪法实质**的最好的一次实物课。革命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它最鲜明最触目地提出各种应当解决的当前的政治任务，使人民群众深刻地感觉到这些任务，使得不解决这些任务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用事实揭穿一切掩饰、遁词、诺言、承认都是一钱不值的东西。“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因为“给予”我们的只是诺言，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权力。我们已经接近自由了，我们已经迫使所有一切人，甚至迫使沙皇都承认自由是必要的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承认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是答应给人民代表以立法权的一纸空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专制。我们愈是接近人民专制，就愈加感到没有人民专制是不能忍受的。沙皇的诏书愈是美妙动听，沙皇的政权就愈加不能容忍。

斗争接近总解决的关头了，接近解决是不是让实权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至于说到承认革命，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它了。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派很早以前就已经承认了，现在维特先生也承认了，尼古拉·罗曼诺夫也承认了。沙皇说，你们要求什么，我就答应什么，不过请你们保留我的权力，让我自己来执行我的诺言吧。沙皇的诏书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因而这个诏书显然不能不导致坚决的斗争。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俄国事变所进入的这种似乎是无意思的局面，其真正意义在于沙皇政府力图用勾结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欺骗，来避免革命。沙皇许给资产阶级愈来愈多的东西，来试试各有产阶级到底是不是会开始普遍转到“秩序”方面去。可是当这个“秩序”体现为特列波夫及其黑帮的横暴的时候，沙皇的号召就有成为旷野的呼声的危险。无论维特或是特列波夫，对沙皇说来都是同样需要的：需要

维特是为了争取一部分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抑制一部分人；需要维特是为了空口允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实际行动；需要维特是为了对付资产阶级，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于是在我们面前又展开了——只是在更高得无比的发展阶段上——我们在莫斯科罢工开始时见过的景象：自由派进行谈判，工人进行斗争。

特列波夫非常了解自己的作用和自己的真正意义。也许，他只是太仓猝了一些，——在圆滑的维特看来，——但是，他看见革命在迅速前进，而唯恐会来不及的。特列波夫甚至是被迫着忙的，因为他感到他所拥有的力量正在减少。

在专制政府颁布立宪诏书的时候，专制政府防止立宪的活动也开始了。黑帮分子干起在俄国从来没有见过的罪行来了。关于殴打、蹂躏、闻所未闻的兽行的消息，如雪片一般从俄国各地飞来。到处是白色恐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警察就煽动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坏蛋去行凶抢劫，以酒肉诱惑市民中的败类，屠杀犹太人，唆使人去殴打"大学生"和所谓暴徒，帮助"教训"地方自治派。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狂。特列波夫"不负厚望"。他们用霰射炮轰击人民（敖德萨），挖眼睛（基辅），把人从五层楼上扔到街心，强占大批民房，大肆抢劫，放火烧房子而不许人救火，枪杀胆敢反抗黑帮党徒的人。从波兰到西伯利亚，从芬兰湾沿岸到黑海，到处都是一样。

但是，和黑帮的这种疯狂暴行，和专制政权的这种肆行暴虐，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这些垂死挣扎同时而起的，是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新的进攻正在明显地发动起来，无产阶级也和以往那样，在每次运动高潮以后，只是在表面上沉静下去，而在实际上是聚集力量，准备进行坚决的攻击。警察的横暴，现在在俄国所具有的性质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哥萨

克的复仇行动和特列波夫的“报复行动”大为猖獗的同时，沙皇政权的解体日益加剧。这无论在外省、在芬兰、在彼得堡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无论在那些人民最闭塞、政治发展最薄弱的地方，在那些居住着异族人的边疆，或是在将要爆发最伟大的革命事变的首都，都表现出来。

请大家比较一下我们从手边的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287]上引来的两份电报吧：“**特维尔电** 暴徒当着省长斯列普措夫的面袭击地方自治机关的房屋。被暴徒包围的房屋后来竟被放火焚毁。消防队拒绝救火。军队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采取任何办法制止这些暴徒。”（我们当然不能担保这个消息是完全确实可靠的，可是与此类似的和比这更坏百倍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这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喀山电** 人民解除了警察的武装。从警察手中夺来的武器被分给了居民。组织了人民民兵。秩序井然。”

把这两个情景对照一下不是颇有教益的吗？一个是：报复，横暴，蹂躏。另一个是：推翻沙皇政权和组织必胜的起义。

在芬兰也发生同样的现象，规模更大得无可比拟。沙皇所派的总督被驱逐了。奴仆式的参政员们被人民一扫而光。俄国的宪兵被赶跑了。他们试图报复（新历 11 月 4 日加帕兰达电），破坏了铁路交通线。为了逮捕横暴的宪兵当即派去了武装的人民民兵。在托尼欧的公民大会上决定了输入武器和秘密出版的书报。在城市和乡村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参加芬兰人民民兵。据说，驻守坚强的要塞（斯维阿波尔格）的俄国卫戍队同情起义的人民并把要塞交给了人民民兵。芬兰正在欢欣鼓舞中。沙皇实行让步，准备召集芬兰议会，取消 1899 年 2 月 15 日的非法诏书，批准那些被人民驱逐的参政员“辞职”。而同时，《新时报》却建议封锁芬兰的一切海港并用武力镇压起义。据外国报纸电讯，在赫尔辛福斯驻扎了很多俄国军队（不知道这个军队对于镇压起义到底有多大作

用)。俄国军舰似乎已开进了赫尔辛福斯内港。

在彼得堡,特列波夫因为革命人民的欢乐(由于从沙皇手中夺得了让步)而实行报复了。哥萨克横行霸道。殴打事件变本加厉。警察公开组织黑帮。工人们原来决定要在11月5日(10月23日)星期日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想为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举行全民追悼。政府方面则准备制造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政府已经预备把在莫斯科以较小的规模制造过的流血惨案(在工人领袖巴乌曼出殡时的残杀)在彼得堡重演一次。特列波夫想利用还没有把部队派往芬兰因而分散了自己的军队的时机,——想利用工人们是准备示威,而不是准备打仗的时机。

彼得堡的工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取消了游行示威的计划。工人委员会决定不在特列波夫所想选定的时机来作最后的决斗。工人委员会正确地估计到,有许多原因(芬兰的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使斗争延期不利于特列波夫,而有利于我们。目前正在加紧准备武装。在军队中的宣传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有消息说,海军第十四和第十八陆战队有一百五十个士兵被捕;在最近十天里有九十二个军官被控告同情革命者。号召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的传单甚至分发到"防卫"彼得堡的巡逻队里去了。革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有力的手把特列波夫所许可的出版自由的范围稍微扩大了一些。据外国报纸报道,10月22日(11月4日)星期六,在彼得堡只有那些赞成工人的要求不让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报纸出版。两种愿意仍旧保持"忠诚"(逢迎旨意)的彼得堡的德文报纸没有能够出版。那些"合法的"报纸,从合法的界限不是由特列波夫决定,而是由彼得堡罢工工人联盟决定的时候起,就说起非常大胆的话来了。«Neue Freie Presse»① 10月23日(11月5日)的电讯说:"停

① 《新自由报》。——编者注

止罢工只是暂时的，据称，当给旧制度以最后打击的时机到来时，就会重新举行罢工。对无产阶级来说让步已经不能发生任何影响了。时局非常危急。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工人阶级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宰。那些被即将到来的大祸所吓倒的人已经开始离开此地（彼得堡）。”

总解决的关头日益接近了。人民起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实现得意外迅速。让特列波夫在革命的芬兰和革命的彼得堡之间，在革命的边疆和革命的外省之间疲于奔命吧。让他去试试给自己选择即便是一个可以用来自由施展军事行动的可靠的小据点吧。让沙皇的诏书更广泛地散播吧，让那些关于各个革命中心的事变的消息更多地传布吧，——这会使我们得到新的拥护者，这会使沙皇拥护者的正在缩小的队伍中发生新的动摇和瓦解。

全俄政治罢工卓越地完成了它的事业，它推进了起义，它使沙皇制度受到了剧烈的创伤，它破坏了卑鄙的国家杜马的卑鄙的滑稽剧。总的排演已经结束。我们显然是站在戏剧开演的前夜。维特不绝地讲话。特列波夫不绝地杀人流血。沙皇还能给予的诺言已经太少了。特列波夫还能够用来进行最后战斗的黑帮军队也太少了。而革命军的队伍却日益增长，力量在个别战斗中经受锻炼，红旗在新俄国上空更高更高地飘扬。

（选自《列宁全集》第9卷
第435—442页）

列　宁

关于斯托雷平的声明

宣言草案

（1907年2月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家杜马代表向人民发表并建议杜马向人民发表宣言如下：

政府通过它的首相斯托雷平先生向人民代表宣布，政府仍要实行驱散第一届杜马以后所实行的政策。政府不愿考虑人民代表的意见。它要求人民代表接受它的政策，帮助它强化这个政策，使这个政策更加周密，使这个政策能够更准确、更充分地推行。

政府的政策是怎样的一种政策呢？

这个政策维护一小撮大地主和皇亲大臣的利益，维护他们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权利。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这就是政府通过斯托雷平告诉人民的话。

农民从政府那里什么都不会得到，政府只袒护地主，无情地残酷地惩罚农民，农民因追求光明和自由，追求生活的改善，追求土地转归农民，追求摆脱沉重的盘剥、苦役式的生活和慢慢饿死的命运而遭到惩罚。农民从政府那里所能得到的是暴政的继续，这种暴政已经夺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的优秀儿女，他们被囚禁、被流放和杀害，因为他们对官吏的专横和地主的压迫进行勇敢的斗争。政府用小恩小惠收买极少数的暴发户和富农，帮助他们洗劫已经破产的农民，以奖赏他们为专制政府的效劳，这便是斯托雷平和他

的内阁想要实行的政策。

工人从政府那里什么都不会得到，政府只会对工人实行暴政和压迫。政府仍然要捆缚工人的双手，不许他们为改善生活而斗争，仍然要查封工人团体，仍然要迫害工人报纸。大工厂主为压迫工人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仍然会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工人从政府那里不会得到帮助来解救失业造成的穷困和痛苦，他们所得到的只能是穷困和痛苦的加剧。政府对工人阶级的帮助就是工厂主和警察官开会制定的法律。俄国工人早就领教过政府的这种“关怀”工人阶级的政策了。

陆海军士兵在政府为了一小撮皇亲的掠夺利益与日本所进行的战争中流血牺牲；在国内，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摆脱兵营苦役，为了使自己被人当做人而不是当做牲畜看待，也流血牺牲。但是，陆海军士兵从政府那里什么都不会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仍然是暴政和压迫，仍然是粗暴的待遇和一块硬面包，以奖赏他们戡平和镇压了自己的兄弟——为自由、为土地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

政府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它要对人民开战而不要和平。声明中有一点没有公开说出来，因此，受人民委派并忠于人民利益的杜马代表要把这一点告诉人民。政府没有公开说出的是：政府的声明就是表示政府决定必不可免地一定要驱散第二届杜马，使杜马甚至没有可能来表达人民的意志，没有可能来表达农民、工人、士兵和一切劳动人民的疾苦，表达人民在选举他们做杜马代表时在委托书中委托他们表达的一切。

社会民主工党一向总是对人民说，杜马无力给人民自由和土地。杜马中捍卫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的代表决心尽一切力量为他们的利益服务，采取在杜马中宣布事实真相的方法帮助人民，向俄国全境的千百万人民说明政府实行的是怎样有害的反人民的政

策，说明它布置哪些反人民的圈套，它对人民拒不实行的是哪些法令和措施。

杜马代表和整个杜马尽管能够帮助人民，但是他们没有人民便一事无成。如果说俄国在短期内终于争到了一点点自由，暂时争得了一个人民代议制，那末这一切成果只能归功于人民的斗争，只能归功于工人阶级、农民、陆海军士兵争取自由的奋勇斗争。

政府又一次向人民宣战了。它已经走上必然驱散第二届杜马、取消现有选举权和恢复旧时俄国专制制度的旧秩序的道路。

工人阶级的代表谨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全国人民。

（选自《列宁全集》第12卷
第182—184页）

列　宁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摘录）

（1907年3月21—25日〔4月3—7日〕之间）

有人说：地主经济比农民经济文明些……　农民没有地主的指引就不行！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地主经济的整个历史、关于现在地主经济的所有材料，都表明地主的“**指引**”永远都意味着对农民的无限迫害、对男女农民人格的极端蹂躏，意味着对农民劳动的举世未见的最残暴、最无耻的剥削（用俄国话说，这就是抢劫）。俄国农民所遭受的这些压迫、折磨和贫困，不仅在西欧找不到，就是在土耳其也找不到。

我的同志策烈铁里①已经谈到，一块块地产连居民一起如何被分给了宫廷“世界”的奸佞和宠臣。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②代表所谈到的关于**经济**的问题，他曾经谈到臭名昭彰的地主“文明”。

这位代表知不知道农民把什么叫作**工役制或劳役制**，经济学把什么叫作**工役经济**呢？

地主工役经济就是地主**农奴制**经济、徭役经济的直接遗物，直接残余。农奴制经济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

① 孟什维克头子。——编者注

② 大地主、沙皇政府的内政大臣（1904—1905）。——编者注

份地来养活自己一家，为此农民就必须在地主土地上劳动三天（有时还要多）。不是用货币支付给工人（象现在各个城市里那样），而是用**土地**支付。农民靠从地主那里得来的份地只能勉勉强强糊口。为了这种糊口，农民本人和他的全家都必须用自己的马、农具或"用具"去为地主耕种土地。农奴制经济的实质就是这样：用少得可怜的份地代替对劳动的报酬，用农民的劳动和农民的工具耕种地主的土地，用地主的棍棒强制农民劳动。在这种经济下，农民本身必然成为**农奴**，因为没有**强制的力量**，任何一个靠份地生活的人也不会给地主做工。这种农奴制对农民是怎样呢，——关于这一点农民自己知道得太多，了解得太清楚了。

农奴制**算作**是被废除了。但实际上地主如今还握有很大的权力（依靠他们抢来的土地），他们现在仍**通过工役制**使农民处于农奴的依附地位。工役制，这是现代的农奴制。我的同志策烈铁里在他的关于政府宣言的演说中说，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现在整个俄国国家政权具有农奴制的性质。可是有一家向政府谄媚的报纸（它的名字叫《新时报》），大叫策烈铁里代表说的是谎话。不，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说的是真理。只有那些完全无知的人或卖身求荣的下流作家才能否认，工役制是农奴制的直接残余，我国的地主经济是靠工役制来维持的。

工役制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地主的土地不是用地主的农具，也不是雇工人来耕种的，而是用受邻近地主**奴役的**农民的农具来耕种的。庄稼人不得不受奴役，是因为地主割回了好地，把庄稼人放在"一小块沙地"上，驱使他们去种少得可怜的份地。地主霸占了很多土地，以致农民不仅无可耕之地，甚至"无养鸡之地"。

1861年省地主委员会和地主——调停官（他们被叫作调停官，想来是因为他们纵容地主）[288]，——是这样**解放**农民的，即把农民土地的1/5割给地主了！他们是这样**解放**农民的，即强迫庄稼人为

了这次掠夺后所剩给农民的份地，要付出**三倍的代价**！任何人都知道，1861年进行**"赎买"**的时候，曾强迫庄稼人付出了比地价**高得多的**代价。任何人都知道，当时迫使庄稼人**赎买**的不仅是农民的土地，而且还有**农民的自由**。任何人都知道，**政府**赎买的"善行"，使国库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地价(以赎金的形式)**比它付给地主的要多**！这是地主和"自由主义的"官吏们为了掠夺庄稼人而结成的兄弟联盟。如果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忘记了这一切，那末农民**大概**没有忘记这一点。如果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不知道这一点，那就请他读一读扬松教授**还在30年前**在其《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一著中所写的东西吧，请他读一读从那时起的所有经济统计文献重复了千百次的东西吧。

1861年是**这样**"解放"农民的：使农民一下子就落入了地主的**圈套**。农民受着被地主夺去土地的压迫，不是饿死，就是受奴役。20世纪"自由的"俄国农民仍然不得不受邻近地主的奴役，**完全和**11世纪"庄稼汉"(《俄罗斯真理》[289]这样称呼农民)受地主奴役，到地主那里去"注册"**一样**！

话儿改变了，法律制定了又消失了，几百年过去了，可是问题的实质依然如故。实行工役制，就是要农民处于受奴役的依赖地位，强迫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去耕种邻近地主的土地。工役经济，这是巧为粉饰的、改头换面的**农奴制**经济。

现在我从关于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的著作所讲的大量例子里举出一个来说明我的意思。目前还有一本农业局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资料丰富的著作，这部著作是以**业主提供的**有关俄国地主经济制度的材料(《得自业主的农业情报和统计材料》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局出版第五册)为基础的。而这些材料是由谢·亚·柯罗连柯先生(不要同弗·加·柯罗连柯混淆起来。不是一个进步作家，而是一个反动官僚，——这位谢·亚·柯罗连柯先生就是这样

的人物）整理出来的。在他所编辑的这本书的第一百一十八页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在叶列茨县（奥勒尔省）南部，在地主的大经济中，除了长工耕种以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由农民耕种，以此作为农民租地的交换条件。**过去的农奴**（请听！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继续从他原来的地主那里**租到土地，并为此而给地主耕地。这样的乡村**仍然**（注意这一点！）被称为某某地主的‘**徭役**’村。”

这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臭名昭彰的农民“解放”实现了**三十年**以后写的。1861 年以后又过了**三十年**，还有“**徭役**”，还有用农民的农具去耕种**原来的**地主的土地之事！

可能有人驳斥我说，这是个别情况吧？然而，凡是熟悉俄国中部黑土地区的地主经济的人，凡是稍稍翻过俄国经济文献的人，都会承认这不是例外，而是**一般的现象**。在**俄罗斯**本土的各个省份，恰好是在有**真正的俄罗斯**地主占优势的地方（怪不得他们对于所有坐在右边席位上的**真正的俄罗斯**人是那样珍贵了！），直到今天也**是工役经济占优势**。

我就引证由许多学者编纂的《丰收和粮价的影响》这样一部有名的学术性著作为例。这本书是在 *1897* 年出版的。书中证明地主的**工役经济**占优势的有下列这些省份：乌发、辛比尔斯克、萨马拉、唐波夫、平兹、奥勒尔、库尔斯克、梁赞、土拉、喀山、下新城、普斯可夫、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特维尔、弗拉基米尔和切尔尼果夫，即十七个**俄罗斯**省份。

工役经济占优势……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地主的土地还是用农民的农具、用破产的、贫穷的、受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来耕种。这就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和所有维护地主利益的人所说的“文明”。当然地主的牲口好，它们在阔绰的厩房里比在茅屋里的庄稼人还生活得好。当然地主

的收成好，因为还在1861年地主委员会就设法把农民的好地割给地主了。但是大谈俄国地主经济的“文明”那只能当作笑柄。在大量的领地上并没有**任何**的地主经济，而只有这样的农民经济：土地是用农民瘦弱无力的马耕的，是用破旧不堪的农具来耕作的。除了俄国，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到现在还保存着这种在大块和最大块土地上使用受奴役的农民的农奴制经济。

地主的“文明”就是保存地主农奴制。地主的文明就是向贫困的农民放高利贷，把农民抢劫一空，使农民为了一俄亩地、为了牧场、为了饮水场、为了树林、为了一普特面粉（冬季以高额利息贷给饥饿的庄稼人）、为了一个卢布（农民家庭恳求来的）……而沦为奴隶。

可是坐在右边席位上的这些老爷们却谈什么犹太人对农民的剥削，犹太人的利率！然而千万个犹太商人也做不到真正俄国的正统地主那样，把俄国的庄稼人抢劫一空！任何最坏的高利贷者的利息也不能和真正俄国的地主所拿的利息相比，这些地主冬天就雇下庄稼人去做夏天的活，或者租给庄稼人一俄亩地，就迫使他付钱、出劳动、送鸡蛋、送鸡，以及天晓得的一些什么东西！

看起来这好象是笑话，可是这种辛酸的笑话却与真理毫无差别。给你们举个**实际**例子说明农民租**一**俄亩地要付出一些什么东西吧（例子是从卡雷舍夫关于农民租佃的一本名著里找来的）：农民租一俄亩地要给地主种一俄亩半地，交十个鸡蛋一只鸡，还加一个妇女工作一天（见卡雷舍夫原书第348页）[290]。

这是什么呢？是“文明”呢？还是最无耻的农奴制剥削呢？

有人用难以容忍的话来诬蔑农民，他们妄想迫使俄国和欧洲都认为我国的农民好象在为反对文明而斗争。这是诬蔑！俄国农民正在为争取自由而反对**农奴制**剥削进行斗争。**正好**是在**真正俄罗斯的**省份里农民运动最波澜壮阔，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搞得最

厉害，就在这些省份里，**真正俄罗斯的**农奴制、**真正俄罗斯的**工役制，以及对贫穷负债的农民的奴役和侮辱最根深蒂固！

工役制并不是靠法律（根据法律，农民有饿死的"自由"），而是靠农民在**经济上的依附**维持下来的。任何法律、任何禁令、任何"监督"、任何"监护"，对工役制和奴役都完全无能为力。要从俄国人民的躯体上剜掉这个脓疮，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所有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还是一种**农奴**所有制，也就是**农奴制**剥削的源泉和支柱。

既然回避是否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这个**根本问题**，那末地主和官吏惯用的那些关于"帮助"农民、"改善"农民状况、"协助"农民得到土地的谈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言论，都不过是无谓的借口和遁词而已。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特别应该提醒农民和农民代表们：不要放过这个问题的**实质**。当地主的地产仍归地主所有还是转给农民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没弄清楚以前，不要相信任何诺言，不要相信任何漂亮的言词。**如果土地仍归地主所有，那末工役制和奴役也就必然会被保留下来**。千百万农民仍然要受穷挨饿。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对农民来说，就是遭受逐渐死于饥饿的苦难。

为了明确指出土地问题的这一实质是什么，必须回顾一下有关俄国地产分配的基本数字。关于俄国地产的仅有的最新统计材料是**1905年的**。这些材料是中央统计委员会根据特别调查搜集得来的，这个调查的全部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主要结果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欧俄共有近四亿俄亩土地。在三亿九千五百五十万俄亩中（初步统计），属于官家、皇族、教堂和机关的有一亿五千五百万俄亩，属于私人的有一亿零二百万俄亩，农民的份地有一亿三千八百五十万俄亩。

乍一看来，好象是官地最多，因而问题似乎完全不在于地主的

土地。

但是，这是个经常发生的错误，必须永远消除掉。诚然，官家拥有一亿三千八百万俄亩土地，但**这些土地几乎全部**都位于北部各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果达省、奥洛涅茨省，并且都是在那些**不能进行耕作**的地方。根据统计学者的精确统计（例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及其《从数字看土地问题》一书的统计），连政府本身也拼凑不出七百多万俄亩能够分给农民的官地。

可见，对于官地不能过分强调。关于农民移居西伯利亚的事也不值一提。这一点劳动派的发言人在杜马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地主老爷们当真相信移民西伯利亚有好处的话，那就让他们自己移居到西伯利亚去吧！关于这一点，大概农民是会同意的…… 而关于由西伯利亚来医治农民贫困的建议，恐怕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

对于俄罗斯各省，特别是对于农民最贫困的中部黑土地区的省份来说，问题**正是出在地主的土地上**，而不是出在任何其他的土地上。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关于"土地太少的特殊情况"的说法只是枉费心机。

俄罗斯中部地少，这不是特殊情况，而是一般的现象。农民地太少，正是因为地主老爷们为所欲为地霸占得太多了。所谓"农民地太少"，这就是说地主霸占了大量土地。

"农民地太少"，也就是地主地太多。

先生们，给你们举几个简单而明确的数字吧。农民的份地共有一亿三千八百五十万俄亩。私有土地共有一亿零二百万俄亩。在私有土地中，属于大土地占有者的有多少呢？

属于他们的共有**七千九百五十**万俄亩土地，他们**每人**占有的土地在**五十俄亩以上**。

而这么多的土地又归多少人所有呢？还**不到十三万五千人**

（精确的数字是十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八人）。

请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数字吧：在**欧**俄的一亿多居民当中，十三万五千人占有的土地就**几乎有八千万**俄亩！！

而一千二百二十五万（！）户份地农民却只占有一亿三千八百五十万俄亩土地。

每一个大土地占有者、每一个（以下简称）地主，平均有**五百九十四俄亩**土地。

每一农户平均有**111/3俄亩**土地。

这就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及其同道者们所谓的**"土地实在太少的特殊情况"**！一小撮（十三万五千）富人每人占有六百俄亩土地、而千百万农民每户只占有十一俄亩土地，农民怎能不**普遍**感到"地太少"呢？地主占有**特别多的土地**，农民怎能不"地少"呢？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劝我们**"放弃"**增加农民土地面积的**"念头"**。不，工人阶级决不会放弃这个念头。农民决不会放弃这个念头。数百万和数千万人**不能**放弃这个念头，在达到自己目的以前不能**停止斗争**。

我所举出的数字清楚地表明了人们正在为什么进行斗争。**平均**每户有六百俄亩土地的地主们，正在为自己的财富、收入（大概每年在五亿卢布以上）而斗争。而最大的地主往往同时又是最大的官吏。正如我的同志策烈铁里所公正地指出过的，我们国家所捍卫的是**一小撮地主**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无怪乎一大群地主和整个政府都残暴地反对农民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

农民则是为摆脱奴役、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而斗争。农民斗

争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多少象人一样地生活。而工人阶级则**完全**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他们的支持符合于工人本身的利益，因为工人也同样受着地主的压迫；他们的支持符合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为地主政权的压迫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先生们，为了向你们表明农民通过自己的斗争能够得到什么和**应该**得到什么，我现在给你们引证一个小小的统计。

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说过："现在已经到了与其用雄辩的言词、还不如用数字、事实和现状来阐明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我完完全全同意大臣先生的话。一点也不错，先生们，正是应该这样：多举一些数字，多举一些关于**地主**有**多少**土地和农民有多少份地的数字。我已经给你们引证了关于地主有**多少**"多余"土地的数字。现在我再来引证关于**农民**需要多少土地的数字。我已经说过，每一农户平均占有 $11^1/_2$ 俄亩份地。但是这个**平均**数字**掩盖着**农民缺地的情况，因为大多数农民所有的份地**都低于平均数字**，只有极少数农民的份地才比平均数字高。

在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农户中，有二百八十六万户（取其整数）**每户**所有的份地**不到五俄亩**。三百三十二万户有**五至八俄亩**。四百八十一万户有**八至二十俄亩**。一百一十万户有**二十至五十俄亩**；只有二十五万户才在**五十俄亩以上**（最后这部分农户大约平均每户不超过七十五俄亩）。

假定用七千九百五十万俄亩地主的土地来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假定说，农民——按照农民联合会的拥护者提赫文斯基牧师的说法，——不愿意**让地主受穷**，而给每个地主留下**五十俄亩地**。这个数字对于象我们的地主这样一些"文明的"先生们来说，恐怕是太大了，但我们暂时还是以它为例。除去十三万五千个地主每人留下五十俄亩以外，就给**农民**腾出来**七千二百**万俄亩土地。从这个数字中除去森林（象某些作家，例如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所作的

那样。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数字，我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森林也有收入，而把这笔收入留在一小撮地主手中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七千二百万俄亩上再加上可耕的官地（不到七百三十万俄亩），以及**全部皇族的土地**（七百九十万俄亩）、教堂和寺院的土地（二百七十万俄亩），你们就可以得出**将近九千万俄亩**的土地①。这个数字足够使**所有**最贫困的农户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增加到十六俄亩以上**。

先生们，你们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可以使几百万农民摆脱饥饿，这可以使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提高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稍微象人一样地生活、象一个"文明"国家的比较文明的公民那样地生活，而不是象现在十室九空的俄国农民这样地生活。当然这还不能使全体劳动者**摆脱一切贫困和压迫**（为此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争取这一摆脱的斗争。我已经说过，有**六百万以上**的农户、即**一半以上**的农民，**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不到八俄亩**。这样一来，他们的土地可以**增加一倍多，几乎两倍**。

这就意味着，半数农民，半数终年挨饿受穷的、使城市、工厂工人劳动价格降低的农民，将**会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了**！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或他的同道者们当真能够劝说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放弃**这种摆脱忍无可忍的、绝望的处境的完全切实可行而又近便的出路的**念头**吗？

然而，即使大半数贫苦农户靠我们**土地过多的**地主老爷们而能够使自己占有的土地**几乎增加两倍**，这也还不够。除了这**六百**

① 详细数字（以备查对）见第3本笔记结尾部分。

万贫苦农户以外，还有**将近五百万**（精确数字是四百八十万）农户，每户有**八至二十俄亩**土地。在这五百万户当中，至少有三百万户无疑地也是靠自己贫瘠的份地度苦日子的。这**三百万农户**也可以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增加到**每户十六俄亩**；也就是说，增加50%，而有些户则甚至增加**一倍**。

总起来说是这样：在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农户总数中，有**九百万户**可以靠那些**土地过多**和过分习惯于**农奴制经济的地主老爷们**的土地来**大大**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工人的状况**，从而将**不再**使工人**降低价格了**！）！

这就是用来对比**大的地主**地产和**贫穷的农民**地产的数字所说明的问题。我很担心，数字和事实的爱好者、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并不喜欢这些**数字和事实**。因为，他在自己的演说中谈到希望引用数字之后，紧接着就说：

……"然而不能不表示担心，**那些**和实现类似（即增加土地）的改革**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希望，同数字一对比**就不会有完全实现的机会了"……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农业大臣先生！农民摆脱工役制和农奴制剥削的希望，正是**应该借助于数字的对比才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无论农业大臣瓦西里契柯夫先生或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先生及其他地主们怎样不喜欢这些**数字**，然而要**驳倒这些数字却是不可能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12卷
第253—264页）

列　宁

政治评论(摘录)

(发表于 1908 年 2 月 26 日〔13 日〕)

沙文主义者不停地在活动。他们拚命造谣，说日本人正在加紧武装，在满洲集中了六百个营，准备进攻俄国。又说土耳其也在积极武装起来，要在今年春季向俄国宣战。还说高加索有人准备暴动，企图脱离俄国(只是还没有叫喊说波兰人有什么计划!)。他们用芬兰正在积极武装的谎言来加紧迫害芬兰，利用在波斯尼亚建筑铁路的事实来拚命鼓动反对奥地利。俄国报刊还加紧攻击德国，说它唆使土耳其反对俄国。这种活动不仅俄国报刊，而且法国报刊也在进行。不久以前，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杜马中就很及时地提到了法国报刊被俄国政府收买的事实。

西欧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并不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报界人士幻想出来的，也不认为是哗众取宠的人玩弄的把戏。不，显然是"统治集团"方面(应读为黑帮沙皇政府方面或者象臭名昭著的"明星院"之类的秘密宫廷奸党方面)发出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暗号，执行着一种有系统的"路线"，采取了某种"新方针"。外国报纸认为，杜马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对所有未参加该委员会的杜马代表保密，即不仅对革命政党而且对立宪民主党① 人保密，是同这种沙文主义活动有直接联系的。有些外国报纸甚至说，俄国政府为了最终表

① 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编者注

明它蔑视“立宪制度”的态度，竟打算不向全体杜马代表，而只向黑帮-十月党① 人把持的委员会请求拨款以加强边防。

下面请看西欧报纸上的两段话，这些报纸不是社会主义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对俄国革命抱乐观态度：

“有一次俾斯麦说过，德国对法国的胜利(1870 年)激起了俄国军人的虚荣心，使他们也想去努力建立战功。由于政治、宗教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土耳其似乎成了特别适宜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对象（1877—1878 年间的俄土战争)。显然，现在俄国那些忘记了日俄战争的教训而又不了解国家真正需要的人，也持有同样的见解。既然在巴尔干已经不必解放什么‘小兄弟’，那末就得想些别的办法来影响俄国舆论。而这些办法老实说要比以前的办法更加拙劣：他们竟想把俄国形容成一个被内外敌人包围的国家。”

“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结果不可逆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对国内惨状的视线。”

反革命专制政府政策中的这个新的沙文主义方针，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在对马事件和沈阳事件以后，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不管怎样努力，两年反动的经验并没有为黑帮专制制度造成任何稍微可靠的内部支柱，并没有建立起任何一种能在经济上复兴专制制度的新的阶级成分。没有这一点，反革命无论怎样残暴和疯狂，都不能保持俄国现代的政治制度。

（选自《列宁全集》第 13 卷
第 417—418 页）

① 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政党。——编者注

列　宁

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摘录）

（发表于 1908 年 7 月 23 日〔8 月 5 日〕）

最近，欧洲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走上一个新的、比从前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

在波斯，发生了把俄国驱散第一届杜马同 1905 年底镇压起义的行动按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反革命。可耻地被日本人击溃了的俄国沙皇军队在捞回本钱，他们热心地替反革命效劳。哥萨克在俄国建立了枪杀、讨伐、殴打和掠夺等功勋以后，接着就在波斯建立镇压革命的功勋。尼古拉·罗曼诺夫站在黑帮地主和被罢工与内战吓破了胆的资本家的前列，疯狂地反对波斯的革命者，这是可以理解的。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军人也不是第一次充当国际刽子手的角色了。英国一面假装清白，一面对波斯的反动派和专制制度拥护者采取明显的友好的中立态度，这是稍有不同的现象。英国的自由资产者被自己家里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激怒了，被印度革命斗争的高涨吓坏了，他们愈来愈经常、愈来愈露骨、愈来愈强烈地表明，对立宪主义颇有研究的最“文明的”欧洲政治“活动家”，在群众奋起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的时候，竟变成了什么样的野兽。波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处境是困难的，印度的主人和俄国的反革命政府差不多已经准备好要瓜分波斯了。但是，大不里士的顽强的斗争、似

乎已经被击溃的革命者屡次获得的军事上的胜利，都表明暴虐的波斯王即使有俄国的利亚霍夫[291]军队和英国的外交家的援助，也遭到了下面的极其有力的反抗。革命运动有本领在军事上反击复辟的企图，迫使有这种企图的英雄们去向异族人求援，这种革命运动是不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波斯反动派取得最完全的胜利，那也只能是人民的新的愤怒的开端。

在土耳其，革命运动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在军队中获得了胜利。的确，这种胜利只是胜利了一半，甚至只是胜利了一小半，因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用恢复臭名昭著的土耳其宪法的诺言暂时敷衍过去了。但是，革命的这种半个胜利、旧政权被迫作出的这种仓猝的让步，必然会使内战发生更坚决得多、更剧烈得多、能吸引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新的转折。而内战的学校人民并没有白进。这个学校是很艰苦的，它的全部课程必然包括反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镇压等等。但是，只有十分愚蠢的书呆子和没有头脑的木乃伊才会因人民进入这个受苦的学校而痛哭流涕；这个学校教被压迫的阶级进行内战，教他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现代奴隶群众中的仇恨集中起来。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闭塞的、迟钝的、无知无识的奴隶的心中，奴隶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可耻的奴隶地位，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

……

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里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发展。只有在各个国家的工人所进行的总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充分地和全面地利用一切活动场所中的一切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带进总的潮流里来，但是，在每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某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缺点。总的说来，我

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近。拿工人阶级方面来说，这次斗争将比巴黎公社即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的时期要准备得更好，要好许多倍。

除了亚洲的革命民主斗争的尖锐化以外，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进步也使俄国革命处于特殊的和特殊困难的条件。俄国革命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有伟大的国际同盟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不仅有国内的敌人，不仅有俄国的敌人，而且有**国际的**敌人。以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斗争为对象的反动活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反动活动还把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团结起来去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反对亚洲的、特别是欧洲的一切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象大多数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到现在还在幻想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至于推开"资产阶级，不至于吓倒他们，不会产生"过分的"反动，不会造成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局面。这真是一个必然落空的希望，真是庸人的空想！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里，引火物这样迅速地增多，烈火这样明显地延烧到昨天还在沉眠不醒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去，这样，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活动的日益加强和各个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日益尖锐化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俄国的反革命没有完成而且也不能完成我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俄国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倾向于国际反无产阶级和反民主的潮流。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指靠自由派同盟者。它应当从农民群众自己必然要用暴力来解决俄国土地问题这一点出发，帮助他们推翻黑帮地主和黑帮专制政府的统治，给自己提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任务，记住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它的胜利同国际革命运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就这样独立地沿着

自己的道路向革命的完全胜利迈进。对反革命的（俄国的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少抱幻想，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多加注意！

（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156—157、161—162页）

列　宁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

（发表于 1908 年 10 月 16 日〔29 日〕）

最近一个时候，关于巴尔干事变的消息和议论不仅充满了俄国的政治报刊，而且充满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报刊。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曾一度迫在眉睫，现在也还远没有消除，虽然更大的可能是，仅仅叫嚣和空喊一番，而不至于真的爆发战争。

我们来粗略地看一下危机的性质和危机给俄国工人政党带来的任务。

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特别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播十分缓慢，以至俄国反革命在波斯起了并且还继续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土耳其革命一下子就碰上了以俄国为首的列强们的反革命联盟。的确，后一论断初看起来是同欧洲报刊和各种外交声明的总的腔调相矛盾的：听听这些声明，翻翻半官方刊物上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所有的声明和文章都充满了对已经复兴的土耳其的“同情”，都只希望在土耳其巩固和发展宪制，都大大称赞资产阶级青年土耳其党① 人的“温和”。

但是所有这些言论都不过是现代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和现代欧洲反动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伪善行为的典型。事实上，

① 即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团结进步党”。——编者注

无论哪一个自称民主的欧洲国家，无论哪一个标榜民主、进步、自由、激进等等的欧洲资产阶级政党，都丝毫不能证明自己真正愿意帮助土耳其革命，真正希望这个革命得到胜利和巩固。相反地，它们全都**害怕**土耳其革命的成功，因为这个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必然是争取独立自主、争取真正民主的愿望在巴尔干各国人民中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必然是波斯革命的胜利、亚洲民主运动的新的推进、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加强，是在漫长的俄国国境线上建立起自由制度，从而为阻难黑帮沙皇政府的政策和促进俄国的革命高涨创造新的条件，如此等等。

目前在巴尔干、土耳其、波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质就是欧洲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我们的各国政府的一切努力、欧洲各"大"报的一切宣传，都不过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混淆社会舆论，用伪善的言词和外交家的手法来掩盖欧洲的所谓文明国家为对付文明程度最低却最渴望民主的亚洲国家而组成的**反革命联盟**。无产阶级在这个关头所采取的政策，全部实质就在于，揭下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假面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对亚洲革命扮演着或帮助扮演宪兵的角色。

欧洲各国对土耳其和巴尔干的一切事变都裹上了密密层层的阴谋的罗网，普通的老百姓都上了外交家的当，这些外交家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枝节问题、局部问题上面，转移到正在发生的事变的个别方面，力图模糊整个过程的意义。然而，我们的任务，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向人民说明事变的总的联系，说明正在发生的整个事变的基本趋势和背景。

企图"捞一把"，希望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以及对附属国或受欧洲"保护"的各国人民独立民主

运动的畏惧，这就是整个欧洲政策的两个动力。人们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与慎重，也就是称赞土耳其革命的软弱无力，称赞这个革命不去唤醒下层人民，没有使群众获得真正的独立，称赞这个革命敌视正在奥托曼帝国[1]展开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此同时，人们还是照旧地掠夺土耳其。人们所称赞的是可以继续照旧掠夺土耳其领地。一面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面继续推行显然是**瓜分土耳其**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民报》（社会民主党地方机关报）极其正确而又中肯地写道：

"1791 年 5 月，真正关心祖国福利的有远见的国家活动家在波兰实行了政治改革。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称赞 5 月 3 日的宪法，欢迎这个宪法，把它看作'造福于邻邦'的事情。全世界都大大赞扬波兰的改革者，说他们和巴黎的可怕的雅各宾派不同，做起事情来是那样地'温和'…… 1793 年 1 月 23 日，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

1908 年 8 月，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政治改革，而且进行得异常平稳。全世界都称赞他们，说他们和俄国的可怕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做起事情来是彬彬有礼地'温和'…… 1908 年 10 月，爆发了一系列导致瓜分土耳其的事变。"

事实上，如果有谁想相信外交家的**言论**，而不考虑他们的**行动**，不考虑列强集体反对革命的土耳其的举动，那简直是幼稚。只要把某些国家的外长、首脑的会晤和谈判的**事实**同以后发生的事变对照一下，对外交家的声明的天真的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了。在 8 月和 9 月间，正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发生以后和奥地利与保加利亚发表宣言之前，伊兹沃尔斯基[2]在卡尔斯巴德和马利延巴德同英王爱德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克列孟梭会晤，奥地利外交大臣冯·艾伦达尔同意大利外长齐托尼在萨尔茨堡会晤，然后是伊兹沃尔斯基同艾伦达尔于 9 月 15 日在布赫洛耶会晤，保加利亚

① 土耳其人建立的军事封建帝国（1290—1922）。——编者注

② 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编者注

大公斐迪南同弗兰茨-约瑟夫[1]在布达佩斯会晤，伊兹沃尔斯基同德国外长冯·雪恩、然后同齐托尼和意大利国王会晤。

这些事实是不说自明的。**在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出动以前，一切重大问题**都已经在俄、奥、德、意、法、英等**六国之间**，在国王和大臣们的私人会晤中以最秘密的和直接的方式谈妥了。**后来**报纸上展开的关于艾伦达尔说意、德、俄已同意奥地利兼并（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事是否属实的对骂，**完全是一场滑稽剧，完全是为了转移视线**，只有自由派庸人才会上这个当。掌握欧洲各国对外政策的巨头，伊兹沃尔斯基、艾伦达尔和一伙戴王冠的强盗及其大臣们，故意把骨头扔给新闻界：先生们，请咬架吧！究竟谁欺骗了谁，谁得罪了谁，是奥地利欺骗了俄国呢，还是保加利亚欺骗了奥地利，如此等等，谁"第一个"撕毁柏林条约，谁又是怎样对待大国会议计划，如此等等。请吧，请让舆论去注意这些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啊！太重要了！）问题吧！我们需要的正是掩盖**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即在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进一步采取瓜分土耳其的步骤、利用某种借口来重新审查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允许俄国黑帮沙皇扼杀波斯的革命这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事先达成的协议。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我们这些全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领袖真正需要的和正在干的事情。让自由派的傻瓜们在报刊上，在议会里去空谈事情是如何开头的，谁讲了什么话，殖民掠夺和镇压民主运动的政策是在什么伪装之下最后形成、签署并公布于世的。

欧洲各大国的自由派报刊（目前吃得最"饱"的奥地利除外）现在都在责难**本国**政府维护本民族利益不够。每个国家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描写成最无能的，最不会"利用"时机的，受别

① 1848--1916年的奥地利皇帝。——编者注

人欺骗的，等等。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推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他们早就说过奥地利的胜利使他们感到“羡慕”（米留可夫先生的原话）。自由资产者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完全是最丑恶的伪善行为，是对真正的进步和自由的最卑鄙的叛卖。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故意不谈反动政府的阴谋，模糊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第二、它推动每个国家走上所谓积极外交政策的道路，即赞同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和干涉巴尔干半岛事务（这种干涉从来就是反动的）的做法；第三、这个政策直接为反动派效劳，因为它使人民只去关心：“我们”能得到多少，“我们”在分赃的时候能分得多少，“我们”能占多少便宜。目前，各国反动政府最需要的，正是引用“社会舆论”来替自己的掠夺行为或取得“赔偿”等等的要求做后盾。它们说，你们看，我国的报刊都在责备我过于大公无私，对本民族利益捍卫得不够，说我太容易让步，并且用战争来威胁我，可见，我的要求是最“低的和最公平的”，是完全应当得到满足的！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和欧洲自由资产者的政策一样，就是讨好反动政府，维护殖民侵略、掠夺以及对他国事务的干涉。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种政策是打着“反对派”的幌子推行的，这就能迷惑许许多多的人，使那些不信赖俄国政府的人信赖政府，使群众的意识模糊起来。所以，我们的杜马代表和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必须注意，不通过杜马讲坛、传单和会议来说明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的反对派立场之间的种种联系，就不可能在社会民主党人就巴尔干事变进行的教育、宣传工作方面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不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对外政策和沙皇政策的同一种实质，就不可能向人民说明沙皇政策的全部危害性和反动性。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高谈阔论、矫揉造作、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伎俩，就不可能揭露对外政策中

的沙文主义和黑帮路线。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对自由资产阶级观点的迁就使社会党人堕落到什么地步。麦克斯·席佩耳在机会主义者的著名机关刊物«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社会主义——???——月刊》)上就巴尔干的危机写道："几乎一切有头脑的党员都认为，如果不久以前在我们的柏林中央机关报上(即在«Vorwärts»① 上)重复过的意见，即认为德国无论从现在的或是将来的巴尔干政变中都将一无所得的那种意见占了优势，那将是一个错误。当然，我们不应该去争夺领土…… 但是，各大国在这个介于欧洲、整个亚洲和部分非洲之间的重要的关键地区大规模地重新配置力量，无疑是会最直接地损害我们的国际地位的…… 俄国这个反动的庞然大物现在根本不能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我们都没有理由把俄国看做敌人，象五十年代的民主派把它看作敌人那样。"(第 1319 页)

这个给自己戴上社会主义者假面具的愚蠢的自由派，竟察觉不出俄国"关心""斯拉夫兄弟"的反动阴谋！他说"我们"(代表德国资产阶级)，"我们的"地位如何如何，却既没有看出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的打击，也没有看出俄国反对波斯革命的步骤！

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刊载于 10 月 22 日出版的那一期杂志上。10 月 18 日(5 日)《新时报》[292] 刊登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说什么"大不里士的混乱已经达到难于置信的程度"，什么这个城市"已被半野蛮的革命者毁坏和劫空了一半"。你们可以看出，革命一战胜波斯王在大不里士的军队，俄国半官方报刊立刻就暴怒若狂。波斯革命军队的领袖萨塔尔汉在这篇文章中被说成"阿德尔拜疆的普加乔夫"(阿德尔拜疆或阿捷尔拜疆是波斯北部的一个省；该省

① «前进报»。——编者注

的首府是大不里士，根据莱克留的统计，该省居民几乎占全部波斯居民的五分之一）。《新时报》写道："所有这些很不象话的事情使得我国在波斯边界上数以百万计的贸易遭到破坏，试问，俄国能够无止境地容忍下去吗？…… 不应当忘记，南高加索的整个东部和阿德尔拜疆从人种学上看是一个整体…… 住在南高加索的鞑靼半知识分子忘记了自己是俄国臣民，竟热烈地参加大不里士的骚乱，派遣志愿军到那里去……对我们来说，重要得多的是使邻近我国的阿德尔拜疆平静下来。虽然俄国极不愿意进行任何干涉，但是情况可能迫使俄国担负起这个责任，不管这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10月20日德国《法兰克福报》收到彼得堡的电讯，说占领阿德尔拜疆是俄国打算取得"赔偿"。10月24日（11日）该报刊登了来自大不里士的电讯："**配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的六个俄国步兵营已于前日越过波斯国境，今日已在大不里士听命待发。**"

麦·席佩耳象奴才一样重复着自由派报刊和警察报刊的保证和叫嚣，对德国工人说，俄国作为反动的庞然大物的意义已经成为过去，把俄国看成敌人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就在这一天，俄国军队越过了波斯国境。

暴君尼古拉的军队对波斯革命者的一场新的屠杀就要来临了。随着非正式的利亚霍夫的干涉而来的是正式占领阿德尔拜疆，并在亚洲重演1849年俄国在欧洲所干的勾当。当时，尼古拉一世派遣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当时，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党中还有真正的民主派，它能够为自由斗争，而不象现在的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只会伪善地空谈自由。当时俄国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至少是镇压了某几个欧洲国家。而现在，欧洲所有的大国，"血红的"克列孟梭的"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对国内民主力量的任何一点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害怕得要命，都帮助俄国扮演

亚洲宪兵的角色。

毫无疑问，俄、奥、德、意、法、英六国的**九月反动密约，包括了**俄国有反对波斯革命的“行动自由”。至于这一点是不是写在什么秘密文件上，经过许多年以后将收入历史资料汇编出版；或者只是伊兹沃尔斯基向他的最亲切的会谈者谈过这一点；或者是这些会谈者自己“暗示过”：我们从“占领”转为“兼并”，而你们也许可以从利亚霍夫的干涉转为“占领”；或者是采用了其他某种方式，——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不管大国之间的九月反革命密约的形式多么不完备，这个**密约却是事实**，它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反对民主的密约。这是为了直接镇压亚洲革命或间接打击这个革命的密约。这是为了今天在巴尔干、明天在波斯、后天或许在小亚细亚、在埃及等地继续进行殖民掠夺和领土侵占的密约。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这种戴王冠的强盗和国际资本的联合势力。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揭穿各国外交家的把戏，清楚明白地摆出一切事实，表明**一切盟国**所起的卑鄙的作用，不管这个盟国是直接起宪兵的作用，还是充当宪兵的帮凶、伙伴或资助者。

在杜马中即将听取伊兹沃尔斯基的报告和立宪民主党-十月党人的质询，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现在肩负着一项非常艰巨但又非常崇高、伟大的责任。他们所在的机构在掩饰主要的反动国家、主要的反革命阴谋者的政策，因而他们应当有本领，有勇气**说出全部真相**。在现在这种时候，黑帮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也有许多事情要他们去做。除了他们，杜马中**再没有别人能够不从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发出反对沙皇制度的呼声。而立宪民主党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情况下所表示的“抗议”，比什么东西都更坏，因为这只能是**同一群**资

本主义豺狼为了替同一种豺狼政策辩护而发出的抗议。

愿我们在杜马中的党组织以及其他一切党组织都开始做起来吧。现在向群众进行宣传，其意义要比平常大一百倍。在我们党的整个宣传工作中，有三件事情应该提到首要地位。第一、同一切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报刊（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都包括在内）相反，社会民主党要揭露各种会议、大国协定、与英国结成的反奥同盟或与奥地利结成的反德同盟或其他任何的外交把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指出列强的反动密约这一事实，这个密约已经成立，各国政府都极力想用比较公开的谈判这种滑稽剧来掩饰这个密约。反对外交家的滑稽剧，向人民说明事情的真相，揭露反无产阶级的国际反动派！第二、我们必须阐明这个密约所造成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结果，即打击土耳其革命，促使俄国扼杀波斯革命，干涉他国事务，破坏民主和民族自决权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的纲领同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样，是要捍卫这种权利的。奥地利人和俄国黑帮分子对"斯拉夫兄弟"的"关怀"是再反动不过的了。这种"关怀"掩盖着早已使俄国在巴尔干声名狼籍的那些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这种"关怀"一向就是要摧残某些巴尔干国家的真正的民主。大国对巴尔干国家的唯一真诚的"关怀"可能是并且只能是一种关怀，这就是让它们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不以外国干涉去破坏它们的生活，不去阻挠土耳其革命。但是，工人阶级当然不能坐等资产阶级采取这种政策！

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直到名称上最主张自由的和最"民主"的政党，包括我们的立宪民主党在内——都拥护资本家的对外政策。这是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的第三件事情。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实质上都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竞赛，只是强调这种竞赛要采取不同于黑帮所采取的形式，只是要求订立不同于政府现在所依靠的那种国际协定。自由派这样反对资产阶级对外政

策的一种形式而主张同一政策的另外一种形式，这样责备政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掠夺和干涉方面！），这就对群众起着特别能把他们引入歧途的影响。我们要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打倒一切干涉政策，打倒资本主义争夺他国领土、他国居民、新的特权、新的市场、海峡等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不赞成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和正义地”发展的荒谬的市侩的空想。社会民主党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它懂得，除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和平和自由的保护者了。

附言：这篇文章付印以后，报上发表了**彼得堡通讯社的**一则电讯，否认俄国军队越过波斯国境的消息。这则电讯登在10月24日的《法兰克福报》早刊第二版上面。在第三版上登了君士坦丁堡10月24日晚10点50分发出的电讯，说10月24日晚在君士坦丁堡获悉，俄国军队已越过波斯国境。国外的报刊，**除社会党的报刊以外**，目前都对俄国军队侵入波斯一事保持缄默。

总之，暂时我们还不可能完全了解全部真相。但是，无论如何**圣彼得堡通讯社**发出的沙皇政府的“辟谣”是不足信的。俄国得到大国的同意，正在用一切办法——从阴谋活动到派遣军队——来反对波斯的革命，这是事实。俄国执行着目的在于占领阿捷尔拜疆的政策，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军队还没有越过国境，那也一定在这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无火决不会生烟。

（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194—204页）

列　宁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发表于 1909 年 7 月 11 日〔24 日〕）

半世纪以前，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纪作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四十年代起一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说，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十九世纪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没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但是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国际反动派已经完全形成，这些政府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起义，意识到劳动同资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为了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准备对任何居于王位的冒险家和强盗表示欢迎。因此，当二十世纪初沙皇政府受到对日战争和 1905 年革命的极其沉重的打击的时候，国际资产阶级就跑来帮助它，用几十亿的贷款支持它，竭尽全力制止革命烈火的蔓延，恢复俄国的“秩序”。你帮我忙，我帮你忙。在欧洲各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打击民主派的时候，沙皇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帮助了这些政府。现在，对无产阶级来说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欧洲资产阶级，

帮助沙皇政府打击了革命。

盟国都在庆祝胜利。暴君尼古拉到欧洲向国王们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致贺去了。国王们和总统狂热地准备欢迎这个俄国黑帮反革命势力的领袖。但是，这些黑帮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高贵骑士所以能取得胜利，并不是由于他们消灭了自己的敌人，而是由于他们分裂了敌人的力量，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没有同时成熟。工人阶级的联合起来的敌人取得胜利的代价是推迟举行决战的日期，是扩大和加深那个将不断地（虽然可能比我们所希望的要缓慢一些）增加无产者的人数、加强他们的团结性、在斗争中锻炼他们、使他们习惯于同联合起来的敌人作战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资本主义，它曾经唤醒了罗曼诺夫王朝贵族的宗法的"世袭领地"，现在正在一个个地唤醒亚洲的国家。

盟国在庆祝胜利。但是，暴君尼古拉和欧洲资产阶级政府领袖们的每次庆祝，都有革命工人群众的呼声象回声般地伴随着。尼古拉和威廉，爱德华和法勒埃尔在密密层层的士兵或一长列军舰的保护下握手致意，他们欢呼：我们把革命镇压下去了。而革命力量通过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象回声一样回答说：我们要把你们一起打倒。

暴君尼古拉出国访问去了，临行前，参加黑帮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宣布了俄国全体觉悟工人的共和信念，提醒他君主政体必然要崩溃。尼古拉到了瑞典。那里，他受到了宫廷的祝贺，受到了士兵和密探的欢迎。瑞典工人群众的领袖社会民主党人布兰亭的欢迎词却是抗议刽子手的访问污辱了瑞典。尼古拉还要前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国王和宫廷显贵、大臣和警官都在准备欢迎他。工人群众也在准备欢迎他：英国将举行群众抗议集会；法国将举行表示人民愤慨的示威；意大利将在他到达的这个不祥日子举行总罢工。所有这三个国家的社会党议员——英国的梭恩、法国

的饶勒斯、意大利的莫尔加利都已经响应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号召，向全世界宣布，工人阶级憎恨和鄙视这个正在镇压波斯人民并向法国派遣大批俄国间谍和奸细的暴徒尼古拉、绞刑手尼古拉。

所有这些国家的“有名的”资产阶级报纸暴怒若狂，不知该怎么谩骂社会党人的言论，不知应怎么替打断社会党人讲话的大臣们和议长们帮腔。但是狂怒也无济于事，因为在真正立宪的国家里，要封住无产阶级议员的嘴巴，要不让群众集会是不行的。俄国沙皇不敢在伦敦、巴黎、罗马露面，这一点无论对国内和国外都是瞒不住的。

国际反动派的领袖们本想趁俄国和波斯的革命被镇压下去的时机，隆重地庆祝一番，但是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致的勇敢的抗议之下，庆祝活动**被破坏了**。

从彼得堡到巴黎，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马，社会党人到处都在抗议沙皇专制制度，保卫革命和革命的口号，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我国自由派向沙皇政府卑躬屈节的那副可耻的奴才相便显得分外清楚了。以黑帮杜马主席为首的几个杜马代表，其中包括温和的右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现在正在英国访问。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代表了杜马的多数，杜马中真正的中派，即既没有极右派也没有极左派。他们装成“宪制”俄国的代表，他们颂扬“革新后的”制度和“赐给人民”以杜马的可敬的君主。他们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青蛙那样，鼓着气，胀起肚子，俨然象是击败了据说是希望废除俄国“宪制”的黑帮反动派的胜利者。“立宪**民主**”（别开玩笑吧！）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在市长举行的早宴上致词时宣布：“只要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的议院，俄国的反对派始终是属于皇上的，而不是反对皇上的。”（圣彼得堡通讯社旧历 6 月 19 日电）十月党机关报《莫斯科呼声报》在 6 月 21 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了一个赫列斯塔科夫式的标题，叫做《欧洲和革新后的俄国》，社论热烈欢迎立

宪民主党人首领的讲话并且指出，他的“温和立宪主义”的言论“可能标志着立宪民主党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放弃为当反对派而当反对派这种不妥当的策略”。

警察办的《俄国报》于6月23日也就米留可夫的讲话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在转述了属于皇上的反对派这句“名言”以后说：“米留可夫先生在英国对俄国反对派承担了某种义务，如果他能履行这一义务，他就会对祖国作出重大的贡献，使他过去的不少罪过可以得到宽恕。”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出头了：“路标”派①，特别是司徒卢威得到了黑帮暴徒的“大主教”安东尼·沃伦斯基的赞许；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得到了警察办的出卖灵魂的报纸的赞许。混出头了！

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是我们从1906年起就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实质上就是十月党人，当时在杜马中的有名无实的“胜利”冲昏了许许多多自私的和不自私的幼稚者的头脑。

我们要指出的只是，我们在**二十多个月**以前，在《无产者报》第19、20号（1907年11月）上评论第三届杜马选举的结果时，**就揭露了现在看得特别明显的沙皇政府玩弄第三届杜马的实质**。1907年11月，我们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都指出，在第三届杜马中可能有**两种**多数：黑帮-十月党的多数和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的多数，这两种多数都是反革命的。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的决议（《**无产者报**》第19号）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第20号）都指出：“杜马中的这种情况特别有利于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上玩弄两面手法。”②

这种对形势的评述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暴露出那些准

① 由立宪民主党人写的文集《路标》而得名。——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1、127页。——编者注

备宣称社会民主党人要再次“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人目光是多么短浅。

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十月党人，并不是把十月党人当做真正的敌人而是当做**竞争者**。为了“争取”选民——我们就称自己为“人民自由”党。为了证明自己的“庄重”——我们在第三届杜马中把马克拉柯夫这些人捧出来，我们通过米留可夫向欧洲宣布，我们是“属于皇上的反对派”。黑帮沙皇政府的忠实奴仆斯托雷平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让黑帮沙皇匪徒**在事实上**主宰全国一切，让他们而且完全让他们去解决一切真正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需要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是为了玩弄把戏，为了向欧洲“显示”，为了更容易借到钱，为了“纠正”黑帮的偏激，为了用国家参议院修改过的……“改革”来欺骗傻瓜。

皇上了解**自己的**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派也了解**自己的**斯托雷平和**自己的**尼古拉。我国的自由派和大臣们不费什么劲就学会了欧洲议会那套并不深奥的虚伪和欺骗的学问。两者都卓有成效地学来了欧洲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手法。

不断加强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团结的俄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同两者进行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

（选自《列宁全集》第15卷
第428—432页）

列　宁

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

（发表于1909年10月31日〔11月13日〕）

冬宫的黑帮强盗和第三届杜马中的十月党人骗子手们开始向芬兰发动了新的进攻。取消芬兰人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防止俄国专制君主的蹂躏的宪法，使芬兰同俄国其他地区处于同样的非常状态，处于同样的毫无权利的境地，——这就是这次进攻的目的。这次进攻是以沙皇不通过芬兰议会而就义务兵役问题颁布了法令并从俄国官吏中任命一批新的参议员这两件事作为开始的。强盗和骗子手们企图用各种论据来证明他们在百万大军的威胁下向芬兰提出的那些要求是合理的和正当的要求。对这些论据进行分析，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些论据，而在于所追求的目的。沙皇政府及其帮凶们想通过对民主自由的芬兰的进攻来消灭1905年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最后一点痕迹。因此，这几天哥萨克团队和炮兵营迅速占据芬兰一些中心城市的事件，是关系到全俄国人民的事件。

受到芬兰人民支持的俄国革命，曾经迫使沙皇松开了他若干年来紧紧扼住芬兰人民喉咙的魔爪。当时，希望把自己的专制制度扩展到芬兰去的沙皇（虽然他的祖先和他自己都曾发誓要尊重芬兰的宪法），不仅被迫同意芬兰人民从芬兰土地上赶走波布里科夫分子[293]刽子手的行动，被迫废除了他自己颁布的一切非法指令，而且被迫同意在芬兰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制。现在，沙皇在镇压了俄国革命之后，又干起旧日的勾当，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

他感到在后面支持他的不仅有他所雇用的暗探和贪官污吏这些老搭挡，而且还有以克鲁平斯基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为首的、在第三届杜马中以俄国人民的名义共同发表言论的有产者的狐群狗党。

现在情况十分有利于干这种强盗的勾当。俄国革命运动大大地削弱了，因此，戴王冠的恶棍已经不用把革命运动放在心上，可以专心一意地猎取他所看中的猎物。曾经向沙皇呼吁，要求它不要再搅乱芬兰的安宁的西欧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匪徒们的行为袖手旁观，不加阻止。因为那些曾经号召欧洲谴责沙皇对芬兰的政策的人们刚刚向他们提出担保，说沙皇是诚挚可靠的，是有"宪制精神的"。那些自命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俄国人民的代表"的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郑重其事地向欧洲资产阶级保证说，他们以及和他们一起的俄国人民，是同沙皇一致的。俄国的自由派竭力想使欧洲对于双头凶鹰向芬兰发动的新的进攻也象对于它对自由波斯的讨伐一样采取旁观的态度。

自由的波斯用自己的力量抗击了沙皇制度。芬兰人民首先是芬兰无产阶级也正在准备给波布里科夫的徒子徒孙们以坚决的回击。

芬兰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必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他们知道，向俄国专制制度献媚的西欧资产阶级是不会出面干涉的；俄国的有产者（他们一部分被斯托雷平的政策所收买，一部分被立宪民主党的谎言所迷惑）是不会象他们在1905年以前那样给予芬兰以道义上的支持的；同时，俄国政府自从在俄国国内击败了革命队伍以来，它的专横暴虐更是大大地变本加厉了。

但是芬兰无产阶级也知道，政治斗争并不决定于一次战斗，有时候它要求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必将是同历史发展的力量相适应的一方。芬兰的自由一定会获得胜利，因为没有芬兰的自由，就不可能有俄国的自由，而没有俄国自

由事业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俄国的经济发展。

芬兰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光荣经验也知道如何为争取自由而进行长期的、顽强的革命斗争，如何在情况允许给无耻的敌人以决定性打击以前，消耗和瓦解他的力量，揭露他的罪恶。

同时芬兰无产阶级也知道，它一开始进行自己新的斗争，就会得到整个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支持。不管当前的条件如何困难，俄国无产阶级都决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自己的全部义务**。

芬兰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同第三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共同讨论同强暴者作斗争的计划。我们的代表将象去年一样在高高的杜马讲坛上大声疾呼，痛斥沙皇政府，并撕下杜马中那些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同盟者的假面具。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全体工人都应当竭力响应我们代表在塔夫利达宫里发出的呼声，使俄国和芬兰的自由的敌人们看到，整个俄国无产阶级是同芬兰人民站在一起的。各地同志们的责任是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来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对芬兰问题的态度。我们党将找到足够的方法（例如对俄国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发出号召，以及采用各种更有效的抗议方式）来打破现在的这种可耻的沉默状态，——目前俄国的反革命正是在这种可耻的沉默状态中蹂躏着芬兰人民。

芬兰的斗争是为了全俄国的自由。不管新的斗争会使英勇的芬兰无产阶级遭到多么巨大的痛苦，这个斗争必将用新的团结的纽带把芬兰工人阶级和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使他们受到锻炼，使他们将来有力量完成他们在 1905 年 10 月的日子里所开始的、并且企图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维阿波尔格的那些光辉的日子里继续进行的事业。

（选自《列宁全集》第 16 卷
第 70—73 页）

列　宁

对芬兰的进攻

（发表于1910年4月26日〔5月9日〕）

1910年3月17日，斯托雷平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关于颁布有关芬兰的全国性法令和决定的程序》的草案。在这个官气十足的标题后面，隐藏着专制制度对芬兰的自由和独立的最无耻的进攻。

斯托雷平的法令草案规定，芬兰的一切事务，凡是“不是纯属这个边区内部事务”的，都要由国家杜马、枢密院和尼古拉二世来决定。芬兰议会只能提出“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对谁也没有约束力。这样芬兰议会实际上变成了帝国的布里根杜马①。

那末，所谓“不是纯属”芬兰“内部事务的法令和决定”是指的什么呢？我们不把斯托雷平在草案中所提出的十七条全部列举出来，我们只指出，这里牵涉到芬兰同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税关系，废除芬兰刑法的问题，铁路事业，芬兰的货币制度，群众集会的条例，芬兰的出版法等等。

这一类的问题统统都得由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来决定！**彻底摧毁芬兰的自由**，——这就是专制制度打算依靠被六三宪法②联合起来的地主代表和商界上层代表来实现的计划。

---

① 布里根杜马是沙皇政府预定在1905年召集的咨议性“代表机关”，因由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法律草案而得名。——编者注

② 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公布了新选举法，保证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多数，称六三宪法。——编者注

这个计划是很保险的，因为这里指的都是被“宪法”认为合法的那些人。五十名极右分子；一百名民族主义分子和“右派十月党人”；一百二十五名十月党人，——这就是已经在杜马中集合起来的、在政府报刊长期的诽谤攻势之后现在随时可以对芬兰采取暴力的那支反动队伍。

专制制度的镇压一切“异族”的旧民族主义现在正在被加强，这是因为，第一，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非常仇恨人民，仇恨他们利用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间的短时期的胜利创造了和黑帮沙皇相对立的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仇恨他们为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一边的芬兰工人群众创造了能自由组织起来的条件。芬兰过去趁俄国革命的机会使自己获得了几年的自由和和平发展。俄国的反革命势力现在正急忙趁着“家中”太平无事来尽量剥夺芬兰已经获得的成果。

历史好象在通过芬兰的例子表明，标榜一时的被一切庸人当作偶像的“和平”发展，不过是一种不长久的、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例外，它完全证实了这样一条常规：只有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各族人民的生活发生巩固持久的变化，才能根本摧毁中世纪的统治和半亚洲式的资本主义。

芬兰过去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完全是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广泛地发动起来了，动摇了俄国的专制制度。现在，芬兰工人只有同俄国群众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才能免除黑帮强盗的进犯。

芬兰这个和平的国家是趁俄国的十月发动而进行革命、靠俄国的十二月斗争和两届反政府的杜马而捍卫自由的，可是这样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性。芬兰的资产阶级攻讦芬兰工人赤卫队，指责他们是革命主义；它竭尽全力来阻挠芬兰的社会主义组织获得充分的自由；它企图通过讨好沙皇政府的办

法(象 1907 年出卖政治活动家那样),使沙皇政府不对自己施加暴力;它指责本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被俄国社会主义者**带坏了**,染上了他们的革命性。

现在,就是芬兰的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出,执行让步、讨好、"献媚"的政策,执行直接或者间接出卖社会主义的政策,得到了怎样的后果。芬兰的人民如果置身于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训练并被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斗争之外,就不能找到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如果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外,就没有办法反击尼古拉二世。

我国专制制度的政策——旧民族主义又一次加强的原因,是我们俄国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反革命性增长了。资产阶级中的沙文主义随着对无产阶级这支国际力量仇恨的增长而增长起来。资产阶级中沙文主义的加强,是同国际资本竞争的加剧和尖锐化相辅而行的。沙文主义是由于日俄战争遭到失败和无力制服有特权的地主而要找别人出气的表现。沙文主义从地道的俄国企业主和商人的贪欲中得到了支持,因为俄国企业主和商人没能在巴尔干尝到一点甜头,是很乐于"夺取"芬兰的。因此,代表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机关的组成,使沙皇政府在**镇压**自由芬兰方面得到了忠实的伙伴。

但是,在侵犯自由边区的反革命"活动"扩大基地的同时,**反击**这些反革命活动的基地也扩大了。如果说,在芬兰的敌人方面不是仅仅有官僚和一撮权贵,而且有参加第三届杜马代表机关的有领地的贵族和大商贾,那末在芬兰的朋友方面,就有千百万的群众,这些群众曾经造成 1905 年的运动,曾经提供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革命派。不管**目前**政治上的平静会持续多久,这些群众仍将冲破一切障碍而生存下去和成长起来。要为俄国革命的新的失败报仇的新的**复仇者**正在成长起来,因为芬兰的自由受到挫折

就是俄国的革命受到挫折。

我们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现在也一再表现出他们的胆小和没有气节。立宪民主党人当然**反对**进攻芬兰。他们当然不会同十月党人唱一个调子。但是，难道不正是他们用了**最大的力气**来进行破坏，使"公众"不去同情**唯一**使芬兰获得了自由、使芬兰已经保持了四年以上的自由的间接的革命斗争和10月—12月的"策略"吗？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俄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同背弃了这一斗争和这种策略吗？难道不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拚命在俄国的整个文明"社会"里挑起民族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情绪吗？

社会民主党在1908年12月通过的决议中曾经说，立宪民主党人宣传民族主义，**实际上**正是为沙皇政府效劳[294]。事实证明，这句话讲得多么正确！立宪民主党人当俄国在巴尔干遭到外交上的失败时所要采用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立场"，正如预料的一样，是一种可怜的、无原则的、卑躬屈膝的反对立场，是**讨好**黑帮分子、**加强**他们的贪欲、**责怪**黑帮沙皇力量不够强的立场。

"人道的"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你们现在来自食其果吧。你们曾向沙皇政府指出，它无力坚持"民族"任务，现在沙皇政府向你们表明，它很有力量对异族实行**民族**迫害。你们的民族主义、新斯拉夫主义等等，是自私的、局限在阶级圈子里的、资产阶级性的实质加动听的自由主义的空话。空话始终是空话，实质却**给**专制制度仇视人类的政策**帮了忙**。

自由主义的空话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这些空话只能**掩盖**资产阶级的狭隘的自私和它的强暴；它们只能用假的花朵来装饰人民的桎梏；它们只能麻痹人民的意识，**使**他们**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敌人。

但是，沙皇政策每实行一次，第三届杜马每存在一个月，都越来越无情地打破自由主义的幻想，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自由主义

的软弱无力和腐朽性，越来越广泛地和大量地播下无产阶级下一次革命的种子。

总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会奋起争取芬兰的自由，争取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

（选自《列宁全集》第16卷
第168—172页）

列　宁

革命的教训

（发表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

自从1905年10月俄国工人阶级给了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强大打击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无产阶级在那伟大的日子里，发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去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它在1905年几个月内争得了工人数十年来徒然期待"首长"赐给的那些改良。无产阶级为全俄人民争得了（虽然只是暂时地争得了）俄国空前未有的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它从自己的前进途中扫除了伪造的布里根杜马，从沙皇手中争得了立宪宣言，并且一举而造成了没有代议机关就不能管理俄国的定局。

无产阶级所争得的伟大胜利是不彻底的，因为沙皇政权没有推翻。十二月起义① 结果遭到失败，于是沙皇专制政府就随着工人阶级进攻的减弱，群众斗争的减弱，而把工人阶级所获得的成果相继夺了回去。1906年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士兵的风潮虽然比1905年弱得多，但终究还是很强大的。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人民的斗争又发展起来，沙皇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但没有敢于马上修改选举法。1907年工人斗争更加减弱下去，于是沙皇就把第二届杜马解散，举行了国家政变（1907年6月3日）；沙皇违背了他所许下的非经杜马同意决不颁布法律的冠冕堂皇的一切诺言，修改了选

① 指1905年12月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编者注

举法，使地主和资本家、黑帮政党及其走狗在杜马中能够稳稳地占大多数。

革命的各次胜利与失败，都使俄国人民获得了伟大历史意义的教训。我们纪念1905年革命第五周年，要明白认识这些教训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知识人士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政府夺回。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是神仙和皇帝！
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第二个教训就是：仅仅破坏或限制沙皇政权还不够，必须把它**消灭**。沙皇政权如不消灭，沙皇的让步总是不可靠的。沙皇在革命进攻加强时就作些让步，进攻减弱时就把这些让步统统收回了。只有争得民主共和国，推翻沙皇政权，使政权归人民，才能使俄国摆脱官僚的暴力和专断，摆脱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摆脱农村中地主及其走狗的专横势力。现在革命后农民和工人所遭到的灾难比先前更加深重，就是当时革命的力量还弱，而沙皇政权没有被推翻的结果。1905年的事变，头两届杜马和这两届杜马被解散的事实，都给了人民很多的教训，首先就是教他们知道必须用共同斗争来实现政治要求。人民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开始是要求专制政府让步：要沙皇召集杜马，要沙皇撤换大臣，要沙皇“颁赐”普选权。

但是专制制度没有并且也不能作这种让步。专制政府用刺刀回答了请求让步的行动。于是人民开始觉悟到必须进行**斗争**来反对专制政府。现在斯托雷平和反动的老爷杜马，可以说是更加用力地要把这种觉悟灌进农民脑海中去。他们灌来灌去一定会灌进去的。

沙皇专制政府也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它已经知道不能指靠农民对沙皇的迷信了。现在它和黑帮地主以及十月党厂主结成联盟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现在要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就要有比1905年强大得多的革命群众斗争的攻击。

这种强大得多的攻击是否可能发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谈谈**第三个而且是最主要的**革命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各个阶级**怎样**行动了。在1905年以前，有很多人以为全体人民都同样趋向自由，都愿意得到同样的自由；至少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清楚俄国人民中各个阶级对于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并且它们所要求的自由也是各不相同的。革命把迷雾吹散了。1905年末，以及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时期，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公开行动了。他们在实际上表明了自己的面目，暴露了他们的真正趋向是什么，他们究竟能为什么而斗争，斗争究竟有力、顽强和坚忍到什么程度。

工厂工人即工业无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进行了极其坚决极其顽强的斗争。无产阶级用一月九日的发动和群众性罢工开始了革命。无产阶级把斗争进行到底了，它奋起举行了1905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奋起保护了被枪杀、被鞭笞拷打的农民。1905年罢工的工人约有**三百万**（如算上铁路员工、邮务人员等等大概有四百万人），1906年有一百万，1907年有七十五万。这样强大的罢工运动在世界上还未曾有过。俄国无产阶级表明了，在真正的革命危机成熟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中间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世界上最大

的1905年罢工浪潮还远没有把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全都发挥出来。例如在莫斯科工厂区的五十六万七千个工厂工人中罢工达五十四万人次，而在彼得堡的三十万个工厂工人中罢工就达一百万人次。可见，莫斯科地区的工人还远没有发挥出彼得堡工人那样顽强的斗争性。在里夫兰省（里加城）的五万工人中罢工达二十五万人次，就是说，每个工人在1905年平均至少参加过五次罢工。目前全俄工厂工人、矿工和铁路工人起码有三百万，而且他们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如果各地的运动都象1905年的里加那样强大，那末，他们就能提供**一千五百万人次的罢工**大军。

任何沙皇政权也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击。但是，谁都知道，这样的攻击不能按社会主义者或先进工人的愿望来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这样的攻击只有在危机、风潮和革命普及全国的时候才能发生。要准备这种冲击，就必须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进行多年顽强的、广泛的、一贯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各种团体和组织。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超过了俄国人民中其余一切阶级。工人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富有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资本把大批工人集中到各大城市，使他们团结在一起，训练他们共同行动。工人随时随地都与他们的主要敌人资本家阶级发生直接冲突。在同这个敌人斗争过程中，工人就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觉悟到必须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必须彻底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工人一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会一往直前地奋勇斗争，反对横在他们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首先是反对沙皇政权和农奴主-地主。

农民在这次革命中也起来进行斗争，反对地主，反对政府，但是他们的斗争力量要弱得多。据统计，工厂工人参加过革命斗争即罢工运动的占大多数（约$^{3}/_{5}$），而农民参加过革命斗争的无疑只占少数：大概不超过$^{1}/_{5}$或$^{1}/_{4}$。农民斗争得不那样顽强，比较分散，

不那样自觉，往往仍然指望沙皇爷爷的好心肠。实际上，在1905—1906年间农民只不过把沙皇和地主恐吓了一下，其实用不着恐吓他们，应该**消灭**他们，把**他们的**政府——**沙皇**政府从根铲掉。现在，斯托雷平和黑帮地主杜马竭力把富裕农民培养成为新的地主式的独立农庄主，作为沙皇和黑帮的盟友。但是，沙皇和杜马越是帮助富裕农民掠夺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就会更加觉悟，而他们对沙皇的迷信，农奴制度下闭塞无知的奴隶的迷信，也就会保存得更少。农村中农业工人一年比一年增加，他们除了与城市工人结成联盟共同斗争以外找不到别的自救方法。农村中陷于破产、一贫如洗、忍饥挨饿的农民一年比一年增加，——当城市无产阶级发动起来时，他们中间就会有千百万人更坚决更一致地起来向沙皇和地主进行斗争。

自由资产阶级，即自由派地主、厂主、律师和教授等等，也参加过革命。他们成立了“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向人民大许其愿，高喊自由。他们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有大多数代表席位。他们约许“用和平手段”去争取自由，而责备工农的革命斗争。农民和许多农民代表（“劳动团分子”）相信了这种约许，驯服地跟着自由派走，而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采取回避态度。这是农民（和许多市民）在革命时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自由派用一只手偶而帮助一下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另一只手却始终援助沙皇，向沙皇保证要保持并巩固他的政权，使农民去与地主妥协，“安抚”“好闹事的”工人。

当革命进入同沙皇决战，进入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时候，自由派就全体一致地卑鄙地叛卖了人民自由事业，离开了斗争。沙皇专制政府利用自由派这种叛卖人民自由事业的行为，利用非常相信自由派的农民的无知，击溃了起义的工人。当无产阶级已被击溃的时候，任何杜马，立宪民主党的任何甜言蜜语，他们的任何

约许都阻止不住沙皇取消一切残存的自由权利，恢复专制和恢复农奴主-地主的专横势力了。

自由派受了骗。农民获得了沉痛然而有益的教训。当广大人民群众还相信自由派，还相信可能同沙皇政权讲"和平"，回避工人革命斗争的时候，在俄国决不会有自由的。当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斗争，推开那些动摇叛变的自由派，领导农业工人和破产农民前进的时候，世界上便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俄国自由的到来。

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奋起进行这种斗争，一定会重新来领导革命，俄国全部经济状况以及革命年代的全部经验就是保证。

五年前，无产阶级给了沙皇专制制度第一次打击。自由的曙光在俄国人民面前闪动了一下。现在，沙皇专制制度又恢复起来，农奴主又来宰制一切，工农群众依然处处遭受压迫，亚洲式的官吏专横和卑鄙地侮辱人民的现象依然到处可见。然而沉痛的教训不会不发生作用。俄国人民已经不是1905年以前那样的人民了。无产阶级已教会他们进行斗争。无产阶级一定会把他们引向胜利。

（选自《列宁全集》第16卷
第295—302页）

列　宁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

（发表于1911年2月8日〔21日〕）

1911年2月19日，俄国农奴制崩溃恰好满了五十个年头。到处都在准备纪念这个日子。沙皇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要教堂、学校、兵营、公开演讲会都宣扬纯粹黑帮派对所谓“解放”农民的观点。彼得堡急忙向全国分发通令，要求所有机关除了“民族俱乐部”即第三届杜马最反动政党之一出版的书刊外，不要订阅其他任何书刊在人民中间散发。有些地方，热心的省长已经在解散未经警察“领导方面”批准而成立的农民“改革”纪念日庆祝委员会（例如地方自治团体成立的），理由是这些委员会没有象黑帮政府要求的那样进行庆祝活动的决心。

政府甚感不安。它看到，尽管工人或农民备受压抑和恐吓，无知和愚昧，但是这些受到地主老爷们的杜马的压迫的人民，遭受农奴主地主以及他们的警察和官吏比以前还要厉害的蹂躏、暴力和压迫的人民，只要一想起五十年前农奴制就已宣告废除，就不能不有所感触，有所激动。

西欧各国农奴制的最后残余，在法国已为1789年的革命消灭，在其余的大部分国家则为1848年的革命消灭。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在1861年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当时的农民起义还是孤立的、分散的、自发的“骚动”，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了。废除农奴制的不是起

义的人民，而是政府，因为它在克里木战争失败以后，看到农奴制度根本不可能再保存下去了。

在俄国，“解放”农民的是地主自己，是专制沙皇的地主政府和它的官吏。这些“解放者”是这样安排的：农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从地主的奴隶地位转到替同样的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服役的地位。

高贵的地主老爷们“解放”俄国农民的结果，把五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土地割给了地主。农民为了赎买用自己的血汗灌溉过的土地，必须缴纳赎金，也就是向昨天的奴隶主缴纳贡款。农民向农奴主缴了几亿卢布的贡款，破产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地主不仅掠夺了农民的土地，把最坏的土地，有时甚至是根本不能耕种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而且往往安排一些圈套，给农民分的土地，不是没有牧场，就是没有草地，不是没有森林，就是没有牲畜饮水处。在俄国内地的大部分省份，农民在农奴制废除以后，还象从前一样，受着地主无止境的奴役。农民就是在解放以后，也仍然是“下贱的”等级，仍然是纳税的愚民、黑骨头①，仍然受着地主委派的地方官的嘲弄、敲诈、勒索、鞭笞、殴打和侮辱。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民象俄国这样，在“解放”之后还遭到这样的破产、贫困、欺侮和凌辱。

可是，农奴制的崩溃震动了全体人民，把他们从长期睡眠状态中唤醒过来，教会他们自己去找寻出路，去为争取完全自由而斗争。

在俄国，农奴制崩溃以后，城市的发展、工厂的增加、铁路的修建越来越快了。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替了。定居的、闭塞的、在自己农村生根的、相信神甫、害怕“地方官”的农奴制

① 在古代俄国，黑骨头指平民，白骨头指贵族。——译者注

的农民为新一代的农民代替了；这新一代农民常到城市去做零工，从流浪生活和雇佣劳动的痛苦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大城市的各种工厂的工人人数日益增加。工人渐渐联合起来，展开反对资本家和政府的共同斗争。俄国工人阶级在进行这种斗争的同时，也帮助千百万农民抬起头来，挺起胸膛，丢掉农奴的习气。

1861年，农民只能进行"骚动"。在1861年后的几十年期间，英勇地竭力唤起人民进行斗争的俄国革命者还是孤立的，被专制制度夺去了生命。直到1905年，经过长期的罢工斗争，经过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俄国工人阶级才成长壮大起来了。于是，它就领导全体人民，领导千百万农民**起来**进行**革命**。

1905年革命使沙皇专制制度动摇了。在俄国，这次革命第一次把对农奴制的压迫记忆犹新的农夫群众变成了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人民。1905年革命第一次向沙皇政府、俄国地主、俄国资产阶级表明，千百万人已经成了**公民，成了战士**，不再容许把他们当成愚民、黑骨头任意压榨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

1905年革命只是动摇而并没有消灭专制制度。现在，专制政体要向人民报复了。地主杜马的压迫和压制更加厉害。不满和气愤的情绪又在到处增长着。既然有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既然斗争已经开始，就会继续下去。既然有1905年革命，就会有新的第二次革命。纪念农奴制的崩溃会使人们想到并号召人们去进行新的第二次革命。

自由派抱怨说：我们需要"第二个2月19日"。不对。只有资产阶级的懦夫才这样说。1905年革命以后，不可能有第二个"二月十九日"。不可能"从上面解放"人民，因为人民已经学会了，并

且**现在正在学习**，从地主的第三届杜马当中学习如何从下面进行斗争。不可能“从上面解放”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尽管才领导了一次。

黑帮派了解这一点，所以很怕纪念1861年。沙皇黑帮派的忠实警犬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写道：“1861年**没有能够防止1905年**。”

黑帮杜马和沙皇政府迫害自己的敌人的猖狂暴行不会防止而只会加速新的革命的到来。1908—1910年的沉痛经验教育了人民如何进行新的斗争。继1910年夏季的工人罢工之后开始了冬季的学生罢课。新的斗争正在发展，发展速度可能比我们希望的要慢一些，但是，发展总是肯定的，必然的。

革命社会民主党清洗了背叛革命、背叛工人阶级的秘密党的不坚定分子，正在集中自己的队伍，团结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战斗。

（选自《列宁全集》第17卷
第70—73页）

列　宁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发表于1911年3月19日〔4月1日〕）

罗曼诺夫老爷们的王朝如此害怕的、俄国自由派如此温情地感叹的纪念日，已经庆祝过了。沙皇政府庆祝这个纪念日的办法是：加紧“向人民”推销“民族俱乐部”黑帮派的纪念小册子，加紧逮捕一切“嫌疑分子”，禁止那些可能发表即使有一点点类似民主主义的演说的集会，对报馆进行罚款和摧残，迫害“叛乱的”电影院等。

自由派庆祝这个纪念日的办法是：一再哭诉必须来一次“第二个2月19日”（见《欧洲通报》[295]），表白自己如何忠心耿耿（在《言论报》①最显著的地方刊登沙皇肖像），诉说自己的民忧、祖国“宪法”的不可靠、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摧毁了”“历来的土地原则”，等等。

尼古拉二世在给斯托雷平的诏书里说，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把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小撮恶霸、富农、富裕农民去任意掠夺，把农村交给农奴主地主去支配，恰恰就是1861年2月19日的“伟大改革”的完成。

应当承认，暴君尼古拉这个俄国的头号大地主，比我们那些好心肠的自由派要更接近历史的真理。这个头号大地主和农奴主头

---

① 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者注

子了解到，更确切些说，从贵族联合会的训谕中领会到这样一个阶级斗争的真理，即农奴主实行的“改革”，按其全部性质来说，不能不是农奴制的改革，并且随之而来的不能不是使用一切暴力的制度。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害怕群众的革命运动，而只有这种运动才能彻底消灭农奴主地主和他们在俄国的独裁统治；这种害怕心理妨碍他们了解这样一个真理，即只要农奴主没有被推翻，那任何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只能具有农奴制形式，带有农奴制性质和采用农奴制方法。害怕革命，幻想改革，而又抱怨“改革”实际上是由农奴主按照农奴制度的方式进行的，这是极端卑鄙愚蠢的表现。尼古拉二世的做法正确得多，教育俄国人民学乖也有效得多，他用实例“让”人民去选择：或者是农奴制的“改革”，或者是推翻农奴主的人民革命。

1861年2月19日的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我国的自由派所以能够把这个改革加以粉饰并描绘成“和平的”改革，只是因为当时的俄国革命运动弱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而在被压迫的群众中还根本没有革命的阶级。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296]也同1861年的改革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内容的农奴制改革，但是，自由派不能把它看成是“和平的”改革，不能随随便便地去粉饰它（虽然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在《俄国思想》杂志上），因为人们可以忘记1861年的单枪匹马的革命家，却不能忘记1905年的革命。1905年在俄罗斯诞生了一个善于把农民群众也发动起来进行革命运动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阶级一诞生，它就不可能被任何迫害镇压下去，它只能随着整个国家的灭亡而灭亡，它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死亡。

我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1861年农民改革的基本特点。臭名

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由于“解放”，黑土带各省农民的土地有$^{1}/_{6}$**以上**被割去了。有些省份的农民被割去和被夺去的土地达到$^{1}/_{3}$甚至$^{2}/_{5}$。由于“解放”，农民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形成了这样的划分：农民搬到“沙地”上去了，而地主的土地却象楔子一样插在农民的土地中，这样就可以使高贵的贵族们更容易奴役农民，用高利盘剥的价格把土地租给他们。由于“解放”，农民被迫“赎回”他们自己的土地，并被勒索了超过实际地价**一两倍**的价钱。总的说来，六十年代的整个“改革时代”使农民不得温饱，受人欺压，愚昧无知，无论在法院或管理机关，无论在学校或地方自治机关，农民都得听从地主农奴主的指使。

“伟大的改革”是农奴制的改革，而且也不可能是别的改革，因为它是由农奴主实行的。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搞改革呢？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易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中的经济形态。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解放以前，农民的“叛乱”每十年都要高涨一次，这使头号大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

“农民改革”是由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前进的一步。农民改革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土地被割去的**愈少**，农民的土地从地主的土地中分开来的**愈多**，农民交给农奴主的贡税（即“赎金”）数目**愈小**，各地农民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愈是不受**农奴主的影响和压迫，这种资产阶级的内容就表露得愈明显。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农奴主的统治，**他就在多大程度上**处于金钱的支配之下，处于商品生产的条件之下，处于对不断出现的资本的依赖地位。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

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

我们的自由派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史学家们百般吹嘘和粉饰过的臭名昭彰的农奴主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由于**让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斗争。自由派也同农奴主一样，站在承认地主所有制和地主政权的立场上，怀着愤怒的心情责难鼓吹**消灭**这种所有制、**完全推翻**这种政权的一切革命思想。

这些革命思想不会不在农奴的头脑中发酵。虽然若干世纪的奴隶制把农民群众压得这样厉害，使他们这样愚昧无知，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是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看出了臭名昭彰的“农民改革”的全部狭隘性，看出了它的贫乏的内容，看出了它的农奴制的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1861 年 2 月 19 日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六十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在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在 2 月 19 日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自觉的无产阶级必须尽量明确地了解到这两种倾向的本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自由派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不摧毁沙皇的君主制度，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权，只是唤醒他们向时代潮流“让步”。自由派过去是现在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不能容忍农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因此，自由派只限于“争取改革的斗争”，“争取权利的斗争”，也就是只限于如何在农奴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瓜分政权。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除了农奴主实行的改革外，**不会有**其他

任何“改革”，除了被农奴主的专横所限制的权利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粉饰、后来甚至加以歌颂的61年的“农民改革”，称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的性质，清楚地看到，那些自由派的解放老爷们把农民抢得精光。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六十年代的自由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297]，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革命面前战战兢兢、他们在统治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2月19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起来了，而且越来越清楚地、明确地、坚决地分开了。鼓吹满足于“文化”工作、规避革命的地下工作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起来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增长起来了，它们最初是混合在民意党人和革命民粹主义者的空想思想体系和书生气的斗争里的，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恐怖分子和单枪匹马的宣传者的革命斗争过渡到革命阶级本身的斗争而开始分道扬镳。

革命前的10个年头(从1895年到1904年)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公开行动起来，他们在不断成长，罢工斗争日益扩大，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鼓动、组织和党日益发展。特别是从1902年起，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农民也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开始了群众性的斗争。

61年刚刚出现并且在书刊中只是初具轮廓的两种倾向，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展和成长起来了，在群众运动中，在各个党派的种种不同场合的斗争中，在出版物中，在群众集会中，在工会、罢工、起义以及国家杜马中都表现出来了。

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建立了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们起初在一个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和睦相处（1905年夏季以前），后来就形成两个单独的政党，彼此激烈竞争起来（现在还在竞争），它们显出了自己的"面貌"，一个基本上是自由派的，另一个基本上是保皇派的，但是，它们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如责难革命者，咒骂十二月起义，把专制政体的遮羞布"宪法"当作一面旗帜来崇拜，却始终是一致的。这两个党始终站在"严格立宪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把自己限制在沙皇和农奴主黑帮派所能允许的活动范围内，黑帮派既不交出自己的政权，也不放弃自己的专制，既不牺牲自己"历代神圣的"奴隶占有制收入中的一个戈比，也不舍弃自己"理所应得"的权利中的丝毫特权。

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与自由主义的倾向不同，彼此界线分明。团结在自己的社会民主工党周围的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他们是同农民分别行动的。农民在革命中组织得非常差，他们的行动要涣散得多，脆弱得多，他们的觉悟更是低得多，并且对君主制度（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着的宪法）存在着幻想，这常常麻痹他们的精力，使他们去依赖自由派，有时去依赖黑帮分子，使他们不是去攻击贵族地主以彻底消灭这个阶级，而是对"上帝的土地"产生了空虚的幻想。但是总的说来，农民，作为群众，正是同地主作了斗争的，行动是革命的，并且在各届杜马中（甚至在代表资格被弄得有利于农奴主的第三届杜马中）组成了劳动团，劳动团虽然常常摇摆不定，但是他们代表真正的民主派。1905—1907年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

一方面是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倾向，另一方面是革命民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倾向。

1861年诞生了1905年。第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改革的农奴制性质使发展受到阻碍，使农民遭到无数极其恶劣的和痛苦的折磨，但是它不能改变发展的方向，不能防止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61年的改革开辟了一定的出路，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某些发展，因而延缓了结局的到来，但是不能消除1905年时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在群众对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专制制度的冲击中爆发的必然结局。农奴主在被压迫群众极不开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改革，在这些群众中的革命分子已经成熟的时候，就引起了革命。

第三届杜马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农奴主实行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改革。如果说，1861年2月19日是由纯粹的农奴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前进的第一步，那末，1908—1910年这个时期向我们表明，**在同一道路上**又走了更重要的一步。从颁布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起，几乎已经过去四年半了，从1907年6月3日起，也已经过去三年半多了，现在已经不只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连十月党资产阶级也确信6月3日的“宪法”和6月3日的土地政策是“失败”了。“最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久以前，人们这样公正地称呼半十月党人马克拉柯夫先生——有充分权利在2月25日国家杜马中既代表立宪民主党人又代表十月党人说：“现在，不满意的是那些最希望长期太平，害怕爆发新的革命浪潮的国家要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大家都说，——马克拉柯夫先生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仍旧沿着现在所走的那条道路前进，我们就会被导向第二次革命。”

1911年春天，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资产阶级的这一共同的看法，证实了我党在1908年12月代表会议决议中对当时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决议指出，“引起1905年革命的经济政治生活的基

本因素，现在继续起着作用，在这种经济政治状况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到来”。

不久以前，黑帮派沙皇政府御用的下流文人缅施科夫在“新时报”上宣称，2月19日的改革已经“悲惨地失败了”，因为“1861年没有能够防止1905年”。如今，自由资产阶级的御用辩护人和国会议员又宣布1906年11月9日①和1907年6月3日的“改革”失败了，因为这两个“改革”都在**导向**第二次革命。

这两个声明，如同1861—1905年间自由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一样，对于阐明改革同革命的关系、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资料。

革命的敌人，有的忿恨而咬牙切齿地承认，有的悲伤而垂头丧气地承认，1861年和1907—1910年的“改革”是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能够防止革命。社会民主党，当代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代表针对这种承认回答说：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和在一切社会危机中，**甚至在**这些危机只是直接导向不彻底的改革的**时候**，都起了极重要的历史作用。革命者是进行一切改造的社会力量的领袖；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看来，他们是完全失败了。事实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越明显地感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虚弱。

1905—1907年的革命阶级，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看来是全盘失败了。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保皇派或者是冒牌马克思主义者的取消派，都喋喋不休地叫喊说，无产阶级似乎走得“太远了”，“太过

① 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颁布土地法令，允许农民脱离村社，把土地变为私产，可以任意出卖。——编者注

火了”，说它醉心于“自发的阶级斗争”，被“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有害思想迷住了，等等。实际上，无产阶级的“过错”只在于它走得还不够远，但是，这个“过错”可以用它当时的力量来辩护，并且可以由它在最凶恶的反动时期不断进行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以及同一切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表现进行的坚忍不拔的斗争来补偿。事实上，凡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凡是作为战果而保持住的，夺得多少和保持住多少，完全要看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进行工作的一切场所如何有力和活跃而定。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才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民主主义，揭露自由主义的全部动摇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英勇地掀起武装起义。

谁也不能预言，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真正民主的改革可以实现到什么程度，但是，毫无疑问，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决定改革的程度和成就。软弱无力、没有气节、没有思想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只能在根据资产阶级精神实行的农奴制的“改革”同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总的回顾一下俄国最近半世纪来的历史，回顾一下 1861 年和 1905 年，我们就可以更加深信不疑地来重述我党决议所讲的这样一句话：“我们斗争的目的，依然是由无产阶级来推翻沙皇制度，夺取政权，即由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革命阶层，通过召开全民立宪会议和成立民主共和国的办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选自《列宁全集》第 17 卷
第 101—110 页）

列　宁

斯托雷平和革命

（发表于 1911 年 10 月 18 日〔31 日〕）

头号刽子手斯托雷平被刺的事件，正是在许多标志证明俄国反革命历史的第一阶段已经终结的时候发生的。因此，本身没有多大意义的 9 月 1 日事件，又把我国反革命的内容和意义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反动派奴颜婢膝地歌颂斯托雷平或考究统治俄国的黑帮党羽倾轧史的合唱声中，在自由派对“野蛮愚蠢的”刺杀举动表示遗憾的合唱声中（《生活事业》杂志中使用这种带引号的流行话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要归到自由派里去），可以听到一些真正有重要原则内容的调子。人们试图把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时代”当作一种完整东西来考察。

斯托雷平是 1906—1911 年将近五年的反革命政府的首脑。这是一个真正独特的、充满许多大可注意的事件的时期。从表面看来，可以把它称为准备和实行 1907 年 6 月 3 日政变的时期。这次政变的准备工作，正是 1906 年夏季，斯托雷平以内务大臣身分对第一届杜马发表演说时开始的。现在，这次政变已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它的一切后果来了。试问，这次政变的人物究竟是依靠了哪些社会力量，或者说，究竟是哪些力量指挥了这些人物？“六三”时期的社会经济内容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斯托雷平本人的“官运”，提供了大可参考的材料和有趣的例证。

1902年，在普列韦① 当权时代，一个地主兼贵族首领当了省长，——因残酷迫害和欺压农民（在萨拉托夫省）而为沙皇及其黑帮党羽"赏识"，——1905年，组织了黑帮匪徒和蹂躏暴行（巴拉朔夫城的蹂躏事件），——1906年，当了内务大臣，从第一届国家杜马被驱散起，当了内阁总理。简略说来，斯托雷平的政治履历就是如此。反革命政府首脑的这个履历，也是在我国实行了反革命统治的阶级的履历，斯托雷平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而已。这个阶级就是以第一号贵族、最大的地主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俄国贵族。这个阶级就是三万个农奴主-地主，他们拥有俄国欧洲部分七千万俄亩土地，即等于一千万农户拥有的全部土地。这个阶级的大地产，就是俄罗斯人历来居住的俄国中部盛行的各种形式各种名目（工役制、奴役制等）的农奴制剥削的基础。俄国农民"土地太少"（且用自由派和民粹派的通用说法），无非是这个阶级**土地太多的**反面。作为我国1905年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土地问题，实质就是让地主土地所有制保存下去，还是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争得多少象人过的生活条件，多少象欧洲那样的自由生活条件的问题。如果是前者，就**必然**使绝大多数的居民长期处于贫穷、困苦、饥饿、闭塞、被压迫的境地，如果是后者，那末非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同它紧密联系的地主君主制度，是**不能实现的**。

斯托雷平的政治履历，是沙皇专制制度下实际生活情况的确切反映和表现。在君主制度处在革命时代的情况下，斯托雷平不能不那样做。当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并根据1905年即杜马**以前**以及1906年杜马**存在时期**的经验证明，绝大多数居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势不两立，并力求消灭这个阶级的时候，君

① 沙皇政府的内务大臣。——编者注

主制度也**不能不**那样做。再没有比立宪民主党著作家所谓攻击君主制度是我国"知识分子"革命主义的表现的断言更肤浅更虚构的了。恰巧相反，客观情况正是：农民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必然提出了我国地主君主制度的存亡问题。沙皇君主制度**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斗争，**不得不**在全然衰朽的官僚制度以及由于军事失利和内部瓦解而削弱的军队之外，再寻找自卫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君主制度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居民中间的黑帮分子，组织蹂躏暴行。我国自由派说到蹂躏暴行时所表现的义愤，特别是他们一面对蹂躏暴行进行道义的谴责，一面又完全容许同蹂躏者进行谈判和订立协定，这就不能不给每个革命者一种极卑劣极胆怯的印象。君主制度不能不镇压革命，而半亚洲式的农奴制的**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君主制度又不能不用最龌龊、最可恶、最下流、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因此，每个社会主义者，每个民主主义者反对蹂躏暴行的唯一适当、唯一合理的手段，就不是进行道义的谴责，而是从各方面全力促进革命，组织革命来**推翻**这个君主制度。

蹂躏者斯托雷平博得内阁职位，正是用了沙皇省长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压榨农民，组织蹂躏暴行，巧妙地用"欧洲式"的外衣、词句、姿态和手势来掩盖这种亚洲式的"行径"。

我国那些对蹂躏暴行进行道义的谴责的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同蹂躏者进行谈判，不但承认他们有存在权，而且承认他们在建立新俄国和管理新俄国方面有领导权！斯托雷平的被刺引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揭露材料和供词。例如，请看维特和古契柯夫① 叙述维特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同"社会活动家"（应读作：温和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谈判组阁问题的书信。参

① 反革命十月党的头子。——编者注

加同维特谈判的有希波夫、特鲁别茨科伊、乌鲁索夫、米·斯塔霍维奇，也就是**既有**立宪民主党未来的活动家，**也有**"和平革新"党未来的活动家，**还有**十月党未来的活动家。这次谈判看来持续很久，因为古契柯夫在信里说到"谈判久延未果，令人困惫不堪"。谈判破裂原来是杜尔诺沃的问题引起的："自由派"不同意杜尔诺沃当内务大臣，而维特却坚决要他当。当时，第一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头子乌鲁索夫，"极力主张提名杜尔诺沃"。当奥波连斯基侯爵提名斯托雷平时，"有的赞成，有的说不认识"。古契柯夫写道："我确实记得很清楚，**谁也没有**象维特伯爵写的那样表示过反对。"

现在，立宪民主党报纸想强调自己的"民主精神"（别笑！），也许特别是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在彼得堡第一选民团选举时同十月党人有过斗争，企图借当时的谈判来把古契柯夫攻击一下。9月28日《言论报》写道："古契柯夫指挥的十月党人先生，往往为了讨好当局而和杜尔诺沃先生一伙同流合污！他们往往面向当局，背朝社会舆论！"同一天的《俄罗斯新闻》的社论，也是用不同的调子重复立宪民主党人对十月党人的这种责备。

然而，请问立宪民主党人先生，既然**你们的**人都参加这次谈判，甚至支持过杜尔诺沃，**你们**还有什么权利责备十月党人呢？难道在1905年11月**全体**立宪民主党人不都象乌鲁索夫一样"面向当局"，"背朝社会舆论"的吗？夫妇吵架，不过是开开心；不是什么原则斗争，而是一些同样无原则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这就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借1905年底的"谈判"来非难十月党人**必须**作出的估计。这种无聊的争吵，只会模糊历史上无可争论的真正重要的事实：从我国革命真正具有人民性，也就是革命按积极参加者成分来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时候起，自由资产阶级的**一切**派别，从十月党人到立宪民主党人，一直都是"**面向当局**"，"背"朝**民主运动的**。俄国反革命的斯托雷平时代的特点，也就在于自由资

产阶级背叛了民主运动，因此，斯托雷平能够向这个资产阶级的这个代表人物或那个代表人物请求援助，请求同情和征求意见。否则，斯托雷平就不能在充满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自己的协助、同情、积极或消极的支持下，实现贵族联合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领导了。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我国自由派的报刊，以及象《生活事业》杂志这种主张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刊物，正是忽略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一点。斯托雷平——不仅是农奴主-地主专政的代表人物；单单这样估计，就是根本不了解"斯托雷平时代"的特点和意义。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这个时代，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充满了反革命情绪，农奴主可以依靠并且确实依靠了这种情绪，可以向这个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求婚"，并且确实"求了婚"，甚至可以把其中最"左的"领袖也当作"陛下反对派"，可以依靠并且确实依靠了自由派思想上的领袖的转变，即转向他们，转向反动派，转向反对民主派和唾弃民主派。斯托雷平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臣，在这个时代，农奴主-地主在农民土地生活方面，竭力以加速度来实行资产阶级的政策，抛弃了指靠农民"宗法心理"的一切浪漫主义幻想和期望，而从俄国一般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俄国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斯托雷平企图把新酒装进旧瓶，把旧的专制制度改造为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度，因此，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也就是沙皇制度在最后这条路上，在沙皇制度最后能走的这条路上的破产。亚历山大三世的地主君主制度企图依靠"宗法性的"农村和一般俄国生活中的"宗法性"；这个政策被革命彻底粉碎了。革命后，尼古拉二世的地主君主制度企图依靠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和地主自己实行的资产阶级土地政策；这些企图的失败，现在连立宪民主党人，连十月党人也深信不疑，这些企图的失败是沙皇

制度**最后能够采取的**政策的失败。

斯托雷平时代农奴主-地主专政的对象，并不是包括整个“第三等级”即全体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不，这个专政是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下实行的，这些条件是：十月党的资产阶级甘心情愿替它服务；地主和资产阶级拥有保证他们的联盟占多数，并使他们能正式同皇帝谈判协商的代议机关；司徒卢威和其他路标派狂热地诬蔑革命而创立了一种博得安东尼·沃伦斯基欢心的思想；米留可夫先生宣布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陛下的反对派”（农奴主遗孽陛下的反对派）。虽然有这些更便利罗曼诺夫老爷们的条件，虽然这些条件从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俄国社会力量对比的观点看来，真是绝无仅有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斯托雷平的政策还是破产了；斯托雷平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新的掘墓人（确切些说，是积蓄新的力量的掘墓人）叩门时被刺的。

*　　*　　*

斯托雷平对资产阶级领袖的态度以及后者对斯托雷平的态度，在第一届杜马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言论报》写道，“1906年5—7月的时期，是斯托雷平官运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心是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说：“这一时期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

真是难能可贵的自供！当时，我们为了可否把“杜马中的发言”作为那个时代的“重心”的问题，同立宪民主党人不知有过多少争论！当时，立宪民主党的报纸对1906年春夏说那个时代的重心不是杜马中的发言的社会民主党人，不知进行过多少气愤的谩骂，给过多少高傲的学究般的教训！当时，《言论报》和《杜马报》对于全俄“社会”因幻想“国民公会”而对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的“议会”舞台上获得的胜利不够欢欣鼓舞，不知进行了多少责难！

过了五年，到了必须对第一届杜马时期作个总的估计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却象换付手套那样轻易地宣称："当时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

先生们，当然不是呵！那末重心究竟在哪里呢？

《言论报》写道："……两派代表暗地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一派主张去同人民代表机关求得妥协，就是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也在所不惜。另一派则要求采取激烈步骤，解散国家杜马，修改选举法。势力强大的贵族联合会就实行了这个纲领…… 斯托雷平曾动摇过一个时候。有消息说，他曾两次通过克雷日阿诺夫斯基建议穆罗姆策夫① 讨论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由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的可能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斯托雷平分明是同贵族联合会有来往的。"

学识深湛、广闻博见的自由派领袖先生们，就是这样写历史的！原来，"重心"**不**是发言，**而**是黑帮沙皇党羽内部两派之间的斗争！毫不迟延，立刻实行"攻击"政策的是贵族联合会，——就是说，不是个别人，不是尼古拉·罗曼诺夫，不是"**上层**"中的"一派"，而是**一定的阶级**。**从右边来的**对手，立宪民主党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他们**左边的**一切，立宪民主党人却没有看到。创造历史的是"上层"，贵族联合会和立宪民主党，而庶民**当然**没有参加创造历史！当时，同一定阶级（贵族）对立的是超阶级的"人民自由"党，上层（即皇帝爷爷）则动摇不定。

但是，还能有比这更加自私自利的阶级盲目病吗？比这更严重地歪曲历史和忘记历史科学基本原理的吗？比这更突出地把阶级、党和个人混淆起来的可怜的糊涂观念吗？

不愿看见民主运动和民主力量的人，比瞎子还要瞎。

---

① 立宪民主党的重要头目。——编者注

第一届杜马时代的重心，**当然**不是杜马中的发言，而是杜马外的阶级斗争，农奴主-地主及**其**君主制度同人民群众即工农群众之间的斗争。群众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重新高涨起来：1906年春夏，一般罢工、政治罢工、农民骚动以及军队暴动风起云涌。**正因为如此**——请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先生们注意——"上层"才动摇不定：沙皇党羽内部各派的争执在于，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可以**立刻**举行政变呢，还是再**等待一下**，再把资产阶级愚弄一下。

第一届杜马，已使地主（罗曼诺夫、斯托雷平之流）深深认识到，他们不能同农民群众、工人们和平相处。而他们这种认识是与客观现实一致的。当时，还有一个次要问题需要解决：究竟什么时候，究竟怎样，是一下子还是逐渐来修改选举法。资产阶级动摇不定，但它的一切行为，包括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行为在内，都表明它害怕革命比害怕反动派要超过百倍。所以地主也就情愿拉拢资产阶级的领袖（穆罗姆策夫、葛伊甸、古契柯夫之流）来磋商可否**共同**组阁的问题。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都去同沙皇，同蹂躏者，同黑帮领袖们商量反对革命的手段问题。但是，资产阶级从1905年底起，从来没有派过一个党去同革命的领袖们商量**如何**推翻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问题。

这就是俄国历史上"斯托雷平"时代的基本教训。当革命势力强大的时候，沙皇政府就拉拢资产阶级来磋商问题；当革命不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时候，沙皇政府就用兵士的靴尖把资产阶级**一切**领袖踢开：先踢穆罗姆策夫和米留可夫，再踢葛伊甸和李沃夫，最后踢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李沃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的区别，根本不是本质的，这不过是这些资产阶级领袖都把自己的脸颊凑近罗曼诺夫—普利什凯维奇—斯托雷平去求得……"一吻"，而博得了这样……"一吻"的先后次序的问题。

斯托雷平恰巧是在黑帮君主制度已经把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情绪中一切有利于它的东西尽量利用完了的时候下台的。现在，这个资产阶级已被遗弃，已遭唾弃，已因背叛民主派、背叛群众斗争、背叛革命而弄得身败名裂，它一看见革命新高潮起来的征候，就张惶失措，无所适从。斯托雷平给俄国人民一个很好的教训：或者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推翻沙皇君主制度而求得自由，或者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之流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下，去受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和托尔马切夫之流奴役。

（选自《列宁全集》第17卷
第230—238页）

列　宁

饥　　饿

（发表于1912年3月17日〔30日〕）

还是同1905年以前的旧俄国一样，饥饿又来临了。歉收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但是只有俄国的歉收才会引起极大的灾难，使千百万农民没有饭吃。而目前的灾难，甚至政府和地主的拥护者都不得不承认，在规模上超过了1891年。

有三千万居民受到最严重的灾难。农民贱价出卖份地、牲口以及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贩卖女孩——又回到万恶的奴隶制时代了。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马上暴露了我国整个所谓"文明的"社会制度的真正实质：这个制度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用另一种外壳包着，处在另一种"文化水平"上的旧的奴隶制度，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一万个"上层人士"的财富、奢侈生活、寄生生活而劳动的奴隶制度。现在，有奴隶向来要进行的苦役劳动，有富人全然无视奴隶的命运的情形。在从前，老爷们直接饿死奴隶，明目张胆地把女人抢来作小老婆，毫无顾忌地拷打奴隶。而现在，富人用文明的种种巧计、成就和进步来掠夺农民，农民被饿得全身发肿，他们没有面包，吃野草，吃泥块，害坏血病，活活被折磨死。而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地主和资本家却捞到了千千万万的金钱，两个首都的娱乐场老板说，他们好久没有这么好的生意了。在大都市的陈列橱中，好久没有象现在这样可耻地肆无忌惮地陈列奢侈品了。

为什么在俄国，也只有在俄国，还有这种中世纪的饥饿同最新

的文明进步同时并存呢？这是因为新的吸血鬼——资本向俄国农民逼来的时候，农民的手脚还被农奴主地主束缚着，被农奴主的、地主的、沙皇的专制制度束缚着。农民受到地主的掠夺，暴吏的专横迫害，被警察的禁令、无理刁难、暴力层层包围着，受到最近实行的警长以及神甫、地方官的警戒的束缚，他们也象非洲的土人那样没有力量反抗自然灾害和资本。现在只有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才会看到象二十世纪的俄国发生的那种普遍的饿死人的事情。

但是，在沙皇政府发表了大肆吹嘘新土地规划的好处、独立田庄经济的进步性等等的言论之后，现代的俄国发生的饥饿决不会不**教会**农民许多东西。饥饿会葬送千百万条生命，但也会葬送阻碍人们了解反对沙皇君主制，反对地主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那种愚昧野蛮的、奴隶式的对沙皇的迷信。农民只有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才能找到出路。只有推翻沙皇君主制这个地主的支柱，才是走向稍微象人的生活、摆脱饥饿和无望的贫困的出路。

讲明这一点，是每一个觉悟工人的责任，是每一个觉悟农民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与饥饿有关的首要任务。任何地方只要做得到，就向工人募捐救济饥饿的农民，并且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把这笔钱送出去，——这当然也是必须做的事情。

（选自《列宁全集》第17卷
第497—498页）

列　宁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发表于1912年5月6日）

三千万农民的饥荒，把俄国农民状况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通常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人们往往忽略了主要的东西，即大地主（主要是贵族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同农民状况的对比关系。我们现在想请读者注意的正是这个主要的东西。

1907年内务部公布了《1905年土地占有统计》。根据这个无论怎样也不会被认为是偏袒农民的官方材料，可以相当确切地了解到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府的统计确定欧俄五十个省的土地共有三亿九千五百万俄亩。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真实的情况，因为其中包括极北部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奥洛涅茨省及沃洛果达省的一亿俄亩以上的官地在内。这些土地大部分不适于农业；这些都是极北部地区的苔原和森林地带。通常把这些土地计算在内，只是为了**掩盖**适于农业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情况。

减去这部分土地后，可耕地总数为两亿八千万俄亩（按整数计算）。其中私有地占一亿零一百万俄亩，份地占一亿三千九百万俄亩。应该把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分开。

关于大地产，政府统计作了如下的报道：

欧俄个人私有的地产

占有面积	占有者	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个占有者的平均占有数（单位俄亩）
500— 2 000俄亩	21 748	20 590 708	947
2 000—10 000俄亩	5 386	20 602 109	3 825
10 000俄亩以上	699	20 798 504	29 754
总　计	27 833	61 991 321	2 227

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因为其中既不包括皇室土地，也不包括大商业公司等等的土地。但是，我们从这些材料中仍然能够知道俄国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情况**。**七百个**地主拥有土地**两千一百**万俄亩，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地主**平均有**三万俄亩**。

不到两万八千个地主，却拥有土地**六千二百**万俄亩，也就是说，**每个地主**平均拥有**两千二百俄亩**。这里必须加上皇室土地——共计**五百**万俄亩以上。其次，**三百五十**多万俄亩土地属于二百七十二个"工商业、工厂及其他"团体。这无疑是大地产，——其主要部分集中在皮尔姆省；在这里，**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俄亩土地（确数是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九百零二俄亩）属于**九个**这样的团体。

因此，总计起来，属于最大地主的土地决不会少于**七千万俄亩**，而一定会多于**七千万**俄亩。这种大地主，为数不到**三万**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根据政府的统计材料，份地最少的农民拥有份地的情况如下：

份　地

份地面积	农　户	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个农户的平均占有数（单位俄亩）
5 俄亩以下……	2 857 650	9 030 333	3.1
5— 8 俄亩……	3 317 601	21 706 550	6.5
8—15 俄亩……	3 932 485	42 182 923	10.7
总　计……	10 107 736	72 919 806	7.0

可见，**一千万**农户（在将近一千三百万农户总数中）只有**七千三百万俄亩土地**。平均每户七俄亩。这里应当加上小的私有地产：十俄亩以下的土地占有者为四十万九千八百六十四户，他们共有土地一百六十二万五千二百二十六俄亩，每户不到四俄亩。因此，**将近一千零五十万**农户只有土地**七千五百万**俄亩。

现在我们可以把在讨论农民问题时常常被忘记或了解得不正确的这些基本材料综合起来：

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是：**三万个**地主拥有七千万俄亩土地。

小农的土地占有情况是：**一千零五十万户**小农拥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

当然，这是总的材料。为了更详细地研究农民的状况和大地产的意义，应该收集不同的地区的材料，有时甚至要收集个别省份的材料。然而，无论政府的或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甚至一部分民粹派的经济学家，往往总是拿个别地区或问题的个别方面来**掩盖**土地问题的**实质**。为了弄清楚土地问题和农民状况问题的**根本意义**，就不应该忽视上述基本材料，也不容许以局部的东西来掩盖基本的东西。

我们将在下面一篇文章① 里援引一些这种掩盖问题实质的实例。现在我们可以作出第一个基本结论。欧俄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拥有五百俄亩土地以上的最大地主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而他们的人数却不到三万人。

绝大多数农民，即一千三百万农户总数中的一千零五十万户，一共只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

每个最大地主的地产平均为**二千二百俄亩**。每户小农的土地平均为七俄亩。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62页。——编者注

如果三万个最大地主的土地转到一千万农户手中，那末这些农户的土地就几乎可以增加一倍。

这种土地分配情况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形成怎样的经济关系，我们下次再谈。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17—20页）

列　宁

最后一个汽门

（发表于1912年8月5日）

我们前面一篇论述俄国目前土地问题的文章（见《涅瓦明星报》第15号），最后是这样几句话：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一个实际共同的地方，就是两个纲领都要从根本上破坏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贵。这种土地占有制也只有破坏，没有别的办法。《言论报》和《俄罗斯新闻》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也就表现在，他们不去证明必须更彻底更坚决地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而斥责斯托雷平不该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我们将从下面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破坏**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破坏却**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暂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破坏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的后果就是三千万人挨饿。斯托雷平的破坏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破坏，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破坏正在这样教导，却是没有疑问的。能不能教会呢，——过一个时期便见分晓。”①

这样，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斯托雷平的破坏中世纪土地占有制**不能**消灭奴役制和工役制，而农民劳动派或民粹

①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7页。——编者注

派的破坏却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以前，首先要指出，对这个问题的最流行的论断，也就是自由派、民粹派的论断，有一部分是修正主义者（巴·马斯洛夫）的论断，其中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抽象提出问题，忽视具体的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历史“更替”。在俄国，正在发生一种西方一些先进国家早已发生过的更替，就是农奴制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

现在谈的是而且也只能是**这种**更替的形式、条件、速度和环境；**其他**一切往往放在首要地位的考虑，只是**无意识地**围绕着问题的本质，也就是围绕着这种更替提出来的。

目前俄国农业中主要的农奴制形式是奴役制和工役制。自然经济还比较大量地保存着，就是说，在一小块贫瘠土地上，用陈旧的非常简陋的工具和生产方法从事经营的不能糊口的小农，还存在着，他们在经济上从属于邻近大片土地占有者，后者不仅把他们当雇工（这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初期），并且当小农（这是徭役制的继续）剥削，——这就是产生奴役制和工役制的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形成这两种制度的特征的条件。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最大的地主和最贫困的农户是三万与一千万之比。平均起来大致是一个有两千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就有将近三百个农户为他做工，这些农户每户大约只有七俄亩贫瘠的坏地，使用的是极落后的原始的（这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更不用说从美国的角度看了）农具。

一部分富裕农民“出人头地”，成了小资产阶级，靠雇佣劳动来耕种土地。地主的一些土地和一些农活也使用这种劳动，这种地主往往昨天还是贵族农奴主或是他们的儿子。

但是，除了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欧洲部分的所有主要省份，还有把这种资本主义关系挤到次要地位的农民使用自己的农

具为地主耕种土地的制度，即昨天的徭役制的继续——工役制，还有“利用”小农（只因为是农民，是小业主）走投无路的贫困状况，叫他们为邻近地主“经济”“服役”的制度，即**奴役制**。什么贷款代工，贷放粮食，冬时雇工，出租土地，允许使用道路、水饲场、采草场、放牧场、森林，贷放农具，如此等等，就是目前奴役制的无穷无尽的形式。

事情有时竟荒谬到这样的地步：农民要把自己的肥料上到主人的地上去，“主妇”还要奉送鸡蛋，——而且这不是发生在公元十八世纪，而是发生在公元二十世纪！

只要把目前俄国农业中的这种中世纪和农奴制的残余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就可以看出斯托雷平“改革”的意义。这种“改革”当然是延缓了农奴制的破坏，正象臭名远扬的，自由派和民粹派大加赞扬的1861年的所谓“农民”（实际上是**地主的**）改革延缓了徭役制的破坏，用另一种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一直到1905年一样。

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缓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就表现在又打开了一个汽门，并且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门。打开了汽门，放出了一些气，就是说，一部分横遭破产的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出卖了这些份地，从有份地的无产者变成纯粹的无产者；其次，一部分富裕农民巩固了自己份地的私有权，有的还经营起独立田庄，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最后，打开了汽门，放出了气，还表现在，有些地方消灭了特别难以容忍的土地零散现象，便于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产生的农民土地的转移。

但是，这种延缓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村的矛盾？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农奴制的大片领地占有制的压迫？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气”的数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一个答案。

三千万人挨饿实际上就证明了，在目前只能是后一个答案。这是小业主挨饿。这仍然是那种旧的、奴役制的、贫困的和受尽农奴制的大片领地占有制的压榨的农民经济发生的危机的图画。在欧洲，在有大片非农奴制的领地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大片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多人挨饿。

除了完全失去自己土地的无产者（他们“巩固”土地私有权是为了把土地卖掉）和极少数富裕农民以外，许多农民都还处于过去的或者甚至更坏的状况。任何巩固土地私有制的办法，任何消灭土地零散现象的措施，都不会使人数众多的贫困农民，使这些守着贫瘠的坏地，使用祖传的已经破烂不堪的农具，养着没有草料的耕畜和牛羊的农民，变成有点文化的有点家业的业主。

对有两千俄亩土地的地主（马尔柯夫或普利什凯维奇这一类型的）周围的有七俄亩小块土地的农民，无论是把他们分散各处，把他们从村社解放出来，还是“巩固”他们少得可怜的土地的私有权，他们都仍然是受奴役的贫民。

斯托雷平的改革既不会消除对众多的农民的奴役制和工役制，也不会消除他们的饥饿。再有几十年这样的周期性的饥饿，目前大量的农户就会彻底破产，这样，斯托雷平的改革就会“胜利”，就是说，我国农村就会建立起已经确立的一般欧洲式的资产阶级制度。可是，在目前，在斯托雷平的“改革”经过了六年的试验，“巩固土地私有权”的人数六年来已有“辉煌”增长以后，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种改革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危机。

对目前以至于最近将来的俄国来说，无需争辩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保留许多农奴制残余的经济的旧的危机，即贫困的、受着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一类的大片领地占有者奴役的小农业的旧的危机。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由三千万人挨饿的事实鲜明证实了的危

机，尽管斯托雷平打开了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手里唯一的最后一个汽门。他们(和他们一道的还有贵族联合会)除了想由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自己来推行资产阶级政策以外，也想不出① 别的办法，或者一时还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保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土地和权力。

目前俄国农村的矛盾归结起来就是：过去的农奴主在完全保持他们的土地和权力的条件下，推行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在土地问题上，这也是"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的一步"②。

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还保持自己的专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处境的旧制度自己走的。这是旧制度能走的唯一的最后一步。这是最后一个汽门。统治资产阶级国家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再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别的汽门了。

正因为向新制度的这一步，是还保持自己的专权的旧制度自己走的，这一步就不可能有而且的确没有什么牢固的结果。相反地，正象目前一切迹象向我们清楚表明的，这一步使旧的危机在俄国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更加加深。

旧的危机在新的环境下，在阶级关系更要明确得多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式加深起来；虽然它在加深，但它的社会经济性质（不仅是经济性质）实际上仍和从前一样。

农村资产阶级经营着极少数优越的独立田庄；与此同时，有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减少，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还保持着自己的专权，大批受奴役的中农横遭破产，活活饿死，失去份地的无产者日益增加，——这就是今天俄国农村的图画。

---

① 当然，应当理解"想出"一词的"实质"：统治阶级的"妄想"是受全世界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限制和制约的。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的目前阶级力量对比情况下，贵族联合会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力，也不会有别的办法。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22页。——编者注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不会消除奴役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指这个词的历史和阶级的意义）的土地纲领却会做到这一点，难道还要证明吗？目前的农村情况使人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土地完全自由转移的条件下，优越的独立田庄一定会立即消除所有中世纪的饥饿现象，消除各式各样的奴役制和工役制，如果这些田庄根据农民的自由选择建立在所有目前还不包括在“土地规划”以内的七千万俄亩的地主土地上的话，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斯托雷平之流的土地措施只适用于“劳动派的”俄国，历史的讽刺难道不是要我们这样说的吗？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239—244页）

列　宁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

（发表于 1912 年 10 月 21 日）

全欧洲的资产阶级报刊，从反动的自私自利的目的出发，主张在巴尔干维持臭名远扬的 status quo（原来的不变的状况），可是现在就连它们也一致承认，世界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章。

土耳其的溃败是毫无疑问的。结成四国同盟的巴尔干国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希腊）的胜利是巨大的。这四个国家结成同盟已成事实。“巴尔干属于巴尔干人民”——这一口号**已经**实现。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在东欧（奥地利、巴尔干、俄国），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成长的顽强的中世纪残余至今还未消灭。这些残余就是专制制度（极权的专制政权）、封建制度（农奴主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特权）和民族压迫。

巴尔干各国的觉悟工人首先提出了用彻底民主的办法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①。现在巴尔干各国的民主阶级软弱无力（无产阶级的人数少，农民闭塞、分散、没有文化），使得经济上和政治上必然的联盟变成了巴尔干君主国的联盟。

① 二十世纪初，列宁为巴尔干人民制定了一条彻底解放的路线。指出巴尔干人民应当通过建立巴尔干各民族国家联盟来推翻封建地主的压迫。——编者注

巴尔干民族问题的解决有了重大的进展。在整个东欧，现在**只有一个俄国**是最落后的国家了。

尽管在巴尔干建立的是君主国的联盟，而不是共和国的联盟，尽管这个联盟的形成是由于战争，而不是由于革命，——尽管如此，在摧毁整个东欧的中世纪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民族主义者先生们，你们不要高兴太早！这一步是**反对**你们的，因为俄国的中世纪残余**最多**！

而在西欧，无产阶级更加有力地宣布了这样的口号：反对任何干涉！巴尔干属于巴尔干人民！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363—364页）

列　宁

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摘录）

（1912年11月）

……关于巴尔干战争、国际形势和俄国的对外政策。

这个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决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题目包括下列几个问题：

（一）巴尔干战争。俄国工人代表也应该宣布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反对斯拉夫人同土耳其人互相仇视。**争取**巴尔干**一切**民族的自由和平等。

（二）反对其他强国干涉巴尔干战争。必须响应巴塞尔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298]召开时举行的那种维护和平的游行示威。以战争对付战争！反对一切干涉！保卫和平！这就是工人的口号。

（三）反对俄国政府的整个对外政策，要特别提到渴望侵占（并且已经开始侵占）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波斯、蒙古的“野心”。

（四）反对政府的民族主义，同时指出芬兰、波兰、乌克兰、犹太等是被压迫民族。为了抵制一切不彻底的提法（例如**单单**提出“平等”），确切地说明一切民族的**政治自决**的口号是极端重要的。

（五）反对自由派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不那么粗暴，但是由于它的虚伪、由于它对人民进行“巧妙的”欺骗而特别有害。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种自由派（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的**）民族主义

的表现呢？从关于“斯拉夫人”的任务的沙文主义言论，从关于俄国的“大国任务”的言论，从主张俄国为了掠夺其他国家而同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的言论可以看出来。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411—412页）

列　宁

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

（1912 年 11 月中）

社会民主党党团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的讲坛上发言时，要声明自己的活动同历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有不可割裂的继承联系，特别是同受到反革命史无前例的政治报复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活动有不可割裂的继承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伟大的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解放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现在，这支解放大军在全世界特别迅速地发展着；生活费用普遍高涨，联合成同盟、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的资本的压迫和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使工人群众的处境愈来愈难以忍受，使资本同劳动的斗争愈来愈尖锐；资本主义的末日快要来到了，千百万团结一致的无产者不久就会建立一种不再有群众的贫困、不再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社会制度。

社会民主党党团要响应在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战争的全世界工人的呼声。工人要求和平。工人反对任何干涉巴尔干事件的行动。只有巴尔干各国人民得到充分的自由和完全的独立，只有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才能够保证通过最好的办法来摆脱现在的危机，以及通过承认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和有政治自决的绝对权利的办法来真正解决民族问题。

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反对俄国政府的对外政

策。它痛斥我们国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波斯、中国强占别人的土地来扩张领土的企图，痛斥强占蒙古这种破坏我国同伟大的兄弟之邦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的行为。

一切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论是镇压和摧残芬兰、波兰、乌克兰、犹太和一切非大俄罗斯民族的粗暴野蛮的政府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准备替俄国的大国任务和俄国同其他大国缔结的掠夺他人土地的协议加以解释的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地掩饰起来的精致的民族主义，都会受到社会民主党党团无情的反对。

统治阶级拚命用民族主义的叫嚣吸引人民的注意力，使人民不再注意不堪忍受的俄国内部状况，这是枉费心机。第四届杜马选举的空前舞弊，很象冒险主义者拿破仑第三的拿破仑主义手法，它千百次表明了政府没有居民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可以依靠了。政府就连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也不能保持了，而 1907 年 6 月 3 日正是为了这个联盟才实行政变的。杜马在全国向左转的时候向右转了。

整个俄国在无法无天、专横暴虐的压迫下呻吟。整个文明世界听到专门折磨我国优秀人物的库托马尔、阿尔加契等监狱中拷问和虐待政治犯的情形都感到无比愤怒。俄国正象人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政治自由。没有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俄国就不能生存和发展，首先和特别需要这些自由的是无产阶级，因为俄国无权的生活束缚住它的手脚，使它不能进行它必需的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和改善生活的斗争。特别是资本的压迫、生活费用的高涨、城市中的失业和农村的贫困，使工人必须联合成工会并且进行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而没有政治自由，就会使工人处于奴隶或农奴的地位。工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将不惜任何牺牲，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根本改变俄国生活的一切政治条件，只有充分保证政治自由的基础，才能保障工人的反对资本的自由。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和有将近一百万工人参加的1912年群众性的工人政治罢工表明，工人重新领导整个民主派争取自由的日子就要到来。三个阵营在选举斗争中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执政的反革命阵营十分软弱无力，甚至在按六三法令进行的选举中也要舞弊，强迫受压制的农村神甫昧着良心，违背信仰地投票。自由派阵营愈来愈从民主派转向大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在里加、叶加特林诺达尔、科斯特罗马和彼得堡的第一选民团中同黑帮结成联盟反对社会民主党，证明了自己的反革命性。自由派想在保存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经过强大的人民运动就实行立宪改革，这种空想在民主派中间愈来愈失去基础。自由派的口号是："用不着第二次革命，需要的只是立宪工作。"而工人阶级认识到这种口号的虚假性，把整个民主派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选举中进行了自己的斗争。

大家知道，甚至官方报刊也说，工人阶级是在下面三个口号下参加选举运动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交还农民。

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确信，这三个要求是实现一切民主主义者都同意的普选权，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由人民选举法官和官吏，取消常备军和设立民警制，教会同国家分立和学校同教会分立等等要求所必需的基础。

在俄国，农民群众的处境愈来愈使人难以忍受。政府的所谓"土地规划"只有使大多数人的处境更加恶化，使农村破产，使去年的饥民达到三千万人，使整个农业得不到任何稳定的改善。表面上的财政稳定是靠强征赋税、鼓励人民酗酒来维持的，政府则依靠一笔又一笔的借款推迟自己的破产。甚至第三届杜马的四十三个右派农民的温和的土地草案也被束之高阁。难怪全部优秀农民愈来愈注视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人民在争取自由斗争中的唯一领

袖。难怪整个民主派从同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密切联系着的1912年的政治罢工中，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看到了新的、更强大的解放运动的曙光。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将捍卫这个运动的利益和需要。它认为自己没有权利隐瞒俄国一切有觉悟的工人想到的和感觉到的东西，不对第四届杜马的多数讲出来。有觉悟的工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忠实于社会主义。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忠实于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原则。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为了这些原则而忠实于自己的共和制的信念。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415—418页）

列　宁

民族问题提纲

（1913 年 6 月）

1. 对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而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

2. 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这一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绝对**必要的：

（一）是为了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则；

（二）是由于在俄国境内，**尤其是在它的边疆**有许多民族，这些民族在经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条件差别很大，而且这些民族（除大俄罗斯人以外，也同俄国其他各民族一样）都受着沙皇君主政体的难以置信的压迫；

（三）最后，是由于在整个东欧（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和亚洲，也就是说，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对国家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造不是还没有完结，就是刚刚开始。而这一改造在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都导向独立民族国家或其民族成分极其相近和互有血统关系的国家的建立；

（四）俄国在今天跟它周围的**一切国家**——从西方的奥地利（该国从 1867 年起，政治自由和立宪制度的基础即已巩固，而现在又在实行普选法）起，到东方的中华民国止——比较起来，是一个国家制度最落后最反动的国家。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

自己的整个宣传工作当中，坚持一切民族都有成立单独国家或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参加的国家的权利。

3. 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这就要求社会民主党人使一切民族：

（一）要无条件地反对统治民族（或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对于在国家关系上愿意分离的民族用任何形式施用任何暴力；

（二）要求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投票，来解决这种分离问题；

（三）要同黑帮十月党人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进行不断的斗争，反对他们袒护和纵容一般民族压迫，尤其是否认民族自决权的言论。

4. 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但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别情况下就不对某一民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给予单独的估计。相反地，社会民主党人正要作出这种单独的估计，不但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资产阶级对各民族无产阶级压迫的条件；还要考虑到一般民主的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特别注意下面这个情况：在俄国有两个民族，由于许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它们成了最有文化和最独特的民族，而这些条件能够使它们最容易最"自然地"实现自己的分离权。这两个民族就是芬兰和波兰。1905 年革命的经验证明，甚至在这两个民族里面，统治阶级即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因为害怕芬兰和波兰的革命无产阶级，而放弃了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想向俄国统治阶级及沙皇君主政体靠拢。

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竭力提醒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使他们提防不要直接被"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所蒙蔽，因为资产阶级正在想方设法用关于"祖国"的花言巧语来分裂

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别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沙皇君主政府订立同盟的把戏。

要是各民族工人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无产阶级就不能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维护自己的日常经济利益。

除了用革命斗争的方法来推翻沙皇君主政体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自由。沙皇君主政体不仅**排斥**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此外它还是欧洲和亚洲的野蛮、残暴、反动的主要堡垒。只有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推翻这个君主政体，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民族劳动群众中一切彻底民主的和能够进行革命斗争的分子前进。

所以，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犯了自己的利益，违犯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主义的利益。

5. 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只有利于某一或某些民族的任何特权。

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在俄国，这尤其是多余的，因为俄国 $^{7}/_{10}$ 以上的人口都是属于斯拉夫族血统的，由于经济流通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在自由国家的自由学校里，也是很容易谈通的。

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农奴主专制国家的农奴主-地主和官僚所规定的俄国原来的行政区划，而用根据现代经济生活要求和尽可能同居民民族成分相适应的区划来代替。

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主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

6. 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全国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

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个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造成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实行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7. 社会民主党反对“民族文化”（或者只是“民族”）“自治”的口号，并且反对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案，因为这个口号第一、根本违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第二、容易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三、可能置整个国家的彻底民主改造的任务于不顾，可是只有这种改造才能保证（一般地讲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少是可能的）民族和平。

由于民族文化自治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闹得特别尖锐，所以我们应当对这种情况作一些说明。

（一）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来看，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口号，都是不能允许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国际文化现在已经由各国无产阶级系统地建立起来，它不是把“民族文化”（不论是哪一个民族集体的）全盘接受下来，而是**只吸取每个**民族文化中彻底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二）在各社会民主党党纲中接近于民族文化口号的唯一例子，大概就是奥国社会民主党布隆纲领第三条了，虽然这种接近还不够大胆。这一条写道：“同一个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组成统一的民族联盟，这个联盟完全以自治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这是妥协性的口号，因为这里连一点超区域的（个人的）民族自治的影子也没有。而且这个口号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把洛兹、里加、彼得堡、萨拉托夫的德意志人结成一个民族根本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争取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并

取消一切民族特权，使在俄国的德意志工人同所有其他民族的工人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文化事业上联合起来。

超区域的（个人的）民族自治并设有（根据这个口号的彻底拥护者的计划）民族议院和民族国务部长的口号（奥·鲍威尔和卡·伦纳），是更加错误的。这种违背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经济条件并且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中都没有设立过的机构，乃是某些人的一种机会主义幻想，他们对于建立彻底民主的机关感到绝望，而想在某些（"文化"）问题上把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人为地隔绝起来，以求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

情况有时迫使社会民主党人暂时服从某种妥协性的决定，但是我们应当向别国模仿的，不是妥协性的而是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决定。所以，在奥地利的妥协企图已经完全破产并且导向分立主义和捷克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今天，模仿奥地利的这种不成功的企图就更是不智的。

（三）俄国的"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历史表明：采用这个口号的，毫无例外地都是整犹太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只是崩得不加批判地跟着跑的那些犹太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并不彻底反对犹太民族议院和犹太民族国务部长。其实，连那些容许或者拥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妥协口号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承认（如奥·鲍威尔和卡·考茨基等）这个口号对于犹太人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在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帮会，而企图把犹太人组成一个民族，就是企图保存帮会。"（卡·考茨基）

（四）在一些文明国家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是在整个国家结构和国家管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瑞士）的条件下才有的那种同民族和平十分近似（比较地说）的局面。彻底民主制（如共和国、民警、人民选举官吏等等）的口号，正在把无产

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每个民族的一切先进分子联合起来，为争取彻底消除民族特权的条件而斗争，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一般“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可以把无产阶级和各民族的先进民主派（那些不要求隔绝，而要求在一切事业上，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上各民族民主分子联合起来的分子）**融为**一体，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分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把它同各个民族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起来。

彻底民主主义的口号是同各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誓不两立的，而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完全为某些民族的反动派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所接受。

8.**俄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就是这样无条件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和教育的等等）**中的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在党的机构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集团，而是把某个地方的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并用当地无产阶级的一切语言进行宣传和鼓动，进行各民族工人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共同斗争，实行地方和省的党组织的自治。**

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年多来的历史经验证实了上述情况。党作为“俄国的”党，即作为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政党，产生于**1898 年。**在党代表大会没有接受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的要求以后，崩得便在 1903 年退了党，虽然如此，党仍然是**“俄国的”党。1906—1907 年的实际生活充分地暴露了这个要求是没有根据的，许多犹太无产者在许多地方组织中继续同心协力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于是崩得又回到党里来了。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大会（1906 年）既把主张地域自治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团

结了起来，又把主张**地域**自治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团结了起来，而且大会**没有**接受联邦制的原则，而要求各个地方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这个原则在高加索实行了好多年，这个原则在华沙（波兰工人和俄国士兵）、维尔纳（波兰、拉脱维亚、犹太和立陶宛的工人）、里加这三个中心地点也在实行，**反对**按照分离主义分离出去的崩得。1908 年 12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代表会议的名义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确认各民族工人**不是在**联邦**原则**上**统一**的要求。崩得分离主义者主张分裂，不执行党的决定，因而使这种“最坏的联邦”[299] 趋于完全破产，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捷克人日益接近，或者说是使后者与前者日益接近（见《我们的曙光》杂志上科索夫斯基的文章，以及捷克斯拉夫分离主义者机关报«Der čechoslavische Sozialdemokrat»① 1913 年第 3 期上关于科索夫斯基的文章）；最后，在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上，使崩得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以及部分的高加索取消派企图把那种**实质上毫无道理的**“民族文化自治”**偷偷地**塞到党纲里去！

无论波兰或拉脱维亚边区的以及高加索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仍旧坚持地域自治和**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工人**统一**的观点。崩得取消派的分裂和崩得同华沙**非**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在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面前，把**整个**民族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无论就它的理论意义或党的建设事业来说，都是如此。

妥协性的决议正是被那些利用这个决议来反对党的意志的人所破坏，而要求各民族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一致的呼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

10. 沙皇君主政体的粗暴好战的和黑帮派的民族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管是大俄罗斯的（司徒卢威先生，《俄国评论

① 《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编者注

报》[300]，“进步党人”等等）也好，乌克兰的也好，波兰的（民族“民主党”[301]的反犹太人主义）也好，格鲁吉亚的和阿尔明尼亚的等等也好——这一切都特别迫切要求俄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比以前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并以坚定的国际主义和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对这个问题作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

（一）民族文化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它表现出来的只是资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了解的局限性。国际文化。

（二）民族区分的永久化，精致的民族主义的实行——各民族的联合、接近、混杂和另一种即国际的文化的表现。

（三）小资产者的绝望（反对民族纷争的绝望斗争）及对根本的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恐惧，只有根本的民主改造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缔造民族和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民族纷争。

（四）在教育事业上的民族集团[302]。

（五）犹太精神。

（选自《列宁全集》第19卷
第236—244页）

列　宁

各等级和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发表于 1913 年 8 月 28 日）

有一本法律杂志引用了俄国国事犯的一些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很值得注意，它对不同历史时期各等级和阶级在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提供了确切的材料。

可惜材料不完全，只说明了以下几个时期：1827—1846 年（农奴制时期）；1884—1890 年（“平民知识分子”运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运动混合的时期）。最后是直接革命前的时期（1901—1903 年）和革命时期（1905—1908 年），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时期。

关于各等级的作用有以下的统计材料。在每一百个被控为国事犯的人当中，各等级所占的比例如下：

时　期	贵　族	小市民和农民	僧　侣	商　人
1827—1846 年……	76	23	?	?
1884—1890 年……	30.6	46.6	6.4	12.1
1901—1903 年……	10.7	80.9	1.6	4.1
1905—1908 年……	9.1	87.7	?	?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解放运动的民主化在十九世纪发展得多么迅速，运动的阶级成分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农奴制时期（1827—1846 年），贵族占绝对优势。这是从十二月党人到赫尔岑

的时期。农奴制的俄国是闭塞的停滞不前的。起来反抗的只有极少数没有人民支持的软弱无力的贵族。然而贵族中的优秀人物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平民知识分子运动时期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时期(1884—1890年),贵族在解放运动参加者当中已占少数,但是同僧侣和商人加在一起还占49%,也就是说**几乎占一半**。运动有一半还是贵族、上层资产阶级这些特权阶级的运动。因此,尽管个别人表现得很英勇,整个运动还是软弱无力的。

第三个时期(1901—1903年)和第四个时期(1905—1908年),是农民和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时期。贵族的比重极小。城市小资产者和农民在革命前的时期占$^{8}/_{10}$,在革命时期占$^{9}/_{10}$。群众觉醒了。从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取得某些重大的胜利是可能的;(2)自由派是仇视运动的(出现了反革命的自由派)。

更有意义的是关于职业的统计,虽然只有后三个时期的材料。下面是每一百个参加解放运动的人(被控为国事犯的)的职业统计:

时　期	农　业	工业和商业	自由职业和学生	没有固定职业和没有职业的
1884—1890年……	7.1	15.1	53.3	19.9
1901—1903年……	9.0	46.1	28.7	8.0
1905—1908年……	24.2	47.4	22.9	5.5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数字。从这里马上就能看出平民知识分子在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时期(1884—1890年)的作用:**大多数**的参加者是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占53.3%)。因此,当时各政党和运动的阶级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民粹派运动的混合,其中学生和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农民("农业")和工人("工业和商业")占的比重不大(7%和15%)。所谓失去阶级性

的人，即脱离本阶级而又没有同一定的阶级保持联系的人，却占了1/5(19.9%)，比农民要多，比工人也要多！

因此，运动的形式是特殊的——非常英勇但又很软弱。

到了革命前的时期(1901—1903年)，起主要作用的是城市工人（“工业和商业”）。他们虽然在人民中占少数，但是**几乎**占参加者的**半数**（46.1%）。知识分子和学生**已经**降到第二位（正好揭穿自由派和取消派关于工人政党的无稽之谈）。农民的比重虽然很小(9%“农业”)，但是在不断增长。

最后一个时期是1905—1908年。城市工人从46.1%增加到47.4%。他们唤醒了农民群众。农民在运动中的比重增长得比所有其他阶级都快，从9%增长到24.2%，**几乎增长了两倍**。农民已经超过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学生（22.9%）。脱离本阶级而失去阶级性的人的比重更是微不足道了（5.5%）。自由派关于我国革命实质上是“知识分子的”革命的理论，显然带有恶毒诬蔑的性质。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就是运动的社会力量。农民虽然比工人和市民的人数多得多，但是远远落在后面了，只占参加者的1/4(24.2%)，因为农民觉醒得还不够。

最后还要赞扬一下六三（斯托雷平）土地政策，① 因为它非常成功地、迅速地、有力地唤醒了其余的人……

（选自《列宁全集》第19卷
第327—329页）

① 指1906—1910年斯托雷平推行的“土地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破坏村社土地公有制，扶植富农和把怀有革命情绪的贫苦农民迁往西伯利亚等边区，妄图通过这些措施来巩固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编者注

列　宁

民　族　平　等

（发表于 1914 年 4 月 16 日）

在《真理之路报》[①] 第 48 号（3 月 28 日）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公布了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该法律草案的正式名称是《关于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及与任何民族出身或族籍有关的一切限制的法律草案》[②]。

在由争取生存、争取面包的斗争而引起的惊慌和不安中，俄罗斯工人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忘记居住在俄国的千百万“异族人”所遭受的那种民族压迫。统治民族——大俄罗斯人约占帝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在每一百个居民中，“异族人”就有五十多人。

这些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比俄罗斯人更加凄惨。

民族压迫的政策就是民族**分裂**的政策。它同时又是一种经常**腐蚀**人民意识的政策。黑帮的全部打算，都是建筑在把各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毒化愚昧无知和备受压制的群众的意识之上的。只要拿起黑帮的任何一张报纸，你就可以看到，迫害“异族人”，挑拨俄罗斯农民、俄罗斯小市民、俄罗斯手工业者同犹太的、芬兰的、波兰的、格鲁吉亚的、乌克兰的农民、小市民、手工业者之间互相猜疑——这就是黑帮赖以为生的粮食。

但是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对于工人阶级来

① 即《真理报》，为了防止沙皇政府迫害而采取的出版名称之一。——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166—168 页。——编者注

说，再没有比野蛮的成见和迷信更加可恨的敌人了，而工人阶级的敌人却在愚昧无知的群众中散播这些毒素。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有两头的棍子。这根棍子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压迫。

工人阶级应当用自己对于必须实行完全平等、完全和彻底摈弃任何民族的任何特权的信念来反对黑帮的宣传，黑帮企图用这种宣传转移工人阶级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黑帮对异族人的迫害。

黑帮正在进行特别仇恨犹太人的宣传。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企图把自己的一切罪恶转嫁在犹太人民身上。

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在自己法律草案中把**犹太人**的无权状况的问题摆在主要地位，是十分正确的。

不管学校也好，报纸也好，议会讲坛也好，这一切都被用来散播对犹太人的黑暗的、野蛮的、恶毒的仇恨。

干这种卑鄙龌龊勾当的不只是那班黑帮的败类，而且还有一些反动的教授、学者、新闻记者和议员。亿万卢布都用来毒化人民的意识。

俄国工人的光荣的事情，就是使千百万无产者用签名和声明来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反对民族压迫的法案……这是巩固**完全的**统一，使俄国所有的工人不分民族溶合起来的一个最好的保证。

（选自《列宁全集》第 20 卷
第 232—233 页）

列　宁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发表于 1914 年 4 月 22 日）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运动的各个主要阶段，才能真正地懂得，工人报刊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经历任何其他的道路。

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 1825 年到 1861 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 1861 年到 1895 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 1895 年到现在。

贵族时期最出色的活动家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当时还存在着农奴制，根本谈不到把工人**阶级**从“卑下的”、“龌龊的”、无权的农奴**等级**的一般群众中划分出来。当时以赫尔岑的《钟声》杂志为首的没有经过审查的一般民主主义报刊，是工人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的先驱。

正象十二月党人唤起了赫尔岑一样，赫尔岑和他的《钟声》杂志也促进了**平民知识分子**的觉醒。所谓平民知识分子就是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维·格·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的总结了自己

的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信》[303]，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动的意义。

在农奴制崩溃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一般解放运动的、特别是民主主义的没有经过审查的报刊的主要群众活动家。民粹主义成了符合平民知识分子观点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流派永远不能同右的自由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但是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赫尔岑更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揭发自由派叛卖行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直到现在还痛恨的。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有好多具有战斗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内容的没有经过审查的报刊作品，已经开始深入到"群众"中去。在那个时代的活动家当中，最主要的有工人彼得·阿列克谢也夫、斯杰潘·哈尔土林等等。但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支流还不能从总的民粹主义的洪流中分离出来。只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思想上已经确定之后（1883年"劳动解放社"成立），在工人运动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而开始不断发生之后（1895—1896年的彼得堡工人罢工），它才可能分离出来。

在谈论俄国工人报刊真正开始的那个时代以前，我们先引用一些能够明显地表明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运动相互之间的阶级差别的材料。这是一个说明各种等级和各种行业（即各个阶级）的人在国事犯（政治犯）中所占的比重的材料①。在一百个国事犯中间：

---

① 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327—329页。——编者注

	贵族	小市民和农民	农民	工人	知识分子
1827—1846 年……	76	23	?	?	?
1884—1890 年……	30.6	46.6	7.1	15.1	73.2
1901—1903 年……	10.7	80.9	9.0	46.1	36.7
1905—1906 年……	9.1	87.7	24.2	47.4	28.4

在贵族时期、农奴制时期（1827—1846 年），绝大多数（76%）“政治犯”是占人数极少数的贵族。在民粹主义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时期（1884—1890 年；可惜没有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类似的材料），贵族退到次要地位，但是仍然占着很大的百分比（30.6%）。参加民主主义运动的绝大多数（73.2%）是知识分子。

1901—1903年时期，正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报——旧《火星报》[①] 时期，这时运动完全民主化了（贵族占 10.7%，“没有特权的人”占 80.9%），工人（46.1%）**超过了**知识分子（36.7%）。

我们要预先指出：在第一个群众运动的时期（1905—1908 年）所发生的变动，**只是**农民（24.2%对 9.0%）**排挤**了知识分子（28.4%对 36.7%）。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者是 1883 年在国外诞生的“劳动解放社”。它因为躲避审查而在国外印行的著作，第一次引证一切实际的结论来有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全世界的经验已经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正确地说明工人运动的实质和它的任务。1885 年在彼得堡出版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报》，当然是没有经过审查的，可是只出版了两期。这几乎是 1883—1895 年这十二年中在俄国创办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报刊的唯一的一次尝试。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工人报刊就不可能广泛地发

① 列宁于 1900 年 12 月在国外创办的第一份全俄政治报纸，到 1903 年 11 月（公历）共出版了 51 期。为了区别 52 期以后由孟什维克主编的《火星报》，又称旧《火星报》。——编者注

展起来。

从1895—1896年起，从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时期起，开始了有社会民主派参加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只有这个时期才真正是俄国工人报刊出现的时期。当时工人的主要出版物是没有经过审查的传单，其中大部分不是用铅印而是用胶版印制的，是为了进行"经济性的"(也为了进行非经济性的)鼓动而写的，这就是说，传单叙述了各个工厂和各种工业部门工人的贫困情形和他们的要求。自然，没有先进工人最积极地参加编写和散发，这种传单是无法存在的。在当时参加活动的彼得堡工人中，可以举出瓦西里·安得列也维奇·舍尔古诺夫(他后来因为眼睛瞎了，不能象以前一样积极地活动了)以及热情的"火星派分子"(1900—1903年)和"布尔什维克"(1903—1905年)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巴布什金(他在1905年年底或1906年年初因为参加西伯利亚起义而被枪毙了)。

印发传单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小组和组织，从1895年年底起，大部分都开始采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名称。1898年，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继传单之后，开始出现了没有经过审查的工人报纸，例如189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圣彼得堡工人小报》[304]以及在同一地方出版、不久就迁到国外去的《工人思想报》。各地没有经过审查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革命时为止，几乎没有间断过，——自然，报纸经常遭到破坏，但是新的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在全俄各地重新出现。

那一个时期的，即二十年前的全部工人传单和社会民主主义报纸，是现在的工人报刊的直接的先驱：所刊登的同样是"揭发"工厂情况的文章，同样是"经济"斗争的新闻，同样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彻底民主主义立场对工人运动任务的原则性的说明，——最后，同

样有工人报刊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即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

有一个重要事实直到现在还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个事实就是：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诞生（1895—1896 年），立刻就划分成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虽然这种划分的形式、外貌等等不断变化着，但是实际上从 1894 年一直到 1914 年都只有实行这样的划分。显而易见，为什么正是这种划分而不是任何另一种划分，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斗争，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上面提到的《工人思想报》是代表当时的机会主义派，即所谓“经济主义”的。这一派在 1894—1895 年各地工人运动活动家进行论战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从 1896 年起，俄国工人的觉醒就引起了国外社会民主主义创作的大繁荣，因此，国外“经济派”的出现和团结到了 1900 年春天（也就是说，是在《火星报》创刊以前，因为《火星报》创刊号是在 1900 年年底出版的）就以分裂而结束了。

1894—1914 年这二十年工人报刊的历史，也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更正确些说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的历史。要想了解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不仅要知道，甚至不必太多地知道各种机关报刊的名称，而应当知道社会民主党各个派别的内容、性质和思想路线，因为名称并不能告诉现在的读者什么东西，只会使他们头脑混乱。

“经济派”的主要机关报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0 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8—1901 年）。《工人事业》杂志的领导者是波·克里切夫斯基（后来投到工团主义者那边去了）、亚·马尔丁诺夫（著名的孟什维克，现在是取消派分子）和阿基莫夫（现在是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同取消派意见一致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起先同经济派斗争的只有普列汉诺夫和整个《劳动解放社》（《工作者》杂志等），后来同他们斗争的是《火星报》（从 1900 年到

1903 年 8 月，即到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经济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

“经济派”口头上十分积极地捍卫工人运动的群众性和工人的独立性，坚持“经济”鼓动有头等意义的意见，坚持稳步地或逐渐地向政治鼓动过渡的主张。读者可以看到，这正是取消派现在拿来炫耀的那一套心爱的空话。事实上，“经济派”实行的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当时的“经济主义”领袖之一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曾经简洁地表述了这种政策的实质：“经济斗争——归工人，政治斗争——归自由派。”最会叫喊工人的独立性，叫喊群众运动的“经济派”，事实上是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一派。

在 1901—1903 年，在一百个国事犯中觉悟工人已经占四十六个，知识分子只占三十七个。这时绝大多数觉悟工人都站在旧《火星报》方面而反对机会主义。《火星报》在三年（1901—1903 年）的活动中，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制定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创立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基础，提出了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形式。在革命前的年代中，工人报刊在《火星报》周围和在它的思想领导下有了巨大的增长。俄国各地没有经过审查的传单和违法设立的印刷所非常多，而且迅速地增加着。

由于在 1903 年《火星报》完全战胜了“经济主义”，无产阶级的彻底的策略完全战胜了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又有更多的“同路人”涌到社会民主党队伍里来，而机会主义也就以火星派为基础，作为它的一部分，在“孟什维主义”的形式下复活了。

孟什维克派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 年 8 月）上成立的，是由“火星派”的少数派（由此就有了孟什维克派或少数派这个名称）以及一切反对《火星报》的机会主义者组成的。“孟什维克”又倒退到“经济主义”上去了，当然在形式上也有一点

翻新的地方；以亚·马尔丁诺夫为首的所有留在运动中的“经济派分子”都加入了“孟什维克”的队伍。

从1903年11月《火星报》编辑部改组后，新《火星报》就成了“孟什维克派”的主要机关报。当时热心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曾经直率地宣布：“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拥护旧《火星报》所奉行的彻底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机关报是《前进报》和《无产者报》[305]（1905年）。

从是不是真正联系群众和是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群众的策略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报刊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即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是1905—1907年这几个革命的年头。如果先进工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没有为社会民主党公开的报刊打下基础的话，在1905年秋天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产生这种报刊的。如果说1905年、1906年、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公开的报刊是两个派别、两个组织的报刊，那末这只能用那个时代的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路线上的差异来解释。

公开的工人报刊出现于三个高潮和比较“自由”的时期：1905年秋天（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306]，孟什维克的《开端报》[307]——这里我们只指出许多机关报刊中的主要的），1906年春天（布尔什维克的《浪潮报》[308]、《回声报》[309]等，孟什维克的《人民杜马报》[310]等），以及1907年春天。

不久前尔·马尔托夫自己用几句话说明了孟什维克在这个时代的策略的实质，他说：“除了协助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实现它的把有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从国家政权中排挤出去的企图以外，孟什维克派看不到无产阶级还能有什么其他参与这次危机的有效措施，但是无产阶级在实行协助的时候，应当保持完整的政治独立性。”（见鲁巴金：《书林概述》第2卷第772页）这种“协助”自由派的策略，事实上就等于让工人依赖自由派，事实上这就是自由派的

工人政策。反之，布尔什维克派的策略是保证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危机时期的独立性，采取的办法是努力使危机发展到顶点，揭露自由派的叛变行为，教育和团结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来反击这种叛变行为。

大家知道，这几年（1905—1907 年）工人群众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孟什维克自己以及今天的取消派，如柯里佐夫、列维茨基等都不止一次地承认过这一点。布尔什维主义表现了运动的无产阶级实质，孟什维主义代表了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派别。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更详细地说明工人报刊中两个派别的策略的内容和意义。在这里我们只准确地确定基本事实，确定历史发展的主要路线。

俄国工人报刊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起先是准备阶段的历史，也就是说**不是**工人运动、**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而是“一般民主的”即资产阶级民主的解放运动的历史，然后才是它本身的二十年的历史，即无产阶级运动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就具有纯粹的阶级面貌，完整地出现在世界上，象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生活在一起，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不断向无产阶级队伍输送新成员。而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小市民最多的国家，它直到现在才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英国早在十七世纪，法国早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五十年就渡过了。

觉悟的工人现在正从事创办、巩固、发展工人报刊这种与自己血肉相关的切身事业，他们是不会忘记俄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报刊的二十年的历史的。

工人运动的那些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朋友，竭力躲避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并且到处叫喊和号召要避免内部斗争，他们是给工人运动帮倒忙。他们都是些善良但是空虚的人，他们的叫喊也都是空虚的。

先进工人只有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确实和详细地了解独立的无产阶级民主派从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中分化出来的过程，才能最终地巩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的工人报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 20 卷
第 240—248 页）

列　宁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发表于1914年12月12日）

现在，关于民族和祖国的言论、议论和叫喊太多了！英国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大臣，法国无数的“先进”政论家（他们竟和反动政论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俄国许许多多官方的、立宪民主党[311]的和进步党[312]的（直到某些民粹派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无聊文人，都异口同声地高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高唱民族独立的伟大原则。他们当中谁是卖身求荣歌颂刽子手尼古拉·罗曼诺夫或者歌颂黑人和印度居民的蹂躏者的无耻之徒，谁是因为愚蠢无知或没有气节而“随波逐流”的庸俗市侩，真叫人无法分辨。不过，分辨这点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面前是一个很广泛很深刻的思潮，这个思潮的根源同大国民族的地主资本家老爷们的利益有极紧密的关系。为了宣传有利于这些阶级的思想，每年要花费几千万和几万万的金钱：这副磨盘真不小，到处汲取水力来推磨，从顽固的沙文主义者缅施科夫起，直到由于机会主义思想或没有气节而成了沙文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鲁巴诺维奇和斯米尔诺夫、克鲁泡特金和布尔采夫一流人为止。

我们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也想明确一下我们对这一思潮的态度。我们这些处在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大国民族的代表，不应当忘记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在人们公允地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国家内，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在欧洲

最东部和亚洲唤起和唤醒许许多多“新的”大小民族的时候，特别是在沙皇君主制度迫使千百万大俄罗斯人和“异族人”拿起武器，遵照贵族联合会[313]和古契柯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多尔哥鲁科夫、库特列尔、罗迪切夫一帮人的利益去“解决”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时刻。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的人）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314]、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甫和地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① 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向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

① 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序幕》。——编者注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当时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征服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败坏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①]和普利什凯维奇[②]匪帮的势力。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例如，把压迫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行为称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

十九世纪彻底民主派的伟大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315]所以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的大俄罗斯工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人类平等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正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说：二十世纪在欧洲（即使在欧洲的最东部也好）"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即反对我们祖国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危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堕落，失去廉耻，丧失节操，教他们压迫异族人民，教他们用一些似乎是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

① 鲍勃凌斯基家族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是俄国的大贵族、大地主和大工厂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是俄国反动贵族组织的头目，积极配合沙皇政府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编者注

② 俄国内务部和宪兵总监手下的特务头目，1905—1907年"俄罗斯人民联盟"等黑帮暴行集团的组织者，这里是指他代表的黑帮。——编者注

可耻的行为。

也许有人反驳我们说，除沙皇制度以外，已经有另一种历史力量在它的卵翼下诞生和壮大起来，这就是大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它起着进步的作用，使经济集中并使广大地区联系紧密。但是，这种反驳不但不能维护反而更有力地斥责我们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应称作沙皇—普利什凯维奇的社会主义者（如马克思称拉萨尔派为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那样）。姑且假定历史解决问题将有利于大俄罗斯的大国资本主义而不利于许许多多小民族。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全部历史都是压迫、掠夺、血腥和污秽的历史。我们并不主张各个小民族一定要分立；**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我们无条件地主张集中制，反对市侩式的联邦制的理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协助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普利什凯维奇征服乌克兰等等，不是我们应做的事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更不要说社会主义者了）应做的事情。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是，谁要想根据这点来证明社会主义者应当帮助俾斯麦，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太好了！此外，俾斯麦把分散的受异族压迫的德国人联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大俄罗斯的经济繁荣和飞速发展，都要求在我们国内消除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我们那些崇拜真正俄国的准俾斯麦的人常常忘记这一差别。

第二，如果历史解决问题将有利于大俄罗斯大国资本主义，那末，应该得出结论说：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社会主义**作用将更加巨大。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长期地用**最充分的**民族平等和友爱的精神来教育工人。因此，正是从大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看，必须长期教育群众，使他们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来坚持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

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隶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英国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半个英国人,他为了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仍然要求保障爱尔兰的自由和民族独立。

我们俄国土生土长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一些人,在我们所谈的第二种假定的情况下,不仅会成为自己祖国的叛徒,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的叛徒,而且会背弃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即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
第609—613页)

列　宁

社会主义与战争(摘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1915年7—8月)

第　一　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摘录)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斥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

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因此，必须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止，也就是从 1789 年起到 1871 年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成了各种战争类型中的一种。换句话说，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是这种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因此这种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同情那些有助于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的国家（即资产阶级），希望它们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法国人掠夺过和侵占过他国领土，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和动摇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没有改变这个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把数千万德国人民从封建割据状况、从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暴君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

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

1789—1871 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谈到这个时代的“防御”战争的合理性时，一向指的就是这些归结为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的目的。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曾这样说过）。社会党人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

“防御”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例如，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那末不管谁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们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假设一个拥有一百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另一个拥有二百个奴隶的奴隶主作战。显而易见，在这种场合运用“防御”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看是一种歪曲，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奴隶主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现代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多半曲解了这个概念，不是片面地运用这个概念，就是总寻找借口说这一战争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这些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操纵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整个地球几乎都被这些“资本大王”瓜分完毕，他们或者占有殖民地，或者用金融剥削的无数绳索紧紧缠住其他国家。垄断、夺取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趋向代替了自由贸易和竞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由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各民族的最大压迫者。资本主义已由进步转为反动，它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类

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要在许多年内、甚至在数十年内熬受各“大”国为勉强保存资本主义（通过侵占殖民地，实行垄断，建立特权，实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把所谓“大”国（即在大规模的掠夺中卓有成效者）瓜分世界的确实的材料列举如下：

各奴隶占有制“大”国瓜分世界的情况

	殖民地				宗主国		共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各“大”国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平方公里	人口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六个“大”国…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不属于大国（而属于比利时、荷兰等等国家）的殖民地……			9.9	45.3			9.9	45.3
三个“半殖民地”国家（土耳其、中国和波斯）							14.5	361.2
						总计……	105.9	1 367.1
其余各国 ……							28.0	289.9
全地球（两极地区除外） ……							133.9	1 657.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789—1871年期间多半领导过其他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民族，在今天，在1876年以后，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过度成熟”，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居民和民

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六个“大”国掠夺了二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掠夺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六个大国奴役着**五亿以上**（五亿二千三百万）的殖民地居民。各“大”国平均每四个人摊到“自己的”殖民地的五个居民。同时大家知道，殖民地是用火和剑夺取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虐待，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剥削（如资本输出、租借、欺骗式贸易、强迫服从“统治”民族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英法资产阶级欺骗人民说，他们是为了各民族和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是为了保存他们抢得够多的殖民地而战。英国人和法国人只要把自己的殖民地“公平合理地”分给德帝国主义者一些，德帝国主义者立刻就会退出比利时等地。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从资产阶级的正义和民族自由（即民族生存权）的观点看来，德国反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对的，因为它殖民地“分得少”，它的敌人比它压迫着多得多的民族，而在它的盟友奥地利那里，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享有的自由无疑比在沙皇俄国这个真正的“各族人民的监狱”里享有的自由更多。但是德国自己并不是为解放其他民族，而是为压迫其他民族作战的。社会党人决不应该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一个较老的吃得过多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这些强盗间的斗争，以便把他们一齐打倒。为此，社会党人首先应当向人民说明真相，指出这场战争从三种意义上说是奴隶主为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这场战争是要通过更“公平地”瓜分殖民地和今后更“和睦地”剥削殖民地来巩固殖民地的奴隶制；第二、这场战争是“大”国要巩固对异族的压迫，因为**无论**奥地利**或**俄国（在俄国比在奥地利还要厉害得多和坏得多）都是专靠这种压迫来维持，都是用战争来加强这种压迫的；第三、这场战争是要巩固和延长雇佣奴隶制，因为无产阶级被分裂、受压制，而资本家则得到好处：发战争财，挑起民

族偏见，加强反动势力，目前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和共和制的国家里，这种反动势力都抬头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①

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的战争，你们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实行的政治是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族、镇压工人运动。当前的战争正是这一政治的继续，也只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例如无论在奥地利或俄国，无论平时或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各民族，而不是解放各民族。相反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一些附属国里，我们看到的政治却是亿万人民觉醒起来争取民族生存，是亿万人民要从反动“大”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现在仍然只能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在考察当前的战争时，只要把这一战争视为“大”国及其主要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就立刻可以看出，认为在当前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那完全是反历史的、虚伪的和骗人的。

比利时的例子

三个（现在是四个）协约国[316]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俄国是普列汉诺夫之流）最爱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是反对他们

---

① 见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第1卷第1篇第1章第24节。——编者注

的。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他们象只要需要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的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假定一切愿意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退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在这种场合，社会党人当然要同情德国的敌人。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三个(或四个)协约国"并不是为了比利时而进行战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伪君子才会隐瞒这一点。英国抢劫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俄国抢劫加里西亚和土耳其，法国要夺取亚尔萨斯-洛林以至莱茵河左岸地区；同意大利签订了分赃条约(瓜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谈了分赃生意。在各国现在的政府进行的当前战争的条件下，不帮助扼杀奥地利或土耳其等国，就不能帮助比利时！这跟"保卫祖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垂死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府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的特点。谁为参加这个战争辩护，谁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永久存在。谁主张利用各政府现有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捍卫真正一切民族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的真正自由。

俄国为什么作战？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俄国那样，国内的大多数居民是受压迫的。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即不到一半，而其他一切民族被当做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一亿七千万居民中，有一亿左右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彻底扼杀乌克兰人的自由，夺取阿尔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等。沙皇政府把战争看做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注意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

运动的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摊到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战争扩大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目，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以便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压迫和掠夺其他民族的可能性加强了经济停滞，因为收入的来源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力，而往往是依靠对“异族人”进行半封建剥削。由此可见，俄国进行的战争是极端反动的和反自由的。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中接着引出的结论就是，应当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应当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事实上他们主张的并不是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的“保卫祖国”，而是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说什么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民族自由和民族生存，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者为**某一**交战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或者象考茨基一样，认为**一切**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事实上维护“本国”（或不论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行，也就彻底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当前战争中最常用的欺骗人民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英国人答应给比利时自由，德国人答应给波兰自由，等等。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是一场压迫着

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者为巩固和扩大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战争。

社会党人不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绝对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正是政治含义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强大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捍卫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捍卫这种权利不但不是鼓励成立小国家，恰巧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地因而也是更广泛更普遍地成立更有利于群众和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317]）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哪怕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第 二 章
俄国的阶级和政党

资产阶级和战争

俄国政府有一点是不落后于它的欧洲伙伴的，它也象它们一样，善于大规模地欺骗“本国”人民。庞大而骇人的撒谎和欺骗的机关在俄国也大肆活动起来，为的是要用沙文主义毒害群众，给人

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沙皇政府是在进行“正义的”战争，是在大公无私地保卫“斯拉夫同胞”等等。

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热烈拥护沙皇政府的黩武政策。他们理所当然地期待从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的遗产中得到巨大的物质利益和特权。他们开过一系列会议，盘算沙皇军队打胜时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口袋的利润。同时反动派十分懂得，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罗曼诺夫君主制的崩溃和阻止新的革命在俄国爆发的话，那只能是沙皇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

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等广大阶层，也沾染上沙文主义（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是如此）。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完全和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立宪民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早就成为执政党。沙皇外交已经不止一次用来进行大规模政治欺骗的泛斯拉夫主义，现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堕落为民族自由主义。它和黑帮作“爱国主义”竞赛，总是很乐意投票赞成军国主义、海上军国主义等等。在七十年代，德国“自由思想的”自由主义发生了分化，分离出一个民族自由主义的政党。目前在俄国自由主义的阵营内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终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我国机会主义者认为俄国自由主义仍然是俄国革命动力的观点已被实际生活粉碎。

统治集团在资产阶级报刊和僧侣等等的协助下，在农民中也煽起了沙文主义情绪。但是随着士兵从战场回来，农村中的这种情绪无疑会发生不利于沙皇君主制的变化。同农民接近的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没有抵挡住沙文主义的浪潮。劳动派[318]在国家杜马中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可是他们通过自己的领袖克伦斯基的口宣布了对君主制特别有利的“爱国”宣言。“民粹派”的所有合法

刊物都尾随自由派。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即加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319]的所谓社会革命党[320]，也和这一思潮同流合污。该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鲁巴诺维奇先生，已成为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321]上，这个党有半数代表投票赞成沙文主义的决议（另一半代表弃权）。沙文主义者在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刊物（《新闻报》[322]等等）中占有优势。“来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即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这次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破产。克鲁泡特金、布尔采夫和鲁巴诺维奇的可悲下场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工人阶级和战争

俄国唯一没有沾染沙文主义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个别过火行动只涉及到工人的最落后的阶层。工人参加莫斯科反对德国人的粗暴行动一事被大大夸大了。整个说来，俄国工人阶级对沙文主义是有免疫力的。

这种情况可以由国内革命的形势和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来说明。

1912—1914年，标志着俄国新的规模巨大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们又看到大罢工运动，而这样的大罢工运动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1913年参加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人数，根据统计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1914年则超过二百万人，接近1905年的水平。大战前夜，在彼得堡情势已发展到发生首批街垒战的地步。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履行了自己对国际的义务。国际主义的旗帜在它的手中从未倒过。我们党早就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决裂了。机会主义和“绝对合法主义”没有成为我们党的绊脚石。这种情况帮助了我们党履行革命义务，正象同比索拉蒂的机会主义党分裂帮助了意大利的同志一样。

我国的一般情况是不容许“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盛行的。在俄国，我们在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等中间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它们在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中却是微不足道的。特权工人和职员的阶层在我国是非常软弱的。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有对合法性的盲目崇拜。战前，取消派[323]（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和马斯洛夫等领导的机会主义政党）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有力的支持。选入第四届国家杜马的所有六个工人代表，都反对取消主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合法的工人报纸的发行份数和捐款情况，无可置辩地证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是反对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

战争爆发时，沙皇政府逮捕和放逐了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人和我们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由于这种情况，加上国内实行戒严、我们的报纸被封闭等等，运动遭到了阻碍。然而我们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依然继续进行着。我们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出版了秘密报纸《无产者呼声报》[324]。

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在彼得格勒翻印出来，并送往各省。出版秘密传单，有的甚至散发到军营中去。在城郊的各个偏僻地方，工人秘密集会。最近在彼得格勒爆发了五金工人大罢工。我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就这些罢工事件发表了几篇告工人书。

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工人党团和战争

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代表在1913年发生了分裂。一方面是齐赫泽领导下的七个拥护机会主义的人。他们是由七个非无产阶级省份选出的，这七个省只有二十一万四千工人。另一方面有六个代表，他们全都是由俄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区的工人选民团选出的，这些区域共有一百万零八千工人。

主要的分歧点是：实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呢，还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策略。实际上分歧多半表现在议会以外的群众工作上。在俄国，如果做这项工作的人还想站在革命立场上的话，就必须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齐赫泽党团[325]始终是放弃秘密工作的取消派的最忠实的同盟者，它在同工人的一切谈话中和在一切会议上，都替取消派辩护。由此就发生了分裂。六个代表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一年来的工作无可争辩地证明，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人正是拥护这个党团的。

战争一开始，分歧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齐赫泽党团只进行议会活动。它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因为否则它就会引起工人对它的极大的愤慨（我们看到，在俄国甚至连小资产阶级劳动派也没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是它也没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反映我党政治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则不同。它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进行反战工作，它向俄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进行反帝宣传。

这个党团赢得了工人的深切同情，因而吓坏了政府，使它不得不公然破坏自己的法律，逮捕我们的代表同志并判决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在逮捕我党同志的第一个正式文告中这样写道：

“社会民主团体的某些成员在这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们进行活动的目的，是要通过反战宣传、秘密传单和口头宣传，动摇俄国的军事力量。”

对王德威尔得提出的“暂时”停止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的著名号召，只有我们党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给了否定的答复。现在从沙皇驻比利时公使库达晓夫公爵的证词中可以知道，这个号召不是王德威尔得一个人拟定的，而是同这位沙皇公使一起拟定的。取消派的领导核心赞同王德威尔得，在报纸上正式宣称它“在自己

的活动中**不反对战争**”。

沙皇政府首先控告我们的代表同志在工人中宣传这个对王德威尔得的否定答复。

沙皇检察官涅纳罗科莫夫先生在审判中给我们的同志举出德国和法国社会党人作榜样。他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而成为政府的朋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样做了，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可悲的骑士们却没有这样做…… 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党人都忘记了自己和其他阶级间的纷争，忘记了党派纠纷，毫不犹豫地站到战旗下。”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们却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并没有这样做……

这次审判展示了我们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秘密进行广泛的反战宣传的动人图景。当然，沙皇法庭还远没有“查出”我们同志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但是所查出的活动就已经表明，我们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多少工作。

法庭宣读了我们的小组和委员会所散发的反对战争和拥护国际主义策略的秘密传单。全俄国的觉悟工人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有联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也尽力帮助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战争。

哈尔科夫省的工人代表穆拉诺夫同志在法庭上说：

“我知道，我被人民派到国家杜马里来不是为了坐杜马的安乐椅，我到过许多地方，去了解工人阶级的情绪。”他在法庭上承认，他担负过我党秘密鼓动员的职务，并在乌拉尔的上伊塞特工厂和其他地方组织过工人委员会。这次审判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成员在战争爆发后，为了进行宣传几乎走遍了全俄国，表明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巴达也夫等人组织了许多次工人会议，这些会议通过了反对战争的决议等等。

沙皇政府用死刑恫吓被告。因此，在法庭上并不是每个人都

表现得象穆拉诺夫同志那样勇敢。他们尽力设法使沙皇检察官难于给他们判刑。现在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却卑鄙地利用这一点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工人阶级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议会活动？

休特古姆和海涅、桑巴和瓦扬、比索拉蒂和墨索里尼、齐赫泽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议会活动。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同志们也承认议会活动，同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同志也承认议会活动。有各种各样的议会活动。一些人是利用议会舞台取宠于本国政府，或者至多不过象齐赫泽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议会活动，则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要履行社会党人和国际主义者的义务。一些人的议会活动使他们坐上部长的安乐椅，另一些人的议会活动则使他们坐监牢、被流放、做苦工。一些人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些人则为无产阶级服务。一些人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另一些人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668—675、684—691页）

列　宁

论单独讲和

（发表于1916年11月6日）

俄国和德国已在举行单独讲和的谈判。这种谈判是正式的，并且在主要问题上两国已经达成协议。

不久以前，伯尔尼社会党人的报纸根据它掌握的情报发表了上述声明。驻伯尔尼的俄国大使馆立即正式辟谣，而法国沙文主义者认为这种谣言的散播是“德国人挑拨离间”，但是，这家报纸认为辟谣没有任何意义，它为了证实上述声明还举出一个事实，就是德国的（毕洛夫）和俄国的“国家要人”（斯提尤尔美尔、吉尔斯和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外交官）现在恰恰都在瑞士，同时瑞士商界也从俄国商界得到类似的正面消息。

不用说，无论从不会承认进行单独讲和谈判的俄国方面来说，或从不管谈判进行与否和进行得顺利与否，总要企图制造俄英两国不和的德国方面来说，进行欺骗都是同样可能的。

为了分析单独讲和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当从目前瑞士发生的和实际上无法验证的谣言和消息出发；而应当从最近几十年来无可争辩的**政策实例**出发。让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扮演普利什凯维奇和米留可夫的奴才或小丑角色的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波特列索夫之流的先生们拚命去证明“德国的罪过”和俄国进行战争的“防御性质”吧！觉悟的工人过去和现在都不会听这些小丑的话的。这次战争是由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引起的，也就是说，是

由列强瓜分赃物、并吞殖民地和小国的斗争引起的，同时，在这次战争中居于首位的有**两种**冲突。一种是英德之间的冲突。一种是德俄之间的冲突。这三个大国、这三个一条大路上的大强盗是这场战争的罪魁，其余的都是胁从的伙伴。

上述两种冲突是由这些国家战前**几十年**来的**全部**政策准备好了的。英国打仗是为了夺取德国的殖民地和打垮自己的这个主要对手，因为德国的优良技术、组织和经商能力无情地打击了英国，以致英国不打仗就**不能**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德国打仗是因为德国资本家认为（这也是十分公正的），他们在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方面居于世界首位是他们“神圣的”资产阶级权利，德国打仗同时还是为了控制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和土耳其。俄国打仗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因为俄国为了镇压乌克兰人民特别需要占领加里西亚（除了加里西亚以外，乌克兰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比较自由的角落）；同时也是为了夺取阿尔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以及控制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除俄德两国的强盗“利益”的冲突之外，还有俄英两国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冲突。列强历代的竞争和客观的国际相互关系决定了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任务，这个任务简要地说来就是：在英法两国的帮助下，在欧洲打败德国，掠夺奥地利（夺取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阿尔明尼亚，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然后再在日本**和同一个**德国的帮助下，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和彻底瓜分中国等等。

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并且利用列强之间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同德国相比，英国是这种野心更长期、更顽固、更强大的敌人。1878 年俄军逼近君士坦丁堡时，英国把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并且威胁说，一旦俄国人出现在“沙皇格勒”，他们便

要向俄国人开火。1885 年俄国险些为了中亚细亚的分赃问题（阿富汗；俄军向中亚细亚的深处推进威胁到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同英国发生战争。1902 年，英国同日本结成联盟，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在 1878—1902 年这一长时期中，英国一直是俄国强盗政策的头号强敌，因为俄国屡次使英国对许多别国人民的统治有受到破坏的危险。

而现在呢？请大家看一下这次战争的情形吧。那些脱离无产阶级而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的言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他们说从俄国方面来看，这次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或者“救国”（齐赫泽）。甜言蜜语的考茨基之流的言论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他们谈到民主和约时，竟说什么现在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会缔结这种和约。事实上，这些政府彼此都被密约网束缚住了，有的是同自己的盟国缔结的，有的是为反对自己的盟国缔结的，而且这些条约的内容也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恶意”确定的，而且是由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全部进程和发展决定的。有些“社会主义者”用一些谈论好事（保卫祖国、签订民主和约）的陈词滥调来蒙蔽工人的耳目，而不揭露本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掠夺他国的秘密条约，这些“社会主义者”已经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

让关于亲善和约的言论从社会主义者阵营中发出来，这无论对德国、英国或俄国的政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第一、它会使人们相信现在的政府可能缔结这种和约，第二、它会使人们不去注意这些政府的强盗政策。

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而政策在战争时期也在“继续推行”！德国同保加利亚和奥地利缔结了分赃的秘密条约，并且继续在进行这种谈判。俄国同英法等国缔结了秘密条约，所有这些秘密条约都是为了抢劫和掠夺，为了掠夺德国的殖民地，掠夺奥地利和瓜分土耳其等等。

“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向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大谈其亲善和约，这同神甫向坐在教堂前排的狼狈为奸的妓院鸨母和警察局长“宣扬”博爱和遵守基督训诫是一模一样的。

毫无疑问，俄英之间订有秘密条约，如关于君士坦丁堡的秘密条约。大家知道，俄国很想得到这个地方，而英国不想给，即使给了以后不是想方设法夺回去，便是要俄国答应种种条件来取得这种“让步”。密约的原文还不知道，但是，英国和俄国曾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斗争，即使现在也还在进行斗争，这一点不仅知道，而且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大家知道，俄国和日本两国之间除了原有的条约（如1910年签订的让日本“并吞”朝鲜和俄国并吞蒙古的条约）之外，在这次战争中又缔结了**新的**秘密条约，锋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向英国**。虽然条约的原文还不知道，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日本曾经在英国的帮助下在1904—1905年打败了俄国，现在它正在审慎地准备能够在俄国的帮助下打败英国。

在俄国的“当权人士”中，即在暴君尼古拉宫廷的匪帮、贵族、军队等等中，有一个亲德派。从整个方针来看，最近德国资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有一种同俄国亲善、同俄国单独讲和以便讨好俄国而集中全力攻打英国的转变。德国方面有这种计划，那是很显然的，是没有疑问的。从俄国方面来看，事情是这样的：沙皇政府当然宁肯首先彻底打败德国，以便尽量多“霸占”一些地方，既能霸占整个加里西亚、波兰、阿尔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又能“打垮”奥地利等等。那时在日本帮助下再掉过头打英国也就比较方便了。但是，力量显然不够。关键就在这里。

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先生竟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俄国的反动派想同德国讲和，而“进步的资产阶级”则要消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并且同“民主的”英国保持友好，这是娃娃讲的话，

是把自己降低到政治上幼稚的人的水平。其实在俄国，**无论**沙皇政府**也好**，一切反动分子**也好**，整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也好，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欧洲掠夺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等等）。这些“亲爱的朋友”所争论的仅仅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从打德国掉过头来打英国的问题。仅仅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打的问题！

如何解决亲爱的朋友们所争论的这个唯一的问题，要取决于**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考虑**，这些考虑**只有**沙皇政府才完全知道，而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之流四成里顶多知道一成罢了。

把整个波兰从德国和奥地利手中夺过来！沙皇政府**赞成**这样做。但是力量够不够呢？英国会不会允许呢？

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夺过来！打败和瓜分奥地利！沙皇政府完全赞成这样做。但是力量够不够呢？英国会不会允许呢？

沙皇政府知道俄国已经牺牲了几百万士兵，**还**能抓多少人去当兵，知道已经打掉了多少炮弹，还能补充多少炮弹（日本在对华战争日益迫近而且完全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是**不**会再供应炮弹的！）。沙皇政府知道过去和现在俄英两国关于君士坦丁堡，关于英国在萨罗尼加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兵力等问题进行秘密谈判的情况。沙皇政府这一切全知道，他手里有各种王牌，并且作了精确的估计，——一般说来，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于不可靠的、没有把握的因素，即“军事运气”的因素起着特别重大作用的一些事情，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之流知道得愈少，就胡说愈多。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波特列索夫之流则对沙皇的秘密条约一无所知，甚至忘记了过去知道的东西，没有研究可以从外国报刊上获得的材料，没有深入地去了解沙皇政府对外政策在战前的进程，没有

注意这种政策在战时的情况，因此他们简直是在扮演社会主义的伊万努什卡的角色。

沙皇政府确信，即使有自由派的全力帮助，有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热心赞助，有普列汉诺夫、格沃兹迭夫、波特列索夫、布尔金、契尔金、齐赫泽（“救国”，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鲁泡特金之流和其他奴才先生们对增加炮弹这一崇高事业的大力协助，——即使如此，在一切可能卷入和已经卷入战争的盟国现有的军事力量（或者说没有军事力量）的状况下，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不可能**强大得**足以战胜德国，或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付出过多的代价（例如，**还**要牺牲一千万俄国士兵，还要花几十亿卢布来招募、训练和装备新兵，再打几年仗），因此，沙皇政府**不能不谋求**同德国单独讲和。

如果“我们”在欧洲为了过多的赃物进行角逐，那“我们”就有把“本国”军事资源消耗净尽的危险，在欧洲几乎一无所得，而在亚洲又可能使“自己”得不到好处，——沙皇政府就是这样判断的，从帝国主义利益的观点来看，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沙皇政府比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空谈家米留可夫、普列汉诺夫、古契柯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判断得**更正确**。

既然在欧洲得不到更多的东西，即使纠合了罗马尼亚和希腊（“我们”从它那里已经拿了一切能够拿到的东西）也得不到，那就不如拿可能拿到的东西！英国现在什么也**不会**给“我们”。德国可能归还我们库尔兰和一部分波兰，甚至还会给我们加里西亚的东部（这对“我们”特别重要，我们可以镇压乌克兰运动，即历史上一直沉睡的几百万人民争取自由和争取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运动）和土属阿尔明尼亚。**现在**得到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摆脱战争，**加强实力，明天**我们在日本和德国的帮助下，在推行灵活的政策下，以及在米留可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对“拯救”心爱的“祖国”这一事业进一步的赞助下，就可以在对英战争中在亚洲得到

一块好地方（整个波斯和通向辽阔海洋的波斯湾，波斯湾和君士坦丁堡不同，后者只能通向地中海，而且要经过许多岛屿，而这些岛屿容易为英国所占领和巩固，使“我们”没有通向公海的任何出口）等等。

沙皇政府正是这样判断的，我们再说一遍，沙皇政府这样判断，不仅从狭隘的君主政体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一般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都是正确的。沙皇政府比自由派、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知道得更多，看得更远。

所以完全可能，我们明天或后天醒来以后，就会看到三国国王这样的宣言：“我们倾听心爱的人民的呼声，决定使人民安居乐业，实行停战和召开全欧和平会议。”三国国王甚至会讲几句俏皮话，重复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用过的一些字眼，说什么我们“答应”（“答应”即使在物价高涨时代，也是唯一便宜的东西）讨论裁减军备、“持久”和平等问题。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一定会随着跑到召开全欧和平会议的城市去举行他们“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善良的愿望、甜蜜的语句和必须“保卫祖国”的信念会用各种语言说个不休。为了掩饰从反德的英俄帝国主义联盟转向反英的德俄同样性质的联盟，是需要这种良好气氛的！

不管这场战争是不是即将这样结束，或者俄国要战胜德国和更多地掠夺奥地利的野心再“保持”一个时候，不管单独讲和的谈判是不是狡猾的敲诈者的一种手腕（沙皇政府会拿现在的对德和约草案向英国说：请给几十亿卢布和作出某种让步或保证吧，否则我明天就在这个和约上签字了），——**不管怎样，假使**不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就不能**不用帝国主义和约来结束。除了后一种结局以外，帝国主义战争无论如何会使英国、德国和俄国这三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这个或那个国家靠侵略弱小国家（塞尔维亚、土

耳其、比利时等）而更加强大起来，并且完全可能，在战后这三个强盗都会更加强大，瓜分被掠夺的国家（殖民地、比利时、塞尔维亚、阿尔明尼亚），而它们所争吵的只是按什么比例来瓜分这份赃物。

不管怎样，不可避免的和不容置疑的是，无论是彻底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直接承认在这次战争中要“保卫祖国”的人，或者是隐蔽的不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宣传缔结一般的，“不分胜负”的“和约”的考茨基分子，都不免要受到愚弄，遭到侮辱。发动这次战争的上述国家的或同样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所缔结的任何和约，都会清楚地向各国人民表明，这些或那些社会主义者扮演了什么样的帝国主义奴才的角色。

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事实一定会表明，谁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看作是摆脱这场战争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出路，谁就是正确的。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谁把沙皇政府的失败和军事上的彻底破产看作“无论如何”都是害处最少的事情，谁就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历史在这场战争中也在前进；如果欧洲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不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摆脱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桎梏，那末只有在沙皇政府在军事上被彻底打垮因而没有任何可能实行半封建式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情况下，东欧和亚洲才能一日千里地向着民主制前进。

战争一定会击毁一切软弱无能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帝国主义和约会使这整软弱无能的东西更加明显，更加可耻，更加可恶。

（选自《列宁全集》第23卷
第124—132页）

列　宁

远方来信(摘录)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1917年3月7日〔20日〕)

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所引起的第一次革命已经爆发了。这第一次革命大概不会是最后一次革命。

这第一次革命即1917年3月1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所得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大概不会是我国革命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已经维持了许多世纪并且在1905—1907年这三年极其伟大的全民的阶级战斗中终于保持了下来的君主制度，竟在短短八天之内（这段日期是米留可夫先生在给俄国一切驻外使节的大吹大擂的电报中说的）就土崩瓦解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奇迹”呢？

奇迹在自然界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双方斗争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庸人们看来，有许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迹。

为了使沙皇君主制度不消几天的功夫就能土崩瓦解，曾经需要有许多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条件的配合。现在把其中几个主

要条件列举如下。

如果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进行了极其伟大的阶级战斗和表现了革命的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以内完成。第一次(1905年)革命深深地翻松了泥土，根除了世代相传的偏见，唤醒了数百万工人和数千万农民去参加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使俄国社会中**一切**阶级(以及一切主要政党)彼此表明了并且向全世界表明了它们真正的本质，表明了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行动方式以及它们的当前目的和将来目的的真正相互关系。第一次革命以及接着到来的反革命时期(1907—1914年)暴露了沙皇君主制度的全部实质，使它达到了"极限"，揭露了它的全部腐败和丑恶，揭露了以穷凶极恶的拉斯普庭[326]为首的沙皇朝廷狐群狗党的全部无耻行为和荒淫无度的生活，揭露了罗曼诺夫皇室这班恶棍用犹太人、工人和革命家的鲜血洒遍了全国的全部兽行，揭露了这些**占有几百万**俄亩土地的**地主**"首脑人物"为了保全自己**和自己阶级的**"神圣财产"而无恶不作、无罪不犯、任意荼毒公民的全部兽行。

如果没有1905—1907年的革命，没有1907—1914年的反革命，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境内其他民族中一切阶级的"自决"，这些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对沙皇君主制度所持态度的决定，就不可能象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八天内表现的那样明确。这八天的革命——如果可以这样譬喻的话——好象是经过十来次主要及次要预演后作的一次"表演"；各个"演员"对于彼此的面貌，对于自己所扮的角色，自己所站的位置以及自己所处的境遇，都极为熟悉，连一切政治倾向和行动手段上稍微有点意义的细微差别，都揣摩得非常透彻。

但是，如果说被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这班老爷及其走狗

们贬斥为“大叛乱”的1905年第一次大革命，在十二年后引起了1917年“灿烂的”“光荣的”革命，——它所以被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赞扬为“光荣的”革命，是因为它（暂时）给了他们政权，——那就必须知道这里还需要有一个巨大的、强有力的、万能的“导演”，他一方面能大大加速全世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能产生空前严重的全世界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除了异常加速全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外，当时还需要有全世界历史中发生的特别急剧的转折，使得遍体血污的罗曼诺夫帝制的车子碰到这样一次转折就一下子颠覆下去。

这个万能的“导演”，这个强有力的加速者，便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

现在说这次战争是全世界的战争，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因为美国和中国今天已经有一半卷入了这场战争，明天就会完全卷进去。

现在说这次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了。只有资本家及其走狗，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用一般批评性的定义，而是用大家熟悉的俄国政界人名来表示——就是一方面只有古契柯夫和李沃夫之流，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之流，另一方面只有格沃兹迭夫，波特列索夫，契恒凯里，克伦斯基，齐赫泽之流等等，才能否认或抹杀这个事实。无论德国或英法资产阶级，进行这次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为了扼杀弱小民族，为了确立对于世界的金融统治，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为了用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的手段来挽救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

帝国主义战争由于它的客观的必然性，不能不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不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

这一**转变过程**已由1917年的二三月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首先向我们表明，当时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的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俄国全体资产阶级和地主连同他们所有不自觉的走卒，再加上他们所有自觉的领导者，即英法两国的大使和资本家；另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在吸收兵士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苏维埃**。

有三个政治阵营，三个基本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十月党[327]-立宪民主党，跟着他们跑的有小资产阶级（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三个**基本**政治力量甚至在"第一阶段"的八天之内就把自己的面貌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甚至对于笔者这样一个离事变发生地点很远，只能看到外国报章所载简略电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在详细说明这点以前，我应该先回头说一说我这封信中论述头等重大因素，即论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那一部分。

战争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奴隶主们连结在一起了。**一团血污**——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情景。

在战争开始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如德国的大卫和谢德曼之流，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之流，老早就在拚命骂革命家的"幻想"，骂巴塞尔宣言[328]的"幻想"，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口号的"梦想性"了。他们百般颂扬，认为资本主义似乎表现出了力量、生命力和适应性，——正是**他们**这班人帮助过资本家在各国工人阶级中间培养"适应性"和驯服性，愚弄和分化各国工人阶级。

但是"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把战争

所引起的革命危机长期推延下去。这一危机正以不可遏止的力量在一切国家里日益增长起来，从正遭遇着“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用一位不久前访问过德国的观察家的话来说)的德国起，直至**饥荒也**已逼来而组织得远不及德国那样“高明”的英法两国止。

所以，在瓦解现象最严重而无产阶级最革命（其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的品质，而是因为它有“1905年”的生动传统)的沙俄境内，革命的危机自然就**最先**爆发出来了。这一危机又因俄国及其盟国遭到多次最严重的失败而加速到来。这种失败动摇了全部旧的政府机构和全部旧制度，引起了全国**所有各个**阶级对它的仇恨，激起了军队方面的愤怒，大批地消灭了具有因循守旧的贵族和腐败透顶的官吏性质的旧军官，而代之以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多半是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那些公然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或者是简直毫无气节的分子，曾经大吵大闹地反对“失败主义”，他们现在已经面临着一个事实，这就是最落后最野蛮的沙皇君主制度的失败同革命火焰的**开始**彼此有历史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战争初期的失败起过加速爆发的消极因素的作用，那末英法两国金融资本即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同俄国十月党及立宪民主党的资本势力的**联系**，就是通过直接**组织**反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阴谋活动**而加速了这一危机的因素。

对于事情的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英法报刊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而极力抹杀，德国报刊则幸灾乐祸地强调说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既不为前一交战的帝国主义者集团那些外交官和部长们的假仁假义的冠冕堂皇的外交谎言所惑，也不为后一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那些在金融和军事方面同前者竞争的人的嘻笑和挤眉弄眼的伎俩所迷。二三月革命的全部事变进程很明显地表明，英法两国使馆以及它们的走狗和“内线”，为了阻止

尼古拉二世（我们希望并且要设法使他成为末世）同威廉二世“单独”妥协和单独媾和，老早就在作疯狂的努力了，他们联合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一部分将军以及军队中特别是彼得堡卫戍部队中一部分军官，直接组织了以**撤换**尼古拉·罗曼诺夫为目的的阴谋活动。

我们决不要给自己制造幻想。我们决不要陷入某些人所犯的错误，这些人现在象一些动摇于格沃兹迭夫—波特列索夫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之间、动不动就堕入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的“组委会分子”[329]或“孟什维克”一样，准备歌颂工人党同立宪民主党“妥协”，歌颂前者“赞助”后者等等。这些人为了替他们自己那套陈旧的、背熟了的（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辩护，公然掩盖英法帝国主义者同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一起进行的阴谋活动，掩盖这一阴谋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主要打手”下台，另用几个比较强硬的、新鲜的、能干的**打手**来代替他。

革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和这样——从表面上看来，骤然看来——彻底地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汇合起来**、并且是十分“和衷共济地”汇合起来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两种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一方面是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他们曾推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一伙人去夺取政权，**以求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以求更疯狂更顽强地进行这个战争，以求**再摧残数百万**俄国工农，好使古契柯夫之流获得君士坦丁堡……使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使英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另一方面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城乡一切贫苦人民）争取**面包**、争取**和平**、争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深入的运动。

谁要是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赞助了”由英国钞票“缝成的”、犹如沙皇帝国主义一样丑恶的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帝国主义，

那简直是愚蠢可笑的。革命工人曾经毁坏、在颇大程度上已经毁坏了、并且将要彻底毁坏可恶的沙皇**君主制度**，至于在一个时间短促和情形特殊的历史关头，曾经有过布卡南、古契柯夫及米留可夫一流人为了把一个君主**换成另一个**也是从罗曼诺夫皇室中抬出来的**君主**所进行的斗争来**援助他们**，那是既不会使他们感到欢喜，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慌张的！

事情就是如此，并且也只是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害怕真理，善于冷静地权衡革命中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善于在估计任何"形势"时不只看到它今天的特性，而且看到它更深远的底蕴，看到俄国和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更深远的相互关系，他就应当如此并且也只会如此观察问题。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全俄其他各地的工人，为反对沙皇君主制度，为争取自由，为农民争取土地，**为和平**，为反对帝国主义大屠杀，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英法帝国主义资本势力，为继续进行和加强这种大屠杀，制造宫庭倾轧，勾结近卫军军官策划阴谋活动，怂恿并鼓励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暗中布置了一个**完全准备妥贴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在沙皇制度一受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初打击时就**夺得了政权**。

在这个新政府里，所有**真正重要的**位置、紧要的位置、决定性的位置，也就是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昨天还充当刽子手斯托雷平的帮凶的十月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330]的手里，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手里，而米留可夫及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坐在那里多半是为了装饰门面，为了充当招牌，为了发表甜蜜的教授式的演说，"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在这个政府里不过是当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

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统治着**我

国，并且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在1907—1914年反革命时期，最后——而且是用特别大的速度——在1914—1917年战争时期，已经在政治上非常迅速地组织起来，已经把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331]等等抓在自己的手里。到1917年，这个新阶级已经"几乎完全"**执掌了**政权；所以沙皇制度一受到打击就立即倾覆，为资产阶级扫清了地盘。帝国主义战争要求各种力量极度紧张化，结果就使落后的俄国的发展进程大大加速，使我们"一下子"（其实是**仿佛**一下子）**就赶上了**意大利和英国，并且几乎赶上了法国，获得了所谓"联合的"、"民族的"（即同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和愚弄人民相适应的）、"代议制的"政府。

从**这次**战争看来，这个政府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亿万资本的"英法""公司"的伙计，除这个政府以外，同时还产生了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城乡全体贫苦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正在努力联系兵士和农民以及农业工人，当然它更要特别努力地联系农业工人，首先联系农业工人，比联系农民更密切地联系农业工人。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沙皇君主制度被打垮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摧毁。

想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政府，即资产阶级的政府，其实是"英法"金融公司的一个伙计，它**不得不答应**给人民一些自由和小恩小惠，这种自由和小恩小惠是以不妨碍这个政府保持其统治人民的权力并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为限度的。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是全体贫苦的人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它在努力争取和平、面包和自由。

这三种力量间的斗争决定了目前的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形势。

第一第二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深刻的，暂时的，仅仅由一时的特殊情况引起的，即由帝国主义战争中事态的急剧转折引起的。整个新政府都是君主派，因为克伦斯基口头上的共和主义根本是不庄重的，是一个政治家所不齿的，客观上是玩弄政治手腕。新政府还没有彻底摧毁沙皇君主制度，就已经开始同罗曼诺夫地主王朝勾搭上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需要君主制度来作为官僚和军队的首脑，保护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特权。

谁在那里说什么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应该赞助新政府（这样说的显然有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和契恒凯里之流以及言语极为支吾的齐赫泽之流），那他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正是这个新政府已经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已经开始勾结（并没有询问过人民！）王朝，已经在为恢复沙皇君主制度而工作，已经在迎请新君候选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极，已经在设法为他巩固宝座，废除世袭的（依靠旧法规维持的）君主制而代之以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式的（用伪造的人民表决办法维持的）君主制。

不，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度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在口头上，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允诺，——那就不是工人应该赞助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赞助"工人！因为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的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巩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

意义和力量。

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都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阵营中的政客们自欺欺人之谈，都是骗人的把戏。

只要对建立工人武装这一事业给以帮助或至少是不加阻挠，——那末俄国的自由就不可战胜了，君主制度就无法复辟了，共和制度就有保证了。

不然，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度，**丝毫**也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也不会实现他们所允诺的“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如同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

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府，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和自由**，即使他们真心愿意这样做（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古契柯夫和李沃夫有诚意），也是办不到的。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因为它是主战的政府，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政府，是从事**掠夺**的政府，是想掠夺阿尔明尼亚、加里西亚和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重新侵占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边疆区等等的政府。这个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资本束缚住了手脚。俄国资本只是操纵**数千亿**卢布资本的名叫“英法”环球“公司”的一个分公司。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面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象德国那样给予人民“组织得非常高明的饥荒”。可是人民是不愿意忍饥挨饿的。人民会知道，并且大概很快就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必须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这个政府不可能给人民自由，因为它是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它**畏惧**人民，并且已经开始勾结罗曼诺夫王朝了。

关于我们最近对待这个政府的策略任务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谈。那里我们将指出，目前时期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口号，即“当前任务”应该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和全体人民的组织的奇迹，准备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取得胜利。**

现在，当我们只限于分析革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时，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同盟者**怎么样？

它有**两个**同盟者：第一个同盟者就是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千百万计的、广大的半无产者以及一部分小农群众。这些群众**需要**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这些群众必然会受资产阶级、特别是按生活条件来说同它最为接近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会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战争的残酷教训，这些将因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愈益残酷的教训，**必然**会把这些群众推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新制度下的相对自由，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用最大的努力首先启发和组织这些群众。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成立农业工人苏维埃，——这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农业工人单独成立自己的苏维埃，而且要使穷困贫

苦的农民离开富裕农民单独组织起来。关于现在所急需的这种组织工作的特殊任务和特殊形式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封信里去谈。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二个同盟者就是一切交战国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目前他们在颇大程度上受着战争的压制，而代表他们说话的往往是那些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格沃兹迭夫和波特列索夫一样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者。可是，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进行，无产阶级已在逐渐摆脱他们的影响，而俄国革命又必然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

拥有这两个同盟者的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可能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完全胜利，来代替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半君主制度，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与备受战争痛苦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尼·列宁

（选自《列宁选集》第3卷
第1—12页）

第四封信

如何争取缔结和约？（摘录）

（1917年3月12日〔25日〕）

沙皇政府发动和进行这场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是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是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它不得不拖延而且愿意拖延这种战争。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于向妓院鸨母宣传行善积德。

现在说明我们的看法。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

我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小册子（该小册子还在革命前就已寄给“帆”出版社，经该社采纳已发表在《年鉴》杂志[332]上）中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在《年鉴》上发表的上述小册子的第七章；因当时还存在着书报检查机关，所以小册子名为：弗·伊林《最新的资本主义》）①。

问题在于资本已经发展到了巨大的规模。为数不多的最大的资本家的联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握有几十亿资本并且相互瓜分全世界。整个地球已经瓜分完毕了。战争是由英法和德国这两个最强大的亿万富豪集团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引起的。

英法资本家集团想首先掠夺德国，夺取德国的殖民地（几乎已经全部夺到手），然后再侵占土耳其。

德国资本家集团则想把土耳其占为己有，并掠夺弱小的邻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来补偿它失去的殖民地。

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关于“解放”战争、“民族”战争、“争取权利和正义的战争”的种种谎言以及诸如此类的花招所掩盖的真相，资本家始终用这些东西来愚弄普通的老百姓。

俄国不是用自己的钱来打仗的。俄国资本家是英法资本家的帮凶。俄国是为了掠夺阿尔明尼亚、土耳其和加里西亚才进行战争的。

我国现任的部长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不是一时得宠的人。他们是整个地主资本家阶级的代表和领袖。他们受着资本的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9页。——编者注

利益的束缚。资本家不能放弃自己的利益，正象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其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受英法资本的束缚。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钱来打仗的。他们为了几十亿借款曾经答应每年付给几亿利息，而这份贡物是他们从俄国工人和农民身上榨取来的。

再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还受到同英、法、意、日以及其他资本家强盗集团所订立的旨在进行这场强盗战争的直接条约的束缚。这些条约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缔结的。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为了窃取政权，利用了工人反对沙皇君主政府的斗争，可是沙皇所缔结的条约他们却一概承认。

这就使整个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在自己的宣言（这项宣言已由“彼得堡电讯社”于3月7日（20日）拍电向国外报道）中说：“政府”（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忠实遵守使我国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的一切条约”。新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1917年3月5日（18日）拍给俄国驻在国外的全体代表的电文中，也作了同样的声明。

这些条约都是秘密的，米留可夫之流不愿意公布这些条约有两个原因：（1）他们害怕人民，因为人民不愿进行掠夺性的战争；（2）他们受英法资本的束缚，而英法资本要求严守条约秘密。但是每一个看报和研究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这些条约中说的不外是日本掠夺中国，俄国掠夺波斯、阿尔明尼亚、土耳其（特别是君士坦丁堡）和加里西亚，意大利掠夺阿尔巴尼亚，法国和英国掠夺土耳其和德国的殖民地，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

帝的意志”生活，慈爱待人，当左边吃了一记耳光时，就让人家再打他右边。地主和商人一面听说教，一面继续压迫和掠夺人民，并且对“神甫”能够很好地安慰“农夫”这一点感到非常高兴。

凡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善意地向资产阶级政府谈和平的人，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都起了完全一样的作用。资产阶级政府有时根本不听这种言论甚至禁止这种言论，有时则允许讲，并且随便许下种种诺言，说他们打仗无非是为了尽速缔结“最公正的”和约，有过错的只是对方。**向资产阶级**政府谈和平实际上是在**欺骗人民**。

为了瓜分土地、市场和租界而使地球染上鲜血的资本家集团，是**不能**缔结“光荣的”和约的。他们只会缔结可耻的和约，即**瓜分赃物、瓜分土耳其和殖民地**的和约。

此外，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根本不同意在目前缔结和约，因为**现在它能够得到的“赃物”“不过”**是阿尔明尼亚和加里西亚的一部分，可是它**还**想掠夺君士坦丁堡**甚至**从德国人手中夺回一直受沙皇政府最残酷最无耻的压迫的波兰。其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实质上只是英法资本家的走狗，英法资本家**除了**想保持住从德国夺来的殖民地**以外**，还想迫使德国归还比利时和法国的一部分。英法资本家帮助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废除尼古拉二世的皇位，是为了叫他们帮助自己“战胜”德国。

那怎么办呢？

为了争取缔结和约（更不用说争取缔结真正民主的、真正光荣的和约了），国家政权就应当归**工人和贫苦农民**，而不应当归地主资本家。地主资本家只占人口中的微不足道的少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资本家正在靠战争大发横财。

工人和贫苦农民占人口中的**极**大多数。他们并不靠战争发财，却因战争倾家荡产、忍饥挨饿。他们既不受资本的束缚，也不

受资本家强盗集团之间的条约的束缚；他们**能够**而且真诚地希望停止战争。

如果俄国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那末这种苏维埃和由它选举出来的**全俄苏维埃**一定会同意实现我们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在1915年10月13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为了摆脱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当时在日内瓦出版）第47号[①]上就已拟定的和平纲领。

这个和平纲领大概是这样的：

（1）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者暂时代替它的彼得堡苏维埃）立即声明，它**不受任何**条约的约束，**不管是**沙皇君主政府的条约**或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条约。

（2）它立即公布**所有**这些条约，**以便让**沙皇君主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强盗目的当众暴露。

（3）它立即公开建议**一切**交战国**马上缔结停战协定**。

（4）它立即向全体人民公布我们工人农民的**和平条件**：

解放**一切**殖民地；

解放**一切**附属民族、被压迫民族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

（5）它声明，决不等待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施予恩惠，而是建议各国工人推翻本国政府，把国家全部政权交给工人代表苏维埃。

（6）它声明，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进行这场罪恶的强盗战争所借的数十亿贷款，只能由**资本家老爷们自己**去偿还，工人和农民是**不承认**的。付给这笔贷款的利息，也就是要向资本家交纳许多年**贡款**，来感激他们曾经开恩让工人为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互相残杀。

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说：工人和农民们！你们能同意**每年付给**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6—368页。——编者注

资本家老爷们**几亿**卢布来奖励他们为瓜分非洲殖民地、土耳其等等而进行的战争吗？

在我看来，为了实现**这些**和平条件，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会同意**进行战争**来反对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因为这种战争是真正正义的战争，因为**一切**国家的**全体**工人和劳动人民**都会帮助这种战争**取得胜利。

德国工人现在看到，好战的俄国君主政府已被一个**好战的**共和国，一个想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且承认沙皇君主政府的强盗条约的资本家共和国所代替了。

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德国工人**能信任这种**共和国吗？

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过去和现在从对伟大的“1905 年”革命的生动回忆中吸取了教益的俄国人民一旦取得完全的自由并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工农代表苏维埃，那末，战争还能进行下去吗？资本家在地球上的统治还能保持下去吗？

尼·列宁

1917 年 3 月 12 日(25 日)于苏黎世

(选自《列宁全集》第 23 卷
第 342—347 页)

列　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摘录)

(1917年4月14—22日〔4月27日—5月5日〕)

8

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一

目前的战争，从两大交战国集团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了分赃、为了财政资本即银行资本获得有利的市场、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

俄国的政权从尼古拉二世手中转到古契柯夫、李沃夫等人的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从俄国方面来看战争的这种阶级性质和意义。

事实非常明显，新政府进行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即侵略的强盗战争，它不仅没有公布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正式承认了它们。新政府这样做，并没有征求人民的意见，显然他们是有意欺骗人民，因为大家知道，沙皇签订的这些秘密条约是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奥地利等等。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完全背弃国际主义，也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

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公债，不管这些公债的名称多么漂亮。

现在的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侵略别国和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是完全不能相信的。因为第一、同俄、英、法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维护其利益的资本家，只要他们还是资本家，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军火工业等等中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在这次战争中就不会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所谓的放弃兼并，完全是为了欺骗人民，1917 年 4 月 9 日米留可夫在莫斯科已经声明，新政府决不放弃兼并；第三、有克伦斯基部长参加的《人民事业报》① 揭露说，米留可夫甚至没有把他的放弃兼并的声明送到国外去。

因此，代表会议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必须把口头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严格区别开来，所谓真正的放弃兼并，就是立刻公布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和外交文件，立刻使遭受资产阶级（他们还在继续执行使我国人民蒙受耻辱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压迫的、被强迫并入俄国的、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

二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党（人民社会主义者、劳动团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政党（组织委员会、齐赫泽、策烈铁里等）以及大多数非党革命家，几乎都醉心于所谓的“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不肯公布秘密条约而用各种诺言和花言巧语来敷衍搪塞、欺骗人民群众的

① 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编者注

结果。

必须承认，“革命护国派”的广大群众是诚实的，他们**真正**不愿意兼并、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真正**希望**全体**交战国缔结一个非强制性的民主的和约。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靠全部或部分地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来维持生活的人）的阶级地位使得这些阶级对资本家的利润不感兴趣。

因此，代表会议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实际上，作这种让步就是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代表会议声明，只要俄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临时政府还只用暴力威胁人民（例如，古契柯夫发布了一个臭名昭彰的命令，要用惩罚来威胁自动撤换长官的士兵），只要资本家**还没有**用暴力来对付那些自由组织起来的、自由撤换和选举**一切**政权机关的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我们党就只进行反对一般暴力的宣传，纯粹用同志说服的方法反对“革命护国主义”的严重错误，并且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广大群众不自觉地轻信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死敌——资本家的政府，是目前俄国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

三

怎样才能尽量迅速地，不是以强制性的和约而是以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这场由资本家掀起的，使人类处于破产、饥饿、死亡边缘的罪恶强盗战争，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会议认为：

以为**任何一**国的士兵单方面拒绝继续作战，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简单地把“刺刀插在地上”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党应当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说明，战争是**各国政府**进行的，战争同一定阶级的政策总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

有签订真正民主的和约而不是强制性的和约，**只有**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真正不维护资本家利润、真正能够结束资本压榨的**阶级**，即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才能结束这场由尼古拉二世之类戴王冠的强盗和资本家这些不戴王冠的强盗所掀起的战争。

只有这个阶级才能**真正**放弃兼并，摆脱财政资本即银行资本的束缚，在一定条件下，不是口头上而是**真正地**把掠夺战争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变成不是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是使**全世界**工农摆脱资本奴役的解放战争。

代表会议再次抗议资本家对我党进行下流诬蔑，说我们主张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认为德国资本家同俄、英、法等国的资本家是一样的强盗，而德皇威廉和尼古拉二世以及英、意、罗等国的皇帝同样是戴王冠的强盗。我们不仅用俄文说明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在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合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①]的德译本中也用德文说明了这种观点。

此外，我党中央机关报的这两位编辑，曾于1915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②]第47号上代表我党声明：如果在战争时期革命使我党获得政权，那我们将立刻向德国和**全世界人民**公开提出缔结非强制性的民主的和约；

如果德英法等国资本家拒绝我们提出的和约，我们就自己进行革命战争，号召全世界工人同我们结成联盟[③]。

代表会议完全同意这项声明。

代表会议认为，现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交战国，都没有俄国这样自由，都没有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种革命的群众组织。

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这样**容易地和**这样和平**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1—285页。——编者注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的中央机关报。——编者注

③ 同上，第382页。——编者注

地把国家政权交给真正大多数的人民，即交给工人和贫农。

代表会议认为，军费的来源不应当是发行使资本家发财的公债，而应当是向资本家征收特别高的所得税和财产税。

代表会议认为，在有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自由的情况下，只要大多数人还不了解当前战争和资本家利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要尽快地中止各族人民的屠杀，就只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这就是在前线举行士兵联欢。

代表会议肯定，甚至完全捍卫资本家利益的《新时报》在4月12日自基辅发出的电讯中也已承认，前线士兵已经开始联欢。士兵代表向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报告的一系列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

俄德两国的士兵，即两国穿着军服的无产者和农民开始举行联欢了，他们向全世界表明，这些受资本家压迫的阶级的正确的敏感提示了中止各族人民屠杀的正确方法。

我们对联欢的体会是：第一、要印刷俄德两种文字的传单，在前线散发；第二、通过翻译人员在前线举行俄德两国士兵的群众大会，同时，不让资本家和大多属于资本家阶级的将领和军官阻挠群众大会，没有士兵直接的特别许可，不让他们参加大会。

在这种传单中和群众大会上应当说明上述对战争和和平的看法，应当指出，只要俄德两国的全部政权完全归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全人类立刻就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这会真正保证很快结束战争，保证各交战国能签订一个持久的真正民主的和约，从而保证世界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
第133—138页）

列　宁

乌　克　兰

（发表于1917年6月28日〔15日〕）

新的联合的临时政府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破产了。乌克兰中央拉达颁布并经全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1917年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乌克兰国家结构的“万有法令”，就直接了当地揭露了这一政策，确凿地证明了它的破产。

该法令宣布：“不脱离整个俄国，不同俄罗斯国家决裂，让乌克兰人民自己有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安排自己的生活……　确定乌克兰制度的一切法律，只有我们的乌克兰大会才有权颁布；确定整个俄罗斯国家领土上的制度的法律，应由全俄议会颁布。”

这些话说得非常明白。这些话极其确切地表明，乌克兰人民现在不愿意脱离俄国。他们要求自治权，但是丝毫没有否认“全俄议会”的必要性和最高权力。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人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有自由脱离俄国的**权利**：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有可能宣传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自由联盟，宣传两个民族**自愿**联合成一个国家。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实际地坚决彻底地同万恶的沙皇制度过去的一切决裂。万恶的沙皇过去采取**一切**手段使语言、居住地区、性格、历史十分相近的各族人民**互相疏远**，把大俄罗斯人变成乌克兰人民的刽子手，千方百计地使乌克兰人民仇视那不许乌克兰儿童使用和

学习本族语言的大俄罗斯人。

俄国革命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派，就必须同过去的一切决裂，必须使乌克兰工人和农民重新象兄弟一样信任自己，信任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权利**，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我们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反对“本国的”和一切国家的资本家。但是这个联盟必须是自愿的，俄国工人决不相信俄国资产阶级，也不相信乌克兰资产阶级，而主张现在就让乌克兰人有分离权；同时**不能硬要**他们**接受**自己的友谊，**要取得这种友谊**，就要平等相待，把他们看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和兄弟。

*　　*　　*

恶毒的半疯狂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报》，对乌克兰人，对他们“擅自”做出的决议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乌克兰人的行为”似乎“是公开的违法行为，应该立即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横蛮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这种攻击是最明显不过的了。打倒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自由乌克兰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同革命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自由联盟万岁！

（选自《列宁全集》第25卷
第76—77页）

列　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摘录)

(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摘录)

(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不少了。因此让我来宣读这个应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的宣言吧。

和平法令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中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公正的或民主的和平，即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式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最高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

全部条件，就毫不迟延地立即采取一切坚决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如果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如果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让它有权在合并国军队或任何较强民族的军队完全撤走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这个民族的国家形式问题，那末合并这个民族的行为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毫无例外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它决不认为上述和平条件是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其中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 1917 年 2 月到 10 月 25 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全部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的，是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的兼并的。

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书面联系、电报，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行这种谈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各中立国。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认为停战时期最好在三个月以上，以便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代表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完全可能结束，同时使各国最高人民代表会议完全可能召集起来最终批准和约条件。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的和平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333]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334]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为全世界工人树立了榜样。所有这一切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选自《列宁选集》第3卷
第354—356页）

列　宁

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摘录）

（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

记　录

列宁说，在讲到民族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俄国民族的成分是特别复杂的，在俄国大俄罗斯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而其余的多数人口则属于其他民族。在沙皇制度下，对其他民族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残酷和野蛮的，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对于那些甚至禁止使用本族语言、使人民群众目不识丁的人的这种仇恨，扩大到全体大俄罗斯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人认为，享有特权的大俄罗斯人只是想给自己保持尼古拉二世和克伦斯基给他们虔诚保持过的那种优越地位。

有人对我们说，俄国一定会被搞得四分五裂，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共和国，但是我们用不着害怕这一点。不论有多少独立共和国，我们都不怕。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划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以便同任何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作斗争。（热烈鼓掌）

如果芬兰资产阶级购买德国人的武器，来反对他们的工人，我们就建议芬兰工人同俄国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就让资产阶级为了国界进行卑鄙可怜的争吵和买卖吧，反正各国和各民族的工人是不会因为这个丑恶的原因分手的。（热烈鼓掌）

我现在用一个不好听的字眼来说，我们现在正在“征服”芬兰，但是不象国际资本家强盗所干的那样。我们是这样征服的：我们允许芬兰有同我们或其他国家缔结联盟的完全自由，保证完全支持一切民族的劳动人民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这种联盟不是以条约，而是以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团结为基础的。

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我们说我们绝对赞成乌克兰人民有完全的和无限制的自由。我们应当摧毁旧的、血腥的、肮脏的过去，那时资本家压迫者的俄国充当了屠杀其他各族人民的刽子手。我们一定要扫除这种过去的遗迹，我们一定要彻底消灭这种过去的遗迹。（热烈鼓掌）

我们对乌克兰人说，你们乌克兰人可以按照你们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我们则要向乌克兰工人伸出兄弟之手，并且对他们说，我们将同你们一起为反对你们的和我们的资产阶级而奋斗。只有各国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联盟才会消灭民族迫害和民族纠纷的一切根源。（热烈鼓掌）

（选自《列宁全集》第26卷
第321—323页）

列　宁

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1920 年 3 月 1 日）

四年战争过去了，一千万人打死了，二千万人残废了，现在帝国主义者自己问起了自己：这次战争究竟为了什么？——照着这样的问题来问，人们有了很有趣的发现。不久以前，法国公布了 1916 年进行的谈判。远在 1916 年，奥皇就同法国开始了和平谈判，但法国对这一点秘而不宣。自称社会主义者并且当时担任部长职务的阿尔伯·托马那时候来到了俄国，答应把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西亚给尼古拉二世。现在这一切都被揭露出来了。这些材料已由法国报纸刊登出来。现在法国工人质问阿尔伯·托马："你说你参加内阁是为了保卫法兰西祖国和法国工人的利益，可是 1916 年奥皇建议媾和的时候，你阿尔伯·托马却不把这个建议讲出来，使得几百万人为了法国资本家发财致富牺牲了生命。"真相的揭露还没有结束。我们揭露真相的时候，首先是公布秘密条约，使全世界看到，让几百万人牺牲生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尼古拉二世能得到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西亚。这一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知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知道，要说他们不知道，要说他们过去没有好好研究过政治和外交以致不知道法国报纸上现在登载的材料，那除非他们是十足的白痴。现在，事情的揭露正逐步深入，而且会一直继续下去。由于这个缘故，各国

的工人农民愈来愈觉察出事情的真相，并开始弄清楚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什么。因此，他们越来越相信我们过去说的是真的，而叫他们去保卫祖国的帝国主义者过去对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造成了奇迹：军力弱小的我们把英国法国的兵士夺取过来了。现在，这已不是预见而是事实了。诚然，我们是用空前的痛苦换得这个胜利的，我们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牺牲。两年来我们经受着空前的饥饿痛苦，特别是我们同出产粮食的东部和南部隔绝的时候，饥饿的侵袭更加厉害。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不只是我们国家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胜利。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竟不能反对军事力量弱小的苏维埃共和国，这种情况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迹呢？因为我们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这个革命将是艰苦的，几百万人会牺牲生命，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各国的劳动群众将会拥护我们，我们坚持的真理将揭穿一切谎言，获得越来越多的胜利。

自从列强进攻俄国失败以后，他们又试用了另一种武器。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有着几百年的经验，是可以更换自己不可靠的武器的。以前他们派自己的军队镇压和扼杀俄国。现在他们试图依靠我们边疆上的国家来扼杀俄国。

沙皇政府和地主资本家扼杀了拉脱维亚、芬兰等许多边疆民族。他们在这些地方的世世代代的压迫激起了仇恨。“大俄罗斯人”这个名词成了所有这些浸在血泊中的民族最憎恨的名词。因此，协约国派自己的军队进攻布尔什维克失败以后，就把赌注押在这些小国的身上：让我们试试靠他们来扼杀苏维埃俄国吧！

丘吉尔同尼古拉·罗曼诺夫实行着一样的政策，他光想打仗并且正在打仗，对议会根本不理睬。他曾经吹牛，说要率领十四个国家进攻俄国（这是1919年的事了），9月拿下彼得格勒，12月占

领莫斯科。牛皮吹得太过火了。他只想到在这些小国里人人都恨俄国，却忘了这些小国的人民清楚地知道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都是何许人物。有一个时候，只差几星期这些白卫将军就要完全胜利了。在尤登尼奇发动攻势、逼近彼得格勒的时候，英国最富有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我亲自读了这篇社论），用半央告半命令的口吻对芬兰提出要求说：去帮尤登尼奇的忙吧，全世界都望着你们，你们要拯救全世界的自由、文明和文化，要去反对布尔什维克。这是英国对芬兰说的话。要知道，整个芬兰都在英国的口袋里，它负债累累，不敢回嘴，因为没有英国，不出一星期就会断粮。

请看，协约国就是这样要求所有这些小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但它们两次都失败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是一点不假的，连敌人也认为它比其他一切国家的还更真诚；是因为许多国家都暗地里认为，不管它们怎样仇恨大俄罗斯扼杀它们，但它们知道，扼杀它们的是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前芬兰白卫政府首脑并没有忘记，1917年11月他亲自从我手中拿到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上面，我们用坚定的笔调写着我们无条件承认芬兰的独立。[335]

当时这好象只是装给人看的。有人以为芬兰工人的起义会使人们忘记这件事。不会的，既然某一个政党的全部政策都能作为证明，人们就不会忘记。甚至芬兰的资产阶级政府也说："让我们来推断一下，因为我们在俄国沙皇压迫我们的一百五十年中毕竟学会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那就是说，我们要帮助扶植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他们是些什么人呢？难道我们不知道吗？难道他们不就是曾经扼杀芬兰、拉脱维亚、波兰和其他许多民族的沙皇将军吗？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敌人去反对布尔什维克吗？不，我们要等一等。"

他们不敢公开拒绝，因为他们是依赖协约国的。他们并不直接帮助我们，他们等待，拖延，写照会，派代表团，成立委员会，坐下来开会，一直开到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协约国在第二次战役中被打败为止。结果我们成了胜利者。

这些小国已经得到了几亿美元，得到了优良的大炮、武器，还有富有作战经验的英国教官。假若它们都来反对我们，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遭到失败。每一个人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没有这样作，因为他们承认布尔什维克是十分诚恳的。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承认任何民族的独立，说沙皇俄国建筑在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上，说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曾赞成而且现在和将来也不会赞成这种政策，说布尔什维克永远不会为了压迫别人而进行战争，——当布尔什维克这样说的时候，人们都相信他们的话。这一点我们不是从拉脱维亚或波兰的布尔什维克那里知道的，而是从波兰、拉脱维亚、乌克兰等国的资产阶级那里知道的。

（选自《列宁全集》第 30 卷
第 352—356 页）

列　宁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摘录)

(1921年12月23—28日)

1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1921年1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摘录)

谁只要象政治家那样稍微理智地周密地考虑一下，谁就会说，在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向国内原有的以及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作出这样的让步和牺牲。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象我们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象我们这样明确地向大家说明：旧俄国，沙皇俄国，军阀俄国对俄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态度是罪恶的、不能容忍的，它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愤怒和抗议是完全应该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政府能够这样公开地承认这种情况，能够进行这种反沙文主义的宣传，承认旧俄国即沙皇俄国和克伦斯基俄国的罪恶，反对俄国使用暴力并吞其他民族。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简单明了的政治事实，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完全不容争论的。任何民族只要不对我们进行阴谋活动以束缚这些民族并对它们进行帝国主义的奴役，只要它们不变成进攻我们的跳板，我们是不拘泥于什么形式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革命者。(鼓掌)但是有些事实确凿而雄辩地证明，在战胜了孟

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俄国，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最小的民族，不管它多么弱小，都绝对可以而且应当放心：我们对它除了和平的愿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打算；我们将继续加强宣传，说明旧政府旧政策的罪恶；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牺牲和让步为代价，无论如何要同过去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现在不愿同我们在一起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我们这种愿望仍旧是坚定不移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证明了。不管四面八方对我们咒骂得多么厉害，我们还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向全俄工农代表大会，向俄国全体千百万工农群众说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今后的和平，我们要把和平保卫住，即使要作很大的让步和牺牲也在所不惜。

（选自《列宁全集》第33卷
第121—122页）

列　宁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给政治局的便笺

（1922 年 10 月 6 日）

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在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要**绝对**坚持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

绝对坚持！

你们的　**列　宁**

对！

约·斯大林

（选自《列宁全集》第 33 卷
第 334 页）

斯 大 林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摘录）

（发表于1901年11月、12月）

二（摘录）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了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唯利是图的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关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地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庶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

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各种教派的千百万信徒，他们不愿依照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明白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末俄国的暴政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明白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它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它们的时候，它们简直不敢想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有学识的人。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17—18页）

斯 大 林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摘录）

（发表于 1904 年 9 月 1 日）

一（摘录）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

俄国无产阶级早就谈到斗争了。大家知道，任何斗争的目的都是要取得胜利。但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

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经常阻挠无产者的团结事业。它用强盗手段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和机关。专制制度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民权利，从各方面压制他们，口蜜腹剑地在他们中间散播猜忌和仇视，挑起他们的流血冲突。这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离间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加强他们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民族壁垒，从而更加顺利地分裂无产者队伍，更加顺利地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小的民族集团，以便扼杀工人的阶级觉悟，破坏工人的阶级团结。

俄国反动势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国专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显，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一定要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事实果然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怎样打破耸立在各民族间的民族壁垒，应该怎样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呢？

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就是如此。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30—31页）

斯 大 林

各民族友爱万岁！

（1905 年 2 月 13 日）

公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正在发展，民族间的壁垒正在崩溃！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正在团结成一支各民族的大军，无产阶级运动的许多细流正在汇合成一条总的革命洪流。这条洪流的浪潮日益高涨，日益猛烈地冲击着沙皇的宝座。腐朽的沙皇政府摇摇欲坠了。无论监狱、苦役或绞架，都阻止不住无产阶级的运动。这个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了！

沙皇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宝座，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它煽动俄国各民族互相敌视，它唆使俄国各民族互相残杀，它力求把无产阶级总的运动分裂成一些零星的运动并使其**互相对抗**，它组织蹂躏犹太人、阿尔明尼亚人的暴行，如此等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用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来离间俄国各民族，削弱它们，然后毫不费力地把它们一一征服！

分而治之，——这就是沙皇政府的政策。沙皇政府在俄国各个城市是这样干的（请回顾一下哥美里、基什涅夫及其他城市的蹂躏行为），在高加索也是这样干的。下贱的东西！它力求用公民的鲜血和尸体去巩固它那可恶的宝座！巴库城内濒于死亡的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呻吟，妻子、母亲和孩儿的眼泪，诚实而尚未觉悟的公民的无辜鲜血，手无寸铁、死里逃生的人们的惊惶神色，被毁坏的家园，被劫掠一空的商店和不绝于耳的可怕的枪声，——这

就是屠杀诚实公民的刽子手沙皇用以巩固他那宝座的东西。

是的，公民们！是他们这帮沙皇政府的走卒唆使一部分还没有觉悟的鞑靼人去残杀和平的阿尔明尼亚人！是他们这帮沙皇政府的走狗把枪枝和子弹发给鞑靼人，叫警察和哥萨克穿上鞑靼服去残杀阿尔明尼亚人！这帮沙皇的奴才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造这次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他们的野蛮目的毕竟达到了。罪该万死的沙皇政府！

现在，可鄙的沙皇手下这帮可鄙的奴仆又竭力要在我们梯弗里斯挑起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他们要你们流血，他们想分裂你们，统治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呀！阿尔明尼亚人、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你们要携起手来，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政府企图分裂你们，你们就一致回答它：打倒沙皇政府！各族人民友爱万岁！

大家携起手来，联合起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团结在这个真正能把巴库惨案的唯一祸首沙皇政府葬入坟墓的力量的周围。

你们应当一致高呼：

消灭民族纠纷！

打倒沙皇政府！

各族人民友爱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71—73页）

斯 大 林

告公民书。红旗万岁！

（1905 年 2 月 15 日）

大希望变成了大失望！不是民族敌视，而是互相友爱，互相信任！不是兄弟间的自相残杀，而是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这个制造蹂躏行为的祸首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沙皇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它毕竟没有挑起梯弗里斯各民族的互相残杀！……

沙皇政府早已在竭力唆使无产者自相残杀，早已在竭力分裂总的无产阶级运动。所以它在哥美里、基什涅夫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蹂躏少数民族的暴行。为了同一目的，它又在巴库挑起了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现在，沙皇政府又把视线投向梯弗里斯来了。它想在这里，在高加索的中心演出一出流血的惨剧，然后再搬到各地去重演！它唆使高加索各民族互相残杀，使高加索无产阶级淹没在自己的血泊里。多妙呵！沙皇政府洋洋得意了。它甚至散发传单，号召屠杀阿尔明尼亚人！它满以为成功在望。谁知在二月十三日那天，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和俄罗斯人，好象偏要和沙皇政府作对，集合在万克教堂院子里发誓要“在反对离间我们的魔鬼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充分表现了万众一心的气概。有些人发表演说，号召“团结”，群众报以掌声。我们的传单散发了三千份。群众争先恐后地抢着阅读。群众的情绪高昂起来了。他们简直有意和政府为难，决定次日还在这个教堂院子

里集合，以便再次“宣誓互相亲爱”。

二月十四日。教堂的整个院子和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散发和阅读我们的传单，都是完全公开的。民众成群结队地讨论着传单的内容。有些人发表演说。群情高昂，当即决定：举行游行示威，从锡安教堂和回教寺院近旁经过，在途中“宣誓互相亲爱”，直到波斯墓场停下，再作一次宣誓，然后解散。群众立刻实行自己的决议。在途中，在回教寺院附近和波斯墓场上，都有人发表演说并散发我们的传单（这天总共散发了一万二千份）。群众情绪越来越高。蓄积的革命精力正在奔放。群众又决定通过总督府大街及戈洛文大街继续游行示威，然后解散。我们委员会利用机会立刻组织了一个小小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由一个先进工人率领，位置在队伍的中心，于是一面临时制成的红旗就在总督府前飘扬起来了。由示威者抬起来的旗手发表了富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演说。他首先请同志们不要因旗帜上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而惶惑。示威者回答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口号已经牢记在我们心里了！”然后旗手说明红旗的意义，用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批评先前发言的人，揭露他们言论的不彻底，指出消灭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必要并号召示威群众在社会民主党红旗下进行斗争。“红旗万岁！”群众回答说。示威群众向万克教堂行进，途中停留三次并听旗手演说。旗手再次号召示威群众和沙皇制度作斗争，并请大家宣誓：要象现在参加游行示威一样，万众一心地举行起义。“我们宣誓！”群众回答说。以后，示威群众到达万克教堂近旁，同哥萨克发生了小小的冲突，然后就解散了。

“梯弗里斯八千公民大示威”的情形就是如此。

梯弗里斯公民就这样回答了沙皇政府的伪善政策。他们为了讨还巴库公民的血债，就这样对万恶的政府实行了报复。光荣和荣誉归于梯弗里斯公民！

梯弗里斯数千公民集合在红旗下，几次宣判沙皇政府的死刑；面临着这种情形，万恶的沙皇政府的那帮万恶的奴才不得不实行退却，放弃了这次蹂躏少数民族的暴行。

可是，公民们，这是不是说沙皇政府今后再不设法组织这种暴行呢？绝对不是！只要沙皇政府存在一天，它愈失去立足之地，它就要愈频繁地对少数民族采取蹂躏行为。根绝**这种暴行**的唯一方法就是消灭沙皇专制制度。

公民们，你们珍重你们自己和你们亲人的生命吗？你们爱护你们的亲戚朋友，而不愿遭受蹂躏吗？如果这样，那你们就要知道，只有消灭沙皇制度，才能消灭一切蹂躏行为和随之而来的流血惨剧！

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就是你们首先应该达到的目的！

公民们，你们想消灭**任何**民族敌视吗？你们想求得各族人民的完全团结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你们就要知道，只有消灭不平等现象，只有铲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一切民族纠纷！

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就是你们最后应该达到的目的！

可是，有谁能把卑鄙龌龊的沙皇制度连根铲除，有谁能使你们永不遭受蹂躏呢？只有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

有谁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有谁能使地球上的各民族团结一致呢？也只有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为你们争得自由与和平。

那末，你们就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站到社会民主党旗帜下面来吧！

公民们，站到红旗下面来吧！

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民主共和国万岁！

打倒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万岁！

红旗万岁！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75—78页）

斯 大 林

反动加紧起来了

（发表于 1905 年 10 月 15 日）

乌云在我们头上密布着。衰朽的专制制度正在抬头，用“火和剑”武装自己。反动势力出动了！再别对我们讲那一套为巩固卑鄙的专制制度而实行的沙皇“改革”了，所谓“改革”，不过是残暴的沙皇政府用以掩饰它那慷慨款待我们的枪弹和皮鞭的一种伪装罢了。

有一个时候，政府避免在国内制造流血惨案。当时它正和“外敌”作战，需要“国内安定”。所以它对“内敌”采取了某种“放任”态度，对于如火如荼的运动“佯作不知”。

现在的时候已经不同了。慑于革命魔影的沙皇政府，为了聚集力量并“彻底地”镇压“内敌”，急忙和“外敌”日本签订了和约。于是反动开始了。早在这以前，沙皇政府就在《莫斯科新闻》上暴露了自己的“计划”。这个反动报纸写道：政府……“不得不同时进行两个战争……对外战争和对内战争。它之所以没有用足够的力量进行这两个战争……部分地是由于一个战争妨碍了另一个战争…… 如果远东的战争现在结束……”那末政府“……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以便不用任何谈判来制服……内敌……而胜利结束对内战争……”“对外战争一结束，俄国（应读作：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将集中在国内生活上，而且会以戡乱为主。”（见 8 月 18 日《莫斯科新闻》）

沙皇政府和日本签订和约时的“计划”就是如此。

后来，和约刚一签订，沙皇政府便通过它的一位大臣又把这套“计划”重述了一遍。那位大臣说：“我们要把俄国的过激党派都淹没在血泊里。”沙皇政府已通过自己的总督和督办在实行上述“计划”。无怪乎它把俄国变成了军营，无怪乎它把哥萨克和兵士密布在运动的中心地区，并把机枪对准无产阶级，——可以认为政府预备再度征服辽阔广大的俄国！

可见政府正向革命宣战，而首先打击的对象就是革命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我们应当这样去了解沙皇政府对“过激党派”所施的威胁。当然，农民如果“不大知趣”，竟要求享受人的生活，政府也不会“委屈”他们，一定会慷慨地用皮鞭和枪弹款待他们。不过在目前，政府还是竭力欺骗他们：允诺给他们土地，邀请他们参加杜马，答应将来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自由”。

至于“洁净的人士”，政府对他们当然会“客气一点”，并设法和他们结成联盟。其实国家杜马的存在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用说，自由资产者先生们是不会拒绝“协议”的。还在八月五日，他们就通过自己的领袖声明说，他们对沙皇的改革欢喜若狂：“……必须竭力使俄国……不致走上法国的革命道路。”（见8月5日《俄罗斯新闻》[336]所载维诺格拉多夫的论文）不用说，狡猾的自由派宁可叛变革命也不背弃尼古拉第二。他们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句话，沙皇政府正在竭尽全力要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

以枪弹对付无产阶级，以虚伪的诺言欺骗农民，以“权利”笼络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反动势力用以武装自己的手段。

不是自己死亡，就是粉碎革命，——这就是今天专制政府的口号。

另一方面，革命势力也没有打瞌睡，而是在继续创造自己的伟

大事业。由于战争而更加尖锐的危机和日益频繁的政治罢工，惊醒了整个俄国无产阶级，使它和沙皇专制制度直接对立起来。军事戒严不但没有吓倒无产阶级，反而火上加油，使局面更加恶化了。谁要是听过无产者无数次的高呼“打倒沙皇政府，打倒沙皇杜马！”，谁要是仔细听过工人阶级的脉搏，谁就不会怀疑：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领袖的革命精神必将日益旺盛起来。至于农民，军事动员早已激起了他们反对现存制度，因为军事动员夺去了他们家中最好的劳动力，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如果再注意到还有涨漫了二十六省的饥荒，那就不难了解灾难深重的农民将会走上什么道路。末了，士兵也开始发出怨言，这种怨言对于专制制度日益具有威胁性。专制制度的支柱哥萨克开始引起士兵的仇视：不久以前，在新亚历山大里亚，士兵们打死打伤了三百名哥萨克①。这样的事件正在逐渐增加……

一句话，实际生活在酝酿着新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正在逐渐高涨并向反动势力冲去。莫斯科和彼得堡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就是这个浪潮的先声。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些事件，应当做些什么呢？

如果听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话，我们就应当立即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以便永远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照他的意见，在进行合法杜马选举的同时，还应当进行不合法的选举。应当在各地成立选举委员会来号召“居民用普遍投票办法选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应当在一定的时候聚集在一个城市里开会，并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消灭专制制度的过程就应当是”这样的②。换句话说，尽管专制制度仍然存在，我们还是可以在全俄实行普选！尽

① 见《无产者报》第17期。

② 见《无产者报》第15期，那里引用了马尔托夫的“计划”。

管专制制度仍然猖獗，“不合法的”人民代表还是可以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并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说，既不需要武装，又不需要起义，也不需要临时政府，只要“不合法的”代表们宣布自己是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的！不过善良的马尔托夫忘记了，这种异想天开的“立宪会议”必有一天会落到彼得巴甫洛堡大狱[337]里去的！住在日内瓦的马尔托夫不懂得：俄国的实际工作者是没有工夫玩资产阶级那套无聊把戏的。

不，我们想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凶恶的反动派在集结黑暗势力并竭力想把它们联合起来；而我们的任务则是集结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并把它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凶恶的反动派在召开杜马，它想找到新的同盟者，扩大反革命的队伍；而我们的任务是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向全世界揭穿它的反革命面目，扩大革命拥护者的队伍。

凶恶的反动派在向革命进行致命的攻击，它想使我们的队伍惊惶失措，想葬送人民革命；而我们的任务则是紧密团结，在全国各地同时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攻击，永远根除沙皇专制制度。

我们需要的不是马尔托夫的纸房子，而是总起义。

只有人民自己的胜利起义才能拯救人民。

不是自己死亡，就是革命胜利，——这应当是我们今天的革命口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155—159页）

斯大林

国际反革命

（发表于1906年7月14日）

目前的俄国在许多方面都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相类似。这种类似一方面表现在：俄国也象当时的法国一样，反革命势力在扩大，并且越出了本国的范围，同其他国家的反革命结成联盟，——反革命逐渐具有国际性了。在法国，旧政府曾经同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结成联盟，请了他们的军队去援助，并向人民革命发动了进攻。现在在俄国，旧政府和德奥两国的皇帝结成联盟，想请他们的军队来援助并把人民革命淹没在血泊中。

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流行着一种传闻，说“俄国”和“德国”正在进行秘密谈判（见《北方土地报》[338] 第三期）。此后传闻愈来愈厉害。现在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黑帮的《俄国报》[339] 竟公开宣称：革命分子是造成“俄国”（即反革命）目前困难情况的罪人。该报说：“德意志帝国政府充分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它已采取了一系列适当的措施，而这些措施一定会产生圆满的结果。”原来这些措施就是“奥国”和“德国”准备在俄国革命一旦有所进展时便派兵援助“俄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达成协议，并且确认“在一定情况下，为镇压或限制革命运动而积极干涉俄国内政，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措施……”

《俄国报》就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国际的反革命早就在大事准备。谁都知道，它早就用金钱援助反革命的俄国来反对革命。但它并不以此为限。现在

它竟决定出兵来援助了。

既然如此，解散杜马的真正意图，也象斯托雷平“新”命令[340]的意图和特列坡夫[341]“旧”暴行的意图一样，连小孩子也容易懂得了……既然如此，大概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天真幼稚的人所抱的幻想就会消失了，大概他们终究会相信：我们这里并没有“宪制”，我们这里在进行内战，因而斗争也应当按军事方式来进行……

可是目前的俄国在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法国相类似。当时国际的反革命使革命扩大起来，革命越出了法国的范围，象汹涌的洪流泛滥于欧洲各国。欧洲“戴皇冠的人们”既然结成总联盟，欧洲的人民自然也就携起手来了。我们今天在俄国也看到同样的情形。“田鼠挖得好呀”……俄国反革命和欧洲反革命联成一气，不断使革命扩大，使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并给国际革命奠定基础。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着**民主主义**革命，伸出兄弟的手去和将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大家知道，随着一月九日的发动，在欧洲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十二月的发动引起了德国和法国的游行示威。毫无疑义，必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发动一定会更坚决地推动欧洲无产阶级起来斗争。国际反革命只会使国际革命更加巩固，更加深入，更加强大，并使它的基础更加稳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将获得真正的体现。

好吧，先生们，你们干吧！随着正在扩大的俄国革命到来的将是欧洲革命，那时……那时，不仅农奴制度残余的丧钟，就连你们所喜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也要响起来了。

是的，反革命先生们，你们“挖得好呀”。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
第227—229页）

斯 大 林

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

（1913 年 1 月 9 日）

同志们！

1 月 9 日这个浸透了我们数百工人弟兄鲜血的日子又来到了。1905 年 1 月 9 日，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枪杀了我们的和平的、手无寸铁的工人弟兄，因为他们到他那里去请求改善生活。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在这漫长的八年中，除了有过昙花一现的自由以外，我们的国家一直受着沙皇和地主的蹂躏和折磨！

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在俄国，工人常因和平罢工而遭到枪杀，连纳发生的事件[342]就是例子。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千千万万的农民被弄得饥饿不堪，1911 年的情形就是例子。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在沙皇的监狱里，人民的优秀儿女受着拷打和侮辱，被弄得大批自杀，不久以前在库托马尔、阿尔加契等地发生的事情[343]就是例子。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陆海军士兵为农民要求土地、为全体人民要求自由，常被沙皇的法庭判处枪毙，不久以前枪毙十七名黑海水兵[344]的事情就是例子。这是地主拥戴的全俄专制皇帝尼古拉·罗曼诺夫在行使他的“天赐”皇权——正教行政总署里披着法衣的恶棍们以及黑帮分子普利什凯维奇和赫沃斯托夫之流所祝福的皇权。

罗曼诺夫君主制依旧紧紧扼住俄国的脖子，今年它还打算庆

祝血腥统治我国的三百周年。

但是，俄国已经不是那个在罗曼诺夫皇朝压迫下长年忍气吞声、任人宰割的驯服的俄国了。首先是领导着一切争取自由的战士——我们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们现在不是以弯腰曲背、受尽屈辱的奴隶的样子，而是以昂首阔步、结成大军的战士的姿态来迎接1913年的1月9日了。我们的战士感觉到并了解到人民的俄国又觉醒了，反革命的冰层被打碎了，人民运动的江河重新奔流起来了，"新战士的队伍在跟着我们前进了"……

八年！经过的时间虽不长，经历的苦难却不少……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三届国家杜马。头两届杜马中自由派虽占多数，但从那里却响亮地发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呼声，因此沙皇遵照黑帮地主们的意志把这两届杜马解散了。第三届杜马本身就是黑帮杜马，五年来它和沙皇的狐群狗党串通一气，力图更残酷地奴役并压迫农民、工人，奴役并压迫整个人民俄国。

在反革命猖獗的岁月中，工人阶级忍受了最深重的苦难。1907年，旧制度的势力暂时压下了群众的革命运动，从那时起，工人一直呻吟在双重的压迫下。沙皇匪帮比谁都更残酷地向工人进行报复。资本家也向他们大举进攻。厂主们利用政治的反动，得寸进尺地把工人费了这么多的气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争得的一切都夺去了。老板们用同盟歇业的手段，在宪兵和警察的保护下延长工作日，减低工资，恢复工厂的各种旧制度。

工人咬紧牙关默不作声。1908年和1909年是黑帮分子对自己的胜利最得意和工人运动最消沉的年头。但到1910年的夏天，工人的罢工就开始复活了。1911年底，有几万工人提出积极抗议，反对被陷害而判刑的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继续服苦役[345]。

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是以1907年11月22日因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被判处苦役而举行的罢工来结束的。1911年底，群

众性的工人运动又为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这些先进的战士们、这些工人阶级的英雄们(现在他们的事业正由第四届杜马的工人代表们继承着)的命运而重新**活跃起来了**。

随着政治斗争的活跃而来的是工人经济斗争的活跃。政治罢工造成经济罢工,反过来,经济罢工也造成政治罢工。工人运动象汹涌的洪流,后浪逐前浪地冲向沙皇君主制和资本独裁的堡垒。觉醒起来追求新生活的工人阶层日益扩大。投身于新斗争的群众日益增多。连纳惨案所引起的罢工、五一节的罢工、抗议剥夺工人选举权的罢工和抗议处死黑海水兵的罢工吸引了大约一百万人来参加。这是革命的罢工,罢工的旗帜上写着:"打倒罗曼诺夫君主制,打倒整个陈旧的、腐朽的、扼杀俄国的地主制度!"

工人的革命运动在扩大着,发展着。工人阶级开始唤醒其他人民阶层去作新的斗争。一切正直的人、一切渴望较好生活的人都开始抗议沙皇的狐群狗党的暴行了。甚至资产阶级也在抱怨,甚至它也不满意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专横独霸的统治了。

六三政制并没有使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安定下来。反革命年代表明,只要罗曼诺夫君主制还完整,只要地主统治还保全,俄国就没有自由生活。

新的革命在高涨,在这个革命中,工人阶级又将负起整个解放大军的领袖的光荣使命。

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仍旧写着三个原来的要求,为了这些要求,工人们曾有过那么大的牺牲,流过那么多的鲜血。

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农民无偿地没收地主、沙皇和教堂的全部土地!

为全体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现代的俄国,围绕着这些要求曾经进行过并且进行着斗争。在不久以前连纳罢工的日子里,工人提出过这些要求。1月9日,

工人阶级又要提出这些要求。

1912年1月9日，彼得堡、里加、尼古拉也夫的工人曾试图用罢工和游行示威来表示纪念。1913年1月9日，我们要在**全俄国**各地都这样做。1905年1月9日在工人的血泊中诞生了俄国第一次革命。让1913年的开始成为俄国**第二次**革命的开端吧。罗曼诺夫皇朝准备在1913年庆祝自己的三百周年，他们还打算长久地骑在俄国的背上。让我们在1913年1月9日对这帮强盗说：

够了！打倒罗曼诺夫君主制！民主共和国万岁！

同志们！凡是有俄国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地方，都不要让1913年1月9日毫无表示地过去。我们要以到处集会，以决议、以群众大会、如果那里有可能，就以

一天的罢工和

游行示威

来纪念这个日子。

这一天我们要追念在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我们追悼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这一天使全俄国到处都响彻着我们原来的要求：

建立民主共和国！

没收地主土地！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准备一月九日的抗议吧！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
第263—267页》

斯 大 林

我们在东部的任务(摘录)

(发表于1919年3月2日)

俄国东部的居民在成分上不象中部各省那样单纯，使社会主义建设易于进行，在文化上也不象西部和南部边疆地区那样成熟，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而顺利地具有相应的民族形式。东部各边疆地区同西部南部边疆地区以及俄国中部不同，这里有鞑靼人和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和乌兹别克人，土尔克明人和塔吉克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学上的集团（约有三千万人），民族成分非常复杂，文化落后，他们不是还没有脱离中世纪，就是不久以前才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这种情况无疑地给苏维埃政权在完成东部的任务方面造成了障碍和一些困难。

除了纯粹属于内部生活性质的障碍，还有一种可以说是外来的"历史"性质的障碍。我们指的是沙皇政府的旨在扼杀东部各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以东部各边疆地区主人自居的俄罗斯商人的贪得无厌，以及不择手段地极力把各伊斯兰教民族拉入正教怀抱的俄罗斯神甫的阴险政策。这些情况给东部各民族造成了不信任和仇恨俄罗斯的一切的心理。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
第210页)

斯 大 林

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摘录）

（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

但是，宣布某一种苏维埃自治的形式，颁布相应的法令和决议，甚至建立边疆地区的政府即自治共和国的区域人民委员会，都还远不足以巩固边疆地区和中部之间的联盟。要巩固这种联盟，首先必须消灭沙皇政府的野蛮政策留给边疆地区的遗产——疏远和闭塞，宗法制度和文化落后，对中部的不信任。沙皇政府故意在边疆地区培植宗法式的封建压迫，以使群众永被奴役，愚昧无知。沙皇政府故意把边疆地区的好地方塞满殖民分子，把当地各民族的群众挤到坏地方去而加深民族纠纷。沙皇政府限制而且有时干脆取消当地的学校、剧院和教育机关，以使群众愚昧无知。沙皇政府压制当地居民中的优秀人士的一切主动性。最后，沙皇政府扼杀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极性。沙皇政府的这一切办法在当地各民族群众中间造成了对俄罗斯的一切的极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有时变成敌视态度。要巩固俄国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的联盟，就必须消灭这种不信任，就必须造成互相谅解和友好信任的气氛。而要消灭不信任，首先就必须帮助边疆地区人民群众摆脱宗法式封建压迫的残余，必须废除（真正废除，而不只是口头上废除）殖民分子的种种特权，必须使人民群众享受到革命的物质福利。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6页）

斯 大 林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摘录)

(提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
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发表于1921年2月10日)

三 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摘录)

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非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柯尔克兹人、乌兹别克人、土尔克明人、塔吉克人、阿捷尔拜疆人、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克里木的鞑靼人、布哈拉人、希瓦人、巴什基里亚人、阿尔明尼亚人、彻岑人、卡巴尔达人、沃舍梯人、切尔克斯人、英谷什人、卡拉恰也夫人、巴尔卡尔人①、卡尔梅克人、卡列里亚人、阿瓦里亚人、达尔根人、卡集·库穆赫人、库林人、库梅克人②、马里人、楚瓦什人、沃加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等)约有六千五百万。

沙皇政府,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民族的政策是:铲除它们中间任何国家制度的萌芽,摧残它们的文化,限制它们的语言,使它们愚昧无知,尽量使它们俄罗斯化。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这些民族不能充分发展并造成了它们政治上的落后。

① 后面七个部族统称为"山民"。

② 后面五个部族统称为"达格斯坦人"。

现在，当这些地区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已经被推翻，人民群众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党的任务就是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群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

（甲）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他们民族面貌的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乙）在他们那里设立使用本族语言的、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经济和政权机关；

（丙）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

二、在六千五百万非大俄罗斯人口中，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经过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乌克兰、白俄罗斯、阿捷尔拜疆的一小部分和阿尔明尼亚以外，剩下的约二千五百万主要是突厥语系人口（土尔克斯坦、阿捷尔拜疆大部分、达格斯坦、山民、鞑靼人、巴什基里亚人、柯尔克兹人等），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无产阶级，多半还保存着游牧经济和父权制氏族生活方式（柯尔克兹、巴什基里亚、北高加索），或者还没有脱离半父权半封建的原始生活方式（阿捷尔拜疆、克里木等），但是已被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总轨道。

党对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任务（除第一点所指出的以外），就是帮助他们消灭父权制封建关系的残余，并且以劳动农民苏维埃为基础，通过在这些民族中间建立坚强的共产党组织的办法帮助他们参加苏维埃经济建设，这些共产党组织要能够利用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苏维埃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同时要能够在自己的建设工作中估计到每个民族的具体经济状况、阶级结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一切特点，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只适用于另一种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俄国中部的经济措施。

三、在二千五百万主要是突厥语系人口中，除了阿捷尔拜疆、

土尔克斯坦大部分、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和克里木的）、布哈拉、希瓦、达格斯坦、一部分山民（卡巴尔达人、切尔克斯人、巴尔卡尔人）和其他某些已经定居并固定在一定地域的民族以外，剩下的约六百万是柯尔克兹人、巴什基里亚人、彻岑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他们的土地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移民的殖民对象，这些俄罗斯移民夺去了他们较好的耕地，一步步地把他们排挤到贫瘠的荒地上去。

沙皇政府，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就是在这些地区的俄罗斯农民和哥萨克中间培植更多的富农分子，把他们变成满足大国野心的可靠支柱。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柯尔克兹人、巴什基里亚人）被排挤到穷乡僻壤而逐渐死亡。

党对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任务（除了第一点和第二点所说的以外），就是把他们和当地俄罗斯居民中的劳动群众为摆脱富农、特别是为摆脱掠夺成性的大俄罗斯富农的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力量联合起来，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帮助他们打倒富农殖民者，从而保证他们有可耕的、为过人的生活所必需的土地。

四、除了上述那些具有一定阶级结构和占有一定地域的民族和部族以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还有一些流动的民族集团和少数民族（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波兰人、犹太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它们掺杂在其他聚居的民族中，多半没有一定的阶级结构，也没有一定的地域。沙皇政府的政策就是采用一切手段，直到采用蹂躏的手段（蹂躏犹太人）来消灭这些少数民族。

现在，当民族特权已经消灭，民族平权已经实现，少数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已为苏维埃制度性质本身所保证的时候，党对这些民族集团的劳动群众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充分利用这个给他们保证了的自由发展的权利。

五、边疆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阻碍了党在这些地区的正常成长。一方面，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党员是在“统治”民族存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压迫，往往缩小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者完全不重视民族特点，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考虑某一民族的阶级结构、文化、生活习惯和过去历史的特点，因而把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庸俗化和歪曲了。这种情况就使他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另一方面，当地土著居民中的共产党员经历过民族压迫的苦难时期，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民族压迫的魔影，往往夸大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抹杀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或者把某一民族劳动者的利益和这一民族“全民族的”利益简单地混淆起来，不善于把前者同后者区别开来，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也就使他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具有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的形式(在东方)。

代表大会坚决斥责了这两种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害的和危险的倾向，认为必须指出第一种倾向即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倾向是特别危险和特别有害的。代表大会提醒大家，不铲除党的队伍中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残余，就不可能在边疆地区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把当地居民和俄罗斯居民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团结在自己队伍中的坚强的、联系群众的、真正的共产党组织。因此，代表大会认为，消除共产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首先是殖民主义的动摇，是党在边疆地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
第20—24页）

斯 大 林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摘录)

(提交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
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

(发表于1923年3月24日)

一(摘录)

七、但是找到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还不能说是完全地彻底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还不能说这一解决已经完全具体而实际地实现了。要正确实现十月革命所提出的民族纲领，还必须克服过去民族压迫时期遗留给我们的那些障碍，这些障碍在短时期内是不能一下子铲除掉的。

第一、这种遗产是大国沙文主义残余，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这种残余还存在于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头脑中，盘踞在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里，它们得到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日益猖獗的"新"路标转换派[346]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潮的支援。这种残余在实践中的表现是俄罗斯苏维埃官僚对各民族共和国的需要和要求采取傲慢轻视态度和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态度。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毅然决然地消灭这种残余，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巩固的国家，各民族的合作才能成为真正兄弟般的合作。因此，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作坚决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一项任务。

第二、这种遗产是共和国联盟各民族在事实上即在经济上和

文化上的不平等。十月革命所获得的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是各民族的伟大胜利，但是这种平等本身不能解决整个民族问题。许多共和国和民族没有经过或者几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因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能充分享用民族权利平等给它们的权利和可能，它们得不到外来的真正而长期的帮助，就不能提高到高级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产生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民族的历史，也在于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政策，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力图使边疆地区变成受工业发达的中部地区剥削的纯原料产地。在短时期内铲除这种不平等现象，在一两年内消灭这种遗产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就已指出："消灭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求我们同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实行奴役的一切残余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铲除掉。而且只有通过俄罗斯无产阶级给予联盟各落后民族真正的长期的帮助，使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繁荣起来，才能把它铲除掉。不这样，就没有理由指望在统一的联盟国家范围内建立各民族的正确的巩固的合作。因此，为消灭各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斗争，为提高各落后民族的文化和经济水平而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二项任务。

最后，这种遗产是许多民族中间的民族主义残余，这些民族曾经受过沉重的民族压迫，还没有摆脱过去的民族耻辱感。民族之间的某种疏远和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罗斯人采取的措施的不完全信任，就是这种残余的实际表现。但是，在某些有几个民族的共和国内，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往往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成这些共和国内较强大的民族反对弱小民族的顽固的沙文主义。反对阿尔明尼亚人、沃舍梯人、阿札里人和阿布哈兹人的格鲁吉亚沙文主义（在格鲁吉亚）；反对阿尔明尼亚人的阿捷尔拜疆沙文主义（在

阿捷尔拜疆)；反对土尔克明人和柯尔克兹人的乌兹别克沙文主义(在布哈拉和花剌子模)，——这种种形式的沙文主义是一种极大的祸害，它们因受新经济政策和竞争的条件的激励而日益猖獗，有使某些民族共和国变成争吵和纠纷的舞台的危险。不用说，所有这些现象都阻碍着各民族真正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联盟的事业。既然民族主义残余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那末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坚决斗争就是铲除民族主义残余的最可靠的手段。既然这种残余在变成反对各个共和国的弱小民族集团的地方沙文主义，那末同这种残余作直接斗争就是党员的义务。因此，同民族主义残余首先是同这种残余的沙文主义形式作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三项任务。

八、中央和地方很大一部分苏维埃官僚不是把共和国联盟看做旨在保证各民族共和国自由发展的各平等国家单位的联盟，而是把它看做取消这些共和国的一个步骤，看做成立所谓"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的开端，这一事实应当认为是旧遗产的鲜明表现之一。代表大会斥责了这种看法，认为它是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同时号召党员密切注意，不要让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苏维埃官僚利用各共和国的联合和各人民委员部的合并来掩盖他们忽视各民族共和国经济和文化需要的企图。各人民委员部的合并是对苏维埃机关的考验：如果这一实验在实践中产生了大国主义倾向，那末党就不得不采取最坚决的办法来反对这种歪曲，甚至提出撤销某些人民委员部的合并问题，直到苏维埃机关经过适当的改造，能够用真正无产阶级和真正兄弟般的精神注意小民族和落后民族的需要和要求为止。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
第153—155页)

斯 大 林

论列宁主义基础(摘录)

(发表于1924年4—5月)

一 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摘录)

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

因为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

其次，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这不仅是说它任凭外国资本自由进口活动，让外国资本操纵俄国国民经济中象燃料和冶金业这样一些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而且是说它能拿出千百万士兵去供西方帝国主义者使用。请回想一下一千四百万俄国军队为了保证英法资本家极高的利润而在帝国主义战线上流血牺牲的事实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仅是帝国主义在东欧的看门狗，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它从巴黎和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得到借款，而从人民身上榨取几亿卢布来缴付利息。

最后，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等等勾当中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大战是沙皇政府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的呢？谁不知道，俄国是这次战争的重要角色呢？

正因为如此，沙皇制度的利益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终于融合为统一的帝国主义的利益。

西方帝国主义会不会不竭尽全力拚命反对俄国革命以维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甘心丧失象旧时沙皇资产阶级俄国这样一个东方强大的支柱，这样一个富有人力物力的来源呢？当然不会！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谁想打击沙皇制度，谁也就必然要动手打击帝国主义；谁起义反对沙皇制度，谁也就必须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谁要是真想不仅打破沙皇制度，而且彻底铲除沙皇制度，那末他推翻沙皇制度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这样，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起来，并且一定要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

而且当时在俄国又掀起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俄国的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这样的革命决不会半途而废，它一胜利就一定要举起反帝国主义的起义旗帜，继续前进，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正因为如此，俄国当时一定要成为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不仅因为这些矛盾正是在俄国带有特别丑恶和特别不堪的性质而最容易暴露出来，也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把西方财政资本和东方殖民地联结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柱，而且

因为当时仅仅在俄国才有能够用革命方法来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现实力量。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俄国革命不能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它不能不在一开始发展时就具有国际性质，因而也就不能不震撼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
第67—69页）

斯 大 林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录)

(1927 年 3 月 1 日)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对东方附属国和殖民地人民所实行的友好政策包含着我方的某些让步，因而我们要负担若干费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任何别的政策，不仅从原则上来看，而且从对外政策的费用上来看，都是我们所不能采取的。在原则上，我们除了友好政策以外，不能实行别的政策，这一点是由粉碎帝国主义枷锁而树立起自己威力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产生的。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从对外政策的费用上来看看。大家知道，我国在东方与中国、阿富汗、波斯、土耳其接壤的国境线，长达数千俄里。在这条国境线上，目前我们只驻有极少的军队，这些军队和交界国居民的关系是友好的，正因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实行友好政策，我们才能在保卫边疆方面减少大量开支。

但是，假定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不是友好的而是敌对的，象俄国专制时代那样，那我们就不得不在这条国境线上驻扎几个全副武装的军团，并在远东停泊许多军舰，象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在这条国境线上驻扎几个军团和相当数量的舰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年要在这些军团和舰队上花费人民好几亿卢布。这也是一种东方政策。但这是一切可能的政策中最

不合算最浪费和最危险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一切可能的东方政策中我们的东方政策在原则上是最正确的，在政治效果上是最可靠的，并且是最经济的政策。

不用说这种政策在东方不仅保证了我们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持久和平，而且保证了我们与日本之间的持久和平。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9 卷
第 156—157 页）

斯 大 林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摘录)

(1930年6月27日)

三 党(摘录)

二、党内事务的领导问题(摘录)

(乙) 如果我们不谈谈党内在**民族问题**方面所存在的倾向,那末我们就不能看出党内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的全貌。我指的第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第二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不象"左"倾或右倾那样明显和顽固。可以把它们叫做爬行的倾向。但这还不是说它们不存在。不,它们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所以不容怀疑,是因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普遍气氛,不能不使在党内有着反映的民族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尖锐起来。因此必须揭穿和暴露这两种倾向的真面目。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什么呢?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机关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

这类倾向分子在这方面所持的出发点是:既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各民族应该融合成一体,而它们的民族语言则应该变

成统一的共同语言，那末现在已经是消灭民族差别和放弃支持以前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时候了。

在这方面，他们还引证列宁的话，不正确地引用列宁的话，有时简直是歪曲和诬蔑列宁。

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民族的利益必将融合成一个整体，——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撤销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列宁在 1913 年同崩得分子争论时说过，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消灭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

列宁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压迫和民族壁垒是会消灭的，——由此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是废除照顾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特点的政策转而采取同化政策来维护……国际主义的时候了吗？

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民族问题上的这种倾向尤其因为它是戴上国际主义假面具并以列宁的名字做掩蔽的，所以是一种最精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第一、列宁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差别应该消失，而各民族的语言应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列宁说过一些与此完全相反的话，他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①（《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46 页）

忘记了列宁的这个基本指示，怎么还能引证列宁的话呢？

不错，有一位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叛徒和改良主义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者的考茨基先生武断地说过和列宁教导我们的完全相反的话。他反对列宁的意见，断言如果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奥联邦获得胜利，那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德语并使捷克人**德意志化**，因为"单是挣脱了束缚的交换的力量，单是德意志人所带去的现代文化的力量，就能不用任何强制的德意志化而**使落后的捷克小资产者、农民和无产者变成德意志人，因为他们这种没落的民族已经不能给予他们任何东西**"（见《革命和反革命》德文版序言）。

显然，这种"观念"是和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吻合的。一九二五年我在东方民族大学的讲话[347]中就曾经驳斥过考茨基的这种看法。但是，一个肆意妄为的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对于我们愿意彻底做国际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难道还能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谁对呢，是考茨基还是列宁？

如果是考茨基对，那末为什么象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这样比较落后的民族，虽然和大俄罗斯人的关系要比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并没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的胜利而俄罗斯化，相反地，却作为独立的民族复兴和发展起来了呢？为什么象土尔克明人、柯尔克兹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用说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等等）这样的民族，虽然他们落后，但是他们非但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而俄罗斯化，相反地，却复兴和发展成独立的民族了呢？我们可敬的倾向分子为了追求表面的国际主义而落入了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魔掌，这不是很明显吗？他们主张在**一个**国家内即在苏联一国内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实质上是力图恢复先前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即**大俄罗斯**语言的**特权**，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哪里是国际主义呢？

第二、列宁从来没有说过，消灭民族压迫和把各民族的利益融

合成一个整体就等于消灭民族差别。我们消灭了民族压迫。我们消灭了民族特权并确立了民族平等权利。我们消除了苏联各民族间旧意义上的国界，即界碑和关税壁垒。我们确立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但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把民族差别即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等消灭了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民族差别即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还存在，那末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的要求就是一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反动要求，这不是很明显吗？我们的倾向分子是否了解，现在取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这就是使苏联各族千百万人民群众不可能使用**本族**语言受教育，使他们不可能有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机关，使他们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我们的倾向分子为了追求表面的国际主义而落入了反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魔掌，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对苏联各族人民，无论是大俄罗斯人或非大俄罗斯人都同样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文化革命口号，这不是很明显吗？

第三、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口号是反动的口号。恰恰相反，列宁向来主张**帮助**苏联各族人民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正是在列宁而不是在别的什么人的领导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拟定并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 “党的任务在于：**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人民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甲）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于这些民族的民族生活习惯条件的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乙）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族语言的、并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和政权机关；（丙）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

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丁）广泛地建立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

列宁完完全全拥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民族文化的口号，这不是很明显吗？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族文化口号，就是否认苏联境内非大俄罗斯各族人民发展文化的必要性，否认各该族人民受普遍义务教育的必要性，而让各该族人民去受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奴役，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列宁确实曾经认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反动的口号。但是难道还能有别的看法吗？

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呢？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民族主义的毒素来毒化群众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文化呢？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

如果不背离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把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呢？

列宁反对资产阶级制度下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时，打击的是民族文化的资产阶级**内容**，而不是它的民族形式，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以为列宁把社会主义文化看做是一种**无民族性的**即没有某种民族形式的文化，那就愚蠢了。崩得分子有一个时候确实曾经把这种荒谬见解硬加在列宁身上。但从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列宁严厉地抗议过这种诬蔑，断然和这种荒谬见解划清了界限。难道我们可敬的倾向分子真的要步崩得分子的后尘吗？

既如上述，我们的倾向分子的论据还剩下什么呢？

除了玩弄国际主义旗帜和诬蔑列宁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

倾向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就是民族文化瓦解和消灭的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实际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各民族本身并不是普通的“现代”民族，而是**社会主义**民族，它们的民族文化按内容说也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社会主义**文化。

看来他们不懂得，随着使用本族语言的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施行和巩固，民族文化必将**更加有力地**发展起来。他们不懂得，只有在发展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使各落后民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他们不懂得，列宁的**帮助**和**支持**苏联各族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的基础正在于此。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我们主张各民族的文化在将来**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文化，而同时又主张在目前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要**繁荣**民族文化。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应该让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繁荣起来，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以便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创造条件。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繁荣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是**为了**当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它们能融合成一种有共同语言的共同的社会主义（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文化，——列宁关于民族文化问题的提法的辩证性正在于此。

有人会说，这样提问题是“矛盾的”。但是，我们在国家问题上

难道不也是有这样的“矛盾”吗？我们主张国家的消灭。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或者拿列宁关于直到分离的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提法来说吧。列宁有时把民族自决这一论题表述为一个简单公式：“为联合而分离”。你们想一想吧：为联合而分离。简直会觉得这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这个“矛盾的”公式却反映着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生活中的真理，这个真理使布尔什维克能够攻克民族问题方面最难攻下的堡垒。

关于民族文化的公式也必须这样说：在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繁荣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消亡并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一种共同的语言）准备条件。

谁不懂得我国过渡时期的这种特殊性和“矛盾性”，谁不懂得历史过程的这种辩证法，谁就根本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的倾向分子糟糕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懂得而且也不愿意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情形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这种倾向反映着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民族中的垂死阶级想恢复自己已经丧失的种种特权的意图。

由此就产生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险，这是党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主要危险。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第314—321页）

注　释

1 *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的官方报纸*——指《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该报是1619—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德国报纸，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王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涅谢尔罗迭给俄国驻德国各邦大使的通告载于1848年7月28日该报第210号。——见第1页

2 *卡里斯宣言*——指1813年3月13(25)日在卡里斯城发表的《告德国人书》。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鼓动德国人起来反对拿破仑，并"允诺"给德国人自由和独立以笼络人心。——见第2页

3 *"先生们，准备马吧！"*——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得到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向出席宫廷舞会的军官们叫道："先生们，准备马吧！法国宣布共和啦！"准备去镇压革命，再一次扮演国际宪兵的可耻角色。——见第3页

4 指在三月革命时期逃往英国的普鲁士亲王。——见第4页

5 即1772年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前的波兰疆界。——见第4页

6 指执行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于1848年4月8日递交丹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声明，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作战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公国，而只是为了反对"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见第4页

7 *1847年的诏书*——指1847年2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开联合议会的诏书，其中援引了普鲁士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颁布的关于等级代议制的法令。国王把召开联合议会（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说成是实现以前许下的立宪诺言。——见第5页

8 *1791年的宪法*——1791年的波兰宪法反映了波兰小贵族中进步人士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意向。这个宪法废除了自由否决权（议会的决议案

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和自由选举国王的制度，规定政府向议会负责，并给予城市资产阶级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些旨在反对大贵族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的措施，巩固了中央政权。1791 年的宪法由于承认地主和农民之间所签订的赎卖契约具有约束力，而使农奴制关系客观上稍微缓和了。——见第 9 页

9 《东方日报》（*«Zeitung des Osten»*）——是 1849 年在波兹南出版的民主派的日报，出版者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波兹南民族委员会的委员弗·斯蒂凡斯基。——见第 15 页

10 见《六月十五日的妥协会议》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92—93 页。这篇文章中指出："沙皇会拯救德国革命，因为他促使德国革命力量集中起来"。——见第 16 页

11 君合国——即两个国家由同一君主统治，但两国的内政外交各自独立。——见第 21 页

12 黑黄军队——指奥皇的军队，因为他们的士兵的领章、衣领和折袖都是黑黄两色的，所以称为"黑黄军队"。——见第 23 页

13 "这把它门户上的钥匙"——这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侵略性的语言。1808 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跟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把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称为俄国门户上的钥匙。——见第 25 页

14 在东方问题上这出新戏的外交序幕——指 1849 年 8 月 25 日俄国沙皇送交土耳其一个照会，要求引渡参加过 1830—1831 年起义、1849 年曾在匈牙利革命军中服务过的四个波兰革命者。照会的语气非常粗暴，是命令式的，甚至表示，尼古拉不惜为此一战。英法两国政府向俄国提出劝告，希望停止对土耳其的压迫，同时英国的大战舰驶向达达尼尔海峡，逼近土耳其领海。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一世只得罢休。——见第 25 页

15 圣让得阿克和圣万得拉——圣让得阿克，墨西哥委拉克路斯的城堡，是墨西哥独立战争时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堡，1825 年光复。圣万得拉，叙利亚的城堡，1831—1833 年埃及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于 1832 年被埃及军队占领。——见第 26 页

16 《通报》——全称是《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政府的机关报，1789 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报。——见第 28 页

17 **提尔西特和约**——指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缔结之前，1807年6月25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会晤于提尔西特，靠牺牲昨日的盟国同拿破仑达成瓜分欧洲大陆的协议：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一世。7月7日和9日分别签订了法俄、法普提尔西特和约。根据和约，沙皇承认法国对欧洲政治地图所作的全部变动，同意支持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同意沙皇从瑞典夺取芬兰，从奥斯曼帝国夺取多瑙河两公国等地。和约的条款对普鲁士极为苛刻。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全部土地，将普鲁士从第二、三次瓜分波兰所得土地组成拿破仑势力下的华沙大公国，将别洛斯托克地区割给俄国，普军被限制在四万二千人，并向法国交付巨额赔款。列宁指出这个条约对普鲁士来说是最大的侮辱。——见第29页

18 **西欧革命运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镇压下去**——指以俄国沙皇为头子的国际反动组织神圣同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对意大利和西班牙革命的武装镇压。1820年10月在特劳波（奥帕瓦）开幕，1821年5月在来巴赫（柳布梁纳）闭幕的一次神圣同盟会议，公开宣布了神圣同盟有权干涉他国内政以维持当地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原则。来巴赫会议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支持下通过决议，由奥地利军队镇压意大利境内的皮蒙特和那不勒斯的革命。1822年10月，神圣同盟在维罗那召开会议，讨论镇压西班牙革命问题。会议通过了由法国出兵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的决议。根据秘密协定，允许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国西境组织十万至十五万人的神圣同盟的后备军。结果西欧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了。——见第29页

19 **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矛盾由于1839—1841年土耳其和埃及重新开战而加剧。1839年土军开进了在1831—1833年第一次土埃战争中被埃及占领的叙利亚，但被法国支持的埃及再次打败。英法争夺埃及的矛盾，随着法国势力的加强而愈趋激化。1833年俄国乘土耳其在第一次土埃战争中失利的机会，假借援助为名，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强加于土耳其。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必须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即"不得在任何借口下允许任何一艘外国军舰进入该海峡"，而俄国舰队则可以自由出入。这一规定大大侵害了其他西方列强、特别是海洋霸主英国的军事、经济利益，从而加剧了俄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尤其

是英俄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关于俄土建立“防御”同盟的条款，使俄国有可能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干预土埃冲突。西方列强为了对抗俄国，1839 年 7 月 27 日向土耳其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声称所有各大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这样，到 1840 年，土埃冲突上升到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使它们几乎卷入一场大战。——见第 29 页

20 **欧洲正统主义**——所谓“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在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则的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度。所有维也纳条约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见第 29 页

21 **平庸的米尔米东人**（贝朗热这样称呼他们）——法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热在《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Les mirmidons ou les funérailles d'Achille»）这首歌曲中，以隐喻的方式描绘了猥琐低能的复辟时期的法国君主和欧洲的其他一些正统主义的拥护者。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个双关语：les mirmidons——米尔米东人，是传说中希腊境内的南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该部落的战士曾在特洛伊战争中在阿基里斯统率下作战；mirmidon 也有矮胖、侏儒的意思，借用指猥琐、无能的人。——见第 30 页

22 **库列夫查战役**——库列夫查在保加利亚境内。这次战役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进程中，发生在 1829 年 5 月 30 日，结果土耳其军队被打败。土耳其军队在 1529 年和 1683 年曾两次围攻维也纳，都没有成功。1683 年波兰国王杨·萨比斯基的军队打退了入侵的土耳其军队，解救了奥地利的京城。——见第 30 页

23 **阿富汗战争以及信德和旁遮普被征服**——1838—1842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是英国继 1837 年与俄国争夺赫拉特之后对阿富汗进行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以英国的失败告终。

1843 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在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主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乘机于 1843 年迫使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后又把它并入英属印度。

英国在 1845—1846 年、1848—1849年和锡克教徒战争的结果占领

了旁遮普（北印度）。锡克教是十六世纪旁遮普的一个教派，它的平等教义成了十七世纪末农民起义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者的指导思想。以后锡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层分子，其代表人物领导了十九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邻近一些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1845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教显贵中的叛变分子，挑起了和锡克教徒的冲突，1846年使锡克教徒国家变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藩属。1848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1849年被完全征服。旁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见第33页

24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于伦敦创办的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见第34页

25 米兰起义——1853年2月6日在意大利的米兰发动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的统治。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马克思指出：**“米兰起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欧洲大陆革命危机逼近的信号”**。有关米兰起义的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93—594、599—603、624—625页。——见第36页

26 希腊起义——1821年春天爆发的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希腊人民在欧洲进步力量的支援下，利用了欧洲列强的矛盾，经过英勇奋战，于1829年赢得了独立。——见第37页

27 法纳尔人——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西北角法纳尔区有钱有势的希腊人，他们大部分是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贵族的后裔，他们依仗原有的政治联系和包税、经商获得的钱财，在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机构中高居要职。——见第37页

28 塞尔维亚的起义——1804—1813年，塞尔维亚人民举行了反对土耳其封建统治的民族大起义，赶走了土耳其压迫者。土耳其苏丹于1813年出兵重新占领了塞尔维亚。1815年塞尔维亚人民再次举行了起义，1830年土耳其苏丹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俄国乘塞尔维亚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机会，打着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号进行投机，以达到夺取巴尔干霸权的目的。——见第38页

29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这次会战是1827年10月20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俄英法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会战结果，土埃舰队被歼灭。——见第39页

30 约翰王的 *Magna Charta*——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反对王权集中的大封建主向英王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于1215年6月15日由约翰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的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利，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的利益作了某些照顾，但宪章没有给基本群众即农奴以任何权利。——见第39页

31 匈牙利流亡者——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在土耳其。俄国和奥地利政府向土耳其提出引渡匈牙利流亡者，土耳其政府拒绝了俄国和奥地利的要求。西方列强为了阻止俄国的影响在近东和中欧扩大，决定对俄国施加压力。英国政府向达达尼尔海峡派出了自己的舰队。尼古拉一世不得不放弃关于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让土耳其政府将流亡者驱逐出境了事。——见第40页

32 阿德里安堡条约——1828年俄国向土耳其发动战争，迫使土耳其于1829年9月缔结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夺得了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一部分土地。该条约还要求土耳其履行1828年10月俄国强加给土耳其的阿克尔曼条约的所有条款。土耳其必须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两公国实际上被俄国所统辖。——见第42页

33 两次战争——指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战争。这两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1812年）和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见第42页

34 亚尼纳的帕沙阿利——是巴尔干半岛西南地区的统治者（他以亚尼纳为首府，辖地包括伊皮罗斯、阿尔巴尼亚、南马其顿等地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同土耳其苏丹处于公开交战状态，他对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行动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带有封建分立主义的性质，终于在1822年失败。——见第42页

35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本文的最后，编辑部加了如下一段话："现在，想对欧洲的人民事业有所帮助的人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促进土耳其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尊重法律，发扬向往自由和独立的本能。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前途都有赖于此。要想丰收，在耕耘和播种上所花费的任何劳力都不能认为是多余的。"——见第46页

36 **圣地问题已经做了有利于俄国的解决**——即关于所谓"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巴勒斯坦)的基督圣地——的管辖权问题。俄国要求保护正教教会的特权，法国支持天主教徒。双方都利用这一纠纷争夺近东霸权。土耳其政府起初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1853年5月4日因受到俄国的压力，又被迫同意特别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相应的苏丹敕令是一个月以后颁布的)。——见第47页

37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法国的资产阶级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在巴黎创刊。——见第47页

38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俄国通过1768—1774年战争，打败土耳其，迫使土耳其于1774年7月21日(俄历10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夺取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伯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夺取了阿速夫、刻赤和叶尼卡列。俄国又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以后兼并克里木准备了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土耳其苏丹政府允许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保护基督教教会、代表多瑙河两公国发言等权利。从此俄国借此条约更加紧侵略巴尔干。——见第47页

39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一家最大的保守派日报；1785年创刊于伦敦。——见第50页

40 **《奥格斯堡报》**——指《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年创刊，从1810到1882年底在奥格斯堡出版。——见第53页

41 **《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罗斯帝国》**——1853年出版的爱·斐·波蒙-瓦西著作的第6卷，这部著作的名称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各国历史》，1843—1853年巴黎版，共6卷(«Histoire des États européens depuis le Congrès de Vienne», t. 1—6, Paris, 1843—1853)。第6卷的标题是《俄罗斯帝国》(«Empire Russe»)。马克思引用的话见该卷第346—347页。——见第54页

42 **乌尔卡尔特先生出版了一个论述丹麦继承权的小册子**——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这本小册子中的《北方》(«The North»)

篇第二部分(«The Danish succession»)。——见第55页

43 *5月6日的条约草案*——指俄国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俄土条约草案。这个条约草案，是在1853年5月4日"圣地"问题已做了有利于俄国的解决以后，俄国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的。条约草案要求保证俄国沙皇对土耳其政府治下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要求君士坦丁堡、安提奥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的所有总主教和大主教享有常任权，只要他们没有被发现犯叛国罪（反对俄国人）；即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免职，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总之，俄国是要土耳其苏丹放弃自己的主权。土耳其苏丹在英、法支持下，拒绝了俄国的这一蛮横要求。——见第57页

44 *布加勒斯特条约*——是俄国通过1806—1812年俄土战争，迫使土耳其于1812年5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把比萨拉比亚从莫尔达维亚划出，割给俄国；再次确认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俄国"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利，实际上是对两公国控制的权利。——见第58页

45 *巴尔塔利曼尼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派军队镇压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848年的革命以后，于1849年5月1日（俄历4月19日）签订的协议。根据这一条约，俄土军事联合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俄军直到1851年才撤出这些公国），土耳其苏丹任命两公国的国君必须征得俄国沙皇的同意。条约还规定了许多镇压人民革命的措施，如果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再次进行军事占领。马克思在本文中引用的是条约第四条的内容，文字是经过马克思通俗化的。——见第58页

46 *1841年公约*——是1841年7月13日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为一方和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期间对外国军舰封锁。这一公约的签订，取消了根据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俄国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见第59页

47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年到1857年在巴黎出版。——见第59页

48 *俄国的最后通牒*——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1853年5月31日（俄历19日）给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的一封信。这封信以最后通牒

的形式要求接受俄国提出的关于保证苏丹统治下的希腊正教臣民的特权的要求，即要求实际建立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俄国还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威胁，暗示在最后通牒遭到拒绝时将出兵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列施德-帕沙1853年6月16日(俄历4日)的回信中，土耳其拒绝了沙皇政府的无理要求。——见第60页

49 《信号报》——即《马赛信号报》(«Le Sémaphore de Marseille»)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27年到1945年在马赛出版。——见第60页

50 "绥靖希腊"——是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希腊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中干涉土希冲突时在外交文件中的用语。——见第62页

51 这一段话引自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Portfolio»中1826年12月22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报告。这一套名为《文件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的丛刊于1835—1837年出版；另一套名为《文件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丛刊于1843—1845年出版。马克思援引的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信发表于《文件集》1836年伦敦版第1卷第7、8、9期，第2卷第13期及《文件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2期。——见第63页

52 伦敦条约——即1827年7月6日英、俄、法三国在伦敦缔结的一个公约。1821年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沙皇俄国和英国政府都企图利用希腊起义，扩展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为了相互制约，俄、英两国于1826年4月签订了彼得堡议定书。议定书规定由英、俄与土耳其谈判，解决土耳其和希腊的冲突，其条件是希腊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土耳其给予希腊自治权。这样，英、俄两国强行充当希土关系的调停者。1827年英、俄、法三国代表在伦敦又举行会议，谈判希腊问题。1827年7月6日三国缔结了伦敦公约，确认英、俄彼得堡议定书。——见第63页

53 俄国照会——涅谢尔罗迭1853年6月11日(俄历5月30日)的照会。这是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一份周知照会。照会强词夺理地提出俄国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沙皇为苏丹统治下的正教臣民的保护者的"理由"。照会还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拒绝这一要求，俄国将采取"坚决措施"。——见第65页

54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俄

历6月26日)缔结的和约。在条约签订以前，沙俄利用土耳其与它的藩属埃及作战失败的机会，在"援助"土耳其的幌子下，把舰队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派部队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同埃及议和。但沙皇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在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该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见第69页

55 **卡夫丁峡谷**(*Furcae Caudinae*)——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负着"牛轭"通过峡谷。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见第70页

56 **对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照会的答复**——指法国外交大臣德鲁安·德·路易斯于1853年7月15日对1853年7月2日(俄历6月20日)涅谢尔罗迭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周知照会的复照。——见第71页

57 **《帝国报》**——即《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于巴黎创办；在1852—1870年第二帝国时期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见第71页

58 **关于密谋杀害苏丹**——指土耳其改革政策的反对者所策划的反对阿卜杜-麦吉德苏丹的阴谋。改革政策的基础是阿卜杜-麦吉德于1839年颁布的诏书。诏书中答应实行某些改革，调整税收制度，保障臣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等。新政策的目的是采取与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妥协的办法，巩固君主制度。虽然上述的改革极为有限，但在试图实行这些改革时，却遭到以苏丹的弟弟阿卜杜-阿吉兹为核心的反动派的拚命反抗。——见第73页

59 **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沙俄侵略军于1853年夏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时，由驻多瑙河俄军头目哥尔查科夫对两公国居民发表的告示。告示说，俄军进入多瑙河两公国，其目的不是更改过去条约中已对公国作了保证的政治机构和制度。——见第73页

60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02年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动期间，该

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见第74页

61 *Lex Regia*〔王位法〕——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7—118页，第257—258页，第269—270页，第274页。——见第76页

62 黎塞留遗教——黎塞留(1585—1642)，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宰相、红衣主教。黎塞留遗教指他在1633年写的《政治遗教》，其中阐述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外政策的重要原则，竭力为法国扩张疆界和夺取欧洲霸权的野心找根据。——见第80页

63 查理大帝敕令——查理大帝是法兰克国王(768—800年)，并被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800—814年)。查理大帝敕令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谕旨。——见第80页

64 伊康尼苏丹——十一世纪末，在小亚细亚的东部，由于土耳其奥古兹人占领了该地区，出现了以伊康尼城(古称科尼亚城)为中心的土耳其封建国家。到十三世纪后半叶，苏丹王国已实际解体，分裂为许多独立公国。和拜占庭接壤的诸公国中，有一个公国位于安那托里亚的西北区，由部落领袖奥斯曼领导，成了后来新的土耳其国家——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到十四世纪，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不仅有伊康尼苏丹原来的领地，而且还有被土耳其人夺取来的邻国的领土。1453年，土耳其奥斯曼人占领了拜占庭皇帝的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京都。——见第80页

65 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论文，载于1851—1852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15页)。这一组论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之约而写的，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些文章在《论坛报》上发表时是用的马克思的署名。——见第81页

66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0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见第82页

67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它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个报还叫《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报头上画有十字。——见第83页

68 *Lex Salica*〔舍拉法〕——指一些西欧君主国中所采用的仅由男系继承的王位继承制。这一制度基于《舍拉法》(«Lex Salica»)——日耳曼的舍拉法兰克人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编于六世纪初。《舍拉法》第五十九章取消了女系后裔的土地继承权，只允许把土地交给男系的继承人。——见第 85 页

69 俄国皇帝作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室的代表拥有对霍尔施坦的直接权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17—118 页，第 258 页，第 270 页，第 274 页。——见第 85 页

70 缅施科夫公爵提议签订一项同土耳其独立绝不相容的秘密条约——俄国在 1853 年除了向土耳其提出俄土条约的草案以外，还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单独签订一个所谓"共同防御同盟"的秘密条约。这一条约的草案规定：一旦某强国企图用武力阻挠实现上述关于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特权的协定，俄皇将给予苏丹武装援助。土耳其政府拒绝了条约的草案，也拒绝了秘密条约的草案。——见第 86 页

71 指 1853 年 6 月 16 日(俄历 4 日)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 1853 年 5 月 31 日(俄历 19 日)的信的答复。他在答复中拒绝了俄国所提的最后通牒式的无理要求和指责。——见第 86 页

72 帕麦斯顿(*1784—1865*)——曾任英国的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首相。——见第 92 页

73 寺院的钥匙由谁掌握的事情——即耶路撒冷"圣墓"所在寺院的钥匙以及保护该寺院的圆顶的权利应属于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徒的问题。沙俄利用这一问题来达到他争夺近东霸权的目的。——见第 92 页

74 阿克尔曼条约——俄国强迫土耳其于 1826 年 10 月 7 日(俄历 9 月 25 日)签订的协定。根据这个条约，俄国要求土耳其立即实施 1812 年布加勒斯特条约的所有条款。——见第 93 页

75 这个话引自库普费尔《1829年奉旨在高加索厄尔布鲁士山附近旅行记。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一书 1830 年圣彼得堡版第 4 页(Kupfer, «Voyage dans les environs du Mont Elbrouz dans le Caucase, entrepris par 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en 1829. Rapport fait à l'Acade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 St.-Pétersbourg, 1830, p. 4)。——见第 98 页

76 **圣彼得堡议定书和伦敦条约**——指1826年4月4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英俄议定书和1827年7月6日英、俄、法缔结的伦敦条约（参看注53）。在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中，英、俄声明它们既不损害土耳其来扩大自己的领土，也不追求无上的势力和在苏丹属地上的贸易特权。英、俄、法在缔结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时又重复了这样的声明。——见第99页

77 这段话马克思引自帕特里克·斯图亚特于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见第100页

78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英国政府机关报；1666年开始出版，每周出版两次。——见第109页

79 **劳埃德委员会**——伦敦的一个办理海上保险及登记的团体。——见第114页

80 **埃尔斯伦**——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重要要塞，1829年6月被俄军攻占。埃尔斯伦也译作埃尔祖鲁姆。——见第118页

81 **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联合"的问题**——指1850年路易-菲力浦死后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正统派和幼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进行联合的一次尝试。——见第125页

82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是十九世纪用来表示1830年七月革命后英法之间亲近的说法。——见第125页

83 **法国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给列施德-帕沙写了一封信**——指1853年12月5日英、法、普三国代表和奥地利外交大臣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对于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略熟视无睹、不予谴责。土耳其请求英法政府出面干涉。12月12日，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给列施德-帕沙写了一封信，继续纵容俄国的侵略，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损害土耳其主权的12月15日的四强共同照会。——见第125页

84 **同俄皇来往的秘密公文**——指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英国外交大臣关于西摩尔和尼古拉一世于1853年初就瓜分土耳其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的秘密往来的公文。——见第127页

85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étersbourg*»）——俄国外交部

的机关报，它以这个名称于1825年至1914年在彼得堡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这里指的是1854年3月2日（2月18日）《圣彼得堡报》就约翰·罗素1854年2月17日在下院的发言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暗示沙皇政府和英国政府在土耳其问题上狼狈为奸，并引1853年西摩尔的秘密往来的公文和1844年的备忘录作为证据。——见第127页

86 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对他经常进行的监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在英国当局的某种帮助下曾是这种监视的组织者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的信件遭到暗中检查。——见第137页

87 **根本法**——1829年，俄国战败土耳其后由俄国占领军头子基谢廖夫于1831年强加于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称组织规程或根本法）。1848年革命时，根本法被废除。——见第140页

88 **科堡王国的图画**——指1845—1846年英国打算让萨克森-科堡-哥特的列奥波特亲王与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结婚的计划。列奥波特亲王是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堂弟。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积极支持这个计划，以加强英国在西班牙的地位。——见第143页

89 **沙多勃利昂**（*1768—1848*）——法国反动的政治家，曾在1822—1824年任外交大臣，法国出席维罗那会议的代表。在沙皇俄国的怂恿下，他主张出兵镇压西班牙革命。这一主张详见沙多勃利昂：《维罗那会议。西班牙的战争。谈判。西班牙的殖民地》一书，布鲁塞尔1838年版第1卷第112，119—120，132—133页；第2卷，第220—221，225页。——见第144页

90 **对南美洲的远征**——指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823年12月2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宣布所谓门罗主义的咨文。——见第144页

91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领导者帕拉茨基、沙法里克）企图以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和里别尔特等）坚决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

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见第147页

92 *俄国军队于1849年开进了匈牙利*——指沙皇俄国镇压1849年匈牙利的革命。——见第149页

93 *德国思辨哲学的代表*——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他在《俄国和德国》(1853)、《俄国和英国》(1854)等许多小册子中实质上发展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见第150页

94 1854年6月俄国通过圣彼得堡的施蒂格利茨银行从国外获得了利率五厘的五千万银卢布的贷款。这笔贷款主要用来抵补进行克里木战争的开支。——见第151页

95 这个公告是在1855年8月28日颁布的。——见第152页

96 *阿富汗的公国*——指赫拉特公国。它的主要城市，即作为通商要道的枢纽和重要战略据点的赫拉特，在十九世纪中叶曾经是波斯和阿富汗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前者有俄国扶助，后者有英国撑腰，反映了俄英两国争夺亚洲霸权的斗争。波斯军队在1856年10月攻占了赫拉特，英国于11月1日向波斯宣战，占领波斯的哈尔克岛、布什尔等地。由于1857—1859年在印度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使英国不得不赶紧与波斯缔结和约。按照1857年3月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波斯承认阿富汗独立，并放弃了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1863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的领地。——见第157页

97 *彼罗夫斯基的军队在征讨希瓦时遭到覆灭*——指1839年11月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率领五千人的军队进攻希瓦汗国一事。俄国这次侵略行动损失惨重，彼罗夫斯基未到希瓦即被迫折回奥连堡。——见第160页

98 *西帕依步兵*——西帕依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土兵。参加了英军和法军于1854年11月5日在克里木半岛的因克尔芒击败俄军的战役。——见第162页

99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

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见第166页

100 **农民事务总委员会**——1857年1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由奥尔洛夫大公担任主席，从1858年1月起该委员会改称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秘密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农奴制的改革，康斯坦丁大公是该委员会的委员。——见第167页

101 马克思指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于1803年2月20日颁布的法令："地主释放农民必经双方同意并缔结合同"，以及尼古拉一世于1842年、1844年、1846年、1847年颁布的各项指令。参看本书第182—190页《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见第168页

102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从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篇文章除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1858年11月3日第5471号上发表以外，马克思还在11月24日的《自由新闻》(«Free Press»)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只是文章的首尾有所改动。——见第170页

103 ***1839*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指俄国瓦·亚·彼罗夫斯基在1839年组织的旨在征服希瓦但终告失败的一次远征，以及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即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战争。1839年8月，英军占领喀布尔，由于1841年11月当地居民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1842年1月向印度撤退，后来变为仓皇溃退。——见第170页

104 **格拉克列亚半岛**——即克里木半岛上西自因克尔芒到巴拉克拉瓦的那一部分。格拉克列亚半岛是因塞瓦斯托波尔被围而开辟的重要作战地区之一。——见第177页

105 指俄国按照1856年的巴黎和约归还给莫尔达维亚的贝萨拉比亚部分。——见第177页

106 **"病夫"**——是1853年1月9日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会晤时对土耳其的称呼。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国，由于双方在巴尔干的利益无法调和，没有达成协议。——见第177页

107 引自约·温·库克《中国：1857—1858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1858年伦敦版第273页(G. W. Cooke. «China: being〈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

London, 1858, p.273)。——见第 179 页

108 **御前总委员会**——即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见第 182 页

109 **"人权宣言"**——马克思提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1789年 8 月 3 日夜间，法国立宪会议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宣布废除一系列当时实际上已被起义农民取消了的封建义务。但是随后颁布的法律只无偿地废除了个人徭役。《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法国立宪会议于 1789 年 8 月 20 日通过的。宣言的主要一点就是宣布自由、财产等等是人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见第 184 页

110 **自由主义运动**——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 1846 年当选以后，随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废除书报预检制度，等等），以麻痹和欺骗人民。——见第 184 页

111 **"权利请愿书"**——即圣彼得堡贵族委员会拟订的圣彼得堡省世袭领地地主农奴管理条例。马克思把这份大约于 1857 年 12 月 5 日出现的文件比做 1628 年 5 月 28 日英国议会向国王查理一世呈递的"权利请愿书"，其内容是要求大大限制国王的权力。——见第 187 页

112 **地主世袭政权的体系**——1807 年在普鲁士曾实行一次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保留一切义务和地主对农民的法庭和警察权力。尽管这次改革很不彻底，但是地主仍竭力阻挠，百般反对在农村中实行自治的改革。在 1808 年，他们获得了占有农民土地的权利。虽然在 1811 年曾允许农民有权赎买封建义务，实际上农民由于苛刻的赎买条件并不总能利用这种权利。在普鲁士，农民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过程拖延了许多年。——见第 190 页

113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从 1830 年到 1851 年在巴黎出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见第 192 页

114 ***1830* 年在华沙发现的俄国的公文**——在 1830—1831 年的波兰起义期间，波兰起义者占领了康斯坦丁大公在华沙的档案库，其中有许多沙皇外交文件。这些文件一部分曾发表在戴·乌尔卡尔特于 1835—1836年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丛刊《国家公文集，公文汇编》（«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一部分发表在 1854 年巴黎出版的《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见第193页

115 **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木筏上**——指1807年的提尔西特条约。拿破仑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一次会见是在停在尼门河中心的木筏上举行的。——见第193页

116 **七月革命**——指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见第194页

117 **神圣同盟**——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起下，俄、奥、普三国君主于1815年9月签订宣言建立的旨在镇压革命的国际反动组织。——见第194页

118 **奥地利已经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马克思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78—184页)一文中讽刺奥地利因为沙皇俄国帮助它镇压了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而“感恩图报”。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俄奥由于在东方问题上的相互争夺而关系恶化。据说，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说过：“奥地利还要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使全世界惊奇”。恩格斯在这里也引用了这句话。——见第194页

119 **俄国似乎只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就满意了**——指关于1853年初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公爵同尼古拉一世关于土耳其问题的谈判，可参看马克思的《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8—177页。——见第196页

120 **巴黎两次被占领**——指反拿破仑同盟的军队于1814年3月30—31日和1815年7月6—8日占领巴黎的事实。——见第196页

121 **在斯图加特会见**——拿破仑三世1857年9月25日在斯图加特同亚历山大二世会见时，亚历山大二世曾向他保证一旦法国和奥地利因意大利问题爆发战争，一定支持法国。——见第197页

122 **维拉弗兰卡和约**——1859年7月11日路易·拿破仑单独和奥地利缔结的结束1859年奥—意—法战争的和约。关于这个和约，见马克思写的《维拉弗兰卡条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72—476页。——见第197页

123 **丹瑙人的礼物**——即谁得到谁就可能死亡的礼物。根据关于夺取特洛伊城的传说，希腊人(根据希腊部族之一的名称也称为丹瑙人)送给特洛伊人一只木马表示和解，其中藏有武装的军士。这就是罗马诗人味

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第二部中的一个主人公所说的一句获得了广泛流传的话“我害怕丹瑙人，甚至害怕送礼的丹瑙人”的由来。——见第198页

124 **哥尔查科夫公爵致德国各小邦的有名的照会**——指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1859年5月27日(俄历15日)的照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3页)——见第198页

125 **华沙大公国**——华沙大公国是拿破仑一世在1807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划出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所建立的藩属；1809年，奥地利被击溃后，奥地利占有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也并入这个公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公国的绝大部分领土以波兰王国的名称并入俄国。——见第198页

126 **德意志联邦条例**——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根据这个条例，为数众多的德国邦形式上联合成为所谓的“德意志联邦”。——见第198页

127 **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指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1848年7月6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代表发出的通告。(见本书《俄国的照会》一文)——见第199页

128 **伦敦议定书**——指1852年5月8日俄、奥、英、法、普鲁士、瑞典同丹麦共同签订的有关丹麦王室领地、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议定书。——见第199页

129 **皮蒙特已经把维拉弗兰卡军港让给俄国**——1858年8月，俄国和撒丁王国达成了一项协定，使俄国享有利用皮蒙特的维拉弗兰卡军港的权利。该港位于地中海岸尼斯附近。这样，俄国在地中海取得了一个立足点。——见第201页

130 **普鲁士购买亚德湾一事**——1853年，普鲁士向奥登堡公国购买了亚德湾的一部分岸边地带，用于建立军港。军港取名威廉港，建于1855—1869年。——见第201页

131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个别地方爆发了革命。只有在克拉科夫从1815年起由奥、俄、普共管，

起义者在1846年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1846年11月，奥、俄、普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见第202页

132 《帕麦斯顿与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05—417页。——见第202页

133 关于出卖贵族领地的法律——指1847年11月8日(公历20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谕；根据该敕谕规定，地主领地凡因债务而拍卖时，农奴有权赎买自己和土地。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23—724页。——见第204页

134 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见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页。——见第204页

135 库扎上校——1859年1—2月，库扎上校当选为莫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君主(执政者)。1862年初，两公国的立法会议合并，这个新王国称罗马尼亚。——见第205页

136 《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保守派的周报，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见第205页

137 涅米罗夫会议——涅米罗夫会议从1737年8月15日至11月11日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涅米罗夫举行。这次会议是在俄土战争(1735—1739)进行期间召开的。俄国代表团提出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变成俄国保护下的"独立公国"，作为订立和约的条件之一。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战争重新爆发。——见第205页

138 福克夏尼会议——福克夏尼会议从1772年7月27日至8月28日在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福克夏尼小城举行，俄方在会议上提出了让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获得独立的建议。土耳其拒绝了这一建议，战争重新爆发。——见第205页

139 "赫特里"——(更确切些说应当是"费里克·赫特里")是希腊的一个秘密团体，成立于1814年，中心在敖德萨，在希腊各大城市均有支部，后来领导了1821年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起义。——见第206页

140 路易十八讨伐西班牙的暴乱——指法国军队为了镇压1820—1823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而对西班牙进行的武装干涉。西班牙国王

斐迪南七世于1822年7月7日试图占领革命的马德里遭到失败以后，秘密请求“神圣同盟”援助他镇压革命。根据“神圣同盟”维罗那会议的决定，应由法国援助斐迪南。法国军队于1823年侵入西班牙，在该国恢复了专制制度。——见第206页

141 《青年意大利》——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创办的一个秘密组织的机关报。这一秘密组织存在于1831—1848年；它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方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见第207页

142 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指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调停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1850年10月在华沙所进行的谈判，其目的是调整两国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个国家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特别是在由于黑森选帝侯国和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了冲突之后，更加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同丹麦在1850年7月订立了柏林和约，规定要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的情况，但普鲁士仍继续帮助这两个公国同丹麦作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允许奥地利军队进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便完全制服这两个公国，但是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对。尼古拉一世皇帝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并力图保持德意志封建割据状态，在华沙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1850年11月底两国政府首脑在捷克城市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举行会谈时得到了解决。按照1850年11月29日签署的奥里缪茨协定，普鲁士被迫放弃它要主宰德意志的要求，并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问题上向奥地利让了步。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派奥地利的一个军团前往霍尔施坦。——见第208页

143 紧急报告——1825年10月16日（俄历4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给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1825年8月18日（俄历6日）涅谢尔罗迭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的实质和对俄外交路线的意见。——见第209页

144 *Slovanský zeměvid*——指“斯拉夫各国”地图，是捷克斯拉夫学家巴维尔·约瑟夫·沙法里克为他的《斯拉夫民族志》（«Slovanský národopis»）一书绘制的，该书出版于1842年。——见第216页

145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1859年在伦敦出版，1860年在罗迦诺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本文中引证的马志尼的宣言，由马克思译成了英文，并加上了简短的引言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06—407页)——见第218页

146 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沙皇俄国和英、法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导致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英、法、土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结果俄国被打败，并于1856年3月签订了巴黎和约。俄国被迫将它侵占的贝萨拉比亚南部归还莫尔达维亚，并被剥夺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利。和约规定黑海中立，对各国商船开放。沙皇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使它在巴尔干和近东的野心暂时受挫。——见第218页

147 巴赞库尔的小说——指巴赞库尔著：《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第1—2卷（Bazancourt. «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ú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 Tomes I—II）。第一版1856年出版于巴黎。——见第218页

148 德意志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德，把奥地利排除在外。联盟于1867年11月解散。——见第221页

149 德意志邦君即将在华沙举行会晤——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摄政王于1860年10月在华沙的会晤。俄国利用奥、普同法国的矛盾，在阻挠意大利统一的问题上互相勾结，以对抗为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撑腰的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政策。——见第221页

150 秘密协定——1859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俄国和法国在巴黎签订秘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一旦发生法国、撒丁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的战争，俄国必须对法国采取善意的中立立场。法国则允诺提出修改1856年巴黎和约中有关黑海和贝萨拉比亚的条文问题。——见第223页

151 哥达党——是1849年6月在哥达（绍林吉亚）举行的反革命犬资产阶级、右翼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

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见第223页

152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是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的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见第225页

153 他们在1848年5月15日走向制宪议会的时候曾经高呼«*Vive la Pologne!*»——波兰万岁！——1848年5月15日，法国制宪议会讨论波兰问题。巴黎十五万民众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波兰万岁口号，冲入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给予反抗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波兰以军事援助。——见第225页

154 1848年和1849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好几家机关报都曾要求对俄作战以恢复波兰——这几家报纸指的是德国民主派报刊和工人报刊，首先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由马克思编辑的、在科伦出版的日报《新莱茵报》。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坚决维护波兰的独立、把波兰的解放和推翻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沙皇制度联系起来。——见第225页

155 国际工人协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抵抗俄国对欧洲的威胁——恢复波兰！"——1865年9月25日和以后几天召开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经过马克思的斗争，会议议程列入了抵抗俄国佬对欧洲的威胁以及恢复波兰的独立和统一的要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3页。——见第226页

156 1864年3—7月蒲鲁东主义分子连续在比利时《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e Peuple»)上发表文章，就波兰问题对总委员会提出责难。恩格斯在本文中指出这些责难是不值一驳的，但是，这些话也出自工人阶级很小一部分人之口，因此恩格斯再次考察了波俄问题，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对外政策。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6—596页，特别是第594—595页。——见第226页

157 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一种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解放和统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便成

了他们的共同口号——指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倡议、于1834年2月在瑞士组织的青年欧洲运动。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组织，由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等民族组织组成。它的宗旨是争取民族统一、民族独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见第228页

158 卢西人——这是近代时期中欧、西欧对住在加里西亚、布柯维纳等喀尔巴阡山东北地区的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称呼。——见第231页

159 自*1390*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指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立陶宛和波兰的数度合并。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初，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为了防御蒙古人的侵犯，曾与立陶宛合并。1385年，立陶宛和波兰为了抵御条顿骑士团的侵略进行了第一次合并。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一再废止和恢复。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波兰和立陶宛组成一个国家，称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见第232页

160 波兰人甚至把莫斯科占领了好几年——1605年6月—1606年5月和1610年9月—1612年10月，波兰两度占领了莫斯科。——见第233页

161 塞米拉米达——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据希腊历史家说，她在巴比伦建筑了一座被称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见第234页

162 "前卫军把武器调转来对准了主力部队"——这是法国将军、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首脑之一拉斐德于1831年1月16日在法国众议院会议上的发言中讲的话。发言发表在1831年1月17日的《总汇通报》上。——见第236页

163 尼古拉一世的诏书——尼古拉一世的这份诏书，载于1848年3月15日《北方蜜蜂报》第59号。——见第237页

164 大财主们的机关报——马克思指的是1867年1月7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见第237页

165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756年由莫斯科大学以小报形式出版的一份报纸，从1859年起成为日报，宣传地主僧侣最反动阶层的观点；从1905年起，成为黑帮派主要机关报之一，一直出

到1917年十月革命。——见第238页

166 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被划归俄国侵占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见第239页

167 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不止一个蒙塔朗贝尔伯爵把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哥萨克的马蹄声是否动地而来——这是暗指1851年7月17日维·雨果在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言中的话，雨果的发言发表在1851年7月18日《总汇通报》上。蒙塔朗贝尔是法国奥尔良党人，天主教党的首脑。——见第240页

168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同《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该报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见第242页

169 指1871年1—3月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代表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俄国乘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之机，声明不再受1856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限制俄国在黑海权利各条款的约束的问题。1871年3月13日签订的协定取消了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拥有舰队和要塞的规定。——见第243页

170 《波罗的海报》(«*Ostsee-Zeitung*»)——1835年起在波兰的什切青出版的一家德文日报。——见第243页

171 《雷诺新闻》——即《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是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是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从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见第246页

172 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米·彼·波果丁《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

1867》，1867 年莫斯科版。马克思的引文见该书第 54—55 页（М.П. Погодинъ.«Польскій вопросъ. Собраніе разсужденій, записокъ и замѣчаній. 1831—1867». Москва, 1867, стр. 54—55）。——见第 248 页

173 *1836 年、1845 年和 1863 年的宣言*——1836 年 12 月 4 日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号召人民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争取把农民的份地交归农民所有。

克拉科夫革命政府在 1845 年底起草并于 1846 年 2 月 22 日发表的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和把土地交给农民。

中央民族委员会在 1863 年 1 月 22 日发表的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它是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的纲领。

三个宣言都阐述了反抗沙皇的残酷压迫，建立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遵循的原则。——见第 249 页

174 *俄国已经根据帖欣和约要求并得到了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帖欣和约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 1779 年签订的。作为这个和约的发起国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在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从而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的事务的权利。——见第 250 页

175 *俾斯麦在波兹南进行文化斗争*——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而取消了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

恩格斯讥讽地把使波兹南的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兹南进行的文化斗争。——见第 252 页

176 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发表于 1875 年 4 月 16、18 和 21 日《人民国家报》第 43、44 和 45 号，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Soziales aus Rußland»）为题于 1875 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5 年 5 月恩格斯给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见本书第 270—272 页）。——第 253 页

177 *特卡乔夫*（*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民粹主

义分子。恩格斯在本文中引用特卡乔夫的话，见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P.Tkatschoff.«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见第253页

178 指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一书中的论述。此书于1847年至1852年在汉诺威和柏林分三部出版。——见第259页

179 毛勒的许多著作——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 («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1856)；《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 («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1—4, Erlangen, 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 («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I, Erlangen,1865—1866)。——见第260页

180 三个威尼斯——1799年至1805年和1814年至1866年期间先后归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意大利威尼斯地区，是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经常策源地。——见第267页

181 从《前进!》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前进!》编辑部的秘书弗·斯米尔诺夫曾经在1月23日的纪念会上讲过话，他强调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和波兰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并代表俄国革命者宣布，每一个俄国革命者都已准备好，“当革命的钟声一敲响，就投入波兰人的队伍，去为波兰人民争得社会自由”。俄国流亡者索洛维约夫也讲了话，他指出要提防波兰地主自由派和沙皇政府可能勾结起来。——见第268页

182 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同盟者——工人政党——弗·斯米尔诺夫1875年2月给马克思的信保存下来了。斯米尔诺夫在信中说，他在给《前进!》写一篇有关波兰纪念会的报道。斯米尔诺夫出席这次纪念会时，曾听到马克思讲过下面这句话：“因此，必须在波兰人民中间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由于波兰报刊的报道中没有这句话，斯米尔诺夫便请马克思证实他是否讲过。马克思的答复没有见到，但是，《前进!》的报道中转述了这句话。——见第269页

183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w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 ——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作用。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它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揭发，使它遭到封建保皇派、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受到政府的迫害。《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在给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第273页

184 指1876年12月11—23日举行的欧洲大国驻土耳其大使君士坦丁堡会议。会议期间沙俄同其他与会国的代表相勾结，要求土耳其给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自治，俄国的目的之一是"要把土耳其人从这个坚固阵地上驱逐出去并使君士坦丁堡暴露出来以便俄国入侵"。——见第275页

185 **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的"战争**——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见第277页

186 **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见第279页

187 **三帝同盟**——即三皇同盟，是由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三国皇帝于1873年10月正式签订的。德国参加同盟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协定发动新的反法战争，俄国企图加强它同英国争夺欧亚的地位，奥匈帝国想约束俄国对巴尔干的扩张。同盟内部矛盾重重，1878年三皇同盟不再续订。

1881 年被新的“三皇协定”即德奥俄中立条约所代替。随着三国同盟的成立和俄法的接近，到 1887 年三皇同盟彻底瓦解了。——见第 280 页

188 指沙皇俄国在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后强迫土耳其签订的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见第 280 页

189 见毛奇著：《1828 年和 1829 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 年柏林版（Moltke.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 Berlin,1845）。1877 年该书再版。——见第 282 页

190 指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期间，1828 年 4—9 月和 1829 年 5—8 月进行的两次战役。——见第 282 页

191 *戴着胜利的花冠*——“戴着胜利的花冠，你值得赞扬”——这是巴·格·舒马赫《柏林民歌》一诗的首句。这首诗成为普鲁士国歌的基础。——见第 282 页

19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541 页。——见第 285 页

193 *俾斯麦在他处理奥地利和法国事务时*——指 1866 年普奥战争和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见第 285 页

194 指 1863—1864 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见第 288 页

195 *1846 年爆发了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革命*——1846 年 2 月，波兰酝酿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总起义遭到破坏，只有在自从 1815 年以来就归奥、俄、普共管的克拉科夫爆发，起义于 2 月 22 日取得胜利，建立了民族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邓波夫斯基在克拉科夫起义时制定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也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将土地分给无地者、成立国家的或“社会的”工厂等）。克拉科夫起义在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 年 11 月，奥、俄、普签订条约，将克拉科夫并归奥地利帝国。——见第 291 页

196 *1847 年，在伦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指 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大会的工作。——见第 291 页

197 《钟声》(«Колокол»)杂志——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办的一份政治性刊物。1857—1865年4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1868年至1869年改为法文，附以俄文副刊。赫尔岑在这份杂志上鼓吹农民解放，宣传空想社会主义。——见第293页

198 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彼得堡郊外的加特契纳。——见第294页

199 1873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1873年，俾斯麦准备发动新的对法战争。沙俄害怕德国力量膨胀，勾结英、奥等国对德国施加压力，迫使德国放弃了这一计划。——见第295页

200 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决议被奥地利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1882年1月爆发了起义。沙皇政府极力利用起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趁机扩展在巴尔干的势力。——见第295页

201 指1863—1864年波兰反抗沙皇俄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见第296页

202 指巴黎公社时期，勇敢地同巴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的许多波兰革命流亡者，最著名的有符卢勃列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等人。前者是公社的三个集团军之一的统帅；后者是第一集团军的统帅，1871年5月初，被任命为公社武装部队总司令。——见第296页

203 宪制的“新纪元”——恩格斯这里谈到的在德国可能出现的宪制的“新纪元”，是讽刺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所谓“新纪元”的名称。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见第296页

204 3月13日——1881年3月13日，根据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见第301页

205 指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中一再使用的说法，即俄国的村社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见第302页

206 指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以下的一段话："我认为，俄国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反动势力日益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把这种位能变成动能"。——见第302页

207 *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中的说法。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14卷第62页(G. W. F. Hegel. Werke. Bd. XIV, Berlin, 1833, S. 62)。——见第302页

208 *整个保加利亚的和东方的事件*——指1885年9月初的保加利亚与东鲁美利亚合并及其以后事件。参看恩格斯:《欧洲政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6—364页。——见第304页

209 *俾斯麦向俄国人屈膝*——多半指俾斯麦在1886年夏季与俄国大使舒瓦洛夫以及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的谈判。俾斯麦为了阻挠法俄接近和防止沙皇政府对输入的煤铁提高关税，在谈判过程中答应支持俄国对巴尔干的政策。——见第307页

210 *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俄国于1878年3月3日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圣斯蒂凡诺强加于土耳其的条约。这个条约将大大加强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英、奥匈等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重审条约,于是在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召开了由俄、德、奥匈、法、英、意、土耳其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签订了柏林条约。柏林条约迫使俄国放弃它在圣斯蒂凡诺和约所攫取的部分权益。列强暂时调整了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见第310页

211 *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1794年波兰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1795年,波兰便遭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第三次瓜分。根据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决定,波兰王国划归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掠夺的大部分土地也随之归了俄国。——见第310页

212 *在和平时期占领了埃及*——1875年，英国通过收购埃及总督持有的大

批苏伊士运河股票而成为埃及的最大股东。1876年，英国和法国利用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建立了对埃及财政的监督和英法共管。埃及人民接连展开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国资本扩张的斗争。1882年，英国以炮击亚历山大港挑起同埃及的冲突，占领埃及。——见第311页

213 *这是1866年波希米亚战役的再版*——波希米亚(捷克)是1866年普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这里，恩格斯把保加利亚在1885年11月2日开始的同塞尔维亚的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同波希米亚战役作了比较。——见第312页

214 *莫斯科市长在他的向沙皇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1886年5月25日(俄历5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迎接亚历山大三世从克里木归来的仪式上，莫斯科市长阿列克谢也夫在致欢迎词中宣称："我们日益坚信：基督的十字架将在圣索菲娅闪耀"。按圣索菲娅是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堂的名称。——见第313页

215 *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众出丑*——当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沙俄的压力下放弃保加利亚王位，保加利亚成立摄政府以后，沙皇政府于1886年9月把尼·瓦·考耳巴尔斯将军作为军事委员派往保加利亚，以恢复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势力，并为挑选一个俄国人做保加利亚国王准备条件。考耳巴尔斯的使命由于保加利亚人民的英勇反抗而未成功。同年11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沙皇政府同保加利亚断绝外交关系。——见第314页

216 *对贝萨拉比亚的两次侵占*——指1812年俄国迫使土耳其政府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强行割占莫尔达维亚的贝萨拉比亚。1856年沙俄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贝萨拉比亚南部归还土耳其统治下的莫尔达维亚。1878年，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失败，俄国又重新侵占了这部分领土。——见第320页

217 *吉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 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俄国政论家，民意党党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叛变革命。1889年上书沙皇，成为臭名昭著的保皇派之一。——见第325页

218 *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指1874年俄国废除征集新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一事。根据1874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从二十一岁到四十三岁的全部男性居民（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出生的

人以及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极北地区若干少数民族除外）都必须在正规军、后备军或民团中服兵役。征召服役采用抽签办法。这一改革本想把俄国军队变为资产阶级类型的军队。但在沙皇专制制度下，由于等级特权、有产阶级享有种种优待以及各阶层服役条件的不平等情况，阻碍了这一制度的实行。——见第325页

219 *1813—1815年的战争*——指反拿破仑的欧洲各国第六次（1813—1814）和第七次（1815）同盟所进行的战争。——见第326页

220 **"民族原则"**——恩格斯揭露老沙皇借口"民族原则"把波兰境内的白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居住的土地兼并入俄国。对"民族原则"的揭露，见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也指出，"民族原则""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见本书第225—235页）。——见第328页

221 **东方礼天主教徒**——是对属于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成的东方礼天主教会的基督徒的称呼。根据1596年布列斯特宗教会议通过的合并条约，波兰贵族共和国内的正教居民应承认罗马教皇为首，并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条，但仍保持正教教会的仪式。——见第328页

222 **自由否决权**——是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波兰议会的表决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要一个议员行使否决权，议会的议案就无法通过。自由否决权大大削弱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政权，加强了地方的割据势力。沙皇俄国为了干涉波兰，竭力维持自由否决权。波兰进步的中小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一直为废除自由否决权而斗争。——见第328页

223 **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这是在威斯特伐里亚境内签订的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两个和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和约保证了战胜国瑞典和法国获得大片领土。条约规定德意志皇帝保证德意志境内各邦永久存在，不干涉诸侯内政。这使皇帝权力更加削弱，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德国完全陷入分崩离析状态。——见第328页

224 **考茨基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指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

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K. Kautsky. «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 Mit einer historischen Einleitung». Stuttgart, 1888）。——见第330页

225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以英、普为一方，以法、俄、奥为另一方。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间的利益冲突以及英、法争夺殖民地的尖锐矛盾引起的。除海战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在欧洲进行，英、法还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进行。1756—1757年普军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俄军于1757—1760年打败了普军。七年战争以英、法、西班牙缔结巴黎和约和普、奥缔结胡贝尔茨堡和约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把它的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它在东印度的大部分领地割让给英国，从而加强了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海上威力。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前疆界。——见第331页

226 **彼得堡同盟条约**——是俄国和普鲁士在1764年3月31日（公历4月11日）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第三方进攻时他方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在秘密条款中俄国和普鲁士承担了不得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的义务。一项专门的秘密条款规定，普鲁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条约为瓜分波兰作了准备。——见第331页

227 **第一次瓜分波兰**——第一次瓜分波兰是在俄军直接占领波兰的情况下进行的。1772年8月5日（俄历7月25日）俄国同普鲁士、奥地利在彼得堡签订了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的协定。根据这个瓜分协定，俄国夺得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德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奥地利夺得了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普鲁士夺得瓦尔米亚、波美拉尼亚等波罗的海沿岸地带和大波兰的一部分。——见第332页

228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1778—1779）的起因是，由于巴伐利亚的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逝世（1777）后无直接继承人，德意志各邦都企图夺取巴伐利亚的领土，而奥地利和普鲁士又企图乘机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战争以1779年5月奥地利同普鲁士、萨克逊缔结帖欣和约告终。根据这一条约，普、奥各获得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逊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给与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约还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俄国最初以交战双方调停

人姿态出现，后来在条约的专门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从而获得干预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见第332页

229 **叶卡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指沙皇俄国在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对土耳其的两次战争：1768—1774年俄国战胜土耳其后把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强加于土耳其；1787—1792年俄国打败土耳其后强迫土耳其签订了雅西和约。——见第333页

230 **"武装中立"的原则**——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5—1783)，叶卡特林娜二世于1780年3月11日(俄历2月28日)发表武装中立宣言。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用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这一宣言是为了限制英国的海上作战权利。在1780—1783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武装中立原则后来基本上纳入了1856年4月16日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代表所签订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宣言附于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参加国在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上。——见第333页

231 **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指1793年和1795年俄、普、奥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第二次瓜分中，俄国获得白俄罗斯的大部分，立陶宛的一部分和第聂伯河以西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格但斯克和托伦两个城市和大波兰的几个省。第三次瓜分中，俄国吞并了整个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奥地利占领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地区和一部分玛佐夫舍地区。普鲁士夺取了其余的西部领土、华沙、其余部分的玛佐夫舍地区。在这两次瓜分中，俄国夺得的领土最多，共达三十七万余平方公里。——见第334页

232 ***1792—1794年同盟***——指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同盟。贵族资产阶级的英国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反革命同盟的建立。在俄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开始对法国进行干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792年2月缔结了军事同盟。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共和和1793年1月处决路易十六以后，英、荷、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意志与意大利

的许多小邦都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和这次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一直进行到1797年。——见第334页

233 1783年夏，根据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的建议，古斯达夫三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芬兰)会见。当时俄国正在准备对土耳其作战。古斯达夫要了解叶卡特林娜对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图和对瑞典企图兼并挪威的态度。叶卡特林娜提出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见第334页

234 **吕内维尔和约**——欧洲各国第二次反法同盟失败后，奥地利和法国在1801年2月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把它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割给法国，并承认在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依附于法国的共和国。——见第335页

235 ***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根据1803年2月25日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帝国代表会议是1801年10月经帝国议会选出，由德意志帝国各邦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德意志西部许多小邦被取消，它们的领土合并于较大的邦，作为对于根据吕内维尔条约割给法国莱茵河左岸领土的赔偿。由于这一决议，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一百一十二个德意志邦被取消，它们的领地的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以及普鲁士。帝国代表会议只是正式确认了1801年10月俄国和法国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根据拿破仑法国的利益解决德意志莱茵河沿岸的领土问题)的条款。——见第335页

236 **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尔利茨城下被打败**——1805年12月2日(俄历11月20日)拿破仑一世的法军在奥斯特尔利茨(莫拉维亚)战败了俄奥联军。这次战役后，奥地利退出了反拿破仑的第三次同盟，和拿破仑签订了普勒斯堡和约。俄军在奥斯特尔利茨的失败，使俄国自从1779年帖欣条约以来对德意志小邦所抱的野心受到挫折。拿破仑成为"莱茵联邦"的保护人。——见第336页

237 **新的莱茵联邦**——拿破仑1805年12月打败俄奥联军，于1806年迫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取消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徒具虚名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了，随即在1806年7月，成立了在拿破仑一世保护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称莱茵联邦。参加联邦的最初有十六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后来又有五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它们实际是拿破仑法国的附庸。拿破仑自

任由二十一个邦参加的这一“莱茵联邦”的保护人。1813年拿破仑战败，联邦瓦解。——见第336页

238 **普俄联盟，耶拿战役，埃劳战役，弗里德兰德战役**——1806年俄国和英国组织了第四次反法同盟，有普鲁士和瑞典参加。普鲁士在7月和俄国签订了秘密同盟（普俄联盟）。下列几次战役是指1806—1807年第四次反法同盟进行的一系列战役：

耶拿（绍林吉亚）战役——1806年10月14日普军和法军的战役，普军被击溃，法军占领柏林。

埃劳（东普鲁士）战役——1807年2月7—8日（俄历1月26—27日）法军和俄军进行的战役。法军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弗里德兰德（东普鲁士）战役——1807年6月14日法军大败俄军的战役。——见第336页

239 **斯德哥尔摩的暴力的宫廷政变和芬兰的让与俄国**——提尔西特条约后，在拿破仑的同意下，俄军于1808—1809年冬横越冻结的波罗的海进攻瑞典的芬兰，瑞典军战败，于11月撤离芬兰。俄军侵入瑞典后，引起瑞典贵族在斯德哥尔摩进行宫廷政变，这次政变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族寡头的利益。1809年3月，瑞典国王古斯达夫四世被推翻，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称查理十三。同年9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签订了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将芬兰割给俄国。——见第337页

240 1812年8月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储卡尔·约翰（贝尔纳多特）在亚波（土尔库）会晤。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8月30日（俄历18日）签署协定，实际结成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协定还规定在丹麦拒绝将挪威让给瑞典国王时，俄国有给予瑞典军事援助以反对丹麦的义务。瑞典则保证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见第337页

241 1808年9月27日（俄历15日）—10月14日（俄历2日）拿破仑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在爱尔福特的会见。拿破仑对被他征服的国家（特别是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感到不安，又害怕奥地利对他发动进攻，因此希望在同奥地利交战时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同时他也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坚决支持俄国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领土要求。谈判结果虽然签署了秘密协定，形式上恢复了1807年提尔西特缔

结的法俄同盟，但在拿破仑和奥地利作战时亚历山大并未积极支持拿破仑，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俄国只占领了加里西亚，没有对奥地利采取其他军事行动。——见第337页

242 *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即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贸易。由于1807年的提尔西特条约，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见第337页

243 *莱比锡会战*——1813年10月16—19日（俄历4—7日）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在莱比锡的决战。联军这次会战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和德意志摆脱拿破仑的统治。——见第339页

244 *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俄、普、奥、英等国打败拿破仑后，于1814年9月—1815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了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分赃会议——维也纳会议。俄国抢到了拿破仑一世在1807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所建立的华沙公国的大部分，加上沙俄过去兼并的波兰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由俄国沙皇兼任国王的波兰王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见第339页

245 *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指在西班牙（1820—1823）、那不勒斯王国（1820—1821）和皮蒙特（1821）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神圣同盟派法军到西班牙、派奥军到意大利进行干涉，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见第341页

246 “神圣同盟”为干涉欧洲事务和扼杀革命而举行的几次会议：

亚琛会议（1818年），结束对战败的法国的军事占领，准许法国参与欧洲事务。

特劳波会议（1820年），拟定镇压革命的“干涉原则”。

莱巴赫会议（1821年），决定武装干涉意大利境内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

维罗那会议（1822年），讨论并决定由法国武装干涉西班牙的革命。——见第341页

247 这段话看来恩格斯是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第52—53页（«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r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Paris, 1854, P. 52—53)。——见第 342 页

248 指结束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阿德里安堡和约。——见第 344 页

249 **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指 1830—1831 年波兰反对沙皇政府的民族起义。尽管这次起义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但是它使西欧的革命避免了沙皇军队的武装干涉，所以恩格斯说，这次起义拯救了欧洲革命。——见第 344 页

250 **欧洲同盟变成反法同盟**——1839 年爆发了第二次土埃战争，英法矛盾的激化和俄国再度干预的可能性，引起了东方问题的尖锐化。当土耳其军队被埃及军队打败的时候，欧洲各大国担心俄国乘机向巴尔干进一步扩张它的势力，向苏丹发出一个表示支持的照会。沙皇尼古拉害怕孤立和企图加剧英法矛盾，同意大国出面调停。结果英、奥、普、俄撇开了法国，于 1840 年 7 月在伦敦签订了公约。公约规定土耳其应由订约国"集体保护"。俄国因此把威胁它的欧洲同盟变成了反法同盟。——见第 344 页

251 《公文集》——这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 1835—1837 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 的名称在 1843—1845 年出版的。——见第 345 页

252 **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各公国**——指 1848 年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废除封建奴役、争取民主自由、摆脱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以及实现民族团结和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见第 345 页

253 **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后尖锐化了。为了调整两国的关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曾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下于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谈判。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实际上已经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则希望建立在它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尼古拉一世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企图保持德意志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华沙争吵中，尼古拉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见第 346 页

254 **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恩格斯指的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于1852年5月8日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条约。这一文件是以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于1850年7月4日在伦敦签订的议定书为基础的。议定书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在内不得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想脱离丹麦与德意志合并的企图制造了障碍。1852年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仍然保留了丹麦国王个人对它们的最高权力。由于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无嗣，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被指定为继承人，后为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见第346页

255 **和约的条件极其宽大**——指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略，俄国同英、法在巴尔干、近东的矛盾导致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俄国为一方，土耳其和英、法为另一方)。俄国被打败，于1856年3月签订了巴黎和约。俄国被迫将它侵占的贝萨拉比亚南部归还莫尔达维亚，并被剥夺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利。和约规定黑海中立，对各国商船开放。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使它在巴尔干和近东的野心暂时受挫。但由于英法之间的矛盾和欧洲列强为了保存沙皇俄国这个欧洲宪兵，巴黎和约对战败国俄国的**"条件极其宽大"**(恩格斯)。——见第348页

256 **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聚力量**——这是亚·米·哥尔查科夫1856年8月21日给俄国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话。1856年他就任外交大臣时在这个通告中规定了俄国的外交政策的方针。——见第349页

257 **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指附于巴黎和约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由于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接近，两国于1859年3月3日缔结了秘密协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答应拿破仑第三在他准备从军事上粉碎奥地利方面给予外交上的援助，一旦战争发生即派俄军到奥地利边境，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军队。拿破仑则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见第350页

258 **意大利违反沙皇和路易-拿破仑的意志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1859年，拿破仑第三在得到亚历山大的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法国和皮蒙特(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掠夺新的

领土。马志尼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真正意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06—412页)

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把意大利统一于皮蒙特的萨瓦王朝。可是拿破仑第三害怕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奥军两次失败后，于1859年7月11日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初步和约，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皮蒙特。

但是意大利人民在1860年掀起了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波旁王朝，南意大利和皮蒙特合组成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的最后统一在1870年)。这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意大利违反沙皇和拿破仑的意志成了统一的国家。——见第350页

259 1863—1864年波兰起义期间，普鲁士的俾斯麦政府企图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鲁士侵占的波兰领土，并希望俄国支持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因此对沙皇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1863年2月，俄普缔结了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见第350页

260 这两个公国在*1864*年脱离了丹麦——1864年，奥、普同丹麦作战，丹麦失败，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被宣布由奥、普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后两公国被并入普鲁士。——见第350页

261 它发表了一篇宣言——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5—294页)——见第351页

262 从法国夺去亚尔萨斯—洛林——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法国失败告终。根据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缔结的初步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给1871年1月18日成立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最后确认了这个条约的条款。——见第351页

263 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指保加利亚境内的四边形要塞区：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苏姆拉和瓦尔那。1877—1878年俄土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见第352页

264 *1857*年的印度起义——1857—1859年印度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1857年春起义在孟加拉西帕依(土兵)部队中爆发，很快就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起义的基本动力是

农民和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的贫民。——见第353页

265 **复辟运动**——指和布朗热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86—1889年的法国沙文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推行的政策的不满，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准备政变，在法国复辟君主制。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支持者的蛊惑性的复仇主义口号。——见第354页

266 **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于1877年12月10日（俄历11月28日）和土耳其军队激战后攻占了普勒夫那（现名普累文，保加利亚北部的一个城市）。——见第355页

267 1867年奥地利帝国改为奥匈二元帝国，以莱达河为该国两部分的分界线。一部分称息斯莱达尼亚（意为"莱达河此岸地区"），包括奥地利、捷克-莫拉维亚、西里西亚、施梯里亚、克伦地亚、提罗尔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斯莱达尼亚（意为"莱达河彼岸地区"），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见第355页

268 指美国记者乔治·谦楠的一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这些揭露残酷虐待流放于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的文章是他在1885—1886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的，发表于1888—1890年在纽约出版的《现代插图月刊》（«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上。——见第355页

269 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俄国政府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自治机关一事。从1866年起，沙皇政府又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这种排挤到八十年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更加厉害。——见第356页

270 这里指的是德国元帅、德帝国总参谋长毛奇在1874年2月16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说。演说中不得不承认，德国人从打胜仗以来"到处都获得了尊敬，可是爱戴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见第357页

271 **俄国各大学的风潮**——1887年11月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发生了剧烈的风潮。1884年的大学章程所规定的检查活动取消了1863年章程规定的大学自治等权利，因而引起学生的反抗。1887年12月初在哈

尔科夫、敖德萨、喀山、彼得堡也发生了大学生风潮。学生风潮被军警镇压了下去。许多参加者被开除学籍并驱逐出境，有的甚至被送入军事感化营。——见第361页

272 指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和1870年9月色当会战中普军包围法军并迫使它投降后在德国出现的沙文主义情绪。——见第362页

273 由于斯捷普尼亚克(谢·米·克拉夫钦斯基)的努力，1890年在英国成立了"俄国自由之友社"，其任务是唤起西欧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1891—1900年，该社出版了《自由俄国》报（«Free Russia»）。——见第362页

274 立宪主义者——自由主义地方自治运动的代表，力图在俄国进行温和的立宪改革。——见第362页

275 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举行联欢、互喊"乌拉！"——指1891年7月至8月初俄国当局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见第363页

276 关于俄国人的问题——恩格斯所答复的是倍倍尔1891年10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局势的看法。倍倍尔认为战争危险日益增长，并认为俄国最有可能发动战争。——见第365页

277 色当战役——1870年9月1—2日的色当战役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拿破仑第三和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八万多名兵士、军官和将军都做了俘虏。色当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见第367页

278 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指1891年7月俄国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公开表示了俄国和法国的相互靠拢。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并于1892年8月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并于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一协定是法俄同盟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见第370页

279 巴黎公债——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五亿法郎)的公债，利率三厘。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1891年的饥荒，俄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

券。俄国政府为了防止公债完全失败，被迫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只推销了九千六百万卢布的公债。——见第370页

280 **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的方法**——关于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随之而来的是为容克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掠夺）。参见恩格斯：《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7—289页）。——见第372页

281 恩格斯指的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税草案》（«Projet d'une Dixme Royale»）（1707年出版）和比·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的零售商业》（«Le Détail de la France»）（1695—1707年多次出版）。——见第373页

282 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2期刊载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的保加利亚文译文。——见第382页

283 **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指1899年10月—1902年5月的英、荷殖民者争夺南非霸权的战争。英国通过战争把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伦治自由邦两个共和国变为大不列颠的殖民地。——见第388页

284 **阿列克谢也夫**——叶·伊·阿列克谢也夫是沙皇俄国海军将领，是1900年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的刽子手。1903—1905年任沙俄远东总督。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后，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沙河之役俄军战败后被解除总司令职务。——见第413页

285 **《革命俄国报》**——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1900年底创刊，1905年停刊。从1902年1月起是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见第415页

286 **每日公报**——列宁指的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消息报》从1905年10月17日（公历30日）到12月14日（公历27日）以公报的形式出版。共出了10号。第11号在印刷时被警察没收了。——见第428页

287 **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指从1864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的自由资产阶级报纸《Neue Freie Presse》（《新自由报》）。——见第431页

288 列宁指的是省贵族农村改革方案起草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会曾企图阻止改革而未能成功，因此，它们力图在自己的方案中尽量给贵族保留更

多的农奴制特权。在解放农民的同时，“为了调整农民的土地关系和监督它们的等级管理情况”，实行了调停官制度。调停官由总督在当地世袭贵族中挑选，由参政院批准。——见第438页

289 《俄罗斯真理》——是至今第一部关于11至12世纪基辅罗斯法院判例和公国立法全书的文字记录，它是在1738年从第一卷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抄本中发现的。《俄罗斯真理》的法规从法律上固定了在基辅国形成起来的封建关系。——见第439页

290 指《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做出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2卷中刊载的尼·卡雷舍夫的文章《农民非份地的租佃》(1892年德普特版)。——见第441页

291 利亚霍夫——沙皇俄国军队的上校，1908年指挥俄国训练的波斯骑兵旅疯狂镇压波斯的民族革命运动。——见第451页

292 《新时报》(日报)——于1868—1917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最初属于温和自由派，从1876年起变为反动贵族官僚集团的机关报。该报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运动。1905年起成为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列宁称《新时报》为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见第459页

293 波布里科夫分子——沙皇总督波布里科夫于1898—1904年在芬兰实行警察统治的羽翼和拥护者。——见第469页

294 见《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见第475页

295 《欧洲通报》——从1866年到1918年春天在彼得堡出版的宣传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月刊，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见第487页

296 *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1906年11月9日(22日)颁布的“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规定的补充”的法令和1910年6月14日(27日)“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的若干规定的修改和补充”的法律，确定了农民退出村社和份地归他们私有的规章。——见第488页

297 列宁引用的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序幕》中的主人公沃尔

金的话。——见第491页

298 **巴塞尔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形势下，第二国际于1912年11月24—25日（新历）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非常代表大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问题。大会通过了反战宣言，严厉谴责沙俄、英、法、德、意等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号召各国人民采取一切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终于爆发，就利用它来加速社会革命。——见第519页

299 **"最坏的联邦"**——是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用来说明1907—1911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边区和崩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虽然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它们实际上是独树一帜的。它们的代表不参加领导全俄党的工作；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协助了取消派的反党活动。（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7—439页和18卷第406—407页）。——见第531页

300 **《俄国评论报》**——1912—1913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是1912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机关报。列宁称这个党为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体。——见第532页

301 **民族"民主党"**——民族民主党（эндеки）是波兰资产阶级反动的、沙文主义的政党，成立于1897年。民族民主党由于革命运动的高涨而感到惊惶不安，他们放弃了原来的使波兰独立的要求，而提出在专制政制范围内实现狭隘的自治的要求。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民族民主党成了波兰反革命的主要政党，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成了波兰的黑帮。民族民主党人在国家杜马中支持十月党人。

1919年民族民主党改名为民族人民联盟（Звёнзек людово-народовы），1928年又改称民族党（Стронництво народов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党分子因为没有自己的政党，乃与反动的波兰农民党（Польске стронництво людове）合并。——见第532页

302 **在教育事业上的民族集团**——指按民族分校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民族文化自治"的基本要求而言。——见第532页

303 **《给果戈里的信》**——指1847年7月别林斯基写给果戈里的信，信中批判了果戈里在《致友人书信》中暴露的反动观点，指出俄国能否得救不在于传道与祷告，而在于废除农奴制度。列宁赞扬它"是一篇没有经过

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见第539页

304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1897年秘密出版，共出过两号，第2号是在日内瓦印的。——见第541页

305 《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前进报》是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从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到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过18号。列宁是该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专门的决议，指出《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主义、恢复党性的斗争中，在提出和阐明革命运动所提出的策略问题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

《无产者报》是秘密的布尔什维克的周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该报是根据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的。列宁被任命为该报的责任编辑。《无产者报》从1905年5月14日(27日)到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过26号。《无产者报》继续执行了旧《火星报》的路线，保持了《前进报》以来的传统。列宁为该报写了50多篇文章和短评。列宁在《无产者报》上发表的文章经常被布尔什维克的地方报刊转载和印成单页。列宁回国后出版的第25号、第26号报纸是瓦·瓦·沃罗夫斯基编辑的。——见第544页

306 《新生活报》——第一份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从1905年10月27日(11月9日)到12月3日(16日)每天在彼得堡出版。11月初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堡以后就直接领导该报。事实上《新生活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2月2日(15日)第27号出版后，《新生活报》就被政府封闭了。最后一号——第28号是秘密出版的。——见第544页

307 《开端报》——合法的孟什维克日报。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见第544页

308 《浪潮报》——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从1906年4月26日(5月9日)到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过25号。从1906年5月5日(18日)的第9号起(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列宁从斯德哥尔摩回国以后)，事实上是由列宁编辑的。《浪潮报》曾多次遭到警察迫害，后来被沙皇政府封闭了。因此出版了合法的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见第544页

309 《回声报》——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是1906年6月22日（7月5日）到7月7日(20日)在彼得堡出版以代替被政府封闭了的《前进报》的。共出过14号。列宁事实上是该报编辑，每一号上都载有列宁的文章。列宁直接参加了"报刊评论"栏的工作。在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前夕，《回声报》被封闭了。——见第544页

310 《人民杜马报》——孟什维克的日报，1907年3—4月在彼得堡出版。——见第544页

311 立宪民主党——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1905年10月成立。首领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但被苏维埃政权粉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见第547页

312 进步党——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进步党人就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列宁全集》第18卷第496页）。进步党人的头子是莫斯科的厂主列布申斯基和柯诺瓦洛夫。1912年11月进步党人形成了独立的政党。——见第547页

313 贵族联合会——俄国地主的反革命组织，1906年5月成立。该联合会对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在第三届国家杜马时期，有很多会员都参加了国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见第548页

314 十二月党人——俄国贵族革命者，因1825年12月14日发动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的起义而得名。

十二月党人的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数百名起义者被逮捕，穆拉维约夫、彼斯特里等五人被处绞刑。列宁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2页）——见第548页

315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见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见第549页

316 三个协约国——指英、法、俄三国于1907年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是同德、奥、意三国同盟对立的另一个军事侵略集团。——见第557页

317 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关于对伦纳和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思想的批判，见列宁《论"民族文化"自治》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4—507页，第20卷第1—35页)以及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见第560页

318 劳动派——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二月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见第561页

319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1905年至1912年，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见第562页

320 社会革命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权。

1917 年 12 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见第 562 页

321 **“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会议于 1915 年 2 月 14 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英、法、比三国社会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平主义派的代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布尔什维克没有被邀请，但是列宁委托李维诺夫（马克西莫维奇）出席代表会议，以便宣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这篇声明是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它要求社会党人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彻底决裂，拒绝同他们合作，坚决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谴责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李维诺夫在宣读声明时被打断并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他把声明原文交给主席团以后，就退出了会场。

关于伦敦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12—114、155—157 页。——见第 562 页

322 **《新闻报》**（*«Новости»*）——社会革命党的日报，1914 年 8 月至 1915 年 5 月在巴黎出版。——见第 562 页

323 **取消派**——1905—1907 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被斯托雷平的反革命屠刀吓破了胆，背叛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秘密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 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

参看列宁的《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57—480 页）。——见第 563 页

324 **《无产者呼声报》**（*«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Голо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15 年 2 月至 1916 年 12 月出版，共出了四号。该报创刊号曾转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第 563 页

325 **齐赫泽党团**——亦称七人团，是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

团的七个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见第564页

326 **拉斯普廷**——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早年是个偷马贼，后来装扮成"先知"，招摇撞骗，混入宫廷。在沙皇统治的末期(1914—1916年)，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对拉斯普廷十分宠信，言听计从。拉斯普廷的得势，是沙皇俄国上层统治腐败和没落的明显表现。——见第576页

327 **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代表俄国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月17日(公历30日)诏书颁布后成立。该党的首领是大工业家古契可夫和大土地所有者罗将柯。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10月17日诏书（在1905年革命的打击下，沙皇政府虚伪地答应给人民言论、集会等自由和成立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月党同立宪民主党等反动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同时，妄图通过极端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竭力反对俄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十月党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见第578页

328 **巴塞尔宣言**——第二国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11月24—25日)通过的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宣言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准备战争的掠夺目的，号召各国社会党人进行坚决的反战斗争。巴塞尔宣言重申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论点(这是列宁和卢森堡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第二国际的首领在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巴塞尔宣言，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就背弃了宣言，站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去了。——见第578页

329 **组委会分子**——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组委会分子即由此而来)是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在1912年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一切反党集团和派别联合举行的八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1917年8月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改选后停止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期间，组委会采取了

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见第580页

330 **和平革新党**——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成立于1906年，是由左派十月党人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成的。列宁称它为“和平掠夺党”。——见第581页

331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为了帮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于1915年在俄国成立的。资产阶级为了使工人接受自己的影响，向他们灌输护国主义的情绪，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工人团”，吸引工人代表参加这些团体，企图鼓动工人群众提高军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孟什维克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策划的这种冒牌的爱国主义的勾当；布尔什维克则宣布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胜利地进行了抵制。——见第582页

332 **《年鉴》杂志**（月刊）——文学、学术和政治性的杂志，1915年12月由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创刊，1917年8月停刊。——见第587页

333 **英国的宪章运动**——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争取通过人民宪章的政治运动。人民宪章包括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为保障工人享受此项权利而规定的一系列条件。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11页）——见第601页

334 **非常法**——是俾斯麦操纵德帝国国会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非常法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禁止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活动；禁止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出版，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战胜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群众，开展斗争，使党得到巩固和发展。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打击下，新上台的威廉二世被迫于1890年10月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参见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见第601页

335 **承认芬兰的独立**——1917年12月18日（公历31日）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该法令是列宁亲自交给芬兰资产

阶级元首斯文胡伍德的。1917年12月22日(公历1918年1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了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见第606页

336 《俄罗斯新闻》——1863年起由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局活动家们在莫斯科出版的报纸，代表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1905年起成为立宪民主党右派的机关报。——见第622页

337 彼得巴甫洛堡大狱——在冬宫对面，是俄国沙皇时代囚禁革命者的地方。——见第624页

338 《北方土地报》——是布尔什维克公开出版的日报，于1906年6月23日至28日在彼得堡出版。——见第625页

339 《俄国报》——是警察黑帮性质的日报，1905年11月创刊，1914年4月停刊，是俄国沙皇政府内政部的机关报。——见第625页

340 斯托雷平"新"命令——指1906年6、7月间，俄国沙皇政府内政部大臣斯托雷平通令各地方当局对工农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采取残酷的军事惩治办法。——见第626页

341 特列波夫——彼得堡总督，曾指挥镇压1905年的革命。——见第626页

342 连纳发生的事件——1912年4月4日，俄国沙皇政府对西伯利亚连纳河地区金矿举行和平罢工的六千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当时被沙皇军队枪杀的工人有二百七十人，受伤的有二百五十人。史称连纳惨案。——见第627页

343 库托马尔、阿尔加契等地发生的事情——1912年8月至10月，俄国库托马尔和阿尔加契两个苦役监狱(尼布楚苦役流放地，位于外贝加尔)的政治犯为抗议监狱当局的暴行，发生大批绝食和自杀事件。为了对此表示响应，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学生举行集会。——见第627页

344 枪毙十七名黑海水兵——1912年10月，俄国沙皇政府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军事法庭判决一百四十二名被控准备在黑海舰队起义的水手。被告中十七人被判处死刑，一百零六人被判处苦役。为反对法庭的判决，莫斯科、彼得堡、哈尔科夫、尼古拉也夫、里加和俄国其他城市都举行了群众性的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见第627页

345 1911年底，俄国报刊上发表揭露沙皇政府陷害行为的新文件：控告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的材料完全是彼得堡暗探局一手捏造的。1911年11月中旬，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向杜马提出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第二届杜马代表的案件。这一要求被杜马否决了。因此，彼得堡、里加、华沙和俄国其他城市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群众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释放被判刑的代表。——见第628页

346 **路标转换派**——俄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派，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俄国白卫分子中间组成，由出版《路标转换》杂志（最初曾以此名出版过一本文集）的集团领导。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反映了那些放弃同苏维埃政权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路标转换派分子指望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逐渐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见第637页

347 指1925年5月18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所做的《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3—127页。——见第647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

篇 目 索 引

马克思、恩格斯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5日—1846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9—645页

恩格斯：三个新宪法（1848年2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0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298页

〔**马克思、恩格斯**〕：**6月15日的妥协会议**（1848年6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2—93页

恩格斯：布拉格起义（1848年6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兹尔温努斯报》的威胁**（1848年6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20—1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184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35页

*〔**马克思、恩格斯**〕：**俄国的照会**（1848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42—349页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89—393页

恩格斯：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1848年9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7—468页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9、11、15、29日）《马克思恩

注：有"*"者，是本书选用的文章。——编者注

格斯全集》第6卷第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新“神圣同盟”**（1848年12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1—172页

马克思：**革命运动**（1848年12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4页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8—207页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14—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

恩格斯：**《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1849年2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62—368页

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年3月30日—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4页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发表于1849年4月5—8日、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0页

*恩格斯：**俄国人**（1849年4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15—517页

恩格斯：**波兹南**（1849年4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36—539页

*恩格斯：**同盟中的第三者**（1849年5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62—563页

*恩格斯：**沙皇和他的藩臣们**（1849年5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69—570页

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1849年5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71—575页

〔马克思、恩格斯〕：**普鲁士新宪法**（1849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78—57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新的军法宪章**（1849年5月15—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88—591页

马克思：**《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184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3页

*恩格斯：**匈牙利**（184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4、612—6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告我的人民”**（184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6卷第616—618页

恩格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1849年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24—626页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弗莱里格拉特（1849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8—529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8页

*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1850年1月31日—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7—258页

马克思、恩格斯：普鲁士流亡者（1850年6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8页

马克思、恩格斯：伦敦的普鲁士密探（1850年6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2页

* **恩格斯：一八五二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53—557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5—287页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5—549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7—38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21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3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26页

*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12日—22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13页

* **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1853年3月23—28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19页

马克思：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1853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0—23页

*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1853年3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30页

*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 年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35—40 页
* **马克思：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1853 年 5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21—123 页
马克思：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土耳其问题（1853 年 5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24—128 页
*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1853 年 5 月 3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29—131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 年 6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257 页
* **马克思：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1853 年 6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32—135 页
马克思：英国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1853 年 6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55 页
* **马克思：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1853 年 6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60—166 页
* **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1853 年 7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84—189 页
马克思：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1853 年 7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197—198 页
* **马克思：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1853 年 7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18—223 页
马克思：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1853 年 7 月 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29—236 页
*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1853 年 7 月 1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37—241 页
* **马克思：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1853 年 7 月 2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57—263 页
马克思：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1853

年8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65—270页

* 马克思：**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1853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71—277页

马克思：**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1853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78—279、288—289页

马克思：**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1853年8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91—298页

*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在下院**（1853年8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99—312页

马克思：**大陆和英国的情况**（1853年8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13—317页

马克思：**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1853年9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30—333页

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1853年9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50—356页

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1853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60—369页

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1853年9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9—385页

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1853年10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62—464页

*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1853年10月—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01—403、410—411、419—421、443—446页

* 马克思：**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1853年10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72—473页

马克思：**德列克吕兹被捕。——丹麦。——奥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1853年10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78—479页

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1853年10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80—485页

* 恩格斯：**神圣的战争**（1853年10月2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卷第486—490页

马克思：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1853年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91—500页

马克思：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丹麦。——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威根的矿工（1853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01—503页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年11月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07—514页

恩格斯：俄军的失败（1853年11月1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15—517页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年11月1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30—536页

恩格斯：多瑙河战争（1853年12月2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80—587页

马克思：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1853年12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88—589页

马克思：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1853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92—601页

马克思：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1853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602—608页

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1853年12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610页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年12月22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613—619页

恩格斯：欧洲战争（1854年1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8页

马克思：西方强国和土耳其（1854年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9—19页

* **马克思：东方战争**（1854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0—31页

马克思：东方的军事行动。——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1854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2—38页

恩格斯：欧洲战区最近的一次会战（1854年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10卷第39—42页

马克思：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1854年1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2—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1854年1月26—2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8—51页

马克思：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俄国的战时财政(1854年2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6—60页

马克思：蓝皮书。——二月六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 (1854年2月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1—66页

马克思：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1854年2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9—76页

恩格斯：欧洲战争问题(1854年2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77—81页

马克思：议会辩论(1854年2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85—99页

马克思：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1854年2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00—109页

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1854年3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17—124页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1854年3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0—142页

恩格斯：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1854年3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3—147页

* **马克思：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1854年3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8—159页

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1854年3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60--177页

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1854年3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78—183页

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1854 年 3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673—679 页

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1854 年 4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188—199 页

马克思：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1854 年 4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00—206 页

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1854 年 4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07—211 页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波兰侨民。——奥地利—普鲁士条约。——关于俄国武装的文件(1854 年 4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21—227 页

马克思：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1854 年 5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28—232 页

恩格斯：辉煌的胜利(1854 年 5 月 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44—248 页

恩格斯：战争(1854 年 5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55—261 页

马克思：奥地利。——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1854 年 5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69—274 页

马克思：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1854 年 6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75—280 页

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1854 年 6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289—30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俄土战争的形势(1854 年 6 月 14—1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303—309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俄军的撤退(1854 年 6 月 19—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310—314 页

马克思：战争。——议会辩论(1854 年 6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315—323 页

* **马克思：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854 年 7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329—333 页

恩格斯：**多瑙河战争**(1854年7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34—339页

马克思：**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1854年7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47—348页

马克思：**意大利的紧张。——西班牙事件。——德意志各邦的立场。——英国法官**(1854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49—359页

马克思：**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杜尔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内阁危机**(1854年7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60—361页

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1854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75—382页

马克思：**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1854年7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83—39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聊的战争**(1854年7月29日—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95—400页

恩格斯：**对俄国要塞的攻击**(1854年8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09—411页

马克思：**撤出多瑙河各公国。——西班牙事件。——丹麦新宪法。——宪章派**(1854年8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12—413页

马克思：**撤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波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185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20—425页

* 马克思：**东方问题。——西班牙革命。——马德里报刊**(1854年8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30—434页

马克思：**西班牙的革命。——博马尔松德**(1854年8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40—441页

恩格斯：**博马尔松德的夺取**(第1篇论文)(1854年8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42—446页

恩格斯：**博马尔松德的夺取**(第2篇论文)(1854年8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47—451页

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1854年8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

卷第509—510页

马克思：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各公国的局势。——西班牙。——英国的对外贸易（1854年9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25—534页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1854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35—544页

恩格斯：克里木的消息（1854年10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45—5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1854年10月5—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51—5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1854年10月5—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56—559页

恩格斯：阿尔马河会战（1854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60—565页

恩格斯：俄国的兵力（1854年10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66—571页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1854年10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72—576页

恩格斯：克里木战局（1854年1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77—585页

恩格斯：巴拉巴克瓦会战（1854年1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86—593页

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1854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94—599页

恩格斯：克里木战局（1854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00—606页

马克思、恩格斯：战况的进展（1854年12月14—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07—614页

恩格斯：奥地利的兵力（1854年1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18—619页

马克思：克里木战局的回顾（1854年12月29日—1855年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20—625页

马克思：四项条款（1855年1月9日—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46—651页

马克思、恩格斯：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1855年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61—663页

马克思：维也纳谈判的真正目的。——反普鲁士的辩论。——雪球暴动（1855年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64—665页

恩格斯：欧洲战争（1855年1月29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4—19页

恩格斯：克里木的斗争（1855年2月9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7—61页

马克思：英国报刊论沙皇逝世（1855年3月3—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22—123页

马克思：克里木事件（1855年3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38—141页

马克思：塞瓦斯托波尔会战（1855年3月23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70—174页

恩格斯：论克里木局势（1855年3月30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96—199页

恩格斯：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1855年4月1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14—217页

*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1855年4月1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18—225页

马克思：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1855年5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88—294页

马克思：奇怪的政策（1855年6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43—347页

恩格斯：欧洲军队。——俄国军队（1855年6月底—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01—514页

恩格斯：黑河会战（1855年8月3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75—581页

恩格斯：克里木战争的前景（1855年9月14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595—600页

恩格斯：俄国的抵抗力量（1855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607—609页

* **恩格斯：俄国军队**（1855年11月2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

卷第636—641页

恩格斯：亚洲战争（1856年1月1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646—652页

恩格斯：欧洲战争（1856年1月1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653—657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1—15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2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23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页

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1857年1月2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27—132页

* **恩格斯：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1857年1月底—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33—139页

*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1857年3月1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1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07页

恩格斯：俄国军队的改革（1857年4月16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09—212页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1857年5月20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

马克思：东方问题（1857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77—28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巴克莱—德—托利（1857年9月10日—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92—9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卞尼格先（1857年9月10日—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12—115页

恩格斯：博罗迪诺（1858年1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58—263页

马克思：历史上有趣的一页（1858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08—515页

*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1858年9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34—35页

* 马克思：**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58年10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7—630页

* 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1858年10月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6—642页

马克思：**普鲁士的摄政**（185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48—651页

*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1858年10月2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40页

恩格斯：**一八五八年的欧洲**（1858年11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96页

* 马克思：**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1858年12月29日和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16—725页

马克思：**欧洲战争的前景**（1859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85—188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7页

恩格斯：**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1859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20—324页

恩格斯：**战争的不可避免**（1859年4月1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34—337页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1859年9月13日、16日、20日和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43、45—49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4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封信

马克思：**英国的政治**（1860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2—13页

*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因**（186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0—680页

*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2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33—565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

封信

马克思致摩里茨·佩尔采尔（1860年4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封信

马克思：为拿破仑在莱茵河上的未来战争作准备（1860年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5、58—59页

马克思：加里波第在西西里。——普鲁士的状况（1860年5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6—67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封信

马克思：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1860年7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10—112页

马克思：俄法同盟（1860年8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21—126页

马克思：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1860年8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57—162页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9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封信

* **马克思：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186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92—195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1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0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11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3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1年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3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5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7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2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49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81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2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

183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 年 4 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92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3 年 6 月 1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96 封信

恩格斯：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 (1863 年 6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627—643 页

马克思：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会(1863 年 10 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614—615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3 年 12 月 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06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 年 1 月 3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09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4 年 1 月 20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10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 年 6 月 7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23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4 年 6 月 10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25 封信

马克思致莱昂·菲力浦斯 (1864 年 6 月 25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03 封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1864 年 10 月 21 日和 27 日之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4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5 年 6 月 2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29—130 页

*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 年 1 月底—4 月 6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70—183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 年 4 月 6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03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4 月 6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05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6 年 4 月 10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06—207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6 年 4 月 13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09—210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4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11—212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5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16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6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24—225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 年 7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37—238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7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45 页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 年 8 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22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 年 12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72 页

* **马克思：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1867 年 1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24—229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 年 4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84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 年 4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85—286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 年 5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0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 9 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65—267、615—616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 年 2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3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 年 3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1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 年 7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61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 年 7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62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 年 7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65

封信

马克思：总委员会就不列颠政府对沙皇俄国的态度所作的声明（1868 年 7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56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 年 9 月 1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89 封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 年 10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1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 年 11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13 封信

马克思：一八六六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1868 年 11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77—379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 年 11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17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 年 2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52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 年 4 月 1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177 封信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69 年 6 月 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45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 年 7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05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 年 11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31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 年 11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32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 年 2 月 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51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 年 2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53 封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 年 2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54 封信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 年 2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64 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5封信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1870年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封信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1870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封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1870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3—464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4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76封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7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9封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1870年7月19日—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7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8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2—34页

马克思、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1870年8月22日—23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3页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0年9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48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9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2页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6—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9—290页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1870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52—153页

恩格斯：筑垒的首都（1870年1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188页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9页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71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77—178页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82—183页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71 年 2 月 4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 卷第 186—187 页

* **恩格斯：俄国状况**(1871 年 3 月 15 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07—310 页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1 年 4 月 6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03 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 年 4 月—5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559—560 页

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1871 年 5 月 5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26 页

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 (1871 年 9 月 17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69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1872 年 2 月 10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529—530 页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委员会的相互关系(1872 年 5 月 14 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87 页

马克思：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1872 年 5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96 页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2 年 5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470 页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2 年 6 月 2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493 页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3 年 3 月 2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577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 年 4—7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489—492 页

恩格斯：帝国军事法(1874 年 2 月底—3 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56—557 页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4 年 5 月 1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632 页

*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 年 5 月—1875 年 4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80—587、616—629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4 年 7 月 15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11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4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16页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年—1875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57—629页

* **恩格斯：支持波兰**（发表于1875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0—633页

*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1875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1—644页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洛夫（1875年1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5—166页

恩格斯致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875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6页

* **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1876年1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40页

恩格斯：威廉·沃尔弗（1876年6—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99—100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1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8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9页

马克思致列奥·弗兰克尔（1876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98页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6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01页

马克思致彼德·拉甫洛维奇·拉甫洛夫（1876年10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03页

*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76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16—217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约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8—679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6年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23页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77年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24页

恩格斯致菲力浦·鲍利（1877年3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40页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4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51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3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5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页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57—259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7年7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60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7—48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7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9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1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7—58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63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8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72—73页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77年10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7页
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77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9页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8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94页

* **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1878年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2—134页
*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8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94—297页
*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8年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97—302页
*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878年2月中—3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5—158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8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76—77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8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78—79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8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84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8年9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85页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87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凡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9页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5—366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9年9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02—103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9年9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05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2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8页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1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10页

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约1879—1880年）人民出版社1965年单行本第103—104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0年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413—414 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0 年 5 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422 页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1880 年 8 月 5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427—429 页

*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1880 年 11 月 27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65—267 页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1881 年 2 月底—3 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30—452 页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1年 3 月 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68—269 页、第 35 卷第 159—16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1881 年 3 月 2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70—271 页

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 (1881 年底—1882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53—477 页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882 年 1 月 21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0—231 页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2 年 2 月 7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260—265 页

*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2 年 2 月 22、25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269—278 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 年 4 月 2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06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 年 9 月 1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90 页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882 年 9 月 1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53—354 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82 年 9 月 16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93 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82 年 11 月 1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04 页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1883 年 4 月 28 日—5 月 1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80—388 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3 年 6 月 12—13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36 卷第 34—41 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3 年 8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7—60 页

附录：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妙尼娜的信的片断（1883年9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539—541 页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3 年 11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71 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 年 11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73—74 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 年 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80—82 页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84 年 1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96—97 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 年 2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99—101 页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84 年 2 月中—3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83 页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 年 3 月 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19—120 页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4年 3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21—123 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3 月底—5 月 2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71—72、161 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 年 6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60—164 页

恩格斯：帝俄高级炸药顾问（1885 年 1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21—223 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5 年 1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276—277 页

*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 年 4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00—305 页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1885 年 7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37—238 页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 年 10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4卷第201页

恩格斯：致扎洛·费尔伯（1885年10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64—366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5年1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7—390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5年1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93—394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5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05—407页

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1886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9—300页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6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81—482页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6年8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90—491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6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96—497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6年8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03页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9月13—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12—517页

*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6年9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17—520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2—536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6年10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6—537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10月23—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41—544页

* **恩格斯：欧洲政局**（1886年10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6—364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6年10月25—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45—553页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1887年1月10日）《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77 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7 年 1 月 2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585—587 页

恩格斯致尤莉娅·倍倍尔（1887 年 3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13—615 页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7 年 3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19—621 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7年 4 月 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21—623 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7年 4 月 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23—625 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7 年 4 月 1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26—627 页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7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635—638 页

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1887 年 12 月 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399 页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 年 12 月底—1888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63—513 页

* **恩格斯致著昂·纳杰日杰**（1888 年 1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6 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8 年 2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18—19 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8 年 2 月 22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22—23 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8 年 2 月 23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27—28 页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8 年 2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2—33 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8 年 2 月 2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5 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8 年 4 月 29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55 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8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15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9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53页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9年5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2页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89年6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28—229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9年8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8—249页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9年9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62页

*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0年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46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0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59—360页

*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90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70—372页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90年1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09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1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页

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5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69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8月9—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36—137页

*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8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39—140页

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1891年9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1—283页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9月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46—147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54—159页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1年10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70—171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10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0—181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10月24—2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4—186页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1年10月29—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95页

*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3—303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1年11月9—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12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1年12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25—226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2年2月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61—262页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九二年波兰文版序言 (1892年2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9—330页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2年3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04—307页

附录：**恩格斯对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 (1892年4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7—623页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2年6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62—367页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 (1892年8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28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8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8页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2年9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64—468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0月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88页

恩格斯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00页

恩格斯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03—504页

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1892年11月底—1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9—413页

恩格斯：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 (1893年1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15—417页

恩格斯：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一八九三年意大利文版序言(1893年2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29—431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3年2月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6封信

* **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 (1893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52—459页

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1893年5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6—627页

* **恩格斯：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1893年6月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7—478页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1871—1875)》序 (1894年1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8—491页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1月上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4年11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65封信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11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66封信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4年11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73封信

恩格斯致约瑟夫·维尔谢维奇·阿塔贝强茨(1894年11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74封信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洛维奇·拉甫洛夫(1894年12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4封信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4 年 12 月 1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185 封信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94 年 12 月 2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187 封信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 年 1 月 22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206 封信

恩格斯致维拉·伊凡诺夫娜·查苏利奇 (1895 年 1 月 30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210 封信

恩格斯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1895 年 2 月 8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213 封信

恩格斯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1895 年 2 月 26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219 封信

恩格斯致爱德华·瓦扬 (1895 年 3 月 5 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220 封信

列　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 年春夏)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79 页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 年秋)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1—94 页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1896 年)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69—93 页

告沙皇政府(1896 年秋)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94—98 页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6—1899 年)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1—558 页

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 年 3 月)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75—76 页

为《工人报》写的文章：我们的纲领(1899 年下半年)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86—190 页

迫切的问题(1899 年下半年)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6—200 页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 年底)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01—222 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1899 年底)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23—250 页

谈谈罢工(1899 年底)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79 页

《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 (1900 年 11 月初)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19—327 页

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 年 11 月上半月)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28—

333 页

* **中国的战争**(1900 年 12 月)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3－217 页

时评(1901 年 1 月)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51—353 页

183 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1901 年 1 月)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71—375 页

工人政党和农民(1901 年 2 月)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76—383 页

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901 年 3 月 20 日)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45 页

新的激战(发表于1901 年 6 月)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11—16 页

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901 年 6 月)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17—63 页

宝贵的招供(1901 年 7 月)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64—70 页

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901 年 8 月 30 日)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72—73 页

* **危机的教训**(1901 年 8 月)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72、75 页

农奴主在活动(1901 年 9 月 10 日)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76—80 页

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 (发表于 1901 年 9 月 10 日)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81—82 页

内政评论(1901 年 10 月)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23—268 页

苦役条例和苦役判决 (发表于 1901 年 11 月)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17—222 页

* **芬兰人民的抗议** (发表于 1901 年 11 月 20 日)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73—277 页

示威游行开始了(发表于 1901 年 12 月 20 日)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89—292 页

怎么办?(1901 年秋—1902 年 2 月)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20—460 页

评国家预算(发表于 1902 年 1 月 15 日)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98—303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902 年 1 月底—2 月初)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0—16 页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发表于 1902 年 2 月 1 日)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04—310 页

破产的征兆(发表于 1902 年 2 月 15 日)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61—66 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2 年 2 月—3 月上半月) 《列宁全集》第

6卷第87—126页

政治斗争和政治手腕(发表于1902年10月15日) 《列宁全集》第6卷第222—226页

为下新城工人在法庭上的演说写的前言 (1902年12月1日以前)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04页

论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 (发表于1903年2月1日) 《列宁全集》第6卷第293—296页

专制制度在动摇中……(发表于1903年3月1日) 《列宁全集》第6卷第312—317页

* **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390—451页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发表于1903年7月15日) 《列宁全集》第6卷第413—421页

* **五一节** 传单草稿 (1904年4月) 《列宁全集》第7卷第185—188页

我们争取什么(1904年7月) 《列宁全集》第7卷第439页

告全党书(1904年8月上半月) 《列宁全集》第7卷第447页

俄国的新公债 (1904年12月16日〔29日〕以后) 《列宁全集》第8卷第23—24页

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 (1904年12月22日) 《列宁全集》第7卷第491—502页

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 (发表于1905年1月4日〔1904年12月22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1—10页

* **旅顺口的陷落**(1905年1月14日〔1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29—37页

俄国革命(发表于1905年1月24日〔11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52页

俄国革命的开始 (发表于1905年1月31日〔18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77—80页

革命的日子(发表于1905年1月31日〔18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81—100页

特列波夫执掌大权 (发表于1905年2月7日〔1月25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109—112页

1月9日后的彼得堡(发表于1905年2月7日〔1月25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113—114页

最初的几点教训(1905年2月初) 《列宁全集》第8卷第115—119页

《警察司长洛普兴的报告书》序言(1905年2—3月) 《列宁全集》第8卷第174—177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发表于1905年3月23日〔10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04页

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1905年3—4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229—231页

欧洲资本和专制制度(发表于1905年4月5日〔3月23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39—246页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3月底—4月初)《列宁全集》第8卷第247页

法国和俄国的"行贿"之风!(发表于1905年4月12日〔3月30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74—275页

* **五一节**(1905年4月12日〔25日〕以前)《列宁全集》第8卷第318—32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1905年4月18日〔5月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54—355页

马克思论美国的"平分土地"(发表于1905年4月20日〔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99页

宪法交易(发表于1905年4月30日〔1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322—326页

告犹太工人书(1905年5月底〔6月初〕)《列宁全集》第8卷第463—466页

保守派资产阶级的忠告(发表于1905年6月3日〔5月2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26—429页

* **覆灭**(1905年6月9日〔5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50—453页

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发表于1905年6月9日〔5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54—462页

致社会主义国际局(1905年6月21日〔7月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21—522页

资产阶级叛卖的头几步(发表于1905年6月26日〔13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86—492页

带白手套的"革命家"(发表于1905年6月26日〔13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493—497页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7、111、117页

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发表于1905年7月3日〔6月20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04—510页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发表于1905年7月10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26—534页

俄国沙皇从土耳其苏丹那里寻找防御本国人民的办法（发表于1905年7月10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35—539页

资产阶级向专制制度讨价还价，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发表于1905年7月10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540—542页

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发表于1905年8月2日〔7月20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55—164页

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发表于1905年8月16日〔3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65—172页

"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发表于1905年8月29日〔16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76—184页

黑帮分子和组织起义（发表于1905年8月29日〔16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85—189页

作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作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发表于1905年9月5日〔8月23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97—208页

我国自由资产者要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发表于1905年9月14日〔1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228页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10月5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53页

莫斯科流血的日子（1905年10月10日〔9月27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22—326页

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搏斗（发表于1905年10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33—341页

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清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发表于1905年10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54—355页

势均力敌（1905年10月17日〔30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01—402页

关于特鲁别茨科伊之死（1905年10月中旬）《列宁全集》第9卷第360页

莫斯科事变的教训（发表于1905年10月24日〔11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61—369页

全俄政治罢工（发表于1905年10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77—380页

政治分派的初步总结（发表于1905年10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81—389页

革命的里加的最后通牒（发表于1905年10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93—394页

俄国局势的尖锐化（发表于1905年10月31日〔18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97—399页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年11月2—4日〔15—1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页

* **最新的消息**（1905年11月4日〔10月22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23页

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发表于1905年11月7日〔10月25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15—422页

尼古拉·艾尔涅斯托维奇·巴乌曼（发表于1905年11月7日〔10月25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24—425页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1905年11月14日〔2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0—31页

无效的挑衅（发表于1905年11月15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2—33页

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4—37页

* **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发表于1905年11月16日〔3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35—442页

秤盘摇晃着（1905年11月1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8—39页

革命的文牍主义和革命事业（发表于1905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2—45页

垂死的专制制度和新的人民政权的机关（发表于1905年11月2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6—50页

两次会战之间（发表于1905年11月25日〔12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444—452页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发表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54、55页

社会主义和宗教（发表于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3—64页

工人政党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任务（1905年12月底）《列宁全集》第10

卷第72—75页

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1905年底或1906年初）《列宁全集》第10卷第68—71页

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906年1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80—88页

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发表于1906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89—95页

告彼得堡市和城外地区全体男女工人书（1906年2月11日〔24日〕以后）《列宁全集》第10卷第10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关于抵制策略的决议（1906年2月底—3月初）《列宁全集》第10卷第109—112页

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发表于1906年3月2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13—123页

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发表于1906年3月2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24—138页

卡·考茨基著《再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了！》小册子俄文版序言（1906年3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169页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70—247页

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1906年4月25—26日〔5月8—9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1—282页

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发表于1906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52—354页

新的高潮（发表于1906年5月6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55—360页

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的决议（1906年5月9日〔22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79页

杜马中的土地问题（发表于1906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84—386页

既不给土地，也不给自由（发表于1906年5月14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90—391页

社会民主党在梯弗里斯选举的胜利（发表于1906年5月14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392—39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II）（发表于1906年5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453页

关于目前的政治局势（1906年5月27日〔6月9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57—461页

无产阶级的策略和目前的任务（发表于1906年5月3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62—465页

反动派开始了武装斗争（1906年6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81—48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杜马内阁问题的决议(III)（发表于1906年6月6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487—488页

从上面来的动摇和从下面来的坚定（发表于1906年6月9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3—5页

团结起来(发表于1906年6月10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8页

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发表于1906年6月14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14—15页

有益的辩论(发表于1906年6月22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26—27页

资产阶级的谴责和无产阶级的号召（发表于1906年7月1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68—69页

勇敢的攻击和屈怯的防御（发表于1906年7月5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83—84页

反动派的阴谋和躁动者的威胁（发表于1906年7月7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90—93页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7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96—98页

暴风雨之前（发表于1906年8月21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115—122页

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发表于1906年8月21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139页

政府的政策和未来的斗争（发表于1906年9月8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165—169页

以波兰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边区、圣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代表名义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的特别意见(1906年11月23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280页

告选民书草案（发表于1906年11月23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282页

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发表于1906年12月24日）《列宁全集》第

11卷第374页

* **关于斯托雷平的声明**(1907年2月底)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82—184页

*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1907年3月21—25日〔4月3日—7日〕之间) 《列宁全集》第12卷第249—283页

第三届杜马 (发表于1907年10月29日) 《列宁全集》第13卷第107—109页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0—409页

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发表于1908年2月19日〔3月3日〕)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1—452页

* **政治评论**(发表于1908年2月26日〔13日〕)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17—418页

一场预订的普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 (发表于1908年3月12日〔25日〕)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7—462页

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1908年新历7月1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50—121页

* **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 (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6—162页

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 (发表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3—175页

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 (发表于1908年10月3日〔16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7—193页

*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 (1908年10月16日〔29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4—204页

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发表于1908年11月1日〔14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243—25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1908年12月底—1909年1月初) 《列宁全集》第15卷第294—297页

走上轨道 (发表于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21—323页

* **评沙皇的欧洲之行和黑帮杜马某些代表的英国之行** (1909年7月11日〔24日〕) 《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8—432页

* **沙皇对芬兰人民的进攻**（1909年10月31日〔11月13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70—73页
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1909年12月2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420页
论统一（发表于1910年2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48页
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4—195页
斗争是为了什么？（发表于1910年3月23日〔4月5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63—167页
* **对芬兰的进攻**（1910年4月26日〔5月9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68—172页
给《斗争报》纪念号（发表于1910年7月）《列宁全集》第16卷第259—260页
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1910年10月）《列宁全集》第16卷第286—289页
* **革命的教训**（发表于1910年10月30日〔11月12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5—302页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发表于1910年11月28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9—331页
游行示威开始了（发表于1910年12月18日〔31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4—357页
农村景况如何？（发表于1910年12月18日〔31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8—359页
论俄国罢工统计（1910年年底）《列宁全集》第16卷第393—419页
我们的取消派（发表于1911年1月和2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51—52页
* **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发表于1911年2月8日〔2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70—73页
关于纪念日（发表于1911年2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92—100页
* **"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发表于1911年3月19日〔4月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1—110页
论政权的社会结构、前途和取消主义（发表于1911年3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6—127页

* **斯托雷平和革命**（发表于1911年10月18日〔3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30—238页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发表于1911年10月18日〔3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4页

旧的和新的（发表于1911年11月5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2—285页

关于第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发表于1911年12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307—311页

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发表于1911年12月8日〔21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17页

饥饿和黑帮杜马（发表于1911年12月22日〔191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42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1912年1月上半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0—43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饥荒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草案（1912年1月上半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2—433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的决议（1912年1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6—45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1912年1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的决议（1912年1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45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1912年3月初）《列宁全集》第17卷第477—483页

* **饥饿**（发表于1912年3月17日〔30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497—498页

*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发表于1912年5月6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7—20页

论俄国各政党（发表于1912年5月10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9—40页

"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发表于1912年5月22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62页

移民问题(发表于1912年6月3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81—82页
革命的高涨(发表于1912年6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88—9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发表于1912年6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01页
资本主义和议会(发表于1912年6月17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16—118页
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比较(发表于1912年7月1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1—137页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发表于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1—152页
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发表于1912年7月20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16页
陆海军中的起义(发表于1912年7月30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24—227页
* **最后一个汽门**(发表于1912年8月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39—244页
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发表于1912年8月8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47—248页
罢工斗争和工资(发表于1912年8月9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49—250页
俄国的生产积聚(发表于1912年8月12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263—264页
孤注一掷(1912年10月4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32—333页
论狐狸和鸡窝(1912年10月18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4—346页
可耻的决议(1912年10月18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7—348页
* **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1912年10月21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63—364页
立宪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者(发表于1912年10月24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65—366页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胜利的社会意义(发表于1912年11月7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2—394页
新生的中国(发表于1912年11月8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
* **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1912年11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

408—414 页

* **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1912 年 11 月中)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415—418 页

生活在教导人们(发表于 1913 年 1 月 19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16—518 页

论民粹主义(发表于 1913 年 1 月 20 日和 22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21—525 页

在阿捷夫之流之间 (发表于 1913 年 1 月 25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30—531 页

俄罗斯人和黑人(1913 年 1 月底)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41—542 页

一个发现(发表于 1913 年 2 月 5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43—544 页

日益增长的矛盾 (1913 年 2 月 6 — 9 日〔19—22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60—578 页

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 (发表于 1913 年 3 月 2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85—586 页

给阿·马·高尔基 (1913 年 3 月 6 日以后)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74 页

自由派粉饰农奴制的勾当 (发表于 1913 年 3 月 9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92—593 页

我们的"成就"(发表于 1913 年 3 月 14 日)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96—597 页

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发表于 1913 年 3 月 22 日)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9—10 页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913 年 3 月 29 日以前)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75 页

巴尔干战争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1913 年 3 月 29 日)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19—20 页

今日俄国和工人运动(发表于 1913 年 4 月 22 日)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27—31 页

移民事业的意义 (发表于 1913 年 4 月 27 日和 5 月 1 日)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47—53 页

资产阶级的国际政策 (发表于 1913 年 5 月 4 日)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215—216 页

地主关于使农村"平静"的呼声(发表于 1913 年 5 月 4 日)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217—218 页

再谈移民事业（发表于1913年5月9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72—73页

建筑工业和建筑工人（发表于1913年5月9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223—224页

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发表于1913年5月10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74—75页

对第四届杜马的评价（1913年5月15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225—226页

农民是在恢复起来还是在贫困下去？（发表于1913年5月16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79—81页

地主的土地规划（发表于1913年5月21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88—89页

物价上涨和资本家生活困难（发表于1913年5月22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227—228页

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1913年6月2日〔15日〕以前）《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4—134页

论现代政府的土地政策（一般的）问题（1913年6月7日〔20日〕以前）《列宁全集》第19卷第171—187页

一次值得注意的代表大会（发表于1913年6月13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247—248页

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示威游行（发表于1913年6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10—219页

* **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236—244页

杜马休会和自由派茫然失措（发表于1913年7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51—253页

立宪民主党人论乌克兰问题（发表于1913年7月16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0—261页

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分离（发表于1913年8月11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7—299页

犹太学校民族化（发表于1913年8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03—304页

* **各等级和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发表于1913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27—329页

尼康主教是怎样维护乌克兰人的？（发表于1913年9月13日）《列宁全

集》第19卷第379—381页

关于俄国的管理和俄国的改良（发表于1913年9月26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92—393页

一九一三年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19卷第426—427页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发表于1913年12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542—548页

自由派教授论平等（发表于1914年3月11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8页

资本主义和报刊（发表于1914年3月20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158页

政治的教训（发表于1914年3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64—165页

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发表于1914年3月28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166页

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1—219页

* **民族平等**（发表于1914年4月16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32—233页

农村中的农奴制经济（发表于1914年4月20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37—239页

*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发表于1914年4月22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248页

“田庄旁边的邻居”（发表于1914年5月8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81页

论两条道路（发表于1914年5月24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04—307页

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04—414页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发表于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8—459页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1914年8月24日〔9月6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1卷第3—4页

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1914年8月底至9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7页

论战争的提纲（1914 年 9 月 5—6 日）《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283—284 页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1914 年 9 月 28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5 页

1914 年 10 月 1 日（14 日）所作的专题报告：《无产阶级和战争》（1914 年 10 月 1 日）《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291—293 页

给亚·施略普尼柯夫（1914 年 10 月 17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146—147 页

*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 年 12 月 12 日）《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09—613 页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发表于 1915 年 2 月 1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99—101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1915 年 2 月 19 日〔3 月 4 日〕以前）《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41 页

论欧洲联邦口号（发表于 1915 年 8 月 23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19 页

*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 年 7—8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66—705 页

给亚·施略普尼柯夫（1915 年 8 月 23 日）《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187 页

反战宣言（1915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46—348 页

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915 年 9 月 19 日）《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355—356 页

俄国的失败和革命危机（1915 年 9 月下半月）《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57 页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 年 10 月 16 日〔29 日〕以后）《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92—393 页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发表于 1915 年 11 月 20 日）《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94—399 页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德莫尔尼。《波斯问题和战争》（1915—1916 年）《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817—820 页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耶格尔。《波斯和波斯问题》（1915—1916 年）《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820—828 页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 年 1—2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716—726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年 1 — 6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

第730—845页

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6年2月8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6页

论俄国当前的口号：不割地的和平和波兰的独立（发表于1916年2月29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1—134页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846—860页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4—354页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8—72页

* **论单独讲和**（发表于1916年11月6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4—132页

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1916年12月〔旧历〕下半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0—201页

告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8—220页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7页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1917年1月1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177—181页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9日〔22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2—259页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7年1月19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3页

* **远方来信　第一封信　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1917年3月7日〔2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1—12页

* **远方来信　第四封信　如何争取缔结和约？**（1917年3月12日〔25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1—347页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7年3月15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7页

告被俘同志书（1917年3月中旬）《列宁全集》第23卷第351页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3月15—16日〔28—29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363—369页

给亚·米·柯伦泰（1917年3月17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90页

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1917年3月26日〔4月8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376—383页

在苏黎世作的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的报告的纲要（1917年3

月 27 日以前）《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437—439 页

共和派沙文主义者的诡计（1917 年 3 月 30 日）《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370—373 页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1917 年 4 月 4 日）《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449—452 页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 年 4 月 10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36—69 页

跟着《俄罗斯意志报》的脚印走（1917 年 4 月 13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90—92 页

是地主和农民的"自愿协议"？（1917 年 4 月 15 日〔27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110 页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 年 4 月 14 日至 22 日〔4 月 27 日—5 月 5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133—138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四日）通过的决议（1917 年 5 月 5 日〔4 月 22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174—176 页

资本家怎样理解"可耻"和无产者怎样理解"可耻"（1917 年 4 月 22 日〔5 月 5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192—193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17 年 4 月 24 日〔5 月 7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04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为捍卫关于战争的决议而发表的演说（1917 年 4 月 27 日〔5 月 10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29—235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说（1917 年 4 月 29 日〔5 月 12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63—268 页

告各交战国士兵书（1917 年 5 月 4 日〔4 月 21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159—161 页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 年 5 月 4—28 日〔5 月 17 日—6 月 10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445—464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战争的决议（1917 年 5 月 12 日〔4 月 29 日〕）《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40—243 页

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70—92页

芬兰和俄国（1917年5月15日〔2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303—306页

秘密条约之一（1917年5月23日〔10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349—350页

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吧！（1917年6月16日〔3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534—536页

有没有通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发表于1917年6月20日〔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40页

* **乌克兰**（发表于1917年6月28日〔15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76—77页

乌克兰问题和俄国执政党的失败（发表于1917年6月30日〔1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84—86页

阶级变动（发表于1917年7月10日〔6月2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118—120页

政论家札记（1917年9月22、23、24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5—41页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至10月1日〔14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294—341页

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6—8日〔19—2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1—158页

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发表于1917年10月7日〔9月24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34页

革命的任务（发表于1917年10月9日和10日〔9月26日和27日〕）《列宁全集》第3卷第284—293页

*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54—358页

* **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1—323页

告乌克兰人民书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1917年12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38—340页

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3页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1月初）《列宁全集》第26卷第396—400页

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4—470页

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发表于1918年2月24日〔1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5—423页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批准布列斯特条约的决议（发表于1918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183—184页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1918年5月14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39—354页

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18年6月27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29—459页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1918年8月上半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39页

在阿列克谢也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58—60页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16—709页

在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说（1918年11月8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134—146页

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18年12月14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4—346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1919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9—168页

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发表于1919年3月底）《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9—222页

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1919年9月2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9页

告红军战士同志们（1919年10月1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52页

致土尔克斯坦共产党员同志们（发表于1919年11月7—1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7页

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草案（1919年11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141—143页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9页

在勃列斯尼亚区纪念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义大会上的演说（1919年12月19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6—247页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1919年12月28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59—265页

在勃列斯尼亚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发表于1920年1月28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17—273页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1920年2月2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87、294页

* **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3月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52—366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全集》第31卷第8—11、39页

致印度革命协会（发表于1920年5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8页

给英国工人的信（1920年5月3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9—120页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1920年6月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70—276页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10月15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0页

在全俄缝纫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2月6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5页

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会议上的演说（1921年2月28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9页

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35页

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0月29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62—64页

就俄国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给政治局的信（1921年12月22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5页

*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23—28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1—122页

*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给政治局的便笺**（1922年10月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法尔勒曼提出的问题（1922年10月27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47—348页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30—31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8—634页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1915—1916年)

① **拉维斯太因论巴尔干问题** 《列宁全集》第39卷第7—8页

② **施尔德尔。《世界经济文汇》第5卷** 《列宁全集》第39卷第18—19页

③ **《社会经济概论》摘录** 《列宁全集》第39卷第49—50页

④ **《银行》杂志摘要** 《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页

⑤ **施尔德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第一卷** 《列宁全集》第39卷第88—90页

⑥ **叶·阿加德。《大银行与世界市场》** 《列宁全集》第39卷第106—127页

⑦ **关于扎克的《俄国工业中的德国人和德国资本》一书**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64—266页

⑧ **莫利斯。《殖民史》**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0页

⑨ **斯特芬《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8—279页

⑩ **伊施哈尼安。《俄国国民经济中的外国成分》**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1—292页

⑪ **《经济学家》论战争和《每日电讯》**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5—306页

⑫ **连施。《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战争》**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1—363页

⑬ **在俄国的财政资本**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4—366页

⑭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 《列宁全集》第39卷第452、478—479页

⑮ **《国际政治评论》**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52页

⑯ **恩格斯。《欧洲能否废除武装?》**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57—558页

⑰ **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国际问题论文》**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61—563页

⑱ **殖民占领和战争一览表**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69—574页

⑲ **《德国和世界大战》**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88—591页

⑳ **霍茨施。《俄国的土尔克斯坦》**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97—600页

㉑ **吕多尔费尔。《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 《列宁全集》第39卷第621页

㉒ **乌布利希。民族和帝国主义**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689 页

㉓ **"布莱斯佛德"笔记**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732—735 页

㉔ **克瓦弗利格。《1774—1914 年俄国的扩张政策》**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761—768 页

㉕ **1870—1871 年以后列强的国际政策中最主要的危机**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775—777 页

㉖ **1870 年以来世界历史主要资料综合试作（埃格耳哈夫和其他资料）**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778—799 页

㉗ **倍倍尔论德俄战争**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833—834 页

㉘ **《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演讲的提纲**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836—845 页

㉙ **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863 页

斯 大 林

*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发表于 1901 年 11 月、12 月）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7—18 页

*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1904 年 9 月 1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30—31、37—39 页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1905 年 1 月）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65—70 页

* **各民族友爱万岁！**（1905 年 2 月 13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71—73 页

* **告公民书。红旗万岁！**（1905 年 2 月 15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75—78 页

* **反动加紧起来了**（发表于 1905 年 10 月 15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55—159 页

公民们！（1905 年 10 月）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67—170 页

告全体工人书（发表于 1905 年 10 月 19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71—174 页

梯弗里斯，1905 年 11 月 20 日（发表于 1905 年 11 月 20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75—177 页

两次搏斗（论一月九日事变）（1906 年 1 月 7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179—186 页

* **国际反革命**（发表于 1906 年 7 月 14 日）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227—

229 页

“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发表于 1906 年 12 月 4 日）《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265 页

无产阶级在斗争，资产阶级在和政府缔结联盟（发表于 1907 年 3 月 17 日）《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3—27 页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发表于 1907 年 6 月 20 日）《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45—48 页

高加索来信（1909 年 12 月 20 日）《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168 页

巴库委员会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1910 年 1 月 22 日通过）《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187 页

五一万岁！（1912 年 4 月初）《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09—214 页

新的时期（发表于 1912 年 4 月 15 日）《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16 页

奔流起来了！……（发表于 1912 年 4 月 19 日）《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31—233 页

* **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1913 年 1 月 9 日）《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63—267 页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89—290 页

连纳惨案一周年（1913 年 1 月 1、2 日）《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365—368 页

论战争（发表于 1917 年 3 月 16 日）《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6—10 页

论取消民族限制（发表于 1917 年 3 月 25 日）《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17—20 页

二者必居其一（发表于 1917 年 3 月 26 日）《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21—23 页

反对联邦制（发表于 1917 年 3 月 28 日）《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24—30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1917 年 4 月 29 日）《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47—53 页

反革命和俄国各民族（发表于 1917 年 8 月 13 日）《斯大林全集》第 3 卷第 195—198 页

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7 年 11 月 14 日）《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3—6 页

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1917年12月12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7—14页

关于芬兰的独立（1917年12月22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23页

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发表于1917年12月31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4—25页

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1918年1月15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8—29页

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发表于1918年3月26—27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47—48页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发表于1918年4月3—4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63—68页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发表于1918年11月6日和19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0—142页

* **我们在东部的任务**（发表于1919年3月2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0页

* **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6页

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920年11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47页

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920年11月17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52—359页

* **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发表于1921年2月10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0—24页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921年3月10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7—30页

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1921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8—59页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发表于1921年11月6—7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91—94页

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回忆）（发表于1922年5月5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05页

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发表于1922年11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14—119页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1922年12月30日）《斯大林

全集》第5卷第130页

* **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发表于1923年3月24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53—155页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1923年4月23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92—213页

* **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初）《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7—69页

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4页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发表于1925年7月4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9—192页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2页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5页

致卡冈诺维奇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1926年4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5—139页

给连纳的工人们（1927年2月22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51页

* **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1927年3月1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56—158页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7年3月29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0—181页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99页

*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0、314—322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7月2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5—8页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页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3—102页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9—320页

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1934年7月19日）《斯大林文选》第656—662页

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 年 8 月 8 日）《斯大林文选》第 19—20 页

在塔吉克斯坦和土尔克明尼斯坦先进的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2 月 4 日）《斯大林文选》第 69 页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 年 9 月）《斯大林文选》第 205 页

告人民书（1945 年 9 月 2 日）《斯大林文选》第 437—438 页

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1948 年 4 月 7 日）《斯大林文选》第 506 页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表于 1950 年 6 月 20 日）《斯大林文选》第 526、530 页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2 年 10 月 14 日）《斯大林文选》第 653 页